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1月(上)
总第189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6 年 1 月 (上)
总第 189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1 月 15 日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SHE HUI YU GONG YI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哞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马强 / 马贵荣 / 万沣毅 / 王红 / 王保峰 / 王德立 / 王守红 / 王国权 / 王坚松 / 王政
王哲 / 白浩扬 / 布朋印 / 冯军伟 / 田瑞建 / 卢莎 / 邓富友 / 布宏雷 / 石恒平 / 田野 / 闫新勇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长鹏 / 刘漩 / 孙明 / 朱红艳 / 任璐 / 辛福 / 吴春华 / 何书一
何宗尉 / 李永华 / 李梓英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斌 / 李军 / 肖玲 / 苏芬芬 / 陈勇 / 陈承 / 谷学亮
杨航 / 杨会民 / 杨同喜 / 杨雨 / 杨高磊 / 杨扬 / 杨威 / 邵佳 / 张鼎 / 张燕蕊 / 张冬 / 张汉英
张金霞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范娱艳 / 侯军旺 / 侯俊勇 / 赵燕成 / 赵建苹 / 赵容榴 / 胡刚
徐志昌 / 高蕾 / 高云辉 / 郭保生 / 郭晓利 / 耿庆山 / 柴宏 / 秦一杰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鲁兵库 / 裴凯峰 / 联凡 / 惠熙玲 / 蒋红超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裴旭峰 / 臧忠燕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新年新起点，奋进“十五五”新征程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激荡着亿万人民的奋斗豪情，也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指明了奋进方向。

过去五年，我国社会公益事业交出了厚重暖心的民生答卷。社会工作首次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党对公益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全面构建，其战略地位被提升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目前，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万家、净资产突破数千亿元，数百万家社区社会组织扎根基层沃土，数十万家机构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每年数千亿元资金精准投向民生领域，慈善帮扶与政府救助深度融合，织密织牢了守护万家灯火的民生安全网。

在社会公益领域，无数平凡身影正用行动诠释着责任担当。从扎根社区守护“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工与志愿者，到奔波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公益项目专员；从数以百亿次参与互联网募捐的爱心网民，到默默传递善意的企业家与普通工薪族；从用数智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科技从业者，到为公益事业搭建桥梁的社会组织工作者……他们以点滴善举汇聚成温暖洪流，让“人人慈善、时时慈善、处处慈善”的理念逐步照进现实。

过去五年，我们见证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中央财政连续五年投入数亿元资金支持重点领域服务，推动资源持续下沉基层；数智技术打破需求与供给的壁垒，让“政策找人”“服务上门”成为常态；全国数百万社会工作人才扎根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成为连接党和群众的“贴心人”。

“十五五”时期，是社会公益事业向高质量迈进的关键阶段：数字化转型需向更深层次探索，精准服务需向更精细维度打磨，协同治理需向更紧密衔接升级。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党建引领的“主心骨”更坚实，让政府与慈善的“协同力”更强劲，让社会各方的“参与度”更广泛，就能在“一老一小”服务、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不断突破，为民生福祉添砖加瓦。

岁月不居，奋斗永恒；征程万里，初心如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奋斗筑牢公益根基，以拼搏彰显时代担当，以团结凝聚磅礴合力，携手构建人人参与的公益生态，为守护民生福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坚实力量！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6 年 1 月 上
总第 189 期

专题报道

寻找一束光：社工机构的本土实践与范式创新
——以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8 年探索实践为例 …… 张会营 冯 山 宋红源

心理茶馆

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困境与出路——“心理家教”模式的本土化探索 …… 韦志中 刘金凤 李新杰 / 01
从文化对话到实践创新：东西方社区心理服务模式的比较研究——兼论“心理茶馆”的本土价值
…… 迦 铎 听 雨 余晓洁 / 03

一老一小

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研究 …… 王靖雅 / 05
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 邓俊芬 张美霞 程贝贝 李淑香 / 08
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李欣琪 卢艺莹 马锐华 吴汐柔 李 姗* / 11
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系统构建与实证 …… 徐群英 / 14
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代际困境与突破 …… 邓 特 / 17
新时期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 范石娴 / 20
“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治理养老诈骗研究 …… 谭云霄 / 2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探究 …… 王道君* 施雨桐 鄢建明 / 26
小学生意外伤害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刘宗浩 季 玲* 吴 瑶 唐 飞 文清桦 / 29
元宇宙场景赋能：赣州市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社工介入新模式探索 …… 刘祥琳 / 32
儿童主任政策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 …… 侯飞飞 / 35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研究——基于文山州 L 村的调研 …… 袁宗泽 孙 毅 / 38
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个案干预研究 …… 王 菁 / 41
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的实践与优化路径研究 …… 周君丽 / 44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主要难题与创新路径研究 …… 李怡淼 / 47

百家争鸣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径研究 …… 殷金桃 / 50
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 曾晓鹿 / 53
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机制创新研究——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实践中心建设为例 …… 侯玉叶 / 56
茂名市乡村地区健康科普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 陈宇涛 张裕海 曾佳利 / 59
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关系研究 …… 金 蕊 赵 雪 / 62
在职校班级实施学生“5+N”自主管理的策略 …… 颜仁明 / 65
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模式的比较研究 …… 倪 燕 张晴晴* / 68
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异化风险与引导策略 …… 刘芳彤 / 71
从生育保障视角看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 …… 刘元元 / 74
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特点及教育支持体系构建 …… 孟智勇 包瑞明 焦玉珍 赵玉平 李 欢 / 77
社会视域下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 何 芳 / 80

医生助理新职业的发展路径与创新型培养模式探索 …… 王海洋 褚亚男* / 83
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分析 …… 王毛毛 / 86
社交媒体使用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 宋 爽 刘昱莹 赵 祎 张小龙 / 89
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方法整合与路径探索 …… 赵广一 高子雯 王晨曦 吴培萌 刘 雨 / 92
高攻击性游戏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 王晨巍 吴昱辰 朱 正 张成涛 王子晔 / 95
数智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提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服务研究 …… 胡思远 徐韦云* 闫鹏飞 李 川 / 98
社会团体助力科研助理制度：驱动科研发展与人才培养 …… 常怡婷 王 航* / 102
“医育融合”视域下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马玲玲 / 105
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路径创新探究 …… 李卓洋 / 108
基于 SWOT 分析法的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实践与思考——以 B 血液中心为例 …… 聂宁涟 / 111

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路径探析 …… 朱 敏 卢友权 陈 岚 / 114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创新实践研究——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样本 …… 李英霞 闫万鸿 / 117
杭州市“半城市化”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 张文天 / 120
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实践路径 …… 王秀丽 / 123
“医养结合”模式下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的伦理困境与可行性对策研究——以 X 市某社区为例 …… 李 想 黄翊浩 袁冬华* / 126
地方精神资源融入家风建设对居民自治意识培育的实证研究——以唐山“五种精神”为核心 …… 张 洋 / 129
数字化党建赋能广西基层治理：“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研究 …… 范 峥 / 132
共同富裕视域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优化路径探究 …… 刘恺君 / 135

教学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深度融合——以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 张 雨 许英霞 / 138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路径探索——以“资本市场”课程为例 …… 李东景 张 霞 熊正文 / 141
九型人格理论赋能高校教育管理：晋中信息学院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新探 …… 景彩峰 / 144
基于 OBE 理念的“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融合教学研究 …… 李珂儿 马 琪 秦国华 迪丽扎娃尔·海来提 王 雪 / 147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育人策略研究 …… 王洁琼 / 150
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新思路 …… 陈玥君 / 153
新课标视域下中职英语“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 王潇宁 / 156
高中美术课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策略 …… 施晓敏 / 159
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育人研究 …… 王冠华 柴连明* 武 洋 李多福 郭 敏 / 162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例 …… 金鹏远 / 165
“双带头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水利工程测量”课程为例 …… 刘 岩 江红丽 / 168
新媒体时代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水平提升策略 …… 白晓童 / 171
“双高”院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学融合的路径研究 …… 辛 欣 / 174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策略探究 …… 王澜钧 / 177
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特色路径研究 …… 周 芸 / 180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栏目设置的教学运用研究 …… 许丽媛 / 18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实施路径分析 …… 黄 琳 / 186

“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本科院校行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模式构建 …… 陈晓玲 / 189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工科专业教学改革实践——以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为例 …… 唐　晶　夏静芬　张　建 / 192

思政论坛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研究 …… 沈　莹　单银丽　沈　意　陈玉洁 / 195
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 王　杨 / 198
数字化时代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 张　月 / 201
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的优化思路 …… 侯霁洋　徐浩茗 / 204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辅导员思政教育模式探索 …… 李　倩 / 207
基于课程思政的最大无关组教学设计 …… 朱星星　张宇轩 / 210
“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 宋季倪 / 213
“大思政课”理念内涵、特征及研究价值 …… 曹雯欣　刘福森 / 216
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探究 …… 武文杰 / 219
职业教育视域下中高职残障学生思政课育人体系研究 …… 周　琴 / 22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 祁彦恬 / 225
主旋律影视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 关　钵 / 228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 李斯瑶 / 231
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下资助育人模式研究 …… 周一汛 / 234
新时代高校“银龄行动”助推“大思政课”的路径研究——以河南省高校为例 …… 李鑫悦 / 237

学海探骊

浅谈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 …… 申艳玲　李海玲　王　琳 / 240
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路径探究 …… 赵　钰 / 243
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研究 …… 林艺凤 / 246
数字时代背景下学生骨干在高校舆情信息工作中的作用探讨 …… 任　瑞　刘艳辉　张珊瑚　李佳洳　葛靖阳 / 249
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五育融合 + 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研究 …… 梁　燕 / 252
“沉浸式”党课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探索 …… 巫健坤 / 255
礼物织情：大学生情侣亲密关系的维系策略——基于礼物交换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 李朋岳　张云梦 / 258
“家—校—医”协同：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路径探索 …… 姜建平 / 261
在校大学生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 黄韵霖 / 264
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 贾小杰 / 267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 …… 孙云超 / 270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提高政工师自身素养的思考 …… 朱　燕 / 273
数智 AI 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科学开展的策略与实践分析 …… 赵启涛 / 276
高职院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路径研究——以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郑大斌 / 279
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 …… 刘志锋 / 282

艺术长廊

自强不息　书印参同——记书法篆刻名家苏金海 …… 彭一超
逐梦艺术　躬身有为——记知名山水画家刘振江 …… 王　田

寻找一束光：社工机构的本土实践与范式创新

——以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8 年探索实践为例

张会营 冯　山 宋红源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用鲁迅这句名言形容近 20 年来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甚为贴切。2006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本土社会工作由此开启快速发展征程。2007 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先行先试，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 7 个配套文件（简称“1+7”文件），深圳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首批试点地区。

同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龙岗这片改革热土上，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彩虹社工”）注册成立，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作为深圳乃至全国首批专业社工机构之一，彩虹社工从诞生起就致力于架起一座“连心桥”：一端连着党和政府的民生关切，一端牵着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用专业服务帮助服务对象感受温暖、保持尊严、拥有希望、获得成长。

18 年来，秉持“专业、专注、创新、聚变”的核心价值观，彩虹社工聚焦禁毒戒毒、社区服务、教育辅导、基层治理四大服务领域，精耕细作，用实干书写时代答卷：先后荣获民政部社会工作标准化示范单位、全国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深圳十大公益机构、5A 级社会组织等殊荣，连续十年蝉联“深圳优秀社工机构”；更以专业沉淀反哺行业，参与出版 4 部专著、发表百余篇实践成果，参与制定 7 项社会工作地方和团体标准，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而回顾彩虹社工过往 18 年的探索之路，正好与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同频共振、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所谓“见一叶而知秋至”，彩虹社工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教训极具研究性、借鉴性和可复制性。

专业化发展：植根本土的专业之路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是个舶来品，无论其思想理念还是服务手法，均起源于西方，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长足发展，本土化成为必经之路。彩虹社工从 2007 年成立之初，就将“专业勤力、敢想敢为”作为机构核心价值观，始终把专业发展放在首位，鼓励员工敢想敢为，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发



深圳彩虹社工员工大合照。



2009 年 3 月，彩虹社工机构作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试点地区代表接受民政部社工试点评估小组评估，获好评。



2014 年 2 月，彩虹社工专业发展委员会成立。

展路径：一是引进香港先进经验，培育本土专业人才。自 2008 年起，由深圳市民政局和市社工行业协会牵头，聘请香港资深社工到深圳进行一对一帮带督导。彩虹社工抓住这一政策机遇，培养了一大批深怀社工情怀、专业基础扎实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后来都成为机构的核心骨干力量。二是培养本土督导，抱团取暖谋发展。2013 年前后，随着香港督导的陆续撤出，深圳开始培育本土督导人才。为弥补本土督导经验不足，彩虹社工专门成立了由香港顾问、本土督导以及资深社工组成的机构“专业发展委员会”，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完善服务标准、解决疑难案例等，实现了顺利“断奶”。三是注重系统智慧，教学相长同提升。彩虹社工除了每年制定涵盖入职培训、专业能力培训、服务案例大赛、参观交流等方面的年度培训体系外，还成立彩虹社工讲师团，通过内训进行专业能力提升。四是完善服务管理，将专业发展形成制度化设计，规范绩效考核，鼓励专业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时至今日，彩虹社工依然以“一米宽、一万米深”的钻研精神，坚持对专业的深耕细作。

项目化管理：从“人情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蜕变

2012 年，随着深圳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全市 600 多个社区实现全覆盖，深圳社工行业规模快速扩大。为避免岗位社工行政化，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彩虹社工率先开始探索项目化管理，即无论是岗位社工项目，还是公益项目、社区服务中心项目，统一按照“社会问题—需求评估—资源分析—明确对象—确定目标—制定指标—制定计划—经费预算—项目执行—监控评估”的项目管理逻辑来进行运营管理。为了有效配合这一管理理念，同步对机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进行相应调整，逐步建构了“章程—制度—办法—指引”四级管理制度体系，形成了科学完善、操作性强、精细化管理和规范化运作的制度体系，

保证了人人有章可循，事事有据可依。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社工服务机构可能普遍存在的“人情管理”现象，也因为项目化管理的深入贯彻而得到很大改善。得益于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设计，彩虹社工在面对第一次发展高峰时，员工接近 800 人，管理起来依然相对轻松和稳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管理理念和策略，至今仍然适用。

标准化服务：从实践者到标准制定者的跃升

从 2012 年到 2014 年，随着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的逐步深入，来自基层一线的实务经验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同时因人而异、因项目而异、因区域而异的发展不平衡情况逐渐凸显。为了统一开展专业督导和服务管理，彩虹社工从最熟悉和擅长的禁毒、社区、学校三大专业服务领域着手，开启标准化制定工作。2013 年，彩虹社工通过组织机构督导、资深社工以及邀请香港顾问的方式，以彩虹的专业实践为基础，开始探索筹备服务的标准化设计和管理。2014 年，《彩虹社工服务标准化组织系统》（简称 CSO）正式定稿，对项目管理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化操作说明，涵盖基础建设、财务管理、日常管理、服务管理、服务成效、对外拓展、公文存档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明确社区、教育、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包括个案、小组、社区服务、家访以及志愿者管理等定义、服务流程以及对应套表。这也使得彩虹社工成为深圳社工行业首家制定专业服务标准的机构。2015 年，《彩虹社工服务标准化组织系统》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目前该标准被全国上百家社工机构所采用，极大地缩小了不同地域间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鉴于彩虹社工在服务标准化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以此为肇始，彩虹社工先后受邀和承接制定了《深圳社会工作服务指标体系——禁毒领域》，主笔起草了《深圳市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地方标准）、参与起草了《深圳市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地方标准），迄今已先后参与制定 7 项社会工作地方和团体标准。从专业实践者到标准制定者，彩虹社工为社工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产品化建构：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价值的突破

经过前期专业化、项目化和标准化的精准定位与施策，彩虹社工的整体服务水平达到了一个稳健发展的水平。2017 年，在深圳市民政局组织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成效评估中，彩虹社工运营的 19 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荣获 A 级及以上的达 16 家。

在此过程中，彩虹社工要求各项目组执行“631”计划，即各项目组在每个合同期内须按比例策划和实施常规服务（60%）、重点服务（30%）和特色服务（10%）。正是基于这一策略，敢想敢为的彩虹社工研发并实施了一大批极具特色的服务项目，这些“小而美、短平快”的项目，很多可以自主筹款，灵活落地，完全不同于常规的指标类服务。这些项目就像一个个社会产品，可以按照商业化的思路进行营销。于是，社会服务产品化的思路开始在彩虹社工管理团队脑海中思考和酝酿。2016 年，彩虹社工发布“双十计划”，宣布组建十支队伍、研发十个产品，正式启动社会服务产品化探索实践。此后两年间，彩虹社工运用精益创业的理念及其工具，对 41 个服务类产品进行预辅导，加快服务产品化进程，“健康快车”“反毒大篷车”“玩偶旅行家”“交通安全城”“校园零欺凌”“人生影像馆”等一大批代表性社会服务产品雏形喷涌而出。以“反毒大篷车——移动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项目产品为例，该产品采取充气城堡的方式，外形设计为可爱的卡通形象，其中设置毒品基础知识、涉毒感受体验、识毒防害 DIY 互动、社会涉毒报道展示及拒毒大考验等区域，通过灯光、视效、声音等多样化的感官效应，从听、说、看、体验四个维度让参观者零距离认识并了解毒品，体验其危害性。截至目前，“反毒大篷车”项目已经在广东、广西、重庆、河南、四川、辽宁等 15 省市授权推广，累计在深圳、广州、郑州等 20 多个地市落地，开展服务 300 余场次，累计获益群众 20 余万人，创收 400 万元。同时，先后获得中国公益慈善大赛百强项目、首届深圳市青少年禁毒项目大赛一等奖等荣誉，成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化推广。“反毒大篷车”项目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为机构带来多少收入和荣誉，而在于通过它的实践探索，证明了社会服务产品化是一条可行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道路，社会工作可以有“第二条路”去选择。

实体化运作：从依赖资助到自我造血的转型尝试

如果说社会服务产品化是一个浅层次的探索，那么市场化运作就是社会服务产品化的未来方向，亦即依托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手法，借用市场化的思维和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受限于财政紧缩的客观现实，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减，社会行业整体规模缩小。

这些外部变化倒逼社工机构不得不另寻出路，开拓新的收入来源。而彩虹社工再一次走在了行业的前列，早在 2018 年，伴随着产品化的逐步推进，就已经开展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首先，彩虹社工单独注册成立了一家实体公司，以便于与市场接轨，更有利于通过市场化途径实现机构的所有业务布局。其次，发挥学校和禁毒社工优势，研发了一批儿童青少年类服务产品，包括“自然里”等研学游学类产品，以及“高考博物馆”等心理减压类服务产品，尝试通过市场化实现从 G 端创收向 C 端收费的实践转型。最后，尝试跨界合作，比如与科技公司合作，联合开发“好社工”服务平台，意在打通社会接口，链接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此外，



2024 年 3 月，张会营理事长赴贵州安龙县万峰湖镇民族小学探访慰问。

还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社会化运营”政策倡导，以“空间换服务”的策略，通过经营“长者服务站”“一针一线”等市场化项目，探索社会工作的实体化发展之路。虽然目前彩虹社工还在不停地摸索和验证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道阻且长但前途光明的路。

社会化参与：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专业情怀

作为内地社会工作行业先行先试之地，深圳的社会工作发展一直处于行业引领地位。同样，深圳首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基本上在全国处于头部地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彩虹社工是其中一员。早在 2009 年，民政部对深圳市龙岗区等全国首批社会工作试点地区进行评估验收时，彩虹社工即作为社工机构代表，接受了评估小组的全面评测，并获得了一致好评。在 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彩虹社工受邀先后在河南郑州、广东惠州和山西太原等地成立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深圳彩虹的社会工作核心理念、策略、管理、经验等整体迁移，成功嫁接到了其他省（区）市。

2020 年以来，考虑到各地社会工作政策及本土机构蓬勃发展的现状，彩虹社工调整策略，不再进行新的机构扩张，而是以智力支持、标准输出、督导顾问等形式，积极参与到其他省（区）市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中。据不完全统计，18 年来，彩虹社工先后接待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工同行交流来访 380 余场次，开展督导顾问及培训赋能活动 200 余场次，与社会工作专业相关高校互动交流 60 余次，建立社会工作实践实习基地 10 余个。同时，彩虹社工积极参与社会事件的处置和社会政策的落地，从汶川地震到茂名泥石流，从“富士康连跳事件”到“新疆喀什社工站”，彩虹社工都组织优秀员工积极参与，一个不落。此外，彩虹社工还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其他省（区）市社会工作均衡发展。比如 2024 年，通过参与民政部主导的深湘“牵手计划”，与湖南当地社工机构携手，成功推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学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顺利落地，开启了当地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先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彩虹社工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优良传统，凸显了彩虹社工、深圳社工，乃至中国社工的历史使命与专业情怀。

结语

18 年风雨兼程，彩虹社工从深圳龙岗起步，逐步走向全国，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一面旗帜。回顾这 18 年的发展历程，从专业化发展、项目化管理、标准化服务、产品化建构到实体化运作、社会化参与，每一步都是中国本土社工机构成长的生动实践。

即使到今天，社会工作在国内仍然还是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它不同于政府部门，也不同于企业单位，甚至与其他的社会团体、慈善组织都有不同之处，因为它有更强烈的关注民生困境、解决社会问题的天然使命。尤其是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社会工作正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如何精准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是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都必须共同面对和回答的历史之问。

而彩虹社工，过去在、现在还一直在、未来也将继续在努力寻找这一束光。

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困境与出路
——“心理家教”模式的本土化探索

韦志中 刘金凤 李新杰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情绪困扰、压力应对不良等心理问题频发，部分青少年甚至因此休学，此类问题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实践中，不少青少年因课堂挫折、学习压力等出现不愿上学等情况，而家长与社会在应对此类问题时往往陷入认知误区，导致小的心理困扰逐步发展为长期心理障碍。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领域的服务模式与认知导向，已难以匹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实际需求，亟须探索本土化的创新路径。

韦志中基于长期青少年心理辅导实践，提出“心理家教”模式，主张打破传统心理咨询的医疗病理定位，将青少年心理咨询重构为心理教育，以学科辅导的逻辑开展青少年心理服务。这一模式不仅为摆脱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困境提供了全新思路，也为推动中国本土化青少年心理工作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案。本文结合具体实践案例，深入剖析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核心困境，系统阐释“心理家教”模式的内涵与实践路径，以期为优化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一、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核心困境剖析

结合实践案例与行业现状，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领域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认知定位、评估标准、服务模式三个核心层面，三者相互关联，共同制约了青少年心理服务的质量与成效。

（一）认知偏差：心理咨询的医疗化倾向与发展性问题的病理化误读

当前大众对青少年心理咨询的认知存在显著偏差，普遍将其等同于心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赋予其强烈的医疗化属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青少年的发展性心理问题被过度病理化——将“遇到问题的青少年”误判为“有问题的青少年”。例如，部分青少年因课堂回答问题受挫产生羞耻感、因学习压力增大出现逃避情绪等，本质上均为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性问题，是青少年在心理发展阶段因适应能力不足而出现的暂时性困扰。但在医疗化认知导向下，这类问题往往被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甚至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等病症。

韦志中在实践中发现，某广州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因课堂挫折、学习压力出现休学倾向，家长最初均试图带孩子进行心理疾病诊断，而非寻求适应性辅导。这种认知偏差不仅会加剧家长与青少年的心理负担，还会让青少年产生“我有病”的负面自我认知，进而逃避社交与学习，形成恶性循环。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心理普查过度渲染了青少年抑郁症高发的态势，以夸大化的统计数字强化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恐慌，进一步固化了“发展性问题 = 心理疾病”的错误认知。

（二）评估标准错位：量化测评的滥用与发展性视角的缺失

当前青少年心理评估普遍依赖量化测评工具，将动态变化的心理状态简化为静态的分数指标，忽视了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性与可塑性。实践中，部分心理测评仅通过几道题目就将青少年判定为“抑郁”“焦虑”，却未考虑测评结果可能受青少年短期情绪波动、近期挫折体验等暂时性因素影响。正如韦志中所比喻的，“这就像司机驾车剐蹭后，就被判定为不会开车一样”，忽视了问题的阶段性与可解决性。

这种错位的评估标准存在三大弊端：一是缺乏发展性视角，未能认识到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会随着成长与正向引导不断提升，将暂时性的适应不良固化为永久性的心理缺陷，忽视了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动态可塑性。二是滋生责任推卸之风，部分学校以心理测评结果为依据，将青少年的适应问题简单归因于“个人心理疾病”，进而推卸教育与引导的主体责任，导致休学青少年难以获得学校的针对性支持与帮助，只能被动接受单一的“治病”式干预。三是固化标签化认知，过度依赖静态测评结果给青少年贴上“心理有缺陷”的标签，既会加重青少年自身的心理负担与自我否定情绪，也会引发周围人群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压缩他们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的社会空间。

（三）服务模式固化：单一咨询导向与个性化教育需求的脱节

传统青少年心理咨询模式以“问题解决”为核心，聚焦青少年已显现的心理问题，沿用“咨询—治疗”的单一流程，忽视了对青少年心理品质的系统性培育。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十分突出：其一，学校心理教师精力有限，很难针对每名青少年开展个性化、持续性的跟踪辅导，难以精准匹配不同个体的成长需求。其二，“问题导向”的咨询模式容易放大青少年的负面认知，让他们陷入“我是问题个体”的自我标签化认知，削弱其主动

提升问题应对能力的内生动力。更为关键的是，传统模式并未触达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核心需求——心理品质的锤炼与认知能力的提升。青少年遭遇的多数心理困扰，本质上是心理“偏科”引发的适应能力短板，比如心理素质薄弱、认知思维僵化、抗压耐挫能力不足等。传统咨询模式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根源上夯实青少年心理“学科”的基础，最终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难以从根本上化解。

二、摆脱困境的出路：“心理家教”模式的核心内涵与实践逻辑

针对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面临的核心困境，韦志中提出“心理家教”模式，核心在于以“心理教育”替代传统“心理治疗”，以“学科化辅导”替代病理导向的咨询，由此构建起一套贴合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兼具本土化特色的服务体系。

（一）核心内涵：从“病理治疗”到“心理教育”的认知重构

“心理家教”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认知层面的重构，即打破传统认知，将青少年心理咨询重新界定为“心理教育”，同时将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从“治疗者”转变为“心理老师”。这一模式明确主张“做青少年的心理咨询，本质上就是做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并提出将心理素养作为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的独立学科，认为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适应不良，本质上是“心理偏科”的表现，而非所谓的“心理病症”，需通过系统性的“心理补课”，逐步提升其综合心理品质。

相较于传统咨询模式，“心理家教”模式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视角的根本性转换，摒弃病理化标签化认知，转向发展性视角，将青少年定位为“需要提升心理能力的学习者”，而非“待治疗的病人”；其二，目标的深层次升级，跳出“解决单一具体问题”的局限，聚焦于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整体提升、认知弹性的逐步拓宽，以及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锻造；其三，关系的平等化重构，以“老师—学生”的平等辅导关系，取代“医生—病人”的不对等治疗关系，有效弱化青少年的心理防御与抵触情绪，让辅导更易落地。

（二）实践逻辑：以“学科辅导”为框架的个性化培育路径

“心理家教”模式遵循“评估基础—精准补课—能力提升”的学科辅导逻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实践流程。第一步，评估心理“学科”基础，全面分析青少年的心理素质、认知模型、情绪调节能力等核心维度，明确其“心理偏科”的具体方向；第二步，制定个性化辅导方案，如英语家教针对性补语法、数学家教针对性补几何，心理家教聚焦青少年的薄弱环节，如针对课堂挫折的心理韧性培育、针对学习压力的认知调整、针对人际关系的社交能力提升等；第三步，传授心理学知识与方法，引导青少年主动学习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的基础概念，提升对自身心理发展规律的认知，从“被动接受辅导”转向“主动提升能力”。

这一实践逻辑的优势在案例中得到充分印证：韦志中及其心理茶馆工作人员在辅导休学倾向青少年时，明确告知家长与青少年“不是来做心理咨询，而是来上心理家教课”，让青少年以“补课”的心态参与辅导，有效降低了其心理抵触。同时，通过系统性的心理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帮助青少年认识到“问题是暂时的，能力是可提升的”，进而主动面对学习与社交中的困难，重建学习信心。

三、“心理家教”模式的实施路径与发展建议

推动“心理家教”模式的落地实施，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资源，从理念更新、课程开发、队伍建设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一）更新认知理念：强化发展性视角，破除医疗化迷思

首先，需面向家长、学校与社会开展认知普及，明确“青少年心理问题多为发展性问题，而非心理疾病”的核心观点，破除“心理咨询 = 治病”的医疗化迷思。可通过公益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传播“心理家教”的核心理念，让家长理解“心理是一门可学习、可提升的学科”，引导青少年以“补课”的积极心态接受心理辅导。其次，需规范心理普查与测评的使用，避免过度量化与标签化，强调评估结果的参考性与暂时性，突出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可塑性。

（二）开发特色教材：构建系统化心理教育课程体系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材多以游戏活动为主，缺乏系统性的心理学知识传授，难以满足“心理家教”的实践需求。应组织专业团队开发本土化心理教育教材，将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可理解、可应用的内容，如同语文、数学教材一样形成标准化课程体系。例如，可设置“人际关系的从众效应”“情绪调节的基本方法”“压力应对的认知策略”等专题，帮助青少年系统学习心理知识，提升心理素养。同时，可借鉴广州外国语学校引入美国大学心理学教材开展教学的经验，结合中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优化课程内容。

（三）培育专业队伍：打造“心理家教”核心人才群体

“心理家教”模式的落地需要一批兼具心理学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的核心人才。一方面，应加强对现有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引导其转变角色认知，从“咨询师”转向“心理老师”，掌握学科辅导式的心理教育方法；另一方面，可推动高校心理学专业增设“青少年心理教育”方向，培养兼具心理学理论基础与教学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同时，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心理家教”服务，如借鉴新东方等教育（下转 03 页）

从文化对话到实践创新：东西方社区心理服务模式的比较研究
——兼论“心理茶馆”的本土价值

迦　铎 听　雨 余晓洁

一、全球化下的心理学知识流动与本土实践创新

现代心理学自诞生起，便深深烙印着西方（尤其是欧美）的文化价值观与方法论预设。以社区心理健康中心为代表的西方服务模式，以其高度的专业化、标准化和临床有效性，伴随全球化进程成为许多非西方社会借鉴的蓝本。这一“心理学的本土化”过程，即对外来理论、概念与方法进行翻译、调整和应用，是中国心理学专业化与服务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

然而，这套植根于个人主义、强调内心探索与病理修复的“诊所模式”，在遭遇中国强调关系、面子、家庭本位与集体和谐的文化脚本时，常显露出深层张力。大量民众倾向于将心理困扰“躯体化”表达，或通过家庭、熟人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化解，对踏入正式“心理咨询室”心存顾虑。这种困境催生了学界对“本土心理学”的呼唤——从自身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经验中，发展出理解心理与行为，并开展助人实践的知识体系。

“心理茶馆”正是在此背景下，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智慧中生长出典型的“本土心理学实践”。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引进与适配，而是创造了一套融合心理疏导、矛盾调解、情感支持与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关系性范式。本文旨在从“心理学本土化”与“本土心理学”这两股力量互动与融合的视角，系统比较“心理茶馆”与“西方传统心理咨询室”的核心理念、运作逻辑与实践形态，进而探讨在中国语境下构建包容性、多层次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可能路径。

二、核心理念溯源：两种知识传统与实践逻辑

（一）西方传统心理咨询室：专业主义范式与心理学的本土化实践

在中国设立的标准化社区心理咨询室，本质上是西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范式本土化的产物。其核心理念承袭了科学心理学与医学模型，将心理困扰定位为个体内在认知、情绪或行为的机能失调，需由受过严格标准化训练的专业人员，在价值中立、保密私密的空间内，运用特定技术进行干预。

（上接 02 页）机构的个性化辅导模式，打造专业化的“心理家教”服务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个性化、持续性的心理辅导。

四、结论与展望

当前青少年心理咨询领域存在的认知偏差、评估标准错位、服务模式固化等困境，根源在于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忽视与医疗化思维的泛滥。韦志中提出的“心理家教”模式，通过认知重构、视角转换与路径创新，将青少年心理咨询转向心理教育，为摆脱行业困境提供了全新思路。这一模式不仅契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实际需求，更顺应了中国本土化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创新方向，有助于推动青少年心理服务从“问题治疗”向“能力培育”转型。

未来，“心理家教”模式的发展需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深化认知普及，破除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病理化迷思；二是加快特色教材开发，构建系统化、标准化的心理教育课程体系；三是强化专业队伍建设，提升“心理家教”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可结合具体实践案例，进一步细化“心理家教”在不同类型青少年心理困扰（如课堂挫折、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等）中的应用流程，优化个性化辅导策略。相信随着“心理家教”模式的不断完善与推广，将为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事业发展、培育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作者：韦志中，广州市南沙区粤港澳大湾区本会团体心理咨询研究院；刘金凤，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李新杰，青岛心理合作社）

这一模式在中国的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心理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进程，为应对明确的临床心理障碍提供了有效工具。但其挑战在于，原生于个体主义文化的“价值中立”“界限清晰”等原则，有时会与中国社会重视人情往来、关系调解与“事理人情”相融合的求助期待产生摩擦。

（二）心理茶馆：关系主义范式与本土心理学的生成

心理茶馆更多体现了从中国社会文化肌理中内生出的本土心理学智慧。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传统文化中“修身养性”“以和为贵”的观念，以及基层社会“说理调解”“人情互助”的实践传统。它不将心理问题单纯视为个体内在的“病”，而更看作是“人—家庭—社区”关系网络的失调。

因此，其干预目标兼具个体情绪纾解、人际关系修复、社区和谐维护及政策有效传达，是一种“治理型”心理健康促进。它借助“茶馆”这一极具中国文化意涵的平等、开放、生活化空间，以及“泡茶人 / 倾听者”这一非权威的、朋友般的角色，成功地将心理支持“去神秘化”“去标签化”，嵌入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之中。

三、实践比较：两种力量的呈现与张力

两种模式在实践维度上展现出系统差异，反映了背后不同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取向（见表 1）。

表 1 东西方社区心理服务模式的比较

比较维度	西方传统心理咨询室（专业主义范式与心理学本土化实践）	“心理茶馆”模式（关系主义范式与本土心理学实践）	融合视角分析
知识基础	西方科学心理学理论、实证研究、诊断系统	地方性知识、人情事理、传统智慧、基层治理经验	前者提供普适性理论框架与技术，后者提供文化理解与情境智慧，二者需对话互补
问题界定	个体中心的心理病理或发展性议题	关系性、情境性的心理社会困扰，常与生活难题交织	本土化模式需关注文化相关综合征；本土实践需提升对典型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
核心方法	结构化会谈、标准化干预技术（如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等）	非结构化谈心、倾听、调解、人文关怀、资源协调	技术需要文化调适方能有效；本土方法需系统化总结提炼，形成可传播的经验
关系性质	专业性的契约关系，角色清晰、边界明确	拟亲缘的信任关系，角色弥散、边界弹性	专业关系确保伦理安全；以亲缘关系降低求助门槛。需要探索符合中国文化的专业关系模式
效果评估	侧重于症状减轻、功能改善的标准化量表	侧重于关系和谐、问题解决、满意度等质性指标	需要发展兼具文化敏感性与科学严谨性的评估体系
优势	专业深度高、干预规范，适合中重度与个人成长议题	可及性极高、病耻感低、文化亲和力强、预防与早期干预优势突出、成本低	
局限	可及性不足、文化敏感性待提升、与社区系统联结弱	专业深度有限、效果评估难、人员专业性参差不齐、依赖个人魅力与社区资本	

四、走向有机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的分层分类协同体系

未来中国社区心理服务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避免将“心理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心理学”实践对立起来，而应致力于促进二者的创造性融合与协同共生，形成“本土智慧为体，专业科学为用”的良性生态。

（一）理念融合：超越二元对立

应认识到，专业心理咨询室提供的规范化服务，是现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必要支柱；而心理茶馆代表的融合性、生活化服务，则是深植中国社会的活力根基。二者共同构成了服务不同需求层次、适应不同文化情境的连续谱。

（二）路径融合：构建协同网络

人才协同：建立“专业督导支持本土实践，本土经验反哺专业教学”的双向通道。鼓励专业心理咨询师下沉社区，为茶馆“泡茶人”提供定期督导与培训；同时，将本土实践中蕴含的文化智慧纳入专业人才培养课程。

服务协同：建立“心理茶馆作为前端枢纽与筛查网络，专业咨询室作为后端资源与深度干预支撑”的转介协作机制。茶馆负责广泛接触、初步支持和问题识别，对于需要深入专业干预的情况，提供平滑、友好的转介路径。

空间与功能协同：在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可设计融合空间，设“茶馆式”开放活动区用于日常接待、团体活动与心理教育；设“咨询室式”私密静聊室用于个体深度咨询。形成“外松内紧、高低搭配”的服务格局。

知识协同：鼓励行动研究，系统总结、提炼心理茶馆中行之有效的本土助人理念与方法（如“情理法”结合的矛盾调解），对其进行心理学语言的转化与阐释，丰富中国本土的咨询理论与技术。

五、结论与启示

心理茶馆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社会在面对普遍性心理健康需求时，一次成功的本土心理学实践的涌现。它并非对源于西方的专业心理学知识的拒绝，而是以一种深植于自身文化土壤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与补充，凸显了心理服务的关系性、情境性与治理性维度。

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表明，中国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完善，必须依靠“心理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心理学”发展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进与有机融合。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继续深化专业心理学知识的本土调适与应用，建立高标准、规范化的服务体系，也要高度重视并系统培育从中国社会自身生长出的心理服务形态与智慧，使其获得应有的认可、支持与提升。

这一融合创新的路径，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中国人民多元、多层次的心理健康需求，助力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也为全球心理学界贡献了一个如何处理心理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文化（下转 05 页）

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研究

王靖雅

摘要：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儿童失去了家庭的庇护，需要依靠儿童福利机构获得照顾和支持。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活动，在儿童福利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协助儿童福利机构，为孩子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保障，对儿童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全面检测和记录，还可以搭建儿童福利机构与所在社区之间的桥梁，积极开展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儿童个体的全面发展。本文主要阐述了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并从精准帮扶每一位儿童、扩展服务边界与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福利机构；作用；社会工作；儿童

随着儿童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儿童福利机构功能定位已逐步从基本的衣食供给扩展到心理支持、能力培养和社会融入等多元维度，然而现有服务难以充分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可以通过科学的需求评估、个性化的服务计划制定及动态的效果监测，实现服务升级。例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进行学习，该理论与儿童在福利机构中的成长需求高度契合，可以为社会工作者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有力依据。社会工作者应强化专业服务能力建设，全面评估儿童多维度需求，制定个性化成长计划，建立动态档案管理系统，通过定期复盘调整干预策略。社会工作者还应构建协同治理网络，完善跨学科团队协作机制，加强政社企联动的资源整合，进而改善儿童成长环境。

一、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研究

（一）直接服务功能

社会工作者的直接服务功能贯穿于儿童生活的各个环节，会密切关注儿童的饮食、睡眠、个人卫生等生活细节，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安排合适的食谱，教导儿童保持个人清洁，培养儿童的自理能力。社会工作者还会为儿童创造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合理布置宿舍或者生活区域，选择合适的家具和装饰品，并定期检查房屋设施的安全性，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社会工作者会对每个进入福利机构的儿童进行详细的个案评估，了解其兴趣爱好、认知能力、心理状态、身体状态等信息，进而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服务计划，确保服务的针对性；同时在实施服务的过程中，会持续跟踪儿童的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服务策略，进而保证服务的质量。较多儿童福利机构内的孩子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起学习辅导的责任，评估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还可以与当地学校合作，争取让孩子都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可协调特教老师、康复师等专业人员，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最大限度地发掘儿童的潜能[1]。

（二）心理支持功能

较多进入福利机构的儿童，对于自己的出身和归属感到迷茫，没有家庭可以依靠，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其在自我认知上产生偏差，从而影响其自尊心的建立。

（上接 04 页）特殊性、如何促进全球知识流动与地方知识创新的“中国方案”。它启示我们，最有效的心理服务，或许是那些既能深入个体心灵深处，又能紧密编织社会支持网络；既具备专业的严谨性，又充满文化的生命力的实践。

（作者：迦铎，西藏心旅伴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听雨，广州市治心心理咨询工作室；余晓洁，惠州市心理健康文化协会）

虽然在福利机构中，工作人员精心照顾，但有限的人力无法满足每个孩子对亲密关系的渴望，长期缺乏足够的情感互动，使部分儿童出现依恋障碍。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可以建立信任关系，用耐心、爱心去倾听他们的故事，注重儿童的感受。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针对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心理辅导方案，对于有严重自卑情结的孩子可以采取正面肯定的方式，帮他们发现自身的优点，而且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采用专业的心理治疗法，达到良好的治愈效果。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可以开展相关主题的小组团体活动，如友谊之旅，通过类似的活动促使小组成员共同商讨策略，培养其执行力、问题解决能力，克服社交恐惧，感受集体力量的温暖。对于遭受过创伤的儿童，还可以运用叙事疗法帮助孩子重构记忆，抚平过去的伤痛，帮助孩子将受害者的心态转化为幸运者的心态，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良好[2]。

（三）保障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进步，由于多方面原因，一些儿童处于困境之中，需要特殊的关怀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了解儿童的需求和困境，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宣传儿童的权益和福利，提高公众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度。在维护儿童权益方面，可以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缺失问题，向社会发起倡议活动，促使相关部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学校设施，还可以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建立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体系。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可以制定合适的教育计划，帮助其攻克学习难关；针对遭受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可以在情感上给予安抚和支持。通过这些服务的介入，可以及时发现儿童面临的问题，并给予解决，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此外，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专业人员的合作，社会工作者可以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发挥医护人员、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为儿童提供服务，同时社会工作者还会与家庭、社区等外部力量进行沟通协调，为儿童回归家庭和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儿童成长过程中，良好的成长环境、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社会工作者介入儿童福利机构，可以细致评估每一位儿童的情况，包括学习风格、智力水平等信息，基于此量身定制教育计划，确保教学内容和方法符合儿童的学习节奏和发展需求。还可以基于评估结果，开展不同层次的教学活动，使每个孩子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充分锻炼，提高学习能力。社会工作者可以组织各类艺术活动，如绘画、音乐、舞蹈等，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激发其创造力。还可以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观察动植物的生长习性，引导儿童体验种植过程，将抽象的知识具象化，扩宽孩子们的认知视野。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可以设计一系列需要孩子们互相合作的游戏项目，如拔河比赛、接力赛，引导儿童分组完成任务，在该过程中倾听他人意见，深刻体会到信任与被信任的重要性。同时可以模拟真实生活场景，引导孩子们扮演不同角色，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提高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社会工作者还可以设置木工、陶艺等手工课程，通过传授手工技艺，使孩子们体会到手工劳动带来的喜悦以及成就感。信息化时代，为培养孩子们的计算机技能，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入适合儿童年龄阶段的信息工具，使孩子们感受信息科技的魅力，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职业选择打开一扇窗户[3]。

二、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应用路径

（一）精准帮扶每一位儿童

儿童福利机构作为收留和照料困难儿童的主要场所，承担着关键角色，随着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养育模式已难以满足所有孩子的个性化需求。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应精准帮扶每一位儿童，应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对儿童进行全面的评估，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独特处境、优势劣势，精准定位其需求。在初步接触儿童时，以真诚尊重的态度，与孩子建立联系，用温暖的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关心之情，使孩子感受到安全和被接纳。在处理问题时，采用理性平和的方式，为儿童树立解决冲突的正确范例。社会工作者可以蹲下身子与其平视交流，给予其肯定。还可以通过玩游戏等方式拉近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并全面收集资料，重点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变化历程，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与他们共同商定短期和长期目标。社会工作者应按照计划开展各类活动，基于孩子的实际需求，实施干预以及监测反馈。针对沉默寡言的孩子，可以通过绘画治疗等非言语沟通方式打开其心扉，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改善其消极思维模式，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应定期回顾进展情况，及时记录进展笔记，进而为后续的服务提供参考。社会工作者应利用多媒体资源，如播放和英雄事迹、励志故事相关的视频或图片，向儿童展示社会各界的优秀人物形象，促使其近距离感受不同领域的正能量，激发其向上向善的愿望。此外，在帮助儿童过程中应引入先进的技术，注重数字化转型驱动升级，积极部署云端数据库，利用智能机器人陪伴孤独症儿童完成指令跟随训练，还可以建立干预效果预测模型，基于历史数据推荐最优服务组合方案。

（二）促进儿童互动与成长

儿童福利机构承担着保障儿童基本权益、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重任，然而当下传统的养育模式忽视了儿童的心理需求、个性化发展以及对他们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可以改变这一现状，应用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促进儿童之间的互动。社会工作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应营造支持性的物理以及社

会环境，合理设计机构内的公共区域以及个人生活空间，营造温馨舒适、富有启发性的环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结合实际情况设置专门的游乐区、阅读角，配备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设施，鼓励其自由探索和玩耍。社会工作者还应注重营造积极向上的福利机构文化，定期举办主题活动，引导儿童在节日庆典、生日派对中参与活动，增强儿童之间的凝聚力，引导儿童学会自我管理。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小组活动，可以基于儿童的兴趣组建绘画小组、体育小组、音乐小组，在小组活动中，使每个孩子发挥自身的特长，鼓励成员之间互相分享、互相合作，共同完成作品。针对儿童不同阶段面临的生长课题，设计相应的小组活动，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的方式，促使孩子们在实践过程中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积极应对挫折和压力。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个体，关注其内心的感受与想法，善于发现并调动周围的各种资源，进而推动儿童福利事业的不断进步。

（三）扩展服务边界与社会支持网络

较多儿童福利机构面临着服务对象单一化、服务内容碎片化等问题，社会工作者针对此现象应主动走出机构大门，深入周边社区开展外展活动，通过定期走访家庭、学校和公共场所，识别潜在的困境儿童，并建立档案进行跟踪管理。社会工作者还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可以联合社区居委会举办儿童安全教育讲座，提高社区居民保护儿童权益的意识。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汇聚多方力量，相关部门应明确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方向和服务标准，为其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儿童福利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童福利领域，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者招募计划，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加强对志愿者的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使其掌握基本的志愿服务知识和技能，提高服务质量。社会工作者应鼓励企业以捐赠资金、物资或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儿童福利事业，还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的同时，使企业员工有机会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加强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4]。

（四）家庭寄养与收养服务

当前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家庭寄养与收养作为替代性儿童照料模式，可以为无法得到原生家庭妥善照顾的儿童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然而这些工作，离不开社会工作者的深度介入，当前大量等待安置的困境儿童急需合适的家庭，较多地区的儿童福利机构缺乏足够的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其专业服务覆盖不全；对于已进入家庭寄养或收养阶段的案例，缺乏长效跟踪监管机制，一旦出现虐待、忽视等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并干预。基于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应综合运用心理测评、行为观察记录等工作手段，掌握儿童全方位的信息，了解候选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等情况，根据评估结果制定详细的安置计划，并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不断进行调整。社会工作者应积极组织面对面会谈，使儿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期望，让有意向的家庭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和诚意，鼓励双方进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可以安排短暂的试相处期，观察儿童在新环境中的适应程度，基于此作出最终决策，提高寄养于收养的成功率。社会工作者应打破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互通有无，联合教育部门解决学龄儿童入学难题，携手民政部门简化手续流程以提高效率[5]。社会工作者还应按照既定时间表上门探访，检查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学习进度、社交活动参与情况等；倾听家长的心声诉求，解答疑难困惑，针对共性问题举办小组分享会，促进经验交流借鉴[6]。

三、结语

综上，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发挥着支持、保护、倡导等功能，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者应深化专业服务内涵，进行精准化的需求评估与干预，组建“社工＋特教教师＋康复师＋营养师”的复合型小组，争取福彩公益金定向资助特色项目。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工作者还应引入先进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可以借助科技手段进一步突破服务边界，依托数字化工具优化服务流程，构建“预防—干预—跟踪”全周期服务体系，进而为新时代儿童福利事业注入人文关怀与专业动能。

参考文献

[1] 吴春颖，洪梦楠．儿童福利机构实施德育的经验、反思与建议——以华东地区N市儿童福利院为例[J]. 社会福利，2025(03): 48−56.

[2] 李静．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展中的实践探索[J]. 社会与公益，2025(04): 442−444.

[3] 唐新颜．让爱的力量扎根在孩子身边——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的角色定位[J]. 云端，2024(31): 139−141.

[4] 童小军．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落地看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J]. 中国民政，2022(13): 58−59.

[5] 范垚，陈国梅．力推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无锡实践[J]. 社会福利，2021(07): 42−43.

[6] 侯晓学．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的郑州实践[J]. 中国社会工作，2021(15): 14−15.

（作者单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社会福利院）

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邓俊芬 张美霞 程贝贝 李淑香

摘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对接养老服务发展需求，本文以护理学专业必修课程“老年护理学”为对象，开展系统性教学改革研究。课程改革遵循“应用为主、产教融合、发展特色”的原则，依托“训赛创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的新型教学模式。通过模块化重构课程内容体系，融入思政元素与职业标准；借助智慧教学平台与 BOPPPS 模型，实施“三课联动”的混合式教学；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评价机制。有效提升了护理学本科学生老年护理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逐步实现了老年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同时，促进了教学团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果与社会效益，为应用型护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老年护理学；教学改革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 2.8 亿，人口老龄化还在持续加深，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社会挑战。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1]，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本研究以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护理专业的特色课程“老年护理学”为切入点，针对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创新实践。

一、改革背景与体系重构：“老年护理学”教学的三重困境突破

目前课程侧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思政育人的内容融入课程较少，二者未很好地融合，难以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2]。课程内容仍以理论为主，缺乏应用性与具体性，课程内容无法与医院与养老机构的实际情况结合，实践课时过少。其解决策略在于加强校企融合，聘请行业专家参与课程建设，并增加课外实践，促进教学内容与临床及养老机构实际紧密结合。同时通过挖掘身边典型案例、邀请业内专家开展讲座等方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实施路径

（一）基于国家战略和养老趋势创新结构化课程教学理念

在健康领域科技及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卫生职业教育面临深刻变革。全周期、全过程维护人民健康的目标对卫生技术人才的能力提出了重构要求[3]。其中，结构化课程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抓手，强调以系统化、模块化设计实现能力递进。其核心特征包括：以养老产业需求为框架的目标分层、以产教融合为路径的内容逻辑化编排、以技术赋能为支撑的教学活动标准化实施，以及以能力增值为导向的动态评估机制。该理念契合“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教育与社会互动的基本原理，通过结构化课程的理论创新，解决了传统职业教育中内容碎片化、教学与产业脱节等问题。在操作层面，结构化课程以“养老产业需求分析→能力标准转化→模块化课程内容开发→动态反馈优化”为闭环，实现了从宏观产业框架到微观教学实施的逻辑贯通，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二）“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的“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思路

在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下，秉持培养特色护理人才的理念，采用“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的“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举措，实现课程教学与学校人才培养理念即思想领航、产教融合、应用为主、协同育人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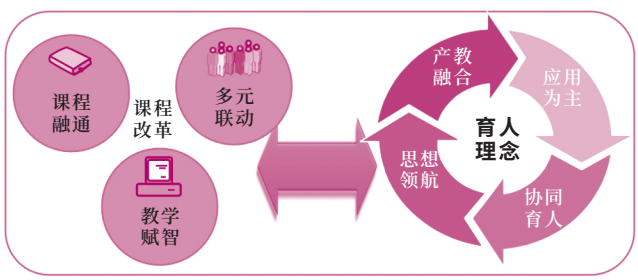


图 1 “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方案

密联系的“四联”目标（见图1），全面解决教学问题[4]1。

“课程融通”以模块化架构重构课程体系，通过跨学科整合将养老产业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资源，构建起“模块引领—项目驱动—能力递升”的三阶培养框架：以基础能力模块打破专业壁垒，用项目任务驱动核心能力培养，最终通过综合性实践实现职业能力递进式提升，形成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动态衔接机制；“教学赋智”是以BOPPPS模型为框架，构建“三式贯通·三课联动·双循环共生”的智慧教学模式，依托虚拟仿真与AI技术，通过在线微课（课前认知建构）、线下授课（课中问题探究）、实践工坊（课后能力迁移）的三式融合，贯通“课前导学—课中内化—课后拓展”的教学闭环；借助数字工具的双向反馈机制，实现“师生互动—学情诊断”的教学循环，推动“虚拟训练—实体操作”的实践循环，形成阶梯式能力培养体系[5]；“多元联动”以三维评价框架重构课程考核体系，构建“多主体协同—多维度观测—多元化评估”的立体化评价网络：依托“院校导师评知识维度、企业导师测技能维度、社区督导考实践维度”的多主体评价机制，将养老真实项目拆解为案例报告（理论认知）、情境模拟（技能应用）、岗位实绩（职业素养）等多元考核模块，形成“过程性诊断+阶段性测评+终结性认证”的链式评估体系，实现教学评价从单一分数导向向职业胜任力导向的范式转换。

1. 整合教学内容，依据“课程融通”改革模式，构建“模块引领、项目驱动、能力递进”的课程内容体系

本课程根据老年人健康演变进程进行课程内容整合，依据“理论为本→实践强化→拓展创新”和“博学→求是→仁爱→创新”的“双向递进”课程设计思路，构建“模块引领、项目驱动、能力递进”的课程内容体系，将教学内容按照“健康—衰弱—疾病—临终”的顺序进行整合，同时在内容体系中贯穿人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式，形成“健康老龄化”“衰弱/失能老年人日常护理”“老年人慢性病健康促进”“老年人临终护理”四大模块及八大项目内容（见表1）。同时以传统文化《孝经》作为思政纲领，以“博学、求是、仁爱、创新”为思政理念（见表2），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尊老、敬老、爱老”的核心品质。

在教学中，以“院校—养老院及养老行业—社区”为指导，建立了以惠民养老公司、立仁医养院、仕博养老院实习基地等为载体的“科研基地—教学基地—专业实践基地”“实习基地群”，满足学校老年护理实习需求，提升了实践教学效果。解决了课程教学过程与临床实践脱节、日常教学与养老护理实际应用分离等问题，实现了以技育才、以德育人的目标，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要求[4]3。

2. 改革教学方法，采用“教学赋智”改革模式，构建“三式、三课、双循环”的BOPPPS教学模式

利用“老年护理学”课程知识图谱，对课程所有

表1“老年护理学”课程内容改革体系

模块	项目	培养能力
模块一：健康老龄化	项目一：老龄化与老年护理相关理论 项目二：老年综合评估 项目三：老年人健康保健与健康养老	理论知识和能力
模块二：衰弱/失能老年人日常护理	项目四：老年人日常生活与安全用药护理 项目五：老年人心理卫生与精神护理	护理技能
模块三：老年人慢性病健康促进	项目六：老年综合征与护理 项目七：老年人常见疾病与护理	实践应用及拓展能力
模块四：老年人临终护理	项目八：老年人临终护理	

表2“老年护理学”课程中思政素材与思政目标

模块	思政目标与素材	思政理念
模块一：健康老龄化	**职业认同，尊老、敬老、爱老品质** 以《孝经》中孝感动天的故事为素材，分析“孝”字的来源意义与老年护理的相关性 **专业素养，奉献精神** 以“老年医学之母”的故事为素材，说明综合健康评估的重要性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为素材，说明国家关于老龄的制度优越性	博学求是仁爱创新
模块二：衰弱/失能老年人日常护理	**专业素养，严谨求实** 以“尊重隐私”案例为素材，关注细节，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为素材，分析安全用药的严峻性 **专业素养，科学探索精神** 以“阿尔茨海默病”为素材，说明疾病诊断的科学严谨	
模块三：老年人常见疾病与护理	**社会责任感** 以“彭宇案”和“最美大妈”为素材，分析人性的美 **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奉献精神** 以《孝经》为素材，承上启下，在疾病护理中体现尊老、爱老、敬老的职业风尚	
模块四：老年人的临终护理	**民族自豪感，正确价值观及生命观** 以“庄子生死论”为素材，传递珍视生命，热爱生活的价值观	

知识点进行资源关联，包括课程思政案例集、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课件、教学微视频、习题库。以雨课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为依托平台，助力课堂改革。构建“三式、三课、双循环”的BOPPPS教学模式（见图2）。

BOPPPS教学模式起源于加拿大的教师技能培训，由导入（B）、学习目标（O）、前测（P）、参与式学习（P）、后测（P）和总结（S）6个环节构成。该模式以建构主义和交际法为理论依据，强调学习和反馈的闭环教学过程，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参与学习、反思和多层次互动，老师及时反馈教学效果并能适时调整教学策略。

3. 改革课程考核评价，依据“多元联动”改革模式，构建“多维度、多元化、多主体”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为适应教学方法改革，体现全过程的督导与考核，构建“多维度、多元化、多主体”评价体系（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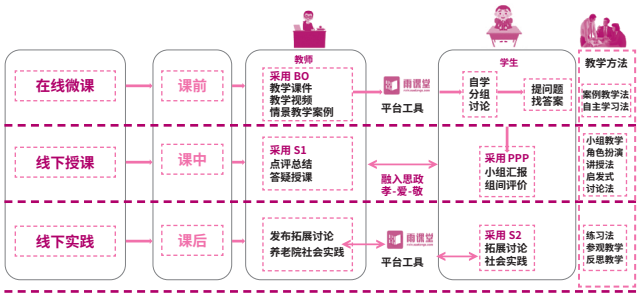


图 2 “老年护理学”教学实施方法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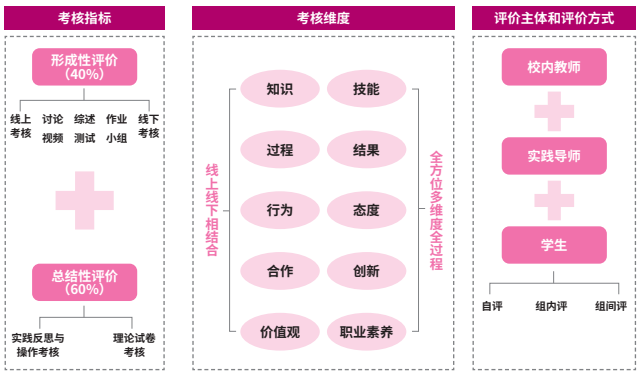


图 3 “老年护理学”“多维度、多元化、多主体”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包括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考核增加综合能力的考核。突出评价的公正与科学性，注重过程性学习，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解决了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

通过多维度的考核机制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素养。主要整合学生的日常学习表现、线上线下学习行为数据、知识掌握程度以及核心素养发展等多个维度的内容。其中，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被置于突出位置，通过优化小组考核机制予以强化。

在实施层面，教师依据班级规模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规模控制在 4~8 人，并设立小组负责人。课前，教师基于教学大纲和单元教学目标，系统整合包括课程目标解析、知识点微课视频、人文素养培育案例等在内的学习资源包，并配发相应的学习任务。各学习小组通过自主查阅资料、协作探究等方式完成任务，并由组长组织组内互评，最终形成评估报告提交教师。课堂实施环节采用“展示—评价—反馈”的循环模式：随机抽取小组进行 5~10 分钟的任务展示，随后开展组间互评，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点评和指导，同时通过阶段性测评和期末考试等总结性评价方式，结合学生课程反馈意见，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这种评价体系不仅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全方位跟踪，更强调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教育理念。

三、“老年护理学”课程改革成效与范式价值

通过“课程融通·教学赋智·多元联动”的“老年护理学”课程的全面改革，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果。近 3 年来，护理学专业学生考试成绩逐年提升，毕业学生在养老、老年慢性病等方面的论文撰写也由 8% 增加至 24%；在第十二届“挑战杯”省级创业计划竞赛中，5 名学生的《“点对点”为老服务站》荣获三等奖；同时有 5 名学生在校级科研项目中立项，发表论文 5 篇；98% 毕业生进入二级以上医院、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业，学生就业满意率达到 95% 以上，学校成为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护理人才供给及储备基地。

以课程改革为引领，通过实施跨学科课程联动机制，教学团队有效推动了相关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与创新。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专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更显著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教学实践能力和学科专业素养，实现了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的双重提升。团队成员主持教改项目 18 项，发表教改及相关论文 40 余篇。荣获省级养老护理比赛一等奖 1 项。其课程改革分别荣获市级教育系统成果奖二等奖，荣获校级成果奖三等奖。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护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进程中，“老年护理学”课程的教学创新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该课程的改革实践为护理学专业课程的深度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施路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健康服务需求的升级，课程目标定位与内容架构将不断进行优化和适应性调整，这也体现了护理教育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22(07): 13-29.

[2] 张妍 . 基于 CDIO 理念的应用型本科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D]. 苏州 : 苏州大学 , 2020.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20(28): 27-31.

[4] 喻荣彬 , 李茜 , 高兴亚 , 等 . 南京医科大学基于 HOPE 理念和 I-CARE 模式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J]. 医学教育管理 , 2018, 4(01): 1-5, 10.

[5] 刘晨曦 . 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问题与路径研究 [D]. 成都 : 四川师范大学 , 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2024 年重点教改项目“应用型高校护理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特色课程群建设与实践”（20240303）；2023 年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虚拟教研室建设项目“护理学专业虚拟教研室”（20230801）。

（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李欣琪 卢艺莹 马锐华 吴汐柔 李 姗 *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社区居家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吐鲁番市，陕西省渭南市、浙江省绍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 5 个社区的 569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运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简约口腔素养问卷及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提示提升口腔健康素养可改善其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建议通过针对性干预措施（如分层健康教育、家庭—社区协同支持）优化老年人口腔健康管理策略。

关键词：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维护老年群体的口腔健康已经成为亟待重视的健康议题。口腔健康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疾病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1-2]。《“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及《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 年）》均强调需关注老年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之间的关联[3-4]。口腔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处理基础口腔健康信息与服务，并据此作出有益健康决策的能力。较低水平的口腔健康素养常导致口腔健康状况不佳，难以充分利用卫生保健服务等状况。不仅会致使口腔疾病的发生风险上升，还会提高诸如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疾病的患病概率，最终给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主要体现的是口腔健康状态对人们生活品质在多个维度上的影响，其范畴涵盖了身体机能、心理状态、社会交往等各个功能领域，同时也涉及口腔疾病的预防与治疗[5]。有研究表明，我国中老年群体在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方面的状况不容乐观，口腔疾病已对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通过调查不同地区社区居家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析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相关因素，并探讨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制定老年人口腔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

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吐鲁番市，陕西省渭南市、浙江省绍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的社区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周岁的社区老年人；②每年在家中或社区居住时间超过 6 个月的老年人；③知晓本研究目的，并愿意参与本研究的老年人。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等无法配合研究的老年人；②患有严重口腔疾病需要立即治疗的老年人。

（二）方法

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子女探望频率、是否患有慢性病、自理能力等。

（2）简约版口腔健康素养量表：该量表经 Jones 等人修订并经颜文等学者汉化，包含 7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5 级评分设计，1 分即“无法做到”，5 分即“没有任何困难”，总分范围在 0~56 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口腔健康素养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8。

（3）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由 Slade 和 Spencer 开发，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已获得原作者授权。

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线上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前需对调查员开展专项培训，使其明确调查内容及问卷填写规范。针对无法独立填写问卷的对象，由调查员根据其回答代为填写。问卷完成后，需通过两步核查确保数据质量：（1）回收过程中逐一检查问

卷填写情况；（2）发现遗漏、缺项等问题时，立即向调查对象询问确认。此外，通过现场问答的形式，既能更深入理解调查对象的反馈，也能保障调查过程的统一性与标准化。

3. 统计学方法

在处理连续性变量时，如数据呈正态分布，用均数 ± 标准差来描述，即给它们贴上了独特的标识，当需要比较不同组的数据时，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来比较它们的差异，但若数据的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来描述，组间比较则要依靠 Kruskal–Wallis H 来检验。对于分类变量，它们像一群有着不同特征的“小团体”，采用频数（百分比）这种“清点与展示方式”清晰地呈现每个“小团体”的规模。在对这些“小团体”进行组间比较时，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检验，即敏锐的“差异探测器”，精准地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

二、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 600 份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 600 份，有效问卷 569 份，有效率为 94.8%。

（一）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对 569 名老年人的调查显示：女性 304 人，占 53.43%；男性 265 人，占 46.57%。60~70 岁：308 人，占 54.13%；71~80 岁：195 人，占 34.27%；80 岁以上的 66 人，占 11.60%（其中 90 岁以上的 16 人）。文化程度为初中或中专的 222 人，占 39.01%；小学及以下 197 人，占 34.62%；高中或大专的 121 人，占 21.27%；本科及以上的 29 人，占 5.10%。家庭月收入低于 3000 元的 158 人，占 27.77%；3001–5000 元的 234 人，占 41.13%；5001~8000 元的 110 人，占 19.33%；高于 8000 元的 67 人，占 11.78%。患有慢性病者 282 人，占 49.56%。

（二）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及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

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总分为（34.29 ± 13.15）分，其中维度得分较低的是“理解”（4.47 ± 2.43）分。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得分为（21.83 ± 12.34）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独立能力减弱（7.23 ± 4.70）分、疼痛与不适（5.22 ± 2.85）分、功能受限（4.77 ± 2.91）分、心理不适（4.61 ± 3.05）分。

三、讨论

（一）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现状分析

研究显示，社区居家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得分处于中低水平。其原因可能包括：（1）老年人缺乏系统的口腔健康知识。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信息的理解与接受能力逐渐下降，导致其对口腔健康知识的知晓率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2）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以及家人、朋友等是多数老年人主要依赖的信息获取来源。这些渠道的信息更新较慢，且可能存在科学性不足或误导性内容。（3）经济条件限制。部分老年人因经济原因无法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护理，从而影响其口腔健康素养的提升。（4）自理能力下降。自理能力较差是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行为的危险因素，这类老年人对他人的依赖性较强、自主能力较弱，导致其口腔健康行为相对较差。

（二）社区居家老年人自身情况对口腔健康素养的影响

1. 文化程度

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具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水平较低。针对这一问题，建议构建社区嵌入式健康教育体系，开发“认知友好型”口腔健康课程，采用高频次、短时长、多模态（如视频演示结合实物模型）教学方式，提升老年人对口腔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可打造适老化健康信息平台，研发集成语音交互、大字体显示等功能的小程序，提供 AI 自诊、用药提醒等服务，帮助老年人更便捷地获取口腔健康知识。

2. 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表明，家庭月收入与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呈正相关。家庭月收入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口腔就医意愿。家庭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在遇到口腔疾病时大多选择基层医疗机构，接受最基础的治疗；而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有能力承担更全面、更高质量的口腔医疗服务，例如定期洁牙、口腔检查等。建议政府扩大口腔医疗保障覆盖面，将更多基础口腔治疗及预防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从而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同时可借助“世界口腔健康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口腔义诊、健康咨询等活动，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决口腔健康难题。

3. 慢性病患病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患有慢性病对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素养具有显著影响。某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会直接增加老年人口腔感染的风险。针对这一问题，社区应加强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及其家属的专项健康宣教工作，可通过发放图文手册、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一对一入户讲解等形式，系统地普及慢性病与口腔健康之间的双向影响机制：一方面让老年人了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如何诱发或加重口腔问题，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晓牙周病等口腔疾患可能反过来影响慢性病的控制效果，从而提升老年人及其家属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此外，社区还可以联合医护人员，根据老年人所患慢性病的类型、病程时长以及身体耐受度等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口腔健康宣教与管理方案。通过这种精准化的宣教模式，帮助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掌握适配自身病情的口腔护理知识与技能，进而切实提升其口腔健康素养，实现慢性病管理与口腔健康维护的协同发展。

4. 子女探望频率

研究结果显示，子女探望频率与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呈正相关，子女探望频率越高，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研究表明，子女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对子女进行口腔健康知识宣教，鼓励子女对老年人的口腔保健行为加以监督，进而助力老年人形成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相关部门可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构等专业机构，面向老年人子女开展多元的口腔健康知识宣教活动，在完成知识宣教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子女在探望老人时，对老年人的口腔保健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督与引导，例如提醒老年人按时、正确刷牙，监督其减少对甜食、坚硬食物的摄入，陪同老年人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当发现老年人存在口腔健康问题时，及时协助其就医诊治。

（三）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的因素如下：（1）接受能力：老年人对口腔健康知识的接受能力越强，越容易掌握正确的口腔护理方法，从而降低口腔疾病的发生率，提升生活质量。（2）理解能力：对健康信息的理解能力直接影响老年人口腔护理行为的规范性，理解能力不足容易引发错误行为，导致口腔问题恶化。（3）支持系统：家庭、社区及社会层面的支持，可以提升老年人口腔护理依从性，从而缓解其因口腔问题产生的心理压力。（4）经济负担：经济条件限制了老年人获取必要口腔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减轻口腔医疗费用可以提高低收入老年人主动接受定期检查与治疗的意愿，进而改善口腔健康。（5）就医便利性：便捷的就医环境可助力老年人及时就诊，避免因治疗延误导致口腔问题加重。（6）沟通能力：医护人员与老年人建立有效沟通，可以加深其对治疗方案的理解，从而增强治疗依从性并优化预后。（7）知识应用能力：将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日常行动（如正确刷牙、使用牙线、定期检查等），起到维持口腔健康的关键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从多维度实施干预，以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1）普及口腔健康知识：借助社区讲座、多媒体平台及适老化宣传资料，系统化普及口腔健康知识，帮助老年人掌握正确护理方法。（2）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构建“社区—医院”联动机制，增设老年口腔专科服务，缩短老年人就医等待时长。（3）减轻经济压力：推动扩大基础口腔治疗项目的医保报销范围，联合公益组织加大定向医疗援助力度。（4）促进医患有效沟通：开展医护人员与老年人的沟通技巧培训，运用可视化工具辅助健康宣教，确保老年人充分理解治疗方案与护理建议。（5）强化社会支持：整合家庭、志愿者及社区资源，建立持续性的老年人口腔健康支持体系。（6）推广健康行为习惯：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引导老年人养成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习惯。

四、结语

本研究结果显示，提升口腔健康素养是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及相关生活质量的关键。口腔健康作为老年人整体健康的重要维度，直接关系着其饮食、咀嚼、语言交流等日常生理功能，也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与社交体验，而口腔健康素养作为老年人掌握口腔健康知识、践行科学口腔保健行为的基础，其水平高低决定了老年人口腔健康管理的效果。通过针对性干预提升其口腔健康素养，不仅有助于老年人的口腔疾病防治，也能增强其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该研究既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助力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提供了参考。未来研究可探索技术赋能的精准健康干预模式与文化适应性的平衡，为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及整体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1] 贾毅，马文君，张治中．城市 (60~75 岁) 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J]. 甘肃科技纵横，2023, 52(11): 63−69.

[2] 郭艳童，于媛媛，陈莹莹，等．山东省主动健康示范区域老年人慢病管理知信行现状及影响机制 [J]. 山东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24, 62(03): 1−8.

[3] 杜雯姣，汤炫．“智慧助老”视角下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与行为需求研究 [C]// 中国班迪协会 (CBF). 2025 年第一届中国智慧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上).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2025: 377−380.

[4] 何丽艳，张海鸥，曾文雅．老年人口腔健康行为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 [J].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23, 22(12): 930−933.

[5] 曹均艳，杨青敏．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全科护理，2021, 19(29): 4137−41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社区居家老年人口腔健康素养与口腔健康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202313560006）。

（作者：李欣琪，新疆第二医学院护士；卢艺莹，新疆第二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马锐华，新疆第二医学院护士；吴汐柔，新疆第二医学院本科生；通信作者李姗，新疆第二医学院讲师）

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系统构建与实证

徐群英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老年群体的教育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特征，传统推荐方法难以精准匹配。本研究聚焦老年大学等典型教学场景，旨在构建一个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系统。该系统通过整合老年学员的多维特征、课程知识结构与学习场景信息，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实现“用户—兴趣—课程—场景”的语义关联建模，并结合深度学习算法优化推荐策略。经过 A/B 测试和用户满意度调查，该系统在推荐精准度和学习路径适配性方面表现出色，有效提升了智慧老年教育的技术应用水平，为满足“老有所学”需求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老年教育；知识图谱；个性化推荐；课程推荐系统；语义建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15 亿，占总人口的 22.3%，老年教育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但老年大学课程推荐面临困境，传统算法难以匹配老年学员复杂需求，存在类目失衡、场景适配差等问题，超三成学员反馈课程与兴趣不符，近三成学员认为难度与能力不匹配。老年学员学习需求多元，目标涵盖兴趣、技能与社交，学习能力受年龄等因素制约，场景也呈现多样化特征。知识图谱技术可整合异构数据、挖掘实体关系，本研究据此构建个性化推荐系统，推动推荐从数据关联迈向语义理解，提升老年学员学习体验与幸福感。

一、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设计

（一）用户需求与课程数据的多维度采集

1. 老年学员信息深度挖掘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全面采集学员信息[1]。线上利用简洁易懂的问卷小程序，设置语音读题功能，方便视力不佳或操作不熟练的老年学员填写；线下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在轻松的聊天氛围中深入了解学员需求。采集内容涵盖静态与动态数据：静态数据包括年龄分段（如 60~70 岁低龄段、70 岁以上高龄段）、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履历等基础属性；动态数据则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兴趣标签（书画艺术、健康养生、信息技术等）、健康状态（自理能力、慢性病史）及学习目标（兴趣培养、技能提升、社交参与）。例如，在对某社区老年大学的调研中，工作人员通过访谈发现，一位 68 岁的退休教师虽然对信息技术感兴趣，但由于轻微手抖，希望学习操作简单的智能设备课程；另一位 72 岁的退休医生，则更倾向于深度参与健康养生知识课程，并期望通过学习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细致的需求信息为后续个性化推荐奠定了基础。

2. 课程数据的结构化整合

针对老年教育领域垂直平台（如国家老年大学、地方社区教育网），运用 Python 爬虫程序（基于 Scrapy 框架）提取课程标题、简介、时长、师资介绍、内容大纲等结构化字段。同时，采用正则表达式解析非结构化文本中的知识点，如从“书法—楷书笔法”“智能手机—扫码支付”等描述中提取关键信息。对于非公开数据，与教育机构签订数据共享协议，通过 API 获取标准化课程元数据，包含课程 ID、适用年龄范围、难度等级、教学形式等字段。对于线下社区课程，设计 Excel 模板收集课程名称、开课周期、场地信息，并利用 OCR 技术识别纸质教学大纲中的关键词，形成初步课程知识库。通过数据清洗去除重复记录，利用 Dedupe 库基于课程名称、师资、大纲关键词构建概率匹配模型，结合人工标注样本优化相似性判定规则，实现高精度重复检测；运用 Word2Vec 模型计算课程描述文本的语义距离，通过计算课程描述文本的语义向量余弦相似度，结合人工验证设定动态阈值（如 0.65），完成同义实体合并，确保课程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二）知识图谱构建与语义建模

1. 本体架构设计

在老年教育个性化推荐系统构建中，本体架构设计是知识图谱的核心基础[2]。利用 Protege 工具构建本体架构时，将“用户”“兴趣”“课程”“场景”“知识点”“师资”作为关键实体类型，明确各实体的属性与特征。比如“用户”实体包含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属性，“课程”实体涵盖课程 ID、难度等级、

教学形式等信息。实体间语义关系的定义，让不同类型数据产生深度关联，像“用户—具备兴趣—兴趣”建立起学员与兴趣的联系，“课程—包含—知识点”体现课程内容结构。SWRL 规则语言的引入，为个性化推荐赋予逻辑规则。通过设定如“用户评估 = 低∧自主学习频率 <2 次 / 周→推荐学习强度≤ 30 分钟 / 课时”等规则（规则库需经专家审核，支持动态调整），系统能根据老年学员的特征，自动筛选出适配的课程学习强度，为后续精准推荐提供可靠的逻辑支撑。

2. 实体填充与关系构建

用户兴趣标签通过 LDA 主题模型从历史行为文本（如问卷回答、学习记录）中提取，并结合 TF–IDF 算法计算标签权重，确定用户核心兴趣点。例如，若某学员在问卷中多次提及“国画山水”“书法临摹”，系统经计算后将“书画艺术”相关标签赋予较高权重。场景实体建模基于时间—空间特征，将学习时段（晨间、傍晚）与设备类型（大屏终端、便携设备）组合生成场景向量，通过 K–means 聚类算法划分为若干典型场景簇。如“晨间—手机端”场景簇适合推送短视频形式的碎片化学习课程，“周末—社区教室”场景簇则适配线下互动性强的实践课程。最终构建起“用户—兴趣—课程—场景”的语义网络，实现学员需求与课程资源的深度关联。

（三）个性化推荐算法设计

1. 混合推荐策略

推荐系统采用“初筛 + 精排”两阶段模式，兼顾效率与精准度。

初筛阶段：快速锁定候选课程。一是用户特征提取：基本信息（如年龄、学历等）、学习行为（如最近点击、收藏夹内容、单次学习时长等）等，通过智能算法分析特征关联，生成用户“兴趣指纹”；二是课程特征提取：基础属性（如时长分级、难度标签）、知识网络（课程关联图谱）等，使用双模块算法分别处理数值和语义信息；三是快速匹配：对用户和课程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相似度计算筛选若干门候选课程，采用快速检索技术，完成百万级课程匹配。

精排阶段：个性化课程排序。一是内容契合度分析：解析课程知识点（如智能手机操作包含拍照、微信等功能模块），匹配用户兴趣标签（根据历史学习记录生成），计算契合度分数；二是群体规律应用：发现学习规律，根据相似用户的选择偏好生成推荐系数；三是智能综合排序：新学员、老学员实时动态融入最新行为，最终生成课程推荐列表，按适配度降序排列。

2. 动态优化机制

在老年教育个性化课程推荐系统中，动态优化机制通过深度强化学习实现实时策略更新，保障推荐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3]。系统将学员的学习行为（如课程完成时长、测验得分）映射为连续状态空间，通过策略网络生成个性化推荐动作：正向反馈，学员完成课程时，根据预设奖励函数增强兴趣标签权重；负向反馈，学员主动跳过或差评时，通过负奖励信号降低相关课程曝光优先级。同时，系统构建“实时行为采集—在线策略更新—效果验证”的闭环流程：一是在模型部署阶段，采用 A/B 测试对比新旧策略，随机分配用户至对照组与实验组；二是收集点击率、完成率等指标，通过假设检验筛选最优策略；三是将验证结果反馈至强化学习环境，驱动策略网络参数迭代更新。确保推荐系统能够动态适应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变化，实现推荐效果的持续提升。

二、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实证分析

（一）实验设计与数据收集

1. 实验对象与数据来源

为验证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系统的有效性，本研究选取某市四所老年大学的 1200 名学员作为实验对象，多维度采集学员数据：利用线上问卷和线下访谈获取基础信息；通过学习平台后台记录线上课程观看时长、互动次数等行为数据；借助课堂管理系统收集线下课程签到、课堂表现等情况；同时，学员完成课程后通过填写评价量表反馈课程满意度。此外，为对比分析，同步收集传统协同过滤算法推荐系统与本研究改进系统的推荐结果数据，为后续的性能评估与效果验证提供全面、真实的数据支撑。

2. 评估指标设定

为全面评价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体系，研究运用了多元评估体系 [4]，处于离线评估阶段时，精确率关注推荐结果的精确性，计量推荐课程里符合用户需求的比例数值；召回率聚焦于推荐的全面覆盖，评估系统成功推荐用户感兴趣课程的程度高低；归一化折扣累积增益统筹考量推荐列表的排序情况，判断系统是否把更具相关性的课程排在前面。在线实验借助 A/B 测试手段，对新旧模型在推荐点击率、课程完成率以及用户停留时长等指标上的差异做对比，直接呈现系统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可以设计涉及推荐准确性、课程相关性等五个维度的李克特五级量表问卷，从用户的主观体验感受切入，进一步开展对系统功能与服务满意度评价的收集，保证评估周全且贴合老年学员实际使用体验。

（二）实验结果与分析

1. 推荐性能对比

在推荐性能对比实验的过程中，依托知识图谱打造的推荐系统凸显优势，经由离线评估数据显示，该系统的精确率、召回率以及 NDCG 值这三项核心指标均完成提升，精确率从传统模型时期的 62.3% 蹿升至 78.6%，象征着系统推荐的课程中，满足学员实际需求的课程占比明显增多；召回率从 58.7% 攀升至 75.2%，彰显系统能更周全地捕捉学员兴趣，减少优质

课程出现遗漏现象；NDCG 值从 0.65 攀升至 0.82，呈现出推荐列表排序质量的优化，关键课程得到优先呈现机会，在线实验数据证实，推荐点击率、课程完成率与用户停留时长分别有 35%、28%、40% 的涨幅，充分证明该系统在实际使用中，能显著提升学员学习投入的热情与资源匹配功效。

2. 用户满意度分析

在针对用户满意度的调研中，基于知识图谱的推荐系统获得老年学员的普遍认可，经过对推荐准确性、课程相关性、界面易用性等维度的李克特量表调查，系统在精准匹配需求上的表现十分优异，85.3% 的学员对推荐准确程度表示认可，证实其可高效捕捉个体的个性化兴趣。在课程相关性方面同样收获了 82.7% 的高满意度，表明系统所推荐课程在内容深度与技能适配度方面，与老年学员学习目标相契合，为顺应老年用户操作习惯设计的可视化界面，通过大图标、简洁导航等贴合老年人习惯的细节，使界面易用性满意度实现 80.5%，学员以定性文本形式的反馈进一步凸显系统价值，诸如“推荐契合兴趣”“操作便利”之类的评价，直观凸显系统在改善学习体验、降低使用门槛方面的显著效果。

3. 典型案例分析

以 65 岁学员张阿姨为例，退休后的张阿姨渴望涉足智能手机使用与摄影的学习，然而传统推荐系统难以精准判定她零基础的学习水平，为她推荐了难度较大的课程，导致其学习进程受阻，慢慢失去学习的热忱。依靠知识图谱生成的推荐系统，凭借对张阿姨年龄、兴趣标签、学习能力等多方面数据的深度分析，精确筛选出“智能手机基础操作入门”“手机摄影初级技巧”等适配课程。凭借系统推荐的课程开展学习，张阿姨熟练掌握了智能设备运用与摄影基础技能，还通过学校摄影社团举办的作品分享活动，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学习受挫”转变为“积极投入”，显著提升了学习获得感与社交幸福感。

三、系统应用价值与未来展望

（一）应用价值体现

该系统在老年大学管理实践中展现出多方面的显著价值，实现了从管理模式到教学与学员体验的全方位优化。系统依托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算法，赋能管理决策科学化。管理者可凭借学员多维特征数据，实现课程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巧妙规避课程类目平衡失调引起的资源闲置，使课程安排更贴合学员当下实际需求，极大提升管理效率。系统建立的学员兴趣与课程知识相关联的网络，给教师呈现了直观的学情分析支撑，教师可依照系统所反馈的学员需求，依据情况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增添教学的互动活力，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与实际效能。从学员视角去考量，个性化推荐助力老年学员找到贴合自身兴趣、能力及学习目标的课程，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在知识技能提升的同时，依托课程学习加入社交活动，拓展社交边界，切实增强老年学员的生活舒适感和社会融入水平。

（二）未来发展方向

为进一步深化系统功能，未来将在知识图谱优化上持续发力。拓展实体类型，纳入家庭环境、社交需求等要素，能更全面地捕捉老年学员的学习影响因素，完善语义网络，使推荐逻辑更贴近复杂的现实场景。在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平衡上，探索联邦学习技术，打破校际数据壁垒，实现多校数据协同建模，在保障学员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系统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老年学员的普适性推荐能力[5]。同时，紧跟技术发展趋势，融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为老年学员创造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以新颖的学习形式提升学习趣味性与参与度，推动老年教育迈向智能化、多元化的更高发展阶段。

四、结语

本研究构建的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老年教育课程推荐系统，通过整合学员多维特征、课程知识结构与学习场景信息，实现了“用户—兴趣—课程—场景”的语义关联建模。结合深度学习算法优化推荐策略，经 A/B 测试与用户满意度调查验证，该系统在推荐精准度、学习路径适配性等方面优于传统模型，有效提升了老年学员的学习参与度与幸福感。展望未来，通过持续扩展知识图谱的认知维度以更全面理解老年群体，通过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技术安全地汇聚多方智慧以提升模型泛化能力，以及通过融合 VR/AR 等沉浸式媒介创新学习形态，本系统及其所代表的智慧老年教育模式，将能更精准、更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且复杂多样的终身学习与发展需求，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实践范例。

参考文献

[1] 黄乐达 . 2000−2023 年我国老年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 [J]. 中国军转民 , 2024(23): 214−219.

[2] 金杰 , 寿明鹤 . 我国老年教育研究演进逻辑、知识图谱与前沿热点——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J]. 科学咨询 , 2023(09): 12−14.

[3] 陈秀锦 . 我国老年开放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 2013—2022 年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 [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 2023, 25(01): 30−36.

[4] 贺佳琪 , 张再雄 . 基于知识图谱的老年大学发展趋势研究 [J]. 中国成人教育 , 2023(04): 16−21.

[5] 张凯宣 . 文化养老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VOSviewer 软件的知识图谱分析 [J]. 行政与法 , 2022(01): 56−66.

（作者系浙江开放大学常山学院一级教师）

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代际困境与突破

邓　特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其安全教育体系正面临传统风险升级与新型威胁叠加的双重考验。在家庭监护结构性缺失的背景下，代际教育断层使得“防溺水、防性侵、防交通事故”三大核心安全领域呈现出特殊困境：隔代抚养者普遍将安全教育简化为“不准下塘”“莫近陌生人”等碎片化训诫，缺乏系统性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理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模式本质上暴露出家庭教育中风险预警机制的缺失。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现状，随后从家校社协同更新安全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建立分层分类指导体系、构建数字化支持网络、完善政策保障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家庭教育改进的路径，旨在为打通留守儿童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一公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代际困境；突破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破解的监护缺失性群体。该群体因父母长期外出务工而处于“家庭监护真空”状态，其生存发展权益保障面临严峻挑战。据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其安全教育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存在的体系性缺失，亟须构建以“防溺水、防性侵、防交通事故”为核心的三维防护体系，通过优化家庭教育提质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一、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困境

（一）家庭情感缺失

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在异地务工，普遍面临家庭情感支持的断裂与缺失。留守家庭主要由祖辈担任主要监护人，但代际沟通障碍显著，祖辈多以物质保障为主，难以提供情感互动和心理疏导。亲子分离导致情感联结薄弱，留守儿童对父母情感依赖性较强，但孩子在遇到困难时选择独自承受，形成内向、敏感的性格特征。这种情感缺失直接影响了安全教育的有效性。例如，儿童在遭遇溺水风险或性侵征兆时，因缺乏信任关系不愿向监护人倾诉，导致隐患难以及时发现。心理研究表明，长期亲情疏离使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冒险行为，如独自涉水等，其安全事故发生率比非留守儿童高[1]。

（二）安全知识普及不足

留守儿童普遍缺乏系统的安全知识教育，特别是在防溺水、防性侵、防交通事故等方面存在明显知识盲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知识储备存在显著结构性缺陷。学校教育层面，有些农村教师缺乏专业安全培训，教学多停留于口头说教。家庭监护短板进一步加剧知识断层。留守儿童处于实际无人监护状态，在与祖父母同住的家庭中，监护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难以教授专业安全知识。部分地区虽通过村级网格员定期走访宣传，但内容多集中于防火防盗，对防溺水、防性侵、防交通事故等议题关注依然不足，这一现状凸显构建标准化安全教育体系的紧迫性。

此外，安全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是导致知识普及不足的重要原因。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本就相对有限，加之安全教育往往不是学校教育的重点，相关教材和教具的缺乏使得安全教育难以系统、深入地开展。同时，安全教育的方式方法也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难以引起留守儿童的兴趣和重视。因此，留守儿童在面对潜在安全风险时，往往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改进的路径

（一）更新家庭教育理念，丰富家庭教育内容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诸多严峻问题，这主要源于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理念滞后，难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求。受教育程度和知识储备的限制，祖父母监护人常采用“禁止外出”“远离危险”等简单方式开展安全教育，却忽视了儿童心理安全与自我防护能力的发展，导致儿童难以有效应对各类新

威胁。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从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入手。首先，要树立“三维空间安全观念”，将生命安全、心理安全和社会适应性纳入其中。例如，开展《家庭安全故事书》阅读活动、组织“紧急情况模拟演习”等，让儿童掌握相关安全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实际能力。其次，需建立“跨代”学习机制，鼓励留守儿童将手机安全知识传授给祖辈，而祖辈则将生活经验分享给儿童，形成“两代”知识传承的闭环。此外，还可借鉴安康市精神卫生关怀项目的实践，采取“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和社区安全工作坊的形式，开展专门的安全教育活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突出“生命安全”，将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融入日常生活。比如，设立“居家安全检查日”，让儿童认识家中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还需构建“安全成长档案”，记录儿童安全知识的获取情况以及行为改善轨迹，为个性化教育奠定基础[2]。

（二）动员各界力量帮助，创新安全教育形式

在留守儿童安全教育过程中，单纯、传统的说教方式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只有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并对安全教育方式进行持续创新，才能为留守儿童构筑起坚实的安全保护网，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加安心、可靠。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意义重大，将安全教育纳入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举措。通过专项经费投入，建设农村安全服务站，配备应急演练仿真系统等硬件设备，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真正的安全教育场地和器材。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该市构建了“市、县未保所—乡儿童督导员—村儿童指导员”的“三级联动”监管网络，在 4443 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农村儿童事务负责人的全覆盖。通过举办“防溺水”“防性侵”等主题教育活动，成立跨学科学习小组，编写《农村监护人应急手册》（方言版），便于家长理解和接受，使得留守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率较上年同期降低 63%。通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工作，使其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事项。同时还需特别关注隔代教育群体的特殊需求，可以编制图文版《监护人安全指导手册》，采用方言广播、皮影戏等在地化传播方式提升安全教育可及性，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家校协同、社会参与的儿童安全防护新范式[3]。

妇女联合会凭借自身独特优势，在开展社会治安宣传工作中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妇女联合会发起“跨界平安联防组”，组织警察、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定期到农村开展“防溺水、防性侵、防交通事故”工作坊。通过情景剧、安全闯关游戏等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儿童的参与度。以新颖的形式，让儿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安全常识，使儿童对溺水的自我保护能力从原来的 38% 提升至 79%。妇女联合会以此方式，改变了以往单调乏味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安全教育变得生动、活泼、易于接受。

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学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学方面，要构建“双线融合”教学体系，线上建立安全训练基地，线下开展紧急撤离演习，让儿童在实践中学会应对紧急情况；线下建立安全虚拟社群，通过卡通挑战等形式，加深儿童对溺水、性侵、交通安全等知识的了解。此外，还可制作“安全工作卡片”，让儿童与家长共同开展家居安全隐患检查工作，如绘制预防道路意外的图画等，从而建立家校合作的安全教育模式。广东省广宁县洲仔镇在“三圈共育”实践中，通过在校内设立“班内互助群”，让优秀学生与需要帮助的学生相互交流，共同了解防溺水的基本常识与技巧，并研发 VR 仿真溺水软件，利用沉浸式培训提升儿童的应变能力。通过开展安全教育，让儿童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得到全面保护。

在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中，企业和社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在家庭中安装智能安防设备，研发儿童安全导航手镯等高科技产品，为儿童安全提供技术支持。云南省保山市为 1356 名儿童安装了与紧急反应系统相连的“智能手环”，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使突发事件处理效率达到 82%。同时，企业及社团还可以通过经济资助、物资捐赠等形式，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基层社会可与高校学生义工队伍合作，开展暑假安全夏令营，通过编排防溺水手势舞、创作网络安全儿歌等有趣活动，让儿童在玩耍中学习安全知识。民政部门可采取措施，引导留守儿童参加消防演练和急救知识竞赛，累计积分可兑换文具，从而建立积极的激励机制。无锡市阳山镇在“双线融合”工程中，利用抖音等平台发布预防性侵害的短视频，在社区内发布《隔代教养 30 问》电子版教材；同时，举办“家庭故事会”，设立“家庭电话亭”，让父母与子女定期沟通，增进感情。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使安全教育更加有趣、更具互动性，更易被儿童接受。

要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必须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并进行创新。政府、妇联、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等各方应共同努力，发挥最大作用，持续改革教学方式，为留守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三、家庭教育改进的系统化路径构建

（一）建立分层分类指导体系

1. 代际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为祖辈监护人编制《隔代教养指导手册》（方言版与图文版），涵盖“防溺水手势训练”“性侵预警信号识别”等模块。推行“银龄课堂”培训项目，通过赶集日集体培训、上门指导等途径增强风险处理能力。

2. 亲子联结强化机制

在留守儿童心理支持项目中，针对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服务对象冯某某的心理重建需求，专业团队作出以下干预：经评估，该生因父母长期务工形成重度自卑心理，并伴随社交恐惧、害怕等临床症状。干预方案包含三项核心措施：一是由心理教师实施每周2次沙盘疗法；二是匹配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影子伙伴”提供陪伴支持；三是建立行为矫正机制，通过“行为积分卡”系统（以安全知识掌握程度兑换探亲假机会）、民警担任“法治爸爸”开展情景模拟训练。

项目同步推行系统性支持制度，要求监护人执行“亲情联络时刻表”，在每周3次视频通话中嵌入安全知识问答；开发“家庭安全任务卡”系统，引导父母远程指导居家隐患排查实践。经6个月干预，该生课堂发言频次实现从0次至每周3次的显著提升，离校出走行为由月均4次降至0次。实践表明，多维干预策略结合家校协同机制，对解决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具有显著成效。

（二）构建数字化支持网络

建立和推广智能化监控体系，是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举措[4]。目前，我国农村家庭监护模式尚不完善，难以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护。而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智能监控系统可对儿童的位置、活动状态、周围环境等进行实时采集，并进行大数据处理，从而对潜在隐患进行预警，保障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在推广过程中，应注重其实用性与易用性。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地区和家庭的实际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确保系统有效运行。同时，要对家长、监护人进行培训，使其熟练掌握使用方法，并能对报警信号进行快速检查和处理。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虚拟家庭安全屋”，家长可远程协助子女开展消防演练等安全训练。同时，开发游戏化学习应用，将交通规则等知识点融入闯关游戏，实现83%的用户留存率。

对于特殊群体可以利用VR技术创设“元宇宙亲情小屋”，进行共育干预。父母可通过VR设备实现跨地域知道孩子在校及在课堂的表现，教师则利用AI语音助手定时提醒服药、作业等事项。基于成本控制原则，该项目充分利用村级活动室的现有设备进行改造，单点改造成本低于5000元，项目核心是企业提供的“安全守护包”产品组合，包含具备电子围栏和一键SOS功能的智能手环，以及用于监测家用电器安全隐患的物联网传感器，在运营模式上，采用政府补贴60%、受益家庭自付40%的方式共同承担费用。

（三）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1. 建立企业责任捆绑机制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留守儿童安全保障工作中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企业责任捆绑机制，是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留守儿童安全保障工作的有效途径[5]。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企业在留守儿童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如要求企业为留守儿童捐赠智能监护设备、提供技术支持等。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将企业在留守儿童安全保障方面的表现纳入评价范围，对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履行责任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惩罚。

2. 实施社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设置“家庭教育协调员”岗位，按50∶1比例配备专业社工，将村级活动中心的一部分改造为“安全技能实训基地”，配备溺水救援模拟器等设备。完善评估与可持续机制。①采用动态监测工具：保山市建立留守儿童发展指数，含安全知识掌握率等12项指标。②实施企业责任绑定：安康市要求用工单位每200名员工配备1名家庭教育指导员。③成本效益分析：洲仔镇项目显示，每投入1元预防资金可减少8.3元善后支出。

四、结语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农村家庭中双亲长期异地务工或经商导致的亲子分离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形成的隔代教养模式已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为破解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难题，需要凝聚教育机构、基层组织和家庭监护人的多方合力，通过系统化的“三防”教育体系构建，切实筑牢儿童成长的安全防线，这不仅关乎千万农村家庭的幸福安康，更是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

参考文献

[1] 刘红升，赵雅欣，詹露露．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困境与出路[J]. 继续教育研究，2023(11): 102−108.

[2] 何江．大数据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精准帮扶探索[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3, 34(18): 275−278.

[3] 吴水艳，栗明伟．协同育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探究——以咸阳地区三个县域为例[J]. 好家长，2023(21): 42−44.

[4] 郭瑞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及教育路径研究[N]. 科学导报，2025−06−09(B02).

[5] 明华，安忠芳．聚力托举，让困境儿童茁壮成长[N]. 广西日报，2025−05−29(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年度湖南教育学会“十四五”教育科研课题“儿童安全教育研究”（E—27）。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第一中学）

新时期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范石娴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引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新征程上，着力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与精神支撑。养老机构是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既是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机构在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系统分析了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义，并尝试借鉴知识管理领域的 SECI 模型原理，运用知识转化理论，探索推进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知识管理；SECI 模型

一、养老机构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增进老年人民生福祉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发展中的重要目标。养老机构作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参与方和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支撑，其党组织建设工作成效初显，为养老机构的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组织形式与作用发挥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制约了党建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从积极进展来看，党组织建设成效初显。一是党组织覆盖面稳步扩大。得益于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在一些地方很多大型养老机构或品牌连锁养老服务企业开始探索建立党组织的途径和方式，有意识地去设立党支部、党小组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同时，也有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给予资金补助，极大地调动起养老机构建党组织的积极性。二是党组织作用初步显现。参与养老机构管理，参与机构重大事项决策，为机构发展把好政治方向；开展先锋岗、志愿服务等活动，组织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服务质量提升；开展党员和群众文化活动、组织思想交流等方式，调动各方积极性，增强凝聚力，让员工更加重视工作，激发主人翁精神。三是推进党员队伍建设[1]。加强党员日常管理，经常化、多样化开展学习教育，强化党性锻炼，提高专业技能，注重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发展成为党员，充实壮大党员队伍。

然而，当下难题也不可忽视：一方面存在着党组织建设不平衡的问题，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养老机构，部分地区和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因体量较小和经费不足等原因导致党组织建设较为困难。另外一方面是党组织形式化严重，发挥作用不充分，有的党组织还是沿用着以往老旧的模式，缺乏创新性和新颖性，同时与机构的管理层之间缺乏交流，难以参与到机构决策中来。还有些党组织所开展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方式落后，部分机构的党员教育内容和形式比较老套，难以激发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在日常管理中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党建工作资源匮乏，多方面的限制不利于党组织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也影响到了党建工作质量的提升。

总体而言，养老机构党组织建设虽有一定成果，但需正视现存问题，尤其是党组织形式的局限。要推动党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需要多方努力，扎实工作。

二、建设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的意义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具有多重深远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与组织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与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最大不同，就是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体党员。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习、继承和发展。养老机构党组织必须继承和发展好这一优良传统，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发现不足、总结提高，在持续的科学理论武装的进程中提升组织领导力。

二是有利于提升干部队伍的履职竞争力与战斗力。由于传统文化下的群体认知和历史发展的实际，养老机构职工队伍中还存在年龄层次偏高，文化层次偏低等情况[2]。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可以通过组织培训等方

式帮助干部职工知识更新、能力培养、实践锻炼，从而提升干部职工队伍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三是有利于增强养老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与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提到了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机构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传统的养老机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发展要求，必将被科技化、智能化、标准化、便捷化的新服务所替代。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必将有助于提升养老机构掌握和运用新技术，更好地融入新的养老服务体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四是有助于引领行业创新与标杆塑造，依托党建引领的方式探索经验，党组织以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推动养老机构勇敢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局限，积极探索智慧养老、医养结合等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医疗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便捷的服务，打造出一套成熟的经验模式，通过对行业的带头模范人物或者单位的挖掘、举办推介活动积极进行行业标杆塑造，从而树立一批服务水平、管理模式和服务文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行业内领军人物和标杆式单位，引领整个行业不断进步、发展、升级，朝着更加专业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方向前进，助力养老事业在老龄化浪潮中破浪前行，为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三、知识管理 SECI 模型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

知识管理指组织对内部知识进行系统梳理、整合、交流与运用，以提升业务效能与核心能力。对于养老机构而言，知识涵盖护理技巧、医疗管理经验、紧急应对办法及心理支持途径等。有效开展知识管理，可防止经验流失，保障服务标准统一，助力新员工快速适应工作，推动资深员工经验传承，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个性化的服务。

SECI 模型即螺旋型知识转换生成模型，该模型由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提出，认为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大类，而隐性知识更难以标准化，不易向他人传递；而显性的知识，则是可以通过语言传播出来的，可以文本化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可以不断地转化，通过互动产生新的知识，螺旋式地创造[3]。以知识为核心的 SECI 模型认为，知识转化有四种基本模式——社会化（潜移默化）、外部化（外在明示）、组合化（总结组合）、内在化（内在升华）。

这两大要素的结合对养老机构的党建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养老机构党员通过社会化可以分享投身养老行业服务的初心与经验，强化新党员使命感。经外部化，将服务中的优秀实践与方法整理成案例集，为党建提供鲜活素材。将党员的服务经验与老年人护理知识加以融合与提炼，有助于构建具有党建特色的服务体系。再通过内在化，党员主动将知识用于实践，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实现党建与养老工作的深度结合，最终实现推动养老机构的发展。

四、SECI 模型对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大量年轻养老服务工作者向党组织靠拢，对现有党员的学习、教育、管理等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养老机构的从业人员知识化、专业化倾向明显，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数量逐年增加。强化党对养老服务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养老服务事业朝着高质量方向稳健发展，不仅是党建工作拓展新领域、实现新作为的关键举措，更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发挥其核心效能的内在诉求与必然要求。

促进知识“社会化”，实现隐性经验的共享传承。“社会化”强调通过人与人、人与组织、群体与群体间的潜移默化地相互感染、相互作用及相互学习，分享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或文化产品，从而把个人所掌握的隐性知识转变成组织可以利用的知识的一种方法。先进思想、知识、技能通过这种方式在组织内部得到分享，而最终形成了组织文化。

推动知识“外在化”，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表达。“外在化”是将个人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通过类比、隐喻、概念或模型等形式清晰表达出来，转化为可被他人理解的显性知识。党组织应鼓励和引导党员、业务骨干，将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有效方法、感人故事进行系统总结和提炼，形成可传播的案例集、操作指南、培训课件或党建故事，使宝贵的隐性经验得以固化、共享和传承。

加强知识组合化，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组合化”是将分散的显性知识进行整理、分类、连接与整合，形成更系统、更完整的知识体系。党组织可以发挥整合作用，将个人总结的显性知识、外部引入的先进理念与政策理论进行系统化编撰，形成具有机构特色的服务标准、培训体系或党建知识库。这一过程有助于将组织战略、管理流程、共同愿景与个人知识成长相结合，提升知识的整体价值。

引导知识“内在化”，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内在化”是个人或组织吸收显性知识，并通过实践、反思将其转化为自身新的隐性知识与能力的过程。党组织应倡导“知行合一”，建立“实践—反思—提升”的闭环机制，引导党员职工将学到的系统知识、理论方法自觉运用于实际服务与管理中，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深化理解、锤炼技能，从而实现个人与组织能力的同步提升，增强党组织的实践效能。

五、新时期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

基于 SECI 模型的四个转化阶段，新时期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可重点从以下路径进行探索：

一是搭建多元学习交流平台，促进知识共享与转化。养老机构内党的组织架构为机构内高效率地学习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平台，如“三会一课”制度等，都较好奠定了组织学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行业的发展、技术的更新、学习环境和党员自身的特点不断构建各种形式的灵活的平台。比如网络阵地：目前使用较好的有“学习强国”平台，该平台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上线以来，已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广泛使用的平台，以碎片化阅读为特点，兼具影音、交流等功能，在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很好地适应了手机用户的特点。为老年事业单位党员职工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信息和学习领域 [4]。再如实践阵地：养老机构是很好地践行孝亲敬老的地方，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行动的体现，在机构内搭建实践和实训平台，既可以为机构内干部职工提供实践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可建立志愿服务平台，为社会大众提供奉献自我的机会。这样的实践和观察，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之间传递，形成群体文化，完善机构文化。其他如研究阵地：养老机构是养老服务最基础的实践场域，更多地参与理论研究不仅可以有助于自身理论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养老服务的良性发展，也可以提升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凝聚共同愿景，激发组织学习内生动力。养老机构党组织搭建多样化、有吸引力的学习平台后，党员和职工、个人和组织之间可以很好地分享知识。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必将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因此养老机构要有明确的愿景，并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可。愿景是机构的发展方向，全体党员职工要挖掘自身潜力，在共同愿景的指引下，相互交流学习，通过螺旋式的转化过程，把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群体的隐性知识，产生新的认识，形成文化认同。在养老机构党的组织建设中，倡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发展的学习理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本领，为养老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三是创新学习机制，推动知识外化与系统融合。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适应未来养老需求的有效途径。有资料显示，人类知识中显性知识所占比例仅为 20%，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创新学习机制来促进知识的转化。首先，要推行课题研究式学习。新时代的养老机构不仅要满足于基本的服务，更要结合时代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变化、新技术的运用等新的特点，不断使养老机构的管理方式更新换代。养老机构党组织可以根据机构的实际，确定一个课题，比如“AI 技术运用”“安宁服务”等，建立研究小组，进行讨论和学习，通过研究掌握前沿知识。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式学习。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坚持带着问题开展学习，在学习中找到答案，在学习中提升认知。比如解决养老机构在更新迭代过程中的问题，在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过程中养老机构如何应对等等。第三，要开展开放合作式学习。合作式学习不仅可以在养老机构党组织内部，也可以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使不同组织的隐性知识明晰，促进组织间知识的融合，持续推动创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交流可以掌握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思路和经营方式，从而推动事业和单位的发展。

四是构建闭环学习体系，保障知识内化与效能转化。从 SECI 模型可以看出，只有内化的知识才是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内化的知识才能进入新的知识模型，才能再次从社会化到内化，这是知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组织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促进这一过程，养老机构党组织必须实现闭环式的学习。闭环学习首先体现在对学习规律的运用，即“认识—理解—思考”，在组织制定学习计划时，要充分遵循循序渐进和内化外化转换的规律，在认识层面多聚焦党的理论的最前沿；在理解层面多促进对新的理论成果和观点的了解和吸收；在思考层面多注重理念和实践的结合。闭环学习还要体现在对监督考核的运用。学习靠自觉，也需要有严格的学习管理制度。在学习中，健全党员、职工学习档案，建立健全评议制度，把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学习成效纳入评议内容，评选先进，以先进带动全体党员。同时，养老机构党组织要加强定期检查，督促学习，促进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成效 [5]。

深化养老机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探索并运用科学路径，扎实完成各项建设任务，才能有效适应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要求，为养老机构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1] 何悦澄 . 社会工作介入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与探索——以广州市 F 社区为例 [D]. 郑州 : 郑州大学 , 2025.

[2] 董小暄 .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信息化绩效评价研究 [D]. 济南 : 山东大学 , 2014.

[3] 岳天明 , 李力 . 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J]. 东岳论丛 , 2024, 45(01): 26−34.

[4] 黄石松 . 养老服务联合体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J]. 前线 , 2024(04): 79−81.

[5] 胡安安 , 戴伟辉 . 知识共享 SECI 模型在基层党支部建设中的应用探索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 2014, 8(03): 92−98.

（作者单位：无锡市老龄工作发展促进中心）

“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治理养老诈骗研究

谭云霄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诈骗问题愈发严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五社联动”作为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充分调动了社区层面多元主体的积极性。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是“五社联动”中的服务主体，也是服务质量的专业保障，因此本文聚焦社工与警务力量在治理养老诈骗中的协同模式，旨在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体系，有效遏制养老诈骗行为，切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五社联动”；养老诈骗；社工；警务力量；协同治理

一、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比18.70%；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占比13.50%[1]。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攀升至3.1亿，占比达22%。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2]。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诈骗手段和空间不断翻新，从传统的“保健品诈骗”“冒充公检法”到新型的“数字鸿沟诈骗”“情感养老诈骗”等，严重威胁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和生活质量。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公安机关虽然在案件侦破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受限于警务资源和专业边界，在诈骗预防和老年人支持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社工虽然能够深入社区开展预防教育和服务，但缺乏法律强制力和案件处置能力。因此，在“五社联动”这一背景下，本文聚焦社工与警务力量的协同关系，探索以下核心问题：当前养老诈骗的主要类型特征及现有治理措施的局限性；社工与警务力量在养老诈骗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互补优势；构建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施路径。

二、养老诈骗的现状特征与治理挑战

（一）养老诈骗的主要类型与发展趋势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已呈现出专业化和多样化趋势，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诈骗形式多样且危害严重，主要呈现六类典型模式。其中健康养生类诈骗最为普遍，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以免费体检或礼品赠送吸引老年人，通过“讲座”“义诊”兜售高价保健品，并加速向线上转移，隐蔽性更强。情感关怀类诈骗增长迅速，诈骗分子扮演“孝顺子女”或进行“黄昏恋”，骗取独居老人情感信任后实施诈骗，心理伤害尤重[3]。冒充身份类诈骗则非法获取信息后冒充公检法、亲友或政府人员，利用信任进行恐吓诱导转账，信息泄露使其精准迷惑性持续提升。数字技术类诈骗瞄准数字鸿沟，利用虚假链接（如社保补贴通知）、远程操控等技术手段行骗，常造成即时大额损失且难以挽回。旅游消费类诈骗以“低价游”为幌子强制购物或捆绑销售，多针对社交活跃老人且常涉跨区域犯罪。投资理财类诈骗虚构养老公寓等项目，包装成正规机构骗取大额资金，追赃挽损难度极高，老年人经济损失最为惨重[4]。从发展趋势看，养老诈骗呈现精准化（信息定制、手段专业）、复合型（多手法交织）和涉及面广三大特点，导致传统治理效果受限，亟须创新治理策略应对。

（二）养老诈骗的治理挑战

公安机关在养老诈骗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其工作重心集中于案件侦破、预警劝阻与技术治理三大领域。与此同时，在社区层面，治理工作则以宣传教育为基础，结合风险排查与个案干预，构建起贴近基层的防护网络。尽管现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若干结构性短板，制约了治理效果的提升。

当前养老诈骗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协同机制碎片化，公安、民政、市监等部门协作缺乏统一指挥与资源统筹，线索移交延迟，信息标准不一，导致跨区域、跨行业打击合力不足。例如，市监部门查获的保健品虚假宣传线索，常难以及时转化为公安机关的有效证据。二是技术治理存在代际鸿沟，公安机关运用的大数据、AI反诈模型预警多依赖电话短信，部分老年人因警惕性高或数字素养低，反将预警误判为诈骗，导致劝阻效

果打折；同时，诈骗分子利用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新技术逃避监管，现有体系追踪打击困难。三是宣传教育实效性不足，社区宣传多单向灌输，内容专业性强、缺乏场景化案例解读，频次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提醒。四是风险排查覆盖不全，基层排查侧重保健品店、理财公司等显性场所，忽视网络平台、私人会所等隐蔽场景，对独居、空巢老人等高危群体动态监测和常态走访机制缺失。五是个案干预专业化缺失，帮扶多限于经济安抚，缺乏系统心理疏导。基层人员普遍缺乏老年心理调适及相关法律知识，难以化解受骗老人的自责及抑郁情绪，甚至造成二次伤害。六是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有待加强，针对养老诈骗的专项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诈骗行为的界定和处罚力度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同时，相关政策在执行层面存在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一等问题，影响了治理效果的整体提升。七是社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有待提升，社会各界对养老诈骗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公众对诈骗手段的认知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得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三、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一）协同治理理论概述

协同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突发事件应对等多个领域广泛运用，该理论核心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一为多元主体参与，突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一同参与社会治理，打破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二是目标协同，各参与主体有着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但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时，能形成共同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合作；三是资源整合，各主体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达成资源的优化配备，提高治理效率；四是互动合作，各主体借助平等沟通、协商与协作，构建彼此信任、彼此支持的合作关系，一起应对社会问题。

1. 社工与警务力量的职能分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在应对养老诈骗的实践工作中，社工凭借对社区环境以及老年人群体的熟知，到社区进行反诈宣传教育，通过一对一访谈、小组活动等形式，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与辨别能力[5]。同时，社工可为遭诈骗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帮他们摆脱困境，重新融入社会。

警务力量包含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还有其他有执法权的相关部门及人员，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养老诈骗治理工作当中，警务力量主要承担侦查犯罪、抓捕嫌疑人、追赃挽损等事项，他们凭借法律给予的权力和专业刑侦方法，对各类养老诈骗案子开展调查，尽快控制诈骗行为，追究犯罪分子法律责任，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挽回经济损失。

2. 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的优势分析

在养老诈骗治理过程中，社工和警务力量协同联动是协同治理理论的生动实践。

在信息共享机制方面，双方搭建起动态的信息交互网络。警务力量依靠专业特长，为社工传递最新诈骗案例、犯罪手法变化走向及风险预警消息；社工凭借深入社区工作的优势，把老年人生活的情形、家庭关系、潜在风险等一手消息反馈给警务部门，达成信息双向精确传递和深度整合，切实填补信息空白。

在资源整合维度，双方借资源重组达成效能最大化。警务力量充分展现执法权威及法律专业长处，为反诈宣传提供典型案例剖析、法律条文解读等硬核内容；社工则利用社区服务网络，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依靠组织兴趣活动、搭建沟通平台等柔性办法，提高老年人参与程度和互动性。

在行动协同层面，双方构建“预防—处置—跟进”全链条响应机制。遇到突发的诈骗案子，警务部门立刻开启侦查程序，发挥专业特长进行案件侦破；社工同步介入，借助心理疏通、经济资助、家庭关系修补等专业服务，帮助受害者减轻创伤、重塑信任，切实防范次生风险[6]。这种“刚柔相济”的协作方式，构成涵盖风险预警、应急处理、长效帮扶的完善治理闭环，大幅提升养老诈骗综合整治功效。

（二）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的构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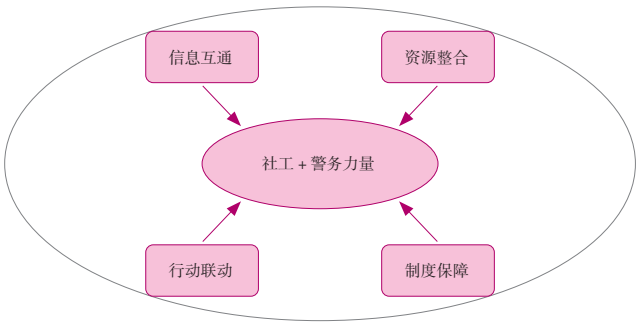


图 1 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模式

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模式（见图 1）构建的前提是，双方需深刻理解防止养老诈骗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老年人财产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协同治理对于有效打击犯罪、保护弱势群体的关键意义；并清晰界定各自在识别风险、宣传教育、线索排查、案件处置等环节中的角色与职责；双方需在养老诈骗治理工作中主动配合、资源共享、协同行动，共同完成预警预防、打击整治、受害帮扶等任务，切实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信息互通：打破数据壁垒，实现精准治理

在养老诈骗治理进程中，警方凭借执法权，能获取诈骗案子线索、犯罪嫌疑人信息、案件类型分布等关键数据；社工借社区走访、日常探访、邻里交流等方式，

知晓老年人的生活情形、社交圈子以及可能碰到的诈骗风险。例如，警方所掌握的关于某类新型养老投资诈骗案子的作案手段、涉案金额等数据，和社工搜集的社区里老年人投资趋向、金融知识水平等信息结合起来，能画出更精准的养老诈骗风险地图，弄清楚高风险区域和人群[7]。同时，借助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达成实时数据交换，让双方可以及时知晓养老诈骗的动态变化，警方能把最新诈骗案例、犯罪趋势等信息传递给社工，社工将社区里老年人遇到的可疑情形和潜在风险反馈给警方，好让警方迅速作出反应，进行预警与防范，进而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加强养老诈骗治理效力。

2. 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形成治理合力

资源整合旨在以社区为核心平台，将警务资源联动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并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警务人员发挥执法专业优势，负责案件侦查、法律宣讲；社工运用专业方法，开展老年人需求评估、小组活动组织，招募社区志愿者协助宣传、走访等工作，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在养老诈骗治理中，双方可以整合资源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比如，联合举办反诈宣传讲座，由警方讲解法律知识和典型案例，增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和警惕性；社工则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互动形式，帮助老年人加深理解和辨识诈骗手段。

3. 行动联动：协同作战，提升处置效率

行动联动是四位一体运作框架的关键环节，强调在养老诈骗治理的各个阶段，社工和警务力量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在风险预防阶段，双方共同制定宣传方案，深入社区、养老院等场所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

当发生养老诈骗案件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社工第一时间协助警方安抚受害者情绪，收集案件相关信息，为警方侦查提供线索；警方则迅速展开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打击犯罪行为[8]。在案件处置结束后，双方持续跟进，社工对受害老年人进行长期帮扶，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同时收集老年人反馈的新情况，为警方后续工作提供参考，形成“预防—处置—跟进”的闭环行动模式，确保养老诈骗治理工作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4. 制度保障：夯实根基，确保长效运行

首先，制定常态化协作制度，双方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一起商量治理策略，处理协作当中出现的问题。

其次，构建考核评价制度，把养老诈骗治理成果纳入双方工作考核体系里，促使工作人员踊跃投身协同工作，此外，完善监督制度，保证信息共享安全、资源使用合理以及行动联动规范。通过制度建设，打破部门壁垒，为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合作提供坚实保障，推动养老诈骗治理工作长久规范发展。

最后，定期组织社工和警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双方的专业能力和协作水平。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知识、社会工作方法、沟通技巧等，促进知识共享和能力互补[9]。

四、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数字化转型叠加催生了新型养老诈骗风险。在“五社联动”背景下，研究社工与警务力量在治理养老诈骗实践中的协同模式，有利于打击养老诈骗，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切实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推动社区养老实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有利于丰富“五社联动”模式的内涵，推动多元主体协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李斌，王业帆．社区治理视阈下养老诈骗治安防控研究 [J]. 警学研究，2024(06): 63-70.

[2] 柳林．基于情境预防的养老诈骗犯罪预防机理与治理对策研究 [J]. 警学研究，2024(06): 71-84.

[3] 王业帆．社区治理视域下养老诈骗防控研究 [D].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4.

[4] 李莹瑶．社区戒毒实践中警务力量与社工协同工作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社区戒毒为例 [D]. 广州：广州大学，2021.

[5] 赵长明．养老诈骗社会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8): 61-65.

[6] 杨浩，张小兵．协同治理视阈下养老诈骗犯罪的困境与抒解 [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3, 36(04): 99-105.

[7]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EB/0L]. (2022-02-21)[2025-06-18].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 5674844.htm.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0L]. (2022-02-21)[2025-06-18].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EB/0L]. (2024-07-21)[2025-06-1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jump=true.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甘肃省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与警务力量协同打击养老诈骗研究”（2023B-316）。

（作者系甘肃警察学院讲师）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探究

王道君 * 施雨桐 鄢建明

摘要：本研究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分析其现状、影响因素及研究方法。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存在社交焦虑、学习压力大、自伤发生率高及心理韧性相关问题，家庭环境特殊性是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在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路径关系研究上存在不足。社会各界应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加大研究投入，构建全方位社会支持体系。本研究旨在为后续研究及干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助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因素—过程整合研究

一、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

202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再度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纳入国家战略视野。据 2018 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 700 万人，这一群体面临“教育内容缺失、教育机制落后、教育方向错位、教育力量单一”的四重困境。从地域分布看，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的留守儿童比例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如四川省某县调研显示，留守儿童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 43.7%，其中单亲外出务工家庭占比 62%，双亲外出家庭占比 38%。这种结构性家庭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呈现累积效应，随着留守年限延长，心理问题检出率呈梯度上升趋势。中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早在 2005 年左右就引起了教育学界的关注 [1]，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水平与非留守儿童有较大差异，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自伤发生率高，应付压力和抗挫能力较弱，心理健康水平较差，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根据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在儿童成长的微观环境中，家庭是对其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核心系统，无论是短期的行为养成还是长期的人格塑造，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由于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的特殊性，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陪伴，社会支持系统缺乏重要一环，容易沾染社会不良风气，增加了教育引导的难度。崔丽娟等人提出，为留守儿童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社会支持的水平和质量，能有效促进多方面社会适应，减少和防止部分问题行为的发生 [2]。社会适应包含情绪适应、自我适应、人际适应等许多方面，赵景欣等人发现，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对焦虑、抑郁等情绪适应有显著影响 [3]，因此，通过改善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让留守儿童的情绪适应水平得到提升，促进建构社会支持系统，进而弥补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失，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一条可行性建议。

社交焦虑作为焦虑障碍的重要亚型，核心特征表现为个体对被他人注视存在显著恐惧。既往研究表明，这种心理状态不仅会导致患者社会功能的严重受损，在人际交往中承受强烈的痛苦体验，更会从根本上使其对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章鸣明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适应能力与情绪水平关系显著，社交焦虑水平越高，社会适应能力越低，说明异常情绪体验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4]。此外，社交焦虑可能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问题行为。比如有研究表明，患有社交焦虑的个体更可能存在手机依赖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手机使用会分散人们对情绪问题的注意力，减少焦虑；也可能是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进行互动，可以抑制他们的自卑、害怕被拒绝以及不适当的社交行为。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缺少父母的监管、引导和关爱，导致社交关系不健全，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社交焦虑检出率高达 32.5%（非留守儿童为 18.7%），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和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因此，探讨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学习在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习压力也是其最主要的压力源。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值日益攀升，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学生群体面临的学习压力呈现持续递增态势。王琇等人的研

究也发现，1997—2020 年间中学生学习压力总体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5]。以往研究发现，较大的学习压力不仅会影响到学业成绩，也会引发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还会阻碍良好行为的发展，学习压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学业成绩下降 0.29 个单位（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同时抑郁风险增加 19%。最新研究表明，“双减”政策落实后城镇儿童课业负担明显减轻，但 34.7% 的留守儿童反映作业量未减反增，主因是农村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不足，父母通过远程通信施加高压力，但缺乏实质性的辅导支持，导致儿童陷入“高压力—低效能”困境。因此，留守儿童的学习压力问题依然值得关注。

自伤是指有意地伤害自己身体，但并未出于自杀目的的行为。一项大样本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报告率达到了 28.8%，高于全球范围内的样本报告率，其中留守经历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6]。在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群体自伤的比例达到了 56.7%，其中反复自伤者占比 41.3%[7]。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存在着“压力累积—情绪调节失败—行为外化”的路径：长期缺乏父母情感回应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发育滞后（如无法识别焦虑情绪），在遭遇人际冲突或学业挫折时，倾向于采用自伤作为应对策略。某留守儿童在访谈中表示：“划伤自己的时候，感觉心里的难过会跟着血流出来，妈妈打电话骂我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研究显示，家庭因素在青少年自伤问题中占据关键地位。人际或系统模型指出，青少年自伤是其所处家庭环境或外部环境功能失常的体现。恶劣的家庭氛围会在不经意间对自伤行为起到支持与强化作用。父母关爱缺乏对留守青少年自伤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8]，留守儿童的自伤发生率高，这与他们的消极情绪、低社会支持和高冲动性有关。近年来，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频率高、范围广、隐蔽性强，自伤部位多集中于上肢等易遮盖区域，学校与监护人识别率不足 30%，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自伤行为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同样身处“留守”状况，为何有的儿童会沦为“问题儿童”，而有的儿童却能实现健康成长呢？早期研究表明，即便一些儿童面临极为严峻的压力或处于逆境之中，他们依旧能够良好地发展。于是，研究者将这类助力儿童在逆境中适应的因素，命名为“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指的是，个体的心理发展未因曾经或正在经历的严重压力、逆境而遭受损害，甚至在挫折中愈发坚强的一种现象[9]。心理韧性能够缓解个体所感知到的心理痛苦与压力，助力个体达到更为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韧性较强的个体通常具备乐观豁达、坚韧不拔、积极应对等优良特质，这些心理品质不仅能帮助他们从容化解压力与困扰，更能促使其以更稳健的姿态适应生活挑战。此前的研究已表明，社会支持在儿童心理韧性的形成中扮演着关键的保护角色，其中，来自家庭及其他成员的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心理韧性发展的主要因素[10]，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与同伴接纳共同构成心理韧性的核心外部资源。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当教师情感支持达到每周 3 次以上、同伴亲密关系数量≥ 2 人时，心理韧性的保护作用显著增强。这解释了为何部分留守儿童能在逆境中保持心理健康，如某留守女童在日记中写道：“虽然爸妈不在家，但班主任每天都会问我作业情况，同桌会借我漫画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可以降低社交焦虑，减轻学习压力，干预自伤行为，心理韧性每提升 1 个标准差，自伤行为发生概率降低 37%。可见，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相关研究对促进该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需求非常迫切，纵向的追踪调查更是少之又少，横断面研究占比超 80%，难以捕捉心理问题的动态演变规律。此外，多数研究止步于单因素关联分析，缺乏对“家庭环境→社会支持→心理韧性→行为结果”的路径验证，这导致现有干预策略多呈碎片化，亟须创新研究方法以突破瓶颈。

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可行性思路

传统的变量中心横断面研究方法，虽然能较为深入地挖掘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足以揭示因果关系，且可能因框选样本而存在研究误差。沿时间路径进行的追踪研究能够揭示因果关系，但存在调研时间久、分析方法要求高、样本流失率高等现实困难。席居哲等人提出的因素—过程整合研究方法[11]，兼顾重点与整合、因素与过程、内源与外源，对各变量进行整合，兼顾时间变量上的连续性，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系统、持续、完整的研究分析，并尝试提供机制解释策略基准框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因素—过程整合模型依托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以及过往的研究成果，为心理韧性研究构建了一套阐释机制的策略性基准框架（见图 1）。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将“因素分析”与“过程追踪”有机结合，既保留变量中心研究的精确性，又纳入个体发展的时间维度，为解析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显微镜 + 望远镜”的双重视角。该模型将那些已被证实能够提升心理韧性的因子，融入以人—环境交互作用为核心线索的动态适应过程框架之中，主要涵盖三个层面：其一为环境预测因子，其中包含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子，危险因子如父母缺位时长（高于 3 年者心理风险倍增）、家庭经济压力（负债率 >30%）、社区治安隐患等，保护因子如教师情感响应度、同伴支持网络密度、社区儿童之家覆盖率等；其二是心理

韧性者所具备的主体特征，比如认知特质中的归因风格与自我效能感以及情绪调节中的情绪觉察速度与表达抑制 / 重评策略使用频率等；其三是在经历消极生活事件后，通过人与环境及适应结果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各类动态调节过程，个体最终会呈现两种发展走向：一方面推动韧性重整而达成积极发展成效；另一方面则因未能实现韧性重整而导致不良发展结局。良性路径如保护因子激活→积极认知评价→心理韧性提升→焦虑 / 自伤行为减少，恶性路径如危险因子累积→情绪调节失败→社交回避加剧→学习效能滑坡。该模型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定量追踪 + 定性访谈）实现了解析保护 / 危险因子的阈值效应、捕捉个体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匹配模式及构建时间窗预测指标三个突破，整体而言，因素—过程整合模型为心理韧性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且系统的研究路径参考体系，在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研究当中也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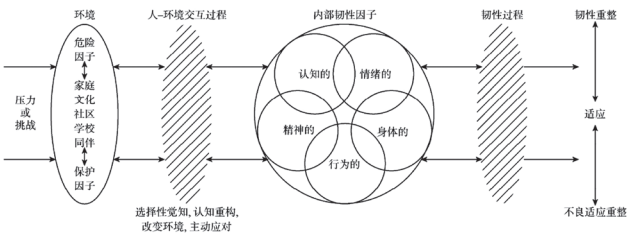


图 1 心理因素—过程整合模型

三、总结

综上所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多维度、复杂性的特点。社交焦虑、学习压力、自伤行为以及心理韧性等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如父母陪伴的缺失，使得他们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存在不足，进而增加了各类心理问题产生的风险。尽管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及部分影响因素，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之间的路径关系研究上较为薄弱，这无疑制约了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有效干预策略的制定。

席居哲等人提出的因素—过程整合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方法基于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全面整合了环境预测因子、心理韧性者主体特征以及动态适应过程等多个关键要素，有望为深入探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框架。未来的研究可借助这一方法，进一步开展纵向追踪调查，深入剖析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更精准地揭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内在机制，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此外，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大对相关研究的投入，整合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资源，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体系，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 周宗奎，孙晓军，刘亚，等 .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01): 71−79.

[2] 崔丽娟，肖雨蒙 .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社会支持系统 :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对策 [J].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10(01): 20−30.

[3] 赵景欣，刘霞，申继亮 .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 2008(01): 36−42.

[4] 章鸣明，曹召伦，顾晨龙，等 . 农村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能力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卫生软科学 , 2012, 26(10): 875−877.

[5] 王琇，杨惠雯 . 学业负担真的越减越轻吗——中学生学习压力的横断历史元分析 [J]. 上海教育科研 , 2022(10): 24−30.

[6] 郭霜霜，焦婷，马颖，等 .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学校卫生 , 2022, 43(05): 768−771.

[7] 薛艳，邱梨红，季家丝 . 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及相关因素调查 [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 2019, 29(04): 225−228.

[8] 黄月胜，范兴华，刘妍，等 . 农村留守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的潜在类别及其家庭动因 [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 2019, 19(05): 47−52.

[9] 席居哲，桑标，左志宏 . 心理弹性儿童的压力 / 逆境认知 [J]. 心理科学 , 2011, 34(01): 102−107.

[10] 辛勇，白柯，陈谢平，等 .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19, 17(06): 817−823.

[11] 席居哲，左志宏 ,WU Wei. 心理韧性研究诸进路 [J]. 心理科学进展 , 2012, 20(09): 1426−144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江西省基础教育课题“因素—过程整合模型下的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路径探究”（SZUSYZH2023−1286）；上饶师范学院 2024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S202410416008）。

（作者：通信作者王道君，上饶师范学院讲师；施雨桐，上饶师范学院本科生；鄢建明，上饶市广信区第六中学中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生意外伤害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宗浩 季 玲* 吴 瑶 唐 飞 文清桦

摘要：目的：分析某市 1~6 年级小学生意外伤害的影响因素，为预防体系构建提供依据及参考。**方法：**对某市 4 所小学（含 2 所市区小学、2 所乡镇小学）的全体学生展开问卷调查，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儿童意外伤害的风险因素。**结果：**分布特征与风险分析表明，不同伤害频次组间在父母安全教育频率、看护频率、手机持有情况、体育活动参与度、睡眠质量及父母陪伴时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回归分析显示，高频伤害的风险因素为父母安全教育频率低、体育活动参与不足、睡眠质量差。**结论：**65.90％的学生从未遭遇意外伤害，仅 2.80％的学生意外伤害次数大于 3 次。小学生群体整体意外伤害处于相对可控范围，但部分学生存在较高的意外伤害风险，这些学生应成为重点关注与干预的对象。

关键词：小学生；意外伤害；影响因素

意外伤害是指无意图、突然发生的使身体受到损伤的客观事件，可由各种因素导致，主要包括交通伤害、跌落伤、中毒、烧伤、烫伤、溺水等[1]。在我国，《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指出[2]，意外伤害是我国 0~19 岁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且意外伤害发生率在部分城市甚至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例如，在北京市，2017—2023 年间，因意外伤害死亡的儿童比例和因肿瘤而死亡的儿童比例接近[3]。在南昌市，2013—2019 年间，发生意外伤害的儿童为 224101 人次，且就诊人次总体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调查中，随机抽取的 2000 名儿童中有 337 人发生过意外伤害，发生率更是达到了 16.9%[5-6]。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于 2024 年对新疆某市 4 所小学 6~12 岁在校儿童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年龄 6~12 岁，知情同意参与研究，无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排除标准包括：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无法配合完成问卷或家长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样本选择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首先对某市所有小学进行统一编号，然后利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 4 所学校（涵盖市区与乡镇），每所学校覆盖 1~6 年级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根据美国 CDC 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监测系统及我国安徽省儿童危险行为发生率（2.5% ~30.4％），结合整群抽样公式计算样本量：

$$N=\frac{4p(1-p)\left(Z_{\alpha}+Z_{\beta/2}\right)^{2}[1+(m-1)\rho]}{d^{2}}$$

其中，预期伤害发生率 p=0.165，置信水平 α=0.05（对应 Z_{α}=1.96），检验效能 β=0.1（对应 $Z_{\beta/2}$=1.28），群内相关系数 ρ=0.01，允许误差 d=0.1p，每校平均人数 m=1000。

计算得基础样本量 457 人，考虑 10％无应答率后最终确定样本量为 500 人。数据采集通过《儿童行为及相关因素调查表》完成，该问卷整合《全国伤害监测报告卡（2014）》与 Rutter 儿童行为量表的条目，涵盖四大模块：学生基本信息（性别、民族、年级）；儿童危险行为（如交通违规、危险游戏等 31 项行为，按频率评分 0~2 分）；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监护人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安全设施配置）；意外伤害事件（伤害次数、类型、处理方式及医疗费用），均经预调查（随机抽取 1 个班级）验证可行性，条目信效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内容效度指数（CVI）为 0.91。正式调查由家长辅助填写，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研究目的，并让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076 份，有效应答率为 97.8％。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横断面研究设计，结合文献分析法和定量问卷调查法，系统探究该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献分析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PubMed 等中英文数据库，系统梳理 2010—2023 年儿童意外伤害相关文献，围绕“意外伤害定义”“危险

行为量表”“影响因素模型”等主题词，筛选出 32 篇核心文献和 5 份政策文件，构建理论框架。研究定义“意外伤害”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经医疗机构诊断为损伤；伤后需他人紧急处置；因伤休息时间≥ 0.5 天，且事件发生在调查前 12 个月内。

问卷调查法：基于分层整群抽样原则，对某市 4 所小学（含 2 所市区小学、2 所乡镇小学）的全体学生展开调查。问卷设计遵循以下流程：初版问卷整合 Rutter 量表行为条目与伤害监测指标；通过专家咨询法（5 名公共卫生与儿科专家）修订条目，删除歧义性问题（如“是否经常受伤”改为“过去一年受伤次数”）；预调查（n=50）检验填写时长（平均 12 分钟）与逻辑一致性。正式调查阶段，由学校教师统一发放问卷，家长在家庭环境中辅助填写，重点标注“伤害事件”需提供具体时间、地点及处理细节。质量控制措施包括：双人录入 EpiData 数据库，比对纠错率 <0.5%；缺失值超过 20% 的问卷予以剔除（共剔除 24 份）；通过电话回访 10% 样本（n=108）验证数据真实性，一致性达到 93.6%。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0 进行统计学分析。首先对连续变量（如年龄、伤害次数）进行正态性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数）描述；分类变量（如性别、伤害类型）以频数（百分比）呈现。单因素分析时，比较伤害组与非伤害组在人口学特征、行为问题及家庭环境上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理论频数 <5 的单元格使用 Fisher 精确检验，多因素分析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是否发生意外伤害”，无伤害为 0，有伤害为 1，纳入单因素分析中 p<0.1 的变量，如监护人吸烟、电子游戏时长等。通过逐步回归法（向前 LR）筛选显著预测因子，计算比值比（OR）及 95% 置信区间（CI）。Hosmer–Lemeshow 检验评估模型拟合优度，p>0.05 时拟合良好，多重共线性以方差膨胀因子（VIF<5）进行评估，累积比数 logit 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针对伤害频率（>3 次，1~3 次，0 次）的有序多分类数据验证伤害严重程度。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涵盖多方面内容。在意外伤害次数上，65.90% 的人从未发生过意外伤害，31.30% 的人发生过 1~3 次，仅 2.80% 的人发生次数大于 3 次。父母开展意外伤害安全教育的频率，经常开展（>5 天 / 周）的占 46.80%，偶尔进行（1~2 天 / 周）的占 46.00%。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以“高”和“非常高”为主，分别占 42.60% 和 35.80%，父母每周陪伴时长超 8 小时的占 66.20%，看护频率为“经常”的占 91.00%。在上学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步行”占比最高，达到 52.60%，“私家车”占比为 33.00%。体育活动参与频率选择“经常”的占比达 64.90%。“睡眠质量好”的占比达 81.50%。手机持有情况“有”和“无”的比例较为接近，分别为 47.90% 和 52.10%。

（二）分布特征与风险分析

表 1 受过意外伤害样本的特征分布与高频伤害（>3 次）风险分析（n=515）

调查项	分类选项	1~3 次 (n=473)	>3 次 (n=42)	x^2/Fisher 值	p 值
父母安全教育频率	经常（≥ 5 天 / 周）	34.20%	9.50%	18.32	0.001
	偶尔（1~2 天 / 周）	52.60%	66.70%		
	从不	13.20%	23.80%		
父母看护频率	经常	85.40%	71.40%	6.54	0.038
	一般 / 偶尔	14.60%	28.60%		
手机持有情况	有手机	59.80%	78.60%	5.91	0.015
体育活动参与	经常	67.20%	45.20%	9.67	0.008
	偶尔 / 几乎不	32.80%	54.80%		
睡眠质量	好	69.10%	52.40%	5.02	0.045
	一般 / 差	30.90%	47.60%		
父母陪伴时长	>8 小时	63.20%	45.20%	5.76	0.056

本研究针对特定调查项目，对比“1~3 次（n=473）”和“>3 次（n=42）”两组样本的数据，以揭示潜在关联，父母安全教育频率维度显示，“经常（>5 天 / 周）”在“1~3 次”组占比为 34.20%，而“>3 次”组仅占 9.50%。卡方检验结果 χ^2 值为 18.32，p 值为 0.001，两组在该频率分布上差异极显著，安全教育频率可能对相关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父母看护频率方面，“经常”状态在“1~3 次”组占比达 85.40%，“>3 次”组占 71.40%，χ^2 值为 6.54，p 值为 0.038，存在显著差异，看护频率与所研究现象之间或有关联。两组中“有手机”的占比分别为 59.80% 与 78.60%，χ^2 值达到 5.91，p 值为 0.015，组间差异显著，手机持有情况中“有”这一因素在整体研究情境下或许存在作用。体育活动“经常”参与度显示，“1~3 次”组占 67.20%，“>3 次”组占 45.20%，χ^2 值为 9.67，p 值为 0.008，差异性显著。睡眠质量评价为“好”的占比在两组分别为 69.10% 和 52.40%，χ^2 值为 5.02，p 值为 0.045，存在差异。

（三）回归分析

围绕高频伤害的研究，对比“>3 次”与“1~3 次”的分组，借助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多个潜在风险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安全教育频率较低时，β 值达到 1.12，优势比为 3.07，95% 置信区间在 [1.42，6.62]，p 值为 0.004，这一组合结果显示，父母安全教育频率低和高频伤害风险存在紧密显著联系，安全教育频率低会大幅增加高频伤害发生的可能，手机持有变量的 β 值为 0.89，OR 值为 2.43，95% 置信区间为 [1.11，5.34]，p 值为 0.026，这表明手机持有

情况对高频伤害风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持有手机可能成为促使高频伤害出现的一个因素。体育活动参与 OR 值显示为 2.14，95% 的置信区间在 [1.08，4.24]，p 值为 0.029，这表明体育活动参与不足和高频伤害风险之间存在关联，参与体育活动不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频伤害发生的风险。睡眠质量差时 β 值为 0.68，OR 值为 1.97，95% 置信区间为 [1.01，3.87]，p 值为 0.047，表明睡眠质量也与高频伤害风险相关，充足的休息使学生白天头脑清醒，保证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更佳，注意力与判断力提高，睡眠质量不佳或许更易受高频伤害。这些因素对高频伤害发生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影响，为后续预防策略制定提供了数据与理论支撑。

三、讨论

（一）意外伤害现状

该地区小学生意外伤害状况的调研包含广泛维度，数据丰富且研究价值显著，在意外伤害次数分布上，数据不均衡性特征显著：65.90% 的学生从未遭遇意外伤害，仅 2.80% 的学生遭遇意外伤害次数大于 3 次，小学生群体整体意外伤害处于相对可控范围，但部分学生存在较高的意外伤害风险，这些学生应成为重点关注与干预的对象。同时，我们能够发现，父母在小学生意外伤害预防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近半数父母经常开展意外伤害安全教育（≥ 5 天 / 周），近半数偶尔进行（1~2 天 / 周），从不开展的占比较小，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家长群体对安全教育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性。多数父母每周陪伴孩子时长超过 8 小时（63.20%），且 91.00% 的父母看护频率为“经常”，可以看出父母对于孩子的陪伴较多。父母文化水平大学本科居多（56.10%），在对子女的期望方面，选择“高”和“非常高”期望的占比总计达 78.4%，这些因素都可以从侧面看出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有所提高，并且彰显多数父母对子女成长成才的深切期盼。总体来说，以上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并互相影响，共同塑造小学生的成长环境。其次，上述差异性显示意外伤害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未来研究需深入探究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制定个性化方案。

（二）意外伤害的分布特征与风险分析

通过分析受过意外伤害样本的特征分布与高频伤害（>3 次）风险，多个关键因素在不同伤害频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预防意外伤害时父母的看护频率也相当关键，“经常”看护下“1~3 次”组的占比高于“>3 次”组，χ^2 值为 6.54，p 值 0.038，差异显著，手机持有情况与高频伤害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显著，“有手机”在“>3 次”组中占比较高，χ^2 值为 5.91，p 值 0.015，组间差异一目了然，长时间使用手机对视力和身体协调性影响显著，间接增加意外伤害发生的风险。

体育活动参与度和睡眠质量与意外伤害的发生存在强相关性，在“1~3 次”组中，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占比更高，χ^2 值达到 9.67，p 值为 0.008，差异显著。体育锻炼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学生的反应速度与平衡能力也相应提高，面对突发危险时的反应更迅速准确，意外伤害发生率降低。同时，在“1~3 次”组中，睡眠质量好的学生占比更高，χ^2 值为 5.02，p 值为 0.045，存在差异。良好的睡眠保障身体健康与大脑功能，充足的休息使学生白天头脑清醒，精神状态更佳，注意力与判断力提高，因疲劳或精神恍惚而导致的意外事故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是可防可控的，且防胜于治。通过针对性总结导致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而加强对儿童遭遇意外伤害的预防，促使政府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推动预防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率、致残率、死亡率。未来还应加强安全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促进安全设施的建设维护，从而为小学生营造安全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降低意外伤害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 YIN X, LI D, ZHU K, et al. Comparison of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20, 30(12): 529−536.

[2] TANIA A, FARAHNAZ S, DAVOUDK−Z. Using modified Delphi method to propose and validate components of child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Iran[J]. Chinese Journal of Traumatology, 2020, 23(05): 274−279.

[3] 胡月，牛贺，鲍筝 . 2017—2023 年北京市通州区户籍婴儿死亡变化趋势及死因分析 [J]. 上海预防医学，2024, 36(12): 1168−1173.

[4] 徐灵均，迟克强，袁玲凤，等 . 南昌地区单中心 2013 年—2019 年儿童意外伤害特点分析 [J]. 中国病案，2024, 25(04): 68−71.

[5] 罗振，杨圆圆，霞依丹·阿不都色米，等 . 乌鲁木齐市 0~6 岁儿童意外伤害的风险因素分析 [J]. 医学与社会，2024, 37(03): 85−91.

[6] 陆国平，任晓旭，宋国维 . 我国儿童急救体系建设现状与发展思考 [J]. 中国小儿急救医学，2012(01): 23−27.

（作者：刘宗浩、吴瑶、唐飞、文清桦，新疆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学生；通信作者季玲，新疆第二医学院护理学院教科办副主任、讲师）

元宇宙场景赋能：赣州市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社工介入新模式探索

刘祥琳

摘要：针对赣州市留守儿童因父母务工导致的亲子沟通受阻、情感疏离问题，结合元宇宙技术兴起的契机，探索元宇宙场景与社工专业方法的融合路径。通过调研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现状，设计适配的元宇宙沉浸式互动场景，制定个性化社工介入策略，构建并评估亲子关系虚实融合重构模式。本研究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既拓展了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问题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元宇宙场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又为赣州市及其他地区改善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提供可行方案，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与家庭和谐。

关键词：元宇宙场景；社工介入；留守儿童；亲子关系；虚实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1. 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现状

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留守儿童数量庞大。赣州市是劳务输出大市，留守儿童问题突出[1]。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和孩子聚少离多，沟通受阻，情感疏离严重。相关调查显示，超 70% 的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存在困难，难以建立深度情感联系，对其身心健康与成长极为不利。

2. 元宇宙技术的兴起

近年来，元宇宙概念大热，它融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虚实相融的空间，在教育、娱乐等领域，元宇宙已初步展现其优势，虚拟课堂让学习更生动，虚拟演唱会带来独特体验。其沉浸式、互动性强的特点，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改善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带来新契机。

（二）关键问题

元宇宙场景与社工专业方法如何有效结合，探索适用于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虚实融合重构路径，提升亲子沟通质量，修复情感纽带，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

（三）研究价值

理论上，拓展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丰富元宇宙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在实践中，为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切实可行的干预策略，助力亲子关系改善，促进家庭和谐；为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参考，推动社会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与支持[3]。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留守儿童亲子关系方面已开展较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乔东平副教授指出，国内儿童保护领域存在专业人员短缺、专业机构不足问题，传统社工介入模式在实操中也存在局限[4]。但相关创新探索已有突破，如上海开放大学 2024 年推出国内首个终身教育领域“元宇宙 +AI 应用场景”，其养老专业元宇宙教学场景，能让学员借助虚拟技术在高仿真环境完成失智老人照护任务，印证元宇宙可营造沉浸式互动体验。亲子关系改善方面，教育专家提出元宇宙为家庭教育提供新契机，可增强亲子情感交流。但国内专门将元宇宙用于留守儿童亲子关系重构的研究较少，多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缺乏深度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儿童保护及支持流动家庭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例如，国际移民组织曾与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政府合作，针对因海外务工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制定预防、支援、辅助、促进四个递进模式的应对措施，建立“移民资源中心”、确认监护人资格、建设“儿童之家”等[5]。元宇宙应用领域，学者 Jane McGonigal 等的研究表明，设计良好的虚拟场景能极大提升参与者的投入度与情感体验；实践中已有“Family Metaverse”等亲子互动元宇宙项目，提供虚拟聚会、共同冒险场景，但较少针对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进行设计，也未与社工专业方法深度融合。整体而言，国外元宇宙技术应用起步较早，但其结合留守儿童问题与社工介入的研究存在空白，亟待深入探索。

三、研究内容

（一）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现状调研

1. 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法

设计针对赣州市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监护人的问卷，内容涵盖亲子沟通频率、沟通方式、沟通话题、情感亲密度、亲子冲突情况等核心维度。通过分层抽样在赣州市不同县区选取一定数量的学校、社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广泛收集数据。选取部分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人、教师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围绕亲子关系的日常状态、面临的问题、期望的改善方向等，挖掘深层次的原因和需求，观察留守儿童在学校、社区活动中的行为表现、情绪状态等，了解亲子关系对其实际生活的影响。

2. 数据分析揭示问题本质

运用 SPSS 等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均值、频率、相关性，梳理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整体状况和主要问题类型，针对访谈和观察所得定性资料，用主题分析法提炼关键主题和观点，如亲子沟通障碍的具体表现、情感疏离的成因等。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把握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二）元宇宙场景设计适配亲子关系改善

1. 需求导向的场景规划

前期调研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问题及需求，明确元宇宙场景设计方向。亲子沟通不畅，可设专门虚拟沟通空间，配多样互动方式。在模拟家庭聚会场景里，亲子能共同游戏、聊天，增强沟通的趣味性与情感交流。

2. 技术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

联合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等技术团队，搭建高度沉浸式元宇宙场景，VR 技术让亲子双方似处同一虚拟空间，实现面对面互动。AR 技术融合虚拟元素与现实场景，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场景里可叠加父母虚拟形象，强化亲子陪伴感，AI 技术依据亲子兴趣偏好，智能推荐互动活动和话题，提升互动效果。

3. 多维度场景内容搭建

创建多种元宇宙场景，学习场景里，亲子能在虚拟课堂共学知识、完成作业，在娱乐场景如虚拟游乐场、电影院等，亲子共度欢乐时光。情感交流场景设温馨家庭角落，方便亲子倾诉心声、分享生活点滴，场景角色形象、环境布置充分考虑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喜好和文化背景，强化代入感。

（三）社工介入策略制定与实施

1. 个性化服务方案设计

社工评估每个留守儿童家庭，结合元宇宙场景特点，制定个性化介入方案，方案含明确的服务目标，在一定时间内提升亲子沟通频率和质量、增强亲子情感亲密度等，还有具体服务计划，每周安排特定元宇宙互动活动、定期线下家访和辅导等。

2. 元宇宙场景中的社工引导

元宇宙场景互动中，社工发挥引导作用，亲子参与虚拟游戏，社工适时引导双方有效沟通协作，传授沟通技巧和情感表达方法，亲子间出现矛盾或冲突，社工及时介入调解，运用专业冲突解决策略，帮助双方理解彼此立场，化解矛盾。

3. 线上线下结合的支持体系

线上元宇宙场景服务之外，社工可开展线下服务，定期组织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参加亲子关系主题讲座、工作坊，提升监护人亲职能力。对留守儿童进行个别心理辅导，缓解因亲子关系问题产生的心理压力，加强与学校、社区合作，整合各方资源，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

（四）亲子关系虚实融合重构模式构建与评估

1. 模式构建与实践应用

整合元宇宙场景设计与社工介入策略，构建起虚实融合的亲子关系重构模式，这一模式将元宇宙场景作为线上互动平台，社工在其中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线下的家庭、学校、社区则形成协同配合的力量。选取部分留守儿童家庭作为实践对象，具体实施该模式时，仔细记录实践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和反馈信息，为后续完善积累素材。

2. 多维度效果评估体系建立

从亲子间互动频率变化体现的关系改善程度、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反映的心理健康状况、家庭日常事务协作效率展现的功能提升等维度，搭建完整评估体系，采用亲子关系量表、儿童心理健康量表这类工具，每阶段对实践对象开展量表测量，精准获取可对比的量化数据。同步收集亲子双方日常反馈形成的自我报告、社工跟踪过程记录的观察笔记、学校与社区提供的实际表现情况，汇总成系统的定性评价信息，把实践开展前后的各类数据与信息逐一比对分析，全面评估模式实施产生的实际效果。

3. 模式优化与推广建议

依据评估结果，剖析模式现存问题与不足，元宇宙场景运行时技术稳定性不足，偶有延迟或中断；在社工介入环节，面对突发状况响应不够及时，这些都需要针对性制定优化措施。梳理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探究该模式在赣州市范围内铺开的可能性，以及向其他地区推广的具体路径，为破解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难题提供一套可直接借鉴、可复制应用的完整方案。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一）学术思想创新

1. 跨领域融合的前沿理念

本研究突破传统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研究边界，系统地将元宇宙技术概念深度融入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研究。过往研究多聚焦传统社会服务模式与亲子关系理

论，社工介入以线下形式为主，难以破解亲子时空沟通障碍。本研究立足前沿科技视角，提出构建虚实融合空间作为解决方案，打破时空束缚，创造全新亲子互动形式，改善亲子关系，既拓展现有学术思想体系，也为跨学科研究树立范例，有望催生更多交叉领域成果。

2. 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重塑

以往亲子关系改善研究多从父母、家庭结构等外部因素切入，对留守儿童个体内心需求挖掘不足。本研究借助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深入解析留守儿童在元宇宙场景中的心理感受、行为反应及成长需求，通过分析其在虚拟亲子互动中的情感表达与参与积极性，把握其对亲子关系改善的期望，进而优化元宇宙场景设计与社工介入策略，使学术研究重心落到儿童主体上，为儿童发展相关研究提供贴合实际、以儿童为本的思想指引。

（二）学术观点创新

1. 元宇宙重塑亲子关系纽带观点

本研究提出，元宇宙能够超越单纯通信工具的角色，可重塑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传统认知里亲子关系多靠现实陪伴互动，而此观点指出，元宇宙凭借沉浸式、强互动性，能打造相似甚至更优的亲子互动体验。亲子可在其中参与虚拟家庭聚会、探险游戏，借语音和动作模拟实时互动，弥补地理距离导致的情感空缺，强化情感联结，还拓展了亲子关系研究内涵，打破其构建方式的固有认知。

2. 社工角色转型与多元协同观点

本研究提出元宇宙场景下社工角色转型及多元协同新主张。传统社工多为协调者、引导者，而元宇宙中需兼具社工专业知识与数字素养，成为“复合型服务者”，既要引导亲子用元宇宙互动、解技术难题，还需联合技术开发者、学校、社区搭建协同服务网络，优化场景功能、融合课后辅导、开展线下活动。此观点为社工实践指路，丰富了社工介入社会问题的理论。

（三）研究方法创新

1. 多技术融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以传统问卷调查、访谈为基础，创新性地融入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情感识别技术。在元宇宙场景嵌入数据采集工具，收集亲子互动时长等行为数据，借助大数据挖掘问题规律；同时利用 AI 情感识别技术，通过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判断亲子情感状态。这种研究方法能提供客观精准的数据支持，在以往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研究中少见，为研究方法创新开拓了新路径。

2. 行动研究与迭代优化模式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法构建迭代优化模式，在实践中持续调整元宇宙场景设计与社工介入策略。每轮实践结束后，以收集的数据和反馈为依据，分析元宇宙场景流畅度、互动环节趣味性、社工引导有效性等问题，针对性优化改进后进入下一轮实践。此模式边实践、边研究、边优化，区别于传统研究“一次性”执行方案的做法，契合课题探索新路径的需求，让研究成果更具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复杂社会问题解决提供创新范例。

五、研究计划

（一）准备阶段（第 1~2 个月）

成立由社会学、社会工作、信息技术等领域专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启动文献综述工作，系统梳理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积累的研究成果，与赣州市民政部门、当地学校、社区建立合作机制，共同确定调研样本的具体范围，着手设计调查问卷内容、访谈提纲要点，同时推进元宇宙场景开发所需技术工具的选型与筹备，让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有序铺开，为研究顺利推进做好铺垫。

（二）实地调研阶段（第 3~5 个月）

1. 多主体调研

在赣州市选取 5~8 个县区，每个县区选取 3~5 所学校和 2~3 个社区，面向 500 名留守儿童、300 名父母及监护人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并录入分析。对 50 名留守儿童、30 名父母、20 名教师、20 名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记录一手资料。

2. 观察与体验

观察记录留守儿童在校内校外活动表现，参与社区留守儿童关怀活动，体验现有亲子互动形式。

（三）元宇宙场景开发与社工介入策略制定阶段（第 6~8 个月）

基于调研结果，联合技术团队开发适配亲子互动的元宇宙场景，重点设计 3 种以上核心互动模式。安排社工开展元宇宙应用培训，结合专业方法制定介入策略，邀请专家论证方案进行可行性优化。

（四）实践与评估阶段（第 9~11 个月）

选取 100 个留守儿童家庭作为实验组，采用元宇宙场景与社工介入方案；另选 100 个家庭作为对照组，采取传统干预方式，定时收集数据，比对两组亲子关系改善状况，借量表评估、访谈反馈检验效果。

（五）总结阶段（第 12 个月）

整合实践数据与案例资料，总结虚实融合的亲子关系重构路径，撰写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召开成果发布会，向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推广可行模式，为同类地区解决留守儿童亲子关系问题提供参考。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研赣州市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现状，设计适用于元宇宙的场景方案，制定社工介入策略，构建并评估了虚实融合重构模式。该模式有望缓解亲子沟通不畅与情感疏离问题，同时拓宽了社工介入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元宇宙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后续研究可进一步优化该模式，推动其在更广泛地区实施，从而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家庭和谐提供持续支持。

（下转 35 页）

儿童主任政策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

侯飞飞

摘要：儿童主任作为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的政策实施者，关系服务递送的质量和实行效果，关乎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然而，在儿童主任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角色与能力困境、主动与联动不足以及理念与认同缺失等，直接影响到儿童主任政策整体效能发挥。基于儿童主任政策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有身份、有伙伴、有工具、有氛围的“四有”儿童主任政策优化路径，即建构国家层面多层次立体化的儿童主任职业发展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支持网络，设计开发未成年人服务操作指引和综合评估体系，加大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环境的营造力度。

关键词：儿童主任政策；发展困境；优化路径

一、引言

作为国家为包含困境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及家庭提供政策和关爱服务的整体制度框架安排，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不仅能预防也能对儿童面临的风险予以响应。整个制度体系包括明确的牵头协调机构、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响应机制、多元且专业的人才队伍、相对充裕的预算资金和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等组成要素。儿童主任政策作为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制度安排，从设置之初就承担着打通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任，该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发展进程[1]。

二、儿童主任政策发展困境

（一）角色与能力困境削弱儿童主任的履职成效

儿童主任一般由政府部门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直接指定而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任命程序，导致儿童主任身份缺乏统一性。同时，儿童主任除了要履行儿童主任的岗位职责，还要承担两保、养老、残联、妇联、计生等其他村居事务，“兼职”和“多重”身份[2]，再加上临时性、突发性的工作任务叠加，往往分身乏术甚至生活时间也被挤占，出现了强烈的职业倦怠和情感衰竭状况。此外，缺乏系统有效且频率稳定的专业培训制约了儿童主任专业能力的提升，培训通常以“以会代训”“集中上大课”的形式展开，培训内容没有很好回应儿童主任的需求，局限于政策宣讲、岗位职责等基础内容，使得儿童主任普遍面临能力困境。总之，儿童主任的角色与能力困境影响到了儿童主任履职成效，削弱了儿童主任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主动与联动不足影响儿童主任的履职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实际情况是除民政、公检法、妇联、团委等单位外，大部门成员单位并不清楚本单位职责分工，多以被动接受任务为主，自主开展

（上接 34 页）

参考文献

[1] 谷宁，盛青云 . 优势视角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分析 [J]. 乡村论丛，2024(05): 107−114.

[2] 申童帅 . 社交媒体使用与亲子依恋关系研究 [D]. 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24.

[3] 汪小兰 . 农村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体验研究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4.

[4] 崔宝琛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 亲子关系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基于两省两校农村儿童调查数据的研究 [J]. 人口与发展，2023, 29(04): 2−19.

[5]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 关爱江西农村留守儿童公益活动举行赣州站启动仪式 [J]. 前进论坛，2023(10): 36.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儿童主任履行发现报告职责后，由于处理程序不顺畅以及有关部门的“不知如何作为”“保守作为”或“消极作为”，儿童受侵害案（事）件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部分儿童主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制度安排持消极态度。同时，各成员单位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缺乏积极有效的横向联动，儿童主任极易处于工作重复开展、信息重复收集、资源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低下等高内耗状态。参与主体主动性不足以及协作程度低，“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影响了儿童主任的工作信心，阻碍了儿童主任政策整体效应的发挥。

（三）理念与认同缺失增加儿童主任的履职难度

作为国家层面设置的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安排，历经 15 年的发展，儿童主任政策措施趋于完善，队伍日益壮大，儿童主任逐渐成为儿童的守护人、家庭的监督员、政策的递送者。但在儿童主任政策的落地过程中，不同程度仍存在政府官员、社会大众甚至部分儿童主任本身，对政策设置的背景意义以及职责任务等了解不深入、不全面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儿童主任功能发挥的欠缺。此外，积极的儿童保护理念认为儿童不是父母和家庭的私人财产，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生命个体，保护儿童不再只是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在现实层面，依然有父母认为儿童是父母的私有物，各种“生而不养”、怠于履行监护责任、暴力管教儿童致伤致残的案例屡见不鲜。社会公众对于儿童保护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加大了儿童主任工作的难度，弱化了儿童主任政策的社会影响力。

三、儿童主任政策优化路径建议

（一）有身份——建构国家层面多层次立体化的儿童主任职业发展体系

在儿童主任政策执行过程中，角色的多重性、工作的兼职化以及职责的不明确导致儿童主任身份的模糊不清是首要问题。为此，要建立儿童主任职业发展体系，明确儿童主任的身份角色、综合培训以及保障激励是基本思路[3]。一是建立专兼职儿童主任队伍，夯实队伍基础。根据城市与农村社区的基本情形、资源情况以及辖区儿童的数量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儿童主任队伍，将儿童主任纳入专职社区工作的招聘中，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稳定性。考虑到儿童主任招聘成本过高，也可在乡街层面设置专职的儿童督导员，村居则建立兼职儿童主任队伍，但尽量固定人员，不随意指派人、更换人员。二是建立儿童主任培训体系，提升专业能力。从市级层面构建儿童主任综合培训体系[4]，涵盖岗前培训、初级以及中高级等培训课程，逐渐增加专业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建立覆盖全员的儿童主任培训档案，并要求地市级民政部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示范培训，县级民政部门要确保实现每年对儿童主任培训的全覆盖。三是建立儿童主任保障体系，提高职业认同。政府应将儿童主任的工作经费和岗位补贴纳入每年的财政支出预算范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地区按比例统筹资金配比，切实保障儿童主任工作经费和岗位补贴落到实处。只有完善补贴制度，才能从整体上推动完善包括选拔、任免、支持、评价及激励在内的儿童主任职业发展体系建设。

（二）有伙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支持网络

仅凭儿童主任一己之力很难架起儿童及家庭与政策之间的桥梁。为此，有必要联动更多主体，寻求合作伙伴，构建以儿童主任为核心，儿童照料人、邻居、网格员、爱心志愿者、专业社工、高校教师及社会力量支持的未成年人保护支持网络[5]。一是发展儿童保护的“盯梢人”。儿童主任在儿童信息摸排和定期走访的过程中，同步掌握儿童照料人和邻居的基本信息，建立常态化联系，使之成为安排在儿童及家庭的“哨兵”。在儿童照料人和邻居的帮助下，线下实地走访和线上互动联系，全面掌握儿童及家庭的实时动态，发现风险与隐患第一时间报告，形成村（居）儿童保护的第一道屏障。二是培养儿童保护的“好帮手”。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势，网格员同时担任未成年人保护观察员，动员所在村（居）内老党员、老教师等或者假期返乡的大学生成为志愿者，在履行发现报告职责的同时，协助儿童主任开展信息摸排、定期走访、政策宣讲、关爱帮扶、活动组织、场所管理等日常工作，减轻儿童主任的工作负担。同时，不能忽视儿童作为志愿者在带动其他儿童及家庭参与上的独特优势。三是发展儿童保护的“赋能者”。儿童主任要充分利用与专业社工共同工作的机会，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练习和内化专业理念、方法与技巧。比如，儿童主任学习并掌握“监护评估—需求分析—匹配服务”这一标准化困境儿童处置流程，妥善解决受侵害儿童个案。同时，发挥高校社工教师教育性、支持性督导功能，帮助儿童主任整合理论与实践，解决困惑与问题，实现专业成长与发展，同时学会自我关怀，积极应对情感消耗。四是寻求儿童保护的“合作者”。当儿童主任面临服务内容单一、场地不足、资金短缺的困难时，社会力量可以有效“补位”。为此，要推动成立由不同专业优势的社会组织主导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联盟，提供能力建设、心理干预、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等个性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服务。儿童主任要善于挖掘、整合村（居）资源，将辖区内的各类资源整理成资源清单或绘制成社区资源地图，为后续链接与使用资源奠定基础。

（三）有工具——设计开发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操作指引和综合评估体系

服务标准化、智能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儿童主任工作效率，关系儿童及家庭对于服务的信任和认可。因此，要借助科学完善的服务操作和评估体系，提高

儿童主任工作质效，动态监督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运转状况，切实使未成年人保护落到实处。一是开发标准化的工作手册。从儿童主任工作实际需求出发，聚焦儿童主任看得懂、能理解、易实践的关键问题，以儿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为核心学科，邀请儿童主任参与开发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工作手册，内容上涵盖政策汇编、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实务技巧、常见疑难问题解答与应对、常用工作套表等内容。同时将工作手册“电子化”并定期更新，方便儿童主任运用手机端查阅相关内容，让工作手册真正成为儿童主任的“口袋书”“随手本”“明白纸”。二是开发智能化的工作平台。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施“数字未保”战略，开发智能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平台，充分整合民政、政法、公安、检察、教育、残联等部门信息，建立综合性的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平台，实现未成年人数据共享，推动儿童主任的数字化支持。同时，探索叠加未成年人线上“一键式”报告、帮教、家庭教育指导等“一站式”功能，快速提高未成年人保护精准化水平。此外，还可嵌入手环定位功能，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云管理”。三是设置科学化的评估指标。坚持以分级分类、科学设置为导向，通过实地调研、听取基层经验、开展专家论证等方式制定客观、可量化的未成年人保护评价指标[6]。在指标设置上将“完成”“良好”“清晰”等笼统的定性指标转化设置为具体的可测量的量化指标。同时，增加“期中考”环节，即增加过程评估，避免“期末考”的单一性，打破结果评估的过高权重，强化过程评估的导向性，充分运用评估结果指导儿童主任日常工作开展，及时查缺补漏，巩固提升。

（四）有氛围——加大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环境的营造力度

儿童主任政策的深入稳定推行，除了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系统合理，儿童主任职业体系的全面完善之外，有目的、有策略地培养社会公众未成年人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公众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友好环境也是关键因素。一是从“需求”入手宣传。时间成本的高昂使课堂讲授类的宣传形式在社区层面较难高效组织。为此，可依托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未成年人保护站、村（居）儿童之家等平台首先从父母在监护照料方面的实际需求入手，进行宣传策划。比如，从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培养、正向教养训练以及厌学问题解决等实用的教育理念入手，逐渐过渡到保护儿童不受侵害、忽视以及儿童如何自我保护等意识理念的知识宣传。二是从“类别”推广普及。积极的儿童福利制度是面向全体儿童的，不仅是生活救助，而是发展权利的全面保护。对社会大众宣传教育的内容也应针对全体儿童按类别进行分类宣传。让社会大众不仅了解国家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福利政策及服务项目，也了解针对全体儿童的普惠性政策保护以及儿童主任作为基层儿童保护的政策递送者、资源链接者在不同儿童群体中的不同服务重点。三是从“多元”介入倡导。社会大众对儿童主任政策以及其他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的了解、接受以及应用需要一个过程。只有不断地输入与强化，才能形成社会大众现代的儿童观。为此，可通过政府预算资金、福彩资金支持以及公益创投项目等形式联合不同未成年人保护成员单位开展品牌联创共建项目，多主体、多形式、多领域宣传儿童福利与保护理念，形成儿童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环境，营造全社会为共同责任人的保护共识。

四、结语

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顶层机制建设、协调运行程序、组织资金保障再到具体服务落地，各个要素环环相扣，层层对应。选取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宏大系统中儿童主任政策这一微观系统，基于微观系统与宏大系统之间的互动，透视儿童主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成效与困境，并结合工作探索与实践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这不仅有利于儿童主任政策的制度完善，更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伍宗云，纪拓．儿童主任职业现状与能力提升研究——以河南巩义、北京房山、新疆伊宁、内蒙古赤峰四地儿童主任为例 [J]. 社会福利（理论版），2020(06): 53−57.

[2] 黄君．身份、能力与保障：儿童主任政策运行的困境和出路 [J]. 社会工作，2020(04): 77−86.

[3] 闫晓英，张柳．我国儿童主任制度升级：机构需求与发展思路 [J]. 社会治理，2022(06): 26.

[4] 叶建琼，陈融．“儿童主任”对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作用研究 [J]. 绥化学院学报，2022(10): 140−141.

[5] 杨慧，李紫聪．“儿童主任+”：理念、机制与运行效果研究 [J]. 青年研究，2022(04): 13−25.

[6] 赵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以及儿童保护三级工作网络建设 [J]. 中国社会工作，2021(06): 20−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山西省民政重点理论课题“儿童主任政策视角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研究—以 S 省 T 市为例”（MZKT2023009）。

（作者单位：太原市儿童福利院）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研究
——基于文山州 L 村的调研

袁宗泽 孙 毅

摘要：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社会工作作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的重要一环，能够在此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基于对文山州 L 村的田野调查，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针对该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出发，发掘儿童在隔代教育过程中面临的代际沟通困难、家庭支持薄弱、心理辅导缺位、社区支持欠缺等问题，对应提出以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介入、社区资源链接及社会宣传为代表的社工实务路径，对探析社会工作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具有参考作用。

关键词：社会工作；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青年通过自身决策考量选择进城务工，在此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逐步走入公众视野，引发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2]，体现出国家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当下，部分儿童由祖辈进行看护，形成了以祖辈教养孙辈为典型的隔代教育模式，且隔代教育已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流教育模式[3]。在该模式背后，农村留守儿童及看护人面临着来自微观、中观、宏观环境的挑战，其中复杂的问题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兼具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双重属性，而社会工作作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的重要一环，能够在增进留守儿童的福祉层面发挥专业优势。

本研究基于对云南省文山州 L 村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工作实务，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该村留守儿童在隔代教育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成因，探索社会工作介入路径，进而在理论层面对社工介入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进行探析，在实践层面形成可供借鉴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以期对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一、L 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

（一）文山州 L 村村庄概况

L 村为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的行政村，辖 18 个自然村，含 22 个村小组（2023 年），村内具有社会工作站点。该村地处山区，距离边境较近，居住着汉、傣、苗、彝等民族的群众，属于边疆民族农村地区。

该村海拔较高，早年交通不便，产业结构虽以第一产业为主，但山区耕田的开垦难度大，加之其远离地方经济中心，因此经济较为落后，并催生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其去向主要包括浙江、上海、广东以及云南昆明等地区，与留守子女距离较远。该村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父母成为空巢老人，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因此该村的隔代教育问题具有一定典型性，急需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与支持。

（二）文山州 L 村留守儿童接受教育基本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该村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中，小学生 260 人，中学生 118 人。笔者在该村运用问卷法、半结构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进行调研，其中运用问卷法发放问卷 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6 份（样本年龄分布情况见表 1），以达到相对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的目的。

同时，通过对所收集数据进行信度分析，运用 SPSS 软件计算出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3（见表 2），说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可以接受，结合问卷题项涵盖多个方面的测量，有助于全面评估研究内容。

表 1 调查样本年龄分布情况统计

项目名称	匹配项	频数	百分比（%）	积累百分比（%）
年龄	6	1	1.3157	1.3157
	7	1	1.3157	2.6314
	8	5	6.5789	9.2103
	9	4	5.2631	14.4734
	10	10	13.1578	27.6312
	11	23	30.2631	57.8943
	12	21	27.6315	85.5258
	13	8	10.5263	96.0521
	14	3	3.9479	100
合计		76	100	100

表 2 标准化 Cronbach's α 分析

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	项数	样本数
0.743	41	76

二、文山州 L 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具体困境及成因

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来自单一的层面，而是由多个维度引发，不同维度的困境相互关联（见图 1）。正因如此，本研究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注人类生存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并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以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扎斯特罗所提出的个体成长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为切入口[4]，围绕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困境成因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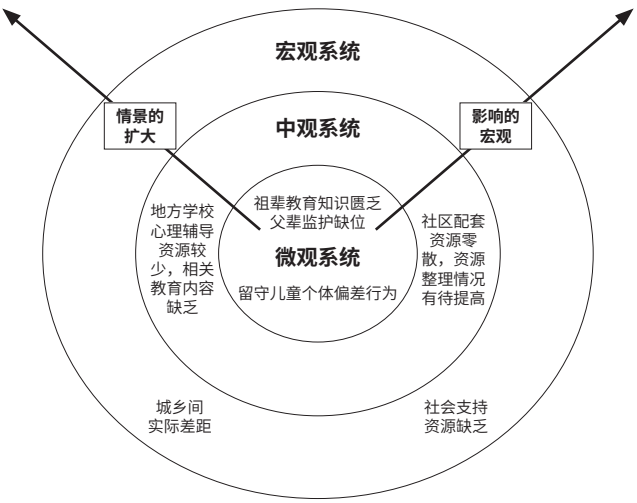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维度示意图

（一）微观层面

1. 祖辈教育知识匮乏，代际有效沟通较少

在隔代教育过程中，祖辈作为孙辈主要的教育者，其在教育过程中与孙辈的互动情况直接关系到隔代教育的效果。根据调查，34.21% 的儿童对跟随祖辈生活的意愿表现出“一般”或“比较不愿意”的态度，23.68% 的儿童“从不”或“很少”与祖辈进行沟通，其原因在于祖辈看护人往往持有较为传统的教育观念，对儿童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认识不足，对孙辈系统化的教育相对较少。

此外，在部分家庭隔代教育的过程中，“重养轻教”现象较为明显，祖辈对孙辈通常表现出较强的关心，可以及时满足部分孙辈成长过程中的需求，但对于孙辈学习层面、心理健康层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对孙辈的教育也常表现为用语言否定其行为。而在代际沟通的过程中，既存在祖辈过分宠溺孙辈的现象，也存在祖辈以批评孙辈代替正常沟通的情况，导致代际间有效沟通较少，隔代教育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 父母监护缺位，家庭系统运作不良

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面临亲子分离问题。部分学者将亲子分离划分为“地理空间的分离、经济层面的分离、心理情感层面的分离、社会关系层面的分离”四个维度[5]，在地理空间分离的基础上，若叠加心理层面或者经济、社会关系等层面的分离，通常会给儿童的成长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 L 村的留守儿童而言，由父母外出务工所产生的地理空间的分离已然存在，其他维度的分离也在该村的一些家庭当中实际存在。不同维度的分离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儿童获得父母支持的概率，加重了祖辈的教育责任，也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缺位的情况下产生分离焦虑现象，60.52% 的儿童“比较希望”或“十分希望”与父母共同生活。

3. 部分儿童出现偏差行为，影响自身健康成长

归因于环境系统的影响与留守儿童的个体认知情况，22.37% 的调查对象有过“离家出走”“打架”等经历，在受教育过程中易与祖辈产生矛盾，留守儿童更愿意将空闲时间花费在网络上；同时，由于一些留守儿童对于与祖辈沟通存在抗拒心理，因此当此类儿童面临困境时，内心情绪无法得到及时缓解，出现偏差行为，过早表现出叛逆倾向。诸如此类的行为使留守儿童在学业层面、心理层面出现诸多问题，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二）中观层面

1. 地方学校心理辅导资源较少，家校教育配合程度有待提升

学校教育对留守儿童个体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校内，通过与朋辈群体进行互动，儿童可构建朋辈群体的支持网络。因此，通过学校教育的积极引导，能够有效解决隔代教育困境，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此外，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来看，学校教育应与家庭教育相辅相成，进而做好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工作，帮助他们消除代际隔阂，与家庭教育共同推动儿童健康成长。

L 村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主要在本村小学就读，在小学高年级或初中阶段多进入乡镇学校就读。由于

当地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留守儿童在心理层面得到的支持相对不充分，其心理层面的封闭倾向无法有效缓解，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减轻家庭教育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2. 村庄有关资源相对零散，隔代教育配套支持较少

农村社区能够为家庭的隔代教育提供助力，对村中的宣传资源、管理资源、活动资源、志愿服务等资源加以利用均可对隔代教育产生积极影响。然而L村部分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若通过社区积极引导与正向宣传、加强社区资源监管、社区面向祖辈和孙辈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不仅可以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更有利于对隔代教育过程中的祖孙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L村文化资源丰富，存在以“滇桐树”“花米饭节”为代表的传说与节日，因此，结合地方文化资源，以“在地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融入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案，并提升孙辈对于有关传说、节日的了解程度，建立代际间的文化纽带，为代际良好沟通搭建平台。

（三）宏观层面

1. 城乡教育理念及教育资源存在差距

城乡之间在教育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等方面尚存在差距。例如，在教育的人力资源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对人才的吸引程度低于城市地区，因此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对隔代教育造成影响；在教育的物力资源方面，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通常落后于城市地区，并且农村地区的儿童受限于其多方面的条件，导致接受的新事物亦少于城市地区的儿童。

2. 社会支持力度尚存提升空间

隔代教育使祖辈需要更多承担对孙辈的教育压力，因此通过社会支持缓解祖辈压力尤为关键。在L村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针对儿童的普惠性服务已逐渐完善，而针对留守儿童祖辈教育观念层面的服务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表现为看护人在隔代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关于教育知识、教育理念的培训较少。此外，部分家庭忽视潜在的社会支持资源，并由此造成隔代教育过程中看护人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看护模式难以得到及时调整、隔代教育效果有限等问题。

三、社工介入文山州L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L村所面临的隔代教育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若从根本层面解决困境，应采取多元维度的介入策略，最大程度地发挥社工介入的功能[6]，在改善留守儿童所处环境的同时协助其适应环境。

（一）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针对教育困境开展助人服务活动

1. 提供个案服务，增进代际沟通

在个案层面，留守儿童获得父辈的支持较少，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工作直接介入其家庭成员，重新在祖辈与孙辈间建立互动纽带，提升父母在隔代教育过程中对留守儿童的支持程度，加强留守儿童获得的家庭支持，为留守儿童及时表达自身需求搭建平台。

2. 开展小组工作，构建社会支持系统

儿童小组工作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小组工作，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应根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活动，并增加活动的趣味性。此外，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小组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保持文化敏感性，积极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促进小组成员挖掘自身潜能、培养积极的自我肯定意识，促进小组成员社会化，构建起社会支持系统。

（二）链接多方资源，提供配套支持

1. 链接学校资源，营造良好成长环境

社会工作者可通过与学校合作，加强学校对留守儿童心理层面的关注，链接学校资源，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助推个体搭建朋辈支持网络，及时发现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利用学校场地开展心理辅导，为留守儿童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

2. 链接社区资源，构建社区支持体系

利用社区的宣传资源、活动资源、管理资源等多方面资源，提升社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程度，强化对留守儿童生命健康的保护。同时，通过开展服务，减少代际隔阂，增强代际间的有效互动，增强隔代教育获得的社区支持，进而搭建社区配套支持体系。

（三）进行社会宣传，提升资源支持力度

社会工作者可通过收集整理留守儿童及其看护人在教育过程中的需求，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反馈并提出建议，推动有关部门为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提供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改善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

此外，在自媒体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者可尝试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积极的宣传，突破空间限制，提升全社会对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的关注度，以加强社会支持，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和谐。通过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分析可知，L村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在微观层面面临祖辈教育效果不良、父辈监护缺位的问题，在中观层面面临获得的学校心理辅导资源与村庄隔代教育配套支持较少的问题，在宏观层面受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与社会支持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工作方法进行介入，增进代际沟通、搭建朋辈支持网络，为留守儿童增权赋能，通过链接学校与社区资源为留守儿童提供中观层面的支持，通过社会宣传促进隔代教育获得更多社会支持。

应注意，不同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完全相同，不同个案间的具体情况（下转41页）

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个案干预研究

王　菁

摘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现实条件制约，其子女多留守农村，形成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本研究以农村留守儿童Y为个案对象，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索改善其攻击性行为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运用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系统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案主的攻击性行为，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务工收入有限及城市就学成本较高等现实因素，大量农民工子女被留在家乡，形成留守儿童群体。当前，学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围绕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展开，关注其群体特征、学业表现及心理行为问题。其中，关于攻击性行为的探讨已从早期的“问题化”标签，逐渐转向多维的“疗愈”与系统干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不仅表现为躯体冲撞，也包括嘲笑、批评、辱骂等言语攻击，这类行为不仅损害他人身心健康，也可能为其成年后的犯罪行为埋下伏笔，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较为常见且危害严重的行为问题之一[1]。

社会工作是一门关注人、关怀人、关爱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专业，儿童社会工作专业作为社会工作专业重要的专业领域，不仅秉持着社会工作普遍遵循的价值观，更具备其领域独有的使命，近年来，儿童社会工作者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成长、发展的需要，以专业的价值为指导和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2]，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对儿童开展助人服务活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改善其攻击性行为。本文基于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多、

（上接40页）也不能等同，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差异性，以“个别化”的服务态度进行服务。同时，社工的服务意味着对服务对象的帮助与改变，应避免无效服务的开展，在介入过程中充分评估服务对象的资源与需求，力图将服务的效果达到最大化。由于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单独依靠社会工作者的力量解决隔代教育困境难免难度较大，因此，社工的服务应积极链接多方资源，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隔代教育的困境构建有效服务机制，为增进民生福祉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创造 , 2022, 30(11): 6−29.

[2]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16(06): 42−47.

[3] 刘红升，赵雅欣，李紫薇，等 . 隔代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J].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 2023, 18(04): 385−388.

[4] 师海玲 , 范燕宁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04): 94−97.

[5] 许彩丽 , 张翠娥 . 重新认识分离：基于家庭视角的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反思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04): 167−174.

[6] 袁飞 , 冯跃 .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困境与社工介入路径分析 [J]. 现代教育科学 , 2021(06): 46−50,57.

（作者：袁宗泽，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孙毅，云南农业大学理学院）

攻击性行为问题显著的社会问题背景，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以生态视角理论为研究视角，辅之以个案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介入并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旨在探索改善该群体攻击性行为的有效路径，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新思路。

二、生态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改善的具体应用

（一）案例情况介绍

C 小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T 市 A 县城郊区，是一所半寄宿半走读学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校的学生群体主要来自周边乡镇及外来务工家庭，其中农村户籍学生占多数，且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 80%。2022 年末，笔者作为驻校社会工作者，在 C 小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实习，在实习期间，社工观察到部分留守儿童呈现出一种“抱团取暖”的现象，同时伴随着认知偏差、情绪波动大以及攻击性行为频发等问题。特别是在一次体育活动中，学生 Y 因争抢篮球而与另一名同学发生冲突，随后 Y 将该同学约至学校附近的商店并对其实施暴力。得知此事后，Y 的班主任迅速介入，将 Y 带至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双方互相道歉。然而，Y 狂扇自己耳光，以此试图逃避老师的责难。为了深入了解 Y 的攻击性行为现状，社工借由学校收集学生心理健康资料的机会，向校内部分留守儿童及非留守儿童发放了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 [3]。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攻击总分普遍高于非留守儿童，而案主 Y 的总分高达 106 分，显著高于群体均值。经班主任转介，社工正式接案。

（二）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改善方案

1. 微观系统介入：重构信念与情绪调节能力

从广义上看，自我成长是指个体在发展中抛弃不恰当的“旧我”以及不断追求更具能力、创造力、思维力的“新我”的过程。而狭义的自我成长，更强调个体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不回避、不抛弃“旧我”，而是在优化中发展出“新我”的过程。在本次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狭义的自我成长观点更为社会工作者所关注。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使得社会工作者了解了案主攻击性行为的行为逻辑。在进入案主微观系统时，社会工作者没有选择回避案主的过往经历，而是与案主一同回顾过去的行为，这一过程帮助案主认识到自身问题，并在过程中反思出能够优化的信念 [4]。

在具体干预中，社工向案主介绍提升情绪管理能力的方法，具体包括深呼吸法、转移注意力法以及在模拟情景中巩固情绪训练结果。首先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一同感受了深呼吸法，案主选择舒服的姿态坐好，在活动开始前闭上眼睛，尽量放松身体肌肉，在脑海中想象自己身处辽阔的场景中，这一场景可以是海边、深山或者是草原，最后开始吸气并在 15 秒之内实现一次吐气，这一过程持续 10 分钟左右，在这个过程中社工放了一些舒缓的歌曲更好地帮助案主放松，深呼吸完成后案主感受到了明显的放松。

最后，社工向案主介绍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这一过程主要与模拟场景配合进行。在接下来的情绪训练中社工采用模拟情景帮助案主更深层次地感受自己的情绪，并为案主提供情绪管理的方案 [5]。例如，案主很难模拟在愤怒中克制的事件，当模仿这一情景时案主发现他并未真正进入场景，于是社工以当案主与最亲密的家人产生冲突时为例，帮助案主回忆在与亲人相处中产生矛盾时自己是如何克制愤怒的，在模拟场景过后案主逐渐回忆起愤怒情境中克制的感受。此时社工向案主提出通过倾诉、运动、离开情境或写日记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并向案主赠送笔记本。

2. 中观系统介入：改善家庭教养环境

通过访谈了解到，案主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在外务工，爷爷则担任了案主的直接监护人角色，负责案主日常生活的教育和管教。然而，爷爷倾向于采用溺爱的教养方式，对案主的错误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合理的惩罚措施，这导致案主形成了脾气暴躁、易怒的性格，并习惯性地使用威胁、谩骂、殴打等攻击性行为来实现个人目的。尽管案主与父亲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联系，但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只能为案主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较少参与到案主的管教中。因此，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应着重帮助案主的爷爷和父亲调整其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共同建立起积极的家庭教养环境，以促进案主的健康成长。

在这一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首先向案主的家长展示了积极、健康的教养模式，并针对案主的具体行为设计了一套易于被案主接受的契约管理模式。例如，针对案主犯错时爷爷常采用的试探性教育方式，社会工作者建议调整为采取坚定而明确的教育口吻对案主进行正面引导。同时，针对案主在学校犯错时父亲常选择忽视的问题，社会工作者鼓励案主父亲应主

表 1 家庭契约表

旧家庭规则	新家庭规则
1. 父母不在身边，案主受苦了，因此不管什么要求都要尽量满足。	1. 区分需求的性质，作出正确判断，满足案主的正当要求。
2. 案主与其他人发生争执都是情有可原的，都是对方的错误。	2. 在案主与其他人发生争执后，首先查明争执原因，表明对案主情绪的理解，随后应分开处理案主与争执对象在争执中的不正当举动，既表达对案主的爱护又在争执发生后及时引导案主避免攻击性行为的产生。
3. 对于案主的攻击性行为，家长无力约束。	3. 家长作为案主的监护人，有责任有能力对案主的攻击性行为进行约束。
4. 不常与案主见面，因此对案主的行为举止不十分了解。	4. 教育、增进关系的方式有很多，不局限于见面，即使不常见面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案主近期的举止动态。
5. 满足案主的经济需要，则完成监护任务，将监护任务简单等同于满足物质需求。	5. 经济需要是监护任务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满足案主的经济需要外，监护人还应承担对案主进行正向教育和引导的责任。

动与案主沟通并解决问题。随后，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案主的爷爷与父亲共同填写了契约书表格（见表 1）。在充分征得案主的同意后，案主的爷爷与父亲正式签订了这份契约书，以此作为他们共同致力于改善家庭教养方式、促进案主健康成长的重要承诺。

随后，针对案主以前在校时与其他同学联合殴打别人、旷课、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社工引导案主对“从众”以及“对比”的思考。例如社工做出情景假设，当其他朋友以攻击行为作为自己“社会人士”的象征时，社工时询问案主是否要为了融入他们做出从众的行为，如果朋友提出共同实施攻击性行为的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视为“朋友义气”的象征时，案主应该答应这一要求还是拒绝？如果答应这一要求则会使得自己再次陷入易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困境中，如果拒绝这一要求可能会失去“朋友”。针对社工的情景假设，案主陷入了思考中。之后，社工引导案主绘画“友情树”，案主在画好友情树后，就和社工一起分享了其中对他来说印象深刻的友情故事。随后社工又和案主提出对比场景，在这一场景中的朋友，他们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真诚相待，在朋友做了错误的行为时会直接指出，不会以“义气”胁迫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在社工的引导下，案主在对比中树立了正确的交友观。

3. 宏观系统介入：拓展社会组织支持网络

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宏观环境指的是处于环境最外围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法律体系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社会组织支持是案主宏观支持体系中的一个缺失环节。通过调研，社会工作者发现距离案主 Y 所在村庄最近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 20 公里以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大约需要 40 分钟，车票费用总计 4 元。一周之后，社会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案主 Y，邀请他参加一个旨在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小组活动。然而，案主 Y 对此表达了犹豫，他既担心自己无法被小组其他成员接纳和喜爱，又害怕因不熟悉活动过程而遭到嘲笑。因此，案主 Y 提出了希望社会工作者陪同自己参加活动的请求。在认真考虑后，社会工作者同意了案主的请求，但同时明确说明，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会代替案主发言，而是仅作为缓解案主紧张情绪的存在。社会工作者强调，参与活动需要案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努力从中学习并与大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案主 Y 对此表示了认可和接受。

根据社会工作机构的规划，人际交往小组活动共分为六节。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案主 Y 逐渐从最初的紧张、担忧状态转变为活泼、开放的状态。每当小组活动结束后，他都会兴奋地与社会工作者分享活动中的趣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工作者在案主的表现中明显感受到了他的积极变化。在第四节小组活动开展之前，社会工作者主动向案主 Y 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案主独自参加活动，社会工作者将不再陪同。此时，案主已经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较为熟悉的关系，并对社会工作的服务流程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当社会工作者提出这一建议时，案主只经过短暂的考虑便欣然接受了。至此，针对案主 Y 的全部介入工作也圆满结束。

三、结语

因群施策，是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良方。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秉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学科，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开展之前避免对服务对象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并在服务过程中摒弃刻板印象，以非评判性和非凝视性的态度，带着善意去观察和理解服务群体。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引导案主参与社会活动，在集体活动中获得社会支持，将增强社会支持系统作为弥补家庭支持系统不足的有效途径。转变家庭教养方式、提升家庭亲密度是影响案主攻击性行为的“双翼”。从家庭层面而言，家长应当树立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来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行为，并对这些行为进行及时的肯定与强化，以减少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家长应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不仅要预防攻击性行为的发生，还要对已经出现的攻击性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提高同辈群体的正向影响力是改善案主攻击性行为的关键策略。积极的同辈群体能够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正面的导向作用，通过与同辈的互动，他们可以学习到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何在互动中遵守社会规范，以及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构建多元社会支持网络是改善案主攻击性行为的有效路径。社会支持网络的核心在于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通过这一网络，农村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支持，重塑个人价值观，学习并内化社会规范。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案主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帮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正向的情感表达方式。

综上，农村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改善，需在微观层面重构认知情绪系统，在中观层面优化家庭与同辈环境，在宏观层面拓展社会组织支持，形成多层互促、内外联动的生态系统修复路径。

参考文献

[1] 谭深 .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11(01): 138−150.

[2] 师海玲 , 范燕宁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 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04): 94−97.

[3] 吴燕 , 郭成 , 李良明 . 疫情下留守儿童的攻击性及其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 :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2, 44(08): 20−27.

[4] 范慧玲 .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与行为 (下转 44 页)

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的实践与优化路径研究

周君丽

摘要：本文聚焦于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旨在探讨其实践现状、内在优势与面临挑战，并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及案例比较等方法，重点剖析了该模式在运营可持续性、服务质量标准化及家庭需求契合度方面的核心议题。研究发现，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凭借其地理便捷性、资源整合性与服务灵活性，有效缓解了家庭育儿压力并激活了社区资源。然而，其在实践中亦普遍面临物理空间受限、专业师资短缺、运营标准不一及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据此，本文从强化多主体资源协同、推动数字化精细管理、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构建标准化质量体系及深化家庭社区参与等维度，提出完善该模式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构建普惠、优质、可持续的社区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嵌入式托育；运营模式；资源整合；服务质量；优化路径

一、引言

在双职工家庭托育需求猛增与人口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根据国家卫健委 2023 年的数据，我国城市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19.7%，而双职工家庭对社区托育的需求覆盖率超过 70%。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借助便捷性和灵活性，成为攻克托育难题的关键之路。该模式借助社区空间及资源，为 0~3 岁婴幼儿提供就近服务，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又带动社区资源的重新激活。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依旧存在运营可持续性、服务质量差异等问题。本研究主要探索其在加强婴幼儿照顾质量、满足家庭需求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国际上，社区托育服务发展较早的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如北欧国家依托其高福利社会政策，构建了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强调性别平等与家庭友好的普惠型社区托育体系；日本“保育园 + 社区”的模式是把保育园融入社区，提供日常的照顾及学习活动开展，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增加了家庭的便利性，还可以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效益，但存在对专业人员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的问题 [1]。

我国的试点城市如上海提出了“15 分钟托育圈”，通过建设社区的“宝宝屋”，依靠建设社区中的“宝宝屋”，在社区里设置嵌入式、标准化的托育服务配备，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使家庭步行 15 分钟范围之内可获得托育服务，目的是打造便利的社区托育态势，该模式呈现出极高的便利性，但要应对服务质量标准、师资力量以及可持续运营等方面的挑战 [2]。

国内外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各有自身的优势与短板，都显示出对应的长处与缺陷，当下我国对社区嵌入式托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层面的剖析，忽略了微观层面运营管理的细节和家长具体行为的模式。实际情形中，家长挑选托育机构时会考虑多种要素，诸如地理距离的远近程度、价格水平的高低状况、服务质量的好坏表现等方面，故而未来的研究需从家长的视角出发，深入解析托育决策因素怎样影响家长的选择，以及该如何改进运营策略去提升家长的满意度和使用频次，研究还借助微观层面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手段，如家长满意度方面的调查、服务质量的测评及成本效益的分析等，为完善社区托育模式提供更贴合实际的指导和建议。

（上接 43 页）问题及对策研究 [D]. 武汉 : 武汉理工大学 , 2022.

[5] 刘玉敏 . 生态学视角下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2019, 35(08): 25−29.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整合定量与定性优势，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全面理解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的实践情况与问题。定量部分根据实地访问五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托育点，采集它们的入托率、成本构成、服务覆盖范围等关键运营指标，同时对家长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至少 300 份有效样本），收集并分析他们对社区托育服务的满意度、喜好以及对服务质量的具体要求。

定性部分则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与社区管理者、托育人员进行深入交谈。针对托育机构负责人，重点询问“场地获取难度”“人员培训机制”“家长沟通痛点”，通过这些访谈，能够更加直观具体地了解社区托育点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挑战、获得的成功经验及潜在改进空间，访谈对象计划选择 10 至 15 名人员，保证获取到多元化观点和经验 [3]。

（二）数据分析

从数据处理角度看，研究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人员把问卷数据导入到 SPSS 里，之后选择恰当的统计手段，就如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或者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验，从而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联，这一步骤可以帮助了解哪些因素是影响家长满意度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家长提供的定性数据，比如他们对服务提出的意见，采用 NVivo 软件对内容进行分析，在采用 NVivo 编码访谈文本关键词的阶段，研究团队会先对访谈内容做初步阅览，标记出所有跟“信任”“便利性”等有关联的关键词及短语，这些关键信息会被进一步整理和归类，之后开展进一步的定性分析，挖掘家长对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真实体验与诉求。

四、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实践现状

（一）主要模式类型与特征

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根据其运营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公建民营型和社区自治型三大类。这三种模式在服务对象、资源分配、管理方式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每种类型的优缺点也不尽相同 [4]。

政府主导型托育模式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承担，依靠公共财政的支撑，主要为所有社区居民提供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此类模式显现出较高的社会覆盖范围与服务普及情况，但也许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服务质量高低不同。

公建民营型模式就是政府提供场地与基本设施，由企业或私人组织承担运营工作，该模式将政府的公共资源与企业市场运作机制结合，能够更灵活地贴合市场需求，促进服务效率，如某市约 70% 的社区嵌入式托育点采用公建民营模式。

社区自治型模式主要依托社区内部力量开展，涉及志愿者参与、邻里彼此帮衬等途径来组织运作，尽管这类模式在服务范围与规模上相对较小，但由于其贴近社区生活，可更好地契合特定社区居民的需求。

从服务时长方面看，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主要有全日托、半日托和临时托三种类型，契合不同家庭具体需求，全日制服务适合全天需照护的家庭，半日托和临时托更灵活，适合工作时间不固定的双职工家庭或有临时照护需求的家庭 [5]。

（二）典型案例启示

在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实践案例中，有三个典型例子值得深入探讨。

北京朝阳区案例：该社区重新规划社区中心闲置空间，提高了社区资源利用率，为婴幼儿提供高质量托育服务，场地改造方案突出空间利用最大化，节省成本，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感和归属感 [6]。

上海徐汇区案例：社区建立起以家长为核心的监督委员会，由社区中的父母组成，他们介入托育服务质量的监督环节，按周期组织活动，增进家长彼此的交流协作，该家长参与机制提升了托育服务的透明度以及信任程度，让家长更情愿选择社区嵌入式托育。

深圳南山区案例：这是深圳市南山区的一项创新实践，此实践实施高效的场地改造策略，同时采用了数字化管理工具，构建在线预约系统以及互动平台，为家长提供便利条件，同样提高了运营的效率，社区会定期收集家长给出的反馈，持续对服务内容进行调整与优化，以保障贴合家庭实际需求。

经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成功的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应该是结合社区的实际条件，采取创新型的场地改造途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家长参与机制，以此提升服务的品质，满足家庭的基础需求。

五、成效评估与现存问题分析

（一）模式成效量化评估

本研究对参与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家长开展问卷形式的调查，收集到家长满意度的分项评分相关数据，再借助儿童的行为观察量表对儿童发展指标开展评定，85% 参与调查的家长表示，“接送便捷”是他们选择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的关键原因之一，这反映出社区托育模式在满足家长日常需求层面的有效性。

对于家长的满意度评估，可以从价格、距离以及服务质量这三个维度展开，设置相应的问题，让家长逐项打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家长对服务质量均给予了较高评价，在价格与距离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家长认为服务所需的成本稍高，但整体而言，社区托育点的服务质量获得了普遍认可。

从婴幼儿的发展指标情况来看，使用儿童行为观察量表实施评估，发现采用了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的婴幼儿在社交能力上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这一结果说

明，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可为婴幼儿创造安全的成长环境，还可以推动其社交能力的发展。

（二）主要问题与深层挑战诊断

资源方面，多数社区托育点主要面临空间有限的问题，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每名婴幼儿活动场地不应少于 3 平方米，但调研显示，62% 的托育点人均活动面积不足 2 平方米，部分老旧小区托育点甚至将阳台、走廊改造为活动区，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区域，适宜的场地愈发稀缺，设备与物资的配备远远不足以契合婴幼儿需求，造成服务质量呈现不佳态势；就师资队伍状况而言，现阶段持有专业保育证书的人员占比不足 50%，这显示保育员的专业水平亟须提升，直接影响了婴幼儿照护质量的高低；托育服务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欠佳，缺少有效的监督评价体系，造成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到位，家长对社区托育服务的信任度同样受到了挑战。

虽然目前看来，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具备较多优势，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遭遇资源、师资以及监管等各方面的问题，未来应该针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分析，寻找有效的处理措施，以此来保障该模式能健康、长久地发展下去。

六、模式完善路径与系统性政策建议

（一）多维优化策略

资源整合：推动社区与幼儿园的设施（如厨房、教具）实现共享，估计可节约 30% 的成本；可借鉴日本“立体托育园”经验，在社区闲置高层建筑底层设置托育点，上层规划为老年活动中心，形成“下托上养”的空间共享模式。

数字化赋能：在互联网上进行宣传，开通线上预订系统，降低托位的空余比率；通过开发“社区托育云平台”，整合周边幼儿园、医疗机构、亲子场馆资源，家长可通过 App 查看实时监控、预约特色课程，如中医育儿指导、非遗手工课，实现“线上选服务，线下享资源”。

家长参与机制：提供常态化的反馈渠道，收集家长的意见，不断改进服务的配适水平。

经由上述优化策略的开展，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效能与质量，还可以促进社区资源的合理分配，给家长与孩子创造更便利、安全的成长环境。

（二）系统性政策支持建议

完善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模式，政策扶持是核心。建议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要依据托位数量来分级，保障不同规模的社区都可得到相应扶持，例如：对老旧小区托育点按“每增加 1 个托位补贴 5000 元 / 年”标准给予场地改造支持，对商业嵌入型托育点实行“托位数量阶梯式减税”。这种做法不仅能激发社区开展建设和运营嵌入式托育中心的积极性，还能切实提升社区里婴幼儿的托育覆盖比例；可通过跨部门协同来进行监督保障，由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教育、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的“托育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解决场地审批、食品安全、人员流动等问题。

人才培养是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关健。人才培养机制可构建“三阶递进”职业发展体系。基础层：在高职院校开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推行“1+X”证书制度，强化照护技能与急救知识培训。提升层：建立“托育导师工作室”，由行业专家带教新手保育员，通过案例研讨、实操演练提升应急处理、家园沟通等能力。创新层：鼓励高校与托育机构联合培养“托育管理硕士”，研究方向涵盖服务设计、政策评估、数字化运营等，为行业输送复合型人才。社区托育点可与职业技术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培养既定向又专业的保育员，不仅能应对托育人员专业化水平不达标问题，还能提升家长对社区托育服务的信任度与满意水平。

在进行试点地区案例分析时，发现 A 市开始落实补贴政策后，托位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扬趋势，达到原有数量的 40%，这说明财政补贴在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进步方面有效。

通过对这些政策建议及实例加以分析，在助力社区嵌入式婴幼儿托育服务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需有的放矢地开展策略调整以及持续优化资源安排，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

七、结论与展望

现阶段调查结果说明，家长们在选择社区托育服务时的核心要素，“近距离信任”是最主要的竞争力，其次是收费便宜和邻里信赖，因此，在设计及实施社区托育服务时，我们需要着重留意几个关键点，包括维持托育服务点的覆盖范围、提供恰当的收费标准，以及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帮扶 [7]。

就未来研究方向而言，核心是要研讨长期跟踪婴幼儿发展的相关数据，建议建立婴幼儿发展动态数据库，系统评估托育模式对儿童认知、情感、社会适应性的长期影响，以此审视社区嵌入式托育模式对婴幼儿成长发展的影响；开展“托育 + 养老”社区综合服务模式的探索也有了新思路，可对不同年龄段的服务需求进行整合，构建更完善且包容度高的社区服务体系，进而促进老年人与婴幼儿之间的代际互动以及社会融合，这不仅能实现社区资源配置的优化，还可能促进代际理解与社会包容，为构建全龄友好型社区开辟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宋鹏蕾 .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D]. 石家庄 : 河北师范大学 , 2019.

[2] 邓丹青 , 殷安康 , 范健 . 0~3 岁婴幼儿医—托育一体化模式刍议 [J]. 妇儿健康导刊 , 2023（下转 47 页）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主要难题与创新路径研究

李怡淼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与供给结构性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大多数老年人倾向于“原居安养”，但现有机构养老与居家照护资源均难以充分满足这一需求。在此背景下，社区嵌入式养老作为一种将专业化服务资源有机植入老年人熟悉生活场景的新型模式，成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向。本文旨在通过文献与政策分析，系统剖析该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难题，并针对性探讨其创新发展的可行路径，以期为相关决策与实践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嵌入式养老；老龄化；养老服务；创新路径；基层治理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核心在于，以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整合照护、医疗、康养及社会支持等多元资源，在老年人居住地附近提供连续、综合的服务，旨在实现“家门口养老”，提升服务的可及性与生活质量[1-2]。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积极探索嵌入式服务网络建设，在改善服务可达性、促进社会融入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也暴露出在可持续运营、专业力量支撑与跨部门协同等方面的普遍挑战[3-4]。

总体来看，社区嵌入式养老虽在实践中展现出潜力，但其规模化推广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因此，系统剖析该模式面临的核心难题，并探讨其创新路径，对构建我国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

（一）政策驱动：顶层规划与地方试点并进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将社区嵌入式服务作为完善居家和社区养老体系的重要抓手。《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提出，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养老、助餐、家政和健康服务功能，推动“社区＋养老服务”“社区＋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模式。各地普遍将社区嵌入式养老纳入“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通过盘活存量资源、改造既有房屋，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营机制，为嵌入式养老服务推广提供了制度基础。

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继出台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北京发布《北京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从建设原则、资源盘活、多元参与等方面作出制度规范；上海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市级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深圳则通过指导意见鼓励利用既有房屋建设“家门口”的小型养老服务设施。地方政策的持续推进，加快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落地与规范化发展进程。

（二）模式特征：小规模、多功能、强嵌入

从实践形态看，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呈现出“小规模、近距离、多功能、灵活化”的基本特征。其一，服务设施体量较小，多以社区日间照料点、养老驿站和上门服务为主要载体；其二，服务内容相对复杂，涵盖助餐、助洁、日间照料、康复辅助、健康监测和文化活动

（上接 46 页）(03): 183-186.

[3] 冯金，张伊铭 . 幼有所育背景下构建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 [J]. 南通职业大学报，2023(01): 8-11, 32.

[4] 刘欣 .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05): 73-74.

[6] 蔡军，屈桂宇 . 婴幼儿社区托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03): 49-53.

[7] 何阳美 . 从“幼有所育”思考如何打造社区托育服务 [J]. 社会与公益，2020(08): 34-35.

（作者单位：北海职业学院）

等；其三，强调嵌入社区生活圈，突出“家门口”的可及性；其四，运营方式较为灵活，可由街道统筹、社区组织或社会化机构承担，并探索多元合作模式[5–6]。

（三）典型经验：上海、北京、深圳的经验亮点

在具体实践中，上海以“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嵌入式服务点”为基础，构建网络化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资源下沉，实现“一站式”供给[7]。北京注重试点项目的规范化运行，明确服务半径和功能清单，并以街道和社区为统筹主体，加强信息化支撑和服务调度[8]。深圳则重点盘活既有房屋资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养老服务岗位，推动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与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9]。

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主要难题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在提升可及性和社区支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维结构性问题，制约其规模化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一）空间资源供给受限且配置低效

嵌入式养老往往依托社区现有空间，如日间照料点、活动室和康复设施，但城市社区土地紧张，公共空间多用于其他功能，导致养老服务场地不足、布局分散[10]。农村地区虽然空间相对充裕，但土地制度和产权不明晰，使设施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使用权，影响服务质量与老年人参与意愿。

（二）资金投入不足与运营可持续性差

嵌入式服务运营需持续投入设施维护、人员工资和日常运营成本。目前多依赖财政补贴和慈善捐助，缺乏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来源，难以支撑长期运营。商业化运营受服务半径小、收费能力弱限制，难吸引社会资本[11]。缺乏明确收费机制与财政激励，服务资金循环难以形成。

（三）专业人才严重短缺且队伍不稳定

社区养老服务核心在于专业人力，但我国专业护理人才供给不足、职业吸引力低，导致基层服务功能受限。护理人员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照护质量，也制约了应急响应、康复服务以及对高需求老年群体的健康支持。

（四）服务内容同质化与个性化不足

嵌入式服务多集中于助餐、助洁和日间照料，缺乏慢性病康复及心理健康等高层次服务。同质化服务难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也不利于形成服务品牌和用户忠诚度。

（五）跨部门协同机制不畅与治理碎片化

社区嵌入式养老涉及民政、卫健、街道社区及社会组织的多方协作，但现实中职责边界模糊、政策标准不统一，导致“多头管理、资源浪费与服务缝隙”[12]。社区自治组织和市场化服务机构参与不足，也提升了协同难度。

（六）数字化支撑薄弱与智慧应用落地难

智慧养老和健康监测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管理平台与医疗机构、长护险系统数据不互通，影响服务连续性和综合管理能力。数字鸿沟也使部分老年人难以使用线上服务，削弱了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能的潜力。

三、问题产生的主要成因分析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虽具有“生活化”“便利性”“资源就近利用”等优势，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这些难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人口、治理、市场、制度与技术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

（一）人口老龄化驱动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中国正在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老年人口总量庞大且增长迅速。这一人口结构变化直接推动对日常照护、慢性病管理、康复服务及心理健康支持等多层次养老服务的需求激增。社区嵌入式养老的核心在于利用本地资源满足老年人的就近服务需求，但现有供给体系在数量和专业化水平上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对高龄失能、慢病患者等群体的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依赖明显增加。

（二）基层治理资源配置不均衡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依赖基层治理能力，包括社区组织动员、医疗资源配置及志愿服务网络。然而，我国基层资源在地区和城乡间分布差异显著。发达地区城市社区在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和专业人员配备方面具有优势，而中西部及农村社区则普遍面临资源不足、服务能力薄弱的困境[13]。社区层面的养老服务资源存在显著“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导致部分地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难以达到均等化发展目标。

（三）市场化发育不足制约可持续发展

养老服务市场化程度低，社会资本和专业机构参与动力不足。尤其在长期护理、康复等高成本、高技术服务领域，缺乏可持续的规模化运营模式。基础生活服务如助餐、助洁等易于开展，但专业性强的服务盈利空间有限，难以吸引社会资本长期参与。同时，从业人员职业前景不明、薪酬待遇偏低，导致专业护理人才流失率高。这种市场化不足与人才困境相互叠加，使社区嵌入式服务供给压力持续存在。

（四）部门职责碎片化阻碍协同效能

社区养老服务涉及民政、卫生健康、医保、住建以及街道、社区等多部门，制度层面仍存在“碎片化”问题。各部门职责边界不清、政策目标和考核体系不一致，导致资源整合困难和服务链条断裂。民政部门主导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卫健部门负责健康管理，医保涉及支付保障，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则关注设施规划。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使政策执行效率下降，易出现重复投入、资源浪费及责任推诿等现象，严重影响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五）数字化基础薄弱限制服务提质增效

数字技术在提升养老服务管理效率和精准化水平

方面潜力巨大，但多数社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与医疗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及社会救助体系之间互联不畅，形成“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制约了跨部门数据共享。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导致部分信息化服务无法有效触达，进一步削弱了数字技术在嵌入式养老中的赋能作用。

四、创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在空间、资金、人员、治理与技术等方面暴露出的结构性难题，有必要从系统治理与制度创新的视角，探索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的优化路径。结合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与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以下创新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推动设施规划与社区发展深度融合

空间资源受限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扩展的首要瓶颈。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前移至社区规划与城市更新阶段，实现与社区公共空间的协同布局。一方面，应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建社区规划中，预留嵌入式养老服务空间指标，通过盘活社区闲置用房、公共服务用房和底层商业空间，降低服务点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应推动养老服务设施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公共设施的复合利用，形成“多功能嵌入”的空间格局。

（二）加强专业护理人员队伍建设：本地化培养与职业吸引力提升并重

专业护理人员供给不足，是嵌入式养老服务难以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破解这一难题，应从“供给端扩容”和“职业吸引力提升”两方面同步推进。一是构建本地化、分层次的养老护理人才培训体系，依托社区、职业院校和医疗机构开展短周期、模块化培训，提升基层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二是通过完善薪酬待遇、职业晋升通道和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养老护理职业的社会认可度和稳定性。

（三）推进“医养结合”：打造嵌入式社区综合照护中心

随着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复杂化，单一生活照料型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应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点为载体，推动医疗资源向社区延伸，构建“医养结合”的综合照护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签约家庭医生、建立社区护理站、引入康复和慢性病管理服务等方式，将基础医疗服务嵌入养老服务流程之中。同时，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区域医疗机构的协作，形成分级照护与双向转诊机制。

（四）推动基层治理协同：以街道和社区为统筹枢纽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的整体协同。应明确街道和社区在养老服务中的统筹角色，强化其在资源整合、服务协调和监督评估中的功能。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将民政、卫健、医保、住建等部门纳入统一的社区治理框架，减少政策碎片化带来的执行阻力。

五、结语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重要模式，具有“生活化、便利和资源就近利用”等优势。然而，实践中仍存在空间、资金、专业人才、服务质量、跨部门协同和数字化等多重结构性难题。这些问题既受人口老龄化和需求增长影响，也与基层治理资源、市场化发展、长期照护制度及数字化基础不足相关。

为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采取系统治理和制度创新策略，包括优化空间布局、建立多元化资金支持、加强护理队伍建设、推进医养结合、数字化赋能及强化基层治理协同。通过总结经验并形成可复制模式，有望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更广泛推广，为我国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杜鹏，马琦峰．中国社区嵌入式养老：现状与问题浅析 [J]. 人口与发展，2024, 30(03): 113−124.

[2] 世界卫生组织．老龄化与健康 [EB/OL]. (2025−10−01)[2025−12−29].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geing−and−health.

[3] 白杨，展颐华，罗述君，等．“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J]. 老龄化研究，2025, 12(09): 943−949.

[4] 辛宇．嵌入式养老模式下的老年心理健康与社会融入研究——基于成都社区的调查 [EB/OL]. (2025−10−12)[2025−12−29]. https://doi.org/10.63887/fss.2025.1.7.53.

[5] 张琳淼．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打造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机制研究 [J]. 老龄化研究，2024, 11(06): 2261−2267.

[6] 朱勤皓．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研究——新形势下老龄工作的探索与创新 [J]. 科学发展，2017(08): 103−109.

[7]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上海民政工作要点》和《2023年上海民政工作总结》的通知 [EB/OL]. (2024−02−05)[2025−12−29]. 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5bc5d60d389446edb2aaf5c66ab0c02a.

[8]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B/OL].(2025−01−21)[2025−12−29].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503/t20250314_4034679.html.

[9] 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深圳市（下转50页）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径研究

殷金桃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的未来。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融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加强思政队伍建设，提升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能力。要发挥思政课堂育人主渠道的作用，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作用，让“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意蕴；路径

党的二十大是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赶考路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因此，“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1]，也是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2]，可见，理想信念教育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才会有目标、有追求，才会成长成才；一个民族有理想、有追求，才会有希望，才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指明了方向，丰富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旨归

理想是指引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明灯，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关乎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资源融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将学生培育为怀理想、勇担责、耐艰苦、勤拼搏的新时代有为青年，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对于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为青年大学生认识国情、把握时代提供了权威思想武器，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其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时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为他们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

（上接 49 页）关于促进和规范利用既有房屋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试点工作指引》印发实施 [EB/OL]. (2024−06−03)[2025−12−29]. https://www.szft.gov.cn/ftqmzj/gkmlpt/content/11/11337/post_11337303.html.

[10] 张菁，赵振乐，王颖楠，等 . 城市更新视角下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难点与运营机制 [J]. 城市规划学刊，2025(01): 71−77.

[11] 高静，李小芹 . 加快构建多元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关于西安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情况的调研 [EB/OL]. (2025−11−24)[2025−12−29]. https://mzt.shaanxi.gov.cn/xw/mtbd/202511/t20251124_3587977.html.

[12] 人民网 .《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 (2024)》发布 解析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EB/OL]. (2025−08−26)[2025−12−29].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n1/2025/0826/c1008−40550512.html.

[13] 吴宏洛，马聪 . 补短板、强动力，农村养老服务如何提质增效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3−13(A07).

（作者系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激励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青年大学生“应该成为怎样的时代新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目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个别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享乐主义思想泛滥，这严重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党的二十大精神中蕴含着自信自强、踔厉奋发、守正创新的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蕴含着勤奋务实、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蕴含着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蕴含着无私无畏、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等。我们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引导他们把自己的个人理想和国家的崇高理想相结合，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发挥团结互助精神、刻苦钻研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学好本专业知识，夯实知识基础，掌握专业技能，增强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跑出最好成绩，争做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三）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经过几代先辈们的前赴后继，我们离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为之努力奋斗。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擘画了宏伟的强国蓝图，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宏伟目标，需要青年大学生胸怀远大理想、坚守初心，拥有坚韧不拔、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和魄力。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其理想信念容易动摇，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屋建瓴，指导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要引导青年大学生全面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丰富内涵，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他们把握时代脉搏，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精准、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正确解答在现实和理想、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等方面遇到的思想困惑；厚植他们的爱国情怀，引导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自觉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为建设强国伟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讲能力

第一，思政教师要谨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教师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力量，应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核心要义，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落到实处，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脑。高校要打造一支理想信念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的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教育引导学生从理论基础上理解理想信念、从党史人物身上感悟理想信念、在政治生活中锤炼理想信念、在服务人民中践行理想信念。

第二，思政教师要重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求高校教师不能照本宣科，避免生搬硬套和空洞说教，将思政课由“知识灌输”转变为“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深、讲透、讲活，润物细无声地达到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目的。充分发挥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当作思政课堂鲜活的教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鲜活的教材，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刻认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切实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高度认同上，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之中，将个人追求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为国家和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彰显青春力量。

第三，思政教师要创新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首先要把握大学生的特点，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用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他们更易理解的讲述方法诠释好党的二十大精神。针对大学生喜好网络社交的特征，思政教师应系统提升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增加知识储备量，主动构建网络育人场景。通过创建线上学习社群，以青年大学生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和呈现形式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互动交流中实现政治引领，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深化他们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领悟，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第四，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首先要提升自身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能力，读懂学透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核心要义，在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引导，将新时代十

年的伟大变革、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伟大建党精神、奋斗精神等内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主题班会、走访宿舍、与学生谈心谈话的契机，组织开展专题讨论，开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精彩内容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使学生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增强使命感，树立远大理想，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二）借力课程思政，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专业课教学中

高校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教育的主阵地，担负着为党为国铸魂育人的初心使命，必须全方位、多维度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融入课堂，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作用，打破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人员的边界，始终秉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以达到系统育人的效果；帮助学生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并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

在高校教学中，教师针对每一门专业都应当树立“大思政课”的意识，应在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挖掘育人元素，要深入研究本学科专业的育人目标和知识体系，主动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各项战略部署融入到大学生课程专业建设中，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标准融入到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在具体实施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学科的教学内容，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要充分挖掘本学科价值引领方面的内容，在授课过程中注意把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有效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使他们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搭建实践平台，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社会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学生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3]。因此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是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方法。传统的灌输教学法使学生厌烦，教师可以通过分小组，让每个小组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另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其中，这些活动可以涉及社会热点、时事政治、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多个领域，可以组织志愿服务、理论宣讲、社会调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价值，增强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4]。

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强化互联网思维，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为抓手，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通过各种多媒体平台创新教学形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教学，构建“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园地”，占据线上传播主导地位。借助这一载体，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案例相结合，采用大学生易于接受的传播形式，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部署进行系统性阐释，同时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多视角分析，开辟互动问答专区实时解决学生困惑，助力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从而引导他们加深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领悟，引导他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三、结语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5]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全体教育工作者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精髓，以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方针为行动指南，引领青年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深耕专业学识，弘扬勇于担当的奉献品格，着力培育胸怀理想、勇挑重任、砥砺奋斗、锐意进取的新时代有为青年，激励青年大学生以昂扬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N]. 北京 : 人民日报 , 2022−10−31(01).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2.

[3] 张春生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高质量立德树人 [J]. 红旗文稿 , 2021(09): 39−41.

[4] 鲁江花 , 祝秋红 .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研究 [J]. 才智 , 2024(07): 185−188.

[5] 蒙象飞 . 培养造就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论述 [J]. 党建 , 2023(01): 36−3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24JDSZ3165）。

（作者系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曾晓鹿

摘要：文化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为文化交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深厚的底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稳定、发展与团结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文化交融理念，深入探究其根基所在，是推动各民族和谐共处、携手共进的关键。本文以文化交融理念为探究视角与突破口，阐释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论述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多视角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所在与实践路径，旨在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根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波动曲线往往与民族延续与复兴的轨迹相重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内生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之中，文化认同与交融是维系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纽带。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分地肯定、具备坚定的信心，才能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才能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力源泉。

一、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一）文化交融

文化交融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互鉴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并非简单地叠加，而是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交流、理解和尊重，实现文化的共生共荣[1]。文化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如服饰、饮食、建筑等，更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交融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2]。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 56 个民族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所形成的共同心理意识，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倡导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分享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3]。

（三）二者的相互关系

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密切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化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底蕴。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文化交融提供了精神支撑与价值导向，确保文化交融沿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交融理念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促进文化交融，是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

二、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一）唤醒共有历史记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变迁，但始终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中华儿女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不仅是精神支柱，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融能够唤醒共有的历史记忆，具有激发国民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作用，从而更加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4]。

（二）促进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思想体系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特点[5]。通过文化交融，各民族能够深入且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塑造共同价值观

共同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和灵魂。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融为一体，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促使各民族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6]。

三、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一）历史根基

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大地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凝聚着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从远古时期华夏部落的初步融合，直至改朝换代奠定多民族国家基本格局，历史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各民族交流合作的印记。不同民族在地域迁徙中，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技艺等方面相互渗透，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如同坚韧的丝带，将中华民族紧紧串联在一起，孕育出共同历史根基。

（二）文化根基

首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已经贯穿到各民族的生活，并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准则基石。同时，在少数民族的史诗与传说中，同样传颂着善良、勇敢、团结等高尚品质，与中原文化价值观相呼应。各民族在此类共同价值观念引领下，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文化的一种纽带，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其次，民俗文化交融，共生了民族情感纽带。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生活智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断进行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现象，是各民族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三）经济根基

首先，古代经贸往来，促进了民族交流。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技术的交流，更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这种经济上的交往，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得以融合与发展。其次，现代产业一体化下的深度合作，推动了民族文化认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产业一体化已成为推动各民族间深度合作的重要力量，不同民族地区的产业优势得以互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

（四）社会根基

首先，人口流动与杂居格局，稳固了民族社会根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频繁，城市社区呈现多民族杂居状态。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同胞共事创业、毗邻而居，日常交往从陌生到熟悉，在共同生活中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互相包容尊重。同时，各地社区创建的“邻里节”“文化交流”等活动，为不同民族居民打破隔阂、互助互学、并肩协作打造和睦社区氛围，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充分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基础。

其次，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架起了民族交融桥梁。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深入偏远民族地区开展支教、医疗救助、文化保护等公益服务，为当地群众送知识、送健康、送文化。组织少数民族同胞走出大山，参与文化交流展示、创业培训等活动。社会组织以爱心为纽带、以行动为桥梁，拉近各民族群众的距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互信，营造互帮互助良好氛围，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社会生根发芽。

（五）教育根基

首先，国民教育体系中，具备丰富的民族团结教育。我国教育体系中，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已悄然融入思政体系。通过讲述民族历史、政策法规、模范事迹，参观民族博物馆、文化展览等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全面了解了民族的多样性，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学会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和谐相处，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力量。

其次，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了教育形式。我国高校、科研机构逐步加大文化传承专业人才培育力度，通过多元手段助力少数民族语言、艺术、技艺的传承，旨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开设民族语言、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课程，借教育之力将民族文化融入时代浪潮，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以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在文化交融理念下，实现民族精神的传承不辍。

四、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与宣传

加强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应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细节，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还原更多生动鲜活的融合故事。同时，全方位探究各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修复古迹、建立博物馆、举办历史文化节等形式，展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贡献与交融。还要加大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通过建设民族文化博物馆、非遗传承基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如网络、影视等创新传播形式，制作高质量纪录片、综艺节目展现民族文化魅力与团结奋进历程，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增强民众对共同历史的认知与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

（二）深化经济融合发展

在经济领域，深化各民族间的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区域发展政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重要路径。通过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的互补与协同发展，可以有效增进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首先，鼓励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衔接。其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拓展民族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借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开发藏毯、苗绣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提升民族产品的竞争力，以经济深度融合拉紧民族情感纽带，加深各民族在经济领域的交融与合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完善教育机制

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在促进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它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桥梁，更是价值观塑造的摇篮，通过系统性、持续性的文化浸润，能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于每一位学子心中。在学前教育阶段，可通过趣味故事、民族歌舞等形式，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基础学科的课程，精心设计课程内容，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逐步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专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课程，结合时事热点和学术前沿，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培养理性认知和家国情怀。同时，组织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编写与时俱进、贴近生活的教材读物，除了介绍历史文化知识，还应融入当代民族团结的生动案例，如脱贫攻坚中各民族携手奋斗的故事、科技领域里民族团队合作创新的成果等，增强教材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强化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认识。

（四）优化社会交往生态环境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首先，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民族文化节庆活动、演艺活动、体育比赛等，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其次，加强城市社区、农村村落等基层组织的建设，推动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嵌入、深度融合。再次，注重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让各民族群众在社会交往中感受到尊重和温暖。最后，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营造民族团结光荣、分裂破坏可耻的舆论氛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五、结语

文化交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文化交融蓬勃发展的当下，只有保持文化自信，创新实践路径，才能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伟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未来，应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方法，持续为这一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才能实现续写民族团结进步的全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刘芷晗，石硕．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J]. 西北民族研究，2022(03): 5−16.

[2] 杨燕，杨富学．古代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57(02): 113−119.

[3] 时雨晴．文化认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结构及实现路径 [J]. 云南社会科学，2024(02): 119−126.

[4] 林镇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州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海珠区三个街道的调查 [D]. 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022.

[5] 杨须爱．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J]. 民族研究，2021(01): 30−47, 140.

[6] 肖志康，肖立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与路径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1(03): 13−1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决策咨询课题“‘输血’与‘造血’并举：河南援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研究”（2025JCZX215）。

（作者系中共哈密市委员会党校中级讲师）

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机制创新研究
——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实践中心建设为例

侯玉叶

摘要：本文聚焦于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建设机制创新。研究结合实践案例，旨在系统总结一套可行的合作模式、一套切实有效的运行机制以及一条高效的运作路径。核心观点认为：实践中心能否成功建设，关键在于“政府搭台、多元主体参与、市场信号牵引”，并通过差别化政策支持，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与区域产业结构同频共振；需把握“资源共享”与“收益分配”两大关键杠杆，推动职业教育供给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应坚持开放协同、集成运营的思路，将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在职研修、生产试制、技术服务和学生实习等多元功能综合集成于同一个平台，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提升区域智能制造水平，支撑产业整体升级。

关键词：开放型实践中心；产教融合；多元共管；产业发展；智能制造

一、背景与意义

（一）对接区域经济，实施精准化人才培养

精准人才培养是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其关键在于解决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同频问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要求职业教育及时把握好行业发展方向，通过职业院校和企业通力合作，随着市场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完善人才培养生态。在培训中，学校要面向市场，对接企业，把生产一线所遇到的技术难点融入学校教学当中，将定制化课程以及真实项目同步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接触最新技术并获得实践体验，在需求引领下培养学生；同时，职业院校也将技术服务作为另一张名片来包装推广，利用自身的专职研发团队及咨询平台，帮助企业客户完成从方案设计—技术研发—技术突破—后续跟进维护等全流程的技术服务工作，并解决客户技术困境，提高产品竞争力，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培训与服务并不局限于在校生群体，职业院校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开展各种形式和各类层次的技能培训课程，无论是零起点还是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人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学习通道，这种开放共享的教学布局能不断帮助社会提高技能力度，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

（二）创新基地功能，全面拓展服务维度

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应覆盖多层次、多维度，让不同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的学习者都能获得适配的培养路径。落实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关键是把合作机制做实在：校企共同打通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与创业通道，借此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下一步，把“基地 + 技能”做得更深：借力企业线上的人力优化与品牌资源，叠加“互联网 +”和信息技术，搭建一个随时可学、人人可学的开放环境，让基地的服务不再受时空限制。为此，先建虚拟实训平台，推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学习节奏由学员自主把握；再把企业真实项目搬进基地，学生直面生产场景反复操练，在毕业前就养成过硬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三）深化校企合作，推动技术、服务与育人双向赋能

不同于学生的育人价值，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更是将学校本身的师资设备开放到企业当中，为企业的在职员工提供技能培训以及相关资格认证，切实解决企业迫切需要的人才升级问题。校企深度对接后，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同时开展，资源共享、互利双赢：基地条件更加完备，师资力量更加雄厚，教学资源再次被挖掘，基地已经形成一批集国际化视野与超高技能于一身的“双师型”队伍，并且开发了一大批利用最新的技术、工艺、行业规范的资源。技术服务产出的成果被及时送入课堂，实现了科教结合，并且又反哺科研，让学生学有所用。此外，基于这种校企合作形式，他们共同开发了许多面向市场的产品，师生的教学内容几乎与市场需求是零距离，故而他们的就业能力得到了提升，有了较好的职业起点。目前，实践中心运行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资源整

合不到位。政校行企共建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措施、运行机制，没有实现统一管理、统一统筹、职责清晰，导致资源使用低效、参与积极性不高、生产育人两个功能难以发挥。下一步要细化运行规则，明晰各方责任，打通资源壁垒，提高配置效率，为实践中心的长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职业教育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表现在：课程设置对标区域产业发展，针对地方产业需要培育应用型人才；以创新载体为重点，将服务范围拓展至县域或基层；多个办学主体协同育才、企业携手院校共同攻克技术难关，推动培养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相融合，满足不同层级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输送优质高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

当前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升级，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联结了教育链与产业链，该中心的机制建构与运行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效果及产业创新的活力。本文沿用协同治理理论脉络展开，从保障和运行两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应基于协同治理，政府、学校、企业、行业联合参与的多方共治理念，为区域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治理提供思路。

（一）构建“多元联动、权责清晰”的保障机制

实践中心推行“政府主导、院校主体、企业参与、行业指导”的四元治理体系，济宁市可以组建区域产教融合指导委员会统筹调配政策资源，院校设立专业建设委员会抓课程开发，企业派技术专家参与实训标准的制定，行业协会提供质量管理并形成闭环。部分成功实践中心采取“1+3+X”组织模式（即一个理事会、三个核心执行机构、若干专业委员会），实现了决策与执行既分离又协同的制度化建设。这一体系首先通过《运行管理办法》《资源共享细则》《成果转化激励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明确各方职责边界；进而引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对实训项目实行 PDCA 闭环管理，确保教学过程与产业标准统一。有国家示范中心在此基础上，同时对接教育认证与行业认证“双标准”，其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8%，成才率较以往提升约 27 个百分点 [1]。多元激励政策设计。政府拨出产教融合专项资金，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高校将高校教师到企业开展社会实践计入教师参与职称评审。企业把“技能积分”与企业职工的职务晋升挂钩。行业开出“创新项目榜单”，对技术攻关予以奖励。深圳某实践中心开展“校企双导师制”以后，企业导师评高职称的比例上升了 18%，教师的横向课题经费增加了 42%。

（二）打造“产、研、学、训”一体化的集成运行模式

1. 功能模块集成：采用“三平台 + 四中心”架构

智能制造技术共享平台、数字孪生虚拟实训平台和产业数据中台是“智能产线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一部分；职业技能认证中心、企业定制培训中心、技术创新孵化中心以及学生创业服务中心为不同的功能定位服务。例如，基于该架构自主开发的“智能产线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已支持 6 个以上专业类别，培训超过 2000 人次。

2. 动态需求响应：建立基于数据的精准匹配机制

构建产业需求预警系统，实时抓取企业用工规模与技术缺口数据，由 AI 算法生成“技能需求图谱”。院校据此灵活更新实训模块，企业则按需发布“技能订单”，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

3. 价值链闭环：构建“人才—技术—产业”循环生态

中心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线打通，在内部设立知识产权转化办公室，“专利池 + 项目库”双轮驱动。学生项目经企业评估后可直接送入孵化通道；迄今已转化专利 20 件，衍生 5 家初创公司，形成“人才—技术—产业”的自我循环 [2]。

三、实施路径

（一）构建“政府统筹、市场驱动”的协同治理机制

政府应加强战略引导，进行政策供给与资源调配破除产教融合“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院校支撑”。通过制定产教融合的建设用地、税收、金融等相关配套政策，建立跨领域的政产学研联动机制，通过组建实践中心，以现代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基础，横向实现政策互联贯通、纵向资源深入基层的育人格局。另外，借鉴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可推进构建混合所有制的实践中心，使企业出资出力（设备、技术、资金）入股，并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院校支撑”共建共管共享共惠的原则开展工作。比如：某个实践中心就采取企业投资建设一条智能化生产线，由政府提供场地和奖励补助，院校负责制定各种课程的模式。依托政府资源，由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共建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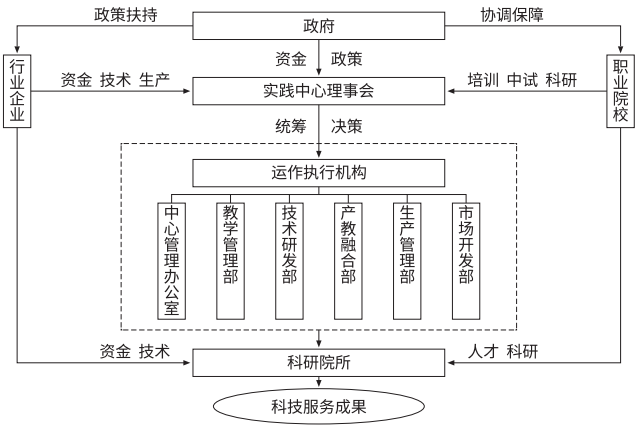


图 1 实践中心管理机构

实践中心，打造人才培养高地，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基于此，我们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科学技术服务集合于同一平台之上，统一通过开放平台开展，以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产教融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促进区域智能制造实现内涵式发展。多方统筹设计并持续维护实践中心的运行机制。政府搭台、多元主体参与、市场力量驱动，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学校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使职业教育结构与区域布局同步于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3]。

（二）构建“多元协同、权责明晰”的共建共享治理机制

建设多元协同的运营体系，实践中心要以“理事会+用户委员会”为双治理架构，厘清政府监管指导、院校教学、企业资源投入、行业组织标准制定权责关系，形成各方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实行全面推行“双导师制”，依托于企业技术骨干与院校专业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对接产业开展调研，并形成相应培养方案；同时，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变成教学案例，把企业技术标准、岗位要求纳入课程体系，实现了校企融合、课岗贯通、校企互动共育的质量目标[4]。

（三）创新“数字赋能、虚实融合”的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针对实践教学资源分散、校地企协同壁垒突出等现实困境，实践中心需着力打造“线下实体基地与线上数字平台”深度融合的“双载体”运营模式，以破解这个困局，在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最大效益的同时满足具体实践。依托区域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统筹集成高校闲置实训设备、科研院所核心专利、企业骨干师资等资源要素，打通校地企联动通道，搭建“线下基地+线上平台”结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践基地。引入企业级智能产线和精密设备，搭建“虚拟仿真+真实生产”的双场景。

在数字孪生系统中先进行工艺设计、模拟调试；再到实机上进行真实生产环节的工步操作训练，避免安全风险，减少耗材，大幅度提高实训效率。线上同步搭建数字孪生实践平台，汇集近千个真实产业案例、行业标准库和精品课程；打造“智能制造云平台”，实现设备预约、技术咨询等功能，促进济宁市域院校企业和企业资源相互流通，已经服务的企业超过了200家，实现了每个企业的平均研发成本降低了约30%，发挥了更大的资源辐射带动作用。

（四）完善“产教互哺、利益共享”的成果转化与反哺机制

实践中心以“教学—科研—生产—服务”为载体，面向区域产业开展“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深度融合；瞄准本地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需要开发“智能产线优化系统”提高生产效率20%，并建设了“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明确技术转让、专利授权等成果转化过程中校企双方、企业和学校技术人员、企业和学生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调动校企双方、师生等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中心所获得技术研发经费的30%更新设备、20%奖励研发人员，使技术研发工作呈现“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五）强化“数据驱动、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与评估机制

强化实践中心运营质效和规范化建设的举措，是全年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年度运营报告+第三方评估”双管齐下监管模式，将中心经营主体的核心发展指标进行量化考核，考核范围包括实习实训人数、培训服务收入、横向技术服务收入以及科技成果获奖情况等，各项指标以大数据方式展现，直观反映出中心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5]。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实践中心要按年度编报运营报告，向外界主动公布实训课程建设数量、企业定制化培训需求清单、实训设备利用率、学员满意度等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倒逼服务提质增效。同时，积极借鉴ISO质量管理体系，并将实践中心运行流程各项内容全部纳入规范范围之内；以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师资队伍专业训练、实训教学管理过程为关键点，建立完整闭环管理机制；详细规定各项规范的操作标准和各岗位的职责权限。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系统构建五大机制——协同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治理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成果转化机制与质量保障机制，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能够有效整合政、校、行、企多方资源，打破体制壁垒，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这不仅能为社会持续输送大批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水平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更能直接服务于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与降本增效，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未来，实践中心应保持开放姿态，积极与国内外先进的同类机构、科研单位及行业组织建立广泛联系，学习借鉴其成功经验与前沿理念，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与能力升级。唯有如此，实践中心才能在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切实履行其时代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冷虹雨 . 基于共生理论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框架与路径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2023(31): 41−46, 73.

[2] 吴瑞莉 . 产教融合、多元共建型智能制造技术中心建设研究 [J]. 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 , 2020(11): 222−224.

[3] 丰云 , 张向超 .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校政企合作长效机制构建——以湖南电大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例 [J]. 中国远程教育 , 2017（下转 59 页）

茂名市乡村地区健康科普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宇涛 张裕海 曾佳利

摘要：为填补粤西乡村健康科普实证研究空白，以实际数据支撑精准化服务，本研究以茂名地区5个代表性乡镇的366名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抽样与自制问卷的方式，结合入户与线上调查，分析健康知识知晓率、获取途径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受访者健康知识知晓率较高但结构失衡，专业渠道覆盖率低；文化程度、年龄、职业是核心影响因素，低文化、老年群体存在数字障碍与主动性不足的问题；乡村地区健康科普存在内容不适配、渠道精准度低、服务有空白、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建议依托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构建“政府主导—高校赋能—社会参与”的模式，开发本土化、分众化科普资源，通过“传统＋数字”双渠道提升健康素养，助力健康乡村建设。

关键词：健康科普；科普资源；健康素养；健康乡村

一、引言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成为民生目标。乡村地区因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受限等问题，其健康科普工作成为薄弱环节。据调查，广东地区健康科普资源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而粤西地区则面临“资源少、形式旧、适配低”的困境，滋生了健康谣言与信息茧房，影响着居民的生命健康与乡村振兴。

茂名作为粤西农业大市，乡村人口占比53.2%[1]，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病率较城市高12.3%，但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尚未有明确数据，仅可参照2020年全国农村15.67%的水平进行推算，显著低于城市的28.08%[2]。202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百千万工程”，明确指出要“强化县域医疗能力”“建设健康乡村”[3]，这为茂名市乡村地区健康科普提供了政策契机。

当前粤西地区乡村健康科普实证研究匮乏，难以支撑精准服务。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健康科普需求受文化程度、年龄等多元因素影响，且普遍存在渠道适配性不足的问题[4]。本研究通过调查茂名地区5个乡镇居民的需求及影响因素，旨在填补区域空白，为构建适配模式提供数据支撑，助力“防止因病返贫”与健康乡村建设[5]。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依据茂名市乡镇经济水平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选取鳌头镇、镇隆镇、大井镇、丽岗镇、博贺镇作为5个代表性乡镇；在每个乡镇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抽取1个行政村，共5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中通过村（居）委会获取常住家庭名单，随机抽取20户；在每户家庭中选取1名15~59周岁符合纳入标准的成员作为调查对象。

（二）调查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过去1年在当地累计居住≥6个月；具备基本语言沟通与理解能力；知晓研究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认知障碍、精神疾病等无法配合调查者；存在严重躯体功能障碍导致交流困

（上接58页）

(03): 67−74, 80.

[4] 宋志敏 . “项目驱动化”的政校企合作联动机制探究——以开封大学实践探索为例 [J]. 开封大学学报 , 2016(11): 19−22.

[5] 刁利平 . 基于资源整合理论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38(10): 84−8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与应用研究”（2023219）。

（作者系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教授）

难者；拒绝参与或中途退出研究者。

（三）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的《茂名市乡村地区人群健康知识知晓率、普及率及科普数字资源覆盖率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含人口学特征、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获取途径及满意度、健康科普数字资源覆盖情况等。

（四）质量控制

严格遵循抽样方法进行操作，调查前统一培训考核调查员。质控人员全程跟踪督导，及时处理问题；调查后抽取 10% 的问卷进行复核，对不合格的问卷进行重新调查。线上问卷中明确对象条件，对不合格的问卷采取电话访谈或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重新调查。

三、结果

（一）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6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3%。调查对象中男性 116 人（31.7%）、女性 250 人（68.3%）；年龄在 19~50 岁之间的占 71.86%；文化程度以大专为主（56.01%）；职业以农村学生及务农为主（79.23%），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特征		n	%	特征		n	%
性别	男	116	31.7	文化程度	大专	205	56.01
	女	250	68.3		本科及以上	18	4.92
年龄	18 岁及以下	52	14.21	职业	务农	84	22.95
	19~30 岁	185	50.55		乡村干部	16	4.37
	31~50 岁	78	21.31		基层医护人员	13	3.55
	51~65 岁	44	12.02		个体经营	32	8.74
	66 岁以上	7	1.91		学生	206	56.2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5	9.56		退休	14	3.83
	初中	57	15.57		其他	1	0.27
	高中 / 中专	51	13.93				

（二）健康知识知晓率

从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来看，受访群众健康知识整体知晓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也存在部分认知薄弱点。其中，传染病预防知识普及效果最为充分，超 96% 的受访者了解流感、新冠的主要预防措施或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急救与慢性病基础认知较为扎实，80.6% 的受访者知晓烫伤的正确处理方法，79.51% 的受访者知晓高血压、糖尿病属于慢性病，且 71.31% 的受访者接受过慢性病防治相关科普指导，科普覆盖面较广。

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慢性病管理知识不足，仅 59.84% 的受访者能非常或比较了解高血压患者日常注意事项，近三成受访者认知程度为“一般”；二是健康核心理念认知欠缺，仅 60.38% 的受访者了解并认同“预防为主、治疗为辅”，超三成受访者仅听说过却不了解；三是对妇幼与老年健康细分知识掌握不够，老年口腔问题护理的深度知晓率（“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仅为 54.65%，对儿童龋齿预防相关认知也有提升空间；四是部分关键知识存在盲区，3.83% 的人完全不知道艾滋病传播途径，1.64% 的人完全不了解儿童龋齿预防方法，这些均需在后续科普工作中重点改进，如表 2 所示。

表 2 受访者对健康知识认知薄弱环节情况

认知薄弱环节	人数	%
慢性病管理知识深度（高血压日常注意事项）	109	29.8
健康核心理念认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111	30.3
老年健康细分知识（口腔问题护理）	90	24.6
儿童健康细分知识（龋齿预防）	49	13.4
关键知识盲区（艾滋病传播途径）	87	23.8

（三）健康科普普及情况和数字资源覆盖情况

健康科普普及率显示，知识获取渠道以数字化平台为主，以传统渠道为补充，形成多元格局。另外，受访者对健康知识的获取呈现“数字化主导、多渠道补充”的特征，但在获取主动性、专业渠道覆盖及内容适配性上存在明显短板。渠道选择上，数字化平台

表 3 健康科普数字资源形式情况

健康科普数字资源形式	人数	%
短视频（如抖音、快手等）	275	75.14
微信公众号文章	198	54.10
科普音频（如广播剧、讲座录音等）	179	48.91
在线图文手册	147	40.16
科普直播	104	28.42
其他	2	0.55

表 4 健康知识价值认可情况

健康知识价值认可维度	人数	%
非常有用	147	40.16
比较有用	145	39.62
一般有用	66	18.03
不太有用	5	1.37
完全没用	3	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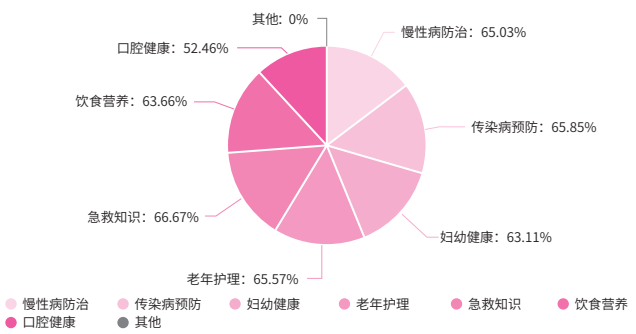


图 1 希望增加的健康科普数字资源的内容

成为绝对主流，便捷性和趣味性成为核心优势。而传统渠道作为补充，形成多元覆盖网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在获取习惯与价值认可方面，近七成受访者有定期获取的习惯，超八成受访者认可其实用性，内容贴合需求。反观健康知识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着专业科普渠道覆盖不足，老年、低文化群体重视度和参与度低，内容适配性不足等问题。受访者反映现有科普形式单一，并希望增加妇幼保健、老年护理、慢性病饮食营养等科普知识（见图 1）。

四、调查结果分析及建议

（一）健康知识知晓率失衡，基础扎实但细分领域短板突出

茂名乡村地区健康知识知晓率呈“模块分化”，基础认知较强，但用药规范、饮食禁忌等深度知识不足，形成“基础强、深度弱”结构失衡。科普内容存在“城市导向重、本土适配低”问题，照搬城市模板，农药残留防护、井水安全等农村议题覆盖不足，且未分层设计。因此，应由当地高校牵头，联合村乡级党政机关，制作“疾病识别 + 基本预防”口袋手册，以通俗表述替代专业术语并配插图；针对慢病患者、孕产妇等开发《高血压用药指南》《新生儿护理图解》等专项资源；编写《本土健康风险应对手册》，满足农药防护、田间急救等农村需求；将医学知识转化为方言口诀，制作 3 分钟内动画短视频，提升不同群体的获取效率。

（二）科普传播渠道适配性差，渠道多元但精准度不足

茂名乡村健康知识获取渠道多元，但适配性差、精准度不足。其中，60 岁以上群体中 72.1% 偏好传统渠道，19~30 岁群体依赖数字化渠道；专业渠道覆盖不足，26.78% 的老年人存在数字障碍。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建议构建分众化渠道矩阵：优化村广播方言音频科普、宣传栏月更海报等传统渠道；打造“茂名乡村健康”短视频 / 微信公众号，设评论答疑；村医对慢病患者、孕产妇等进行“一对一”月指导；乡镇每月举办村级讲座；简化科普 App 界面，设“方言模式”；建“茂名乡村健康科普数据库”；乡镇组织志愿者每月培训智能设备使用方法。

（三）科普服务覆盖空白，整体覆盖广但关键领域缺失

茂名乡村科普服务关键领域存在空白。据调查，妇幼保健科普需求率为 53.01%，但村级服务存在空白；偏远山村交通不便，村民参与科普活动困难。同时，乡村农民工职业病防护覆盖不足、老年人和低文化群体获取科普信息频率低，也是乡村科普服务较为显著的问题。因此，建设村级“妇幼健康服务站”，配备专项资料，乡镇医护每月上门指导并建档；开发《农药防护手册》《田间急救技巧》，在农忙季节村医科普员田间进行“碎片化科普”；开展“老年健康周”活动，提供体检、咨询与照护手册；组建“流动科普队”进入偏远村；建村级科普微信群实时答疑；向老年 / 低文化群体推荐科普音频、上门发放简易手册，每季度进行“拉家常式”访谈。

（四）科普协同机制缺失，单一供给多但合力未形成

茂名乡村科普协同机制缺失，依赖村“两委”与卫生院单一供给，高校专业资源参与度低，社会志愿服务常态化不足，明显缺乏本土科普人才。所以，当地政府应主导设立专项基金，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将覆盖率与知晓率纳入考核；依托村卫生室建设标准化科普点；本地高校组建含医生、专家、学生、方言学者的研发团队，开发方言短视频、互动手册等资源；对接省级项目，组织医护 / 高校志愿者每月开展“双培训”；选拔村医、退休医护、乡贤为“村级科普员”并定期培训；多渠道收集需求，高校团队针对性更新内容，形成“需求—开发—传播—反馈”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茂名乡村地区健康科普知晓率低、需求迫切，文化程度与自评健康状况为主要影响因素，现有资源存在“内容不适配、渠道单一化、数字覆盖低”的问题。建议依托“百千万工程”，构建协同科普模式，聚焦慢病管理、妇幼保健等核心需求，开发本土化、分众化资源，通过“传统 + 数字”双路径传播，助力健康素养提升与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茂名市统计局 . 2023 年茂名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4-04-30)[2025-11-28]. https://www.mm111.net/2024/04/30/991407985.html.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2020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 [J]. 中国健康教育 , 2021, 37(08): 677-680.

[3]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EB/OL]. (2023-02-27)[2025-11-28]. https://drc.gd.gov.cn/qtwj/content/post_4101218.html.

[4] 李静 , 王浩 , 陈晨 . 我国农村地区健康科普知识需求及影响因素 Meta 分析 [J]. 中国公共卫生 , 2023, 39(04): 598-602.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2025-11-28].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茂名市 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共建项目“基于‘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的健康科普资源开发与传播策略研究”（2025GJ56）。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关系研究

金 蕊 赵 雪

摘要：目的：评估初中生疏离感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青少年疏离感问卷》对自贡市某中学的852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初中生自尊的平均分为30.259±5.666，初中生疏离感的平均分为130.996±57.866。初中生自尊和疏离感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r=−0.755，P<0.01），初中生的自尊能负向预测疏离感。**结论：**初中生整体的自尊水平中等偏上，整体的疏离感中等偏下。初中生自尊水平越高，疏离感越低；反之，亦然。

关键词：自尊；疏离感；初中生

一、引言

疏离感作为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指的是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等各种关系网络之间，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了社会孤立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自我疏离感等消极的情感[1-2]。

自尊是个人对自己的积极或消极态度，是对社会角色自我评价的结果，反映了他们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3]30。有研究表明，自尊与疏离感之间关系密切[4]。

青春期是疏离感发生的高危时期[5]，疏离感与青少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6-7]。

本研究以初中生作为被试，旨在了解初中生疏离感的现状，并进一步探讨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相关关系。这对维护初中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为完善初中生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式，于2025年4—5月，对自贡市某中学的初中生发放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52份。

（二）研究工具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采用罗森伯格于1965年编制的自尊量表，量表共10道题目，单一维度[3]115-160。采用Likert 4点计分，得分越高，则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7，信度较好。

《青少年疏离感问卷》：采用杨东等于2002年编制的《青少年疏离感问卷》，该量表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共52个项目，其中有6个项目为测谎题[2]412。采用Likert 7点计分，得分越高则疏离感越强。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2、0.928和0.837，总问卷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5，信度较好。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26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初中生自尊、疏离感的得分状况

本研究中初中生自尊、疏离感的得分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初中生自尊、疏离感的得分状况

	M	SD
自尊	30.259	5.666
社会疏离感	71.413	32.879
人际疏离感	40.078	18.780
环境疏离感	19.505	8.865
疏离感总分	130.996	57.866

初中生自尊的平均分为30.259±5.666，自尊水平较高。初中生疏离感的平均分为130.996±57.866，疏离感水平较低。

（二）初中生自尊、疏离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中初中生自尊、疏离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如表2所示。

初中生的自尊在性别（t=4.252，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自尊得分低于男生。初中生的自尊在年级（t=8.736，P<0.01）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年级学生的自尊得分低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初中生的自尊在是否为独生子女（t=0.914，P>0.05）上差异不显著。初中生的自尊在是否有留守经历（t=-2.657，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有留守经历的学生低于没

有留守经历的学生。

初中生的疏离感在性别（t=–4.420，P<0.01）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在疏离感及其分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初中生的疏离感在年级（t=4.329，P<0.05）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疏离感、环境疏离感和疏离感总分上初一年级组得分均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组，且初二年级组得分高于初三年级组；但在人际疏离感维度，初一年级组得分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组，初二年级组得分低于初三年级组。初中生的疏离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t=–0.910，P>0.05）上差异也不显著。初中生的疏离感在是否有留守经历（t=4.057，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有留守经历的初中生在疏离感总得分及其分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初中生。

（三）初中生自尊和疏离感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方法对初中生自尊和疏离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自尊与疏离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见表 3）。

（四）初中生自尊对疏离感的回归分析

将自尊作为自变量，疏离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自尊可以显著预测疏离感，自尊能够解释疏离感 57% 的变异量（R^2=0.570）（见表 4）。

四、讨论

（一）初中生自尊的基本情况及差异分析

初中生自尊的平均分为 30.259±5.666，自尊水平较高。初中生的自尊在性别（t=4.252，P<0.01）、年级（F=9.736，P<0.01）、是否有留守经历（t=–2.657，P<0.0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t=0.941，P>0.05）没有显著差异。

女生自尊得分低于男生。相较于男生，可能是青春期的女生情绪感知更为细腻和敏感，在应对学业竞争、人际交往及外界评价等方面的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这就使得自我中心矛盾突出，更容易陷入内耗，产生自卑感。

初一年级学生的自尊得分低于初二、初三年级学生。可能是因为初一阶段学生还处于对新环境的适应当中，缺乏安全感，对周围的环境还没有适应，对很多事情力不从心，到了初二和初三时，随着逐渐熟悉和适应初中的环境和生活，心理状态趋于稳定，自尊水平随之提高。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自尊没有显著差异。随着现代父母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获得更为平等的对待，两者在自尊水平上的差异被弱化。

有留守经历的初中生自尊得分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学生。留守期间，学生大多和家里的老人在一起生活，老人更多的是照顾其生活，往往会造成对儿童情感的忽视，使儿童难以形成安全感，导致产生更强烈的自卑感[8]。

（二）初中生疏离感的基本情况及差异分析

初中生疏离感的平均分为 130.996±57.866，疏离感水平较低。初中生的疏离感在性别（t=–4.420，P<0.01）、年级（t=4.329，P<0.05）、是否有留守经历（t=4.057，P<0.0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t=–0.910，P>0.05）上没有显著差异。

国家实施素质教育，重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此，学校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并组织到各地进行研学活动，使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与自然。另外，初中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内度过，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他们可以在学校生活中获得相应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满足感。因此，本研究显示，初中生的疏离感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在疏离感上差异显著，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有一些不同，以往研究中大多认为男生的疏离感得分要高于女生[9–1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疏离感的总分还是分维度的分数，女生都高于男生。可能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感性，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细微变化，加上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容易体验到被拒绝和排斥的感受，从而产生疏离感。另外，随着社会观念的逐步变化，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越来越高，她们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们经受着与男性同样的考验，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和隐形的不公平存在。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疏离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年级组得分高于初二、初三年级组。其原因可能是在适应陌生环境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初一学生进入新环境，对一切

表 2 初中生自尊、疏离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项目	类别（N）	自尊	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	环境疏离感	疏离感总分
性别	男（420）	32.088±5.700	66.341±32.060	37.150±18.489	18.712±8.893	122.202±56.994
	女（432）	29.454±5.521	76.345±32.950	42.924±18.523	20.273±8.778	139.542±57.490
	t	4.252**	–4.490**	–4.553**	–2.579*	–4.420**
年级	初一（310）	29.207±5.443	75.981±33.256	42.181±18.135	20.423±8.780	138.584±57.332
	初二（306）	30.739±5.701	69.330±32.230	38.817±18.727	19.500±9.049	127.647±57.244
	初三（236）	30.259±5.666	68.114±32.681	38.949±19.292	18.301±8.622	125.364±58.554
	t	8.736**	4.837**	3.094*	3.864*	4.329*
独生子女	是（211）	30.569±5.673	70.147±32.073	38.687±18.717	19.014±8.627	127.848±56.901
	否（641）	30.158±5.664	71.830±33.153	40.535±18.713	19.665±8.942	132.030±58.187
	t	0.914	–0.645	–1.244	–0.924	–0.910
留守经历	有（281）	29.527±5.635	77.580±33.502	43.719±19.638	21.057±9.087	142.356±59.383
	无（571）	30.620±5.651	68.378±32.165	38.286±17.999	18.739±8.659	125.403±56.321
	t	–2.657**	3.872**	4.018**	3.614**	4.057**

注：*P<0.05，**P<0.01。

表 3 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相关分析（r）

项目	1	2	3	4	5
1. 自尊	1.000	−0.767**	−0.714**	−0.574**	−0.755**
2. 社会疏离感		1.000	0.902**	0.809**	0.984**
3. 人际疏离感			1.000	0.775**	0.954**
4. 环境疏离感				1.000	0.864**
5. 疏离感总分					1.000

注：**P<0.01。

表 4 初中生自尊对疏离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β	t	P
		B	标准误			
疏离感	自尊	0.755	0.570	−0.755	−33.536	0.000
	R^2	0.570				
	F	1124.631**				

注：**P<0.01。

还不是很熟悉，加上初中的学习模式与小学完全不同，学生要同时应对环境适应与学业转型的双重挑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和调整，因此初一时学生的疏离感得分较高。随着时间的增长，学生对周围的环境和学习渐渐适应，逐渐有了归属感，因此疏离感逐渐减弱。此外，学校对初一学生在行为规范等方面管理比较严格，学生感受到较强的学校管制 [11]。

疏离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更多的是与同学和老师学习和生活在一起，即便是非独生子女与其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也会相应地减少。同样地，即便是独生子女，也不会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产生孤独感。因此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其疏离感程度影响不大。

留守中学生的疏离感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中学生。父母的缺席通常会给他们造成情感损失，中学生本身就处于一个身心飞速发展的时期，留守所带来的亲情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学生 [12]，爷爷奶奶等祖辈难以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学生也无法及时向父母倾诉，最终造成个体产生疏离感 [13]。

（三）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的关系

初中生自尊与疏离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初中生自尊能负向预测疏离感。自尊水平越高，疏离感得分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14]。

自尊水平高的学生也意味着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帮助他人。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使他们更愿意接纳自我、主动接近他人并融入环境，与他人保持亲密联系，因此较少感到疏离 [15]。而自尊水平低的学生则往往对自我评价较低，在面对挑战时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多采取退缩或被动的应对方式。这种消极互动模式使他们难以维系正常的人际关系，容易与他人和环境产生距离感，从而体验到更强的疏离感 [16]。

五、结语

初中生自尊和疏离感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初中生的自尊能负向预测疏离感。初中生自尊水平越高，疏离感越低。且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自尊、疏离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可以构建差异化的课程体系，基于不同类型初中生的特点，实施精准化的干预措施以降低其疏离感。笔者在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中学心理课并非面向所有年级开展，由于学业压力等现实因素，一般是以初一年级开课为主，只有部分学校初二年级有开课，初三年级基本没有开课。并且课堂开展大都以教学形式进行，团体辅导等活动课程少有出现。在时间安排上，学校可以分单双周上课，针对初二和初三可以两周上一次课。充分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有些学校在课后服务时会安排一些社团活动，可以分年级开设心理社团。在形式上，不只局限于心理课的理论讲解，可以穿插一些室外活动课、团体辅导，也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讲座，以提高初中生的自尊水平，降低初中生的疏离感，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 杨东，吴晓蓉 . 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构建 [J]. 心理科学进展，2002(01): 71−77.

[2] 杨东，张进辅，黄希庭 .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 [J]. 心理学报，2002(04): 407−413.

[3] 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陈晨，陈光华 . 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对高中生攻击性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J]. 中国特殊教育，2016(10): 78−84.

[5] SANDHU D, TUNG S. Contribution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owards adolescents' alienation[J]. Pakist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04, 19(1−2): 1−14.

[6] 魏义承，徐夫真 . 留守初中生学业适应与教师 / 父母期望知觉、学校疏离感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 27(10): 1559−1564.

[7] 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 . 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2019, 42(05): 1106−1112.

[8] 王玉花，孙兵 . 留守初中生心理弹性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间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学校卫生，2018, 39(02): 292−295.

[9] 钱荣 . 大学生疏离感及其与人际信任、家庭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10] 魏欢 . 青少年疏离感发展的实证研究 [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11] 李文正 . 中学生疏离感及其家庭功能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2.

[12] 孔祥军，刘艺，赵启会，等 . 农村（下转 65 页）

在职校班级实施学生“5+N”自主管理的策略

颜仁明

摘要：在“五育并举”背景下，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策略。本文首先梳理蔡元培“五育并举”理念的历史传承，随后探讨该理念下职校育人方法的创新与实践，并系统提出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的理念框架与目标定位。最后，从实践层面提出“5+N”自主管理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组建“5+N”自主管理学生团队、建设特色班级文化、推行量化评价制度等。通过以上举措，构建“五育并举”视域下的班级自主管理体系，切实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为职校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系统化、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5+N”自主管理模式；“五育”融合教育；“德育为本”育人理念

一、传承蔡元培“五育并举”理念

纵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育家蔡元培以其深邃的思想指引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他首倡“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这五大教育领域不可偏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石。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创新，是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发展的和谐统一，是个体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至高境界。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文件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强调了要遵循教育规律，以教师队伍为基石，通过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纲领性文件，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教育本质的探索。

2021 年 9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绥德实验中学的讲话，更是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提升到了新时代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孩子们要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这不仅仅是对青少年的期望，同时也是对所有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探索“五育并举”理念下职校育人方法

（一）“五育并举”在班级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在新时代，“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为教育改革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五育并举”理念已深度融入到班级管理中，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班级管理是学校管理体系的基石，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等，都有赖于班级管理。如何管理好班级，校领导、班主任及任课教师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教育视野，需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教育工作者要运用先进的管理模式与方法，要使其适合职校学生

（上接 64 页）留守初中生疏离感与自我伤害的关系研究 [J]. 中国西部科技 , 2014, 13(02): 124−125.

[13] 李赛兰，庭艳 . 海南省医学生疏离感与家庭功能、自尊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 2017, 25(08): 4.

[14] 侯积良 . 自我与亲社会行为 [J]. 心理科学 , 1991(04): 48−53.

[15] 许春杏 , 张雨晴 , 蒙永彩 , 等 . 青少年自尊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 :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J]. 心理月刊 , 2024, 19(21): 28−31, 35.

[16] 任菲菲 , 张景焕 . 大学生疏离感的发展现状及其与自尊的关系 [J]. 山东省团校学报 : 青少年研究 , 2012(02): 40−43.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的身心特点与成长需求。他们不仅要精通专业知识，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还要在日常班级管理中把“五育并举”理念浇灌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像春雨一般滋养着每一位学生，保证在班级中立德树人任务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使其具备专业技能和高尚品德，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

（二）职校学生的特性与成长需求

职校学生是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充满活力，也面临一些挑战，怀揣着对精湛技艺的无限向往，憧憬着未来美好的职业生涯，毅然选择职业教育这条道路。职校学生在学习方面有积极性与探索欲，但在学习的同时，自觉性不够稳定，不同个体的行为习惯差异较大。处于青春期的他们，有着多变的心理状态，他们渴望在新学校中展现自我、希望得到认可，又可能因成绩、家庭等原因而暗藏自卑情结。因此，职业教育需因人而异，要不拘一格培育人才，不仅要传授他们专业技能，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塑造其道德品质，强健其体魄，培养其审美情趣，助力每位学生全面发展，让每位学生都有光明的未来[2]。

（三）职校教育对“五育并举”的深化实践

职业学校不同于普通高中，其肩负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大使命，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在新时代，职校教育需贴合时代，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职校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深耕细作，加强专业技能的传授，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日常教育中，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用智育启迪思维，用体育锤炼体魄，用美育陶冶情操，用劳动教育培养勤劳品质。“五育并举”，相互渗透，构建一套系统科学、高效的育人体系，为社会输送更多具有专业技能，具备高尚品德、强健体魄、审美情趣和劳动精神的多层次复合型人才[3]。

（四）“五育并举”在职校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弊端

在职校教育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五育并举”虽被寄予厚望，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职校学生在学习成绩、品德素养等方面差异显著，这给全面育人的实施带来了极大挑战。一方面，部分学生因学习成绩差，在知识学习和技能掌握上存在明显困难，对智育与专业技能教育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学生品德素养的参差不齐，使得德育工作的开展显得步履维艰，统一的价值观导向难以形成。

在课堂学习、社会实践这些“五育”融合的关键环节，不同学生的参与程度与全身心投入程度大相径庭。一些学生积极参与，从中受益，实现全面发展；另一些学生则因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或缺乏资源，难以获得足够的锻炼机会，各方面得不到提升。学生之间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不仅削弱了“五育并举”教育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更是让“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在实际操作中收效甚微[4]。

三、提出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理念

笔者提出的“5+N”自主管理教育理念，是在“五育并举”的视野下，开创职校学生的自我管理体系。其中的“五育”，可以理解为品德、学习、体育、审美和劳动教育五个方面，它们交融在一起，是素质教育的基础。职校学生的自主管理，是在教师的悉心指引下，让学生自己成为管理的核心主体，通过学生的自我约束、自我驱动、自我教育，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明确未来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为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提出的“5+N”自主管理模式，“5”是五个关键角色的代表，分别代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并引领学生全面发展各种素养。而“N”则是学习过程中的各位小组长，他们组合自由，形成5人或者6人的小组，促进团队成员间的协作和成长。构建这一模式，是对职业学校学生“五育并举”培养目标的深入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运用了团体动力学的原理。通过组织管理团队，建设班级文化，量化评估体系，我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学生自主管理方案。这套方案不仅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更是对“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原则的具体实践，为职校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设立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的目标

（一）开辟“五育”融合并进的班级管理新路径

实现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的目标，需要构建全面的育人评价体系，该体系依托“五育并举”的框架，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制度，量化的考核体系，确保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五育”活动，学生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和实践，力争做到在德育中铸魂，在智育中寻美，在体育中强身，在劳育中寻乐，在美育中展翼，在班级管理中逐步实现“五育”的和谐共生与同步发展。

（二）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管理新模式

在团体动力学原理的基础上，我们将个人成长、团队协作与班级组织三者进行紧密融合，打破传统教育管理理念的束缚，探索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管理运作模式。此机制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精神，提升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增强学生的班级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进而在班级内部营造积极健康、充满活力和团结互助的氛围[5]。

五、实施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策略

（一）组建“5+N”自主管理学生团队

通过学习团体动力学原理，我们知道了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只能在团体中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我们围绕学生“德智体美劳”素养的发展目标，以团体动力学的理念为

指导，组建了“5+N”自主管理学生团队，这 5 名负责人由班级同学选举产生，小组长则不固定，由学生志愿者担任，小组长们在确保平衡的前提下，将 5 至 6 名同学志愿者组成小组。这种团队构建方式，能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与学生的自我管理，推动班级的发展与进步。

（二）建设“5+N”自主管理特色班级文化

1. 德育铸魂

德育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具备高尚情操、坚定信念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技能型人才能够通过德育培养出来。通过开展班会课、主题活动日等活动，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班级可举办小型“红色故事分享会”，让学生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通过举办法治教育活动，使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

2. 智育提能

丰富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使他们具备更强的社会竞争力。班级的学风至关重要，我们要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如教育部门主办的科技节、创新创业大赛等。智育考核不仅要考核学生的成绩，还要考核学生的参与度。同时，通过建立学分制，营造早学、多学、快学的学习氛围。

3. 体育强身

我们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体育老师要在体育委员的协助下，对学生进行体质监测和个性化指导，尽可能使学生体质达标。学校还可以举办体育节、社团活动等，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展现体育风采。对于体育特长生，我们还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校队训练机会和参赛机会，帮助他们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4. 美育塑造

我们通过美育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情操，让学生在美育活动中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通过开设艺术选修课，组织工作室体验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让学生参与各类比赛，如书法比赛、绘画展等。还可以举办合唱比赛、青歌赛、春联书写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提升美育素养。

5. 劳育育德

我们要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使劳动常规化、特色化、榜样化，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快乐，展现技能。通过布置简单的劳动任务，如维护班级卫生、校园打扫等，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快乐。同时，邀请当地的劳动模范进校园宣讲，让学生了解劳模及其事迹，树立劳动榜样。

（三）推行“5+N”自主管理量化评价制度

1. 完善评价体系

想要确保班级管理的有序进行，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化评价体系。班级量化评价体系为班级管理提供明确的标准和依据。在《班级“五育”量化考核细则》中，各项管理内容具体化、精细化，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注重学生的参与，让学生参与考核细则的制定和讨论 。在量化考核中，我们要将“五育”细化，将抽象内容转化为细化的条目和具体的分值，便于学生理解和执行。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在活动安排和考核上注重个体差异，鼓励每位学生立足基础，实现全面发展。通过有效的班级管理，推动学生“五育”素养的不断提升。

2. 量化考核细则

为更好地制定《班级“五育”量化考核细则》，我们需高度重视日常记载工作。考核细则涵盖“五育”五个方面，遵循公正公平原则，五位负责人详细记录各项得分，以表格和图表的形式进行呈现。实行日结、周结、月结、期末总结的制度，并确保考核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同时，及时发布量化结果，以供学生查询。通过表格和图表，教师能够细致掌握学生个体的情况，又能宏观把握班级的整体情况，为学生提供精准指导。

3. 营造竞争环境

职校学生更渴望得到认可和肯定。班主任应把握学生的心理动向，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选出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学期的“优秀学生之星”，在班级内进行表彰，并通过口头表扬、颁发荣誉证书和小奖品等，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考核指标分为基础分和附加分，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完成规定任务和活动获得基础分，部分学生则通过更多努力参与更多活动，争取获得附加分。这样的奖励机制有助于在班级内形成健康、积极的竞争氛围，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飞 . 论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教学范式转型 [J]. 当代教育科学 , 2022(07): 33-40.

[2] 江丽丽 . 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的内涵、目标及实施策略 [J]. 职业 , 2024(02): 94-96.

[3] 浦爱华 . “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研究 [D]. 大庆 : 东北石油大学 , 2021.

[4] 高晓丽 . “五育并举”背景下加强高校劳动教育的内在依据与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20(10): 97-101.

[5] 雷婷 , 林继东 , 廖子龙 . “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体育强身”计划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阐释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 2024, 39(05): 140-14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江苏省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职校学生‘5+N’自主管理的实践研究”（22B01QTWX35）。

（作者系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

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模式的比较研究

倪　燕　张晴晴*

摘要：目的：调查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员技能现状，探索有效培训模式。**方法：**选取南京市 6 家养老机构的 180 名护理员，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90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培训模式，干预组采用情景模拟结合实操训练与视频学习的综合培训方式，培训频次为每周 4 小时，持续 8 周。评估指标包括技能掌握程度、培训满意度、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和护理服务质量评分。**结果：**干预组总体培训满意度为 9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7%（P<0.01）；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为 85.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8.9%（P<0.05）；护理服务质量总评分为（84.2±6.8）分，优于对照组的（78.5±7.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情景式实操培训模式可有效提升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服务品质。

关键词：失能失智；养老护理员；服务技能；培训模式；需求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持续增长，养老护理员的专业技能水平成为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养老护理员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偏低、专业培训不足等问题，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在应对复杂护理情况时显得捉襟见肘[1]。失能失智老人常伴有认知功能障碍、行为异常、情绪波动等多重问题，对护理员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而现有培训体系却难以提供有效支撑。从成人学习特点出发，护理员群体更适应直观、参与度高的实践型学习方式，单纯依靠理论授课的效果有限。因此，构建贴近实际工作需求、符合学习特点的情景式培训模式，对于提升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资料及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南京市 6 家具有失能失智专区的养老机构作为研究场所，具体包括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鼓楼区福利院、建邺区养老院、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浦口区养老服务中心、栖霞区福利院。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在失能失智区域从事护理工作满 6 个月，年龄在 18 至 60 周岁之间，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包括：患有严重影响工作能力的疾病，以及计划在近期离职或调岗的人员。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共纳入 180 名养老护理员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年龄范围为 19~60 岁，平均年龄为（52.4±8.6）岁，其中女性 156 名，男性 24 名，以女性为主。学历构成如下：小学及以下 42 名，初中 90 名，高中或中专 48 名，初中学历占多数。工作年限为 1~15 年，平均工作年限为（4.8±3.2）年。

（二）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调查阶段运用自制问卷收集护理员基本信息和技能现状，问卷涵盖人口学特征、工作背景、护理技能自评、培训经历、培训需求 5 个维度共 45 个条目，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6，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将 180 名护理员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90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培训模式，包括理论讲授、技能演示、师傅带徒等方式。干预组则体验情景式实操培训模式，其核心在于模拟真实养老机构环境，构建贴近实际工作的护理场景。护理员在这种仿真环境中反复练习各项操作，配合制作的技能小视频随时查看学习要点。两组培训时间相同，均为每周 4 小时，持续 8 周。

情景式培训内容涵盖五大核心模块：“生活照料”模块重点训练进食协助、排泄护理等基础技能；“基础护理”模块强化体位变换、褥疮预防等专业操作；“安全防护”模块突出跌倒预防、走失防范等应急处理技能；“心理疏导”模块教授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方法；“康复训练”模块指导肢体功能锻炼和认知训练技术。每个模块都结合失能失智老人的实际特点，让护理员在模拟情境中掌握应对策略。

（三）观察指标

本研究设置 4 个观察指标评估培训效果。

护理技能掌握情况：采用技能操作考核量表进行

评估，包括基础护理技能、专业护理技能、应急处理技能三个维度，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技能掌握越好。

培训满意度：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价，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效果、培训组织四个方面展开，采用 5 级评分法，总体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

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统计护理员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通过情况，包括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的通过人数和通过率。

护理服务质量：采用服务质量评价量表，由失能失智老年人或其家属对护理员的服务态度、专业技能、工作效率、沟通能力等方面进行评分，总分 100 分。

（四）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5.0 软件处理数据。连续性变量用 $x^2 \pm s$ 描述，两组间差异检验使用 t 检验；分类变量用频数（构成比）描述，组间差异检验使用 x^2 检验。设定 $\alpha=0.05$ 为检验水准。

二、结果

（一）养老护理员基本技能掌握情况分析

对参与研究的 180 名养老护理员进行培训前基线评估发现，其专业技能掌握程度整体偏低且不均衡。基础护理技能各项目掌握率介于 34.4%~60%；专业护理技能掌握率普遍较低，分布在 15.6%~37.2% 之间；应急处理技能掌握率相对较好但仍有不足，如表 1 所示。

表 1 养老护理员基本技能掌握情况 [n(%)]

技能类别	技能项目	熟练掌握人数（n）	掌握率（%）	x^2	P 值
基础护理技能	体位变换技术	62	34.4	18.46	0.008
	褥疮预防护理	74	41.1	12.67	0.013
	协助进食	95	52.8	3.56	0.059
	排泄护理	89	49.4	5.12	0.024
	个人卫生护理	108	60.0	7.20	0.007
专业护理技能	失智症行为识别	51	28.3	32.04	<0.001
	认知训练方法	35	19.4	56.25	<0.001
	心理疏导技巧	28	15.6	67.24	<0.001
	康复训练指导	43	23.9	42.01	<0.001
	用药管理	67	37.2	21.78	<0.001
应急处理技能	跌倒处理	121	67.2	21.78	<0.001
	急救技能	106	58.9	7.56	0.006
	走失防范	77	42.8	12.80	0.012
	暴力行为应对	57	31.7	29.16	<0.001
	突发疾病处理	84	46.7	9.80	0.017

（二）培训满意度评价对比分析

培训结束后，两组护理员在满意度评价上呈现显著差异。干预组总体满意度为 9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7%，培训方式和效果评价差异明显，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护理员培训满意度对比 [n(%)]

评价维度		干预组（n=90）	对照组（n=90）	x^2	P 值
培训内容满意度	非常满意	42(46.7)	28(31.1)	8.46	0.037
	满意	38(42.2)	36(40.0)		
	一般	8(8.9)	18(20.0)		
	不满意	2(2.2)	6(6.7)		
	非常不满意	0(0.0)	2(2.2)		
培训方式满意度	非常满意	48(53.3)	22(24.4)	15.62	<0.001
	满意	34(37.8)	47(52.3)		
	一般	6(6.7)	15(16.7)		
	不满意	2(2.2)	4(4.4)		
	非常不满意	0(0.0)	2(2.2)		
培训效果满意度	非常满意	45(50.0)	24(26.7)	12.84	<0.001
	满意	33(36.7)	37(41.1)		
	一般	10(11.1)	21(23.3)		
	不满意	2(2.2)	6(6.7)		
	非常不满意	0(0.0)	2(2.2)		
总体满意度	非常满意	41(45.6)	25(27.8)	9.73	<0.001
	满意	41(45.6)	44(48.9)		
	一般	6(6.7)	15(16.7)		
	不满意	2(2.2)	4(4.4)		
	非常不满意	0(0.0)	2(2.2)		

（三）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率统计分析

在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结果方面，干预组总通过率为 85.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8.9%，中级证书通过率和实操考试成绩差异显著，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考取情况对比 [n(%) / $x^2 \pm s$]

考试类别		干预组（n=90）	对照组（n=90）	x^2/t	P 值
总体通过率		77(85.6)	62(68.9)	6.89	0.032
证书等级分布	初级证书	51(56.7)	46(51.1)	0.56	0.454
	中级证书	23(25.6)	14(15.6)	2.87	0.042
	高级证书	3(3.3)	2(2.2)	0.21	0.647
	未通过	13(14.4)	28(31.1)	6.89	0.032
分项考试通过情况	理论考试通过	81(90.0)	76(84.4)	1.25	0.264
	实操考试通过	82(91.1)	71(78.9)	4.52	0.034
	一次性通过	65(72.2)	51(56.7)	4.61	0.032
	补考通过	12(13.3)	11(12.2)	0.05	0.823
考试成绩分析	理论考试成绩（分）	82.4 ± 8.6	78.9 ± 9.2	2.67	0.008
	实操考试成绩（分）	86.7 ± 7.4	81.2 ± 8.9	4.52	<0.001
	总成绩（分）	84.6 ± 6.8	80.1 ± 7.5	4.23	<0.001

（四）护理服务质量评估对比分析

在护理服务质量评价上，干预组在各项评分及总

分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组总体服务质量评分为 84.2 ± 6.8 分，优于对照组的 78.5 ± 7.3 分，护理安全性指标显著改善，如表 4 所示。

表 4 两组护理员服务质量评估对比 ($x^2 \pm s$)

评估指标		干预组（n=90）	对照组（n=90）	t 值	P 值
服务态度评分		87.3 ± 5.8	82.1 ± 6.4	5.68	<0.001
专业技能评分		84.6 ± 6.2	78.8 ± 7.1	5.89	<0.001
工作效率评分		83.7 ± 6.9	79.2 ± 7.8	4.12	<0.001
沟通能力评分		85.1 ± 6.5	80.3 ± 7.2	4.72	<0.001
护理安全性评分		86.4 ± 5.7	81.6 ± 6.8	5.12	<0.001
服务满意度评分	老年人满意度	88.2 ± 6.1	83.4 ± 7.3	4.81	<0.001
	家属满意度	85.9 ± 6.8	80.7 ± 7.5	4.95	<0.001
	同事评价	82.1 ± 7.2	77.8 ± 8.1	3.84	0.002
	管理者评价	86.7 ± 5.9	81.2 ± 6.7	5.98	<0.001
护理质量指标	护理差错发生率（%）	2.8 ± 1.2	5.1 ± 1.8	−9.74	<0.001
	老年人跌倒发生率(%)	1.6 ± 0.8	3.2 ± 1.4	−9.12	<0.001
	护理投诉次数（次 / 月）	0.3 ± 0.5	0.8 ± 0.7	−5.23	<0.001
总体服务质量评分		84.2 ± 6.8	78.5 ± 7.3	5.41	<0.001

三、讨论

专业护理技能掌握率不足 30%，凸显了传统培训模式在应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复杂照护需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反映出当前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传统培训模式难以满足失能失智照护工作的特殊要求，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需求具有多变性，认知障碍导致的异常行为、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复杂的身体状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复杂的护理图景 [2]。护理员面对这样的挑战，仅凭传统的“看师傅做，跟着学”显然力不从心。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解情景式培训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依据。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建构的。这一观点恰好揭示了传统培训模式的不足。养老护理员群体有着鲜明的学习特征，年龄偏大让他们更依赖经验学习，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使他们更偏爱直观形象的教学方式 [3]。情景模拟培训恰好迎合了这些特点，让抽象的护理知识变得触手可及。配套的视频资源更是贴心设计，解决了“当时学会，过后就忘”的普遍难题。

培训满意度的大幅提升折射出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过去的培训多是“填鸭式”理论灌输，护理员坐在下面听讲，培训效果自然有限 [4]。情景式培训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让护理员成为学习过程的中心，在模拟环境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反复实践。这种转变不仅是方法上的创新，更是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当学习者真正参与进来时，内在的学习动力被激活，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的组间差异，揭示了技能培养的内在规律。干预组实操考试成绩的显著提升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技能来自反复地实践。传统培训往往重理论轻实践，护理员虽然能够熟练地说出操作步骤，但一到实际操作就露怯 [5]。情景式培训让护理员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反复练习，技能掌握自然更加扎实。中级证书通过率的提升尤其值得关注，这与护理员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护理服务质量的全方位改善体现了技能培训的溢出效应。当护理员真正掌握了专业技能，工作起来更有章法，服务态度也随之改善。护理差错的减少、老人跌倒率的下降、褥疮发生率的降低，这些量化指标背后，是护理员专业素养的实质性提升。老人和家属满意度的提高更是让人欣慰，说明培训效果真正惠及了服务对象。

本研究结果为优化我国养老护理员培训模式提供了实证依据。情景式培训的显著效果表明，其标准化推广已具备实践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培训内容设计必须紧贴失能失智群体的真实需求，这种贴合度直接决定了培训的实用价值。单纯的理论灌输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实践导向的体验式学习才是未来的方向。护理员需要在仿真环境中反复磨炼，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照护场景中游刃有余。政策层面的支持亦不可或缺，将情景式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标准体系，配套相应的资源投入，通过顶层设计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养老护理服务的专业化转型，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成长机制。实践能力应当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真实技能水平比书面成绩更有说服力。职业发展通道是否畅通，直接影响从业者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归属感。将技能等级认定与薪酬激励待遇、职业晋升相衔接，能够有效激发内在动力。师资力量建设更是重中之重，理论功底扎实、实战经验丰富的培训师资源稀缺，培养这样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下真功夫。区域协作平台的搭建有助于打破资源壁垒，让优质培训资源发挥更大效用，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 徐静 . 养老机构长期照护服务困境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4.

[2] 李懿 , 杨茜 .ICARE 理念对县级敬老院养老护理员失能照护能力及职业精神与态度的影响 [J]. 卫生职业教育 , 2024, 42(07): 122−125.

[3] 万凯莹 . 基于组合预测模型的广西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护理员需求量预测研究 [D]. 南宁 : 广西中医药大学 , 2023.

[4] 林雅妹 . 失智失能老人照护需要专业机构托底养老护理将成为释放消费潜力新产业新动能 [J]. 上海商业 , 2020(11): 22−25.

[5] 唐莹 , 周涛 . 湖南省养老护理人力资源调查研究 [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0, （下转 71 页）

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异化风险与引导策略

刘芳彤

摘要：青年婚恋观是青年对恋爱和婚姻基础问题的看法，与恋爱、婚姻行为密切相关，它不仅决定青年的恋爱与婚姻生活模式，还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多元价值的冲击和影响下，新时代青年婚恋观呈现出“冷与热”两种截然相反的现实境遇。此外，青年群体在婚恋情感中还存在持续性“躺平”、普遍性“压力”和整体性“对立”等现实困境。因此，需从顶层设计、主体协同和网络治理三个方面着手，纾解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异化风险，从而为新时代青年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婚恋环境。

关键词：青年；婚恋观；异化风险；引导策略

青年婚恋问题事关人口安全、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要加强青年婚恋观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1]。进入 21 世纪以来，青年群体对于恋爱与婚姻的态度展现出更为开放与自由的态势。初婚年龄持续延迟，离婚率及不婚率快速增长，单身人口规模显著扩大，婚姻形态亦日益多元化。在多元价值的冲击和影响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显现出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与新特征，甚至出现了异化风险。因此，我们需探寻新时代青年婚恋观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异化风险，以此制定科学引导策略，为青年群体婚恋观的塑造提供坚实基础。

一、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冷与热”

中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阶段，当代青年面临社会转型和多元价值的冲击和影响，婚恋观呈现出多元特征。

（一）冷场：青年群体对婚恋的“冷淡”态度

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个体的婚恋观受其主观影响较大，且极具个性化差异。因此，对青年婚姻情感的主观意向与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是开展青年婚恋观研究的应有之义。

第一，青年群体的“主动单身”意向日益凸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开放程度、交友多元化、恋爱自由化、思想前卫化等方面的影响造就了青年育儿择偶方式和观念的转变。加之面对巨大的购房、买车等压力，青年不再以积极心态追求“脱单”，从而形成青年“主动单身”的局面。根据中国婚恋网、珍爱网发布的《2022 年 Q4 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数据，在 9106 份有效问卷中，近八成的人没有明确的脱单意愿[2]。目前部分青年在心态上已经将单身视为人生婚恋情感发展过程中的平常之事，在脱单方面选择了“躺平”，进而造成青年群体短期内主动选择单身并且逐渐习惯单身、享受单身的状态。

第二，青年“闪婚闪离”现象不断增加。新时代青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具有极其鲜明的群体性特征：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追求自我的个性表达和多元化的价值诉求。和传统婚恋观不同，新时代青年倡导婚恋自由，甚至形成了婚前“试婚”“同居”等范式的婚姻观念，极易造成“一眼定终身”式的“闪婚”现象。

（二）热场：社会场域对青年婚恋的“热情”关注

青年群体的婚姻状况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都享有较高的关注度，将青年婚恋事件当作可供“品读”的

（上接 70 页）27(02): 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江苏省民政厅养老科研一般项目“失能失智区域养老护理员服务技能水平现状及培训模式的探索与研究”（YLB2024002）。

（作者：倪燕，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副主任养老护理师、主管护师；通信作者张晴晴，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副主任护师）

热点信息。

第一，青年婚恋情况成为家庭内部的焦点。在传统生活中，婚姻是家庭再生产的基础，更是生活得以延续的保障，婚姻在代际继替中反复确认、强调个体存在的现实意义和生存价值。每个家庭内部的青年婚恋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吸引了家庭成员的目光。长此以往，家庭内部对青年群体的关注逐渐衍生出“催婚”“逼婚”等现象。而青年一代与家庭长辈的代际冲突也在“催婚”中愈演愈烈。长辈们认为婚姻长久的重要基础是经济条件，个人的性格、颜值、身材则是次要因素的。但是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在婚姻的选择上，往往以自我感觉为中心，其重要的条件是情投意合的程度。

第二，青年晚婚不婚现象成为公众热门话题。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2020 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 28.67 岁，而在 2010 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 24.89 岁，也就是说在 10 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 4 岁[3]。“不婚晚婚成流行”的话题在微博阅读次数达到 5 亿，讨论次数超过 11 万，短视频平台以“不婚主义”为话题的视频播放量高达 21.9 亿次。尽管传统社会默认的婚恋观和婚姻秩序在现代社会因不断被解构而逐渐消逝，但部分媒体和公众依然给大龄不婚的青年群体打上“被剩下的”的标签。这一标签化现象将长期存在，会对青年群体造成心理负担，成为引发社会风险的潜在因素。

二、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异化风险

青年婚恋观异化表现为青年群体在婚恋情感中存在持续性“躺平”、普遍性“压力”和整体性“对立”的现象，亟待社会的关注与引导。

（一）青年群体在婚恋情感中的持续性“躺平”

一方面，青年群体婚恋主体能动性的缺失。在《光明日报》“青年说”发起的网上调查中，97% 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存在回避甚至恐惧社交的现象[4]。越来越多伴随着新技术成长的青年认为自己有“社恐”现象，社交圈变窄、社交能力变差成为必然结果，从而窄化了自身的婚恋交互场域。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抵制“追求猛烈、目的性强、时间短”的快餐婚恋，而是期待“细水长流、真诚真挚”的慢节奏婚恋。因此，青年不再以积极情绪投入婚恋活动，而是选择耐心等待良配和正缘，极少部分甚至出现不再相信爱情的消极心态。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代偿情感体验的获得。智能媒体时代，青年群体单身状态的情感空缺能够被多元化的情感代偿情感体验所弥补，如宠物、健身、游戏、追剧等。丰富的情感体验让人们的情感空缺有了替代性的情绪出口，使青年群体不再单向度地关注婚恋关系。部分青年群体将自身的情感寄托在婚恋节目和游戏上，从侧面也能够体现出青年群体对于婚姻关系的向往和忧虑，青年对婚恋风险的感知程度也在不断地加强，使青年群体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建立满意的婚恋关系。

（二）青年群体在婚恋情感中的普遍性“压力”

其一，个人生存压力。很多青年被迫以“白 + 黑”“996”的高压工作为常态。同时，高校“硕博圈”也存在着大量的单身青年。“先立业，后成家”这一理念成为现代青年对婚前积累物质经济条件的理性审视。影响青年婚姻态度的现实经济因素的调查数据显示，养育子女费用支出、车房压力和结婚成本支出位列经济负担前三[5]。而在个人生存压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将“提升自我”放在“拥有爱情”的前面。

其二，社会舆论压力。当代青年成长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碎片化的网络信息极大地冲击了青年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影响着青年婚恋观的系统形成和全面认知。各类婚恋综艺节目泛娱乐化倾向突出，更加重视对功利主义婚恋观、“快餐式”恋爱和超理想主义伴侣的频繁渲染，增加了青年群体的婚恋焦虑。再加上媒体夸大事实，对于婚内出轨、家暴、婆媳关系等新闻进行报道，不断渲染婚姻的阴暗面，增加了青年对婚恋的消极情绪和心理负担。

（三）青年群体在婚恋情感中的整体性“对立”

其一，性别分工下的婚恋成本问题引发“对立”。在男性的思想观念中，认为自身的角色是负责赚钱家养，同时扮演好新时代好父亲的角色。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在进入婚姻之后，家庭和工作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尤其是在养育孩子之后，会严重地减少工作的时间。这些冲突使自己在求职和晋升时处于劣势，影响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婚恋成本成为男性和女性间进行比较和辩论的焦点之一，引发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使婚恋问题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话题，也对青年婚恋观造成了一定冲击。

其二，资本对流量的追逐蓄意制造“对立”。在种种“群体极化”的案例中，“性别对立”事件是最能激起并最具对抗性的互联网“战役”，这正是由性别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而这一话题所带来的巨大流量也成了资本追本逐利的工具。资本利用这些平台本身的流量，并选取带有“凤凰男”“捞女”“普信男”等带有标签化和污名化的词汇，不断吸引大众的眼球，引发两性争论和热议，同时还出现了挑拨性别对立的话语，使网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对青年婚恋观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三、新时代青年婚恋观的引导策略

针对青年婚恋观的异化风险，应从顶层设计、主体协同和网络治理三个方面对新时代的青年婚恋观进行引导。

（一）顶层设计：加强青年群体婚恋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一方面，加强青年婚恋领域的法律制度保障，持续推进青年群体婚恋普法宣传。近年来，婚恋财产纠

纷和婚恋交友诈骗案件频发，暴露出青年群体对婚恋基本法律条文的浅薄认知。应建立健全青年家庭婚恋普法宣传制度，通过中央或地方的官方平台在青年频繁使用和浏览的 App 或短视频平台开设普法账号或普法栏目，针对青年婚恋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另一方面，实施青年婚恋相关的扶持政策和福利补贴。例如，国务院在 2021 年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出要重点解决单身青年的住房困难问题。通过租房或购房补贴政策，切实解决青年婚前住房、租房难问题[6]。此外，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孩子生育、教育和养育等层面上的关键问题，为育龄青年在养育方面提供重要的条件，使其具备养育的基础，降低青年人的养育成本与经济压力。

（二）主体协同：建立“家校社”三位一体的青年婚恋教育引导体系

新时代青年婚恋观教育引导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重点、以社会教育为保障，多种教育途径形成育人合力，进一步促进青年正确婚恋观念的形成。第一，有效发挥家庭婚恋教育的首场域功能。对于青年群体婚恋价值观念的形成来说，家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子女会对父母的情感状态、相处的模式、矛盾处理的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形成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对其婚恋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深远持久的重要影响。父母应承担子女的婚恋教育责任，注重积极正向解决婚姻问题。第二，积极发挥学校婚恋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学校应加强学生对青春期恋爱方面的认知，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的身心变化，懂得珍惜人生、自尊自强。高校婚恋教育需要对大学生婚恋道德观、价值观和法律意识开展培育工作，通过设置婚恋课程、举办专题讲座、社团活动等方式，帮助其建立正确的婚恋价值取向，增强婚恋责任感，创造良好的校园婚恋文化氛围。第三，充分发挥社会婚恋教育的总保障作用。在社会层面营造文明健康的婚恋主旋律，积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婚恋美德，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琴瑟和鸣”“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等中华优秀婚恋美德进行现代阐释和宣传。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等媒体，广泛传播婚恋教育相关知识。

（三）网络治理：营造“婚恋友好型”的青年群体婚恋网络生态

对于青年婚恋观的引导，除了从顶层设计和主体协同两个方面入手，还需从网络治理方面进一步营造健康的青年婚恋网络生态。

第一，规范婚恋领域文艺作品和产品。部分婚恋领域的文艺作品和产品为了获得公众的广泛性重视，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等问题。婚恋领域文艺作品和产品应对社会现实予以更多观照，强调人文关怀。要建立多样化的呈现方式，以掌握青年群体思想上的变化和作品的价值引导为关键，给予公众启发和思考。第二，打击婚恋交友平台不法行为。据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2023 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行业市场规模呈增长态势，由 26.9 亿元增至 93.8 亿元[7]。婚恋交友平台在不断扩大用户群体、促进青年婚恋交友多元化的同时也引发了隐私泄露、言语骚扰、骗婚骗财等不法乱象，严重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从法律层面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网络平台在婚恋市场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审核机制。同时，相关执法部门应加大对婚恋平台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存在虚假信息、诈骗行为等问题的平台依法进行处罚，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第三，严格监管婚恋场域的智能媒体。自媒体平台上存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对于青年正确婚恋观的建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部分媒体传播所谓的“婚恋智慧”，往往从青年群体的兴趣偏好出发，旨在吸引他们的关注。然而，这些所谓的“知识”与科学、理性的婚恋观念相悖，这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故意夸大婚恋问题的严重性，加剧了青年群体的婚恋焦虑。面对此类智媒体传播失范现象，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媒体机构传播内容的审核和监管力度，确保所传播的婚恋知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科学理性原则，对传播来源、传播方式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从源头遏制不良信息对青年群体的侵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EB/OL]. (2017-04-14)[2025-09-11].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2] 中国婚恋网、珍爱网发布《2022 年 Q4 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揭秘单身人群恋爱消费 [EB/OL]. (2022-11-11)[2025-09-23]. https://www.sohu.com/a/604700609_120952561.

[3]《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EB/OL]. (2023-02-15)[2025-09-16]. 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

[4] 李丹阳 . 勇敢起来，触摸真实社交的复杂与温暖 [N]. 光明日报，2020-08-30(05).

[5] 张佳，朱秀杰 . 个体化视角下大学生的多元婚姻态度研究 [J]. 青年探索，2022(03): 91-100.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EB/OL]. (2021-07-02)[2025-09-2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7/02/content_5622027.htm.

[7] 艾媒咨询 |2024—2025 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 [EB/OL].(2024-06-19)[2025-08-25]. https://www.iimedia.cn/c400/100883.html.

（作者单位：长春教育学院）

从生育保障视角看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

刘元元

摘要：生育保障制度与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有着密切联系。当前，我国女性就业规模已达 3.2 亿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育儿压力以及就业歧视等现实困境，严重制约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尽管我国已构建起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体系，但仍存在着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生育津贴保障水平不足、企业缺乏激励补偿机制以及育儿支持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为此，需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完善企业激励补偿机制、全面建立育儿支持体系等举措，推动育儿责任由“女性负担”转向“社会共担”，切实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关键词：生育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生育保险；就业性别歧视

如今，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有 3.2 亿人。但是，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在生育期间，女性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这不仅会中断她们的职业生涯，还可能使其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期。生育后，妇女通常要承担更多的育儿压力，在家庭与职场之间难以平衡。

在法律与国家政策方面，我国已经构建起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妇女享有平等就业权利，并且禁止就业歧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法律落实不到位、生育保障水平不足等问题，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现象，严重影响了妇女这一群体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女性为社会进步贡献出巨大力量，其就业平等权不仅关乎女性本身的福祉，也对整个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只有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才能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此背景下，以生育保障为视角，深入探究其与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内在联系，探析我国生育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完善这一制度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生育保障与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关联

生育保障一般包括生育保险、生育休假以及生育补贴、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等内容。生育保障不足，会使妇女在家庭与职场之间难以抉择，职业发展受限。而完善的生育保障制度，则可以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具体而言，生育保障制度的作用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生育期间经济来源，增强就业稳定性

生育保障制度中的生育保险为生育妇女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确保她们在生育期间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生育保险”制度。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生育保险待遇涵盖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两类。首先，女性在生育期间，可全额或部分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降低了生育妇女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其次，生育妇女可依法获得 98 天及以上的生育津贴。这种支持措施避免了妇女因生育导致的经济困境，使她们能够安心度过生育期，增强就业稳定性。

（二）促进职业发展连续性，降低职业中断风险

生育保障制度还包括各类生育休假，最主要的当数产假和哺乳假。产假一般会持续数月时间，可以为生育妇女提供必要的休息及照料婴儿的时间。同时，哺乳假制度让产后一年内回归职场的母亲有额外的哺乳时间，能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降低因生育而导致的职业中断风险。

近年来，除了产假和哺乳假这两种常见的生育休假，一些地方还提供了夫妻双方都可以享受的育儿假。例如，在山东、福建以及广东等省份，子女满 3 周岁以前，其父母均可享受每年 10 天的育儿假。育儿假政策为职场生育妇女及其配偶提供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机会，减少了育儿对他们职业发展的影响。

（三）减少就业歧视，提升就业机会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定了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生育妇女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在岗，导致对工作的投入不足，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减少对女性的招聘。

良好的生育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进而减少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育龄妇女的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享有生育保险待遇。女职工在休产假期间，领取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而企业在此阶段无须负担工资。这一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进而减少企业在招聘、录用、晋升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行为，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

二、我国生育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障法律制度经历了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生育保障方面也在不断优化，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限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仅为 2.49 亿。大量灵活就业女性以及未正规缴纳社会保险的私营、个体企业中的女性群体未能被生育保险有效覆盖。

1.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不足

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不断出现，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加，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灵活就业女性群体增长迅速，但她们在生育保险参保方面面临许多困境。以外卖行业女性从业者为例，她们工作时间不固定，劳动关系复杂，难以按照传统的职工生育保险参保模式进行参保。而且，许多地方的灵活就业保险并不包括生育保险，进一步缩小了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

2. 部分企业不为职工依法参保

部分私营、个体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不为职工缴纳社保，自然也不为女职工办理生育保险。这些企业中的女性职工在生育期间无法享受生育津贴与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等法定权益。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女职工当下的生育保障权益，也对妇女就业稳定性和长远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加剧了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二）生育津贴保障水平不足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妇女的生育津贴应当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来计发，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申报职工工资和缴纳社保时故意压低工资基数，有些企业甚至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申报，这导致用人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实际，女性领取生育津贴的金额也不足以覆盖本人工资。

此外，生育会产生额外的医疗、生活以及新生儿抚养等费用，这些都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笔者通过访谈得知，部分女性的生育津贴仅一万余元，无法满足产假期间的开销需求。有些女性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提前结束产假回归职场，在职场与家庭间来回奔波。这不仅影响了妇女的身体恢复和对新生儿的照顾，也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企业缺乏激励补偿机制

为促进人口发展、优化人口结构，我国在 2021 年就已出台三孩生育政策。在现行的生育保障制度下，女职工依法享有产假、哺乳假等待遇，这对于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水平、鼓励生育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企业为此需承担许多额外成本。比如，妇女产假期间岗位空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业务发展。为维持该岗位的正常运行，企业需要投入人力、财力以及时间成本，重新招聘员工或培训原岗位的替代人员。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哺乳期女职工每天安排 1 小时哺乳假，若生育多胞胎，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则每天再增加 1 小时。这进一步减少了企业从女职工处获得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其用工成本。

由于缺乏对企业的有效补偿或激励政策，企业在招聘时往往会对女性求职者存在顾虑，在晋升过程中，也不愿提拔女性到关键岗位，使职场女性陷入“母职惩罚”困境。

（四）育儿支持体系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在生育保障方面存在重“生”轻“育”现象 [1]。育儿支持体系存在诸多短板，难以满足家庭育儿需求，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

1. 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 0~3 岁儿童大约有 3000 万人，其中超过 1/3 的家庭有入托的需求。在北京以及上海等一线城市，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 2/3。

近年来，我国的托育服务政策法规体系已逐步完善，托育服务供给也稳步提升。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共有 477 万个托位。从比例来看，千人口托位数达到了 3.38 个，相比往年有较大提升。但整体供给相对于巨大的托育需求来说，仍显不足。

2. 育儿假政策落实不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设立父母育儿假，这为各地育儿假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多地出台了育儿假政策，规定抚养 3 周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可以每年享受 5 到 20 天不等的育儿假。然而，这一政策在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在落实过程中，往往面临许多挑战。在具体执行方面，育儿假的申请流程、员工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不够明确，企业借故多方推脱，导致育儿假政策无法落实到位。

3. 父亲参与育儿支持缺失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通常要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 [2]。目前，我国生育保障立法的内容仅着眼于女性，

其制度服务对象也主要针对女性群体。在男性参与育儿方面，则缺乏相关政策和设施的支持。比如，根据一些地方的政策，男性可以享受 15~30 天不等的陪产假。但实际上，一些用人单位对相关政策不太了解，落实积极性也不高。再如，在公共场所设置的婴儿喂养和护理场所多名为“母婴室”，这没有充分考虑男性育儿的需求。有些地方设置的哺乳室未与婴儿打理台分开，“男士止步”的牌子将育儿的男性阻挡在外。

三、完善生育保障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权益实现的路径

（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为解决当前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应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1. 将灵活就业女性纳入生育保险范围

目前，有些灵活就业女性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即使购买了灵活就业人员保险，也并未包含生育保险部分，这不利于保障灵活就业女性的权利。2022 年，国家卫健委等 17 部门印发相关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之时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如此一来，灵活就业女性也逐渐被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之内，在受孕和生育过程中，她们可以按规定享受到生育津贴以及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未来，应逐步落实相关政策，使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保障得到更全面的覆盖。

2. 督促企业依法为女职工参保

劳动保障、税务等部门应加大监督及执法力度，积极督促企业依法为女职工参保。首先，劳动保障部门等主体可以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用人单位缴纳社保情况进行核查，及时纠正企业不为女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其次，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并将违法情节严重的企业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范围，限制其在市场准入、贷款等方面的活动，从而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

（二）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

1. 加强生育津贴监管与整改

生育津贴方面，要完善政府监管机制，确保企业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社保部门应定期对企业申报的工资数据进行抽查核实，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针对逾期未改的违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

2. 建立分层普惠育儿补贴制度

目前，我国已有郑州、杭州、济南等地开始发放育儿补贴，但整体而言，覆盖范围还不够全面。为此，政府要积极推动育儿补贴在各地普及化，并尝试建立分层普惠育儿补贴制度[3]。在这一制度下，育儿补贴金额根据子女数量、家庭收入情况等因素进行分层设计。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给予更多的补贴，并简化育儿补贴的申请、审核程序，逐步实现育儿补贴的直接发放。

（三）完善企业激励补偿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生育假制度之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没有得到充分考量，企业负担过重[4]。对此，应完善企业激励与补偿机制，有效缓解企业因女职工生育产生的负担，提升企业招聘和录用女性的积极性。

1. 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优化成本分担机制

一方面，各地可依据实际状况，对吸纳育龄妇女就业企业提高社保补贴比例或增加税收减免额度，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在生育保障中的责任。

2. 建立企业生育保障奖励制度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5]。建立对企业的生育保障奖励机制，能有效提高企业承担责任的积极性。例如，对有效落实产假、育儿假、哺乳假等生育保障制度，以及主动设置哺乳室等设施的企业，政府给予其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奖励，并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提升企业形象，为企业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

（四）全面建立育儿支持体系

完善生育保障配套措施，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实现，需要全面建立育儿支持体系。

1. 加强托育服务供给

在托育服务方面，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建设更多公办托育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以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单位办托等托育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强社会托育服务供给。

2. 推动育儿假政策落实

目前，育儿假成本负担不均衡，企业的负担较重。为推动育儿假政策落实，可尝试建立育儿假成本分担机制，比如实行企业负担、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工资支付模式，破解“政策请客，企业买单”的难题，减少企业用工负担。此外，在制度层面，应从国家角度进一步规范育儿假制度，在内容、时长等方面作出原则性规定，各地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育儿假的适用情形、申请流程等内容，增强可操作性。

四、结语

女性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妇女拥有充分的平等就业权益，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鲜明体现。在鼓励生育政策及全面增强经济实力背景下，要深刻认识到，生育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责任，政府、企业要积极落实生育保障制度，将育儿责任从“女性负担”转向“社会共担”。社会各界也应摒弃传统的性别偏见，积极营造性别平等的氛围，消除对生育女性的就业歧视，切实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参考文献

[1] 曹薇薇，杜昕璇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保障法律制度构建路径探究 [J]. 中华女子（下转 77 页）

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特点及教育支持体系构建

孟智勇 包瑞明 焦玉珍 赵玉平 李 欢

摘要：作为中职教育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其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在对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普遍存在自卑敏感、职业规划迷茫等问题，这与成长环境、教育资源分配及社会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教育支持体系，并提出具体策略，旨在为提高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支持；体系构建

农村籍中职学生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在融入城市校园生活与适应职业教育模式的过程中，面临更多心理健康挑战。他们一方面承受着来自家庭的高期望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应对职业学习过程中的竞争状况与内心的迷茫不安，由此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目前，对这一类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教育支持体系也存在许多欠缺之处。因此，深入探究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特点，并构建与之相应的科学教育支持体系，对促进其全面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特点分析

（一）自我认知易出现偏差，伴随自卑敏感倾向

农村籍中职学生多在乡村长大，与城市学生相比，其接触的物质资源以及社会视野、成长环境存在差异。部分农村籍中职学生进入中职校园后，自我认知可能出现偏差。平时与不同生源背景的同学相处时，部分学生易将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言行习惯与别人进行比较，从而产生自卑心理。从实际观察的情况看，这种自卑感可能使其敏感多疑，在意他人评价，甚至存在担心被嘲笑、被排挤的担忧。调研数据表明，集体活动中，约35% 的有此类心理倾向的学生，会顾虑自身表现不符合他人期待，因此选择被动参与或退缩，减少主动交流的次数，长此以往，可能会养成孤僻的行为习惯。

（二）人际交往存在障碍，易产生焦虑情绪

受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农村籍中职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在农村，人际交往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大多局限在亲属、友人以及邻里范围内，然而中职校园中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需要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老师进行交流互动。鉴于缺乏足够的人际交往经验与技能，他们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易产生紧张、不安的情绪，难以恰当表达自身的想法与情感。此外，城市和乡村在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样会给他们的人际交往造成困扰，例如，在日常语言表达习惯、具体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使他们和城市同学产生隔阂。人际交往受挫易使他们产生焦虑情绪，担心难以融入集体，长此以往，会对他们的学习及生活状态产生负面影响[1]。

（三）职业规划存在迷茫，易产生挫折感

职业规划在中职学生成长过程中是关键环节，但是

（上接 76 页）学院学报 , 2021, 33(02): 94−102.

[2] 万子怡 . 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女性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 [J]. 就业与保障 , 2023(07): 85−87.

[3] 袁涛 . 低生育率、生育权益与生育权益保障——兼论积极保障理念下中国特色生育保障体系构建 [J]. 社会保障评论 , 2024, 8(04): 32−47.

[4] 杨复卫，妥慧芳 . 从产假到育儿假：生育假制度的革新路径与法律续造 [J]. 社会政策研究 , 2024(02): 67−80.

[5] 贺丹 , 史毅 . 积极生育保障制度：理论脉络、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J]. 社会保障评论 , 2025, 9(01): 16−29.

（作者系山东外事职业大学讲师）

农村籍中职学生在这方面往往比较迷茫。首先，由于农村地区职业信息相对稀缺，他们对各类职业的认识有限，难以精准掌握职业发展的走向与要求。部分农村籍中职学生受家庭以及社会观念影响，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认为中职毕业之后只能从事层次较低的工作，对自身职业发展缺乏信心。在学习过程中，当他们遭遇诸如专业抉择、实习规划等问题时，常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感到困惑。这种迷茫状态，会使他们在学习与实践活动中缺乏持续动力，一旦遭遇艰难险阻与挫折打击，便极易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可能会选择放弃努力[2]。

（四）情绪管理能力较弱，易出现极端情绪

部分农村籍中职学生在情绪管理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当他们遭遇各种压力与挫折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方式。部分学生会选择将自己的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不愿向人倾诉，试图自行消化，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就会逐渐积累，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情绪控制能力较差，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会出现愤怒、冲动等极端情绪反应，甚至还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相对欠佳的情绪管控能力，不但会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关系造成影响，而且还很有可能给他们的学业和日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支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完善

学校作为农村籍中职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目前，许多中职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缺乏合理性，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环节和针对性，难以满足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实际需求。其次，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不健全，具备专业素养的心理咨询师数量不足，咨询方式较为单一，很难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此外，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将其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规划，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二）家庭教育支持相对不足或缺失

学生成长的第一环境是家庭，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颇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农村籍中职学生获得的家庭教育支持普遍薄弱。一方面，农村家长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较少，难以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孩子的心理问题。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者行为异常时，他们常常会运用简单且强硬的方式处理，如指责、打骂等，这样做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加重孩子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很多农村的家长为了维持生计而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和孩子长时间处于分离状态，无法参与孩子的成长历程，对孩子的陪伴以及关爱有所欠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获得充足的情感支撑，很容易出现孤独、自卑等心理问题[3]。

（三）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

社会支持体系对于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目前，社会对农村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关注以及支持仍显不足，还存在一定的偏见与歧视，在就业过程中，部分企业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采取不公平的对待方式，打击了农村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就职方面的信心。另外，社会上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明显出现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相对较少，当农村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遭遇心理问题时，难以获得专业援助。与此同时，媒体对农村籍中职学生进行的报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往往过度聚焦于负面信息，缺乏积极向上的宣传，这种情况会影响社会对该群体的认知与评价，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四）学生自身对心理健康认知不足

农村籍的中职学生自身对心理健康的认知水平较低，这也是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的关键要素。由于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匮乏，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极少有机会接触到和心理健康有关的知识，他们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偏差，常把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疾病”，因而会羞于向他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烦恼，更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服务。另外，部分学生缺少自我反思以及自我调节意识，当遇到心理困扰时，他们不知道怎样通过正确的途径进行排解，往往选择逃避或压抑，使得心理问题逐渐变得更加严重。同时，他们对自身的心理需求认识不够清晰，在问题刚出现的早期阶段很难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4]。

三、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支持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学校应进一步提升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并将其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规划。首先，需对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设置加以优化，在理论教学基础上增加线下实践教学部分，并针对农村籍中职学生的特性与需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如人际交往、情绪管控、职业规划等。其次，应健全心理咨询服务体系，配齐配强专业心理咨询工作人员，通过多种类型的咨询形式，例如个体形式咨询、团体形式咨询等，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当学生出现不良心理状况时，可以及时帮助他们进行疏导。另外，还应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等载体，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积极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校园氛围。

（二）强化家庭教育支持功能

家长应提升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强化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给予孩子充足的关爱与支持。学

校可通过举办家长培训班、家长会等方式，向家长传授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以及教育方法，让家长深度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随时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疏导。另外，家长应注重和孩子的情感交流，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和心理诉求，当孩子遇到困境与挫折时，给予他们鼓励和引导，帮助其树立起自信心。除此之外，父母可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务工，应尽可能地缩短与子女分开的时长，增加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营造温暖融洽的家庭环境。

（三）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各界需共同加强对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关注与支持，为他们营造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第一，政府应增加对农村区域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的整体体系，支持在农村地区设立更多数量的专门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为农村籍中职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第二，企业应树立科学、合理的用人观念，消除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歧视，为他们提供平等无差别的就业机会。此外，媒体也应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籍中职学生的正面宣传，客观报道他们的积极事迹及成长故事，促使社会加深对这一群体的认识与理解，营造具备包容性、充满支持力量的社会氛围。

（四）提升学生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农村籍中职学生自身需积极主动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应以正确的态度认识自我，树立自信心，在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具备敏锐察觉自身优点与长处的能力，持续不断地积累成功经验，以此强化自我认同感。同时，需掌握合理宣泄情绪的方法，当遭遇压力以及挫折时，能够通过向他人倾诉心声、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等途径来释放自身情绪，防止负面情绪的过度累积。另外，需主动学习有关人际交往技巧，积极踊跃地参与集体活动，将自己的社交范围扩大，进而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清晰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恰当的职业规划，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不懈地努力奋斗[5]。

（五）推动职业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

学校可凭借职业教育的特点，探索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路径。例如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专业技能教学中，在实训课程中设立团队协作任务，借助小组共同完成技能操作项目，以此培育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合作意识，进而缓解他们在人际交往的焦虑情绪。同时，结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开展职业心理素质专项训练，帮助学生明确职业方向，减轻因迷茫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另外，邀请成绩优异的校友分享其职业成长历程，尤其是那些成功克服内心困境、实现职业上重大突破的事例，激励他们在专业学习中汲取心理成长动力，实现技能提升和心理健康的协同发展。

（六）建立动态心理监测与精准干预机制

针对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构建常态化的动态心理监测与精准干预机制是提升教育支持效果的关键。学校可依托心理咨询中心，组建由专业心理咨询师、班主任、专业教师组成的监测团队，采用心理测评量表、日常行为观察等多种方式，对农村籍中职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进行心理状态监测，建立个人心理成长档案，实时追踪心理变化轨迹。对于监测中发现存在轻微心理困扰的学生，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主题心理沙龙等形式进行普遍性干预；对于存在较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实施一对一的精准辅导，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同时，建立心理危机预警与应急处置流程，明确各主体在危机干预中的职责，确保在遇到突发心理危机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为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筑牢安全防线。

四、结语

农村籍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具有社会复杂性，其改善需要学校、家庭及社会的协同关注与持续努力。当前的教育支持体系仍存在一定缺陷，亟待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支持体系。同时，还需提升学生自身的心理调适能力。唯有凝聚多方力量，形成有效合力，才能够切实改善农村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促进他们全面发展，进而为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柏荣楼，戴春兄．农村中职院校学生心理特点及教育对策研究 [J]. 快乐阅读，2023(08): 100−102.

[2] 杨玉琴．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究 [J]. 新课程，2022(31): 238−240.

[3] 刘薇．“互联网 +”背景下农村中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J]. 安徽教育科研，2022(15): 77−78.

[4] 王静．农村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 [J]. 现代职业教育，2022(11): 73−75.

[5] 魏宁．心理健康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J]. 亚太教育，2015(34): 18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籍职业院校学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2024GSZYJY−350）。

（作者：孟智勇、赵玉平、李欢，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包瑞明、焦玉珍，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社会视域下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何　芳

摘要：红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属性与人文精神，在新时代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此，分析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的价值，并结合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现状，深入探讨基于社会视域的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路径，涉及挖掘利用红医文化资源、深化红医文化与党建工作融合、聚焦服务优化和品牌建设、创新红医文化的宣传模式等内容，以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视域；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

“红医文化”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医疗文化与精神传统，该文化以红色革命精神为核心，将医疗卫生实践与革命事业密切结合。红医文化历史起源可追溯至中央苏区时期，1927 年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后，面对缺医少药和疾病流行等严峻条件，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构建适应战争环境的医疗卫生体系，建立红军医院、卫生学校等基础机构，为革命队伍提供必要的卫生保障。在形成过程中，傅连暲、贺诚等早期医务工作者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将医疗服务与革命任务紧密联系，推动了红军医疗体系的建立与运作，成为红医文化的重要代表。1931 年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成立，毛泽东题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事件成为红医精神确立的标志，进一步巩固了红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赓续红色基因，明确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政治坚定、救死扶伤、埋头苦干、技术优良”的红医精神已成为医务工作者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力量。红医文化对于培养当代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坚定医学生的职业信念，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一、社会视域下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的价值

（一）助力人文价值回归

在现代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医疗服务面临着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红医文化以“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理念，蕴含深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医疗服务中存在的技术与情感脱节问题。通过在公立医院构建以红医文化为基础的人文服务体系，可引导医务人员在诊疗实践中强化医德医风建设，重视医患沟通，尊重患者人格，优化服务态度，从而实现医疗服务从“治疗疾病”向“关照生命”转变的内涵延展。同时，红医文化中所承载的“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技术优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则有助于增强医务人员的职业认同感，激发其服务热情与社会责任意识，进而提升医疗机构整体服务水平，这能够为技术精湛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现代医疗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1]。

（二）重塑职业精神体系

红医文化所强调的“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对医务人员职业精神的重塑具有重要价值。面对职业倦怠、职业压力与医患矛盾等多重挑战，医务人员的职业认同感正面临一定程度的弱化风险，而通过系统构建红医文化体系，可以在医院内部营造具有政治高度、价值深度、文化温度的职业环境，引导医务人员不断深化对医德规范、职业使命的认知，进而实现从“职业角色履行”向“职业理想践行”的转变。如在组织实践中，可借助红医文化教育、典型人物宣传、榜样引领机制等多元路径，有效提升职工思想境界与服务水平，增强岗位责任感，并构建“红医精神—职业价值—行为实践”的认知链条，这有助于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主动践行红医精神，为医院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与精神保障[2]。

（三）增强社会公众信任

医患关系的稳定和谐是社会健康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而医患信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红医文化以其鲜明的人民立场与服务精神，具备极强的情感感

染力和社会认同基础，在构建医院与公众之间信任桥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构建红医文化传播体系，向社会广泛展示医务人员的责任担当、职业操守，能够有效增强公众对医疗机构的情感认同，缓解潜在的认知误解。如通过将红医故事、典型人物事迹、医患互动场景等进行全媒体传播，可显著扩大红医文化影响力，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树立医疗机构的社会形象，社会视域下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3]。

二、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一）红医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足

当前多数公立医院在红医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系统利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呈现出片面性、形式化问题。一方面，部分医院对红医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符号”或“历史记忆”层面，缺乏系统性的挖掘意识，未能建设专业研究队伍，这使得资源整合度较低，历史档案、实物陈列、口述资料等未能系统归档。另一方面，红医文化的传播多依赖单次展览、专题讲座等传统方式，缺乏融合现代传播技术的多元化传播平台，难以形成持续影响力。此外，部分医疗机构尚未建立红医文化资源动态更新机制，资源开发停滞不前，内容老化严重，不利于青年医务人员的认同构建，这一现状必须设法改变[4]。

（二）红医文化未能融入党建工作

近年来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在制度建设与组织保障方面日趋完善，但红医文化作为党建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的重要载体，尚未在各级党组织工作中深度融入。具体来说，目前多数医院党建活动以政策宣讲、会议部署、党务培训为主，缺乏对红医文化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理论阐释，同时，部分基层党支部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与红医文化联系不紧密，红医文化对党员政治认同与服务意识的深层引导受此影响无法实现，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三）红医文化品牌建设滞后

在医疗行业品牌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红医文化尚未转化为具有识别度、公众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红医文化品牌建设整体呈现滞后状态。具体来说，多数公立医院未对本单位红医文化资源进行差异化提炼，缺乏系统的品牌定位，在传播策略、视觉体系方面的探索也存在不足，这使得红医文化在社会舆论场中的可视性与传播性受到限制。同时，红医文化宣传活动以内部展示与经验交流为主，缺少对新媒体手段的深入运用，以及与群众需求、社会价值观念相契合的内容创新，也难以形成持续性的舆论热点，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医疗文化体系构建提出的新要求[5]。

三、基于社会视域的公立医院红医文化体系建设路径

（一）大力挖掘、利用红医文化资源

在新时代背景下，红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精神结晶，凝聚着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理念，是新时代加强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建设和弘扬职业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考虑到不同地区公立医院的发展历程各异，其院史承载着地方红色文化基因及医疗战线发展轨迹，是红医文化生成与演变的重要依据。建议各公立医院立足本院具体史料，对院史中有关战争救护、革命医疗、群体动员等内容进行专题化整理，梳理事件脉络、关键人物、突出贡献，构建具有独立叙事逻辑的红医文化体系。

构建虚实结合的平台，促进制度化建设。红医文化的传播路径不应局限于传统载体，而是应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集成式传播平台，推动红医文化资源向可视化、互动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建议开发“红医教育 VR 仿真系统”，以三维建模技术再现战地救护车紧急转运、临时医疗站手术救治、药品短缺应急应对等战争时期的救治场景，通过场景模拟训练医务工作者的应变能力，增强人文意识。也可以设立“红色卫生史博物馆云平台”，用以整合各地红医历史展览、专家访谈、革命医疗故事、珍贵影像资料等，建立时间轴、专题图谱与人物谱系，实现按需检索与内容订制，使学习内容更加系统全面。

（二）深化红医文化与党建工作融合

基于社会视域，红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紧密结合党的建设工作，通过机制协同、思想引领、实践渗透等路径，实现红色文化的政治功能、育人功能、治理功能的协同发挥。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党建工作不仅能够为红医文化体系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组织保障，也能够为红医文化的常态化传播、制度化运行提供坚实基础。为此，需要系统推进红医文化与党建工作的融合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融合机制，确保红医文化深度嵌入医院治理体系，在医院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覆盖全院各科室、各职能部门的红医文化建设组织架构。具体而言，可设立红医文化建设委员会，由党委书记担任主任，党办、宣传科、人事科、医务科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统筹推进红医文化内容构建、宣传推广、教育培训等工作。各党支部应同步成立红医文化小组，明确专人负责文化活动的组织、内容统筹，推动文化建设与科室业务深度融合。

具体实践还应聚焦制度规范，通过构建红医文化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党委、党支部、职能科室在红医文化建设中的职能职责，以及具体协同机制，确保“任务有人管、工作有人做、成效可考核”。

（三）聚焦服务优化和品牌建设

红医文化深植于“人民至上”的价值体系之中，其服务精神贯穿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

医疗卫生服务全过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公立医院需以红医文化为核心内核，持续推进服务模式优化与品牌体系建设，以此提升医院整体治理能力与社会影响力，可使红医文化在服务实践中获得深度延展与现实转化。为此，应构建以患者体验为导向的服务流程再造机制，贯彻落实红医文化中的“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核心理念，真正做到以患者需求为起点，对原有诊疗流程进行全链条重构。建议全面推行“全流程闭环服务管理”，从患者就诊预约、导诊分流、检查检验、药品发放到康复随访，设立标准化操作流程，明确责任人、时限节点、异常反馈机制。辅以信息化平台和多学科协同诊疗机制，进一步减少患者多次排队、重复检查的问题，实现“一站式”服务管理，真正构建“快进、快诊、快出”的医疗运行格局，使红医文化理念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体系中落地见效。

还应聚焦人文服务领域，营造具有红医精神的人文关怀氛围，聚焦患者心理、情绪、尊严等多个层面。为此，应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着手，重塑医院人文服务体系。在制度层面，可建立“医患沟通标准制度”，明确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的言语规范、心理慰藉职责，促进医患互动情感化；也可以设立“患者服务顾问”岗位，专责解决就诊过程中的非医疗问题，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在实践层面，可开展“红医人文服务技能培训”专项课程，设立“红医服务观察团”，用以系统培训礼貌沟通、医患冲突化解等内容，并对医务人员服务过程进行观察、评价和反馈，真正推动人文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此外，还应考虑构建红医文化品牌传播体系，结合医院历史沿革、服务特色、红色资源，丰富医院红医文化的独特内涵，形成可识别、可传播的品牌语言体系，如院徽、院训、服务口号等，使医院形象在视觉层面体现红医文化的精神气质。这一过程还可以建立“内容＋平台＋互动”的综合路径，构建多层级传播体系，积极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红医典型事迹、服务案例，并定期组织开展红医文化节、红医开放日、红医服务月等红医文化品牌活动。同时结合行业协会、专业期刊、高校联盟等渠道开展品牌共建项目，实现红医文化品牌从院内走向院外，从单一传播走向协同传播，真正形成多主体共建、全媒体联动的红医文化品牌建设格局。

（四）创新红医文化的宣传模式

在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红医文化的宣传模式需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立足时代语境、拓展传播渠道、创新表达方式，真正推动红医文化从传统传承走向融合传播、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构建由传统媒体、新媒体、院内媒介、社会平台构成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实现红医文化的多层级、广覆盖传递。在线下渠道方面，应持续加强医院宣传栏、文化长廊、电子屏、院报等传统媒介的内容建设，并建设一体化信息发布系统。在线上渠道方面，应系统整合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组建融媒体运营团队，建立红医文化传播矩阵，并针对不同受众设计差异化传播内容。在社会平台方面，公立医院应积极与新闻媒体、行业机构、高校平台合作，开设“红医文化”专栏，推动红医文化宣传跨越行业边界，实现医疗文化与社会舆论的良性互动。

在具体宣传过程中，需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声音、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丰富内容创作方式，增强传播效果。如采用微电影、短视频、纪录片等视听形式，将红医故事中的人物精神、历史背景生动呈现，增强叙事性与艺术感染力。也可以通过互动 H5、沉浸式情境游戏等方式，将红医精神融入互动体验，使受众在“参与—感受—认同”的过程中完成价值认知的建构，同时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设立虚拟纪念馆、情景还原展厅、红色任务体验平台等红医文化场景化体验系统，实现红医文化内容从平面叙述向立体呈现的转化。

四、结语

未来，红医文化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增强系统性与专业性，强化政治引领与制度保障，推动文化理念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开放包容、内外兼修的红医文化生态体系，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公立医院精神建设与服务创新。

参考文献

[1] 邹长青 . 弘扬红医文化培养仁心医者 [J]. 中国医学人文 , 2024, 10(07): 1.

[2] 闫英丽 , 桑利娥 . 新时代红医文化动量空间建构的三维审视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24, 37(06): 641−645.

[3] 刁传秀 , 朱宏晋 , 程乐森 . 红医文化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研究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24, 37(06): 646−650.

[4] 刘桂江 , 蔡运荃 , 张洁莹 . “红医文化”融入医院软文化建设的策略探析 [J]. 现代医院 , 2023, 23(07): 1023−1026.

[5] 陈敏 . 新时代红医文化融入公立医院文化建设的路径 [J]. 国际公关 , 2022(12): 13−15.

（作者单位：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医生助理新职业的发展路径与创新型培养模式探索

王海洋 褚亚男 *

摘要：通过对目前医院医疗健康工作对于医生助理的需求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在医生助理已经成为临床科室工作的特殊构成部分并且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实施标准的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引领、社团服务、医院培训，通过多部门联合培养医疗人才的方式提高整体服务能力，在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对于医疗健康工作人才的培养标准也越来越高，每一个阶段都不容忽视。医疗卫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领域，特别是在促进护理助手的专业技能提高和社会相关行业全面发展等方面团体化支持很重要。

关键词：医生助理；培养模式；新职业；医学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民众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然而国家医疗系统正遭遇多重挑战，包括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高质量医疗服务供给不足，以及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工作负荷过重等问题愈发突出[1]5，在此背景下，探索并实施医生助理等新兴医疗职业进入医疗领域，成为缓解当前医疗人力资源紧张的有效策略。

医生助理在国际上建立了培训和实践体系，特别是在美国，已成为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在临床实践中为医生提供支持，该职业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优化资源分配和减轻医生工作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自 2008 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首次设立医生助理职位以来，中国一些医疗机构也开始设立类似职位，但这个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医生助理的职业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医生助理培训体系、支持医疗的法律政策以及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中国医疗体系的持续改革和完善，医生助理的专业发展也将逐步得到优化和完善。

医生助理不仅通过承担非临床任务为医生提供有效支持，还通过接受专门培训来提高专业技能，这使他们能够在预防、保健、治疗和康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引入和培养医生助理还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并促进发展公平、可及的医疗保健服务，这将产生积极的战略影响，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

二、医生助理职业背景和现状

医生助理这一职业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旨在应对医生短缺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挑战。美国率先构建了系统的医生助理培训体系，培育出一批能够在医师指导下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人才队伍，随后这一模式被包括爱尔兰、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借鉴，并依据各自医疗体系的特点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与发展，尽管在不同国家医生助理的具体职责与工作范畴存在差异，但其核心目标均在于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与品质。

中国起步较晚，如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于 2008 年率先设立了“一对一”门诊医生助理，承担医生的部分行政、文秘工作，随后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医院效仿设置相应岗位。以上各岗位均由各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调研设置，并无一个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因此中国的医生助理与被世界公认的医生助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大多是在接受一定期限的短期培训后便上岗了，多是在门诊与住院部内承担一些非临床辅助性的工作，如记录病历、接待患者等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3]，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者不能从事医疗工作。这对于经验丰富的医助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参与到更多的医疗活动之中。虽然有专家主张赋权医助，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其他种类的医疗工作，但是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支持，并且我国还未建立全国性的医生助理职业资格认证及标准化培训体系，还无法真正实现其职业标准化以及职业的发展。

三、临床对医生助理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临床医生的工作负荷不断加重，医疗资源呈现出相对紧缺的状态，临床医生们常常被烦琐的非临床事务缠身，

如病历记录、患者咨询等，这些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量的诊疗时间，这不仅影响了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也给医生带来了额外的工作压力。因此，医院急需引入医生助理来分担这些非临床工作，以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医生助理在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他们协助医生治疗患者、记录病历、开展健康教育以及安排就诊时间，还可参与患者监测、数据收集和临床研究，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通过履行这些职责，医生助理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减轻医生的工作负担，并改善患者的医疗体验。临床环境对医生助理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充分证明了该职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潜力。

四、医生助理职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民众对医疗健康的服务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对应的医疗机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以适应更多的民众对于门诊和住院医疗服务的需求，来咨询的患者数量也将会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加之患者对疾病的了解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在医患双方沟通中讲究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助理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牵线搭桥。

（一）医生助理职业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

医生助理的作用是可以有效地缓解医疗纠纷，提升病人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医生助理的工作内容包括医护会诊、上报病人临床情况、报告实验室结果、为病人答疑解难，并且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向患者讲授健康知识等，从各方面参与病人的整体治疗过程，极大地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他们耐心地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告诉病人相应的病情，疏导病人情绪，给患者家人带去心理安慰和安全感。医生助理不仅会加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并且会缓和医患矛盾，为病人提供人文关怀。注重病人咨询、关注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全方位需要的医疗模式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感受度，并促进了医患之间的和谐相处[5]。

（二）医生助理职业优化门诊就诊流程

医生助理在门诊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职责主要包括临床支持与流程优化。在临床支持方面，医生助理根据专业要求和执业医师的指导参与制定治疗方案，确保电子病历的标准化填写，准确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并完成医疗文书工作，如执行医生的指示和安排检查时间表[6]63。

把医生助理合理地安排到门诊中分诊患者，简化门诊的咨询流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门诊的治疗效率，规范了门诊咨询流程，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医生本身的诊疗功能，也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医院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三）医生助理职业促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增加医生助理可优化医疗资源分配，他们帮助医生完成非临床工作，解决了因人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问题。他们对科室管理及病人出院后的随访工作有较大帮助，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水平。医生助理可以通过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获得较高的病人满意度，并使医生有更多精力去做专业的诊断工作[6]64。

五、对医生助理职业的相关要求

医生助理在大多数大型医疗机构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医生助理必须掌握基本医学知识及技术基础、临床技能并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医生助理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医疗仪器及操作电子病历系统；要熟悉与医疗保健相关的法规制度以确保诊疗的安全和有效；要遵守医疗保健从业者的伦理规范，尊重、保护病人隐私，关爱病人，对工作高度负责；要言之有物、语速适中、善于表达，善于和患者及家属、同事及医护人员等各类人员交流[7]。

六、“政府—学会—医院”联合培养模式

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基础医疗培训模式是课堂学习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培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8]。美国医师助理教育协会（PAEA）[9]负责医师助理的职业培训及发展，并面向会员开展教育、职业发展、研究等相关活动。我国的医疗助理培训主要是短暂的前期预科培训，缺少系统化教育以及实践机会，因此我国目前急需提升医疗助理的专业素质，可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10]，同时结合国情，可以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医院三方共同参与的培训模式。这是一种创新性的培养方法，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协会的专业指导以及医院的实习带教共同培养医疗卫生人员。

（一）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

政府起主导、支持作用。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和标准，明确医疗助理的职业属性、工作职责；制定培训、认证与管理的相关办法；为发展医疗助理队伍制定有关政策、给予经费支持，并鼓励医院设立医疗助理岗位，以提高其在医疗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缓解临床一线医生的压力以及优化我国现有的医疗人力资源配置，笔者认为可以将新医疗专业加入到当前的我国医疗体系当中，并对其进行职业准入标准设定、确定其实践范畴以及实行分层管理，明确其在多学科团队合作诊疗方面的功能角色定位[1]90。政策上还需要从三个方面使医疗规范标准化，即职业准入标准、实践范围和法律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医疗团队协作服务规范化[1]92–94。

（二）学会指导和资源支持

我国众多的科学协会、联盟及研究机构在医助职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以下简称“京健会”），其

一直是推动医助行业发展的引领者和支持者，工作领域主要覆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与培训，对医助进行各种专业的培训以及教育，让他们了解专业所需的技能技巧并完善知识体系；二是职业发展指导，同时为医助创造条件可以加入医师队伍，甚至是在协会的支持下进一步学习深造，成为医护或者更高级别的专业人员；三是医疗助理标准的制定及推广应用，既保证了服务质量与水平，又能让更多的医疗行业从业者产生信任感；四是有一个经常更新的数据资源库，目前已拥有 100 多个各领域专科委员及上千位行业专家。医疗工作者可以通过京健会获得行业最前沿的信息，以便及时地进行技术升级；五是为医疗助理推介工作岗位，包含咨询服务、招聘会推荐和岗位检索等，有助于他们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协会给医助们提供专业的技能以及接受新知识的机会，医助也可以借助此机构和医学院的合作机制获得实习机会及实践经验。通过多种支持活动，相关行业协会和组织能够为医助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三）医院实践与专业培养

医院是为医生助理开展临床技能培训的重要场所，给其提供了学习、历练的机会。我国的医生助理培训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没有统一的培训标准和长效化的保障措施。王文文 [11] 将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师助理的培训内容归纳为查阅病历、开出处方、收取病历、健康宣教、医患沟通等。赵丽丽等 [12]146 则结合所在机构不断开展专业化的培训实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将标准化门诊的数据存档、临床数据管理、随访系统的打造、优化专家的工作时间及品牌建设等内容也囊括其中。可以将他们的经验总结运用到实施不同的医院分级以及制作专业的岗位说明书，先确定每年分级应该完成的工作和任务，针对不同的专科来设置，然后到相应的机构去开展培训，并且强调各种机构的专业能力建设，这就好像是进行分级诊疗一样，需要同时考虑到执业医师的要求：基本能力有观察生命体征、记录规范的医疗数据；中级能力有协助制定治疗方案，负责解释相关检查的结果；高级能力侧重于专业医疗服务 [13]。在门诊需要根据不同的专科选择不同的渐进式能力培养方案，符合执业医师自身的要求。住院部培训需加强跨学科合作管理，主要包括医疗案例管理、医疗数据质量控制、出院后的延续性治疗管理、随访管理 [12]147。

七、医生助理的局限性和未来发展

我国医生助理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活动范围有限、法律和政策支持不足。随着医疗模式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慢性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医生助理在提供服务方面拥有大量的机会，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临床诊断和治疗、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等工作中，医疗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预计医生助理将在中国医疗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八、结语

医生助理是一个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职业，在中国医疗体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为医务人员减负，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改善医患关系，助力医院提供关怀性护理服务。针对这一职业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政府、社会、医疗机构需协同发力，提供政策引导、教育培训、技术支撑等，促进医疗助理职业发展，为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蒋慧莉 . Physician Assistant/Associate(PA)“医生助理”在我国部分三级公立医院的知晓情况和需求程度分析 [D]. 北京 : 北京协和医学院 , 2023.

[2] 张泽苗 , 胡银环 , 李得和 , 等 . 国外医生助理发展情况研究及启示 [J]. 中国医院 , 2022, 26(07): 54-5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EB/OL]. (2021-08-20)[2025-11-06].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104.html.

[4] 杨艳英 , 何梅 , 陈熙 , 等 . 医生助理岗位应用于日间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效果分析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 2022, 29(10): 53-57.

[5] 严晓霞 , 毛燕君 . 医疗助理师在提升肺部手术病人住院体验中的应用 [J]. 护理研究 , 2018, 32(22): 3637-3640.

[6] 曹璐璐 , 何梅 , 崔丽君 , 等 . 国内外医生助理岗位对比分析及启示 [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 2019, 26(02): 62-65.

[7] 史巧巧 . 中医护理专项小组在提升外科护士中医护理能力中的价值 [J]. 中医药管理杂志 , 2024, 32(07): 146-148.

[8] MALONE R.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associate: an overview[J]. Ir J Med Sci, 2022, 191(03) :1277-1283.

[9] BARWICK T A, KIRCH D.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nd Physician Assista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Modeling Teamwork for Tomorrow's Health Workforce[J]. J Physician Assist Educ, 2015, 26(04): 167-168.

[10] BIEZEN MVD, DERCKX E, WENSING M,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decision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managers to train and employ a nurse practitioner or physician assistant in primary care: a qualitative study[J]. BMC Family Practice, 2017, 18(01): 16.

[11] 王文文 . 肺小结节门诊设置专家助理岗位的实践与探讨 [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 2023,

（下转 86 页）

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分析

王毛毛

摘要：普通话测试中，朗读作品作为语言测试的一个部分，不仅能评估语言能力，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2021 年版）》中朗读作品的分析，研究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尤其在民族地区，利用朗读作品推动文化认同与民族团结，增强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深化其国家认同。朗读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可有效提升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借助优化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教学方法，可更有效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普通话；朗读作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普通话作为我国通用语言，对推动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普及普通话不只是语言教育的要求，更是强化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方式。朗读作品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组成部分，除了考查语言能力，还担负着传播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民族认同的重任。《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2021 年版）》在朗读作品篇目上有了较大改动，全部作品均出自近现代白话著作或文章，其中部分作品源自中小学语文教材，选择朗读作品时兼顾了艺术性、思想性、民族性及时代性，还对作品的文体比例、年代、题材、内容等进行了全面优化，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普通话测试所用的朗读作品，已成为学习者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的历史背景与发展

（一）普通话的历史与发展

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源于我国对语言文字统一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把推广普通话列为重要组成部分。1955 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正式把普通话界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将推广普通话列为国家一项重要任务。1982 年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首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自 2001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明确了普通话的法定地位，对其使用范围加以规范。

伴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普通话推广在形式上不断有新突破，为各民族人民增加了更多学习渠道和方式，尤其在民族地区，普及普通话对实现教育公平、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家认同感起着关键作用。

（二）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的选择与演变

我国自 1994 年起正式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1994 年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中，普通话水平测试有 50 篇朗读作品，朗读内容为现代白话文作品，其内容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伴随时代的进步，朗读作品日益丰富，且更重视文化的多样性。2003 年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中，朗读作品数量改为 60 篇，既注重语言规范性，还兼顾了作品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特别是文学性突出的篇章，选用了较多国外作品或以外国人为内容的篇章。

（上接 85 页）14(05): 68−71.

[12] 赵丽丽，郑伟 . 我院开展门诊医生助理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7, 2(10): 146−148.

[13] 朱惠 . 医生助理员对提高门诊工作效率的作用及意义 [J]. 华西医学，2014, 29(04): 774−775.

（作者：王海洋，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医学信息专员；通信作者褚亚男，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人事管理部主任）

伴随社会持续发展，2021 年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更新了朗读作品，选材更强调多样性、时代性和文化传承，50 篇朗读作品内容更为丰富，还特意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在作品选择上，重点展示现代汉语的语言特色及表达方式，重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突出语言的社会功能及文化传递意义。

（三）普通话朗读作品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普通话朗读作品与文化认同存在着紧密关联。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其朗读作品不只是语言能力测试的工具，还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载体，学习者既能锻炼语言技巧，还会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教育[1]。

对民族地区的学习者来说，普通话朗读作品不但是语言学习的关键内容，更肩负着文化传递与融合的重任，尤其通过朗读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历史价值的作品，学习者可在语言学习进程中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文化认同感的养成，会强化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在朗读的作品中，许多篇章借助讲述中国历史、弘扬中华文化、歌颂祖国山河、呈现发展成就、诉说美好情感的故事，增强了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可与敬重，通过朗读作品而产生的这种文化认同感，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发展意义重大。普通话朗读作品不只是语言考试的一部分，更是承载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载体，能有效培育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的形成。

二、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一）促进民族团结与增强凝聚力

普通话测试的朗读作品对促进民族团结有着独特功效，民族地区的学习者既训练了语言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能切实增进各族人民的理解尊重、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人民的凝聚力。

在民族聚居区域，推广普通话以及进行朗读作品教学成为推动民族团结的重要办法，学习者不但掌握了标准普通话，更凭借作品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底蕴，提升了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认同[2]。部分朗读作品，围绕历史故事、祖国风光或传统节日展开主题，既利于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还可激发学习者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历经长久的朗读训练，学习者可深刻感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语言学习渐渐转变为促进民族凝聚的动力，增强了国家认同感，为社会和谐与共同发展筑牢基础。

（二）弘扬民族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

用于普通话测试的朗读作品，不单单是语言学习的工具，还担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朗读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作品，让学习者更好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增强文化自信，尤其在民族地区，朗读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不但助力学习者学习普通话，还能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敬意。

朗读作品中引用的诗词、谚语、成语等，全是中华文化的关键承载物，在学习这些作品期间，民族地区的学习者能体会到文化的力量。部分朗读作品中，既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还彰显出民族文化的多样与包容[3]，凭借这样的文化传承，学习者能从语言角度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辉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朗读作品的挑选越来越重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相融合，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学习者在接受现代教育期间，不忘文化根基，学习者朗读《大匠无名》《莫高窟》等作品，不仅普通话水平得以提高，还体悟到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文化责任的思考，由此激发起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责任意识。文化认同不只是停留在语言表达上，还进一步渗透进每个学习者的思想与行动，激励他们自发地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

（三）促进语言与文化认同

普通话测试所用的朗读作品，在促进语言与文化认同上作用显著。学习者通过诵读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不仅能提升语言能力，还能在文化表达中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语言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思想、风俗与情感，普通话朗读作品借助语言传递这些文化价值。

对于民族地区的学习者而言，学习普通话不只是掌握一种语言工具，更是达成文化认同的过程，朗读作品所蕴含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能让学习者借助语言了解民族的共同记忆与历史进程。《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全面呈现了中国古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艺术特色，在朗读教学期间，既让学习者的朗读技巧得到提升，还让他们体悟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凭借这类作品，学习者不但提高了语言能力，还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可。

朗读作品中的每一处停顿、每一个重音安排，皆为文化认同的传达，民族地区的学习者借助这些蕴含深厚文化的作品，在语言学习期间可感知文化内涵，进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更深厚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豪感，同时为推动社会融合和共同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

三、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的教学改进策略

（一）当前朗读作品的教学实践分析

普通话测试所用的朗读作品在普通话培训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开展普通话培训时，目前普通话培训教学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民族地区的学习者通常会面临作品内容理解与语言技巧掌

握的双重困境，大量学习者普通话基础欠佳，朗读时易出现音变处理不当、语调把控不准等状况，进而影响了朗读的情感传递与作品的呈现效果。

朗读的作品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底蕴，众多民族地区的学习者鉴于文化背景有别，常难以精准领会作品的情感与思想内涵，往往无法切实传达作品的精神。以《看戏》这篇课文教学为例，民族地区的一些学习者对京剧艺术认识不足，对京剧大师梅兰芳也缺乏了解，导致朗读时情感无法充分表达，削弱了情感共鸣。朗读作品教学不只是语言训练，还是文化理解与认同的过程，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紧密相连。

（二）朗读作品教学的优化路径

在教学方式上需加强多维度讲解。教师不仅要从语言特质、朗读技能角度进行示范，而且要从文化、历史、情境等多维度剖析，带领学习者体悟作品背后的价值意义，譬如在讲解《莫高窟》《大匠无名》等篇目时，借助梳理时代背景、人物精神、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成果的进程，使学习者在朗读之前就形成较充实的文化积累。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资源、情境视频、音频示范、图文对照等手段使课堂呈现多样化，让学习者在“看得见、听得见、感受得到”的氛围中体悟作品所蕴藏的情感力量，这种视听感受不仅有益于学习者把控语气、节拍与情绪，也能够深化其对文本思想意义的理解，进而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共鸣[4]。

在教学策划上应关注差异化需求，开展分层教学。教师需依据学习者的普通话水平、言语习惯以及对文化背景的领悟能力设定不同层级的学习目标，针对语言底子薄弱的学习者，需借助重点词语示范、句式跟读训练、语音矫正等途径巩固发音基础，再以简化的文化解读逐步引导其树立文化认同；针对语言能力较为突出的学习者，可开展更进阶的表达训练，像情感朗诵、段落韵律把控、文化主题解读，使他们在朗读中实现语言技巧与文化理解的双重提高。借助小组协作、分角色朗读、情景模拟等方式推动不同层次学生之间的交流，使学习者在交谈、模仿与合作中不断提高朗读水平与文化认知深度。

（三）朗读作品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可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普通话朗读作品教学进行创新，凭借语音识别技术和智能反馈系统，教师可实时知晓学习者的发音问题，同时提供即时反馈[5]，这既有利于学习者纠正发音错误，还会提高教师对学习者朗读水平的把控能力，让教师可按照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

现代技术可让朗读作品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帮助学习者更深入地领会作品，利用视频、动画等形式，教师可呈现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让学习者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体验里，体会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基调，运用多感官的学习模式，既可以增强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又能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成效。

教师还能够借助跨学科协作，将朗读作品教学和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融合，向学习者传授更全面的知识，教《匆匆》这篇课文时，融合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学评价等多学科知识，助力学习者多维度深度剖析作品内容，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

运用这些创新教学手段，普通话朗读作品教学不仅增添了生动性与互动性，还能助力学习者深入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现代技术应用可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提高教学质量，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还能为民族地区教师提供更高效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经验。

四、结语

普通话测试所用的朗读作品，不但是语言学习的关键部分，还在增进文化认同、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社会凝聚力方面有着独特功效。通过朗读蕴含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作品，民族地区的学习者在提高语言技能的同时，能更深入地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借助语言和文化的双重培育，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优化朗读作品挑选与教学手段，既能提高普通话培训教学质量，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文化支撑。伴随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普通话测试朗读作品教学在传承与创新中持续发展，未来会更关注个性化教学与跨学科融合，为民族地区语言教育与文化认同建设开拓新的发展途径。

参考文献

[1] 唐美智，孙景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听呈现与诗意表达——以《第一次的离别》为例 [J]. 艺术研究，2025(02): 76-78.

[2] 路钰玮．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教学新路径探究 [J]. 知识文库，2025, 41(06): 28-31.

[3] 郭云龙，陈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为例 [J]. 中国军转民，2025(06): 140-142.

[4] 苏漪．普通话水平测试“短文朗读”项失误分析及应对策略 [J]. 浙江考试，2023(02): 60-62.

[5] 海霞．调整改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朗读作品内容迫在眉睫 [J]. 国际人才交流，2022(05): 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普通话测试用朗读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民族地区教学实践路径研究”（2024JDXY016）。

（作者单位：临沂第五中学）

社交媒体使用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宋　爽 刘昱莹 赵　祎 张小龙

摘要：为了探究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本研究应用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量表、老年人微信使用情况和幸福感的调查问卷的改编版，对中老年人进行调查。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手机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的是微信的中老年群体，比最常用的不是微信的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更高；手机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的功能是聊天的中老年群体，比手机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的功能是观看视频的中老年群体人际价值感更高。因此，本研究得出结论：手机社交媒体软件使用类别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存在影响，表现为将微信作为最常用软件的中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将其他软件作为最常用软件的中老年人。

关键词：中老年群体；社交媒体；手机软件；自我价值感；人际价值感

一、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规划部署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指出要“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保持良好且有意义的社会关系，通常作为一种提升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年轻一代在完成高等教育之后，普遍选择在较大城市打拼，如此一来，日渐衰老的长辈想要保持与年轻一代的良好联系，就需要借助社交媒体。手机社交媒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既消除了物理距离，还让联络随时可以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数字反哺，增进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频率，提高了沟通的深度[1]。已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能够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归属感、自我价值感等，并且减少孤独感[2-4]。然而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纷繁复杂，且还在呈现日趋多元的势态。比如老年人常用的手机软件（微信、抖音、快手、头条、淘宝等），从内容上分类，既有娱乐休闲型信息，又有知识技能型信息[5]。从形式上分类，既有新闻、小说、哲理名言汇编等文字类的信息，又有搞笑、风景、奇闻逸事等视频类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究竟哪类能够提升中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尚未有明确的说法。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手机社交媒体不同功能的使用对中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以期在未来的数字媒体助力老龄化社会发展中，能够更加便捷、更加精准地为中老年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线上收集了 152 份符合研究条件的参与者数据，删除具有明显作答规律的问卷、总分在 3 个标准差外的问卷，以及趋中反应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134 份，占总发放比为 88.16%。有效问卷的人口学变量数据见表 1。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表 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信息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年龄段	50~59 岁	66	49.3
	60~69 岁	44	32.8
	70~79 岁	16	11.9
	80 岁及以上	8	6.0
户籍类型	乡村	66	49.3
	城镇	68	50.7
性别	男	31	23.1
	女	103	76.9
受教育程度	义务教育及以下	72	53.7
	高中、中专及以上	62	46.3
经济水平	一般及以下	92	68.7
	比较宽裕及以上	42	31.3
婚姻情况	已婚	103	76.9
	独居（未婚、离婚、丧偶等）	31	23.1
健康状况	一般或较差	69	51.5
	较好或非常健康	65	48.5

为人口学信息调查，如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共 7 个条目，用于后续的比较分析。第二部分是对郭丽娜（2019）《老年人微信使用情况和幸福感的调查问卷》进行改编，使其在措辞和表述上符合本研究的现状调查内容[6]，该部分共计 7 条目。第三部分为宋伊（2013）编制的《老年人自我价值感量表（GSWS）》[7]。该量表共 25 个条目，包括人际价值感、影响力价值感、生理价值感、规则价值感、心理价值感共五个维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自我价值感越高。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40，具有较高的信度，整个调查问卷的第三部分经主成分因子分析，该量表截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计 5 个，累计贡献率为 63.11%。降维结果与原版量表一致，结构效度良好，符合使用条件。

（三）研究流程及数据统计

采集数据的方式为依托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调查问卷。对收集回的数据应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包括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考察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2 个，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8.10%，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结果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中老年群体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自我价值感的描述统计

在 134 份有效数据中，有 121 人使用过微信、抖音、快手、头条等手机软件，占比超过 90%。在经常使用的手机软件中，微信最多，为 77 人，占比 57.5%；抖音次之，28 人，占比 20.9%；使用快手的有 15 人，占比 11.2%；使用头条、支付宝等其他软件的有 14 人，占比 10.4%。

在使用手机软件频率方面，每周 1~2 次有 15 人，占比 11.2%；每天 1~2 次的有 38 人，占比 28.4%；每天 3~4 次的有 26 人，占比 19.4%；每天 5 次及以上的有 55 人，占比 41%。微信等社交软件好友数量方面，好友在 20 个以内的有 47 人，占比 35.1%；好友 20~50 个的有 29 人，占比 21.6%；好友 51~100 个的有 33 人，占比 24.6%；好友 100 个以上的有 25 人，占比 18.7%。

用途方面，使用手机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聊天的有 53 人，占比 39.6%；最主要的功能是观看视频的有 37 人，占比 27.6%；最主要的功能是阅览文章的有 30 人，占比 22.4%；最主要的功能用于支付、购物、交易等的有 14 人，占比 10.4%。具体信息类型如表 2 所示。

调查对象自我价值感问卷得分如表 3 所示。

（三）社交媒体使用影响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推断统计

通过对中老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的统计分析发现，半数以上的中老年人最常用的软件是微信，其他软件如抖音、快手等加起来占比不超过五成。因此，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最常用的是微信与最常用的不是微信这两个群体进行自我价值感差异比较，结果发现，群体间自我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259$，$p<0.05$。其中，五个维度结果有所不同，人际价值感差异不显著，$t(132)=-1.627$，$p=0.106$。影响力价值感差异不显著，$t(132)=-1.315$，$p=0.191$。生理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849$，$p<0.05$。规则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231$，$p<0.05$。心理价值感差异不显著，$t(132)=-1.673$，$p=0.097$。

通过对中老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主要功能进行分析发现，一类中老年人最常用的功能是沟通聊天，另一类中老年人最常用的功能是观看视频。沟通聊天无论是通过文字、语音还是视频电话，一定是需要至少两个人参与的。但观看视频，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搞笑片段，一个人也能进行。因此，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这两类个体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发现，这两类中老年群体的人际价值感表现出明显差异，$t(88)=2.086$，$p<0.05$。具体表现为，手机社交媒体使用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聊天的群体，比手机社交媒体使用最主要的功能是观看视频的群体人际价值感更高。

（四）其他人口学因素影响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推断统计

除手机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数据收集以外，本研

表 2 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内容的具体类型

信息内容类型	人数	比例（%）
影视作品	31	23.1
搞笑视频	25	18.7
直播购物	16	11.9
自然风景	6	4.5
生活技巧	15	11.2
科学常识	22	16.4
哲理文案	6	4.5
时政新闻	13	9.7

表 3 调查对象自我价值感问卷结果

维度	人数	M±SD
人际价值感	134	3.80 ± 0.71
影响力价值感	134	3.38 ± 0.75
生理价值感	134	3.62 ± 0.82
规则价值感	134	3.95 ± 0.71
心理价值感	134	3.93 ± 0.77
总分	134	3.74 ± 0.65

究也采集了研究对象的一些人口学信息。经分析发现，健康情况对自我价值感有显著影响，相比于健康情况一般或较差的人，健康情况较好的中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感更高，t（132）=4.285，p<0.05。五个维度均表现出明显差异，人际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4.205，p<0.05。影响力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886，p<0.05。生理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5.077，p<0.05。规则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3.031，p<0.05。心理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3.086，p<0.05。

此外，婚姻状况对自我价值感影响显著，分析发现，已婚中老年群体比未婚、离婚、分居、丧偶等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显著更高，t（132）=–2.507，p<0.05。其中，人际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293，p<0.05。影响力价值感差异不显著，t（132）=–1.166，p=0.246。生理价值感差异不显著，t（132）=–1.972，p=0.051。规则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3.268，p<0.05。心理价值感差异显著，t（132）=–2.235，p<0.05。

四、讨论

（一）手机社交媒体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类型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存在影响。微信相比于其他软件，对增加中老年人自我价值感有明显帮助。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此款软件刚刚问世时，深受大学生群体和职场白领的青睐，随着相继增加了移动支付、公众号、小程序插件、视频号等功能，其受众群体愈加广泛。时至今日，已然成为一款主流通信软件。由于其操作简单、应用场景丰富、应用便捷，其对于使用者的幸福感的提升是有显著作用的。尤其是老年人，微信使用可以提升该群体的生命意义感，从而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8]。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蒋俊杰等人（2023）的研究结论。微信的本质是即时通信工具。因此，不管软件新增怎样的插件与功能，聊天功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也是研究中，详细分析沟通聊天与其他功能对于自我价值感影响差异比较的原因。分析发现，将聊天视为手机第一功能的人，人际价值感显著高于将观看视频视为手机第一功能的人。正如前文所述，沟通聊天，无论使用手机社交媒体还是面对面进行，其参与者不能少于两人。这说明，聊天作为一种社交方式，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而人际交往本身就是人际价值感的体现[9–10]。这个结果提示我们，中老年群体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形式提升人际价值感，进而提升自我价值感。

（二）影响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其他因素

在本研究结果分析中，我们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更有帮助，这与李添（2018）、王伟平（2019）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11–12]。由于老年群体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再有工作相关事务，因此，生活重心主要集中在家庭。而家庭中，配偶之间相互照料所带来的精神慰藉是其他关系不可及的，这就使得婚姻状况成了影响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的重要人口学因素。此外，健康状况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也存在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不仅在生理价值感这一维度表现更好，而且在总分以及各个维度上，全部显著好于健康状况一般的个体。这与董晓帅（2023）的研究结论一致[13]。身体健康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14]。

五、结论

手机社交媒体软件使用类别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感存在影响，表现为将微信作为最常用软件的中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将其他软件作为最常用软件的中老年人。从具体功能来说，将沟通聊天作为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功能的中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将观看视频作为社交媒体软件最常用功能的中老年人。此外，健康状况对自我价值感存在影响，健康状况良好的中老年人比健康状况稍差的中老年人自我价值感更高。婚姻状况对自我价值感存在影响，已婚的中老年人比未婚、离婚、丧偶等情况的中老年人自我价值感更高。

参考文献

[1] 伍麟，杨旸．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心理价值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58(06): 65–77.

[2] NEWMAN L, STONER C, SPECTOR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older adult us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Ageing & Society, 2021, 41(02): 377–402.

[3] ROLANDI E, VACCARO R, ABBONDANZA S, et al. Loneliness and social engagement in older adults based in Lombardy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 cours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21): 7912.

[4] 郭小弦，申欣悦，李晓光．共享数字时代的福祉：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J]. 宁夏社会科学，2023(05): 156–165.

[5] 滕露．数字鸿沟·原乡观念·城市偏见：贵阳市随迁老人数字融入困境研究 [D]. 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23.

[6] 郭丽娜．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社交媒体对老年群体的价值研究 [D]. 昆明：云南大学，2020.

[7] 宋伊．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及其与身体自我关系的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2013.

[8] 蒋俊杰，陈珺怡，喻婧．老年人微信使用与获得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23, 21(03): 367–373.

[9] 程科，黄希庭．试析自我人际价值（下转 92 页）

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方法整合与路径探索

赵广一 高子雯 王晨曦 吴培萌 刘 雨

摘要：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犯罪现象及不良行为问题愈发严重，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聚焦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现状，深入探寻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方法与路径。以儿童需求为导向，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运用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及深度访谈法，研究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生命教育中的实践应用。研究发现，三位一体的服务方法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有效促进儿童生命认知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提升，为构建系统性生命教育体系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研究也存在不足，如需要方法整合的完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健全等。这些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以期形成更加完善、高效的生命教育体系，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关键词：社会工作；未成年人生命教育；方法整合；路径探索

一、研究背景

当下，生命教育的缺失致使一系列令人忧心的现象频繁涌现。相关研究表明，自杀已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社会问题，相关极端行为与心理风险在青少年群体中均有一定比例存在[1]，这一严峻形势警示社会各界需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加快构建多方协同的生命教育体系。

生命教育作为应对此类问题的有效手段，党和国家给予高度关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向》等政策文件明确将生命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生命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与价值指引。

但目前，未成年人生命教育面临诸多困境。受传统文化对死亡的回避态度、西方价值观渗透、学校教育偏重升学、缺乏专业生命教育等因素影响，儿童对生命的理解较为模糊。再加上经济快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盛行，少年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难以正确认识生命，进而引发一系列负面事件。

社会工作坚持尊重生命、促进个体全方位成长的核心理念，在助力人们挖掘内在潜能，化解社会问题并防范问题滋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凭借科学

（上接 91 页）

感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03): 37-42.

[10] HARTER S, WATERS P, WHITESELL N R. Relational self-worth: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worth as a person across interpersonal contexts among adolescents[J].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03): 756-766.

[11] 李添 , 陈翔展 , 尹述飞 , 等 . 婚姻状态对空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 2018, 38(16): 4058-4059.

[12] 王伟平 , 赵彩杰 , 邓飞 . 社区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及对生存质量影响 [J]. 社区医学杂志 , 2019, 17(11): 623-626.

[13] 董晓帅 . 身体健康与老年人老化态度及其干预研究：主观年龄和自我价值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D]. 重庆 : 西南大学 , 2023.

[14] 柴一凡 , 郭森 . 主观年龄对老年人公益活动参与的影响——基于 CLASS2014 年数据分析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0(03): 167-17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青年教师专项“模块化教学视域下老年人沟通方式的探索——以社交媒体使用为例”（202410）；辽宁省 2023 年度基本科研项目“辽宁省农村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特征与对策”（JYTMS20231851）。

（作者：宋爽，辽宁教育学院〈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健康服务与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刘昱莹、赵祎，辽宁教育学院〈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健康服务与管理教研室专业教师、助教；张小龙，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检察院科员、三级检察官助理）

理论和专业服务，不仅关注个体生长，更重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与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需求高度契合。发挥社会工作体系化、整合性的优势，弥补传统课堂的局限，既可以预防自我伤害或自杀行为，又能引导受教育者尊重生命、肯定生命的价值，促进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升生命意义感，成为当下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重要探索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起源于系统理论和生态学，由美国社会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将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体与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与生命教育的系统性需求高度契合[3]。

（二）研究思路

1. 以儿童需求为导向

儿童是生命教育的核心服务对象，其需求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开展服务前，应深入了解儿童在生命教育方面的需求，包括生命安全知识、生命价值观念、生命情感体验等。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儿童及其家长、教师等对生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介入策略提供依据。

2. 协调多系统关系

家庭、学校、社区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对生命教育影响重大。社会工作介入时，需注重协调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形成教育合力。一方面，与家庭建立紧密联系，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生命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共同推进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同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生命教育实践活动。

3. 整合工作方法

在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服务对象既是独立个体，也是群体和社区的一员。个人问题与群体、社区问题相互关联，解决个人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群体和社区因素。因此，应灵活运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满足儿童多样化需求。

（三）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收集和分析现有的文字记载、各类标记与符号等资料进行研究。通过系统收集、整理与分析国内外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策略，探索其有效路径与方法整合策略。

笔者通过知网等学术数据库，广泛查阅了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相关论文，深入了解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 参与式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深度融入研究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不公开其真实身份，而是以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方式，开展具有隐蔽特性的观察。

笔者参与生命教育公益创投项目的策划、实施，在此期间获取了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在工作期间与社区儿童主任、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

3.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采用无预设、直接且一对一的交流模式，双方能充分展现主动性与创造性，访谈过程极具弹性与灵活性[4]。本研究在开展生命教育介入服务的前后，对项目涉及的部分儿童、家长、社会工作者以及学校教师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通过对儿童的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和需求，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策略提供依据；对家长的访谈反映了家庭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和支持作用，也揭示了家校合作的可能性和挑战；对教师的访谈则揭示了学校在生命教育方面的现状和困境，以及他们对专业成长和课程发展的期望；对社工的访谈则揭示了他们在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和经验教训，为方法整合和路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依据。

三、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方法整合体系

未成年人生命教育涵盖认知、情感、行为等多层面发展，需整合不同的工作方法。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为整合提供理论依据。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它们各自独特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完整框架。个案工作是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基础，通过了解个体需求，为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小组工作是个案工作的延伸，将个体融入团队，提升其社交能力，同时为社区工作提供团队力量。社区工作则是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拓展，将生命教育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实现个体、团队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各种方法在不同系统层面发力，整合后能实现个体、群体与社会环境的有机融合，促进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全面推进。

（一）“三位一体”的服务方法应用

1. 个案工作：提升心理韧性

少年儿童处于身心发展阶段，情绪和心理调节能力较弱，面对挫折时容易出现消极情绪，甚至产生自杀或自伤想法。个案工作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面对面交流，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治疗和系统环境改造服务。个案工作强调一对一、个性化服务，根据少年儿童的个性特征分析诊断问题，建立信任平等的关系，制定切实可行的辅导方案。通过家庭与社会系统的有力支持，循序渐进地调整案主的心理状态，提升其应对逆境的适应能力，

深度挖掘内在潜力，促使自我完善。

2. 小组工作：培养社交技能

小组工作以团体为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与团体成员共同界定需求，发挥成员潜能，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功能。少年儿童对周围环境敏感，信息筛选能力不足，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

小组工作会把面临相同问题、处于相似情境的少年儿童汇聚起来，帮助他们改变态度，提升人际关系和应对环境的能力。社会工作者设计系列主题活动，如破冰游戏、生命体验、角色扮演等，引导少年儿童分享经验，达到生命教育的目的。

3. 社区工作：整合社区资源

社区工作是以社区为对象，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活动，挖掘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福利，促进社区进步。积极发动、组织社区居民投身集体活动，对社区资源进行挖掘整合，以此化解社区问题，增进社区福利，助力社区进步。把社区工作模式运用到未成年人生命教育领域，将服务对象有序组织起来，探寻并利用社区资源。运用社区倡导的工作方法，通过居民议事会推动制定《社区生命教育公约》，联合物业公司打造“生命教育长廊”等公共空间，构建起利于少年儿童群体开展社会交往的平台，大力发动少年儿童主动参与社区活动。通过活动参与，协助少年儿童完成自我认知、实现自我肯定，逐步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导他们勇敢迎接生活的挑战。

四、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

“三位一体”的方法体系为实践提供了工具支撑，而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协同合作，在方法体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专业方法嵌入家庭、学校、社区场域，构建起具有可持续性的教育生态环境，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携手推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学校应发挥引领作用，整合家庭与社会教育资源，通过家长学校、社区活动，引导家庭培养孩子良好生活习惯，助力社会提升孩子人际交往能力，促使其树立积极生活态度，凝聚多方教育合力。

（一）家庭：构建生命教育第一课堂

家庭，是儿童成长历程中首个且至关重要的环境。父母，是儿童养育、照顾与教育的首要责任人。父母所具备的监护能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了最基础、最关键的保障防线，重要性不言而喻[5]。对社会工作者而言，在家庭层面可以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根据儿童的实际情况和家庭背景，为家长制定个性化的家庭教育计划，包括生命教育内容的安排、教育方法的选择等。同时，开展家长赋能计划，建立“线上微课 + 线下工作坊”的培训体系，引导家长通过学习和亲身体验，提升自身对生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家长生命教育的意识与能力。此外，建立亲子共学机制，设立“家庭生命教育日”，通过共同参与急救演练、自然观察等活动，促进代际生命认知交流。

（二）学校：打造生命教育课程共同体

学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和儿童身心特点，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生命教育课程，研发校本课程，内容涵盖生命认知、生命安全、生命价值等方面。通过跨学科整合，将生命教育融入其他学科教学，如在语文教学中融入生命主题阅读、在生物课开展“植物生长观察日记”项目。

建立学校社工师、心理咨询师、教师的协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三师联动”，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社工实务经验、心理咨询技术和教师课程资源，开发生命教育活动案例库；实施“影子计划”，社工与心理咨询师定期驻校观察，教师参与专业督导，形成“发现问题—联合干预—跟踪评估”的闭环服务流程。例如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教师负责课堂渗透教育，社工组织“生命价值”主题小组，心理咨询师开展个体创伤辅导，共同制定《校园生命守护公约》，实现预防性干预与发展性支持的有机结合。

（三）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建立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与联动机制。家庭深度参与学校课程设计，促进教育理念统一；学校与社区双向赋能，学校开放生态环保等课程资源融入社区活动，社区提供生命体验馆等实践基地，形成“课程 + 实践”联动模式；社区组织亲子实践，并收集家庭反馈，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通过“家庭—学校—社区”联席会议评估教育效果、调整策略，搭建统一资源平台共享课程、活动及师资信息，最终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生命教育网络，为儿童提供持续支持。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方法，并探索家庭、学校、社区等层面的介入路径，为儿童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生命教育支持。突破传统视角，创新性地以社会工作角度介入生命教育，探索社会工作如何在家庭、学校、社区等不同场景下介入生命教育，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方案，推动生命教育的普及。

本研究虽然整合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但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实现无缝衔接和高效运用，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各种方法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形成更加完善、高效的生命教育体系。

研究虽然进行了一些实践，但对于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研究尚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应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估体系，及时收集和分析数据，以便不断优化和改进工作方法和路径。

（下转 95 页）

高攻击性游戏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晨巍 吴昱辰 朱　正 张成涛 王子晔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攻击性游戏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影响机制。基于符号暴力理论并融合认知重构的视角，整合社会学习理论、一般攻击模型和认知失调理论，构建“媒介渗透—个体共振—环境调制”三元交互模型（以下简称“三元模型”）。研究表明，暴力游戏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是符号生产、个体认知与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产物。暴力游戏通过视觉美化与叙事策略，借助神经奖赏机制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敏感度；同时，高攻击性特质和家庭功能缺失形成共振，进而加剧暴力外化风险；此外，文化语境呈现悖论性调节作用，城乡青少年对暴力符号的解码差异显著影响其现实转化路径，而代际文化断裂则进一步强化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认知割裂。

关键词：高攻击性游戏；文化符号；认知重构；文化调节；青少年犯罪心理

一、问题提出

当前，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与暴力游戏普及率的同步攀升，引发社会对数字时代犯罪心理诱因的深度关切。现有研究证实暴力游戏接触与攻击性行为存在关联，但对其内在机制的解释仍存在明显分歧：行为主义学派取向强调游戏机制通过“刺激—反应”模式直接强化攻击行为；而认知学派则关注暴力符号对个体道德判断框架的潜在解构。这一理论争议导致现有研究难以系统解释为何在相似条件下，部分玩家出现攻击行为外化，而其他群体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整合行为主义学派和认知学派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将暴力游戏的影响机制归纳为媒介、个体和环境三个相互作用维度，并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媒介维度：暴力游戏如何通过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重构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与情感反应？

个体维度：青少年的攻击性特质与家庭功能缺失如何调节暴力符号的认知内化过程？

环境维度：文化语境如何在暴力游戏的认知渗透中发挥双向调节作用？

现有理论分歧部分源于单一解释框架的局限：行为主义学派过度关注暴力游戏的直接行为强化作用，认知学派偏重符号化暴力对道德框架的解构过程，而神经科学视角侧重长期暴露对大脑功能的适应性改变。为系统揭示暴力游戏的多层级影响机制，本研究尝试整合文化符号暴力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构建三元模型，以弥合现有理论对“影响异质性”的解释鸿沟。

二、理论基础与模型整合

针对现有研究对“同类型游戏对青少年影响差异

（上接 94 页）

参考文献

[1] 何美绮 . 青少年生命意义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 复原力的中介作用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2020(31): 25−28, 33.

[2] 刘淑娟 , 杨丽敏 . 论社会工作介入生命教育之路径 [J]. 学术交流 , 2012(03): 167−170.

[3] 雷静 , 谢光勇 . 近十年来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综述 [J]. 教育探索 , 2005(05): 92−94.

[4] 段书祥 .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 [D]. 成都 : 西华大学 , 2017.

[5] 王蓉 . 小组工作介入困境儿童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 [D]. 太原 : 太原科技大学 , 202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用生命影响生命：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生命教育的方法整合与路径探索”（202411276036Z）。

（作者系南京工程学院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

显著”的解释困境，本研究以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理论为核心，结合社会学习理论的模仿逻辑、一般攻击模型的“认知—情感”双路径机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神经适应视角，构建三元模型。这一整合框架能够同时解释暴力符号的隐蔽渗透（媒介维度）、个体特质与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个体维度），以及文化背景的缓冲或催化效应（环境维度），从而系统揭示暴力游戏影响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动态路径。

（一）理论基础

1. 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理论

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理论由布尔迪厄提出，强调权力通过文化符号的“自然化”过程隐蔽塑造个体认知框架。暴力并非仅指物理强制，而是通过语言、图像等符号将特定价值观内化为“理所当然”的认知模式。在游戏情境中，符号生产体现为设计者利用视听技术将暴力行为美学化，弱化其现实危害性；通过击杀奖励机制激活大脑愉悦中枢，强化“暴力—愉悦”关联；最终借助暴力符号与消费主义的结合，使暴力行为成为青少年身份建构的符号化象征，从而模糊道德边界。

2. 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行为通过观察、模仿与强化习得，强调环境与个体认知的交互作用。青少年通过观察游戏角色的暴力行为及其正向反馈，形成攻击性行为的认知模板，并通过自我学习调节行为外化。具体表现为：游戏角色提供攻击行为的示范，高攻击性特质的青少年更易模仿；击杀奖励机制作为正向反馈强化暴力行为习惯；而“游戏虚拟性”标签则显著降低青少年的道德约束力。

3. 一般攻击模型

该模型整合短期情境因素与长期人格特质，提出暴力刺激通过认知启动与情感脱敏双重路径诱发攻击行为。从短期效应看，暴力游戏中的敌意场景会激活玩家的攻击性认知图式，提高现实冲突中的敌意归因倾向；从长期效应看，持续暴露于暴力刺激会使玩家情感反应阈值升高，导致冲动行为增加的效应[1]。

4. 认知神经科学视角

长期接触暴力符号引发大脑的适应性变化，包括对暴力刺激的情感反应脱敏，以及共情能力的降低；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玩家的前额叶—边缘系统连接减弱，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抑制冲动行为的阈值降低，最终导致道德判断能力下降。

（二）理论模型整合

根据上述理论，本研究从媒介、个体、环境三个层面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

媒介层面，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理论揭示暴力游戏通过符号生产与神经奖赏机制重构道德认知，体现为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和认知渗透。具体表现为游戏暴力的视觉美化结合大脑愉悦机制与道德脱离策略，显著降低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道德敏感度，长期暴露者将出现道德认同度的系统性下降。

个体层面，社会学习理论与一般攻击模型共同解释攻击性特质与家庭功能的共振放大效应，体现为个体特质的共振放大。具体表现为高攻击性特质个体的神经敏感性加剧暴力符号的认知内化，而家庭功能缺失则通过削弱道德反思能力，显著提升暴力行为外化风险。

环境层面，认知神经科学与文化心理学阐明文化语境对行为外化的双向调节作用，体现为文化语境的双向调节。具体表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观虽可通过道德反思能力抑制部分攻击性行为外化，但因对权威暴力叙事的盲从可能助长“暴力工具化”认知；农村青少年因现实暴力经验与虚拟符号的叠加，其攻击性行为迁移率显著高于城市群体。

1. 媒介维度

暴力游戏通过三重机制渗透道德认知：（1）如感官刺激——游戏暴力的美学化设计；（2）神经奖赏——击杀奖励强化“暴力—愉悦”关联；（3）暴力行为的正义化包装——通过叙事策略消解现实道德约束。

2. 个体维度

攻击性特质与家庭功能的交互作用：高攻击性个体易将游戏暴力迁移至现实冲突；情感忽视或管教缺位导致青少年依赖游戏中的“暴力掌控感”补偿现实无力感，形成行为外化的心理机制。

3. 环境维度

文化背景通过双重路径调节行为外化阈值：集体主义文化既可通过群体认同感抑制公开施暴，又可能因对权威叙事的盲从合理化暴力工具化；城乡解码差异表现为部分农村青少年因现实暴力经验与游戏符号的叠加，更易模仿游戏中的“复仇逻辑”。

4. 模型动态性

三个维度并非独立作用，而是通过交互形成动态影响机制：文化符号隐蔽影响的初级渗透，游戏设计通过感官刺激与行为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奖赏机制；认知情感重构的中介转化，暴力符号在神经适应与道德脱离的双重作用下，重构个体对暴力的认知图式与情感反应；社会文化语境的终极调制，文化价值观与结构性因素决定暴力认知外化为现实行为的阈值与形式。

三、影响机制解析

本研究以文化符号的隐蔽影响理论为核心，融合认知重构理论的视角，构建暴力游戏影响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多层级解释模型。通过解构游戏媒介的符号生产机制、个体认知的神经适应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调节逻辑，形成以下分析框架与机制解析（见图1）。

（一）文化符号隐蔽影响的编码解码循环与认知渗透机制

暴力游戏通过三重符号系统完成对暴力行为的合理化建构并渗透至青少年的认知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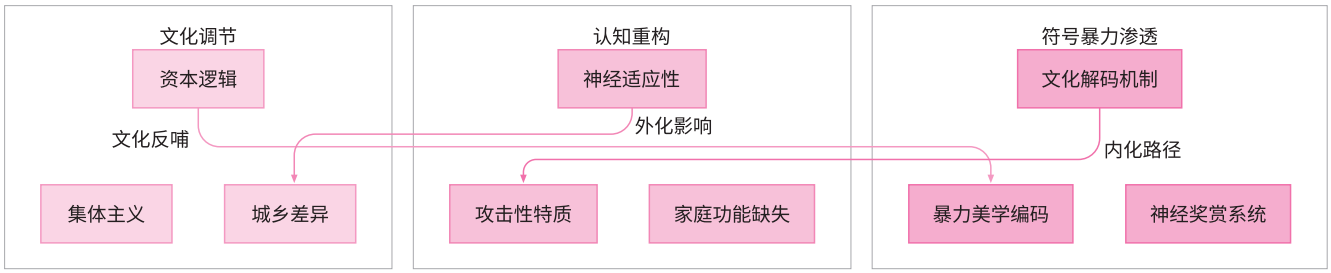


图 1 调节机制整合框架

1. 符号生产的技术操控与感官渗透

游戏设计者利用视听技术与叙事策略，将暴力行为编码为具有“合法性”与“愉悦感”的符号集合。例如，“爆头特效”通过视觉夸张化将暴力行为转化为美学符号消解其现实危害性；“正义暴力”的叙事包装则将暴力重新定义为“必要手段”或“英雄义务”。

2. 符号的解读方式的认知偏差与神经重塑

青少年在游戏过程中通过“游戏化认知滤镜”对暴力符号进行选择性解码。这一过程激活道德脱离机制，具体表现为：责任转移（“游戏里杀人不是我杀人”）；后果最小化（“虚拟暴力不会造成真实伤害”）；道德合理化（“消灭敌人是为了保护队友”）。

长期接触暴力符号引发大脑的适应性变化，包括奖赏系统对暴力奖励信号的敏感性增强，前额叶皮层对冲动行为的抑制能力下降，形成“暴力行为→神经奖赏→行为重复”的成瘾循环。

3. 符号内化的行为闭环

游戏中的击杀奖励系统建立了“暴力收益”的直接关联，通过神经回路强化“暴力—愉悦”的强关联。这种闭环设计不仅完成文化符号隐蔽影响的初级渗透，还通过长期神经适应导致情感脱敏与自我控制能力弱化，最终重构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框架[2]。

（二）认知重构的神经心理双路径与个体环境共振机制

暴力游戏的影响通过神经适应与心理策略的双重路径重构认知结构，并与个体特质、家庭功能形成共振效应。

1. 大脑的适应性变化驱动的脱敏与抑制失衡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暴力符号会导致情感钝化和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前额叶皮层对冲动行为的抑制功能减弱，加剧攻击性行为外化的神经基础[3]。

2. 道德认知框架的解构与重组

青少年通过道德推脱策略降低道德反思能力，逐步将暴力行为纳入“可接受行为”的认知范畴。高攻击性特质个体的注意偏向与敌意归因偏差进一步催化这一过程，形成暴力认知向现实迁移的心理模板。

3. 家庭功能缺失的“认知塌陷”效应

家庭情感支持缺位会削弱道德反思能力，促使青少年将游戏中的暴力逻辑作为现实冲突的解决策略。例如，长期遭受家庭忽视的个体更易通过游戏中的“暴力掌控感”补偿现实无力感，形成行为外化的高风险路径。

4. 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共谋逻辑

游戏产业资本通过暴力符号的商品化运作，将暴力行为转化为可交易的身份象征。这种商业化逻辑与消费主义文化结合，使暴力符号的消费成为青少年身份建构的一部分，进一步模糊暴力行为的道德边界。

（三）社会文化语境的缓冲催化与文化调节悖论

文化背景通过价值观冲突与解码差异调节暴力符号的现实转化阈值，呈现复杂双向效应。

1.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双刃性

保护性抑制与批判性反思的消解：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与“面子维护”，通过社会规范内化抑制公开攻击行为；但对权威叙事的盲目服从，可能削弱个体对暴力本质的反思能力，形成“暴力工具化”认知。

2. 城乡文化解码的异质化逻辑

城市青少年的“娱乐化解码”与农村青少年的“现实叠加效应”：在消费主义浸染下，城市青少年更易将暴力符号视为娱乐消费品，通过“符号距离化”缓解道德焦虑；而农村青少年因现实暴力经验与游戏暴力的符号刺激产生认知共振，可能将虚拟暴力经验作为现实冲突的解决模板。

3. 代际文化断裂的隐性风险

青少年与父辈的代际文化隔阂导致家庭难以有效干预暴力符号的解码过程。这种代际断裂加剧虚拟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认知割裂，使其更易陷入“游戏化生存逻辑”。

该模型揭示暴力游戏影响犯罪心理的系统运作机制：从微观神经适应到宏观文化传播与复制，暴力符号的渗透始终与资本逻辑、集体意识紧密交织，使青少年在无意识中成为暴力美学商业化的共谋者与受害者[4]。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高攻击性游戏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多层级影响机制，核心在于暴力符号通过感官刺激、叙事策略与大脑的愉悦机制的协同作用，逐步解构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道德认知框架。游戏设计中“正义暴力”的叙事包装与击杀奖励的闭环设计，模糊（下转 98 页）

数智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提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服务研究

胡思远 徐韦云* 闫鹏飞 李 川

摘要：双相情感障碍疾病负担日益加重，精神卫生服务模式亟待优化，促使朋辈互助团体服务受到更多关注。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为该服务模式赋能，但也伴生着不容忽视的伦理与实务风险。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并结合一线实务经验，综合分析了当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在数智化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和核心挑战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后的服务提升路径。研究发现，本土实践呈现出三大特征：与社区支持网络深度整合、数智化工具应用仍相对局限、患者家属高度参与。同时，面临数智服务伦理风险凸显、服务评估标准偏颇、社会工作者系统参与缺位等主要挑战。为此，本研究提出应构建规范化与伦理先行的数智工具应用框架，完善社会工作者为核心的专业服务体系，并着力培养适应数智化场景的复合型朋辈支持人才，以推动该服务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双相情感障碍；朋辈互助团体；本土化；数智化；社会工作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1]，会显著降低患者心理社会功能和增加早逝风险[2]，双相情感障碍疾病负担列全球第 20 位[3]。单纯药物治疗无法解决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社会功能下降的问题，约 80% 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工作丧失[4]。对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需要综合考虑药物治疗、心理社会干预和护理人员的参与[5]。

（上接 97 页）现实与虚拟现实的伦理边界，通过长期神经适应引发道德敏感度显著下降，形成“暴力合理化”认知倾向。这一过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个体特质及外部环境形成共振。高攻击性特质个体的神经敏感性与家庭功能缺失的叠加，加剧暴力行为的外化风险；而文化语境的双向调节效应表明，集体主义价值观虽通过群体认同感抑制部分攻击性行为，却可能因对权威叙事的盲从助长暴力工具化认知[5]。城乡文化解码的异质性进一步凸显现实暴力经验与虚拟符号的叠加效应，农村青少年更易将游戏暴力迁移至现实的冲突解决中。

研究强调，暴力游戏对青少年心理的侵蚀是符号生产、个体认知与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产物。游戏产业资本通过暴力符号的商品化运作，与消费主义文化合谋，使青少年在无意识中成为暴力美学商业化的共谋者与受害者。城乡文化背景的解码逻辑差异深刻影响暴力符号的现实转化路径，代际文化断裂则加剧青少年在虚拟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认知割裂。

本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暴力游戏与犯罪心理的复杂关联提供跨学科理论框架，同时为家庭、教育机构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启示。唯有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方能在虚拟现实与现实交织的认知生态中守护青少年的道德根基，构筑健康成长的数字防线。未来需进一步探索文化价值观影响暴力认知的神经机制，并开发可量化评估的干预工具，以实现对高危群体的精准识别与早期介入。

参考文献

[1] 罗红 . 暴力电子游戏对玩家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 攻击性特质的调节作用 [D]. 重庆 : 西南大学 , 2016.

[2] 曹钧 . 青少年逆反心理的相关因素分析 [D]. 南京 : 南京医科大学 , 2008.

[3] 郭开元 . 中国未成年犯的群体特征分析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 2015, 34(01): 34−37.

[4] 王熠姝 . 暴力电子游戏对大学生攻击性和情绪的影响 [D].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 , 2014.

[5] 李晶晶 .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述评 [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9, 10(03): 22−25.

（作者系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本科生）

世界卫生组织《2013—2030 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强调朋辈互助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社会功能重建的关键作用[6]，《“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则呼吁通过社区康复与人文医疗双路径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7]。随着患者康复需求增长和政策引导深化，在数智化技术发展赋能背景下[8]，朋辈互助团体（peer support group）方法进一步应用于双相情感障碍治疗的前景日益受到关注。

基于以上内容，本文研究数智化时代本土环境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的应用现状与挑战，提出社会工作者参与下的对策建议。

一、数智化背景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的国际经验

朋辈互助团体指相似经历者在特定支持下所组成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团体，通过不批判的方式，构建一个安全互助的社群。从而重建自我意识，提升自我效能感并建立疾病自我管理能力，让自身双相情感障碍疾病得到有效康复。传统模式下，社会工作者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协助链接资源以实现参与者社会融合、推动朋辈互助团体协同社区支持、参与多专业合作并协助做医疗决策、参与危机干预、政策倡导和服务方案研究[9]。

（一）数智化技术驱动服务模式迭代

传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开展方式虽也有部分线上内容，互助来源依旧是真人。但数智化技术快速发展叠加疫情带来的影响，新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互助团体可借助数智化技术进步，不受场景限制，使传统线上服务效果更接近线下体验[10]。互助来源也开始转变为纳入真人康复经验的数智化技术在非敏感话题上提供部分辅助。当前，数智化技术已可模拟真人互助成员，理解寻求帮助者的意图，保持富有同情心、建设性和非评判性风格[11]的同时以支持性的方式回应。

（二）服务效果评估向人文关怀深化

传统研究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服务时，常用定量方法评估症状缓解、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提升效果[12]。且疾病恢复的综合考量显示疾病负担减轻[13]。但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的服务效果验证应回归社会工作者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国外经验是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关注朋辈互助团体中参与者的互动模式和对团体的主观体验，探究出服务起效的有效因子分别是保持日常规律、社交联结感、积极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与管理[14]，这种效果验证方式的深化或可避免掉入仅为改善数据而设计活动的怪圈。

（三）社会工作倡导下的政策支持升级

社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为推动社会正义而进行政策倡导，欧盟已在 2023 年 6 月 7 日发布《全面精神健康方法》，计划以 12.3 亿欧元支持成员国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将包括朋辈互助团体在内的非医疗干预措施纳入核心内容[15]。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政策对朋辈互助团体服务模式的支持，可使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更好发展。

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的本土化现状与挑战

（一）与社区支持网络的整合及其深层挑战

当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发展尚在起步阶段，部分实践探索依托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开展[16]，主要仍依托社区支持网络开展。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中已将朋辈互助工作方法纳入[17]。

上海市“阳光心园”实践已覆盖全市所有街镇，其中多数有社会工作者直接或者间接参与[18]。但因缺乏标准化服务框架的指引，导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服务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可推广的本土服务规范。且当前我国无明确规范要求社会工作者参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更无明确要求社会工作者发挥什么作用。据国外经验，当朋辈互助团体发展进入数智化时代，社会工作者在促进互助团体安全、防止成员过度依赖、处理成员缺席和不当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19]。社会工作者系统参与不足是数智化时代背景下本土双相情感障碍朋辈互助团体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且现有服务成效评价主要聚焦参与人数、临床症状改善和参与者满意度测评等表面指标，忽视对朋辈互助团体过程质量、参与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及伴随伦理风险的关注，以上缺失会掩盖本土双相情感障碍朋辈互助团体发展的结构性问题[20]。

（二）数智化工具的初步应用与伴生伦理困境

国内移动互联网普及使众多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互助微信群应运而生，群成员在线上分享疾病康复经验。其显著特征是互助来源依旧是真人。在当前数智化工具应用受限的情况下，已有学者指出算法偏见、服务门槛和患者隐私保护等伦理困境，提出应思考如何构筑充满希望的“有算法伦理”的社会，让数智化技术发展向善，更大限度改善朋辈支持服务[21]。

（三）家属服务与朋辈互助团体的深度协同

在本土实践中，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服务存在更多协同家属服务的特点。作为一种严重精神障碍，其症状表现多变且不稳定，患者家属承受更繁重的护理负担，社会偏见和误解也给家属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22]，促使家属更积极地参与患者朋辈互助群体的协作。加入线上互助平台可为家属提供实时交流的渠道。

在差序格局背景下，家本位观念使家属对患者的责任感更强。但非血缘关系也可根据实用功能形成拟亲缘机制[23]。因此，朋辈互助群体协作和数智化工具应用可依功能成为外层支持圈层。通过家属与朋辈互

助群体协作，患者能获得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家属还充当“数字守门人”，帮助患者使用数智化工具并免受侵害。

三、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本土化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智化技术应用体系

在数智化技术应用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融合的初始阶段，需建立以安全为导向、本土适应的治理体系。应优化数智化模型训练方法并提升算法的可解释性，减少算法误判和偏见风险[24]。社会工作者还必须提倡患者数据收集可用最小化原则与脱敏处理，并提倡完善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律规范[25]。在服务时必须保留真人干预环节，注重协助患者建立与真人互助参与者真实情感连接以应对过度依赖数智化技术的问题和所带来的风险[26]。最后，社会工作者还应推动数智化技术普适性发展，降低数智化技术使用门槛并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普及。

（二）完善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的本土化服务机制

构建社工系统参与的服务体系，需要从多维度进行系统规划。组织架构层面，构建“家庭—团体”协同与“医院—社区—家庭”三级支持网络[27]，通过家庭共学小组和支持档案等措施强化家庭参与度；机构职责上，精神专科医院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与评估转介服务，社区机构负责日常团体干预和资源协调，家庭充当文化和社会支持桥梁；角色职能划分需严格明确边界[28]，患者分享疾病经验并互相提供情感支撑，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互助团体运营，家属联络员形成互补支持体系。构建多维评估框架，除临床维度标准化量表外，还应纳入社会维度，需要社会工作者主导开发适应本土化的社会功能评估工具，重点关注患者职业重建、家庭关系修复等议题[29]，最终形成本土化评估范式。

（三）建立分层分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与国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体系社会工作者参与先于数智化技术应用不同，国内两者基本同步，可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适应数智化背景的社会工作者，构建专业教育强化分层培养模式。首先，重构互助逻辑，合理利用有家庭本位特征的社区支持网络。其次，采用三级分层架构精准赋能，基础层普及知识，核心层培养“康复榜样”，专业层培训督导员。最后，强化技术与社会协同机制，开发数字化工具，推动政策衔接，促进参与者回归社会。为保障体系可持续性，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制定危机预案。需探索激励机制，推动更多患者加入朋辈互助团体，形成精神健康治理本土化路径。

四、结论

在双相情感障碍康复需求日益增长、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以及数智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朋辈互助团体服务模式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际实践已形成较成熟的经验，我国本土探索亦呈现出与社区网络深度融合、有限而审慎地应用数智化工具、高度整合家属支持等鲜明特征。然而，当前发展仍面临数智伦理风险凸显、服务体系标准化不足、成效评估工具滞后以及社会工作者系统性参与缺位等严峻挑战。为此，必须构建安全规范的技术应用框架以驾驭数智化浪潮，完善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的服务体系以夯实服务根基，并建立分层分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以储备核心力量。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政策的持续优化及专业能力的稳步提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朋辈互助团体有望在我国实现更加规范化、普及化与深度化的发展。这不仅能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切实福祉，也将有力推动精神卫生领域服务模式的创新与专业人才队伍的壮大，从而为构建覆盖全民、公平可及、高质量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陆林 . 沈渔邨精神病学 [M].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018.

[2] CHAN J K N, TONG C H Y, WONG C S M, et al. Life expectancy and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 in bipolar disord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r J Psychiatry, 2022, 221(03): 567-576.

[3] ZHONG Y X, CHEN Y F, SU X Y,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s of bipolar disorders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trend analysis from 1990 to 2019[J]. General Psychiatry, 2024(37): 101255.

[4] BALDESSARINI R J, VÁZQUEZ G H, TONDO L. Bipolar depression: a major unsolved challenge[J]. Int J Bipolar Disord, 2020, 8(01): 1.

[5] MCINTYRE R S, BERK M, BRIETZKE E, et al. Bipolar disorders[J]. Lancet, 2020, 396(10265): 1841-1856.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2013-2030[M/OL]. Geneva:WHO,2021[2025-03-2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31029.

[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2025-03-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8] 施瓦布·克劳斯 . 第四次工业革命 [M]. 李菁 , 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6.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er suppor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promoting person-centred and rights-based approaches[M]. Geneva: WHO, 2021.

[10] KWAN R Y C, NG F, LAM L C W, et al. The effects of therapeutic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 to promote

mental well-being in older people living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J].Trials, 2023(24): 558.

[11] YOUNG J, JAWARA L M, NGUYEN D N, et al. The Role of AI in Peer Support for Young People: A Study of Preferences for Human-and AI-Generated Responses[C]//Proc CHI Conf Hum Factors Comput Syst. New York: ACM, 2024: 1-18.

[12] MORTON E, WILLIS E, BROZENA J, et al. The Type, Impacts, and Experiences of Peer Support for People Living With Bipolar Disorder: A Scoping Review[J]. Bipolar Disorder, 2025, 27(02): 1-15.

[13] LYONS N, COOPER C, LLOYD-EVANS B.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group peer support interventions for people experiencing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J]. BMC Psychiatry, 2021, 21(01): 315.

[14] JUPILLE J, HARSCOET Y A, DUVAL M, et al. "What makes you well?" Supports of well-being in bipolar disorder. A qualitative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2023, 18(01): 2244763.

[15]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2021/228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December 2021 on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11/24/EU (Text with EEA relevance)[EB/OL]. (2023-12-05)[2025-03-25].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1/2282/oj/eng.

[16] 顾玲敏 , 李建华 . 双相精神障碍病人个性化教育联合同伴支持对病人自我管理的影响 [J]. 全科护理 , 2021, 19(27): 3793-3796.

[17]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残联关于印发《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的通知 [EB/OL]. (2020-12-28)[2025-03-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2/29/content_5650065.htm.

[18] 杨锃 , 陈婷婷 .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社区精神康复机构研究——兼论本土精神卫生公共性建设的可能路径 [J]. 社会科学战线 , 2017(03): 9-17.

[19] DENG D, ROGERS T, NASLUND J A. The role of moderators in facilitating and encouraging peer-to-peer support in an onlin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J]. J Technol Behav Sci, 2023, 8(02): 128-139.

[20] 李国威 . 复元视角下精神病患者同伴支持服务模式的实务研究 [D].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 , 2022.

[21] 杨锃 , 朱佩怡 . 健康治理视域下的数智化精神健康服务 : 情景、实践与挑战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9(05): 30-45.

[22] 王萍萍 . 双相情感障碍青少年照顾者的照顾历程研究 [D]. 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 , 2022.

[23] 费孝通 .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8.

[24] 姚智宇 , 陆高峰 . ANT 视阈下生成式 AI 偏见的实践建构研究——以数据标注劳动为例 [J]. 科学学研究 , 2025(03): 1-12.

[25] 杨清望 , 唐乾 .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冲突及其协调 [J]. 河南社会科学 , 2024, 32(12): 81-93.

[26] 刘芳 , 吕洪 .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现实挑战与推动策略 [J]. 都市社会工作研究 , 2025(03): 1-15.

[27] 郭琼 , 李媛 , 刘清秀 , 等 . " 互联网 +" 医院—社区—家庭三元联动管理模式在围产期抑郁中的应用 [J]. 四川精神卫生 , 2023, 36(06): 503-508.

[28] SHALABY R A H, AGYAPONG V I O. Peer Support in Mental Health: Literature Review[J]. JMIR Ment Health, 2020, 22(06): 15572.

[29] 刘媛红 . 双相情感障碍病人社会支持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J]. 全科护理 , 2023, 21(31): 4382-438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上海市虹口区公卫优秀青年培养项目 " 朋辈互助团体对社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康复作用研究 "（HKGWYQ2024-10）；2023 年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第四届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 朋辈互助团体对社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康复作用研究 "（2023YXONRC02）；2024 年上海市 " 医苑新星 " 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 医务社工项目 "（沪卫人事〔2024〕70 号）；2024 年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研究课题 " 探索高中生群体 ' 医教结合 ' 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XS24A031）。

（作者：胡思远，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社工；通信作者徐韦云，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闫鹏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社工部副主任；李川，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社工部主任）

社会团体助力科研助理制度：驱动科研发展与人才培养

常怡婷 王 航*

摘要：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就业双重需求驱动下，科研助理已经成为衔接科研攻关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岗位，但该岗位也因流动性高、待遇低、职业路径不清晰等问题，面临人员流失的难题。国家持续出台“稳就业”政策，鼓励高校、院所、企业扩容科研助理岗位。社会团体依托跨界资源整合、灵活培养、交流平台三大优势，能够制定职业能力标准、申请新职业、开展联合培训与专场招聘，为科研助理构建“培养—就业—晋升”全链条支持体系，既能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又能为科研机构提供稳定高效的辅助力量，助力我国科研生态持续优化。

关键词：社会团体；科研；人才培养

一、科研助理的背景分析

（一）社会对科研助理的需求

科技创新的社会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个领域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发迫切。从改善生态环境到提升医疗水平，从推动经济发展到增强国家竞争力，科技创新已成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提升科研实力，必须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特别是要着力培养一支由青年才俊组成的科研人才队伍。这支队伍既包括在科研技术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专业人才，也涵盖在科研助理岗位上提供支持的辅助人才。在当前的人才政策支持下，科研助理岗位已成为补充和加强科研团队实力的重要来源。通过这一岗位，可以有效地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青年科技人才，为科研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医药卫生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更加困难，就业岗位相对萎缩与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的落差日益增大；结构性矛盾叠加，存在招聘难、就业难并存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毕业生高质量就业[1]。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一条新的就业途径，既能够缓解就业压力，又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接触科研、提升自身能力的平台。高校大力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壮大科研助理队伍，聘用部分毕业生，也是促进就业与继续深造的有效手段[2]。我国推动一大批毕业生走进院所、高校、企业成为科研助理，既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好路径，达到“学有所用，人尽其才”的效果，又对科研活动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二）科研助理面临的挑战

科研助理流动性较大：许多毕业生在担任科研助理期间，一旦得到更符合职业规划的工作机会，往往会选择提前结束当前职位，使得部分科研工作需要新的人来接手，或多或少影响科研进展[3]。原因是科研助理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但实际工作内容可能较为基础，与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期望不符，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并且科研助理薪资既不同于企业的多劳多得，也难以达到同等条件下在编人员的薪资水平[4]。科研助理只是一个过渡性岗位，职业发展道路不明确。对于科研助理的人文关怀不足，导致科研助理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无法全身心融入单位。以上这些原因导致科研助理流动性大，难以持续发展[5]。

（三）科研助理的国家政策支持

为了有效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就业”和“保障就业”的政策指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的是创造更多能够充分利用毕业生专业技能的工作岗位，并拓展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就业途径。近年来，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国家加大了对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并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渠道，激励更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设立科研助理职位，从而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科研助理的角色与具体实践

科研助理在科研全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有利于提升科研项目的执行效率，确保研究质量，同时为科研团队提供必要的行政和技术支持，为科研项目顺利进行提供更多优质的保障和服务。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释放主要研究人员的时间，使其能够专注于更具战略意义的科研活动，从而推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此外，科研助理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和

职业发展平台，有助于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科研助理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成功的示范案例。该实验室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科研助理聘任管理体系，通过三方协同管理，使得科研助理制度有所依、能力提升有支持、职业发展有引导。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在积极探索科研助理的培养和管理模式，为了提升科研助理的水平，逐步探索出一条“1+2”科研助理模式[6]，其中“1”代表一个固定的岗位，“2”代表两个能力培养方向，即管理科学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通过建立这种模式，学院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在科研助理制度的具体实践为科研助理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团体在助力科研助理的职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社会团体在科研助理培养中的独特优势

（一）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社会团体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连接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等多方主体，为科研助理提供多元化的培养资源。科研机构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丰富的科研经验，高校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育体系，企业则具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社会团体通过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科研助理提供丰富的实习机会、培训课程、学术讲座等，帮助他们拓宽视野，提高专业素养。

社会团体汇聚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为科研助理带来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这些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与科研助理分享最新的科研成果、技术趋势和行业动态。科研助理通过与之交流互动，学习到先进的科研方法和技术，了解行业的发展需求，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邀请医疗领域知名专家，成立多个学科专业委员会，建立多学科融合科研平台，汇聚北京各大医疗机构的优质医疗资源，促进了临床、疾控、健康教育及其他专业人士间的交流、合作。

（二）灵活的培养模式

社会团体有能力组织各类专题培训、研讨会等，通过举办涵盖科研方法、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活动，满足科研助理在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针对初入科研领域的科研助理，组织基础实验技能培训和科研方法入门讲座；针对有一定经验的科研助理，组织高级数据分析技术培训和学术论文写作研讨会等。通过这些活动，科研助理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科研助理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社会团体与科研机构、企业等单位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为科研助理提供实习机会。在实习过程中，科研助理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了解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模式，为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三）强大的交流平台作用

科研助理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需要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分享，以获取更多的经验和启发。社会团体通过举办科研助理交流活动，如学术论坛、经验分享会、案例分析会等，为科研助理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科研助理在这些活动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学习他人的成功案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同行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积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与人才跨界交流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讨论慢性病领域的各种问题，通过科研人员和专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科技人才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创新，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社会团体的行动方向

（一）制定培养标准与规范

为了提高科研助理的培养质量，需要明确科研助理的职业能力要求和发展方向。职业能力要求包括专业知识、实验技能、数据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发展方向可以分为技术型、管理型、综合型等不同类型。明确以上两点，有助于科研助理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和提升，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通过团体标准立项，建立医疗机构科研助理素养能力标准，对科研助理的培养思路和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引导，促进了科研助理队伍建设，为临床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标准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科研助理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还能促进医疗机构科研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提高整体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二）新职业申请

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对科研助理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职业认定工作滞后，没有适时合理认定、收录各类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社会团体有能力向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申请科研助理新职业，有助于为大学生开发更多就业岗位。例如中国社科教育培训中心在 2019 年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请了“科研助理新职业”，随后发布的《关于拟发布新职业信息公示的通告》（中就培函〔2019〕67 号）标志着科研助理正式成为一个新职业。

但对于医疗科研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尚无可以参考的职业类别。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在积极进行医疗科研助理新职业

申请，对于推动科研助理岗位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明确科研助理的职业定位和工作职责，为科研助理提供更加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健全医疗科研助理职业体系，提升行业相关人员对于医疗科研助理的定位与职能认知。

（三）开展专业培训与教育

一些医院对科研助理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科研助理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和科研技能。一些医院倾向于招聘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科研助理，以确保科研工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社会团体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等担任培训讲师，开展专业培训与教育活动。科研助理从专家授课中学习到先进的科研方法和技术，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例如 2023 年 10 月，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疼痛可视化综合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期超声可视化精准诊疗培训班，旨在规范疼痛超声可视化技术标准，实现疼痛超声可视化精准诊疗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与同质化。京健会还通过举办“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分析培训”，助力科研助理提升数据分析等关键技能。通过专业培训，医疗科研助理能够在职业技能上得到显著提升，不仅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也对整个医疗科研领域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团体可以与高校合作，推出联合培养项目，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和社会团体的实践资源优势，为科研助理提供更加系统的学习机会。如厦门大学医学院开展科研助理素质提升系列培训活动，包括职场基本素养、科研项目管理、实验室管理、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等模块，以提升科研助理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联合培养项目包括课程学习、实践实习、科研项目参与等多个环节，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科研助理人才。同时，联合培养项目也能够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渠道，促进高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四）促进就业与职业发展

就业是科研助理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团体举办科研助理专场招聘会，邀请科研机构、企业等用人单位参加，为科研助理提供就业机会。在招聘会上，科研助理与用人单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和招聘条件，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同时，社会团体为科研助理提供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提高就业成功率。

建立职业发展指导机制是帮助科研助理规划职业生涯的重要措施。社会团体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等担任职业发展导师，组织职业发展培训和讲座，能够为科研助理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发展指导和咨询服务。职业发展导师根据科研助理的兴趣、特长和职业目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提供职业发展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

社会团体可与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荐优秀的科研助理到科研机构工作或参与科研项目，拓展晋升渠道。科研助理从这种方式中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和影响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科研助理作为科研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其队伍的稳定与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科研活动的效率与可持续性。社会团体凭借自身优势对科研助理的培养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团体利用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连接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为科研助理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资源；灵活的培养模式为科研助理的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满足不同层次科研助理的需求；强大的交流平台作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更加高效便捷。未来，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的角色定位，深化其与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协同机制，将是推动科研助理制度走向成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林炜 , 张爱林 , 陶磊 . 医药卫生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 2023(09): 21−26.

[2] 蒲永锋 , 张宇飞 , 马芳武 . 高校科研助理队伍建设模式探索——以就业与深造融合为视角 [J]. 高校后勤研究 , 2021(08): 82−85.

[3] 李立 . 新形势下科研院所科研助理岗位设置与人才需求分析 [J]. 人才资源开发 , 2023(13): 58−60.

[4] 王雨清 , 李瑞锋 , 彭博雅 , 等 . 我国大型医院专职科研助理发展现状与管理思考 [J].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 2022, 35(06): 458−462

[5] 罗雪芹 , 徐文正 , 王丽 , 等 . 农业科研单位科研助理流动性思考——以 Y 研究所为例 [J]. 投资与创业 , 2022, 33(03): 223−225.

[6] 孙汶雯 . “1+2” 科研助理模式的实践探索 [J]. 医学研究杂志 , 2024, 53(06): 191−195.

（作者：常怡婷，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医学信息部专员；通信作者王航，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秘书长）

“医育融合”视域下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马玲玲

摘要：随着我国托育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医育融合”已经成为提高婴幼儿护理质量的关键途径。本研究以婴幼儿托育服务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深入探讨在“医育融合”视角下，人才培养模式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可能的创新途径。研究表明，“医育融合”能够通过融合医学和教育学科的优势，有效地适应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满足国家职业标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主要存在课程体系割裂、师资短缺和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提出重构“医学＋教育”素质模型、建设跨学科课程群、实施“双导师制”培养机制等创新路径，并通过“校—医—园”协同实践基地建设，培养具有健康管理和托育指导双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婴幼儿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式。

关键词：医育融合；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社会对于婴幼儿早期成长的日益关注，婴幼儿托育服务及管理行业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契机。但是，目前这一领域发展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尤其明显。基于这一背景，“医育融合”这一概念的引入，为婴幼儿托育服务及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指明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对“医育融合”视域下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进行深入探究，希望能够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行业发展起到有益借鉴作用。

一、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医育融合”的核心价值

（一）专业大类调整背景下“医育融合”的现实必要性

随着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质量和专业性在社会需求方面的不断攀升，单一学科培养的传统模式已经很难适应产业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的需要。专业大类调整推动本专业走向跨学科和综合性，“医育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点。突破长期以来医学和教育学的学科壁垒，使得二者在婴幼儿托育领域得到深度融合[1]。通过融合医学领域在婴幼儿生理健康、疾病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和教育学在幼儿心理发展、教育方法和策略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对婴幼儿进行全方位、一体化的护理和教育。这一整合既有利于提高托育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让他们更能处理婴幼儿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为婴幼儿托育行业向专业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全行业向高质量和科学性的方向发展[2]。

（二）基于国家职业标准的人才培养规格与医育课程体系构建

以国家职业标准为风向标，明确定义婴幼儿托育服务领域对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和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职业素养的多维度需求。根据这一准则，本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要注重培养既具有医学知识底蕴又具有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体来说，学生既要具备婴幼儿生理发育、疾病预防、护理方面的医学专业知识，又需要熟练掌握婴幼儿心理发展规律、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教育领域的其他内容。为达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医育课程体系建设需要秉承系统性、前沿性和实用性等原则[3]。一方面应覆盖“基础医学”“幼儿保健学”和“学前教育学”等核心课程，构建扎实的学科知识框架；另一方面需要跟上行业发展潮流，将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和特殊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前沿课程中，开阔学生专业视野。同时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以实习实训和项目实践为载体，使学生能在实际工作情景下锻炼专业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

（三）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对“医育融合”的内在要求

在生理层面上，婴幼儿机体各脏器系统发育尚不完善、免疫功能比较弱，很容易受外界环境因素和疾病侵袭等因素的影响。如婴幼儿消化系统功能尚未健全，消化和吸收食物的能力受到限制，易发生消化不良、腹泻等肠胃问题；呼吸系统发育不全、呼吸道黏膜细嫩，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和其他疾病。这需要将医学知识融入托育服务当中，掌握专业医疗护理技能并能及时发现婴

幼儿健康异常情况，并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治和干预，以确保婴幼儿健康。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婴幼儿正处在感知觉、认知、情感及社会性等方面的萌芽阶段，婴幼儿在与周围事物的互动中，不断地了解世界并建立起情感联系。这一时期，适宜的教育引导对于婴幼儿的大脑发育、智力开发以及良好人格品质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教育者需利用教育学原理根据婴幼儿各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设计出丰富的、启发性强的教育活动来激发婴幼儿学习的兴趣和潜力，从而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5]。

二、当前“医育融合”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医学课程与早教课程体系的割裂问题

在课程设置上，目前大部分高校医学课程和早教课程缺少有效衔接和融合。医学课程注重人体生理结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讲授，其内容严密、体系完整，但和婴幼儿早期教育实际需要关联度较低；早期教育课程主要集中在幼儿的心理成长和教学方法上，强调更新教育观念和培养实践技能，但对于医学的基础知识却很少涉及[6]。这造成了学生很难在学习中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及实现医学知识和早教理念之间的有机结合。教学实施中师资队伍专业背景的不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分割。医学教师普遍缺乏教育学的有关知识，很难从教育的角度指导学生认识到医学知识对婴幼儿托育的重要作用；早教教师虽然教育经验丰富，但是对于医学领域前沿知识的掌握有限，不能把医学理念贯穿于教学实践。

（二）复合型师资队伍结构性短缺

从专业知识的维度看，现有的师资队伍中，医学专业背景的教师通常深耕人体生理、病理等医学知识，在幼儿的心理成长模式和教育方法方面，他们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少，这使得他们难以将医学的专业知识有效地应用到婴幼儿的托育实践中；而具有教育专业背景的教师虽然熟练掌握幼儿教育心理学、课程设计等教育理念和技巧，但对婴幼儿常见病的防治、护理及康复等方面的医学领域专业知识有限，不能全方位、一体化地对婴幼儿进行健康管理和教育指导。这种专业结构上的失衡使教师很难实现将医学和教育知识在授课过程中深入融合，从而影响“医育融合”培养目标的实现。在师资层次结构上，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既有较深医学造诣，又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并能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医育融合”教学研究的领军人才更是罕见。与此同时，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创新思维强的青年教师储备亦较为薄弱，致使师资队伍总体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难以达到“医育融合”对人才培养的高标准要求。

（三）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协同机制缺失

从合作的深度层面来分析，目前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两者间的合作多为表面形式而缺少实质意义上的深度融合。医疗机构通常以疾病诊断和治疗为主，在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健康促进方面重视不够；托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幼儿的日常护理和教育指导上，但在面对婴幼儿突然出现的健康问题时，与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和专业支援显得不足。合作的不深入造成了双方很难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三、“医育融合”视域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一）重构“医学＋教育＋保育”人才素质模型

在“医育融合”这一全新的视角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突破传统的框架，构建一个“医学＋教育＋保育”三位一体的人才素质模型，以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在医学维度上，人才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涉及婴幼儿生理发育特点、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诊治、营养和健康管理。既要了解婴幼儿机体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又要掌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并能利用医学手段监测婴幼儿健康，进行风险评估和早期干预，构建婴幼儿健康成长医学防线。从教育的角度看，人才需要深入掌握幼儿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对婴幼儿在认知、情感和社交等方面的成长模式和特性有深入的了解。能根据婴幼儿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案，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婴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潜力，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保育维度重视人才应具有专业保育技能，主要表现在对婴幼儿的日常生活照顾、生活环境创设和安全防护。能够为婴幼儿提供细致入微的生活照护，营造安全、舒适、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环境，保障婴幼儿的生活质量与安全。

（二）建设“基础医学—幼儿保健—早期发展”课程群

基础医学课程是根基，要覆盖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核心内容，给学生建立一个扎实的医学知识系统，从而准确地掌握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机理，为了解婴幼儿特殊生理状况打下基础。针对婴幼儿这一特殊人群，幼儿保健相关课程深入地探讨他们的生长发育模式、营养需求、喂养建议，以及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护理等方面的知识，指导学生获得确保具备婴幼儿健康的专业技能，学习从医学角度对幼儿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保健建议。早期发展相关课程则将视角转向婴幼儿的心理、认知与社会性发展，融合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教授学生如何依据幼儿发展特点设计教育方案，采用恰当的教育方法，促进婴幼儿感知、动作、语言、思维的综合发展。课程群建设过程中需要关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衔接。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避免重复和脱节，使医学知识和教育理念达到深度融合。在阐述婴幼儿生理发育特点的同时，将他们的认知发展规律同步联系起来，指导学生考虑怎样依据身体的发育阶段来制定教育计划。同时采取多元化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和模拟实训，使学生能

够将所学内容应用于真实或者仿真的场景之中去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三）构建“双导师制 + 医教轮岗”培养机制

双导师制注重为每一个学生都配备医学导师和教育导师，医学导师医学专业知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能从医学角度向学生阐述婴幼儿常见病的诊治及防治，引导学生获得健康评估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形成严谨的医学思维及科学的健康管理理念。教育导师通常是托育机构或高等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对幼儿的成长规律和教学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并负责指导学生制定教育计划和进行教学活动、开展教育评价，以促进学生教育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的提升。通过双导师的协同引导，使学生对医学和教育知识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地把握，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安排学生经常到医疗机构和托育机构轮岗实习，让他们切身感受不同情景下医学和教育工作的实际操作。在医疗机构里，学生可参加婴幼儿健康检查、疾病诊疗，学习医学知识的临床运用，提高对婴幼儿健康问题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在托育机构中，学生可以深度参与到幼儿一日生活照料的教育活动组织中，把教育理念落实到实际教学行为中，促进与幼儿的沟通互动以及对其的教育引导。通过医教轮岗可以使学生突破医学和教育学的藩篱，深刻认识两者在婴幼儿托育服务过程中相互联系、协同发展，提升跨学科综合素养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并为今后开展“医育融合”有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打造“校—医—园”三位一体的实践基地

以“医育融合”人才培养为构架，创建“校—医—园”三位一体的实践基地，是推进理论和实践深度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措施。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要发挥自身学科资源、师资力量和科研优势对实践基地进行理论支撑和学术指导。通过建设一个系统而完善的课程体系来实现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从而使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同时组织专业教师深度参与实践基地的教学活动和项目研究，实现最新学术成果向实践教学内容转化，保证人才培养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五）培育“托育指导 + 健康管理”的综合能力

在当前“医育融合”的大背景下，培养“托育指导 + 健康管理”的综合能力，成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员适应行业变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关键环节。托育指导能力需要人才熟练掌握幼儿发展规律和教育方法，能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婴幼儿的成长特点设计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案，涉及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性等多维度的成长领域。这就要求人才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地发现幼儿的兴趣和需要，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激发幼儿的学习潜力；与此同时，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并和幼儿父母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一起促进幼儿的发展。健康管理的能力主要集中在维护婴幼儿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上。为有效地对婴幼儿进行健康监测和评估，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人体的生理构造、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营养和饮食的合理搭配。如此，他们才能及时判断幼儿的健康状况并采取科学的干预措施。另外，还要有进行健康教育的能力，面向幼儿父母及托育人员进行健康知识宣传，指导他们建立正确的健康理念，为婴幼儿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及托育环境。

四、总结

“医育融合”为婴幼儿托育服务及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文章提出的重构人才素质模型、构建课程群、构建培养机制、创建实践基地和培养复合能力的创新路径，旨在解决目前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些途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共同组成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继续完善这一体系，以期培养出更加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并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和管理领域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 胡利繁，周艳丽，王潇．“医育融合”背景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路径研究 [J]. 世界幼儿，2024(01): 92−94.

[2] 王小艳．医育融合视角下以就业为导向建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思考 [J].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2023, 33(05): 174−176.

[3] 赵凯璐，吕素，吴方萍，等．“医育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婴幼儿托育服务教育 SWOT 分析 [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4, 32(04): 428−433.

[4] 郭玲，梁卉，程海燕．新政策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医育融合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J]. 科教文汇，2024(05): 135−138.

[5] 周艳丽，胡利繁，王潇．高职院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探析——基于新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4(39): 185−188.

[6] 陈亚伟，刘彬彬．“尚医生”：医育融合 育见幸福 [J]. 杭州，2023(09): 26−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托幼一体背景下高职院校医育融合式托育人才培养路径研究”（2024SJYB1292）；2023 年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托幼一体背景下‘医育结合’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GYJY202313）；2025 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江苏省高职院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基于 0~3 岁婴幼儿发展需求的适配性分析”（2025SJYB1299）。

（作者系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路径创新探究

李卓洋

摘要：当前志愿服务已成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并在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大学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在服务过程中提升综合素质，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等方法，发现当前志愿服务通过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可以有效促进高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并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研究结果表明，系统化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因此建议高校从加大宣传力度、搭建多元化平台和优化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增进志愿服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志愿服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素养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是时代大势所趋和社会进步必需。志愿服务精神，与新时代中国人民所崇尚的道德规范、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相契合。新时代，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势在必行。2024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1]，明确指出“把志愿服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社会实践”。《“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要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常态化[2]。志愿服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以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志愿服务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融合，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国家层面

一是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奉献精神，有助于树立起他们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参与志愿服务，大学生不仅可以亲身感受到为人民服务以及为社会作贡献的快乐，还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进步等。

二是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快融入社会，推动其心智和行为向成熟化发展，还能够提升他们的自我认知感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也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互助精神，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三是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可以给大学生提供锻炼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机会，使其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阔思维，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让大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从深层次上来讲，这也对我国的教育人才储备和长期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二）高校层面

首先，志愿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部分[3]，它能够将思想政治理论的原理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这不仅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性，还能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意识发展，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功能。

其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可以丰富高校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营造一种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校园学习氛围，吸引大学生参与，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可以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为高校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更良性地发展和完善，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持续完善与创新。

最后，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可全面提升自身能力，其中包括提升其交往能力、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等，这对大学生道德素质、学问素养、身体素质、审美素质以及劳动素质等的提升都有正向的作用，为其将来就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创造力的人才。

（三）个人层面

首先，思想作为行为的先导，无疑起到“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作用。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感，并在实际参与中强化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为他们的成长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参加志愿服务可以使大学生积累更多的社会实践经验，让他们在公益实践过程中可以加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积累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其眼界更开阔、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刻，提升就业能力，为后期就业做好铺垫。

最后，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可以提升大学生的爱心、耐心、意志力等良好心理素质和能力，在关心他人、为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健康人格，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和幸福指数，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

二、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志愿服务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

近年来，高校已经把志愿服务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当中，将其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实践教学内容的一大重点。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学生能够将自身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并且也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群、各种各样的服务形式去进一步认识、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从而提高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参与志愿劳动服务能够切实促进大学生社会义务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增强其社会认同感，提升社会服务理念；志愿服务也能够给大学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一种自省意识和自省机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全面性的成长。通过这种多维度、全方位的教育方式，志愿服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高校教育主体对志愿服务存在认知偏差

目前来看，社会公众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一般性学雷锋活动和对政府社会管理服务功能的边缘性补充上，却忽略了志愿服务中蕴含的巨大道德力量。高校也出于学习进度、时间安排、学生安全等因素，不得不减少甚至不愿组织志愿服务性质的实践活动。

同时，也并非所有大学生对志愿服务都有科学的认识。部分大学生仅出于对特定志愿服务活动的兴趣而参与其中，他们仅怀揣着好奇心投身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然而，一旦活动的进程或成果未能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便可能对志愿服务产生负面情绪，大大降低志愿服务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此外，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之心，他们更加看重志愿服务的结果为自身带来的实利，如评优评先、发展党员和团员等。因此，如果高校师生的内心对志愿服务存在认知上的滞后性，只会使志愿服务流于形式，无法显示出志愿服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作用。

（三）志愿服务的评价体系有待优化

高校以志愿服务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往往未能充分重视活动后的评估环节。在高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评价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要求学生基于对活动过程的回顾撰写个人心得体会、实践报告等，并将这些记录作为评估的主要依据。这种课后作业式的评价方式存在主观性、片面性以及形式主义的问题，不能从整体上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进行考量、检验，因而也无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进行总体把握和准确评估。

另外，在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指导教师和相关志愿服务组织者也很少进行活动总结和反思。由此，在有效组织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从大学生自我评价、指导教师评价和志愿服务对象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并及时反馈给相关各方，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在最大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为整个教育过程和结果构建一个全方位的评价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三、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创新探究

（一）推动志愿服务宣传，营造积极参与氛围

在高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积极面向师生展开全面宣传，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诠释志愿服务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将志愿精神的种子撒播到每一位大学生心中[4]。对于高校教师，学校应定期举办志愿服务宣讲会，宣传优秀志愿服务事迹，推动教师在思想上更加重视志愿服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潜在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教化功能。对于大学生，高校可以通过组织观看志愿服务相关专题纪录片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同时，要及时宣传优秀大学生的志愿服务事迹，报道典型的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自豪感与荣誉感。通过这些宣传，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同与参与意愿。

（二）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

高校可以通过搭建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平台[5]，如社会实践调研、基层社区帮扶、偏远地区与中小学支教、环境保护或法律常识等知识文化传播等类型的志愿服务平台，以高校组织为核心，结合政府部门、典型企业、大中小学校等具体志愿服务平台，鼓励大学生广泛参与各类社会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高校志愿服务体系，这些平台能够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参与社会调研、社区帮扶、教育支援、环境保护等具体项目，不仅能增加对社会需求与问题的深刻理解，还能够培养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服务精神，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志愿服务活动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跨界合作的机会，学生将有机会与不同背景的社会群体、政府机构及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工作，增强团队协作、沟通协调和创新能力。

一方面，这些平台通过持续推进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多样化，不仅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质，还能够加深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活动将激励大学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更加关注社会公益，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优势，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机会。通过参与社会调研、社区服务、文化传播等各类活动，学生不仅能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场景，更能在实际操作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这些实践经历有助于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情境时，学生能够学会灵活应对和创新解决，从而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

（三）构建完善的立体多维评价体系

以往对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测评反馈或考核方式只是简单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的方式呈现，这种形式过于单一并且不具有针对性，导致评价过于笼统，不能真实反映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全面成长和内在变化，学生仅仅为了应付检查，忽略了活动本身的价值追求[6]。这极易造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虚化，无法有效衡量学生在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真实进步。因此必须构建立体化多维评价体系，在测评中注重测评理论学习成果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学生志愿服务参与活动的参与度、责任心、团队精神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深入，长效发展。

其一是志愿者自我评价，即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根据自身在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自我反思，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制定改进措施，以促进个人成长和进步；其二是教师评价，即指导教师通过观察和记录大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中的综合表现，从工作态度、团队合作、问题解决等多个维度给予全面评价，帮助学生发现优点与短板；其三是第三方受众评价，即作为志愿服务对象的第三方受众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行为、服务质量及整体表现给予评价，这一评价能够从服务受益者的角度提供更客观、具体的反馈；其四是志愿者互评，即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之间相互评估，分享彼此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学习与合作。通过综合考虑学生的自我评估、教师评价、第三方受众反馈及互评等多角度的评估结果，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在志愿服务中的表现，进而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与支持。

四、结语

发展和完善志愿服务，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工程。这不仅要求在管理理念上不断更新与跟进，更需要在实践操作层面进行创新，突破传统的框架和模式。同时，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于系统内部的规范化运作，还需要外部相关因素的协同配合，包括社会、家庭、政府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支持与参与。当前高校应当从实际出发，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开拓创新思路，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挖掘志愿服务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综合素质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这种持续创新和优化，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使其更加契合时代要求，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谭建光 .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学习体会之一 [J]. 大社会 , 2024(10): 51-52.

[2] 李冉 , 章硕 .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邮政相关政策点解读 [J]. 邮政研究 , 2022, 38(05): 22-28.

[3] 张泽彬 . 志愿服务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探析 [J]. 科学咨询 , 2024(11): 46-49.

[4] 周根飞 .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立探索——以广州自闭症康复机构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实践为例 [J]. 南方论刊 , 2023(08): 99-100.

[5] 梁佳卉 . 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微治理”的实践困境与机制创新 [J]. 公关世界 , 2025(14): 106-108.

[6] 吕莉 . 志愿服务时长，岂能变成金钱游戏 [N]. 人民日报 , 2025-07-28(13).

（作者系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于 SWOT 分析法的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以 B 血液中心为例

聂宁涟

摘要：加强夯实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确保党建引领业务落到实处是新时代背景下采供血机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最后一公里”延伸的必然要求，对提升采供血机构的整体医疗服务效率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 SWOT 建模分析法，以 B 血液中心为例，明晰了当前采供血机构党支部开展工作所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等现状，并围绕深化思想认识、建强人才队伍、用好联系制度、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策略，为进一步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新时代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基层党支部；SWOT 分析；采供血机构；高质量发展；规范化建设

无偿献血事业作为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公益事业，是临床医疗需求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和疾病谱的不断变化，新发新型传染病风险、医疗保障水平与医疗服务量持续增长，血液保障能力和血液安全供应面临新挑战。采供血机构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发挥党建引领中心工作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SWOT 分析法是管理学中重要的基础策略，作为一种战略规划工具，可有效提升党建工作的专业性、规范性和科学性。本文采取 SWOT 分析法，从宏观战略角度对采供血机构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全方位分析，制定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方法策略，以期实现党建工作水平提升的目标，促进采供血机构保障服务提质增效。

一、SWOT 分析

（一）内部优势（S）

1. 采供血机构党委聚焦党建引领发挥领导作用

B 血液中心党委承担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构建“两个清单和三项制度”，即中心党委及班子成员党建工作责任清单、科室权力清单，党委会议和主任办公会议事规则、科室核心组制度，将党的领导与中心采供血重大决策部署及日常业务管理紧密融合，确保党的建设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B 血液中心多年来始终重视并落实好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制度，2023 年，配套建立党委委员联系支部联络员制度，以更好地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积极带动中心其他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 采供血机构自身实力过硬

B 血液中心成立于 1957 年，是市级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成立近 70 年来，在党建引领下，中心从最初的 5 名工作人员发展到目前 600 多人的专业化团队，从最初的几间平房发展到综合性业务大楼和现代化献血方舱；血液产品由单一的全血发展到 30 多种血液制剂，现已成为集采供血、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国内大型采供血机构，年采血总量超百吨，居国内采供血机构之首，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首都精神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经过近 70 载的成长发展，B 血液中心职工已具有较好的凝聚力，树立了共同价值观念，这是中心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3. 采供血机构党的组织建制规范

B 血液中心按照职能性质相关、业务领域相近的原则应设尽设，充分考虑各科室“党员数量、业务相近”等因素，设立 1 个党总支、19 个党支部、34 个党小组，2021 年底基本实现了“支部建在科（室）上”的目标，为全面推动支部规范化建设筑牢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与此同时，中心积极落实“双带头人”制度，各基层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由科室负责人担任的比例达 100%，其中科室正职占 70.5%，努力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共同部署、共同推进、共同落实。

（二）内部劣势（W）

1.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方式方法和载体不够明晰

B 血液中心还需持续思考提升党建与业务融合，助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推进。一方面，党委带领党支部作用发挥还不够显著，激发支部活力促进党建业务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还不够清晰。另一方面，由于党建与业务在工作内容、工作特点上存在差异，在对党建和业务工作同步考评上做得不足，缺少联动式考核评价方式方法。

2. 党务干部培训工作的系统性筹划有待加强

当前，在党务干部的培训工作中，B 血液中心还需更多关注系统筹划的细致度。一方面，培训内容的整体规划有时稍显欠缺，常常是结合具体任务开展专题学习，对于党务干部需要的政策理论、实务技能等核心素养，缺乏长期的、分阶段的培养规划和安排，干部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显得不够连贯。另一方面，培训方式的灵活性需要提升，比如可以结合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党务干部的实际需求，设置多样化的培训模式[1]，并加强培训后的效果跟踪与反馈，更好地帮助党务干部队伍实现能力素质的系统性提升。

（三）外部机会（O）

1.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2]。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党支部建设给予高度关注。2018 年，中共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其中针对基层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必须积极履行政治责任，切实抓好党支部工作。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3]；同时，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辐射到每个支部和每名党员[4]。推进采供血机构党支部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是积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做好党支部建设工作的有力抓手，更是提升支部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有效手段。

2. 采供血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采供血机构的发展重心已然从注重增量的改革阶段转入更侧重存量的优化阶段，从单纯追求扩张规模的阶段转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变要求采供血机构在坚守公益性的同时，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使采供血机构的党建工作有效融入采供血事业的不断健康发展、文化建立建设与服务能力改善的全过程，真正意义上做到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为采供血机构业务发展注入强大的内驱力。

（四）威胁（T）

1.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需进一步加强

党员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方面仍存在不同层面的差距，一部分党员的先锋意识比较薄弱，在日常工作中担当作为、冲锋在前的劲头不足，积极干事创业、敢于创新的热情不够饱满。此外，以党员职工自身良好形象带动周围群众奋勇向前的整体氛围尚未完全形成。总的来说，B 血液中心党员职工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 对采供血机构党建工作的可量化考核与监管机制尚待强化

党建考核在实践中可以作为采供血机构党建工作“指挥棒”，从宏观层面来看，做好党建工作的考核与激励，可以充分发挥党总支、党支部的主观能动性[5]，推动党建工作更加契合采供血业务发展需求。但是，目前采供血机构在党建考核指标及考评监督体系的建设上尚不完善，部分考核指标设计过于单一，在实际考评中难以量化落地并具体操作；还有些考核流于形式，不能够充分彰显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应有的价值。这不仅不利于凝聚工作合力，也对党支部规范化建设造成了阻碍，无法有力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

二、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策略

（一）深化思想认识，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及行动自觉

结合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等相关要求和采供血机构特点强化理论学习，通过系统授课、专题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往深里学、往实里悟，同时要联系实际学，用理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理论素养与业务水平同步提升。一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明确“为何要规范”。深入学习党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党支部建设的基本要求，从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的职能定位明确规范化建设是党支部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前提。二是持续提高政治站位，掌握“规范的方向”。从党的执政根基的高度认识党支部规范化建设，领会党支部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规范的支部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服务群众。三是持续跟进实践需求，明晰“规范的价值”。针对部分党支部存在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规范和党员管理松散等问题，明确规范化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联系采供血机构的业务工作，理解规范的支部能够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采供血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组织保障，避免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四是持续增强责任意识。党组织书记要深刻认识到自身是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主动带头落实各项规范要求。同时，全体党员要明白作为党员队伍的一员，需积极参与、主动监督，助力支部建设提质增效。

（二）建强人才队伍，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制度

党务干部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在党支部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6]。B 血液中心作为卫生系统中的基层单位，始终注重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

面对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优化支部的设置，于2021年底基本实现“支部建在科（室）上”的目标。同时，中心深入推进党建和业务“双带头人”制度，一方面着力把中心的优秀党员培育成为业务带头人，另一方面努力把中心的业务骨干培养成为党建带头人。近两年来，中心已有2名党员提拔成为科室的副主任，2名党员升任科室主任；各在职党支部的支部书记都由科室的负责人兼任，大力推动“双带头人”全面覆盖。此外，中心扎实落实“双培养”制度——把中心各项业务骨干吸纳入党并发展为党员、把党员锤炼成各科室的业务骨干。近两年发展的党员中，有2名属于高知群体，占发展党员总数的20%。

（三）用好联系制度，补强规范化建设的薄弱环节

多年来B血液中心持续实施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制度，2023年，为了进一步强化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制度的作用发挥，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党委委员联系支部联络员制度，加大力度引导中心各党支部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在实践中，中心将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作为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的突破口与切入点，以党支部政治建设为重点，指导党支部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聚焦年度党建任务，以完成联系点各项工作任务为抓手，明确具体的推进措施，切实推进党支部组织体系建设、组织生活开展等各个方面的标准化建设，努力做到四个“一”，每年要完成以下四项联系工作：至少到所联系的支部讲授一场专题党课，以党员的身份参加所联系支部的组织生活至少一次，至少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工作，至少帮助所联系支部解决一个突出问题。通过以上举措助力党支部提升规范化建设质量，着力推动先进支部发挥引领作用、中间支部实现全面进步、后进支部达到合格标准。

（四）完善监督机制，制定具体可执行的考评办法

采供血机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是否已经开展”能够进行直观地细化、量化，但是对于“开展得好不好”则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可量化的评估。所以，若采用的考评方法不合适则易导致出现“重形式、轻效果”的后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考评办法，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一是在党建活动开展过程中，采供血机构要以精准化、专业化为目标方向，采用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需求、能够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自身服务职能部门建设的党建分类指导办法，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提供必要支撑。二是要转变考核与考评思路，从以往侧重形式考核转入过程考核。开展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以此倒逼并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中“党建责任”落实落地。此外，考评要兼顾年度定量考评与长期定性考评，主动将组织考评、党群评价纳入其中。在具体考评工作中，B血液中心围绕采供血业务各项重点工作设置“否决项”，重视听取各职能科室和业务科室等相关方的意见，推进党建与业务联动考核，形成务实有效的考核考评导向，让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成效从“抽象”变为“具体”，从关注“规定的动作做没做”转向关注“工作的成效好不好”。三是采供血机构可将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情况作为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及评优评先等涉及个人发展成长项目的重要判断依据，把卫生系统统一要求与基层达标紧密结合，创建上下统一的标准可量化考评系统，从而积极推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

三、成效

运用SWOT分析法，明晰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分析了当下的机会与威胁，通过具体实践，目前B血液中心的党建工作与采供血业务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形成“倡导者先行捐献热血”“党员志愿服务先锋岗”“主题政治生日”三大党建品牌，中心的工作质效显著提高，服务对象及职工满意度进一步提升。高质量的党建可引领保障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可作为衡量高质量党建成效的重要手段。正确使用SWOT分析法，推进采供血机构的党建和业务融合，确保采供血机构的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等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同时也为采供血机构的长足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四、结语

B血液中心对照建设目标，结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情况，通过多种措施精准发力，积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为采供血机构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未来，中心将继续聚焦新时代背景下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质量提升，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建强人才队伍、用好联系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推进党建与业务“共同促进、共同提升”的良好态势，为采供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吴晓艳，林霄，李爽．公立医院党务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的调研与思考[J]. 医院管理论坛，2019, 36(08): 20-22.

[2] 中国共产党章程[EB/OL]. (2022-10-26)[2025-05-09]. 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3] 袁兆龙．党委委员联系党支部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以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为例[J]. 求贤，2024(09): 50-51.

[4] 吴山保．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 党建研究，2021(02): 54-56.

[5] 陈玉恒，张平，周妍，等．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路径分析[J]. 中国医药导报，2024, 21(09): 202-204.

[6] 王晶晶，黄亦恬，张玉，等．新时代提升公立医院党支部政治功能路径探析[J]. 现代医院，2022, 22(11): 1670-1672.

（作者单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路径探析

朱　敏 卢友权 陈　岚

摘要：本文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这一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核心议题，探讨了其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文章强调最佳利益优先、尊重身心发展、依法依规保护、家校社协同等原则的重要性，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完善立法体系、强化执法监督、优化司法保护、健全救助机制等关键路径。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结合基层治理实际案例与调研数据，旨在推动构建系统化、法治化、专业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防线，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朝着治理法治化的方向进行，未成年人因为年龄、社会经验等原因而与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些区别，因此需要法治保障。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及未成年人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针对基层治理环境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需要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制度设计、强基固本，通过一个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运行顺畅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统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使得法治保障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概念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指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在法律、制度、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人格尊严权、财产继承权、隐私权等方面的各项权益的依法保护与有效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保护未成年人身体与心理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避免其遭受暴力、歧视、忽视、虐待、剥削为根本目的[1]。未成年人因生理和心理不够健全、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需要外部社会对其进行专门的保护和帮助。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除了包括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教育条件之外，还包括他们参与社会、表达意志和实现平等发展的权利，对和谐社会和法治中国的构建与发展作出贡献。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进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不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未成年人面临的诱惑与风险不断增加，尤其在网络安全、校园暴力、家庭教育缺失等方面问题突出。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家庭与学校责任，能有效预防和遏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成长环境。

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最佳利益优先

最佳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它是法治对未成年人特殊地位肯定的最高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过程中，最佳利益优先原则要求我们在有关未成年人的一切事务上，包括家庭教育和管理、学校与社会的干预以及司法等，应当在考量所涉及事宜时，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今后最大利益放在首位[2]。这里的未成年人利益既包括立法时对未成年人的明文规定，也涵盖执法、司法中具体衡量和优先考虑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强调未成年人是与成年人平等的社会角色，并非被动地受他人照顾与保护，而是受人尊重、善待与协助的主体；它还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应有充分的、落实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儿童友好的理念。比如，在协调家庭矛盾、解决校园暴力、提供社会救援等一系列相关事项的过程中，应多听取未成年人的意愿，评估作出决定是否对其身心健康发展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避免因为成年人的利益优先而忽视未成年人自身的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应建立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机制，对于未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的判决听证应该进行单独审理、设立法官以及进行心理评估。因此，只有把最佳利益优先作为价值衡量和操作标准，才能真正达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保证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功能落到实处的良好效果。

（二）尊重身心发展

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原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建设中最基础的原则。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塑造的发展成长期，身心尚未成熟定型，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在立法修法和政府有关的行政管理中，要求考虑其年龄认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选择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治理方式[3]。要求治理主体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需求、心理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应引导其健康成长；尽可能和缓、恰切地介入未成年人成长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过程中。如果只求其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的保护，不注重心理健康、情感发展、人格成长等方面的呵护，势必不足以支撑起保障未成年人生存、发展权的价值。这种原则对于家庭、学校、社区层面有着重要的贯彻落实途径。在家庭和社区层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活动空间设置，未成年人各项权益受到暴力侵害时的心理辅导设施、制度的设置方面。家庭治理中的家长需要“懂得孩子的年龄”，尊重子女的身心发展。在学校教育中设立不同年龄段的教育和行为引导的机制，不能采取粗暴的体罚或羞辱的方式处置学生的行为问题。如此做好适龄化、适性化、适当的政策和社会服务工作，才能体现出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尊重，才有可能使其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才能奠定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护的根基[4]。

（三）依法依规保护

依法依规保护是法治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进行权益保护的重要原则之一，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关行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并以规章制度为准绳。未成年人因其是权利主体，在实践中其所享有的各项基本权益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予以明确和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为未成年人的发展成长提供了全周期和全方位保护。依法依规，就是不允许再依靠主观随意性来治理，不允许再以人治的方式来办事，在一切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治理过程中都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有章可循，可依规办、规范办、阳光办、公道办。在实际工作中，依法依规保护的体现就是要求基层执法、司法和相关服务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规规章的程序办事，一切有权必有责、有权必受监督。在有关社会救助以及福利性支出落实过程中也要严格把控程序，对困境儿童的识别也必须根据相关法律和制度进行保护。基层还需要持续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既要帮助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知晓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又要不断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严明的执行体系依法依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仅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而且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

（四）家校社协同

家校社协同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相关主体相互分离的状态之下，仅靠单一主体的保护行动，难以全面保障其相关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护。家校社协同原则要求形成多方参与、职责分明、联动高效的保护机制，使教育、管理、服务相互配合、综合发力，全方位、全时段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5]。这一项基本原则契合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多方主体协同的理念，有利于形成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局面，实现未成年人成长发展有良好、安全和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家校社协同可以体现在共担责任和共享资源方面，即家长必须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责任，同时从情感、习惯等角度入手，学校要形成以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制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的育人氛围，社区及相关社会组织要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法治宣传教育、救助保护的服务，三方共同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进程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路径分析

（一）完善立法体系

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心理都尚未成熟，自身抵御外界伤害的能力较弱，所以极易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的不良因素干扰。相应地，也需要完善、全面的立法对其予以保障。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给予的法律保护，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相关规定操作性不强、法规衔接不到位、针对性不足等，因此，完善立法体系建设，推动保护机制的发展就相当重要。立法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法治支撑只有全面系统、规范分层、切实有效，才能有效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强化执法监督

加强执法监督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强化基层工作的重要方面。法治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社会法治化的发展离不开基层工作，虽然目前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非常丰富完整，但是如果执法和监督的环节没做好，这些法律也有可能落空。基层部门需要明确对行政执法部门对执法工作进行明确的规定，强调执法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相关事务的敏感性和责任意识，及时、合理执法，加强执法培训，提升相关人员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性侵”等事务的执法能力和人文关怀意识，避免执法不公时产生“二次伤害”。同时也需要通过合理的监督执法构建多维度、广领域执法监督，如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妇联组织以及人大代表和公益组织建立经常性执法监督队伍，对具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相

关工作进行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

（三）优化司法保护

要构建完善专业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体系，优化司法保护，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的基础。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先天弱势，在受到法律侵害或者偶然因过失或无意识造成违法时，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性化、差异化司法保护。优化司法保护不仅是依法处理相关的案件，而是在设置程序方面、设立机构方面、配备人员方面给未成年人以应有特别的关怀，如研究单独设立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可行性，指定专门人员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提升专业素质能力。从具体举措看，基层应深入推进一体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建设，加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方面的协作配合，环环相扣、不留死角，同时，加强心理矫正、法律救助与社会服务的融合，如在审理过程中，结合心理咨询、社会工作介入，对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抚慰，消除心理阴影，恢复身心健康，使其重新回归家庭与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则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推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社区矫正制度，促进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悔过自新，使其重返社会。只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法治成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实堤坝。

（四）健全救助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的推进，需要建立完善的救助机制。当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监护缺失、流浪乞讨等困境时，往往自身尚无有效能力去寻求帮助，及时、有效的社会救助则予以帮助和支持。完善的救助机制应包含及时的紧急救助和有效的心理救助、法律救济、基本生活救助等多项内容，进而建立起快速响应机制、多种形式协同联合的应急机制和长效救助机制，使得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及其人格尊严不会受到侵害。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救助机制应以社区治理体系平台为基础，集中民政、教育、公安、司法等治理主体的力量，健全统一分解、按照主体实行分级接报、分级处置，设立统一的督办责任部门的阶梯处置过程及跟踪机制，建立“困境儿童信息台账”和“儿童关爱保护联动小组”的长效机制，加强对未成年人困境信息的跟踪排查，实现对儿童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鼓励购买社会服务机制，引入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为受助儿童提供专业有针对性的服务，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要构建常态化走访排查预警机制。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基层治理中，要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加完善，或者说需要朝着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发展。基于立法完善、司法监督、司法维权以及救助等方面都能有效实现联动，基于保护最佳利益和依法保护，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促进等，才能构建多元化与动态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未来依旧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的良好结合，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的作用与效能，使广大未成年人能公平地拥有安全健康、充满爱心和快乐的成长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君凯 . 浅析基层社会治理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J]. 警戒线 , 2023(05): 29-32.

[2] 邓锁 . 法治化进程中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 [J]. 东岳论丛 , 2024(01): 86-94.

[3] 李欣蕊 , 张一驰 , 卢玉婷 , 等 . 社会共治 : 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 [J]. 社会科学前沿 , 2023, 12(05): 2699-2706.

[4] 何群 , 沈君燕 .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的治理 [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6(04): 104-113.

[5] 余丽 , 孟凡玉 . 新时代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路径探析 [J]. 北京青年研究 , 2024, 33(01): 30-36.

（作者：朱敏，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卢友权，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陈岚，宁夏银川育才中学一级教师）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创新实践研究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样本

李英霞 闫万鸿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放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谋划、去考量。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治安思维，是推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遵循。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政治安全敏感期、海岸风险凸显期、人口管理复杂期、新型犯罪高发期、服务发展攻坚期“五期叠加”新形势。要创新性创建“红蓝绿”三色融合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新模式，推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打造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对基层社会治安进行全时空、多层次、系统性预防和治理。

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治理模式

“枫桥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制度中，赋予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的发展定位和发展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放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谋划、去部署、去考量。新时代“枫桥经验”需结合地方性治理元素，将普适性的经验嵌入地方治理实际，进而赋予理论成果鲜活的生命力。打造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公安样板，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生成新质公安战斗力，以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助推公安工作现代化，是在海南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1]。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的治安思维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的应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治安思维，是推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遵循。主要体现为：

（一）政治方向——强化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

这也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灵魂。社会治安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和基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转型升级对社会治安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越复杂、越棘手，越要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公安工作的主线，推动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机制。

（二）人民立场——强化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一不变初心

这也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宗旨、原则，更是公安机关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安机关只有主动适应社会新发展新变化，让人民群众成为公安维稳工作的受益者，才会最大限度地赢得民心；只有让人民群众成为公安维稳工作的参与者，才能最大限度地汇集民力；只有让人民群众成为重大矛盾问题的裁决者，才能最大限度地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问题导向——强化始终弘扬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精神

这也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工作法宝。“枫桥经验”之所以经久不衰、永葆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紧跟时代节奏，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重点，不断创新发展。公安工作要做好做实、取得成效，就必须改革创新，与时代接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化风险隐患为共治共赢，真正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公安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四）发展源泉——强化始终激活基层基础这一深厚本源

这也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活水之源。公安工作的焦点、重点和主要力量也在基层。这就需要把功夫用在平时，用在完善和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上，重

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把公安派出所、社区（村）警备站等建好建强，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优势，更好履行管理服务、维护稳定的职能，筑牢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根基。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实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特别是在封关运作的关键时期，风险防控与安全保障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务必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高质量发展。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晴雨表”，也是风险防控“第一道防线”。自由贸易港、全岛同城化、海南文化等是海南社会治安治理的独特元素和基因，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五期叠加”的新形势[2]。

（一）政治安全敏感期

随着自贸港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境外高校独立办学、数据跨境安全流动等特殊政策的叠加，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暴力恐怖等外部输入性风险凸显，对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威胁进一步加大，海南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多元、复杂、严峻，既有与内地的共性，也有高度开放下的新敌情、新特点、新挑战。海南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艰巨繁重、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

（二）海岸风险凸显期

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岸线长达 1900 公里，港船岸线治安管控压力大。走私偷渡、毒品流入、房地产和养殖等违法违规项目侵占海岸带、洋垃圾非法入境、外来物种入侵，以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各类案件频发，特别是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违法犯罪活动，如何构建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反走私联防联控机制和岸线立体化防护体系，织密海上、岸线、岛内三道反走私防控圈，是新时代海南公安工作的新课题。

（三）人口管理复杂期

随着免签政策的落地，随之而来的是涉外管理对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部分外国人甚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主要表现在：“三非”外国人案件屡禁不止；人员跨境违法犯罪行为增多；不法分子以海南岛为中转站，进行走私、偷渡、毒品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免签外国人非法离岛；外国人行动轨迹异常；有组织性外国人犯罪；流动人员潜在危害；输入性疾病疫情防控；重大勤务事件和舆情事件等。同时，外国人的社区融入融合问题也对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3]。

（四）新型犯罪高发期

作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由贸易港，衍生了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安全稳定问题，反走私、反洗钱、反逃税的“三反”压力明显加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重点敏感进出口商品监管、洋垃圾输入、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等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的深入推进，一方面，数据安全成为重要风险点，网络新型犯罪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经济金融风险激增，对资金穿透预警和新型经济犯罪问题的防控能力以及严防经济金融领域风险传导外溢提出更高要求。犯罪的跨国性、有组织性、智能性、隐蔽性不断增强，公安机关的情报工作能力、犯罪防控能力、侦查取证能力等都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服务发展攻坚期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内在之需。公安机关在打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上必须当好主力军。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旅游警务、生态警务、外国人服务管理、警卫安保“金名片”。如何健全“护企安商”新机制，如何创新警务运行机制，如何加强知识产权等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不断提高公安机关服务营商环境建设的能力，是公安机关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实践——以海南三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样本

（一）三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基本情况

海南现有三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分别是：石山派出所、红岛海岸派出所、福山派出所。三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注重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与海南资源禀赋和区位特色相结合。比如，石山派出所是典型的农村所，辖区是全国重点镇、海南十大文化名镇之一、海南省首个互联网农业小镇。红岛海岸派出所突出的是海南海岸管理的特色。福山派出所当地聚焦的是热带农业、咖啡产业、咖啡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枫桥经验”没有固定的模板，务必要实现本土化融合发展，做好“警地融合”大文章，画好“自画像”才能画出“同心圆”。

（二）三个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共性特点

1.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三个派出所都能够强化政治引领，加强政治建设。比如，红岛海岸派出所传承“红岛”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能力建设作支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抓党建促队建，将红岛精神代代相传。通过夯实“1234”工作矩阵，融合推动“赋引、赋惠、赋能、赋权”并驱，推动警务工作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2. 发挥德治的内化作用

三个派出所都能够深挖自身独特的地缘特点和优势，把德治摆在重要位置。比如，石山派出所创新民谣工作法。海口石山人喜欢民谣，石山派出所民警充分利用当地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村民一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轻松的曲调创作“普法民谣”，把日常法治宣传、法治教育融入其中，让法治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内心。同时，充分利用美富村“家风家训馆”等本地特有的村规民约，特别是发挥其在未成年人教育中的作用，做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4]。

3. 发挥自治的协同作用

三个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都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比如，石山派出所打造大榕树警务，推行“1+2+N”警务模式，即一个社区警务力量由 1 名民警、2 名警务助理和 N 名警民联调员、石山义警队员组成。福山派出所创新“咖啡警务”工作法，打造了“和气福厚警民调解室”“老谭调解室”两个调解平台，利用社区民警人熟、地熟和乡贤威望高、深谙风俗人情的优势，做到调解工作前移。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的创新——“红蓝绿”三色融合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新模式

（一）建强“红蓝绿”三色治理主体，打造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应当具备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共同体意志、共同体行为、共同体责任三个维度，共同体意志突出的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契合度，强调的是共同体之间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目标的认同和追随；共同体行为强调的是共同体之间整合各自资源对于既定共识内容的行动和落实；共同体责任强调的是共同体之间对于共同体行动后果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红蓝绿”三色治理主体，即“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特别是要培育社会组织作为“第三种警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其成为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自我革新的重要驱动力。比如，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创新的“四所一庭一中心”联动调解机制，发挥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庭和社区服务中心合力，通过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这就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的典范。

（二）构筑“红蓝绿”三色治理体系，创建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红色：以党的领导为统领，切实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优势。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建促队建引领警务机制改革的路径，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把党的领导贯穿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形成对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有力支撑。

蓝色：以治理能力为核心，切实构建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治理思维和实践样本，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是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要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升社会治安防控的联动性，提升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形成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合力。

绿色：以科技手段为支撑，切实提高科技支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必须树立大数据思维，坚持数据治理，发挥大数据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的聚合、研判、预警作用，让数据助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精准化。基层社会治安治理必须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切实发挥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的优势，发挥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警务治理中的效能，提升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5]。

（三）创新“红蓝绿”三色治理文化，发挥文化治理在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独特优势

文化治理是柔性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村规民约、乡绅治理、乡亭里制等优秀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基因和治理智慧。我们要把传统文化中的治理元素和现代治理的理念相结合，进一步彰显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自信。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务必要关注和发挥地域文化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共同体培育社会治安治理共同体，优化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红蓝绿”三色文化融合建设。红色文化，要发挥好红色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好红色资源优势和红色精神内核，传承红色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蓝色文化，要突出警营文化，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以文化人、以文育警，打造特色警营文化新形象。绿色文化，要聚焦省情、社情，深挖具有地方特质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构建特色“警地融合”文化新品牌，打造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特色品牌。

参考文献

[1] 田和新，蒋升，王阅 . 构建与高水平自贸港相适应的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 [N]. 人民公安报，2024-08-18(01).

[2] 琼公宣 . 石山派出所：扎根群众的“榕树警务”[J]. 派出所工作，2021(02): 28-31.

[3] 许志耀，王锡昌 . 福山派出所的“咖啡警务”[J]. 派出所工作，2024(06): 25-28.

[4]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求是，2017(21): 3-28.

[5] 陈福连 . 构建区域化治安责任共同体研究——基于绍兴基层公安机关实践“枫桥经验”的思考 [J]. 公安研究，2015(05): 40-4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海南乡村治理制度供给研究”（Hnky2025-81）；2025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基于 ADDIE 模型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探索——以《刑事侦查》课程为例”（Hnjg2025-222）。

（作者单位：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杭州市“半城市化”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张文天

摘要：本研究以杭州为案例，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探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的多维矛盾及其破解路径。研究结果发现，积分落户制度存在经济资本筛选偏差，加剧弱势群体排斥；社区融入呈现“双低”特征，物理隔离与信息断层加剧社会排斥；教育医疗资源存在结构性配置失衡，空间正义缺失显著。本研究提出了“制度—技术—空间”协同治理框架，建议深化户籍福利解耦改革、构建数字治理平台、优化社区空间资源配置，为破解“半城市化”难题提供系统性方案。

关键词：“半城市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数字治理

中国城镇化率在改革开放后快速突破65%，实现数亿人口城乡转移的同时，暴露出近3亿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突出矛盾，该群体虽参与城市建设，却因户籍壁垒、数字技术排斥与公共服务空间错配，难以获得平等市民待遇，形成权利保障的制度性缺口。这种结构性矛盾既制约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又与“十四五”规划的“共同富裕”和“数字中国”战略目标形成张力，亟须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治理框架，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身份固化、推进数字化治理重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促进社会融入，应建立“技术—制度—空间”三维联动的改革机制，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权益保障工具，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全域覆盖与精准匹配。这不仅有助于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潜能，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突破。

一、相关理论框架

（一）西方经典人口迁移理论

西方学界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始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形成了若干经典理论框架。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个体理性决策的重要性。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部门扩张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结构转型，但这一过程可能因政策干预而受阻。西方推拉理论强调个体迁移的理性决策，而中国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困境更多源于制度性排斥。

（二）“半城市化”理论的深化与本土化

博兰尼的嵌入理论为“半城市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指出，经济活动需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中，否则将导致社会整合失败。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脱离嵌入”状态，使得流动人口虽参与城市经济系统，却难以融入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形成“半城市化”困境。

（三）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根植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陆益龙（2020）指出，户籍制度作为“制度性城墙”持续制造着城乡居民权利差异，即使在户籍改革推进后，附着于户籍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仍构成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核心障碍[1]。张车伟等（2021）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证实，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1%，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0.3%，但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服务供给激励[2]。陈宇峰（2022）提出“渐进式赋权”理论，主张通过居住证制度构建权利累进机制，但其研究发现医疗、教育等核心公共服务兑现率不足40%[3]。

（四）数字治理的双重效应与技术赋能的实践困境

智慧城市技术应用正在重塑流动人口治理格局。田毅鹏（2021）发现“城市大脑”系统通过数据采集实现流动人口精准管理，但算法歧视导致低技能群体面临“数字排斥”[4]。数字鸿沟问题引发学界关注。汪明峰等（2022）对长三角制造业工人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缺失使其就业机会减少23%，形成“数字贫困循环”[5]。技术赋能实践面临制度适配难题，张茂元（2023）揭示“互联网+政务”平台因部门数据壁垒导致服务可及性不足[6]。

二、杭州市流动人口治理要素的互动关系

杭州市流动人口治理的关键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要素通过密集的网络化连接，形成了

多条清晰的传导路径，共同构成了多维度协同的治理体系。

从技术赋能的核心传导路径来看，技术应用（2）直接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7）提供基础支撑，大数据与 AI（9）则进一步为平台（7）赋能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使其能够精准作用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信息壁垒（18）；信息壁垒（18）的破解推动教育资源整合（13），教育资源整合（13）直接促进社会融合（17），而社会和谐发展（22）则对社会融合（17）形成正向反馈，这条路径构成了治理体系中“技术支撑—服务优化—融合提升”的核心脉络，凸显了数字化工具在打破信息不对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关键作用。

制度创新层面的传导路径体现为底层政策驱动逻辑，流动人口户籍改革（4）为制度创新（1）提供实践基础与政策试验场景，积分制政策（6）则为制度创新（1）提供具体的实施工具，制度创新（1）一方面直接推动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20），另一方面也通过优化治理规则，为户籍改革的深化提供支撑；同时，社会保障（5）与社会保障体系（16）形成协同，二者均指向社会融合（17）与社会和谐发展（22），与户籍改革、制度创新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治理（21），体现了治理体系对系统性风险的制度性消解能力。

空间治理与服务优化的传导路径呈现出递进式修复特征，社会隔阂（19）倒逼城中村改造（10）的推进，城中村改造（10）同时推动住房保障（15）与空间优化（3），住房保障（15）支撑医疗资源配置（14），医疗资源配置（14）进一步作用于信息壁垒（18），最终通过空间重构与服务升级，完成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该路径将空间正义理念嵌入治理实践，通过物理空间的优化与公共服务的可达性提升，逐步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社会的隔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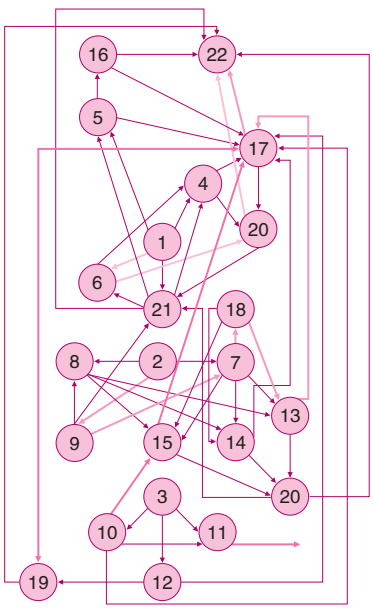


图 1 治理要素互动关系示意图

图示中的次级节点形成了补充支撑网络：空间优化（3）推动社区空间优化（11），社区空间优化（11）指向社区治理相关节点（12），空间治理的整体成效则通过改善居住与服务条件，间接削弱社会隔阂（19）；医疗资源配置（14）、教育资源整合（13）均会推动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20），而城市化进程（20）也会反向促进社会融合（17）。整体而言，所有治理要素最终均汇聚于流动人口治理（21），形成了“技术赋能、制度驱动、空间重塑”的三元协同范式，实现了从单一管控向涵盖制度包容性、技术穿透力和空间正义性的综合治理转型。

三、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的多维结构矛盾

（一）流动人口的落户壁垒

积分落户制度作为城市人口调控工具，在户籍改革中具有进步意义，但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导致不同流动群体面临差异化壁垒。不同群体面临着不同的落户困难。低收入群体因收入、社保、住房等经济指标在积分体系中权重过高，难以突破经济资本匮乏的困境；随迁子女受制于户籍与教育资源捆绑机制，居住证持有年限、稳定住所等要求加剧教育机会不平等；老年群体遭遇年龄歧视性条款，积分标准偏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属性，使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触达。这种基于经济贡献度的筛选逻辑，实质是将户籍权益异化为“人才引进”工具，客观上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排斥。要摆脱该困境，需建立包容性积分框架，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增设公共服务需求评估维度，推动户籍与福利解耦，实现从“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

（二）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度

杭州市流动人口社区参与呈现“双低”特征，35% 的流动人口从未参与活动、常态化参与的仅占 10%。参与形式多集中于政策宣讲类活动（63%），而文体与自治决策类活动参与不足（12%）。空间分异加剧参与障碍，流动人口居住点距社区服务中心平均 2.3 公里，物理隔离叠加信息传播断层形成双重排斥——社区 71% 的信息依赖公告栏，而 83% 的流动人口通过移动端获取，政策知晓滞后 7~10 天。治理主体缺位更显突出，仅 23% 的社区居委会有流动人口代表，业委会成员占比不足 2%。

（三）流动人口生活居住条件与社交空间

杭州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交生态呈现“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主城区本地居民人均公共活动空间 4.6 平方米，而城中村仅 1.2 平方米，核心区文化设施密度是城中村的 7.3 倍。空间资源配置差异形成社交图景断裂，城中村到文化中心通勤耗时 42 分钟，超出

15 分钟心理阈值，导致流动人口月均文化参与 0.7 次，较本地居民少 2.3 次。社交网络内卷化特征显著，同乡关系占比 68%，而与本地居民稳定连接不足 9%，线下空间缺失与 19% 智慧平台使用率叠加形成数字鸿沟，加剧社会融入双重脱嵌。城中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居住环境恶劣和基础设施落后；老旧小区主要表现为公共社交空间缺失和空间规划不合理；新兴城区虽然硬件条件较好，但仍存在社交空间不足导致居民互动匮乏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城市居住空间规划在满足居民社交需求方面存在普遍不足。

（四）流动人口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的难度

杭州市积分入学政策凸显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流动人口子女大部分受积分限制入学，入读优质校概率较低，民办校就读比例居高不下。政策洼地效应显著，余杭、萧山等流动人口密集区公办校准入积分线较主城区高 28 分，加剧教育起点不公的代际传递。积分权重失衡将 46.3%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群体排除在优质教育竞争外，居住证与社保年限积分占比不足 45%。

在学校录取方面，60% 的流动人口遭遇障碍，远超本地居民的 20%；教育设施的可及性差距更大，流动人口受限比例达 55%，而本地居民这一比例仅为 10%。此外，50% 的流动人口认为教育质量不足，本地居民的这一比例为 25%。流动人口在教育机会、硬件资源及教学质量上均处于劣势，反映出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这一差异可能加剧社会分层。

（五）医疗服务可获得性

杭州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医疗健康服务获取方面呈现系统性落差。在常规医疗服务领域，流动群体享有的基础保障水平与户籍人口存在差距明显，反映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仍需完善。在突发健康风险应对方面，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对流动人口的覆盖效能显著弱于常住居民，暴露出危机干预体系的结构性短板。跨区域医疗保障衔接机制的不畅，导致务工群体参保持续性面临挑战，特别是跨省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权益维护存在制度盲区。跨省医保转移接续障碍导致流动人口断缴率达 28%，医疗资源空间配置失衡使聚集区每万人全科医生数仅为核心区的 43%。制度性障碍体现为长三角跨省门诊结算病种覆盖率为 58%，住院自付比例比本地居民高 9.7 个百分点，导致流动人口小病自我药疗率为 49%、延误就诊率高达 18%，医疗救助申请率不足 32%。

（六）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覆盖率

杭州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显著制度适配困境。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40%，失业保险覆盖率为 35%，较本地居民均低 30 个百分点，在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差距最大。制度性障碍体现为劳动关系认定僵化导致平台就业者参保率不足 12%，跨省社保转移周期长达 45 个工作日，同等缴费者养老金地域差达 28%。群体分化特征明显，建筑业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断保率为 63%，快递、网约车从业者失业保险覆盖率不足 8%，已参保者中仅 39% 清楚转移流程、28% 了解申领条件，制度认知模糊加剧权益悬浮。

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困境的协同破解路径

流动人口治理应通过制度、技术和空间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整合，形成三维协同框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

在制度维度，核心包含三大政策支柱：社会保障改革方案着力解决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教育政策优化重点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积分落户政策则通过量化指标建立梯度化落户通道。这三个政策子系统相互支撑，形成制度创新的闭环。

技术维度以数据共享平台为中枢，通过整合公安、社保、教育等多部门数据资源，实现流动人口信息的实时更新与精准画像，为政策实施提供数据支撑。该平台同时对接各类公共服务系统，提升服务供给的智能化水平。

空间维度采取双轨优化策略：公共空间建设聚焦公园、广场等共享场所的规划布局；社区优化则针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实施差异化改造。两个空间层级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社会交往和社区融合。

五、结论

中国流动人口“半城市化”困境源于户籍福利捆绑、数字治理异化与空间分异叠加的“制度—技术—空间”互锁效应。户籍制度的经济资本筛选逻辑与积分落户门槛排斥弱势群体，数字工具的技术控制倾向加剧服务可及性衰减，资本驱动的空间生产固化社交隔离。破解需三维协同：推进户籍与公共服务解耦，建立跨区域社保衔接；构建智能治理平台，破除数字鸿沟与信息壁垒；实施包容性城市更新，优化社区融合空间。制度包容性、技术普惠性与空间正义性的系统协同，是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转型、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随着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制度层面有望深化户籍与公共服务脱钩改革，探索全国统一的居住证赋权标准；技术维度将依托城市大脑建设，推动数字治理从“管控”向“赋能”转型，开发多语言智能服务平台降低新市民使用门槛；空间领域则需强化“15 分钟生活圈”规划刚性约束，要求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与社区融合空间面积纳入土地出让条件。通过制度赋权、技术增能、空间融通的三维联动，流动人口将逐步突破“半城市化”桎梏，最终实现从“生存型迁移”向“发展型定居”的质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1] 陆益龙 . 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与城乡融合发展 [J]. 社会学研究 , 2020, 35(05): 123−145.（下转 123 页）

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实践路径

王秀丽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化进程深度推进，基层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治理现代化面临新挑战。社区党建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本文旨在系统阐述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协调、服务群众三大核心作用及其核心机制，分析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组织建设短板、资源整合困境与方法创新不足等突出问题，进而提出通过强化党组织自身建设、创新协同共治机制、推动数字化赋能、完善制度保障等系统化路径，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社区党建；基层社会治理；党建引领；治理现代化；实践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日益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与治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聚焦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创新，探讨其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机制

（一）政治引领：价值塑造与共识凝聚机制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是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的重要结合点，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功能。其在思想引领方面，在基层社会利益和观念较为多元的条件下，社区党组织有责任通过将党的先进理论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共识，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日常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融入基层治理之中[1]。但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联系群众生活实际，将国家发展蓝图转变为社区发展规划，使党员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保证基层治理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充当“黏合剂”和“方向盘”的角色，基层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各个主体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行动逻辑，在基层治理中容易出现摩擦，而党组织能够以政治认同为纽带，通过建立党建联席会商讨会、区域化党建联盟等制度，将分散的治理资源整合到统一的治理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既要控制政治权力，同时尊重各主体的“独立性”，协商议事、平衡利益，还要引导各个治理主体由“各自为政”转变为“协同共治”，党组织不仅仅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管控，还通过建构价值认同、确立制度规则等方式，凝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合力和行动的向心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二）组织协调：资源链接与矛盾调处机制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是一项复杂工作，需要严密组织、高效衔接。社区党组织把组织力转化为战斗力。

（上接 122 页）

[2] 张车伟，蔡翼飞 .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J]. 中国人口科学，2021(03): 2−16.

[3] 陈宇峰，黄冠 . 居住证制度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得 [J]. 管理世界，2022, 38(01): 89−103.

[4] 田毅鹏 . 智能治理时代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转型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2021(12): 201−209.

[5] 汪明峰 . 数字经济时代流动人口的数字排斥研究 [J]. 地理研究，2022, 41(05): 1283−1296.

[6] 张茂元 . 数字政府建设的碎片化困境及其治理 [J]. 中国行政管理，2023(02): 56−63.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在组织结构上，采取“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网格化四级组织架构，将党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末梢，通过这张大网，实现党的意志快速传导和对社区的人、事、物的精细管理[2]。通过党员责任区等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使各治理结构单元都成为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沿阵地。

面对基层多样化的利益冲突，牵涉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党组织在利益主体之间担当着“中立协调者”的角色，以“利益整合者”的定位，以“居民说事”“民主协商会”为载体，引导利益各方依法表达诉求、协商方案，协调的过程中依托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对社情民意和政策法规的了解把握。在资源整合方面，统筹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群众资源，做好党组织需求与居民需求的“需求—资源—项目清单”对接，避免资源闲置与重复建设，发挥治理的最大效能。

（三）服务群众：需求响应与社区赋能机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社区党建就是将党的宗旨和原则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具体行动，把治理的成果惠及社区居民。党组织通过作风下沉、常态化民意收集等途径了解群众需求。通过入户访问、居民恳谈、网络信箱等方式，收集居民在就业、养老、教育、环境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居民动态需求台账。把需求调研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党组织及时动态调整服务重点，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在服务供给方面，社区党组织坚持“三精”方向，为老年人引进专业养老机构、成立党员助老服务队，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专业服务；面向青少年，联合学校、社会组织开展兴趣培养、课后托管等公益服务，建构“家校社”教育共同体；针对有需要的困难群体，采取“一对一”帮扶的方式，提供政策咨询、资源链接等解决实际困难。除此之外，还围绕居民精神生活层次举办各类活动，如社区文化节、邻里运动会等，培育社区共同体的理念，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格局。

二、当前社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

（一）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短板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本应发挥引领核心作用的社区党组织，部分力量薄弱。党员结构存在明显问题，老龄化现象严重，新党员发展不足，对新理念、新方法接纳速度慢，与治理动态不相适应。在文化程度上，部分党员因为文化程度不高，难以充分理解政策、运用创新理念，导致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在活动方式上，部分党组织活动单一，并且多是理论学习，脱离实际，与群众脱节，导致活动不能调动党员积极性，不能吸引群众，党组织内部凝聚力弱，无法产生强大合力[3]。社区党务工作者属于执行层，执行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党务工作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党建业务培训，对于党建理论和组织流程了解不足，更没有基层治理经验，难以处理如邻里纠纷、设施规划布局等社区问题，导致工作开展不力。

（二）资源整合的碎片化与协同困境

社区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驻区单位与社区配合不力，信息沟通不畅，驻区单位囿于自身利益对社区不熟悉、不热心，导致社区难以调动驻区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而失去借助驻区单位优势发展的机会。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不能发挥基层治理的作用。部分组织内部管理混乱，缺乏发展规划，专业化人才少，服务能力弱，且资金来源单一，依赖政府补贴，一旦拿不到补贴就难以生存，且不能承接社区委托，满足群众所需。社区资源分布不均衡。老旧社区受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影响，基础设施差、公共空间狭窄、资源相对缺乏，与新社区相比缺乏吸引力，在资源方面处于劣势，极大地制约社区党建的资源调动能力。

（三）工作方法的路径依赖与创新不足

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一些社区党建工作方法滞后。习惯使用行政命令，考虑群众所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够，缺乏对群众多样化需求的调查，缺乏对社区矛盾纠纷的成因的考察，不能及时更新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工作效率不高。一些社区党组织在信息时代下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大数据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发布社区服务信息还是以张贴告示方式为主，时效性不强、覆盖面小，年轻人不能及时获得，服务便捷性不高。社区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缺乏各参与主体的有效激励机制，社区党组织没有创建居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平台，没有在参与中形成激励机制。居民参与渠道不畅，导致社会组织难以与党组织沟通，各主体各自为政，不能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三、社区党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优化路径

（一）夯实组织根基：锻造坚强有力、充满活力的战斗堡垒

党员队伍是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要优化发展党员队伍结构，社区应注重吸收年轻党员、骨干党员。主动走进社区工作者中，将其中政治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社区工作者培养发展为党员，让其熟悉社区日常工作，用最短的时间投身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将在社区服务中长时间段内有奉献精神、有责任担当的志愿者作为党员培养的重点对象。社区志愿者有较为丰富的服务经验，能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4]。将优秀青年作为关注对象，通过社区组织开展的各类文体活动，发现有热情、有想法的青年，可以主动邀请其参与到党组织的学习活动中，逐渐将其纳入党组织管理。

突破党组织活动形式的单一化，结合社会治理实际，定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如针对社区环境卫生问题，开展“美丽社区，党员先行”活动，动员党员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环保知识，引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扩大党组织在居民生活中的影响力；再如，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如开展电器维修服务、心理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等，可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提供志愿服务，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日常服务之中，增强党组织活动的实效性。

组织社区党务工作者定期培训。邀请党建专家、优秀党务工作者定期授课，讲授党建知识、党建理论等，学习如何运用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工作规律做好党建工作。举办党务工作者经验交流会，交流各社区党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典型经验、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完善党务工作的考核、激励机制，对党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政绩、群众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定期评价，对表现突出的党务工作者给予物质、精神奖励，如推选“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将其事迹张贴于社区宣传栏，以激发党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二）深化协同治理：构建开放共享、互利互惠的资源融合平台

要建立社区与驻区单位沟通协调的长效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在每月或每季度内选定固定时间，由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负责人共同主持，共同商讨近期社区与单位的相关事宜，明确合作事项，签订共驻协议。明确驻区单位与社区在基层社会建设中的权责，比如驻区单位的学校图书馆、体育馆等文体场馆在指定时间，可以开放使用，社区负责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和卫生维护等服务。

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场地租用补贴等来降低社会组织的经营成本。提供资金补助，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通过项目申报、评估等方式为有需求、有潜力的发展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项目的招投标，社区党组织结合居民的实际需求，梳理出养老、助残、青少年服务等需求项目清单，并向社会组织公开招标。

可以借助互联网建立社区资源平台，集中社区人、财、物等各类资源信息。社区里的一些闲置物资、可提供的志愿服务、场地设施等信息都可以在社区资源平台上发布，不同社区可以借此平台来打破资源隔阂，使资源合理流通、流动。比如老旧社区，设施比较陈旧，可以通过平台向建设的新社区借用相应设备，或者寻求技术支持，实现社区之间的共同发展。

（三）创新工作范式：推动治理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协同化转型

社区党建工作要彻底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服务意识。深入到社区中去开展调研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进户入户，向群众询问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社区有什么服务需求，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工作方案，拟定服务计划。例如，社区居民反映社区停车难，党组织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合理规划新停车位，制定停车管理方法等。

加强社区党建信息化建设，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平台和服务平台，在党建工作平台上实时发布党建信息、活动通知，也可以借助平台进行党员管理，如线上交纳党费、办理组织关系等，提升党员管理的时效性[5]。群众需求收集反馈功能，群众有任何意见建议随时可以提出，党组织及时解决处理。开发社区服务 App，让居民通过手机即可知晓社区服务信息，如社区活动预告、政务服务办理指南等，也可以线上办理水电费缴纳、医保社保查询等，将社区党建服务工作线上线下结合。

创新“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模式，建立社区治理协商议事会，定期组织居民、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参与社区事务协商讨论，对社区内的重大事项如社区改造项目、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由“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形成合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四、结语

社区党建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和动力源泉。其在强化政治引领、统筹组织协调、深化服务群众方面的核心功能，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力度与温度。面对当前存在的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资源整合效能不高、工作方法创新不足等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通过持续夯实组织基础、深化协同共治机制、锐意创新工作方法等综合施策，不断提升社区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展望未来，唯有始终将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置于突出位置，推动其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方能将党的组织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筑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基石，为实现基层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纪，张杨子涵．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J]. 行政管理改革，2025(02): 25−35.

[2] 杨武生．梅营社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J]. 创造，2024, 32(12): 68−72.

[3] 宋维志．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与运行边界——以“红色物业”为例 [J]. 公共管理评论，2023, 5(04): 5−24.

[4] 宋维志．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内涵、制度路径与价值效能 [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38(05): 1−14.

[5] 杜爱国，杨少华．以社区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以武汉市武昌区的基层经验为例 [J]. 武汉社会科学，2023(02): 130−136.

（作者系中共滦南县委党校讲师）

“医养结合”模式下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的伦理困境与可行性对策研究
——以 X 市某社区为例

李　想　黄翊浩　袁冬华 *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融合医疗与养老服务的综合模式正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医务社工在此模式中作用关键，需兼顾专业医疗服务与老年人心理、社会及生活需求，保障其整体健康。本研究聚焦该模式下医务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照护服务时面临的伦理难题，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探讨 X 市“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人的照顾生活状况，系统考察某社区医务社工团队在实际工作中遭遇的伦理冲突及其成因。基于调研结果，本研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为医务社工开展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伦理实践参考，切实维护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医养结合；医务社工；伦理困境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医疗技术和社会持续发展使医养结合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关键方式。医务社工在此模式中作用关键，需兼顾专业医疗服务与老年人的心理、社会及生活需求，保障其整体健康。实际工作中，医务社工常面临医疗与养护平衡的伦理难题，需确保老人获得必要治疗的同时享受良好的养老条件。协调家庭与个体权利冲突也是一大挑战，既要尊重老人自身意愿，又要维护其身心健康。有效解决社区照顾实践中的这些伦理困境，对推动老龄问题解决和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意义较为深远，通过探讨 X 市某社区“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人的社区照顾生活状况及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的伦理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医务社工在社区照顾养老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与伦理责任，还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保障其权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社区照顾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和谐社会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也为破解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实际服务提供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困境及价值观冲突提供了可行的建议。

二、相关研究现状

尹雨晴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因老年人自身的生理机能与功能日益衰退，其所掌握的健康方面知识较为片面，健康方面的思想认知不足，健康行为欠佳，以至于自身健康情况不如意 [1]。故此，医疗和养老两者相互融合，加大对老年群体健康方面的照护力度，拓展其健康知识面，对提高其日常生活质量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于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多位学者在不同时间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博、佟欣和刘学凯在 2018 年的《中国医学伦理学》中重新审视了本土化老年临终关怀服务社会工作介入的伦理困境，指出了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复杂伦理选择和挑战 [2]。接着，在 2019 年，刘博和芦恒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进一步探讨了医务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重塑路径，他们详细分析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临终关怀时遇到的具体伦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3]。此外，崔博文在 2023 年的研究中关注了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与职业实践，从双重边缘与意义重构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实践中所面临的伦理和角色挑战 [4]。李南君关于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的研究指出，社会工作实务中伦理困境包含了隐私与保密、案主自决、价值中立原则以及专业界限等多重困境，并提出了伦理抉择所遵循的基本步骤，提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培养起专业、开放、与时俱进、及时反思的思维逻辑 [5]。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解决这些困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学者们的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理解，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启示。

国内开展医养结合模式研究的起步时间晚，但近些年随着老龄化问题愈发明显，该领域的研究正逐渐向深处拓展。国内学者较多地关注医养结合模式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与实践挑战，对医务社工开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其在社区照顾中的作用与发展潜力，以及怎样培养专业医务社工人才。这些研究共同揭示出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以及解决这些困境的迫切需求与重要性。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对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理解范畴，也给实务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指导与启示，但对医务社工在实践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具体操作问题的讨论仍显深度不足。

三、理论基础——社会嵌入理论

“嵌入论”认为个人不是从个人中分离出来的，每个人都是和他所属的团体有联系的，并且融入这个团体之中。而这些人，也能够从这个世界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支持。迈克·格兰诺维特则认为，在“社会过多”和“社会缺失”之间，应当以“社会嵌入”作为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他认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在作出选择时，往往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 这是一种社会与个体间的关系。“嵌入本质”理论并未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是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予以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老年人都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尴尬境地。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需要从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转型，同时也需要对老年人的社会融入进行介入。针对老年人，实施社区照顾模式，是实现其社会平衡的一种方式。 在小区里，老年人能够得到居家的照料，如每日的洗衣、做饭、清洁等生活照料；在其他时间里，老年人可以去医院接受治疗，或者参与其居住地所开展的娱乐、健身、培训等各类活动。

四、医务社工在医养结合模式中的角色与伦理要求

（一）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1. 基本医疗与养老服务提供者

身为医养结合模式中医疗及养老服务的提供方，医务社工肩负着为老年人提供全面服务的重大任务，他们不仅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对老年人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康复护理等，还应关心老年人心理、社会层面和生活的需求。就医疗服务而言，医务社工需与医疗团队一起合作，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的医疗帮扶，保证他们获得恰当的诊断和治疗举措。

2. 老年人情感支持者

由于老年人个体生理和心理特征，老年人常常会感到孤独，在医养结合模式中，多数老年人对象都患有或多或少的慢性病，常常产生自我怀疑和感到无助，他们需要来自医务社工的情感支持。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医务社工首先要在服务工作中体现出真情实感，给予老人心理层面的支持，使老人感受到关注和关爱，然后综合考虑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医疗需求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的因素，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医疗方案。

3. 医疗与社区资源链接者

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照顾服务过程中的资源链接者，是指当老人及其家属出现困难和需要帮助时，医务社工帮助老年人运用其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构建新的网络关系，以及整合社区及社会资源的方法，使老年人从中获得资源支持和帮助，缓解老年人困境，为其提供一个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保障其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

4. 医务社工与其他关系协调者

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关系的协调者，主要侧重两方面关系的协调。一方面是对社会工作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协调。医务社工在为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操作方法及价值观上的差异产生分歧。这时医务社工就需要担当关系协调者的角色，解决服务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促进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提高团队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是对老年人、老年人家属及医护人员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协调医护人员、老年人及老年人家属之间关系的纽带，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恰当介入能够有效地促进医患双方的交流，不但可以帮助老年人及其家属向医护人员表达诉求，还可以把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法等相关信息传递给老年人及其家属，使医患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二）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的伦理原则

1. 尊重自主权原则

此原则着重提及以独立个体形式存在的老年人具备自主选择自己生活及护理途径的权利，医务社工在开展服务工作时，理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这一自主权，不仅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需求，也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顺从他们的选择，这不仅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怀，也是医务社工职业道德的明显体现。

2. 公平公正原则

医务社工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伦理要求是公平公正。这要求医务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基于每位老人的具体需求与情况提供无差别服务，杜绝因个人偏好、经济条件等因素产生的偏袒或歧视，始终保持中立客观立场。

3. 善良原则

医务社工服务老年人需秉持仁爱关怀精神，尽力满足其身心需求。日常工作中应持续观察老人的身体与心理状况，主动识别并处理潜在问题。面对老人的痛苦与困境，医务社工要及时提供关怀慰藉，运用温暖言辞和周到服务协助其应对挑战。

五、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的伦理困境

为系统了解在医养结合模式下社区医务社会工作

者团队介入社区照顾中所遇到的伦理困境，笔者对 X 市某社区医务社工团队的服务工作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对医务社工团队主管小王的访谈，得出医务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中的伦理困境常常是多方面的，且具有复杂性。为进一步收集服务工作中伦理困境的种类，表 1 为问卷调查中 30 位医务社工根据自身实际服务情况所表述的伦理困境类别汇总。

表 1 医务社工服务工作中所遇伦理困境主要类别

主要类别	人数	百分比
自决原则与保密	10	30%
医疗资源及其他利益冲突	18	60%
团队合作冲突	18	60%
医学原则和社工价值冲突	9	30%
其他复杂困境	15	50%

（一）缺乏对自主权和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

老年人是能动的主体，要用活动理论和发展型视角来全面看待老年人。有的医务社工想当然地认为，老年人缺乏生活自主能力，需要依靠外在的服务与帮助，所以可以在服务过程中帮助老年人做决定，认为自己作出的决策就是最大限度地符合老年人利益的，老年人也一定都会采纳。此外，在医务社工介入社会照顾过程中，医务社工可能需要接触老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敏感信息。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信息，保护老人的隐私权成为一项挑战。

（二）利益冲突与利益平衡

在 X 市某社区，医务社工参与社区照顾时碰到的另一个关键伦理难题是利益冲突与平衡。在照看老人的阶段，医务社工要面对多方利益的交叉与冲突局面，这里面涉及老人个体的利益、家庭的期望、医疗机构的规范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顾及家庭的期望与需求，探求最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基于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医务社工要在不同利益范畴之间权衡抉择，以守护整体社会的公平与福祉水平。

（三）团队合作与沟通的复杂情境

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现象，团队中的医生或者心理治疗师成员或许觉得医务社工就是干杂活的，专业性不强，真正帮助到老年人的主要还得靠他们才行。医务社工作为团队的一员，或许在团队中处于较低的位置，面对其他专业人员的指导与管理，医务社工可能会遇到权力不对等引发的沟通问题，因为不是专业医师，而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致可能会影响对老人最终的照顾和安排。

（四）伦理决策的复杂性

伦理决策的复杂性体现在其中涉及的伦理困境和多重利益之间的平衡。医务社工在社区照顾中常身处伦理困境，其决策复杂性源于需平衡多重利益与伦理冲突，既要兼顾医学专业要求和医疗团队共识，又必须维护社会工作自身独特的价值立场。

六、社区照顾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应对策略

（一）强化尊重老人的伦理原则

医务社工在社区照顾中必须坚守尊重老人的伦理核心，即维护长者的人格尊严、个人权利与自主性，确保其享有尊严与自我决策空间。社工服务应突出老人主体地位，支持其自主做选择；当老人需协助决策时，需依据具体情况提升其自我决定能力，助力其独立判断。

（二）建立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机制，对医务社工在介入社区照顾过程中至关重要。医务社工介入社区照顾时，构建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机制尤为关键。需设立公正、独立且高效的冲突解决与调解渠道，协助各方利益相关者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从而最大限度保障老人的权益与福祉。

（三）加强团队合作与沟通

医务社工参与社区老人照顾需着力加强团队协作与沟通。这意味着不同专业背景人员需协同努力，为老人提供综合协调的服务。医务社工应与医护人员、其他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建立紧密协作关系，共同制定并执行社区照顾方案，积极参与团队讨论决策，确保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支持。

（四）建立伦理决策支持系统

伦理决策支持系统应包含对伦理规范和原则的周全说明，还有对各类伦理困境的剖析与探讨，在为医务社会工作者提供理论及实践的指引上，该系统应提供与伦理决策相关联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件，以使医务社会工作者明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规定，并落实法律规定开展实际工作。

七、结语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 X 市某社区照顾服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考察，重点剖析了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中参与社区照护时所遭遇的伦理难题。研究不仅提供了对此类困境的深刻理解，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随着社会变迁持续深入、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必须认识到这些伦理挑战不仅持续存在，其表现形式和复杂性还可能随时间和具体情境动态变化。未来的探索需着重加强对医务社工的伦理素养培养与专业训练，以增强其处理伦理冲突的实际能力，同时需要关注并持续改进伦理决策辅助工具在实际工作中的效能与作用机制，为医务社工进行伦理抉择提供更可靠的支持和方向指引。

参考文献

[1] 尹雨晴，刘晴偲，张洁，等 . 现域下（下转 129 页）

地方精神资源融入家风建设对居民自治意识培育的实证研究
——以唐山“五种精神”为核心

张　洋

摘要：本文以唐山“五种精神”为研究核心，聚焦地方精神资源融入家风建设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通过实证考察发现，当前唐山“五种精神”在融入过程中，面临文化代际断层、实践形式脱节、资源整合不足等现实挑战，不同年龄与职业群体的自治意识呈现出显著差异。研究旨在剖析地方精神与家风建设的内涵耦合性，探索二者赋能居民自治意识培育的优化路径，构建价值共识传播体系、实践融合机制与多元协同框架，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唐山“五种精神”；家风建设；居民自治意识；优化路径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家风建设同居民自治意识培育的协同发展十分关键。唐山“五种精神”作为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包含公而忘私、百折不挠等价值内核，和传统家风理念高度契合，对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有着独特作用。当前，地方精神资源在融入家风建设与居民自治意识培育过程中面临不少现实挑战，怎样有效整合地域文化资源，构建协同发展路径，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问题。

一、唐山“五种精神”融入家风建设的价值逻辑

（一）理论层面：地方精神与家风建设的内涵耦合性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唐山“五种精神”中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自强不息，与传统家风的“修身齐家”“坚韧进取”等理念具有紧密的关联，传统家风主张个人修身提高品德修养，实现家庭有序治理，这和唐山“五种精神”包含的高尚道德与积极的人生态度相契合。公而忘私的精神激励个体摒弃私利，重视集体和社会利益，这与传统家风倡导的个体为家庭、家族和社会贡献力量的观念一致。家风作为家族世代传承的价值与准则，是地域文化的微观呈现，唐山“五种精神”作为地方文化符号，价值引领作用强大，能为家风建设注入精神养分，使家风传承融入时代与地域特色内涵，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培养出传承优秀文化、具备高尚品质的家庭成员。

（二）实践层面：家风建设对居民自治意识的培育机理

依据社会治理理论，家风之中包含着深厚的责任

（上接 128 页）“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 2020, 40(14): 3130-3132.

[2] 刘博 , 佟欣 , 刘学凯 . 本土化老年临终关怀服务社会工作介入的伦理困境再审视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 2018, 31(06): 745-748.

[3] 刘博，芦恒 .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重塑路径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4(01): 65-73.

[4] 崔博文 . 双重边缘与意义重构 : 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与职业实践研究 [D]. 重庆 : 四川外国语大学 , 2023.

[5] 李南君 . 双重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研究——以 J 市 Z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例 [J]. 就业与保障 , 2023(03): 85-8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0 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一线社会工作者情绪劳动的评估与管理研究”（20SH05）。

（作者：李想、黄翊浩，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袁冬华，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担当意识与公共参与理念，在家庭所营造的环境里，长辈通过言传身教，把责任意识传递给晚辈，让家庭成员认识到自己对家庭和他人肩负的责任，在家庭面临困厄的阶段，成员间彼此帮衬、共同扛起重担，该责任意识在代际间传递时实现了自我强化。家风所推崇的公共参与理念，激发家庭成员积极投身社区事务等相关公共活动。在社区传播层面，具有良好家风的家庭在社区中展现出榜样示范作用，其踊跃参与社区建设、关怀邻里等活动，会影响周边的家庭，引导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依靠这种社区传播路径，源自家风的责任意识、公共参与精神，逐渐成为居民自治的内生动力源泉[1]。当拥有源自家风的精神力量的居民数量愈发庞大时，便会构建从家庭维度履行责任到社区维度积极自治的“家风—自治”传导路径，有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朝着更良好、有序的方向前行，提升社区治理的成效，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三）地域特殊性：唐山“五种精神”的本土治理价值

唐山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禀赋，唐山“抗震精神”——经历巨大灾难后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被纳入家风建设范畴后，使居民的自治意识培育达到特殊的成效，它使得居民的集体主义观念进一步加强，在遭遇困难及挑战的关头，居民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团结协作、联合应对。在社区治理实践中，这种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为社区的整体福祉添砖加瓦。唐山工业文化使得居民拥有了严谨、务实、创新的可贵品质，在工业发展阶段应对各种危机的经验，促使居民形成较强的危机应对能力。此能力在家风营造的过程中实现传承，比如社区面临突发事件或发展困境时，居民依靠从家风中汲取的危机应对能力，可当即作出反应，主动参与难题攻克工作。在家风建设中融入唐山“五种精神”，极大增强了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居民借助家庭传承这些宝贵精神，在社区生活中，将这些精神作为纽带，互相救助、彼此支撑，培育出紧密的社区聚合体，进一步提升了居民自治的意识，促进社区实现自我管控、自我服务、自我教化、自我监察，构建更加和谐有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区格局。

二、唐山“五种精神”融入家风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一）融入路径的实证考察

在家庭这个维度，部分家庭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长辈向晚辈诉说唐山在不同历史阶段，借由“铁肩担道义”的大钊精神、开滦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等战胜困难的事迹，将这些精神嵌入家族记忆加以传承。一些家庭把唐山精神的核心要素写入家规制度，如借助“特别能战斗”精神勉励家庭成员在事业、学业上积极拼搏，依靠“公而忘私”的抗震精神，引导家庭成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作出恰当的抉择。在社区维度，通过举办专题讲座，邀请本地历史专家或亲历者讲述唐山精神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促使居民深刻领会其内涵。在主题活动方面，开展以唐山“五种精神”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居民投身其中，提高对“五种精神”的认识程度和情感方面的认同[2]。在制度层面，地方政策对相关项目进行资金上的支持，支持社区、学校等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活动，推动唐山“五种精神”系统融入家风建设。

（二）居民自治意识的现状评估

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定量剖析居民在社区事务参与度、公共责任认知、自治组织认同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结果发现其在不同年龄层次呈现出明显分野，年轻人群体因生活节奏快、社交形式多样等缘由，社区事务参与度相对不高，公共责任认知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在自治组织认同这一维度，一些年轻人对传统社区自治组织缺少深度认识。中年人群体鉴于担负了较多家庭与社会方面的责任，在社区事务参与度上占比颇高，对公共责任的认识较为深刻，在对自治组织的认同方面，他们更倾向于务实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自治组织类型。老年人群投身社区事务的热情十分高昂，公共责任认知受传统邻里相互帮扶观念的影响很大，对社区的自治组织忠诚度很高。不同职业人群间同样呈现出差异性，公职人员鉴于工作特性，对公共责任的认识相对清晰，在参与社区事务时更看重政策指引与组织统筹；企业员工因为工作压力和时间上的限制，参与程度有限；自由职业者鉴于时间自由度大，存在较大潜力，但尚需进一步激活其参与事务的积极主动性。

（三）现存矛盾与障碍

在文化代际存在的断层这一维度，年轻一代在信息急剧膨胀的时代里成长，面临多元文化的冲击，对本土文化尤其是地方精神的关注度不高。唐山“五种精神”所根植的历史背景，与年轻群体的当下生活存在显著的时空隔阂，造成他们对这些精神的认识不够深入，不易把这些精神融入自身价值观念与家风传承。在实践方面，比如活动设计过程中，家风建设与居民自治意识培育未能实现深度衔接，个别社区开展的相关活动，仅追求形式上的热闹，未深入思考怎样将这些精神转化为居民在家庭生活、社区自治当中的实际行动，缺乏长久机制及深层次构思，使得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迅速消散[3]。在精神资源转化方面，政府、社区和家庭间协同机制出现缺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社区在整合家庭资源与政府资源时，缺少有效的手段，家庭获取政府政策上的支持以及社区组织资源的渠道不顺畅，难以凝聚起合力。

三、地方精神资源赋能家风建设与居民自治意识培育的优化路径

（一）价值共识构建：多维传播体系的立体化设计

在家庭维度，编制《唐山精神家风培育指南》，

梳理“五种精神”的历史文化，转化成故事集、家训模板，将李大钊事迹、开滦煤矿奋斗史、抗震救灾故事等形成故事集，以家庭为单位开展阅读传承，让唐山精神融入家庭文化，以家训模板提炼精神内核，形成家风建设范式，助力家庭制定个性化家训。联动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挖掘口述史与文献，充实故事集，增强历史厚重感。在教育维度，社区教育将唐山精神与家风培育结合进行课程开发，针对青少年用情景模拟等方式助其理解精神内涵，将家风建设融入其成长过程，纳入长期规划形成常态化机制，引入沉浸式技术开发虚拟历史场景课程，增强感染力。短视频、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在媒介维度有传播优势，制作短视频展现家庭家风故事，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相关案例，打破时空限制，增强用户认同感，同时构建价值传播体系，建立审核反馈机制，收集建议，联合自媒体矩阵扩大辐射范围，形成线上线下传播生态[4]。

（二）实践机制创新：家风建设与自治场景的深度融合

作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平台，社区议事会可把家风评议纳入议事流程，在讨论社区公共事务之际，引导居民从家风传承维度切入，表达观点并提出建议，把家风中所蕴含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在志愿服务活动期间，按照唐山“五种精神”的指引，将家风传承与志愿活动相结合，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社区救济、环境治理等活动，在实践当中增强家庭成员的责任意识及社区归属感。可设立聚焦家风传承的志愿服务日，围绕传统节日设计别具一格的服务项目，实现家风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在项目化实施方面，规划开展“唐山精神家风示范户”评选以及自治案例征集这类品牌活动，通过评选示范住户，打造榜样范例，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提高更多家庭投身家风建设的主动性；自治案例征集活动，鼓励居民分享在社区治理当中发扬家风精神的成功经验，形成可向外拓展推广的实践样式。建立案例库动态更新机制，邀请社会学专家对案例进行学术层面的转化，分析出通用性强的治理逻辑要点。在制度保障方面，建立“精神传扬—家风树立—自治参与”的激励模式，采用积分兑换物品、荣誉奖励等方式，为踊跃投身家风建设和社区自治的个人与家庭提供物质及精神层面的奖赏。积分可实现生活用品或社区服务的置换，以荣誉表彰来增强居民的成就感与荣誉感，助力营造良好的社区自治氛围[5]。可借鉴其他城市积分制管理的相关标准，增强激励机制的可持续性。

（三）协同治理框架：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路径

政府主导作用的体现是把“精神—家风—自治”融合纳入基层治理规划之中，设定相关的政策规章，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为融合项目提供资金扶持与制度支撑，以财政专项拨款等方式，调动社会资源助力家风建设与社区自我管理，促进地方精神资源的挖掘、整理以及转化。建立起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宣传、民政、教育等部门的资源，建立专项行动预案。在社区互动联合层面，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发家风培育及自治能力训练的项目，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性显著、灵活性强的属性，能与社区合作开展家风文化讲座、自治技能培训等相关活动，厚植居民的文化底蕴并提升居民的自治水平。社区可将辖区内的企业、学校等资源加以整合，形成多方互助的治理局面，采用社区基金会模式，搭建资源整合平台，助力企业社会责任精准贴合社区治理需求。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成为地方精神传承以及社区自治活动开展的基础支撑，依靠《家庭自治承诺书》《家风契约》等，明确家庭在社区治理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调动家庭投身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引导家庭成员共同制定家庭自我治理计划，把唐山“五种精神”融入到家庭日常行为规范中，从家庭这个维度促进社区自治意识的培育，实现家庭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积极互动。开发聚焦家庭自治的数字化管理工具，设置家风建设打卡及家庭责任清单等功能区间，借助大数据为各个家庭量身定制指导方案，建立智能化家庭自治的生态系统。

四、结语

将地方精神资源融入家风建设，对居民自治意识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将唐山“五种精神”融入家风建设，可增强居民自治意识，需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实现实践机制的创新，加强多元主体配合，切实释放地方精神资源的活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李欢欢，陈磊，李学芝，等．数字媒介下沂蒙精神数字地方感的营造模式研究 [J]. 新媒体研究，2024, 10(11): 62−67.

[2] 龙文馨．基于场所精神的老旧小区景观绿化改造设计 [J]. 住宅与房地产，2024(13): 117−119.

[3] 孙越．地方精神、生存命题和伦理传统：福建电影中的信俗空间 [J]. 东南传播，2024(04): 40−42.

[4] 彭岚嘉．文学与地方精神的相遇与耦合——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地方书写》[J]. 博览群书，2023(11): 76−79.

[5] 韩洋灵子，卓钊航．基于地方精神视角的井冈山精神传承 [J]. 时代报告，2023(05): 82−8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唐山市社科联 2025 年立项课题“唐山五种精神家风涵育与基层治理体系融合模式研究”（TSSKL2025−201）。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化党建赋能广西基层治理：“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研究

范　峥

摘要：本研究聚焦广西社会治理领域，提出依托“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提升基层政府与社区综合治理能力。“IPv6+”凭借其扩展性、安全性等优势，契合广西基层政权在资源调配等方面的需求。当前一些地方基层治理存在融合度低、人员素养不高等问题，可通过发挥党支部作用、提升人员素养等路径加以改善。实施“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构建大联防大联控体系，打造“掌上政府”，有助于提升管理能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该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成果，对广西发展意义重大，值得深入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广西；党建；基层治理；“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一些地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提升基层政府与社区的综合社会治理能力，成为各地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时，“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

基于广西实际情况，本研究从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出发，借助“IPv6+”网络技术，推动党员双报到大协作机制升级，为提升广西各级政府尤其是社区的综合治理能力提供理论支持，为政府决策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IPv6+”、伟大工程和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的内涵

（一）“IPv6+”

2020 年上半年，工信部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提出“IPv6+”概念。“IPv6+”是万物智联的体现，在 5G 和云时代，通过分片实现确定性的网络智能识别联接、应用驱动和安全隔离，推动各行业生产力高速发展与产业变革，助力实现智慧政府，构建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它具备扩展性、安全性、实时性等特点，拥有简化的报文头格式、充足的地址空间、层次化的地址结构、灵活的扩展头以及增强的邻居发现机制等。“IPv6+”为全网体系结构创新创造可能，支持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多种技术。

广西基层政权在社会管理中，对在线音视频通信需求巨大。目前，“IPv6+”已实现通用标准化，具备大规模使用的空间，能够承载海量智联。视频分发系统服务基于纯“IPv6+”，用户可点对点直达，确保实时在线。借助 CERNET2 主干网，还能实现跨区域的“IPv6+”组播，满足手机移动客户端便捷上网需求。这对于广西在资源调配、信息沟通等工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提升社会管理效率的有力工具。

（二）伟大工程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并指出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1]。

（三）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指的是在广西域内，包括中央、国家所辖以及广西各级政府管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内的党员，在保持单位原有领导方式和经营模式的基础上，打破行业界限与行政分割，到所在社区报到。通过搭建沟通平台，实行“平战结合”（平时轮流换岗，特殊时期集中管理），开展共驻共建，以组织共建、制度共建、事务共商、活动共办、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文化共兴、发展共促等方式，形成条块结合的新型协作体，构建共建、共商、共享、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统筹发展，激发基层政权党建工作的活力。“党员双报到”这一党建理论由四川省广元市委组织部于 2013 年 6 月率先提出，之后内涵不断丰富发展。

三、以党建为抓手解决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

党建引领基层政权治理是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并将“党是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作为保障，党的政治领导优势与事业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只有实现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有效衔接，才能凝聚广西各族群众和社会组织力量，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街道办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求，广西作为拥有众多街道办和社区的边疆民族地区，其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影响高质量发展全局。

基层政权党建工作可从七个方面协同推进。一是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支部需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理论武装、服务实践和民主评议，持续提升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二是培育高素质党务工作者队伍。着力提升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通过“导师制”“轮岗制”等创新培养方式，打造示范引领型干部队伍。三是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构建“日常教育＋党校培训＋新媒体平台”三维体系，设计情景教学、实践课堂等特色载体，深化党员政治认同和党性修养。四是完善党员监督考评机制。建立“日常＋年终”双重考核体系，推行“积分制管理＋定性评估”，将考评结果与评优评先挂钩，强化纪律约束。五是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和人才输送力度，通过“人才驿站”“项目孵化”等机制，培育专业化社区治理团队，激发基层内生发展动力。六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施“居民积分制”“楼栋议事会”等参与机制，通过“微心愿认领”“邻里服务日”等活动，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参与度。七是推进韧性治理体系建设。打造“智慧街道”数字平台，构建“网格化＋信息化”快速响应机制；培育“平战结合”的韧性社区，通过应急演练、资源储备和能力培训，提升风险防控与恢复能力。

四、实行“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构建大联防大联控体系

以党建强化“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提升基层“一根针”综治能力，对广西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广西各级党组织应秉持创新、统筹和整合发展理念，打破原有党建格局，结合广西产业发展目标和区域特征，创新基层政权党建工作模式，构建区域“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制定相关制度章程和工作方案，搭建党建网络工作协调议事平台，实行双向服务和评价监督，保障资源、经费、场地等基础载体，形成纵横结合、机制开放、覆盖面广、党政企共同参与的协作体，为广西党建工作提供实践经验。

在这个大协作体中，每一位公民都是社会主体的一员，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通过多元合作、组织协商、良性互动实现资源共享，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精准性和有效性。中央驻桂行政企事业单位、区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共同参与，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避免单打独斗。全体人员共同推动公共事务解决，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具体而言，大协作体坚持党的领导，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加入，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倒逼、重心下移，依托大协作组织推动辖区服务执法联合联动，实现多元协同、预案管理科学化，提升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打造智慧政府、智慧社区，为辖区单位和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以小分队服务为工作方法，以“形象代言人”身份接触群众，发挥“志愿换服务”的榜样力量，实现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服务辖区群众。构建多元参与的管理模式，形成基层政府、社会组织、街道社区和公民群体“四位一体”的协同防控网络和联防联控机制，增强应对各类复杂情况的预警、防控能力。基层政权强化与中央、自治区政府的协同，“上下一盘棋”，提升整体战斗力，同时促进党员自我提升。

五、打造万物智联的“掌上政府”，将“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打造万物智联的“掌上政府”成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也使得“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度”在实践中更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以及行政管理协同化水平[2]。

在新时代，广西基层政府面临着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全新格局，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构建智慧政府与开放政府，实现透明线上服务，实现与群众的实时沟通互动，已然成为基层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建立电子政务治理信息数据共享模式，积极培育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数据服务体系，基层政府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万物互联与万物智联。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还为基层政府推行新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支持与技术基础[3]。

打造“掌上政府”在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其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公共服务质量、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作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创新发展数字广西的进程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已成为衡量广西综合实力与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标志。“IPv6+ 党员双报

到协作制”依托大数据搭建智能手机沟通平台，为基层政府管理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借助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基层政府能够进行科学决策与精准操作，实现资源的高效精准对接以及人力资源的快速集结。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政府从传统的碎片化管理模式向现代协同化治理模式转变，显著提升了基层政权的公信力。

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掌上政府”的建设契合了智慧政府的发展理念。智慧政府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显著特征，强调作为平台的政府架构，以此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推动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朝着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方向发展[4]。“掌上政府”作为智慧政府的重要实践形式，能够实现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满足民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政务服务需求。在实践操作中，“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具备独特的运行机制与显著优势。IPv6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万物智联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基础，其能够支持海量设备接入网络，保障数据传输的高效性与稳定性。党员“双报到”制度则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组织的力量延伸至基层社区的各个角落。通过大数据搭建的智能手机沟通平台，党员能够及时了解群众需求，整合各方资源，迅速响应并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这种将先进技术与党建制度有机结合的模式，为基层政府管理注入了强大动力，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与质量。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持续深化“掌上政府”建设以及“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的实践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与制度完善。一方面，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优化大数据分析算法、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为“掌上政府”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党员“双报到”制度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确保制度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作用。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推动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六、“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是意识反作用原理在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具有创造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能够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这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新时代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5]。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全新目标，强调每个人的发展与全社会发展和谐统一，涵盖劳动能力、道德、才能和志趣等多方面。这一理论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价值目标，为“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和广西人才强桂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广西，“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广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价值提升，为谋求全人类幸福和发展贡献力量。

七、结语

“IPv6+ 党员双报到大协作制”是新时代党建的创新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反作用原理与 21 世纪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借助高科技打造“掌上政府”，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应对复杂情况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对广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节选）[J]. 新湘评论 , 2024(17): 58−59.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20−10−29)[2025−11−28].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0/29/content_5555877.htm.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19−10−31)[2025−11−28].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0/31/content_5447245.htm.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21−11−08)[2025−11−28].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1/content_5650329.htm.

[5]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7−10−27)[2025−11−28]. 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作者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博士、讲师）



共同富裕视域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优化路径探究

刘恺君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将其目标切实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是新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剖析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耦合关系，论证二者融合发展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针对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等现实问题，提出强化党建引领、激活社会组织等优化路径。应充分发挥党的核心引领作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社区基础，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共同富裕；城市社区治理；协同治理；优化路径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石，其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整合多元主体资源、构建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这一模式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旨高度契合。本文立足于共同富裕的宏观视域，旨在探索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如何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更有效地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一、共同富裕与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内在关系

（一）共同富裕是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价值引领与发展方向

第一，共同富裕目标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这一理念体现在基层治理领域，必然要求构建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多主体协同，调节人民不同的利益诉求，统合共同精神与价值，最大程度保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二，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的内涵，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作用，最终实现共同享有的意旨。在这一发展要求的指引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从激活社会最小细胞入手，激发不同主体的社会参与，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构建起社区责任共同体，最终以多元主体责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推动相关资源的整合、共享，最终实现共同享有。

第三，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允许并鼓励“先富带后富”[1]。这一思想蕴含了合作与帮扶的核心理念。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的方向指引，搭建协同治理平台，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利益共同体之上的责任共同体，积极营造合作氛围，完善合作机制，推动人们在持续互动中增强情感认同，塑造精神与价值共识，最终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情感和行动共同体。

（二）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基层路径

1. 精准对接多元需求，拓展共同富裕的实践覆盖面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高。人们不仅寄希望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也期望实现精神文化资源的公正分配，实现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富裕”。针对人民群众需求的升级，宏观的政策导向与制度措施固然不可缺，但真正的落实还需要最接近人民群众的基层治理层共同发力。社区作为基本生活单元，是最深入居民群众生活的实践场域，人们的第一需求都会首先反映到社区。社区通过对所在区域居民个人相关资料的掌握，对居民反映需求的整合，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满足民众需求，提高民生水平。但要想满足新时期不同群体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单凭社区主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应运而生，即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需求”为中心，通过汇聚多主体之力，发挥不同主体资源能力优势，凝聚共同力量，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扩大共同富裕的实际覆盖面。

2. 激活第三次分配机制，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界定已不再仅仅局限于道德力量支配的慈善捐赠行为，而是包括志愿服务、社区公益等所有不特定主体之间进行互助、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是一种社会机制[2]。

共同富裕的其中一个内涵要求为共建共享，其本

质即为反对政府的大包大揽。对此，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实践形式，以社会机制作为运行的主导机制，以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作为参与的主体，有助于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

3. 涵养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营造共同富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具有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和缺乏社会公德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数量的扩大不仅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更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应对这一现象就需要从精神与情感层面入手，着力培育公共精神，塑造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基础。

城市社区协同治理通过倡导互助合作的价值理念，在不同主体间建立起柔性资源链接方式。通过主体间的民主合作，无形中加强彼此的情感联结，增强情感认同，逐渐塑造起精神与价值共识，形成共生共存的共同体意识。此外，这一模式也有助于消解当代“原子化”社会中群体关系冷漠的现象，有助于社会团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软环境”基础。

二、当前面向共同富裕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对共同富裕与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二者关系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可以发现当前社区治理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

1. 政治引领与价值融合功能发挥不足

一方面，基层党员干部认识水平不足。调查发现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该目标的实现与社区无直接关联，从而忽视了党组织在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基层基础作用，对自身承担的责任义务也模糊不清。党员群体自身思想认识的欠缺与懈怠使得其在向多元主体传递价值导向与党的政策主张上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缺乏对公共价值的引导与整合，示范引领作用有待提升。城市社区受市场经济体制影响大，人口异质化程度高，多元主体在社区场域中易演变成相互博弈的利益个体，使得社区协同治理的方向可能偏离维护居民利益与价值的初衷。基层党组织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应该站在各分散主体利益之上，对多元主体利益认知进行引导与整合，同时向其传达共同富裕的政策要求与思想内涵，为多元主体确定协同治理的正确价值方向，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与思想保障。

2. 组织动员与社会融合能力尚需提升

一方面，部分居民群众缺乏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参与主动性不强。此外，社区居民的参与主要局限于女性离退休群体，参与范围不够广泛。另一方面，部分共建单位对于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缺乏思考与认识，参与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合作容易流于形式。此外，共建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渠道，使得参与合作也存在沟通壁垒。

（二）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机制不健全

1. 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持有待优化

相关政策措施的缺乏使得社会组织在发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作用方面缺乏制度保障与环境支持。目前大多数社区所在的基层政府尚未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助推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指导以及配套的监督、评估方法等，这影响了社会组织力量的发挥。

2. 内生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影响力有限

目前城市社区大多数社会组织为政府购买服务类型，对政府依赖较重，自主性与独立性不足。这类社会组织缺乏居民群众的直接参与和社区内部的支撑性，呈现出分散化与悬浮化的特点，对社区居民难以起到切实的影响与带动作用。同时，一些社会组织政社不分的特性使得其在提供产品、服务的能力与专业性上存在不足，难以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3. 多元主体间协同网络尚未形成

社会机制的单一运作难免会遇到失灵困境，缺乏与基层政府、市场主体的密切合作，其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限制。

三、共同富裕视域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协同治理政治根基

1. 深化政治引领，把稳协同治理的价值航向

首先，需精准把握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内涵。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与方向把控的作用不是要求党组织遵循权威主义的管理思路，而是应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原则，尊重不同利益主体诉求的表达，在吸纳与整合不同利益需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带动多元主体寻找并建构起公共价值[3]。

其次，必须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特别是抓实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社区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层载体，承担着更为直接与艰巨的任务。基层党员干部要将自己的思想认识与国家发展目标、党的政策主张相统一，才能在多元主体治理的社区场域中凝聚思想共识，使协同治理的方向与党的政策要求保持一致。

最后，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思想传播与价值融合功能。加强基层党的政治建设是为了使其更好地向多元主体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与党的政策主张。在纵向上，基层党组织可以发挥其组织效力，积极对接与联系居民群众，通过“一对一”入户宣传或者举办政策宣讲活动，让居民了解共同富裕的政策要求与思想内涵，从思想上转变居民群众的认识。在横向上，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及党的组织在多元主体中的嵌入作用，汇聚并确立统一的思想认识

与价值目标，凝聚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把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方向。

2. 强化组织动员，汇聚协同治理的多元合力

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得天独厚的组织优势，能够快速动员党员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要想将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转化为多元主体的行动共识，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强有力的组织引领和社会动员作用的发挥。

首先，推动党员下沉，发挥基层党组织纵向组织动员功能。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纵向组织链条，发动党员下沉社区一线，实现一名党员对接数名群众，向其定期传达党的政策方针、思想理念，将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治理发展方向传递给群众，动员其发挥自身主体性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协同治理。

其次，加强组织覆盖，发挥基层党组织横向组织动员功能。通过将党的组织建立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组织构造中，实现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与组织覆盖。在此基础上，发挥社区党委联结辖区内共建单位的横向组织作用，主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为实现共建共享畅通参与渠道。

最后，搭建公共平台，发挥基层党组织纵横协调中介功能。城市社区可以依托自身空间布局，搭建如党群服务中心、红色会客厅等党建公共空间，将其作为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协商沟通的治理空间。基层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中介功能，引导多元主体有秩序、有效率地参与治理，发挥物理空间的综合服务效力，推动多元主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二）激活社会组织，夯实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

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其本质是内生于社会的，实质上更有助于激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是一种更为根本和更具可持续性的资源分配方式[4]。社会组织作为践行社会机制的重要主体，激活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有助于推动其运用社会机制，发挥社区协同治理中促进共富的载体作用。

1. 优化培育环境，发展多元共治组织网络

要降低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简化审批流程，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政府要出台社会组织助推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指导与配套的监督、评估办法。当前出台的政策工作方案都只是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以优化公共民生服务供给，缺乏关于助推共同富裕的指导安排。

2. 构建协同机制，提升专业服务供给效能

第一，应推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通过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相关制度规定，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运作流程及服务供给清单，推动社会组织在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下运行。此外，健全基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推动不同社会组织展开良性竞争，倒逼社会组织提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基层政府也可以对新兴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激励与资金支持，推动其发展壮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与引导而非完全的行政化干预，有助于增强居民群众的社会组织信任度，增强其发展运作的群众基础[5]。

第二，鼓励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建立战略合作。社会组织与企业展开合作有助于撬动市场资源，丰富社会组织的资源链接及资金来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提升其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质量。例如，与互联网科技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开发线上服务平台，实现服务供给的现代化与智能化转型等。

四、结语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迫切需要基层治理体系的创新支撑。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把稳方向，通过激活社会组织培育内生动力，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也是对共同富裕理念战略的基层呼应与生动实践。展望未来，必须持续深化党的建设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协同机制，使社区真正成为资源汇聚、服务共享、情感联结的幸福家园，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而持久的基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 [J]. 管理世界，2021, 37(08): 117−129.

[2]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 [J]. 浙江社会科学，2021(09): 76−83, 157−158.

[3] 迟晓璐．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优化 [N]. 经济导报，2025−08−29(010).

[4] 谢琼，谷玉莹．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第三次分配的理性逻辑：评述与思考 [J]. 社会治理，2022(09): 26−37.

[5] 李昊，郎金焕，张琪璇．社会组织助力共同富裕趋势、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社会组织类六个共富观察点的调研 [J]. 浙江经济，2024(05): 58−60.

（作者系中国共产党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党校助理讲师）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深度融合
——以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张　雨 许英霞

摘要：在全面乡村振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被赋予精准输送人才、赋能区域经济、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时代使命。明确产教融合的核心使命与纵深发展标准，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达成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共赢的必然要求。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作为山西省应用型本科高校与产教融合重点建设单位，立足区域发展需求，通过下沉企业挖掘产教耦合点、健全培养目标协同机制，落实“双导师制”聚焦关键技术创新，强化师资协同效能，打造特色专业项目与数字教育平台、夯实实践创新基础等路径，构建起适配乡村振兴的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新质生产力；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赋能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抓手，而人才支撑与产业升级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的关键动能。在产教融合纵深发展与现代化教育体系构建的时代要求下，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高校，肩负着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作为山西省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院校、首批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和实训基地重点建设单位，2022 年以来先后获评中国双创典型示范高校、山西省首批省级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省级众创空间、机器人科普基地及煤炭行业科普教育基地，凭借自身办学优势与资源积淀，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探索产教深度融合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范式。

一、产教融合的逻辑起点：乡村振兴与高校发展的双向赋能

（一）乡村振兴为高校建设注入发展动能

乡村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兼具消费与要素双重属性的特色市场。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化，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项目与企业投资重点逐步向乡村下沉，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涌现出大量实践需求，且这些需求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城市发展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凭借地缘邻近、资源适配的天然优势，自然成为承接乡村振兴技术支持、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任务的核心载体，承担起服务区域发展的时代责任。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灵魂所在，而高校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地方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设乡土文化课程、培育文化传承人才等方式，为新时代青年根植本土情怀，以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为高校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乡村的实践需求倒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乡村的文化资源丰富了高校的育人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进而促进高校招生质量与教育教学水平的稳步提升，实现了乡村振兴与高校发展的双向成就。

（二）产教纵深融合是高校服务乡村的必由之路

拓宽产教融合深度与广度，既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促进多方协同创新以及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是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核心策略。地方政府在产教融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责任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资源调配与环境营造上。首先，政府应出台更加具体、可操作性强的产教融合政策，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利，为产教融合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其次，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高校深度合作，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再者，政府还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产教融合示范区、共享实验室等，为产教融合提供物理空间和技术支持；最后，建立健全产教

融合评价与监督机制，确保合作效果，及时调整优化合作策略。产教融合的本质是知识、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这需要政府、高校、企业乃至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的紧密协作。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意味着打破传统界限，形成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网络。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产学研联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形式，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速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提高创新效率。此外，鼓励和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建研发中心，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1]。

二、产教融合的核心动因：时代需求与办学定位的精准契合

（一）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使然

应用型本科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类型，与当前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兼具社会服务职能，具有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2]。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应该紧紧围绕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大力发展学科建设，打造特色专业课题，以突出的科技教育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二）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河北考察时依托河北地域特色，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河北地方高校教学研究课题。要确保高校建设发展目标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机融合，就需要立足地域和高校特色及现有教育资源，解决地方发展技术难题，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以科技赋能乡村文化发展。

（三）复合型人才的供需矛盾倒逼人才定点输出

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人才培养方案建设要不断适应地方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深刻变化。

当前，山西省乡村与城镇就业人数存在巨大差距，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地方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定点输送人才，助力乡村就业发展。地方城镇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是理论与实践交叉的综合性问题。即要求地方型高校以地方区域发展为标准，以企业关键技术为核心，以高校优势学科为抓手，激发理论生产不同角度的创新活力，探索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机制。

三、产教如何融合

（一）下沉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健全培养目标协同机制

1. 锚定产教融合耦合因子

高校需跳出“学科导向”局限，深入企业项目一线，挖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依据企业发展定位、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按图索骥”地开展教育、生产、研发和服务等活动，制订丰富的教育内容，完善课内理论课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培养原始创新能力导向。因此高校在制订人才培养计划，编写相应课程教学大纲中，应充分融入地方经济转型浪潮，把准企业技术攻坚方向，使学生培养目标与企业运行目标相一致，建立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企业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3]。

以岩土工程勘察课程为例，山西地区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工程等乡村振兴项目时，面临着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挑战，如黄土丘陵区的湿陷性黄土处理、矿区周边的地基稳定性评估等实际技术难题。高校在课程大纲制定中，应主动对接当地岩土工程企业的实际需求，将乡村道路建设中的地基勘察标准、小型水利工程的岩土体稳定性分析、乡村民宿及公共建筑的地基处理技术等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融入课程内容，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就能聚焦乡村振兴中的具体技术痛点，实现培养目标与地方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明晰产教融合核心意义

在产教融合教育改革中，切实推进校企联合、科教融合、协同创新，拓宽产、学、研、用融合之路，助力高校学科建设、专业结构优化和教学管理。发挥产教融合教育改革主体的正负反馈作用，促使政府、高校、企业互通互惠，精准解决现实难题，健全产教融合主体培养目标协同机制，构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二）落实产教融合“双导师制”，健全导师队伍协同机制

学生是产教融合最直接的受益主体，教师是教学的引导者，也是产教融合的直接执行者和教学改革的主体对象[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教必先强师。”基于产教融合主体利益，激发教师革新意愿，完善课程计划，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在课堂中更多地融入应用案例、课堂互动，丰富校外培训及实践应用研究，是教学改革的内部动力。为应对新时代人才需求，高校教师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与会教师致信精神，以教育家为榜样，弘扬“心有大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努力提高自身理论与实践能力，做教育的笃行者。

在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教学中，“双导师制”的落实更需突出应用型特色。高校导师侧重传授岩土工程勘察的基础理论、规范标准和数据分析方法，而企业导师则来自地方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施工企业，具备丰富的乡村项目实践经验，可通过现场教学、案例复盘等方式，指导学生掌握野外地质调绘、原位测试设备操作、勘察报告编写等实操技能。通过“双导师”的协同指导，既夯实了学生的理论基础，又提升了其解决乡村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

践操作的深度融合。

（三）开展产教融合项目建设，健全教育资源协同机制

1. 打造特色专业项目，聚焦主题攻关

产教融合应顺应地方区域发展目标，把准区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企业高新技术与运营发展为建设平台，注入高校科学研究发展动力，形成政府、企业、高校的主体品牌效应。以山西省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特色专业项目建设为例。山西省是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全省含煤面积 935.44 km^2，占国土面积的 25%。由于我国北方岩溶煤矿区普遍存在“煤在楼上，水在楼下”的特点，因此，煤矿开采活动对我省岩溶地下水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污染风险。2000 年以来，随着我省煤矿资源整合，废弃煤矿采空区面积较大，采空区内蓄积形成的煤矿“老窑积水”发生溢流，严重污染了矿区及其周边区域的水土生态环境。为贯彻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煤矿“老窑水”污染治理修复作为政府与企业产教融合耦合因子为大势所趋，因此山西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致力于解决煤矿“老窑水”排出造成下游碳酸盐岩区渗漏，区域岩溶水和饮用水水源地的污染，瞄准符合山西省矿山水文地质特色的老窑水原位修复、生态环境治理和资源化新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立足地域特色办好学校科技创新发展。

2. 保障基础教学资源，推进专业实践创新。

（1）创新专业学科建设

近年来，地方政府依靠省技术创新中心平台的建设，将高校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能力与企业技术攻关与创新实践能力相结合，促进产教融合深度推进。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致力于构建“实践—科研—再实践”的循环创新体系，为产教融合教育改革、地方全面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动力。具体应依托政府产教融合承载平台，促进学科建设，创新技术研究，将工程实践转化为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依托自身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完善产业机制，定点输送人才，缓解区域就业压力，保障区域发展 [5]。

（2）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以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煤矿专业“煤矿地质学”课程体系构建为例。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模式（PBL）、以案例为导向的学习模式（CBL）、以团队合作为导向的学习模式（TBL）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机融合的课程改革。21 世纪随着资源的开发利用，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煤炭仍然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到 2050 年在我国能源构成中的比重仍然是 50% 以上。煤矿企业要实现高产高效，实现现代化，就要依靠煤矿地质理论和煤矿地质技术与工作方法的进步。“煤矿地质学”是高等院校煤炭类工科非地质类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一门集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于一体、生产实践和地质研究紧密结合的地质学课程，对保障煤矿建设和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高产、高效和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深层融入课程思政

构建“党建 + 思政 + 产业”三维引领体系，将爱国主义、大国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元素有机融入思政教育，采用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学方法，不仅为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定位，丰富了其内涵，还明确了实施路径与方法，这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不断形成新的生动实践，具有深远意义。PBL 教学法通过引导学生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探究性学习，不仅增强了学习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也为将抽象的思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学习任务提供了有效载体，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在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应用型高校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更需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到培养具备高尚品德、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感人才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人成长的负责，更是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担当。因此，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不仅要强化学生的思想认知，提升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自信，更要紧密围绕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将国家发展大局与学生个人成长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为实现这一目标，应用型高校需回归教育本质，即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推进专业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具体而言，应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之中，比如通过案例分析、社会实践、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例如，在农业相关专业中，可以围绕乡村振兴的具体项目，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培养他们服务乡村、振兴乡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应遵循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以 PBL 教学方法的问题导向为人才培养主要目标。专业思政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石和平台，应把学生德育要求精细化地分配到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大纲的制订中，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牢牢把握在专业思政框架下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着力点，实现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 毛才盛，田原．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发展路径：共生理论视角 [J]. 教育发展研究，2019, 39(07): 7-12.

[2] 陈星．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2017.

[3] 唐甜甜，宋辉．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下转 141 页）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路径探索
——以“资本市场”课程为例

李东景 张 霞 熊正文

摘要：新文科建设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价值塑造与专业能力并重的新要求。本文以“资本市场”课程为实践载体，聚焦新文科背景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思政元素挖掘不够，难以和专业课有机融合，专业课教师育人能力如何提升以及思政教学效果如何科学评价。针对这些问题，积极探索系统化实践路径，重构“价值引领—能力塑造”融合的教学目标；深度挖掘契合课程知识模块的思政资源；创新构建产教融合赛事、党建引领活动、企业实景课堂联动的多维实践育人模式；初步建立起涵盖学生自省互评、教师动态观察、企业实践评价的多元协同评价机制。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资本市场

新文科建设的深入推进正深刻重塑我国高等教育人文社科格局。2020 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及《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了专业优化、课程提质与模式创新三大核心任务。新文科的本质在于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通过课程重塑人才培养模式，以更精准对接学生发展需求，培养兼具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作为管理学与经济学交叉融合的财务管理专业，其课程体系在财经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新文科要求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将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置于同等高度，实现专业教育与价值引领的深度交融。然而，审视当前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对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尚浅，难以有机融入专业知识体系；思政教育方式方法相对单一，难以有效激发学生共鸣；育人效果也因缺乏科学评价机制而难以被准确评估，理论设计与实践成效之间存在脱节。这些问题成为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关键瓶颈。

一、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资本市场”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资本市场”课程的思政建设需要紧密结合课程特点，在对“资本市场”课程现有教学实践进行审视与思考的基础上，发现课程思政建设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对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

“资本市场”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深度与广度不够，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的融入教学内容还存在困难[1]。课程思政要求将隐性育人知识融入专业知识的传授中，渗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思政资源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但现实情况是，部分教师在课程设计中对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融入方式也较为单一，难以达到预期的育人效果。

（二）专业课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有待提升

在“资本市场”课程的育人实践中，教师的角色不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和疑问的解答者，其作为价值引领者的责任同样关键且不可替代。教师队伍无疑

（上接 140 页）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 [J]. 农业经济 , 2025(04): 126−128.

[4] 寇福明 , 秦俊丽 .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研究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20, 40(30): 6−9.

[5] 李倩 . 产教融合 :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 2019(09): 45−48.

（作者：张雨，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助教；许英霞，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

是推动课程思政建设落地的核心力量，这就要求他们需持续提升自身的思政育人素养与教学水平。然而现实中，部分专业教师在价值引领的意识和能力方面尚显不足，难以将思政元素不着痕迹地“编织”进专业知识的脉络之中。有效的课程思政要求教师不仅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须具备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功底，熟练掌握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最终实现在讲授如资产定价、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时，能将家国情怀、法治意识、职业道德等如春雨般自然浸润学生心田[2]。因此，如何系统性地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使其能够肩负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双重使命，成为当前“资本市场”课程思政深化过程中亟待突破的核心议题之一。

（三）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尚不健全

在新文科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下，高校普遍意识到专业课程承载思政育人功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资本市场”课程的任课教师也在积极探索将价值引领融入专业知识传授的路径。但是，迫切需要一套可靠的方法，来科学度量思政教育在专业课堂中产生的实际育人成效。

二、“资本市场”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与路径

（一）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与整体设计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不仅肩负着传授专业知识的使命，更承载着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责任[3]。课程以“一中心、三层面”的教学目标为导向，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一中心”即以塑造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其在专业学习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层面”则分别从专业精神、职业素养和理想信念三个方面展开：培养学生具备责任担当意识、勇于创新、投身实践的专业精神；提升学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素养；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在课程建设中提出了“一中心、三课堂、三融合”的课程设计方案。以学生为中心，借助中国大学慕课、学习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资源和智慧教学工具，综合利用线上课堂、线下课程、实践课堂，同时把育人目标融合于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设计中，打造一个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课外与课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学习平台。实现专业认知、课程知识入于脑，创新意识、专业素养践于行，责任担当、家国情怀植于心，从而使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教学全过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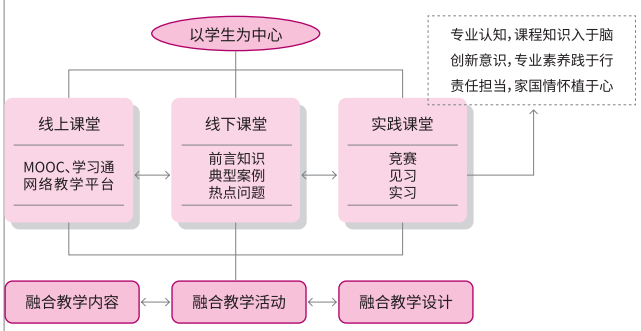


图 1 “资本市场”课程建设整体设计思路

（二）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

为实现上述思政教学目标，在“资本市场”课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具体做法：课前深挖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结合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利用网络资源和教学平台，如学习通、中国大学慕课等，设置讨论话题，发布任务，进行轻直播讨论等，引导学生思考相关思政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课中创新教学方法，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在授课过程中，详细设计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搜集典型素材，设计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例如，通过典型案例法、故事讲述法、职业体验法等教学方法，将育人目标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中。同时，注重结合金融市场实践，引导学生认识我国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性，提高金融素养和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4]。课后转换角色，答疑解惑，提高自身育人能力。借助教学平台发布作业和拓展学习资源，学生自主探究，进行知识巩固和拓展。同时，利用微信或 QQ 群进行互动答疑，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惑。此外，还应注重与学生交流社会热点和思政问题，传递正能量，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见表 1）。

表 1 “资本市场”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内容	思政主题	部分思政案例
股票市场	培养正确的财富观、价值观以及风险意识	奥康 IPO 定价腐败案；炒股失利经典案例；正确财富观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相结合的案例
债券市场	债务责任与信用意识	永煤控股债券违约事件案例分析；个人信用与企业信用重要性实例分析
证券投资基金市场	团队合作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	私募基金支持国家“双碳”战略案例；海富通基金管理团队的协作实践案例
股权投资基金市场	强化创新与创业精神	河北坤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创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并购市场	职业素养与创新精神	龙薇传媒收购万家文化案例；滴滴出行与优步全球并购案中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
资产证券化市场	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	蚂蚁金服小贷资产支持证券化，详细分析资产证券化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寻找平衡及金融创新体现

（三）构建多维联动的实践育人课堂

为了切实提升“资本市场”课程思政的育人实效，

项目组在新文科理念引领下，着力突破传统课堂边界，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实践教学活动。

1. 深化产教协同，在实践场域浸润职业精神

立足新文科“协同育人”理念，项目组与本地建设银行、国泰君安海通证券等机构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持续开展“国泰杯”模拟投资挑战赛。该赛事高度仿真资本市场环境，促使学生将课堂所学的资本市场理论、分析工具应用于模拟投资决策全过程。在赛事组织与指导中，将合规操作规范、职业道德操守作为核心要求贯穿始终，引导学生深刻体认审慎投资理念与风险管理意识的重要性。通过与行业一线机构的紧密互动，学生不仅能及时把准金融领域前沿脉搏，更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切身体会金融从业者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专业使命，其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伦理素养在实践中得以提升。

2. 强化党建引领，熔铸家国情怀

依托基层党组织优势，项目组协同学生党支部创新打造“党建 + 专业”载体——“沙漠淘金”挑战赛。该赛事巧妙地将复杂的资本市场分析、资产配置策略与团队协作、逆境决策、创新思维等要素融为一体，培养学生在资源约束和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综合应对能力。赛事之外，依托党支部平台，精心组织学生观看《红色金融》等专题纪录片、参观革命历史纪念馆或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5]。这些活动并非简单的观摩，而是引导学生在回望历史、感悟先辈崇高精神的过程中，深刻思考国家金融安全、服务实体经济、个人价值实现等宏大命题，从而在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辨中不断增强爱国情怀与时代使命感。

3. 拓展企业课堂，加强实践教学

组织学生深入校企合作企业进行实地参观。通过近距离观察企业的资本运作流程、投融资决策实践，以及与企业管理层、业务骨干的面对面交流，学生可以直观理解资本市场理论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以及优秀企业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在参观交流的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如何坚守商业伦理底线、平衡利益相关者诉求等现实案例，将诚信经营、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等思政要义，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实践教学的每一个观察点和讨论环节。

（四）建立多元协同的思政育人评价体系

为全面评估并持续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成效，需构建一套涵盖多主体、贯穿全过程的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突破传统评价模式，从学生个体成长、教师教学反思及行业实践反馈三个维度综合衡量思政育人效果。在课程关键节点，引导学生开展自我反思与同伴互评，促使学生在审视自身知识掌握、能力运用及价值判断表现的同时，观察并评价同伴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活动中展现的思政素养，通过相互激励实现自我认知提升与共同进步。授课教师则依据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案例分析深度、实践报告质量、团队协作精神等，动态综合评判其专业知识技能与思政素养发展水平，并基于学生反馈及自身教学观察，持续优化思政元素融入方式与教学策略，增强思政教育的精准性与感染力。此外，将实践课堂活动深度融入评价体系，特别依托与本地建设银行、国泰君安海通证券等合作机构共同举办的“国泰杯”模拟投资挑战赛，依据学生在赛事中模拟投资决策全流程表现，从市场分析能力、风险控制策略、合规意识、团队协作精神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判，这种基于真实业务场景的行业评价，不仅为检验学生学以致用能力和价值认知水平提供了有力依据，其反馈也有效推动了课程内容与行业前沿需求、职业伦理规范的动态对接，进一步提升了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性。

三、结语

本文基于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以财务管理专业“资本市场”课程为具体载体，系统探索了专业课程深度融入思政教育的可行路径与实践策略。研究与实践表明，通过重构教学目标体系、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多元评价机制等举措，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在塑造专业精神、提升职业素养、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内生动力，最终促成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增效。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断探索更具时代性、针对性和亲和力的教学方法与载体，致力于构建更加成熟、稳定、科学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为培养兼具扎实专业功底、卓越实践能力与崇高价值追求的复合型财经人才贡献切实可行的“资本市场”方案。

参考文献

[1] 邓江花 . 新文科视域下证券投资学课程思政建设探析 [J]. 对外经贸 , 2023(07): 72-75.

[2] 袁艺 . 以学生为中心的财务管理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J]. 会计师 , 2022(03): 106-108.

[3] 常真机 . “课程思政”视域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规范化教改研究 [J]. 中国标准化 , 2022(14): 171-173.

[4] 张思园，李霞 . 课程思政在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路径研究 [J]. 投资与合作 , 2024(06): 202-204.

[5] 穆敏丽 . 投资学课程思政综合评价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4, 45(19): 850-85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文山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路径探索——以‘资本市场’为例”（WYZL220606）。

（作者单位：文山学院）

九型人格理论赋能高校教育管理：晋中信息学院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新探

景彩峰

摘要：九型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人格心理学工具，在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晋中信息学院将九型人格理论创造性融入其完满教育体系，探索构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该模式通过构建多元化教育载体、完善个性化成长支持体系、强化实践转化机制三大路径开展实践，具体建立了“学校—学院—书院”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开发了适配九种人格类型的差异化教育活动，培育了专业的九型人格解析师团队，并形成了基于人格认知的个性化培养机制。实践表明，该融合模式在提升学生自我认知水平、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实效、创新高校教育管理范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深化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改革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九型人格理论；完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管理；人格发展

九型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人格分析工具，为深入理解人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及发展需求提供了科学框架。在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如何有效运用九型人格理论指导学生成长，已成为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晋中信息学院创新性地将九型人格理论融入完满教育体系，探索构建了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发展模式，为高校育人工作的提质增效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一、九型人格理论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阐释

九型人格理论将人格划分为九种类型（见图 1），研究其特点与差异，为理解人格发展规律提供科学框架。该理论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能够指导个性化培养，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理论关联，两者在九型人格理论指导下实现有机融合，构建科学育人体系。

（一）九型人格理论的内涵与核心特征

九型人格理论是一个系统的人格分型体系，阐明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及外在表现形式。该理论认为人格类型在个体早期经验中形成，经与环境互动而趋于稳定，构成认知与情感及行为的整体模式。九型人格理论强调类型间价值平等，每种类型皆有其特定的心理防御机制及成长空间。在动力系统层面，人格类型表现为独特的注意焦点及心理能量分配模式，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及行为选择[1]，在发展维度上，人格类型体现为稳定的基本特质及动态的成长路径，形成了基本类型与压力状态及整合状态的动态转化体系。九型人格理论深入阐述了各类型的核心动机、基本恐惧、关注焦点及成长方向，构建了完整的人格理解及发展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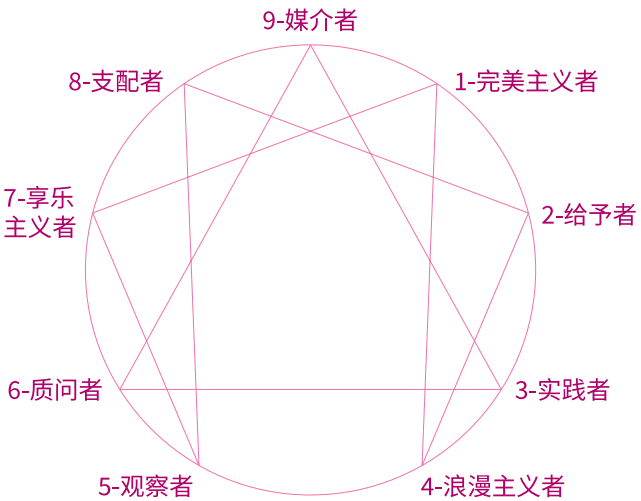


图 1 九型人格图

（二）九型人格理论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多维应用价值

九型人格理论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及实践工具。在人格诊断层面，该理论揭示了人格类型的核心特征及表现模式，为深入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及发展需求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人格发展层面，九型人格理论强调每种类型的优势潜能及成长路径，为制定个性化育人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人格整合层面，该理论构建了压力管理及人格整合的系

统方法，为提升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及人格健康水平指明了方向。九型人格理论通过深入揭示人格运作规律及发展机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及实践思路。

（三）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关联

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基础及育人目标上存在深层关联。从理论根源看，两者均植根于人格发展理论，关注个体的整体性成长及人格完善；从教育理念看，完满教育强调学生在体格、情绪、认知与精神等维度的和谐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则着重关注心理素质培养及人格健康发展；从实践路径看，完满教育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整体性的发展框架及多元化的实践平台[2]，心理健康教育为完满教育提供了专业化的理论指导及方法支持，两种教育理念在九型人格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构建了更加科学及有效的育人体系。

二、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实践路径

晋中信息学院将九型人格理论融入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创新构建了三条实践路径：构建多元化教育模式，设立专业场所，开展系列课程；完善个性化成长体系，组建专业团队，实施个性化培养；强化实践体系转化，开展特色活动，建立全程指导机制，形成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

（一）构建“三级协同、课程联动、活动分层”多元化教育模式

晋中信息学院将九型人格理论融入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创新构建了多层次与立体化的教育支持体系[3]。学校搭建了“学校—学院—书院”三级心理健康服务场所：校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有完满人格解牌室，心理团辅室、个体咨询室、音乐放松室、情绪宣泄室及沙盘游戏室等专业场所，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及完满人格解析师师生团队，提供系统化的心理辅导与人格成长服务。各学院建立二级心理工作站，配备谈心谈话功能区和心理专员，负责日常心理普查与危机干预及个体辅导等工作，书院心理空间设有心灵加油站、团体活动室、无忧解压馆及沙盘游戏区等，心理老师一对一入驻书院，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心理支持与自我探索平台。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学校整合九型人格理论与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构建了多层次课程体系[4]。面向全体新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系统介绍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方式，九型人格理论及其在大学生成长中的应用。开设“人格心理学”“幸福课”等选修课程，引导学生深入认识不同人格类型的特征与成长规律及整合路径，依托书院开展“九型人格与生涯规划”“遇见全新的自己”等主题讲座与工作坊，构建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完满教育实践中，学校围绕四大模块开展了面向不同人格类型的特色活动：社团活动板块重点关注 1 号完美者与 3 号实践者学生，通过学生会与社团联合会等平台开展“干部培训班”“团队管理工作坊”，培养领导力与组织能力；志愿服务板块针对 2 号助人者与 9 号媒介者学生特点，组织开展“三下乡”“志愿者服务进社区”等公益项目，培养服务意识与沟通能力；艺术实践板块为 4 号浪漫者与 5 号观察者学生提供“大学生音乐节”“戏剧节”等表达平台，发展创造力与思维能力；竞技体育板块帮助 6 号质问者与 7 号享乐者及 8 号支配者学生通过“淬炼营”“多样化体育赛事”等活动，提升团队协作与抗压能力，通过差异化活动设计，促进不同人格类型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完善“师资专业化、骨干普及化、活动品牌化”的个性化成长体系

晋中信息学院基于九型人格理论构建个性化成长体系，通过专业培训与普及教育及特色活动三个层面推进实施。学校每月邀请九型人格理论专家开展为期三天的“完满人格成长训练营”，第一天通过专题讲座系统介绍九型人格理论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第二天进行人格类型解牌演示与实操训练，第三天组织案例研讨与经验复盘，培养校级完满人格解析师 44 人及院级解析师 110 人。通过系统培训，打造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与实践经验丰富的完满人格教育团队。

学校面向心理委员与宿舍长及班干部等学生骨干广泛开展完满人格实践活动。每周心理老师进书院组织“遇见完满的自己”等人格解牌工作坊，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与发现潜能。定期举办“认识自己、成为自己、超越自己”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人格发展规律。开展“助人自助”培训营，培养学生骨干的辅导技能，针对新生群体，通过团体辅导与个案分析等形式，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已累计培训学生骨干 6000 余人。

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期间，举办“九型人格与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心理剧大赛等活动。在“10.10 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后，组织开展“心理嘉年华”及手语操表演等活动。每学期还会不定期举办包括 OH 卡牌心灵对话、沙盘治疗体验与艺术绘画工作坊及鼓圈音乐治疗等心理团辅，参与学生 10000 余人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成长。

（三）强化“数据驱动、精准支持、全程指导”的实践转化机制

晋中信息学院创新性地将心理健康普查与九型人格测评相结合。通过对某学院新生的测评数据分析发现，4 号浪漫者及 6 号质问者人格特征显著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4 号型学生因强烈的情感体验及独特性追求，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及人际适应困扰；6 号型学生由于过度警惕及安全需求，常出现焦虑及决策困难[5]。针对这一发现，学校建立了重点关注机制，

通过个别咨询与团体辅导等方式，并鼓励他们积极利用学校完满教育各类活动，帮助这类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能力。

学校深入开展“完满人格进书院”系列活动。通过“遇见全新的自己”“破解人格密码”“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等主题活动，将九型人格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实践。每个书院设立完满人格工作坊，定期开展人格解牌与团体辅导及心理沙龙，每个学院利用主题班会、辅导员说完满、心理工坊等积极开展完满人格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与理解他人。活动采用体验式学习方法，通过角色扮演与情境模拟等形式，增强学生对不同人格类型的直观认识及实践体验。

针对九种人格类型，学校打造了个性化成长支持方案。在心理团辅方面：为 1 号完美者设计“完美与放松”，为 2 号给予者学生开展“自我关怀”，为 3 号实践者学生组织“平衡与成长”等主题团辅。在完满活动中：为 4 号浪漫者学生提供艺术创作平台，为 5 号观察者学生开展思维训练，为 6 号质问者学生组织信任建立活动。在日常关注上：特别关注 7 号享乐者学生的深度体验，8 号支配者学生的情绪管理与 9 号媒介者学生的自我表达。在阅读指导方面：为每种类型学生精选 3~5 本成长图书，如《完美的陷阱》（1 号型），《助人的艺术》（2 号型）与《内在驱动力》（3 号型）等。通过多维度支持促进不同类型学生的健康发展，通过系统化的个性化培养方案，有效促进了不同人格类型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教育融合模式的实践成效评估

该融合模式经过一年半的运营取得显著成效：学生人格认知水平提升，对自身特征形成深入认识，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提高，专业辅导体系不断完善，教育管理模式创新，形成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构建系统化运行架构。

（一）学生自我认知与发展自主性显著提升

基于九型人格理论的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实践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人格认知水平。通过建立校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与学院二级心理工作站及书院心理空间的三级服务体系，学校为 24 级 7000 余名学生开展了系统的人格测评工作，每月开展的完满人格专题培训已培养出 150 余名校院级解析师团队。学校充分利用“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及“10.10 精神卫生日”，每年通过人格解牌、OH 卡牌、沙盘治疗、艺术绘画以及鼓圈音乐等多样化形式组织开展了 100 余期心理团辅活动，深入引导学生从性格特点与心理动力及成长方向等维度进行自我探索，使学生在人格认知深度与成长规划能力及自我管理意识等方面呈现出自主发展及持续提升的良好态势。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与吸引力同步增强

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模式推动了教育质量的整体跃升。学校面向心理委员与宿舍长及班干部等广泛开展完满人格系列活动，结合完满人格解牌与读书分享会及心理工坊等多样化形式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校创新性地将 OH 卡牌心灵对话、沙盘治疗体验与艺术绘画工作坊及鼓圈音乐治疗等形式融入团体辅导中，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吸引力及实效性。同时学校积极开展“遇见更好的自己”等主题活动 70 余期，参与学生达 700 余人次，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化实践体验的转变，构建起全方位与立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

（三）教育管理向科学化、精准化的模式转变

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实践创新了教育管理模式。通过将心理普查与九型人格测评相结合，学校发现 4 号浪漫者及 6 号质问者学生更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学校为九种人格类型量身定制了成长支持方案，从心理团辅、完满活动与日常关注及推荐书籍四个维度入手进行精准指导，并通过艺术创作、思维训练与信任建立等特色活动满足不同人格类型学生的成长需求，形成了系统化的个性化培养体系及全程育人机制。

四、结语

晋中信息学院的探索表明，以九型人格理论为桥梁，深度融合完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育人路径。它通过构建学校、学院、书院“三级协同”服务模式、“因型施教”的活动体系与“数据驱动”的支持机制，成功地将抽象的人格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育生产力。这一模式的价值在于：理论层面，它验证了发展性心理学理论与现代全人教育理念深度结合的可能性；实践层面，它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操作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管理工作流程，推动了教育管理从经验主义向科学精准转变。

未来，可在如何量化评估不同人格类型学生的长期发展成果、如何进一步深化“解析师”队伍的专业能力，以及如何将这一模式拓展至更广泛的生涯教育与领导力培养等领域进行持续探索，从而为培养兼具健全人格与卓越能力的时代新人贡献更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李颖，陈猷，赵翩翩 . 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J].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25(01): 80-82.

[2] 裴宇晶 . 九型人格心理学在思政工作中的应用 [N]. 新华日报，2025-02-06(11).

[3] 孙红岩，辛向，付天宇，等 . 苏轼人格精神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 24(02): 150-152.

[4] 吴瑕 . 高校艺术教育对大学生完美（下转 147 页）

基于 OBE 理念的“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融合教学研究

李珂儿 马 琪 秦国华 迪丽扎娃尔·海来提 王 雪

摘要：本文以 OBE 理念为核心，探讨“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的融合教学模式，采用整合实验内容、引入临床案例、强化实践操作等手段，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体系，分析“机能实验学”课程的性质与特点，结合临床案例引入、微课视频预习、实验操作与数据分析等环节，设计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方案。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显著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临床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医学实验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OBE 理念；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融合；教学改革；临床案例

一、引言

伴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逐渐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转变。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注重能力培养，与医学教育对实践能力、临床思维和创新精神的要求高度契合。“机能实验学”作为医学教育中的实践课程，承担着培养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科学思维和职业素养的任务。传统机能实验教学存在实验内容碎片化、临床关联性不足、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急需以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二、OBE 理念概述

OBE 理念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诞生背景与全球高等教育质量危机密切相关。当时，传统教育模式因过度强调知识灌输、忽视能力培养而饱受诟病，OBE 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教育范式转型的标志性成果。核心逻辑可概括为“目标导向—反向设计—能力本位—持续改进”的闭环系统，具体体现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重构[1]。OBE 理念将学生置于教育主体的位置，强调学习成果的达成度，要求教育者从“教什么”转向“学生学会什么”，以可观测、可衡量的学习成果指标，重构教学目标与评价体系。OBE 理念将学习成果视为教育质量的“锚点”，设计遵循 SMART（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原则。例如，医学专业的学习成果可能包括“掌握临床诊断基本流程”“具备独立处理急诊病例的能力”等，成果需与行业需求、职业标准直接对接。

三、“机能实验学”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机能实验学”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设计深度融合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及药理学等学科的核心实验内容，利用高度综合的实验平台，培养医学生扎实的实践操作能力、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团队协作精神。具体特点如下：

（一）实验内容的综合性

“机能实验学”的实验涵盖动物实验、离体器官实验，延伸至人体实验层面，多层次、多维度的实验设计，要求学生能突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及药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例如，在探究某种药物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时，学生需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掌握心血管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进行实验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验证药物效果，是对学生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应用能力的全面考验。

（上接 146 页）健全人格培养的影响研究 [J]. 新美域，2024(11): 153-155.

[5] 曾智斌 . 体验式教学在课程改革中的应用——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例 [J]. 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4(18): 186-18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学生需求导向的高校辅导员工作室个性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2024zsszsx186）。

（作者系晋中信息学院讲师）

（二）实践操作的高要求

实践操作从实验动物的准备、手术操作、仪器设备的精准使用，到数据的细致采集与科学分析，每一步都需学生亲力亲为，且要达到高标准的精确度与规范性。例如，在进行动物实验时，学生需熟练掌握动物麻醉、固定、手术暴露等技巧，对于生物信号采集系统、血流动力学监测设备等实验仪器的操作，也应达到熟练且精准的程度。数据分析能力也是评价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指标，学生能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得出结论，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三）临床关联的显著性

实验结果与疾病机制、药物作用机制紧密相连。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验证理论知识，模拟临床情境，分析实验结果，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与作用机制。将基础研究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是医学生未来成为合格的临床医生不可或缺的素质。

（四）团队协作的必要性

实验过程中，学生根据各自的专业背景与技能特长合理分工，共同完成实验任务，考验学生的个人能力，锻炼他们的沟通协调与团队协作能力。在团队中，成员间相互信任、有效沟通，共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有效培养学生的领导力、责任感以及团队精神。

四、基于 OBE 理念的“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融合教学

（一）基于 OBE 理念，明确教学目标

根据 OBE 理念，教学目标以行业需求和学生职业发展为导向，结合医学教育认证标准，设定以下学习成果：

知识目标：掌握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基本实验原理；

技能目标：熟练完成实验操作、数据采集与分析，撰写实验报告；

能力目标：具备临床思维能力，能将实验结果与疾病机制进行关联分析；

素养目标：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课前预习，了解课程内容

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发系列微课视频和慕课资源，科学设计预习任务，使学生在正式课堂学习之前，对课程内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和初步的掌握，为课堂上的深入学习和互动交流奠定坚实基础 [2]。例如，在学习急性心力衰竭相关知识时，学生使用慕课了解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临床治疗的新方法以及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拓宽视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为充分发挥微课视频和慕课资源的优势，教师可将两者进行有机整合。在预习任务中，学生先观看微课视频，对实验原理和操作流程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再使用慕课资源深入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拓宽知识面。

设计预习任务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深度思考。预习任务单的首要任务是学生认真观看微课视频，记录其中的关键知识点，查阅相关文献，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了解急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引导学生结合微课视频和查阅的文献内容，提出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的学习提供方向。

（三）临床案例引入，激发学习兴趣

在医学教育领域，临床案例教学将抽象的医学理论知识与真实的临床情境紧密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医学知识的内涵和应用，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3]。以急性心力衰竭为例，详细探讨临床案例的选择与设计，以案例讨论与问题引导的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如：患者，男，65 岁，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10 年、糖尿病病史 5 年，因“胸闷、气促 3 天，加重 1 小时”急诊入院。患者入院时神志清楚，但呼吸困难明显，端坐呼吸，大汗淋漓，口唇发绀。查体显示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双肺可闻及大量湿性啰音，心界向左下扩大，心尖部可闻及舒张期奔马律。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改变，心脏超声检查显示左心室扩大，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综合各项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左心衰竭。该案例贴近临床实际，患者的基础疾病和症状表现都是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常见的临床特征，且该案例包含丰富的临床信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分析依据，培养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

（四）PPT 细化讲解，了解原理流程

使用 PPT 深度剖析急性心力衰竭实验原理，插入心脏结构示意图，标注左心室、右心室等关键部位，强调本次实验重点聚焦于左心室功能变化。介绍原理流程，静脉注射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可影响心脏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性，改变心肌的收缩力和心率，致使心脏功能受损，模拟急性心力衰竭的发生 [4]。肾上腺素具有正性肌力作用，过量使用会使心脏耗氧量增加，加重心脏负担；乙酰胆碱则可抑制心肌收缩力，两者联合应用可有效地诱导心衰模型。以图表形式展示左心室收缩压（LVSP）、左心室舒张末压（LVEDP）等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正常范围和在心衰模型中的变化趋势。展示地高辛、多巴胺等药物的分子结构图，介绍其作用机制和剂量选择依据。

（五）教师带领总结，建构知识体系

实验课程进入收尾阶段，教师以引导者身份助力学生实现实验内容的深度内化。课堂上，教师通过分层提问、动态思维导图演示等具象化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梳理实验流程中的关键操作节点，同时搭建互动

交流平台，鼓励学生主动分享实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与解决方案，以及对实验现象的思考与感悟[5]。在此基础上，教师结合教学重难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案例，对实验背后的核心原理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深度解读，不仅帮助学生厘清原理的逻辑脉络，更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原理与实际应用场景之间的关联，让学生理解实验研究对专业实践的支撑价值，打破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间的隔阂。同时，教师针对实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操作误差、数据处理不规范等问题，组织学生开展针对性复盘分析，引导学生从操作细节、流程设计等维度反思改进，培养严谨的科学思维与责任意识；通过对团队协作实验项目的总结，提炼团队协作中的有效经验与不足，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素养，助力学生将分散的实验知识、技能与思维方法整合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为后续专业学习与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急性心力衰竭作为威胁生命健康的急危重症，往往因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或血压骤升等诱因触发，核心病理生理机制在于心肌细胞代谢紊乱引发的心肌收缩力急剧下降。当心肌收缩功能受损时，左心室犹如失去动力的“泵”，左心室收缩压（LVSP）从正常的 100~140mmHg 显著降低，而左心室舒张末期压（LVEDP）则由正常的 5~12mmHg 异常升高，这种血流动力学的剧烈改变，致使心脏无法有效将血液泵送至全身，进而引发肺淤血、体循环淤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端坐呼吸、下肢水肿等典型临床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在临床治疗领域，强心药物成为对抗急性心力衰竭的“利器”。以洋地黄类药物实验为例，其作用机制为抑制心肌细胞膜上的钠—钾 ATP 酶，促使细胞内钠离子浓度上升，进而推动钙离子内流，最终实现增强心肌收缩力的效果。在实验设计中，研究人员选取实验动物构建急性心力衰竭模型，以此模拟临床真实病理状态。给予强心药物后，借助精密压力传感器开展实时监测，通过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直观呈现药物对心脏泵血功能的调节作用，且实验结果与临床实际观察到的治疗效果高度契合。无论是临床检查中的心功能改善，还是患者临床症状的缓解，均能验证实验原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充分凸显实验研究在指导临床精准用药、客观评估药物疗效方面的重要价值。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指导学生规范操作实验仪器、准确记录实验数据，保证实验过程的严谨性；另一方面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引导学生结合患者实际病例，深入分析实验结果与临床治疗方案之间的关联。学生通过本次实验，不仅深入理解急性心力衰竭从病理生理机制到临床症状的演变过程，以及强心药物的作用原理，更掌握了将实验中获取的理论知识与数据转化为临床诊疗思路的方法，学会结合实验指标判断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进而优化用药剂量与治疗方案，切实提升临床思维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未来从事临床工作筑牢基础。

五、教学效果与反思

本次基于 OBE 理念设计的实验课程有效促进了教学目标与行业需求的对接。然而本次课程也存在不足之处。实验资源有限，部分学生操作机会不足，影响实验体验和学习效果，致使他们对某些关键技能的掌握不够熟练。临床案例的引入虽能增强实验的实用性，但部分案例的复杂度过高，超出学生的当前认知水平，学生在分析案例时感到困惑和迷茫，难以将所学知识与案例内容有效结合。今后可联合临床教师共同设计案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需求，对案例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使其与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匹配。

六、结语

本文以 OBE 理念为指导，构建“机能实验学”实验项目的融合教学模式，通过临床案例引入、微课视频预习、实验操作与数据分析等环节，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临床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符合医学教育改革趋势，为培养具有临床胜任力的医学人才提供了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 陈博，张延娇，蒋杨，等 .OBE 理念下融合临床技能的机能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J]. 中国医药科学，2024, 14(18): 50−53, 146.

[2] 赵玉，赵晋，马艳庆，等 . 虚拟仿真实验在机能实验学中的应用评价分析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 45(01): 88−94.

[3] 霍雯，唐钒，郑倩 .“德技并修”机制在医学机能实验学中的应用 [J]. 四川生理科学杂志，2024, 46(11): 2594−2596.

[4] 汪铭，陈聚涛，张隆华，等 .“双一流”背景下新医科实验教学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以人体机能学实验课程为例 [J]. 高教学刊，2024, 10(22): 31−34.

[5] 吴勤婷，韦红巧，黎静，等 . 新医科背景下护理学专业机能实验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J]. 科教文汇，2024(06): 112−1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新疆第二医学院 2024 年校级线下一流课程“机能实验学”。

（作者单位：新疆第二医学院）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育人策略研究

王洁琼

摘要：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智能建筑行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其人才需求也逐步向多样化、高端化方向转变，迫使技工院校必须主动革新其智能建筑专业的育人策略，以精准对接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本文通过梳理行业人才需求的核心特点，结合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当前课程体系的结构性滞后、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师资队伍的能力代际落差、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浅层化困境等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育人策略，力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行业输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育人

一、引言

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当下，全球产业正朝着高增值、知识集约方向转型，智能建筑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建筑技术与“智能化”技术在实践中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一体化的智能建筑系统结构[1]。产业升级不仅驱动智能建筑技术革新，更推动产业链延伸拓展，这对专业人才的知识构成、技能水准与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技工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主体，其智能建筑专业的育人策略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因此探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工院校智能建筑专业的育人策略，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智能建筑行业人才需求特征分析

（一）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多维转向

智能建筑领域对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正持续提升，这一要求不仅覆盖建筑、电气、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智能建筑项目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维的各个环节，更需要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核心素质包含扎实的建筑专业基础，以及对 PLC 编程、传感器研究等核心技术的掌握，同时须具备复杂系统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能力，精通 BIM 模型的构建与优化，还能运用智能算法提供决策支持；在绿色建筑领域，专业人才需关注建筑能效管理、可再生能源运用及建筑碳排放削减策略，以此推动智能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2]。

（二）实践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智能建筑领域对跨学科协作的重视程度持续加深，沟通协作能力也相应成为专业人才的核心素养，这类人才需掌握跨领域交流技巧，在与计算机科学家开展协作时还应具备算法应用基础；行业的快速发展则进一步要求人才兼具实践与创新双重能力，既要熟练完成智能设备运维、快速破解技术难题，也要能敏锐捕捉行业趋势、研发新技术，为行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三）对职业素养的重视程度提升

随着智能建筑项目规模持续拓展、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团队协作、沟通能力、责任心及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已成为企业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智能建筑类专业人才需与多专业团队紧密配合以实现项目目标，而良好的职业素养正是保障项目质量与实施效率的核心要素。

三、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课程体系的结构性滞后

根据 20 余所技工院校 483 份有效专题问卷的调研结果，76.4% 院校已开设两类及以上智能建筑专业，虽开设院校数量有所增加，但该专业占比仍偏低，且东部地区虽开设数量占优，其增速却滞后于行业需求；在课程设置上，虽智能建筑课程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以传统建筑课程为核心，尚未形成系统化专业体系，加之课程内容更新迟缓、实践教学与行业脱节，难以满足复合型人才需求。

（二）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作为培育学习者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部分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却面临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设备更新滞后、实训项目缺乏深度、实操环节不足，且校外实习管理不

够精细，这些问题不仅限制学习者对专业技术的掌握与创新能力发展，还对其职业素养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形成制约。

（三）师资队伍的能力代际落差

智能建筑专业本身带有跨学科属性，当前技工院校该领域的师资存在三方面显著短板：跨学科知识储备不够充足，企业实践参与机会有限使得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技术更新培训参与度较低制约了知识体系的前沿性，这些问题呈递进态势，既限制学习者的实践机会、削弱其职业素养与创新能力，最终还会影响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四）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浅层化困境

校企合作是技工院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当前部分院校虽已与智能建筑企业建立合作，但合作形式仍较单一，多集中在学习者实习、企业兼职教师授课等方面，而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关键领域，校企双方缺乏深度协作，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3]。

四、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育人策略建构

（一）构建基于 OBE-CDIO 的“双螺旋”育人模式

1. 基于 OBE 与 CDIO 理念的结合

CDIO 这套完整的工程教育理念及实施体系，实际是以产品从研发到运行生命周期里的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四个环节为依托，引导学习者在工程场景中用主动实践的方式整合课程知识，最终实现工程能力与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4]。

2. 构建“双螺旋”结构

一条螺旋侧重理论知识学习，从基础理论逐步向专业理论深化；另一条螺旋聚焦实践项目推进，从简单项目逐步向复杂项目过渡以持续提升学习者实践能力，两条螺旋相互交织且彼此促进，共同推动学习者能力发展。

（二）模块化课程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1. 以项目为驱动整合课程

依据CDIO理念规划贯穿整个学习阶段的工程项目，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技能训练到综合能力培养的递进逻辑，低年级安排照明控制系统设计等基础智能建筑子系统项目，高年级则设置智能建筑整体综合设计项目，同时结合 OBE 理念与 CDIO 理念的项目驱动思路完成课程整合。比如可将建筑电气技术、智能控制系统、传感器技术这类相关课程融入具体项目，让学习者在推进项目时综合运用多门课程的知识与技能，以此培育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2. 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

技工院校需主动开发“模块化 + 项目化”课程包，将建筑、电气、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加以整合，并围绕智能建筑技术核心构建课程体系。“智能建筑概论”侧重搭建领域宏观认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与施工”深入拆解系统设计及施工全流程，教师可结合实际项目案例展开分析，引导学习者针对不同建筑需求设计智能化方案并掌握施工技术；物联网技术课程围绕智能建筑三层架构的应用展开教学，培养传感器数据采集、无线通信传输与智能终端控制能力，大数据分析课程则专注于多源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从能耗、设备运行及用户行为数据中提炼优化管理的关键依据。

3. 动态化课程内容更新

智能建筑技术领域的跨学科融合与技术迭代正同步提速，实践中需构建动态更新机制以保障课程体系与产业实际需求无缝衔接，具体可通过前沿技术植入、行业发展图谱动态梳理，将 BIM、AI 能耗优化算法及 5G 物联网架构等新兴技术纳入课程模块，并由校企双方协作发布《智能建筑技术前沿清单》。围绕真实工程场景将行业标杆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例如“智能建筑概论”引入智慧医院设计实例，“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与施工”结合某智能园区项目拆解 5G 组网方案，再依托校企协同开展动态校准、技术转化与模块化设计，形成“需求驱动更新—改革反哺行业”的良性循环，确保课程体系对产业变革始终具备敏锐响应能力[5]。

（三）虚实融通的实践教学体系升级

1. 智能化实训教学平台建设

以“虚实结合、产教融合”为原则构建覆盖智能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实践教学设施集群，可实现教学环境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耦合，校内实训中心模拟从规划设计到运维的全流程，配备含不同品牌楼宇自控、消防报警及智能安防监控系统的多品牌智能设备以还原真实工作环境，运维实验室侧重故障诊断与系统优化训练，产教融合基地引入企业最新设备及真实项目数据，并依托捐赠设备开展老旧建筑改造实训，最终达成教学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2. 阶梯化实践教学项目设计

设计纵向贯穿智能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实践项目，具体可覆盖规划环节的智能建筑项目可行性研究与方案策划、设计环节的建筑智能化系统方案设计、施工环节的设备安装与调试，以及运维环节的系统维护与故障处理等关键内容。

实践项目的来源与实施需体现多元性，既可用企业实际项目，也可由教师结合科研项目改编，通过与合作企业签订协议将部分企业项目引入校园，使学习者在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下完成实践；同时推动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课题供学习者参与，并对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建筑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标准开发校级集训项目，融入“1+X”智能建筑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内容，最终达成竞赛训

练、证书考核与课程实训的有机衔接。

（四）复合型“双师型”师资队伍赋能工程

1. 强化跨学科教学能力培养

针对智能建筑“建筑 + 电气 + 信息 + 控制”的多学科融合特性，需培育学科交叉与技术复合的师资队伍，具体可通过定期组织技术融合研讨、邀请行业专家开展讲座与培训课程、支持教师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同时鼓励教师参与智能建筑方向研究项目，对具备条件的教师，院校可提供在职进修机会，使其前往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跨学科知识。

2. 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化建设

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需细化相关规范，明确教师应定期到智能建筑企业参与实践锻炼，可规定每两年累计实践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同时明确实践岗位与具体任务，确保教师深度参与企业实际工作，如智能建筑项目招投标、方案设计及施工管理等环节，以积累真实实践经验。

开展智能建筑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时，教师可结合企业实践期间参与的项目案例，向学习者讲解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及解决策略，同时凭借自身专业能力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例如协助破解智能建筑系统技术难题，以此促进校企深度协作，达成互利共赢目标。

（五）构建深度融合、协同共赢的校企合作生态

1. 共建产学研一体化育人平台

可联合智能建筑领域企业深化合作，通过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携手龙头企业共建智能建造产业学院，共同研发认证课程与行业标准，同时校企双方需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在确立培养目标时充分纳入企业对人才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及职业素养的具体要求，同步合作规划专业建设方向，并依据行业发展动态调整专业课程体系，且需邀请企业专家深度参与课程体系设计与课程标准制定，确保课程内容精准匹配企业实际工作场景需求。

人才培养进程中，校企双方需共同参与教学过程管理，企业可委派人员介入教学质量监督并实施教学效果评估，同时联合开展实践教学指导，由企业工程师与校内教师协同指导学习者开展实践操作以提升其实践能力，且在学习者考核评价环节需融入企业评价标准，除校内组织的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外，企业可依据学习者实习期间表现及项目完成能力等维度进行评价，最终达成校企协同育人目标。

2. 深化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围绕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推行订单式培养，达成“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岗”的深度融合，校企双方需共同制定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企业依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明确人才所需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等具体要求，同时参与订单班课程设置以确保课程内容与企业实际工作高度契合，教学内容设计可结合企业项目案例及工作流程展开，订单班学习者毕业后直接进入合作企业就业，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6]。

以资源共享、成果互利激活企业参与动力，院校为合作企业开展员工技能提升培训，企业开放最新设备支撑教学并设立“企业奖学金”奖励订单班优秀学习者，校企可联合申报课题且共享工法专利、技术规范等研究成果。

五、结论

在建筑业绿色化、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智能建筑行业对人才的复合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及产业适配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技工院校智能建筑专业面临的课程体系滞后、实践教学薄弱、师资能力断层及校企合作浅表化等现实困境，系统性地提出了育人策略的优化路径：构建以成果为导向（OBE–CDIO）、以项目为载体的“双螺旋”育人模式，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重构模块化、动态更新的课程体系，以回应跨学科知识整合与技术快速迭代的挑战；升级虚实融通、阶梯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保障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实施以“双师型”为核心的师资赋能工程，破解教师队伍的能力代际落差；最后，构建深度融合、利益共享的校企协同生态，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平台与机制保障。

综上所述，技工院校须主动适应产业变革，通过上述策略的系统实施与动态优化，方能持续提升智能建筑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行业转型升级精准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而赋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水生，周泉，何君，等 . 智能化技术在建筑工业化中的应用进展 [J]. 科技导报，2022, 40(11): 67−75.

[2] 屈万英，王黎，周百灵，等 . 探讨“建筑 +”多专业分级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J]. 中外建筑，2025(06): 114−118.

[3] 殷建国 . 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技工院校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14): 84−85.

[4] 曹森孙，梁志星 . 基于 CDIO 理念的工程专业教师角色转型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01): 4.

[5] 李小玲，张信，吴静 . 智能建造视阈下建筑工程类专业教学改革探索——以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23(02): 91−94.

[6] 袁潇，高松 . 高职院校专业管理机制研究 [J]. 高教探索，2017(01): 76−8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南省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教学研究立项课题“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技工院校智能建筑类专业育人策略研究”（jykt202430）。

（作者单位：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湖南建设中等职业学校〉）

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新思路

陈玥君

摘要：巴蜀文化视域下的高职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是传承地域文化、培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创新路径。改革核心在于构建“双核四维”目标体系，实现课程从“基础工具课”向“文化传承与职业赋能课”的转型；构建“经典文学＋巴蜀文化＋职业应用”三维内容架构，突破传统教材线性编排局限；创新“情境体验＋实践探究＋数字赋能”多元教学模式与“过程性评价＋多元化主体＋素养导向”综合评价机制。该改革为高职“大学语文”课程发展提供新方向，可有效提升课程质量，强化学生地域文化认同感，培养具有人文素养、职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关键词：巴蜀文化；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载体，具有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作用，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引领的使命，但在教学实践中，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存在一定不足，多数院校注重专业技能，不重视人文素养，造成语文课程课时被压缩，内容脱离实际，且传统教学方式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1]。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且具备“兼容并蓄”“坚韧豁达”“务实创新”的精神特质，将其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改革中，可避免课程同质化，增强学生的地域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2]。基于此，本文探讨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新思路，以提升课程质量，传承优秀文化。

一、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传承地域文化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可为“大学语文”提供教学资源。在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下挖掘巴蜀文化基因，可保持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中融入巴蜀地域文化，有助于研究巴蜀文化，促进巴蜀文化的传播，并推动巴蜀文化的传承、弘扬，深入挖掘其精神价值、实践价值，促进地方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且将巴蜀文化融入语文教育，可激发学生的文化传承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们主动保护宣传当地文化，助力巴蜀文化的传承[3]。

（二）提升育人功能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育目标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该目标要求“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职业能力。巴蜀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务实精神、职业伦理，可促使课程育人功能升级。明代学者杨慎的治学理念为“闻不若见，知不若行”，可引导学生形成严谨的态度；卢作孚的经营哲学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可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巴蜀工匠技艺追求“精益求精”，可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将上述文化元素与职业素养结合，可促使“大学语文”课程从培养语言能力升级为培育综合素养，在学生职业发展中注入人文动能。

（三）构建特色课程

当前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处于边缘化状态，课程缺乏特色、辨识度，与高职教育类型特征不符合，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可以助力课程文化建设。《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排方式为“中外文学简史”式，在其中加入巴蜀文化后，可形成鲜明的地域标识。在内容编排上，可聚焦巴蜀文学经典，在实践编排上，可链接地域文化资源。在教学上，可与地方产业需求相结合。在烹饪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可设置“东坡美食与文学”专题，分析苏轼在《老饕赋》中的文字表达、饮食文化；在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可向学生讲授巴蜀石窟造像中的文学故事，跨学科融合文学、艺术；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可设计巴蜀童谣创编环节，锻炼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在教学中设计特色课程，可促进“大学语文”和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增强课程的独特性，避免“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

二、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课程改革需遵循国家政策导向，在职业教育中加强人文素养的培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地方政府需积极推动地域文化传承创新，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高校、地方文化单位之间进行合作，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进巴蜀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为课程改革提供政策支持。

巴蜀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为课程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巴蜀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动的民俗风情、深厚的精神内核。司马相如、扬雄的汉赋经典，三苏父子的宋词华章，郭沫若、巴金的现代文学成就，共同构成了文学资源库。川剧、蜀锦、巴蜀童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杜甫草堂、三苏祠等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活态文化资源。文学资源库、活态文化资源助力“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优化，具有独特的课程改革优势[4]。

（二）挑战

当前“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存在教学理念固化的缺陷，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理念“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素养”，认为“大学语文”课程为基础工具课程，不重视文化传承、素养培育。这种传统教学理念可能造成“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影响课时安排，降低教师进行文化融合教学的积极性，难以充分挖掘巴蜀文化的精神内涵、育人价值。

如今“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未系统性整合巴蜀文化、语文教学优质资源，教材中的内容主要为通用文学经典，关于巴蜀文化的内容较少，尚未形成体系化教学内容框架。同时，尚未形成完善的校地协同育人机制，高校与地方文化单位、行业企业的合作停留在表面，无法形成有效的教学资源。高职院校中部分教师缺乏巴蜀文化素养，不能准确把握地域文化的内涵、脉络，以及其与专业教学的融合点，限制了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导致其难以设计高质量的教学内容、教学活动。

三、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重构课程定位

“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为精准定位，将其从“基础工具课”进阶为“文化传承与职业赋能课”，确立“双核四维”目标体系。“双核”为地域文化传承、职业素养培育，“四维”为统筹语言应用、文化认知、职业伦理素养、创新实践关键能力。

课程目标设计要根据巴蜀文化特质、专业需求进行分层细化：文化类专业主要培养学生的巴蜀文化研究能力，锻炼其传播能力，核心目标为系统梳理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撰写地域文化推广文案；旅游、餐饮等服务类专业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解读、服务转化能力，关键目标为解读巴蜀文化景点的文化内涵、结合地域文化设计服务方案；机械、电子等技术类专业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设定目标为从巴蜀工匠文化中汲取创新灵感、撰写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职业文书，通过精准定位促进课程深度衔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革新内容体系

课程改革的核心为内容体系革新，需突破传统教材线性编排的限制，构建“经典文学 + 巴蜀文化 + 职业应用”三维架构，促进通用内容与地域特色、文学经典与职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经典文学模块聚焦于“文化根脉传承”，选择李白《峨眉山月歌》、杜甫《春夜喜雨》等具有巴蜀印记的篇目，在解读文本过程中讲解地域文化。在《峨眉山月歌》讲解过程中，可融入峨眉山形胜、唐代巴蜀交通旧事，让学生感受“夜发清溪向三峡”的韵味；在讲解《春夜喜雨》时，可将诗歌内容与成都平原农耕肌理产生联系，解读“润物细无声”的地域情感表达。

巴蜀文化模块聚焦于“地域特色培育”，共分为三个子模块系统开发资源。经典文学模块收录巴蜀名家的代表作，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巴金的《家》；民俗文化模块研究川剧唱词、茶馆烟火中的语言元素；精神特质模块提炼“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在讲解内容中融入苏轼、卢作孚等人物的事迹。

职业应用模块聚焦于“提升实践能力”，根据不同专业特性制定专题：旅游专业开设“巴蜀景点讲解词撰写”课程，餐饮专业开设“东坡美食与饮食文学”课程，学前教育专业开设“巴蜀童谣创编与教学”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开设“巴蜀元素文案设计”课程。同时编写《巴蜀文化与高职语文》校本教材，内容为“文本 + 案例 + 实践任务”，并图文结合，在呈现专业内容的同时增强可读性[5]。

（三）创新教学模式

构建“情境体验 + 实践探究 + 数字赋能”的多元教学模式，让语文课堂从“静态讲解”转向“动态体验”。

将情境体验教学与“文化感知”结合，构建真实场景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巴蜀文化。课堂内构建“巴蜀茶馆”场景，让学生扮作茶客，使用巴蜀方言聊民俗典故；举办“川剧唱词赏析”活动，带领学生赏析《白蛇传》唱词中的文学修辞手法与情感韵味，在真切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课堂外组织“巴蜀文化寻根”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实地探访三苏祠、杜甫草堂等文化遗址，开展“楹联解读”“诗词吟诵”等实操活动；走访川剧艺术传承中心，安排学生对传承人进行深度访谈，系统梳理艺术传承脉络、实践经验，最终形成兼具史料价值和思辨性的文化访谈报告，强化文化认知的实践落地。

实践探究教学的核心为“能力培养”，依托项目式学习构建任务体系。牵头开展“巴蜀文化推广”项目，组织学生分组完成“主题确立—史料调研—文案精研—成果展演”全流程实践，旅游专业编制《文化旅游导览手册》，文秘专业撰写推广实施方案，传媒专业创制专题宣传影像；设置“巴蜀文学人物研究”课题，引导学生选定苏轼、巴金等研究对象，结合文本解析与生平考辨撰写学术性研究报告，并通过课堂汇报答辩深化研究成果。

数字赋能教学突破“时空局限”，依托信息技术拓展教学场域：构建“巴蜀文化数字资源库”，系统整合电子文本、音视频素材及文化遗址 VR 全景资源，助力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借助在线教学平台实施“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设计“巴蜀文化知识闯关”模块化任务，线下联动实践研学；依托短视频平台发起“我眼中的巴蜀文化”创作项目，引导学生拍摄文学遗址、民俗展演等内容，并进行传播实践。

（四）优化评价机制

构建“过程性评价 + 多元化主体 + 素养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过程性评价占据较高权重，以学习全过程表现为核心构建多元评估体系，课堂参与度维度聚焦学生在情境体验、小组研讨中的互动质量与深度参与状态；实践任务维度围绕文化寻根、项目式学习产出的调查报告、推广文案、展示答辩等成果进行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评价；自主学习维度则通过线上资源研习时长、知识闯关达成度及文化笔记的学术梳理质量综合评定。终结性评价设置合理权重，构建“文化素养 + 职业应用”双任务考核体系，文化素养维度以“巴蜀文化专题论文”或“文化主题演讲”为考核载体，综合评定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知深度、逻辑梳理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职业应用维度立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考核内容，旅游专业聚焦景点讲解词撰写质量与现场展示效果，文秘专业侧重文化活动策划方案的专业性与可行性，实现评价与职业能力需求的深度耦合。

四、课程改革的保障体系构建

（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课程改革的核心主体，通过“培训—研修—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提升自身巴蜀文化专业素养、教学创新实施能力。学校定期举办“巴蜀文化专题培训”，邀请高校教授、文化学者深度解析文学脉络、民俗底蕴与精神内核；选派教师参与“地域文化与语文教学”学术研讨学习前沿经验，安排教师赴三苏祠、川剧艺术中心等挂职研修丰富实践资源；组建专项教研团队，进行课改课题攻关、教学资源开发，通过常态化集体备课与教学观摩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二）资源整合联动

课程改革打破校园壁垒，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联合地方文化馆、博物馆、文化遗址管理处建立“巴蜀文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开辟实地研习场所；邀请文化传承人、专家学者进校园举办“大师讲堂”，深度介入课程设计与教学指导。联合旅游、文创领域企业共建“文化服务实践项目”，推动学生深度参与地域文化推广、文旅产品开发等实操工作，在实战场景中锤炼专业能力；同步对接地方政府争取支持，将课程改革纳入区域文化传承发展规划，夯实政策与资金双重保障。

（三）校园文化浸润

校园文化作为课程改革的核心支撑载体，需系统构建巴蜀文化浸润式育人环境，将景观体系融入地域标识，打造“东坡诗词长廊”“巴蜀名人墙”等文化景观，教学楼廊道以川剧脸谱、蜀锦纹样等元素营造氛围；常态化举办“巴蜀文化节”，举办诗词吟诵、川剧展演、文化知识竞技等特色活动；组建专项社团，引导学生开展文学创作、民俗田野调研、文化传播实践，形成“课堂教学筑基—校园文化浸润—社会实践赋能”的育人闭环。

五、结语

巴蜀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可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与高职教育类型特征相结合，通过重构课程定位、构建内容体系、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评价机制可解决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未来，可进一步深化校地协同，持续优化教学资源，将地域文化融入到高职院校语文课堂中，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程秋云 . 新时代背景下巴蜀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意义和路径 [J]. 嘉应文学 , 2025(17): 161−163.

[2] 胡成霞 , 邹海燕 . 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 : 竹枝词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 2024, 34(02): 67−73.

[3] 杨松林 , 杨宇新 . 浅谈文化类校本课程读本的编写策略和方法——以《巴蜀地方文化中小学生游学读本》为例 [J]. 中学语文 , 2021(22): 57−61.

[4] 杨松林 . 以巴蜀文化经典传承来助力国家文化自信——成都二十中初中语文“吟诗咏词走巴蜀，文化文明在我心”校本特色课程综述 [J]. 语文月刊 , 2018(03): 39−43.

[5] 孙小涵 , 刘小文 . 基于巴地汉阙文化的跨学科综合性教学策略研究 [J]. 科教文汇 , 2024(02): 166−16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4 年项目“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创新融合与价值挖掘”（CJF24049）。

（作者系绵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新课标视域下中职英语“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王潇宁

摘要：随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深化发展，职业教育中职英语教学亟待改革，以契合《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针对传统教学中听、说、读、写技能训练相互割裂，导致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不足、学习效能低下的现状，本文提出构建“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四项技能的有机融合与循环促进，旨在通过重构教学目标、整合主题内容、创新活动设计、优化多元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实现语言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协同发展。本文系统阐述了该模式的内涵、优势，分析了当前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并着重探讨了其实践构建策略，以期为提升中职英语教学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课标；中职英语；听说读写融合；循环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宏观背景下，中职英语教学的价值定位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对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及职业素养的综合培育。当前教学实践面临更多机遇，也面临显著挑战。传统中职英语教学的听说读写模块彼此独立，导致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无法协同发展，难以将所学内容应用于实际，自身素质和能力也未得到提高。新课标背景下，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创新教学方法，关心学生学习，全面提升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由此出发，教师应当构建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以使教学与新课标教学要求更为契合，为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强化综合素质提供有力保障。

一、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的内涵及优势

（一）内涵：基于技能整合与循环促进的教学范式

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是一种新颖的教学模式，此模式认为听、说、读、写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整体，不能孤立地进行教学。教师需要通过循环教学引导学生在不同的语言技能之间不断转换和运用，实现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例如在听的过程中，学生可学习语音、语调、词汇和语法等知识，为说和写打下基础；说的练习可引导学生巩固所学的语言知识，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能促进听力理解；阅读则能使学生增加词汇量，知识面，为写作提供素材和范例；写作能进一步深化学生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有助于提高口语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落实此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在开展英语教学中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将课堂视作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阵地，带领学生把握每节课程的重点，将听说读写融入各个教学环节，以此不断强化学生听力、口语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与此同时，教师也需要拓展优化听说读写的各个环节，以此保障学生更扎实地掌握英语知识，最终呈现良好的英语课堂教学效果。

（二）优势：指向核心素养与职业发展的多维价值

在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下，学生能进一步内化英语知识，积累丰富的学习内容，同时也可拓宽英语学习视野，锻炼自身综合素养。由此可见，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独具优势。

首先，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能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此教学模式下，学生能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则可相应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参与课堂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听说读写循环模式也能使教学更具趣味性，确保学生的探索兴趣与英语学习信心得到大幅提升。

其次，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以往教学方式相比，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整合方面，需要教师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融为有机整体。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度解读新课程教学理念内涵，寻找合适的教学创新策略，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在此模式下也将跟随教师引导以更佳状态完成学习任务。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采用任务驱动、情境模拟、新媒体试讲等教学方法，引领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锻炼英语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协同发展[1]。

最后，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实现了教学与职业需要有效对接。在此教学模式下，新课程教学要求将得到进一步满足，教师重点关注核心素养培养环节，在教学中遵循学生职业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设定教学目标、完善教学活动。与此同时，学生学习内容也将与知识发展需要紧密衔接，能按照未来岗位标准和要求发展能力完成对应学习任务，以此提升自身职业竞争力。

二、当前中职英语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第一，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普遍薄弱。部分中职学生文化基础不佳，缺乏充足的英语词汇积累，听说读写能力都存在不足，在学习英语知识时也面临一定阻碍。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方法存在滞后性，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导致学习积极性存在缺失。例如部分教师教学中仍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不仅可能导致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也可能阻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教师教学模式枯燥，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中职英语课堂教学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第二，听说读写环节在教学中彼此割裂。传统的中职英语教师教学中存在听说读写尚未有机结合的问题，部分教师强调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部分教师则更关注听力和阅读教学，忽略了四者之间的协同关系。一般情况下，听说读写能力彼此促进、协同发展，但部分教师仅出于应对考试的教学目的，并未将四项能力有机结合，导致中职英语课堂教育价值相对缺失。

第三，教师课堂教学评价相对单一。教学评价是巩固学生知识学习、检验学习成果的关键步骤，但现阶段中职英语教师往往仅以课堂练习题作为教学评价工具，以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并评价学生学习状态。单一的教学评价导致学生的学习存在盲目性，部分学生仅为应付教师而完成课堂检测，并未充分认识到自身英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同时，教师单一的评价方式也无法精准把握学生情况，导致教学辅导和教学策略调整缺少针对性。

三、新课标下中职英语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一）以素养与职业双导向，重新构建分层递进的教学目标体系

中职英语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与核心素养，因此教师需要深入探索新课标内涵并结合中职学生特点，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运用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确保听说读写贯穿教学全过程，提升学生英语综合素质[2]。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也需要考虑学生未来职业场景中英语的应用需求；例如，对于汽修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教学中适度融入汽车维修英语术语，为学生后续职业发展打下语言基础。也可引入汽车维修领域的英文维修手册阅读任务，鼓励学生在真实的职业文本中学习专业词汇和表达。

教师应结合新课标与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创设分层递进的教育目标。英语总体教育目标从核心素养培养出发，细化听说读写技能目标为基础、提升、总结巩固三个阶段。在基础阶段主要通过图片激活词汇，同时引入生活中常见的英语标识、短视频等素材，引导学生在熟悉的场景中学习英语；在提升训练阶段，可带领学生完成录音跟读并增加配音练习，鼓励学生模仿英语原声以锻炼语音语调；在总结巩固阶段，则可开展竞赛与项目式学习，如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英语职业介绍手册，综合运用听说读写技能。学生在目标指引下梳理知识体系，有序完成学习任务。例如在“个人与家庭生活”相关教学中，基础阶段可通过图片激活学生词汇，鼓励学生参与听说环节并由此掌握关键句型，通过小组对话、写作接龙训练读写技能；提升训练阶段，利用录音引导学生跟读，强化特定写作句型练习；总结巩固阶段，以竞赛形式巩固知识，结合“成员、体貌特征、职业、工作职责”开展对话演练与互评，辅助学生自主构建学习目标体系，成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在此基础上也可组织学生开展“职业人物英语访谈”活动，模拟采访不同职业的人士，进一步提升语言运用和沟通能力。

（二）依托主题与专业，整合立体化教学内容

新课标背景下构建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合理整合教育内容，建立与学生综合素养的联系。首先，深度剖析职业需求，选取英语与职业关联内容为不同专业学生定制教学内容。例如，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可引入航空服务英语词汇、日常交际英语表述等内容；对于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可加入数控机床及其操作词汇英语表达等。其次，围绕教学主题提供丰富听力材料。可收集行业内真实的英语对话、英语广播节目片段等，引导学生接触更真实的语言环境。最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布置阅读和写作任务，助力学生在语境中提升技能。例如，结合当下热门网络话题、流行文化设计相关的英语阅读文章和写作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3]。

例如在“交通”单元教学中，教师紧扣教学主题确定与中职学生职业需求相关的学习内容，借助多媒体技术呈现多样化的听说读写资源并归纳整合，打造新型课堂。针对旅游英语专业学生，教师以景点介绍、导游讲解等作为主题，围绕“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开心旅游”等话题将职业资源融入英语课堂，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与此同时，教师也引入交通行业最新动态，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等相关英语资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英语的基础上了解行业前沿信息。此外教师可开展“交通英语情景模拟”活动，鼓励学生分别扮演司机、乘客、交通管理人员等角色，在模拟场景中运

用所学英语进行交流，增强语言实践能力。对于幼教专业的学生而言，教师可整合幼儿语言活动、绘本教学、游戏组织等真实教学案例，促使学生在模拟的情景之中练习听说表达；把幼儿绘本、活动方案、儿歌童谣当成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提炼并撰写简要的教学活动摘要或活动设计要点，这样既能巩固专业词汇，又能提升读写应用能力。教师还需要定期更新教学资源库，收集各个行业最新的英语实操文本与资讯，如每月选取一篇行业前沿的英文报道，组织学生分组阅读讨论，以小组口头汇报的形式分享观点，把听说读写技能自然融入实际应用场景，让学生切实体会到英语在职业中的实用价值，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与针对性。

（三）技术赋能与活动创新，创设沉浸式学习情境

构建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创新课堂活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促进听说读写能力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可充分利用 VR 技术，也可开展英语短剧表演活动，鼓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英语短剧，在编写剧本过程中锻炼写作能力，在排练过程中提升口语表达和听力理解能力，在表演过程中增强自信心和语言运用能力。

尤其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和 VR 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教师应充分利用相关新技术创设真实的学习场景，使英语学习与学生生活实际和职业场景紧密结合，推动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例如在“校园生活”教学中，教师利用 VR 技术创设循环教学课堂，将“我的校园生活”作为教学主题，鼓励学生在 VR 情境下与网络人物互动，运用所学词汇描述学习感受、探讨喜欢的课程及原因，锻炼语言表达和听力能力。同时教师引导学生撰写交互感受，组织小组开展“制定理想中的校园生活计划”口语表达训练，学生通过听录音、小组交流分享、归纳整理生活计划、描述校园生活等活动，将英语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实际语境，实现听说读写有机结合，全面提升英语核心素养。此外也可开展线上英语学习社区活动，学生在社区中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学习心得、完成学习任务，打破课堂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学习场景 [4]。

（四）推行过程性多元评价，实现以评促学促改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新课标对中职英语教学评价提出更高要求。在听说读写循环教学课堂中，教学评价旨在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并发现学习问题。因此教师需构建多元化教学评价形式，在课堂测验、互评和评价体系表的基础上也可引入成长档案袋评价，将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作品、阶段性测试成绩等放入档案袋，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长轨迹 [5]。

如在节日主题教学中，教学围绕各式庆祝活动展开，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创设情境组织角色扮演活动，引导学生掌握庆祝活动关键词句。教学评价环节需要教师关注学生对相关词汇和语句的掌握与运用情况，开展全面评价。通过设定课堂测验、同桌互查答案，布置“开幕庆祝”写作任务并进行互评，结合学生自评与互评，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调整学习策略。此外也可制定评价体系表，详细记录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及听说读写存在的不足，并根据记录结果与学生个别交流，及时反馈和指导，助力学生提升学习效果。同时邀请企业导师参与评价，从职业需求的角度对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进行评价，使评价更具专业性和实用性，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此外可开展英语学习成果展示会，鼓励学生展示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英语手抄报、英语演讲视频等，由教师、同学和企业导师共同进行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成就感。这些多维度的评价结果不仅能帮助教师精准把握学生在听说读写各环节的学习短板，还能为后续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学方法的优化提供针对性的数据支撑，从而推动教与学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四、结论

本文针对中职英语教学中长期存在的技能培养割裂问题，基于新课标核心素养理念，系统构建了“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并非简单的教学顺序调整，而是一种以技能整合观与学生中心论为基石的整体性教学重构。它通过目标体系的重设、教学内容的融合、活动情境的创设以及评价体系的革新，旨在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训练由孤立的“点”连接成互促的“环”，最终编织成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的“网”。

实践证明，该模式的实施能有效提升中职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语言学习效能感及职业情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然而，其全面落地亦对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资源开发能力、课堂组织能力及信息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可进一步聚焦于：开发与各专业配套的“循环教学”主题资源包；探索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对学生在循环任务中的行为数据进行跟踪与智能诊断；构建支持该模式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总之，推动听说读写循环教学，是实现中职英语教育从“教知识”向“育素养”转型的关键一步，对于培养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学森 . 中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J]. 校园英语 , 2022, (21): 94−96.

[2] 王嘉琪 . 浅谈如何提高中职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J]. 校园英语 , 2021(49): 78−79.

[3] 刘艳红 . 探究如何培养中职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J]. 校园英语 , 2021(30): 81−82. （下转 159 页）

高中美术课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策略

施晓敏

摘要：本文立足于高中美术课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从教育本质与学生思想认知发展的角度，探讨价值观塑造与价值体系构建的路径。研究强调，高中美术课程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平台，其深厚的人文属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供了天然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融入美术教学，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主题单元重构、文化基因迁移、技术赋能创新等维度提出具体策略，并通过理论阐述与教学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旨在将高中美术课程真正打造为学生提升审美素养、坚定文化自信、涵养价值品格的重要阶梯。

关键词：高中美术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策略；美育；课程思政

美术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石，在高中阶段不仅承担着传授艺术知识与技能的任务，更肩负着提升学生审美素养、塑造正确价值认知的育人使命。高中美术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与人文精神，能够将时代精神生动地呈现，为学生学习与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直观而深刻的途径。本文从美术学科的独特性入手，探索价值教育的渗透路径，致力于剖析美术元素（如色彩、构图、叙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层联系，将艺术形式转化为具象的价值载体，引导学生在对色彩与形体的审美体验中，感知和谐、公正、爱国等价值理念的深刻内涵。

一、美术课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一）顺应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美术课程不仅是人文教育领域构建的核心要素，从战略价值角度来看，该学科也从单纯的艺术技能传授逐渐转为了对各种经典文化的传承，在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价值塑造与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为广大高中生的成长与进步提供了更多支持。对于广大青少年而言，他们更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坐标，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美术学习与人文理念认知的深度融合，通过美术知识体验和美术作品欣赏，完成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高度认同，为日后更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提供支持与帮助。此外，从教育现代化转型的角度来看，美育理念还可以带领广大学生突破各种束缚，从单纯的美术技法训练逐步转为审美素养、文化理解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提升，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美术教学体系构建中，高质量完成教育本质的回归与坚守，从与时俱进的艺术实践中获得文化基因与价值信仰的双丰收。在这种融合模式的影响下，教师也要不断提高个人业务技能，帮助学生在丰富的图像识读中破解各种文化密码，坚持从审美判断的角度校准个人价值坐标，在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的价值体系影响下实现既定的育人目标。

（二）拓展思政教育创新实践的必然路径

思政教育是铸魂育人的根本。针对高中阶段的学生，教师一定要从传统的应试教学中挣脱出来，从价值认知向行为实践深度转化的角度，展示美术课程中各种经典作品深厚的底蕴，将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打造成为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梯。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高中美术立德树人教学目标，在日常的美术课堂

（上接 158 页）

[4] 杨天军 . 构建中职英语高效课堂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中职英语听说读写循环课堂教学模式构建浅探 [J]. 中学教学参考 , 2021(21): 86-87.

[5] 徐娟 . 试谈中职英语教学中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J]. 亚太教育 , 2015(03): 76.

（作者单位：辽宁省劳动经济学校）

上教师还要发挥各种视觉艺术的优势，从突破各种传统说教思维的角度，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生的审美体验中，为更好地实现春风化雨般的浸润效果提供支持。不仅如此，在一线美术教学中，教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拓展现有思政教育的实践领域，通过艺术创作引导学生感受工匠精神，在作品鉴赏中帮助学生理解家国情怀的弥足珍贵，还要在审美批判中养成独立的思考习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深地刻在心中，完成知识灌输到精神浸润的迁移，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在学生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最终构建起永恒的价值塑造的认知。

（三）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青少年时期是各种价值观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也是高中学生认知能力提升的最佳时点，为此在高中美术课程推进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发挥其优势，在感官介入和核心价值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完成色彩表达与造型语言的深度融合，让更多的高中生明白：艺术来源于社会，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各种道德规范的展现。无论是红色主题的革命精神还是非遗中的工匠精神，甚至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文明都表达着人们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最后，教师还要从具身认知、情感共鸣以及价值内化的逻辑中，引导学生用自己手中的笔触勾勒出心中的美好遐想，从多层次的审美理念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角度，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认知，真正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原有认知层面进行突破，通过各种审美体验完成价值理念的自主建构。而这个宝贵的过程不仅会为学生的精神世界进步提供更多帮助，同时还能够从关注其终身发展的角度入手，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重要性[1]。

二、高中美术课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策略

（一）在单元教学中传承文化基因

为了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更好地渗透到高中美术教学中，并对学生的一言一行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教师要结合实际教学需要一种高质量联动性沉浸式学习体系，在彰显高中美术课程优势的同时，实现各种文化基因的创造与传承[2]。不仅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对各种美术作品所孕育的文化价值进行讲解、剖析，将看似单一、纯粹的美术内容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论紧密融合，还要对传统工艺造型法进行关注，站在艺术文化的角度对不同主题美术作品背后所孕育的丰富社会价值进行展示，带领学生完成一种全新的认知转变。此外，教师还要根据高中美术教学需要发挥大单元教学优势，在各种主题式单元设计中对各种教学内容进行完善、融合，确保传统艺术元素能够与当代价值理念有机融合，引导学生从审美层面逐步过渡到文化理解，真正地站在创作实践的角度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悟和实践[3]。

例如在高中美术教材中“色彩”相关单元教学中，教师就要设计一个名为“多维色彩探秘”的教学主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过程中，将生活色彩模块与城市色谱调查有机结合，鼓励学生在调查、走访中采集身边各种社区的色彩，从分析“中国红”与“蓝色安全心理”的角度做好“文明、和谐”理念的融合；在艺术色彩学习模块中则要引入 VR 技术，带领学生通过鉴赏《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工艺，结合王希孟的创作经历完成对“敬业”精神的渗透，让学生们能够在数字重绘中更好地思考“什么是文化自信”；而在文化色彩模块的学习中，教师则是以敦煌朱红、天安门金色作为突破口，带领学生探索各种色彩背后的文化含义，以此实现学生的色彩价值理念迁移，尝试将朱红色融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校园霸凌勇敢说‘不’”的法治主题海报设计中，从源头上激发学生由各种色彩知识向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认知的转化。

（二）巧用跨学科项目教学模式

高中美术课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应该从打造主题统整与学科融合的模式入手，充分发挥学生的实践创新意识优势，从发挥跨学科项目设计实践性的角度，选取各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社会话题，在传统与现代、公共空间与美育等角度实现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的跨学科理念认知。为了能够真正地将其与美术教学中的各种色彩语言进行关联，让更多的高中生都可以在视觉刺激下成为人文精神的传承者，美术教师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将其分解为视觉符号、历史叙事以及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在梳理不同学科重大事件以及热点社会话题的同时，完成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价值传承。让看似抽象的美术课堂展示成为有趣的跨学科项目学习引导，通过互动、协作、探究的体验活动，完成历史时间轴理念向视觉表达的过程迁移[4]。此外，教师还可以从实践的角度入手，在公共艺术创作中注入新的价值基因，将美育教学作为连接各个学科知识与核心社会价值理念的重要桥梁。

例如在进行“客观看事物”的美术学习中，教师就要设计一个多棱镜似的历史真相跨学科体验项目。通过为学生们展示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与现代新闻摄影作品《这里是河南开封》进行细化对比，鼓励学生站在社会学、艺术史以及社会主旋律的角度，对“观察立场如何影响事实呈现”这一议题进行跨学科讨论，根据历史课上教师所讲述的“宋代城市布局特点”进行回忆，站在思政认知的角度去思考“古典与现代、主体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鼓

励学生在小组讨论的支持下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融入其中，坚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迁。此外，各小组还可以通过抽取教师所提供的“美育认知问答”题目的方式模拟学术沙龙互动，抽到“美术专家”角色的学生要从美术技法应用的角度对《清明上河图》和《这里是河南开封》进行散点透视，结合社会热点话题对不同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进行分析；抽到“社会学专家”角色的学生则要从全面客观的认知中，穿越时空，对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展开对比，真正地从对这些项目的认识与表达中实现更好的认知体验。

（三）在技术赋能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高中美术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教学路径，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平台、互动软件等工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美术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中。要结合高中学生的认知实际，通过展示各类红色虚拟美术馆、在线艺术展览等数字化场景，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直观感受不同历史时期艺术作品的平台，在感受爱国情怀和社会理想等精神内涵的同时，以沉浸式的体验感受革命年代艺术家的使命与担当，在源头上提高学生对爱国、敬业等价值理念的认同。不仅如此，高中美术教师还要适当引导学生借助各种数字绘画工具开展各类主题作品创作，从构思、构图以及设色的角度，将自己对自由、平等、公正的思考进行展示，在技术赋能的创作理念指导下，广大高中生可以跨越时空，设计各种主题鲜明的公益海报、太空沙雕塑，在解决美术技术难题、协调创作分歧的过程中养成“诚信、友善”的高尚品格，以一种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体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能够符合新时期美术学科特点，又能够无限贴近当代青少年的认知诉求，在有的放矢的教学引导中，让技术成为传递真、善、美最为重要的艺术媒介[5]。

例如，在“绘画的诞生”相关单元的教学中，美术教师就要充分发挥 VR 技术优势，对《江山如此多娇》等红色爱国主义艺术巨作的创作场景进行还原，学生们则需要在相关智能设备的帮助下穿越时空，亲眼见证傅抱石、关山月等画家挥毫泼墨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水墨与油彩交融的绘画技巧，还可以在“中国红”的虚拟展厅中，通过对比欣赏的方式对不同时期的爱国题材美术作品进行鉴赏，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的美术学习，并不是一件枯燥、抽象的事情，其中包含了不同历史阶段广大艺术工作者用画笔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以及“爱岗、敬业”理念的弥足珍贵。随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数字绘画板完成“我眼中的新时代”主题美术作品创作，将高铁穿越山河、乡村振兴大跨步发展等元素进行融合展示，让更多的学生都能够深刻体会到诚信沟通与友善合作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美术学习，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同时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观的塑造。

三、总结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高中美术课程，是回应时代发展、深化课程育人功能的必然要求。教师应通过主题单元重构、跨学科项目学习与技术赋能创新等策略，打破学科壁垒，连接艺术感知与社会情感，使美育成为价值观培育的生动载体。

展望未来，高中美术教育应持续推动“艺术—价值—生活”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教师需不断提升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能力，在教学中自然渗透价值引领；另一方面，教育体系也应加强对美术课程育人功能的制度支持与资源保障，鼓励更多教师投身于教学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美术课程润物无声的育人优势，培养出具有崇高审美情趣、坚定文化自信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6]。

参考文献

[1] 张晓 . 粤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中学美术课程路径研究 [J]. 第一讲堂 , 2024(04): 189-191.

[2] 颜燕军 . 如何在美术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J]. 中学教学参考 , 2022(21): 1-4.

[3] 胡昕童 . 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美术传统文化大单元教学实践 [J]. 教师天地 . 2024(01): 5-6.

[4] 卫艳 . 大美课堂：中央美术学院“高参小”中华美育系列课程实践 [J]. 美术研究 , 2021(05): 8-11.

[5] 李雪 , 张明 . 技术赋能视域下高中美术课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路径探究 [J]. 中国美术教育 , 2023, 45(06): 56-60.

[6] 陈杰 . 基于多模态理论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策略探究 [J]. 教师 , 2024(25): 78-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中美术课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策略研究”（BC24105）。

（作者单位：马龙区第二中学）

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育人研究

王冠华 柴连明* 武 洋 李多福 郭 敏

摘要：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为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提供了系统化实施框架。该框架以目标导向逻辑确立价值塑造成果，以反向设计逻辑重构教学内容与活动，以融合渗透逻辑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统一，以闭环改进逻辑保障育人质量持续提升。基于此，提出精准设定多维育人目标、系统重构价值融合的课程内容、创新协同育人导向的教学方法、完善过程性与反馈性兼具的评价机制，助力高校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高尚医德的医学人才。

关键词：OBE 理念；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育人逻辑；育人路径

基础医学课程作为医学教育体系的核心构成，承担着培养医学生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的双重使命。课程思政将价值引领融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过程，成为基础医学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理念强调以学生最终获得的学习成果为核心，重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体系，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薛兴欣等（2023）指出，OBE 理念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清晰的逻辑起点，其“以终为始”的设计思路有助于将价值塑造目标具体化、可测化[1]。易伟阳等（2025）进一步强调，在医学教育中，OBE 与课程思政的融合能够有效破解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问题，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2]。基础医学作为医学人才培养的根基性阶段，亟须依托 OBE 理念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一、OBE 理念的内涵

OBE 即成果导向教育，是源于工程教育领域、现已广泛应用于多学科的教育理念，核心是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重构教育体系[3]。其内涵可概括为三大核心维度：一是目标导向性，聚焦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养，明确学习成果的可衡量、可达成标准，摒弃传统以课程内容为中心的教学逻辑；二是反向设计原则，围绕预期成果反向推导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确保教学活动与目标高度契合；三是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动态监测学生成果达成情况，结合行业需求与教育发展趋势优化教学流程。OBE 理念强调学生主体地位，注重知识的实际应用与能力迁移，要求教育过程兼顾个体差异与社会需求，最终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精准培养，为行业输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其核心要义体现了“以终为始、以果为据、持续优化”的教育逻辑。

二、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育人逻辑

（一）目标导向逻辑

目标导向逻辑以基础医学课程思政的预期育人成果为核心，明确思政育人具体方向。其核心是界定涵盖医学生职业价值观、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等与学科内容紧密关联的核心成果。该逻辑强调育人目标的可衡量性与可达成性，需将抽象思政目标转化为具体能力指标与行为表现，确保可通过教学实现并经评价检验。同时，需兼顾基础医学专业培养目标，使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互补衔接，保障学生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同步发展。

（二）反向设计逻辑

反向设计逻辑遵循 OBE 理念“以成果定目标，以目标定过程”的核心思路，从预期思政育人成果出发，反向推导教学内容、方法与资源配置。要求先明确学生须具备的思政素养，再梳理各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确定教学重点。注重教学环节与育人目标的精准匹配，确保每项教学活动对应特定思政目标。同时，需考虑课程先后顺序与知识关联，构建跨课程思政育人链条，实现不同课程思政目标的衔接递进，避免重复或遗漏[4]。

（三）融合渗透逻辑

融合渗透逻辑核心是实现思政元素与基础医学专业知识、技能的有机融合，破解“两张皮”问题。其要求深入挖掘医学史中的科学家精神、科学思维、人文关怀等课程思政资源，转化为教育内容并与专业教

学相结合。强调思政教育的隐性化，反对生硬附加，通过深度解读专业知识，让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接受思政教育。同时，需注重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的逻辑关联，确保融合自然流畅，既不影响专业知识传授，又能充分发挥思政育人效能。

（四）闭环改进逻辑

闭环改进逻辑以提升育人质量为目标，构建“目标设定—教学实施—评价反馈—改进优化”的闭环体系。要求教学过程中定期收集学生学习反馈、思政素养表现等信息，通过科学评价分析目标达成情况，识别教学问题与不足。强调评价结果的实际应用，需依据反馈调整教学目标、优化内容、改进方法，使育人过程适应学生发展与社会人才需求。注重育人体系的动态性，需要关注医学领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变化，及时更新思政目标与内容，保障育人体系的科学性与时效性。

三、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育人路径

（一）精准设定育人目标，强化产出指向要求

1. 明确能力结果指标

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能力结果指标，需紧扣医学人才培养核心诉求，聚焦知识应用、职业素养与价值引领的融合共生。指标体系应突出三大核心维度：一是医学专业能力，要求学生扎实掌握基础医学核心知识与实验技能，具备逻辑分析病理机制、解读医学数据的专业素养；二是职业实践能力，强调医学伦理践行能力、医患沟通技巧与团队协作意识，培育严谨求实的临床思维与责任担当意识；三是价值引领能力，涵盖家国情怀、人文关怀与生命敬畏意识，塑造医德高尚、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指标设定需遵循可衡量、可达成原则，摒弃模糊表述，通过层级化、具体化的能力标准，确保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目标同向同行，为后续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评价反馈提供明确的产出导向依据。

2. 建立多维目标体系

多维目标体系的建立需要整合基础医学的专业培养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形成横向覆盖各课程、纵向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目标网络。在横向维度，教育者需根据基础医学各课程的知识结构与教学重点，确定每门课程的思政子目标，使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在课程层面实现融合，如解剖学课程的思政子目标可设定为“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生理学课程的思政子目标可设定为“引导学生树立整体观念与辩证思维”。在纵向维度，教育者需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与成长阶段，将思政育人目标分为基础阶段、提升阶段与巩固阶段，基础阶段侧重医学伦理与职业规范的启蒙教育，提升阶段侧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培养，巩固阶段侧重社会责任感与职业精神的强化[5]。

（二）系统融入课程内容，构建价值引领体系

1. 优化知识结构布局

教育者需根据思政育人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重新梳理基础医学课程的知识结构，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知识体系之中，形成“专业知识 + 思政元素”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在知识结构布局过程中，教育者需优先选择与思政元素关联紧密的专业知识模块，作为思政教育的重点载体，如在医学史模块中融入科学家的爱国事迹与奉献精神，在疾病机制模块中融入科学思维与创新意识的培养。同时，教育者需调整知识内容的呈现顺序，使思政元素的融入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例如，在讲解病理学中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时，可先介绍相关的医学伦理原则，再展开专业知识的讲解，确保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前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2. 强化内容价值关联

强化基础医学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的价值关联，需以 OBE 理念为牵引，实现专业知识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核心在于挖掘课程知识背后的思政内核，建立“知识载体—价值内核—育人目标”的逻辑关联，避免思政元素的表面化植入。通过梳理基础医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提炼其中蕴含的科学精神、伦理规范、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等价值要素，将其与医学理论、实验原理、临床应用等内容有机融合。同时，立足行业发展需求与医学人才培养标准，突出价值关联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确保每一项专业知识的传授都承载相应的思政育人功能。这种关联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逻辑重构使价值引领自然融入知识学习过程，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熏陶，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协同提升。

（三）创新教学实施方式，促进课堂育人协同

1. 丰富教学方法组合

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教学，需构建多元化教学方法组合体系，打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协同落地。核心在于依据育人目标与课程内容特点，整合多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形成“理论讲授—探究式学习—实践体验”的闭环教学逻辑。通过系统设计教学环节，将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情境模拟等方法有机融合，既强化基础医学知识的深入理解，又为思政元素的自然融入搭建载体。教学方法选择需紧扣能力产出要求，注重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与自主探究能力，推动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感悟医学职业精神、科学伦理与人文价值。同时，兼顾教学方法的可操作性与适配性，确保不同教学环节相互支撑、协同发力，为课堂育人提供多元路径与高效保障。

2. 强化课堂互动引导

强化课堂互动引导是实现基础医学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关键环节，需以 OBE 理念为核心，营造“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氛围。通过设计具有

思辨性、价值性的互动议题，引导学生围绕医学伦理困境、职业责任担当、行业发展使命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研讨。互动过程中，教师需发挥引导者与赋能者作用，通过精准提问、逻辑梳理、价值点拨，推动学生突破思维局限，形成正确的职业认知与价值判断。同时，注重互动形式的多样化与包容性，搭建平等对话、自由表达的交流平台，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知识分享见解、碰撞思想，使思政元素内化为学生的职业信念与行为准则，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同步提升。

（四）完善教学评价机制，推动育人成效提升

1. 构建过程评价体系

基于 OBE 理念的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过程评价体系，需以价值塑造为核心导向，聚焦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成效。评价维度应涵盖课堂参与、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及价值认知四大模块，打破单一考核局限。课堂参与侧重学生对思政元素的呼应与践行表现，理论学习兼顾医学专业知识掌握与思政内涵理解，实践操作关注医德素养在实操中的体现，价值认知聚焦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核心素养的培育进度。评价方式采用多元化组合模式，整合课堂互动评估、阶段性测试、思政认知问卷、实践表现记录等手段，实现定量与定性评价的有机结合，确保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为精准把握育人效果、优化教学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推动课程思政从“形式融入”向“实质见效”转变。

2. 强化结果反馈闭环

结果反馈闭环的构建需以 OBE 理念为引领，突出反馈的针对性、及时性与有效性，形成“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良性循环。建立多主体反馈机制，整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及行业专家点评等多元视角，全面收集课程思政育人成效相关数据。反馈内容需聚焦核心维度，既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达成情况，也涵盖思政素养的培育效果，明确学生在价值认知、职业道德、人文素养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依托信息化平台搭建高效反馈渠道，确保评价结果快速精准传递至师生双方，同时制定个性化改进方案，针对反馈问题优化教学内容设计、调整思政融入方式、完善教学实施策略。建立反馈效果跟踪机制，通过后续教学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检验改进措施的落实成效，持续优化评价体系与教学实践，确保育人目标全面达成。

四、结语

OBE 理念为基础医学课程思政提供了系统化育人框架，通过目标导向、反向设计、融合渗透与闭环改进四大逻辑，有效破解了专业教育与价值引领“两张皮”问题。本文提出的多维目标设定、价值融合内容重构、协同教学方法创新及过程性反馈评价机制，构建了“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位一体的育人路径，为基础医学课程思政落地提供了实践指引。未来，需持续紧扣医学人才培养需求，深化 OBE 理念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动态优化育人体系，推动专业能力与医德素养协同培育。

参考文献

[1] 薛兴欣，倪婧．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的路径探索——以眼视光医学专业为例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21(06): 75−80.

[2] 易伟阳，刘惠君，刘持．OBE 视域下“生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的构建与实践 [J]. 教育教学论坛，2025(09): 60−63.

[3] 王群，周海燕，杨学攀．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在基础医学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研究 [J]. 大学，2024(33): 143−146.

[4] 杨落落，张帆，金国花，等．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内窥镜技术课程为例 [J]. 吉林医学，2025, 46(02): 505−507.

[5] 刘雪梅，彭丹，桂晓玲，等．“三全育人”理念下医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J]. 浙江医学教育，2024, 23(04): 204−2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校级教学质量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甘肃医学院一流本科线下课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GYJG2022X0005）；2022 年甘肃医学院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基于新医科背景下《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GYJG2022P0005）；2023 年度校级教学质量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甘肃医学院一流本科线下课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检验技术）”（GYJG2023X0002）。

（作者：王冠华，甘肃医学院助教；通信作者柴连明，甘肃医学院讲师；武洋，甘肃医学院副教授；李多福，甘肃医学院讲师；郭敏，甘肃医学院副教授）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
——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例

金鹏远

摘要：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本文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例，阐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并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教师思政素养有待提升、评价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提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优化路径，包括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创设真实教学情境以营造课程教学氛围、完善评价体系并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等，以期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课程思政；中国通史；思政元素；立德树人

“课程思政”理念是在建设新时代高质量思政课程的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育人方略，它既是加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迫切需要，也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更是高校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融为一体，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

“中国通史”作为法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梳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与价值观。通过深入挖掘其中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如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以及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能够有效推动思政元素与史学知识的深度融合。

这一融合对于落实“三全育人”工作机制、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发挥史学育人功能、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立德树人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任务，要根据专业课程的特点来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并以专业课程为载体，潜移默化地融入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的教育，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

（一）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

高校课程思政是在高校教学过程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价值观念，贯彻“立德树人”核心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知识体系，旨在全面提升专业课程的育人实效。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运行模式上，高校课程思政明确要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将其贯穿于高校开设的全部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其次，在实践路径上，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各类课程教育教学是核心环节与重中之重。这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体系内蕴的思想价值、精神内涵与文化逻辑，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润物无声。再次，在教育理念上，课程思政深刻体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根本目标在于落实“立德树人”。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学内容需自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积极向上的文化思想、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求以及鲜明的政治导向，从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高校课程思政发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融合是应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必要举措。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能够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发挥隐性教育作用。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例，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相关事件中，其潜在的思政元素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高校思政课程具有“显性”的特点，将显性教育与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相结合，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是“中国通史”和其他专业课程的共同目标。

课程思政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创新。例如，“中国通史”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不仅能够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也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发挥着隐性的教育作用。课程思政是通过“非思政课”任课教师以“非思政课”的隐性教育形式，以全新的探索、思路和理念开展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最终共同担负起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2]。简言之，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发挥课程的隐性教育作用是高校面临的重大课题。只有发挥好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作用，才能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情怀，从而推动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三）“中国通史”课程的独特育人优势

“中国通史”课程作为一门系统阐述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的基础学科，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育人优势。其一，课程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通过梳理历代治乱兴衰的内在逻辑，特别是重点讲述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饱经磨难、奋起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能够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引导学生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认同。其二，课程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课程的血脉与灵魂。这使其成为涵养学生家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最为生动和厚重的教材。

其三，课程提供了深刻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有助于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已从理念倡导全面转向深度实践，但在落地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若干现实难题。部分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内涵理解不够系统，思想政治素养与育人意识有待强化，在教学中难以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不少课程仍存在“两张皮”现象，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较为生硬，缺乏内在逻辑关联与学理支撑，育人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教学内容与方式创新不足，多以单向灌输为主，贴近时代、贴近学生的案例资源、教学模式较为匮乏，难以有效引发学生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因此，立足新时代育人要求，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已成为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核心议题与关键突破口。

三、加强高校思政课程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素养

作为高校教师，首先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要开展常态化的培训，并通过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来帮助教师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思政老师要想胜任课程思政工作，首先要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专业课程，真正实现教书育人[3]。这就要求老师深入理解思政元素的内涵和内在逻辑，在提升自身思想政治素养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专业课程的知识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高校教师还要运用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并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规范和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高校教师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结合专业课程的特点和教学活动的开展情况，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在开展专业课程教学活动的同时，不仅要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还要对学生的情感、思想、态度、价值观进行全面考察，以便于在教学活动中做到因材施教。最后，高校教师要具备课程思政的教学与管理能力，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的习惯。

（二）创设真实教学情境，营造浓厚课堂学习氛围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教师可以创设真实、生动的教学情境，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特点相结合，营造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在教学情境中深度学习，使其主动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从而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4]。例如，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时，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教师要通过创设真实而生动的教学情境，开展小组讨论，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营造富有意义的教学氛围。此外，教师在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可以通过图片、多媒体等教育教学元素，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展现在学生眼前。教师可以通过真实录像和音频，使学生身临其境。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对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信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情境教学的设立，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还能让思政元素

渗透到专业课程中，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

（三）完善评价体系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不仅承载着传授专业知识的重任，更肩负着塑造学生健全人格、培育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担当意识的未来栋梁的使命。因此，高校将课程思政素养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与升华。这一举措要求高校在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从课程设计到教学实施，再到效果评估，都要深入贯彻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和规定。这意味着，各学院需在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的选用、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应。通过这样的安排，课程思政不再仅仅是几门独立课程的责任，而是成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渗透到每一门学科、每一堂课中，成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整体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5]。

在教育革新的浪潮中，完善评价体系是推动课程思政深入实施的关键。传统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主要标尺，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品德塑造与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而新的评价体系则强调“德才兼备”，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意味着评价体系的转变：从单纯考核知识记忆，转向全面关注学生思想境界、道德认知、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培育与发展。为实现这一转变，高校需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调研等方法。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促使他们在实践中深刻理解思政理论，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通过这些活动，思政元素得以自然渗透于教学之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6]。此外，评价体系还必须具备精准性和全面性，能够多维度、全方位地衡量学生在思政融合课堂中的成长。这包括但不限于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表现、团队协作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评价。只有当评价体系能够准确反映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与成就时，才能真正激活教育的深层价值，培养出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拥有高尚品德、宽广胸怀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将课程思政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顺应时代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必然选择[7]。通过持续探索与实践，不断优化评价体系，深化课程思政内涵建设，有望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心怀天下的时代栋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8]。

综上所述，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走向深入，关键在于回归育人本质，聚焦“融合”难题，通过强化教师主导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评价机制等综合举措，切实将价值引领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0.

[2] 徐兴华 , 胡大平 . 推进课程思政需要把握的几个重要问题 [J]. 中国大学教育 , 2021(05): 60−64.

[3] 来守军 , 关晓琳 , 费翔 , 等 . 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以《仪器分析课程为例》[J]. 化学工程与装备 , 2019(01): 310−311.

[4] 郝德永 . “课程思政”的问题指向、逻辑机理及建设机制 [J]. 高等教育研究 , 2021, 42(07): 85−91.

[5] 李爽 .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137−144.

[6] 金奇杰 . 高校课程思政数字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索 [J]. 公关世界 , 2023(21): 74−77.

[7] 高帅 .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论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1(11): 30−32.

[8] 王建颖 , 张红 . 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3): 144−152.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双带头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以“水利工程测量”课程为例

刘　岩 江红丽

摘要：本文基于“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视角，探讨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首先阐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分析当前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并以“水利工程测量”课程为例，介绍在“双带头人”引领下，课程思政的整体设计、资源挖掘、方法创新与“三教改革”的具体实践案例。旨在构建培养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专业课程体系，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为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党建引领

一、引言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1]。在水利类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对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双带头人”是指让教师党支部书记成为党建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着力打造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的教师骨干队伍，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师资引领。因此，从“双带头人”培育工程视角出发，探讨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

（一）目标一致性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科研能力，又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师德师风的教师队伍，以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二者都聚焦于人才培养，旨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3]。

（二）师资协同性

“双带头人”作为教师党支部书记和学术带头人，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既熟悉专业教学规律，又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党建工作经验，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自然地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同时，他们可以组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讨和交流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合作，提高整个教师团队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三）内容互补性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注重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组织保障。通过开展党建活动、主题教育等，能够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在课程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要求。课程思政则为“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载体，将党建工作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效果，使党建工作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二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建了“党建引领 + 专业育人”的融合机制，有效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教学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育人合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整体优化与创新发展。

三、“双带头人”视角下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策略

（一）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开展“双带头人”培训，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学术研讨、实地考察等活动，提高“双带头人”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课程思政教学水平，使“双带头人”成为课程思政教学的行家里手[4]。以“双带头人”为核心，组建课程思政教学示范团队，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整个教师团队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同时，建立健全教师思政能力发展长效机制，通过结

对指导、集体备课、教学竞赛等方式，营造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课程思政建设氛围，夯实育人根基。

（二）整合教学内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在“双带头人”的主持下，深入分析专业课程特点，对水利类各专业课程进行全面梳理，结合水利行业特质，如工程伦理、生态意识、国家水安全等课程具体内容，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思政元素映射图，增强思政融入的科学性与说服力。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细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教学任务，并将其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5]。“双带头人”组织教师编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源，建设课程思政教学网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互动交流。

（三）创新教学方法，增强课程思政吸引力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教师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充分利用虚拟仿真、在线课程、移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形式。“双带头人”可牵头开展“思政情境模拟”等互动教学实践，在专业场景中引导学生辨析是非、坚定信念，实现思政教育从“外在输入”到“内在生成”的转变。

（四）强化实践教学，促进学生知行合一

合理安排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与测绘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创新创业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接触行业前沿技术，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在“双带头人”的带领下，设计融入思政内涵的实践教学方案。例如，在测量实习中强调规范操作、数据求真，培育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在参观重大水利工程时，讲解建设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志向；在服务乡村振兴的测绘项目中，引导学生体察国情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实现专业技能锤炼与思想价值引领的同步推进，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四、“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

（一）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是水利类专业大一学生的核心基础课，开课学生数量多，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课程主要讲述水利工程测量的基本知识和职业技能，应用性、实践性及合作性强，结合岗位职业素质需求，确立了“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向。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工科专业课程特点，“双带头人”牵头组建教学团队，通过梳理知识体系、深挖思政元素，对课程进行了整体设计，重构了课程体系，凝练出“思想引领、情感培育、行为规划、职业精神”四个层面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并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职业道德和行为习惯教育、工匠精神教育、劳动教育”四条课程思政育人主线（见表1）。

表1 “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思政内容及思政目标矩阵

项目名称	典型工作任务	思政教学内容	思想引领	情感培育	行为规划	职业精神
测量基础知识	测量的基本任务与主要内容	激发学习兴趣，确定规矩，树立社会责任感	●	●	○	●
	控制网布设的形式、原则和方案	测绘科普人文知识学习，弘扬测量精神，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养成	○	●	○	●
测量基本技能	水准测量	测量基本职业素养；民族自豪感；科技创新意识	●	○	●	●
	角度与距离测量	测量基本职业素养；树立文化自信	●	○	●	●
小区域控制测量	四等水准测量	爱护仪器、规范操作仪器、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等职业素养	○	●	●	●
	全站仪一级导线测量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依据规范进行测量的素养、精度和质量意识	●	○	●	●
地形图测绘与应用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文化自信、依法测绘、国家版图意识、爱岗敬业	○	●	●	○
	地形图的应用	精益求精、科技强国，助力于全球互联互通	○	○	●	●
水利工程施工测量	施工测量的基本方法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筑牢工程质量的终身责任意识	●	○	●	○
	渠道测量	中国基建的全球领先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四个自信”的政治认同	○	●	○	●
	水工建筑物施工放样	工匠精神、精度和质量意识	●	○	●	●

注：●表示包含该目标，○表示不包含该目标。

（二）结合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教育资源

在“双带头人”的组织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专业特点和课程特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自信”“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新时代测绘精神、测绘职业道德、测绘发展史、测绘工程建设成就等有效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中，系统设计和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改进教学方法，探索课程思政建设新模式

为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与育人效果，“双带头人”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教学模式创新，在现有混合式教学模式基础上深度融入“全过程育人”理念，精心构建“双课堂＋三阶段”教学模式，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双课堂”作为该模式的重要载体，线上课堂依托优质教育平台与丰富的数字资源，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自主学习渠道。学生可以随时观看教学视频、查阅资料、参与线上讨论，提前预习课程内容，带着问题进入课堂；线下课堂则强调师生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知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同时注重情感交流与思想引导，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线上线下课堂相互补充、深度融合，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环境。

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教学模式紧密围绕学生的学习过程，将“全过程育人”理念落到实处。在课前阶段，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学习任务与资源，引导学生自主预习课程内容，完成基础知识点的学习。课中阶段是知识内化与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线下课堂上，教师以学生的预习情况为基础，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讲解与难点剖析，通过组织小组讨论、项目实践、角色扮演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后阶段，学生通过完成课后作业、参与实践项目、开展小组调研等方式，巩固所学知识，提升综合应用能力。教师利用线上平台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改与点评，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指导。同时，鼓励学生进行拓展学习，推荐相关的书籍、文献、在线课程等资源，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未知领域。

（四）推进“三教改革”，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与路径

构建课程思政体系，教师队伍是核心，教学资源是关键，教法改革是保障。“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思政建设以推进“三教改革”为重要抓手，以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高标准教材资源和深入推进教法改革为主要方法路径，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

在教师队伍方面，“双带头人”定期组织学习和专题培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教师的思政意识、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打造一支专业教师、思政教师、企业指导师三方协同育人的创新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同时，建立常态化教研机制，定期开展思政教学能力提升工作坊，强化教师的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

在教材资源方面，在“双带头人”带领“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教学团队开发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省“十四五”规划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时事热点和新建工程项目案例，及时更新思政元素，开发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及思政素材资源库，优化完善现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教法改革方面，根据职业教育特点，探索能够实现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与手段，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

五、结语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为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核心和引领力量。实践证明，通过发挥“双带头人”在顶层设计、资源整合、模式创新和团队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制，不断探索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方法，为培养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文雷，彭聪，黄巍，等．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J]. 中国高等教育，2023(09): 30−33.

[2] 丁宗胜．高职院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双融双促机制探索与实践 [J]. 高教论坛，2021(11): 5−7.

[3] 高炳森，马志健．高校“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引领高质量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J]. 吉林教育，2024(26): 61−63.

[4] 刘戈，凌杰．高校课程思政与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分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6): 82−84.

[5] 李晓雯．基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党建＋课程思政”实践探索——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基层党支部建设为例 [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 23(02): 38−4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实践机制研究”（2024GXDJ−YB095）。

（作者单位：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新媒体时代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水平提升策略

白晓童

摘要：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育作为区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师的教学能力对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影响较大。本文在剖析政策背景与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内蒙古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现状，探讨了新媒体在提升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中的优势，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为开发蒙汉双语数字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与现代教学融合，以及推动内蒙古民办教育师资队伍提质增效、促进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新媒体

一、问题的提出及理论概念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以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内蒙古自治区颁行《关于印发自治区“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进一步强调“民办教育需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民办教师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其教学学术能力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效果。面对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以民办教师为研究主体，研究其教学能力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概念阐释

自 1990 年，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首次提出“教学学术”问题，学界逐渐兴起关于教学学术内涵和教学学术能力的研究[1]。从国际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教学学术能力是高校教师的一种关键能力，核心能力包括对知识的认识能力及教育教学能力等。目前，国内学者有关“教学学术能力”概念内涵的针对性研究并不多见，尚未形成关于此概念的规律性认识。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近年来，相继出现一些关于教学学术能力的专项研究，众多教育学者投身其中，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与实证调研，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教学学术理论框架。黄睿彦等（2024）采取资料分析和演绎推理的方法，建构了由理念、知识建构、成果效能和反思四个一级要素组成的医科类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模型[2]；赵元祯（2025）从教学学术能力的知识生产性、发展性和实践性三方面探讨了教学学术能力的内涵本质，认为教学学术的本质是教师要成为真正的反思性实践者，运用实践性知识来应对特殊情境问题，并通过真实教学情境实现知识的储备与能力的提升[3]；刘喆（2022）将教学学术能力定义为：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学科素养发展，教师能运用恰当方法对教与学问题进行研究，将研究结果作用于教学活动，同时公开分享供同行评价和建构的一种实践性知能结构体[4]。

综括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教学学术是一种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活动，它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应当包括教学观念、学科知识、教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力、交流能力和反思能力等多个方面。立足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地区民办教育的独特语境，本文所界定的“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需凸显两大核心维度：民族文化融入能力体现为将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教学深度耦合并开发区域特色教学资源的实践素养，数字教学转化能力表现为娴熟运用新媒体技术破解民族地区资源短缺瓶颈、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高效共享的应用能力。

二、新媒体在提升内蒙古自治区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中的优势分析

新媒体指利用计算机、互联网、移动设备等现代化通信技术来传递信息、展示内容的媒介形式，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数字化程度高等特点，已成为现代教学手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提升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一）丰富教学资源，拓宽学术视野

新媒体平台汇聚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学术数据库和在线课程、教学案例分享平台等资源，囊括各个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研究成果、教学方法和实践经验，为教师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参考资

料，有助于教师丰富教学资源，拓展学术视野[5]。一方面，基于新媒体平台（如MOOCs、虚拟教研室），教师可实时获取全国范围内的教学案例、学术讲座与前沿研究成果，实现跨区域资源共享。例如，内蒙古某民办高校参与的“草原云教研”项目，通过直播互动技术，使牧区教师能够同步参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名师课堂。另一方面，新媒体支持蒙汉双语资源的系统化开发与传播，有利于整合民族文化数字化资源。例如，利用AR技术复原蒙古族历史场景，将传统那达慕文化转化为数字化教学素材，既保留文化特色，又增强课堂吸引力。

（二）便捷交流互动，促进学术协作

新媒体技术重构了传统学术交流模式，推动教师从“个体研究”向“协同创新”转变。利用新媒体构建学术交流共同体平台，教师可以通过学术博客、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平台与同行进行实时互动，分享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和合作研究。例如，内蒙古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组织“爱智云讲堂”系列线上学术交流会，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

（三）促进教学研究，激发创新思维

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一大变革方向是如何利用技术赋能高效的教学与研究，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打造智慧课堂和智慧教学创造了新的契机，也为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实验和教学案例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有利于促进教学研究，激发创新思维。例如，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新媒体技术，联合哈尔滨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等高校共同发起“青春赋能，科学备考”全国大学生健康主题系列活动，学生按照流程登录后可随时点击观看学习并参与知识竞答，让课堂变得更加“智慧”和“高效”。

三、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师利用新媒体提升教学学术能力水平策略

（一）利用新媒体开展培训与学习

一是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培训。例如，商丘学院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了“五阶段递进式”教师教学培养平台，对标教师成长的不同阶段，依次为以合格教师为目标的新入职教师集中教学培训、以获得授课资格为目标的新任教师助教过程培训、以称职主讲教师为目标的新开课教师强化培训、以优秀教师为目标的成长过程跟踪培养，以及以教学骨干和教学名师为目标的个性化拔尖培养设置教学内容，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学术能力，成为民办高校特色发展项目。

二是促进教师自主提升教学学术能力。例如，教师利用在线课程、教育平台、社交媒体、虚拟社区等途径开展自主学习，以提升自身教学设计、课堂管理、教学内容呈现以及教学反思等技能，并根据自己的个性化培育诉求，达到深度的培训效果。

三是加强跨校合作与交流。内蒙古自治区民办学校在提升教育质量、拓宽教育资源方面展现出积极的姿态，它们通过不断加强与其他高校及各类教育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共享与经验的深度交融，不仅促进了区域教育生态的多元化发展，还为师生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习与成长平台[6]。因此，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为教师们提供互相学习、借鉴的机会，使其能够就教学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分享成功案例，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从而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此外，在推进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民办学校还要注重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如签订校际合作协议、建立教师互访制度、联合开展科研项目等，确保合作的持续性和深度。

（二）建立新媒体学术交流平台

一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例如，建设自治区级“草原虚拟教研室”，按学科组建蒙古族文化课程开发组、新媒体教学技术组等专项团队，支持跨校教师协同备课与课题攻关。

二是建立学术资源库，提高教师获取学术资源的效率。例如，开发“蒙汉双语学术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教师论文、教学案例、多媒体素材等资源，采用区块链技术确权，鼓励教师上传原创内容并获取积分奖励。

三是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拓宽教师的学术视野，激发教师的学术研究兴趣。例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参加首届“北疆之星”历史学本硕校际共建学术研讨会，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共同交流和探讨历史学领域的学术问题。拓展活动边界举办“内蒙古民办教师教学学术创新大赛”，设置数字化教学案例、双语教学成果、民族文化教学创新等多元赛道，通过线上展示、网络投票与专家评审联动评选优秀成果并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广；支持教师组建学术兴趣小组，围绕特定研究方向开展线上协作研究、定期分享进展，涵养学术研究良好生态。

（三）培养教师新媒体应用能力

一是提升教师新媒体素养。在新媒体环境下，教师面临来自不同渠道与性质的信息冲击，提升教师媒介素养与铸魂育人的能力至关重要。面对新媒体技术对教育的冲击，教师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提升学生的认知价值、拓展研究思维、加强体验实践，同时提升自我对新技术的认识和理解，增强自己运用新媒体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能力，把握媒介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7]。针对内蒙古民办教师需重点强化两大核心素养：民族文化数字化转化素养，体现为通过专项培训掌握新媒体技术，将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适配教学场景的优质资源；信息筛选与整合素养，聚焦于助力教师从海量信息中精准甄别契合民族地区教学需

求的核心资源。

二是提升教师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教师的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是指教师适当利用新媒体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这要求教师能够掌握各类新媒体设备、软件、平台的操作方法，将新媒体中的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数字化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开发利用、教学评价等。一方面，学校可将新媒体应用能力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如设立专门的“数字教学创新奖”，以此作为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型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可以打造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竞赛，以赛促教，不断深化新媒体、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学术能力。可搭建“新媒体教学导师制”，遴选校内新媒体应用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导师，以一对一精准指导助力青年教师推进数字化教学改革，使其快速夯实新媒体教学实操技能。

（四）加强新媒体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

一是硬件设施升级。完成校园网络升级改造，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保障数据传输的高速稳定。建设智能教室，配备智能教学终端、交互式电子白板、智能录播设备等，为开展新媒体教学提供硬件支持。建议政府牵头加大对内蒙古偏远地区民办院校的资金投入，优先支持其硬件设施升级，结合民族教学需求为部分教室配置蒙汉双语教学终端、民族文化数字化展示设备等特色硬件。

二是搭建软件平台。引入和开发适合本校教学需求的新媒体教育软件平台和教学管理平台，并开发涵盖各学科的新媒体教学资源库，积极整合外部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定期对资源库进行更新和维护，确保资源的时效性和适用性。重点开发集成双语课程管理、学情分析、教学评价等功能的蒙汉双语教学管理系统，联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共建收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献、民俗影像等资源的蒙古族文化数字化资源库，为教师提供专属教学素材，通过对优质原创资源给予资金奖励鼓励教师参与建设，激发资源建设内生动力。

三是建立专业的新媒体技术支持团队，为教师提供及时、高效的技术支持，确保教师在使用新媒体设备进行教学时不会因为技术问题而中断教学进程。组建涵盖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教学设计师、民族文化专家的复合型团队，构建“技术咨询—操作指导—资源开发—问题排查”全流程服务体系，通过线上咨询平台、线下服务窗口、定期上门巡检等多元渠道响应教师技术需求，建立技术问题反馈机制，实时收集使用过程中的实操难题，持续迭代优化软件平台与硬件设备适配效能。

四是设立新媒体教育教学专项基金，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平台开发、教师培训等工作的资金需求。同时，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建议政府将民办院校新媒体建设纳入教育专项经费支持范畴，对建设成效突出的院校予以奖励，同时鼓励民办院校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引入社会资金参与新媒体平台搭建及资源开发；将专项基金使用情况纳入学校财务公开体系，接受教师与社会监督以保障专款专用，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制并依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资金分配，提升资金配置与使用效能。

四、结语

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提升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采取有效的提升策略，能够帮助民办教师突破现实困境，提高教学研究能力、教学创新能力和学术交流意识。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民办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的研究与实践，不断完善提升策略，为内蒙古自治区民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参考文献

[1] 朱炎军 . 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 [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 2021, 10(03): 16−20.

[2] 黄睿彦 , 王小全 , 喻荣彬 , 等 . 新医科背景下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模型建构与内涵分析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05): 537−542.

[3] 赵元祯 . 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内涵本质、现实异化与消解路径 [J]. 高教探索 , 2025(S1): 140−143.

[4] 刘喆 . 什么是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内涵与发展路径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40(10): 54−64.

[5] 周萍 , 陈红 . 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建构 [J]. 高校教育管理 , 2015, 9(06): 94−98.

[6] 杨茂庆 , 孙杰远 . 聚焦于教育研究能力的教师教育模式探析 [J]. 教育研究 , 2012(12): 95−99.

[7] 吴小蕊 . 民办院校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现状与策略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12): 49−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4 年度规划课题“内蒙古自治区民办院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路径研究”（CANFZG24393）。

（作者单位：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双高”院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学融合的路径研究

辛　欣

摘要：为充分体现高职公共体育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双高计划”内涵建设要求，本研究聚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合实践。文章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对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融合思政元素的内生逻辑加以系统分析，明确体育课程所蕴含的规则意识、拼搏精神、团队协作理念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要求同频共振，是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育人目标的重要载体。结合“双高”院校人才培养痛点与体育教学现状，研究提出公共课程融入思政的路径：通过挖掘理论与实践教学方法中的思政元素、拓展思政内容、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能力、完善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在体育竞技技能传授与体能训练的同时，强化思政引导、文化传承与职业素养培育，为“双高”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学术参考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双高计划”背景；公共体育课程；思想政治教学；课程融合；教学改革

为助力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明确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达到世界水平，能够引领改革进程、支撑发展需求的高职学校与专业群。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核心已从单一专业技能培育，转向“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既要筑牢学生的专业技能根基，更要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与综合素养。2019 年 6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作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体育课程融入思政教育、落实育人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思政课程改革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1]。因此，如何构建适应“双高计划”要求的高职院校公共体育思政教学体系，对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发现，在体育事业发展的征程中，为了培养后继接班人，我们应当紧紧抓住关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可以简称为“思政课”），追赶超越，推陈出新，探索上好思政课，帮助学生学好思政课，从而提高思政教学的效果和实践性，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之义。体育理论课程作为高职院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展课程思政的独特优势，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品德修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高职院校体育理论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双高”院校公共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内生逻辑

高等职业学院的公体课程教学不仅汲取了中国体育精神的精华，更将中国体育精神融合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中，高校体育教师在提升自我竞技的同时，也要更深层次地将中国体育精神融合于日常教学中，通过寓教于乐、实践与理论融合等方式，实现体育课程的思想性、趣味性、主动性和丰富性，解决日常教学枯燥乏味、单一说教的问题，真正实现坚守好体育课堂中的思政教育阵地的目的，让学生在日常的体育锻炼中潜移默化锻炼出健康的体魄、培养坚定的信仰、树立远大的抱负。

在公共体育的教学过程中，需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这种由体育运动孕育而成的意识形态，实则是体育运动所蕴含的、对人的发展具有启迪与影响意义的有价值的思想作风和意识[2]，它已然超越体育运动本身的范畴，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与追求。体育精神涵盖的主要方面有社会适应能力与意识品质、法治观念与规则意识、协作意识与集体主义[3]。体育精神包含着对人一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内核，其体育课程教学的总目的并非体育知识与技能的教授，主要为向学生传达体育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理念。一是，对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革进行调研和讨论，可以通过多角度多维度进行信息获取和整理，从而研究体育教学

方法的现有时间管理模式和方向；二是从思政课的角度出发，分析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构建策略；三是，适当地引入现代化信息教学手段，将其与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制度和方法相融合。

二、“双高计划”背景下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政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课堂教学改革要以“课程思政”为导向，通过优化课程设置、修订教材内容、完善教学方法、强化教学管理等教学方式，将各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及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系统梳理并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切实达成课程育人目标[4]。高校开展体育思政课程的教学任务的主旨，就是要在公体教学中深挖思政理念，重新设计教学计划、明确实施办法和教学方法，在精心设计思政与理论结合的同时，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组织过程、学生评价等各个过程进行完善和规划。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明确融合导向的教学目标：改变高校体育教学目标模糊的现状，突出课程思政要求。将个人与社会目标融合，兼顾学生身心发展、思想成长与社会需求，结合学生兴趣与体育精神，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平竞争、追求超越的体育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弘扬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信念，达成认知与价值目标，助力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

2. 重构思政融入的教学内容：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培养健康体魄的基础上，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学生心理素质、体育道德及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教学内容应丰富多元，体现体育对身心智的全面促进作用，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满足学生高层次需求，契合新时代教育要求。

3. 创新协同育人的教学方法：革新老旧单一的教学模式，摒弃老套的“准备—基本—结束”教学步骤及传统教学流程，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组织与方法，调动学生主动性，通过多样化教学增强课程实用性、趣味性与有效性。

4. 完善全面多元的教学评价：将德育目标纳入体育课程评价核心标准，兼顾知识传授与教育影响，结合实用性与激励性。综合考量学生体育态度、知识、技能等多方面素质进行考评，实现动机态度、过程与效果“三位一体”评价，促进学生反思成长。同时，对教师教学进行全面评价，涵盖教学设计、教法、思政目标达成等，推动教师优化教学。

三、“双高”院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学融合的实践教改形式

高职院校的课堂仍然是教育的基本形式和重要阵地。公共体育课程以思政要素为指引，以理论结合实践教学为内容，是师生创造共同教学体的完美融合，也是提升政治教学亲和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在进行思政教学改革，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5]。高职院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技术技能型、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使其符合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是其教学核心，工学结合是其教学模式，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其显著属性。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与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应当紧紧围绕高职教育的针对性和突出特点，才能事半功倍、行之有效。具体来说，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立足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体育课程也不例外，要紧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体育思政教学；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突出教学内容的职业导向。在具体课堂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从而实现高校思政与工体课程结合的实践性。

1. 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师生互动：在传统教学课堂上，均以教师示范，同时学生模仿为主，互动匮乏。需转变为“主题—探究—表现”的项目型模式，以主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导其理解体育精神与历史。依托建构主义理论，融合体质与健康教育观，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与反思积极性，培育身心健康、志向远大的新时代青年。

2. 强化品质培育，发挥教师引领：体育教学应融入挫折与意志教育，借情境教学设置困难，引导学生团结协作、克服失败。教师需发挥示范作用，以言传身教传递体育精神，在指导锻炼时给予思想启迪，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3. 践行理实结合，促进教学融合：在理论教学阶段注重实操训练过程，体育教师更应该注重学练结合的教学手段，秉承“思政融入”的教学理念，深挖体育课程中的多元化思政内容，培养学生德技并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该在注重自我提升的同时，关注学生思想与技能的培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四、“双高”院校体育教师思政课程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路径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美誉，精准诠释了教师职业的崇高与责任。教师肩负着传递知识、塑造学生人格、引导学生成长的双重使命，既要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更要帮助学生完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教书育人的核心要义在于“先修己而后育人”，“双高”院校体育教师同样如此，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持续深化对政治思想理论的学习与理解，不断提升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唯有如此，才能为学生的成长指引正确方向。

在高校教师队伍中，体育教师是育人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肩负着“以体育人、以文化人”的独特而关键的育人职责。面对“课程思政”这一全新的教育要求与发展形势，体育教师需要以积极昂扬的心态主动适应，从思想根源处调整认知、转变观念，不断强化自身的育人意识与责任担当。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双高院校体育教师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思政育人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体育课堂思政教育能否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结合“双高”院校体育教学现状与教师队伍建设实际，可通过以下路径，有效提升体育教师的思政课程实践教学能力。

第一，开展针对性专题培训。在课程思政改革刚刚起步的阶段，不少专业课程教师，其中也包括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往往不够深入，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专题培训就成为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通过系统的专题培训，能够帮助教师快速打破认知壁垒，全面提升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水平，进而培养起强烈的课程育人意识，逐步提升思政育人的实际能力。第二，搭建多元化经验交流平台。体育教师在“思政育人”方面经验的匮乏，是制约其育人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各高校可以积极搭建经验交流平台，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在思政育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请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心得体会，将他们在一线教学中发现的学情分析、体育课程中的思政融合方法与深挖技巧，以及在长期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中的报告经验，以案例、宣讲等形式，传递给更多的教师同行。同时，对体育课程与思政融合的效果进行深入探讨，组织一线教师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提升水平。第三，组织常态化公开教学示范活动。教学示范课程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检验实践活动，可以让资深教师在短时间内展示多年教学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技术动作，从而帮助观摩的年轻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对于体育教师而言，参与教学示范与观摩，能够相互学习与借鉴，更好地将思政育人与体育竞技相互融合，以体育精神为引线，有机融合思政育人的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总之，提升“双高”院校教师体育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多举措协同推进。通过开展专题培训、进行经验交流以及组织教学观摩等方式，助力体育教师更好地适应“课程思政”背景下的育人工作新要求，为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坚实力量。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 以德立身，坚守教育使命：在时代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体育教师需明确自身责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践行“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四个统一”要求，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理念内化为价值追求，加强思想政治修养，以学识与示范引领学生成长。

2. 以德施教，深耕教学责任田：秉持爱教敬业理念，体育教师应精进教学技能，融合“技、艺、术、道”。立足课堂，将思政融入体育教学，以家国情怀与道德修养感染学生，引导其树立正确价值观。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满足学生身心发展需求，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3. 以德育德，强化教师育德能力：高校需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将德育意识培养纳入培训体系，遵循教育规律提升教师使命感。通过搭建研修平台、完善传帮带机制，系统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增强体育教师人格魅力，完善综合素质，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做到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帮扶者和陪伴者。

五、结论与展望

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也是推动双高院校公共体育教学与思政体系建立的核心内容。以体育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传承与延续的重要精神资本，将体育精神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打造了适配“双高计划”背景的公共体育教学新模式，破解了传统体育教学重技能、轻育人的困境。在“双高”院校公共体育课堂中，学生既能掌握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锤炼健康体魄，又能了解体育文化、传承体育精神，坚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实现“健身、育心、立德”的协同发展。

在未来高职教育中，“双高”院校应将思政课程与公共体育课程深度融合，以思政融入为培养学生的重要切入点，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创新体育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合理深化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推动体育课程思政与体育课程改革交相辉映，深入落实。同时，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保障，完善体育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政教学融合常态化、长效化，建立以德育人、文化育人、体育育人相结合的全面思政教学体系。通过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公共体育课程的育人价值，将体育精神与思政理念、职业素养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德技并修、体魄强健、勇于担当”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朱亚成，张青．“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J].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 24(01): 91−94.

[2] 刘留．人工智能背景下体育教学改革的价值逻辑及实践进路 [J]. 辽宁体育科技，2025, 47(02): 112−116.

[3] 徐力达．高校定向越野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践研究 [J]. 当代体育科技，2025, 15(16):（下转 177 页）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策略探究

王澜钧

摘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环节，亦是高校思政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要求，旨在深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与实效，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为目标。通过系统阐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大思政课”融入其间的必要性，本文深入探究并凝练了“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的具体策略，以期为高校提升心理育人质量、实现育心与育德相统一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大思政课；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策略；三全育人；立德树人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需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在新时代背景下，将思想政治元素、理念与要求深度融入心理健康教学全过程，已成为新时代高校育人的必然趋势。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为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赋予正确的价值导向，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于教学各环节，实现心理素质培育与思想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最终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文将以“大思政课”为引领视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策略进行系统探究。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一）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是保障和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健康成长的关键手段，对其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对大学生展开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得以更深入地探索与理解自身的内心世界，切实掌握压力调适、情绪办法、人际交往等关键心理技能。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更能为其未来适应社会发展、实现职业生涯成功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1]。

（二）增强大学生社会适应和抗压能力

面对社会快速变迁与竞争加剧带来的多重压力，大学生亟须提升社会适应与心理韧性。有效的心理健康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如何解决人际交往问题避免冲突[2]。这些能力的培养，对于大学生顺利完成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在未来复杂社会环境中保持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三）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与和谐氛围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校园整体的稳定与文明和谐。通过对大学生展开积极的心理健康教学，大学生能逐步树立起积极的心态，可以与他人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和温暖的语言进行沟通，这有利于避免冲突和矛盾的发生。同时，心理健康教学的有序开展，还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对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3]。

（上接 176 页）139-142.

[4] 朱晔慧 .OBE 理念下水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J]. 科教文汇 , 2025(13): 104-107.

[5] 徐波波 .“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5(06): 101-10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2025JYB17）。

（作者系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大思政课”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与时代性

“大思政课”理念强调教育的系统融合与资源协同。将其有机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打破心理健康教育的单一课程局限，使心理健康教学更具系统性和全面性。同时，将“大思政课”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活动中，还可以实现对育人力量和育人资源的有效统筹，既进一步深化“三全育人”，又推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理念、理想信念进行有机结合。

（二）促进价值引领与心理成长的深度契合

“大思政课”与心理健康教学在育人目标方面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均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的。因此，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将“大思政课”和心理健康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既可行，又必要。二者实现有机结合，既可以培养学生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还可以强化学生对理想信念、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等的正确认知。这对于大学生成长为具有良好心理品质的高素质人才具有支撑作用。

（三）回应学生复杂多样的成长发展需求

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也是面临多重压力（学业、就业、情感等）的重要时期。因此，在该时期，以“大思政课”为引领，开展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教学活动十分重要，可帮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更好地管理情绪，并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进而进一步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心理需求，为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发展助力[4]。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策略

（一）以融合性育人目标为导向，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大思政课”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的育人目标不能只局限于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还应注重“育德”，即“大思政课”视域下，育人目标应当为“育心＋育德”，以对大学生起到全面的教育效果。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在面向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学活动时，应从“育心＋育德”的目标出发，有效挖掘心理健康教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既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水平，也提升学生思政素质水平[5]。

以“自我认知与价值引领”专题教学为例，教师既要让学生对自己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也要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有机挖掘、渗透“爱国主义”元素，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切实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发展、进步的紧密联系。依托课堂讲授融入“爱国主义”元素。课堂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可适当应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国家重要事件、英雄人物事迹和国家成就，包括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抗争、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等，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以上国家重要事件、英雄人物事迹和国家成就对自己内心产生的影响，以此有效夯实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信心，并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自己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重大成就进行讨论，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为国家作贡献的决心。依托实地参观融入“爱国主义”元素。“亲身参与”是更好提升大学生爱国情感的有效措施。因此，在心理健康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心理素质，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即教师可以以“第二课堂”为抓手，组织学生参观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可以通过观看展览和现场讲解的方式，让学生感受红色精神。同时，为保证红色精神能对学生个性心理发展有良好的引领，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写参观感想，可以有效实现红色精神的内化。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到科研机构和现代企业进行参观，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国家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这可以在大学生心中埋下为国奉献的种子，从而能够在日后的学习中，付出更多的努力。教师在“自我认知”教学活动中有机融入“爱国主义”元素，既可以让学生全面认识自己的能力，也可以让学生对未来发展有明确的规划。教师以“大思政课”为引领，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活动，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也可以对心理健康教学活动主题进行升华。

（二）以课程内容为依托，精准设计思政融合切入点

“大思政课”视域要求教师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活动时，要实现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就要紧紧围绕课程内容，科学、合理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以确保大学生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也可以逐渐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

例如，在“自我认知与价值观塑造”的心理健康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采取有效措施融入马克思主义。首先，教师可以以理论讲解的方式，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以此引导学生要实现自身在智力、体力和道德上的全方位的发展。为让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全方面发展的重要性，教师可以为学生分享杰出科学家案例、体育明星案例和社会公益活动参与者案例等，以真实的案例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引领。例如：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分析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利用自身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做出的卓越成就；可以与学生一同分析体育明星在体育锻炼中所体现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与学生一同分析公益活动参与者在志愿服务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通过分析一个个真实案例，学生的心理会发生变化，从

而立志成为优秀的人才、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这既是对学生心灵的洗礼，也是对学生思想的引领。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即让学生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医生、警察和教师等，以此帮助学生体验不同职业所肩负的使命和价值，这有利于学生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等进行反思，逐渐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又如，在“人际关系与团队协作”专题中，可着力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沟通协作能力与共情能力。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信任背摔、盲人方阵、团队烹饪挑战、密室逃脱等多样化团队建设活动，通过团队活动的方式，帮助学生切实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他人的重要性，并帮助学生进一步拉近与其他同学之间的距离。针对当前大学生存在的同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学生之间关系差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角色扮演”活动，在该活动中，学生需要分别扮演冲突者（双方）、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等角色，教师则要为学生设计相对真实的冲突场景，并让学生站在“角色”的立场，对场景进行模拟，如此，可有助于学生深入地理解冲突的复杂性和危害性，从而能够促使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应对冲突，如何在冲突发生时保护自己。教师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设计冲突场景，并让学生扮演角色，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还能促进学生与同学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以教学方法创新为驱动，探索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大思政课”视域对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教师能在新形势下，能在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探索并总结新的教学方法，既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又推动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高质量融合，以形成“1+1>2”的效果。本文认为，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若想实现有效融合，可以从教学方法出发。

1. 案例分析 + 时事热点

具体来说，心理健康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从时事热点中挑选与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紧密相连的经典案例，包括科技创新成果和社会公益活动等。教师以真实经典案例为抓手对学生展开教育教学活动，可以更轻易地引起学生共鸣，促使学生主动思考，从而在思考中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以及其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此，既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又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2. 任务驱动 + 情境模拟

简单来说，教师要根据思政课程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面向学生设计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任务，帮助学生在任务中以身临其境的方式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进行思考。同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增添情境模拟环节，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体验情绪变化、应对压力，并对如何在不同场景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思考，这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3. 小组合作 + 探究学习

新时期，教师需要转变教育理念，给予学生更多思考和探索的机会。故此，在探究“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关系”的活动中，教师可将学生分成由 3~4 人组成的小组，并要求学生结合时代需求，从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等方面入手，对“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最终形成具有小组特色的研究成果。该小组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感知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学的相互促进关系，同时，也可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四、结语

将“大思政课”理念深度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推动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合与协同育人，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要求，也是提升心理育人工作科学性、系统性、实效性的关键路径。本文从育人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多个维度探讨了相应的教学策略，旨在为构建“育心”与“育德”并重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提供参考。唯有持之以恒地推进理念创新、实践探索与机制完善，方能使“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心理健康教育真正成为启迪智慧、润泽心灵、塑造品格、引领成长的有效载体，为培养大批身心健康、信念坚定、可堪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香姑 . “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探析——以“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为例 [J]. 大学 , 2024(20): 154−157.

[2] 周静 .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研究 [J]. 大学 , 2024(35): 19−22.

[3] 詹清清 . 基于链式教学模式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思政构建路径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07): 57−60.

[4] 宋颖佳 . 课程思政视野下心理健康教育项目化教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J]. 公关世界 , 2024(15): 30−32.

[5] 彭彪 , 王晓玲 .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23(12): 21−23.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助教）

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特色路径研究

周　芸

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下简称“原理”课），是落实“两个结合”、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的关键举措。当前，这一融入过程面临文化符号与理论映射适配性不足、技术赋能未能有效支撑文化与理论融合创作、融合成效难以科学评价等现实挑战。本文提出构建“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双轮驱动的特色路径，具体包括构建“艺术符号—理论概念”映射系统、创设“创作驱动理论内化”的教学模式、健全协同保障与科学评价体系。该路径以“以艺通理”为核心理念，旨在为艺术类高校“原理”课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为培育德艺双馨的新时代艺术人才筑牢思想根基。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号映射；创作内化

一、引言：时代诉求与融入机制探索

新时代“两个结合”重要命题为高校思政课改革指明了方向。艺术类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培养兼具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人才的特殊使命。当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虽已形成共识，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探讨普适性的路径或方法，针对艺术类高校语境下的“融入”机制，特别是如何利用艺术专业的独特优势实现深度内化的系统性研究稍显不足。

本文旨在探索一条高度契合艺术类高校专业特性与学生学习规律的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原理”课的特色路径。核心是构建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双轮驱动的特色融入路径。其中，“符号映射”通过构建具象化的“艺术符号—理论概念”关联网络，为抽象理论赋予鲜活的艺术表达，解决理论“可感知”问题；“创作内化”则以主题性艺术创作项目为驱动，将创作实践转变为理论理解、运用与内化的过程，辅以智能技术与协同保障机制，解决理论“可创作”与“可转化”问题，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艺术专业语境下的深度交融与价值共生。

二、现存挑战：文化深入融入的现实困境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类高校“原理”课的探索虽已起步，但在深化实施环节，尤其是在实现文化精髓与理论内核的有机融合方面，仍然面临以下现实困境。

（一）文化符号与理论映射的适配性不足

现有融入路径在构建“传统文化符号”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映射关系时，多以综合类高校模式为蓝本，对不同艺术专业（如美术、设计、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特有的文化载体缺乏深度挖掘和解构。导致映射关联流于表面，阻碍了文化元素向理论认知的顺畅转化。

（二）技术赋能未能有效支撑文化与理论的融合创作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目前多集中在传统文化场景的呈现或教学资源的数字化展示等前端环节，尚未深度嵌入文化与理论融合创作的核心环节：构思阶段缺乏文化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联提示；创作阶段缺少文化符号内涵阐释或相关理论验证的辅助工具；作品打磨阶段难获针对作品中文化元素运用是否恰当、理论表达是否准确等核心问题的动态分析反馈。

（三）文化与理论融合的科学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对学生在创作项目中展现的“传统文化转化融合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度”进行科学的评价，是当前面临的难题。两者的关联性难以量化，评价多依赖主观经验，这直接影响对文化融入与理论内化真实效果的评估，不利于教学策略的针对性优化。

三、构建“艺术符号—理论概念”映射系统：实现理论“可感知”

深度融入的基础是实现抽象理论的“可感知”。针对艺术生善于把情感、哲思等抽象之物转化为可见、可听、可触的艺术具象形式的思维特点，需构建一套将传统文化精华创造性转化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范畴的符号映射系统。

（一）坚持批判继承，遴选文化精华

“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应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1]摒弃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时代精神相悖的封建糟粕，如艺术曾服务于特定剥削阶级的旧有陋习，重点遴选与传统艺术创作、审美理念、伦理思想相关且富含哲学意蕴的文化精华。例如，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的艺术伦理观，强调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统一；传统工艺中蕴含的“格物致知”的实践精神，体现了通过实践探究事物本质的认知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观点高度契合。这些文化精华是融入“原理”课的宝贵资源，能够让课程内容更贴合艺术生的专业需求，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引导艺术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价值观。

（二）创新构建“符号—理论”映射关系

映射的核心在于揭示文化符号背后的普遍哲理，并建立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范畴的精准关联。比如，以传统园林“借景”手法为符号，通过巧妙布局使不同空间的景物相互关联、形成整体，可用来诠释唯物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原理；以古琴演奏“和而不同”为符号，不同音色的琴弦和谐共鸣能够阐明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关系原理；以书法笔墨为符号，墨色的渐变积累形成笔画形态与艺术效果的质变飞跃，直观展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规律。

（三）开发校本化案例库与应用指南

结合戏剧、书画、民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编写《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传统文化融合教学案例库》，案例库需清晰地标注符号与理论的映射关系[2]。例如，通过解析《清明上河图》中汴河码头商贩交易等场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抽象的商品交换与生产关系概念具象化；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融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可用于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关于文化开放与融合的内涵；年画“门神”的功能从最初的驱邪祈福演变为后来的文化象征，这一演变过程能够阐释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应用指南则指导教师如何在不同章节、针对不同专业灵活运用这些映射案例。

四、创设“创作驱动理论内化”的教学方法：实现理论“可创作”与“可转化”

“符号映射”解决了理论的“可感知”问题，而理论的深度内化则需依托创作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专业实践相结合，通过布置与专业相关的实践作业，引导学生在构思、创作、诠释作品的全过程中，主动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课堂教学：基于映射的探究式学习

利用前期构建的“符号—理论”映射关系，激活学生思维，为后续创作项目提供理论认知基础和创作灵感。

1.“艺术解构—理论阐释”法

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细节解构，搭建从具象观察到抽象理论的认知桥梁。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课堂中可引导学生从物质细节（服饰材质、宴饮器具、演奏乐器等）分析社会存在；从人物关系（人物动作、姿态、神态等）揭示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在这样的分析过程中，学生通过对作品物质细节与人物关系的解构，自然领悟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而非被动接受理论结论。

2.“专题模块 + 艺术佐证”法

该方法以理论主题为纲、艺术素材为目，借助专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艺术的融合。例如，设置“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与传统戏曲冲突设计”专题，教师可先解析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再引导学生分析《窦娥冤》的戏剧冲突：剖析窦娥与张驴儿的斗争性，以及两者被同一腐朽制度裹挟的同一性，论证矛盾是剧情发展的动力。让学生体会戏曲这一传统文化载体如何生动具象地呈现抽象的哲学原理。

（二）技术赋能：构建沉浸式智能创作场域

利用技术工具高效支持创作项目的实施，并强化创作过程中文化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联认知。

1. 技术赋能创作过程

有研究提出“教师可以利用 VR 技术，创建虚拟文化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3]。技术赋能的核心是让学生置身历史文化场景，直观感受不同文明艺术符号的交融，深化对文化开放包容的感性认识，为创作项目提供素材和背景。

2.AI 深度定制辅助系统：“艺理共生”智能系统

针对艺术生的学习痛点，可设置“艺理通”创作助手，其核心功能是在学生创作构思遇阻时，根据其创作主题和关键词，智能推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关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案例、文化符号内涵等。目的是即时创建创作实践与文化元素、理论概念的关联提示，帮助学生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融入文化符号并关联理论。

此外，还可搭建线上“知识图谱”[4]，整合课程知识点、文化符号的映射关系、经典案例等资源，形成可视化网络。知识图谱能为学生提供系统化的学习导航，帮助其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

（三）核心实践：主题性艺术创作项目驱动理论内化

创作项目是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载体和理论内化的关键驱动力。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实现在“做”中学，在“做”中内化理论。

1. 开展主题性艺术创作项目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 在“原理”课实践环节，组织开展主题性艺术创作项目，要求每个项目紧扣一个或一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概念，明确规定学生必须选择并运用特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诠释项目所要求的概念内核。项目形式需紧密结合学生的艺术专业方向。例如，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可围绕“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创作一组展现地域文化个性与共性的海报；舞蹈或戏剧专业的学生可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主题，编排展现普通劳动者实践力量的现代舞剧或话剧；产品设计或文化管理专业的学生可运用“辩证否定观”，设计既保留传统工艺又融入现代审美的非遗文创产品，实现“扬弃”式的创新表达。

2. 设立“非遗传承 + 理论实践”工坊

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课堂演示技艺，直观呈现传统文化的精髓，教师讲解该技艺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生在传承人和教师的指导下，围绕一个明确的主题，运用刚学习的非遗技艺进行创作。例如，用多层剪纸的叠加技法表现“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通过泥塑的捏塑过程体验并诠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

五、健全协同保障机制与科学评价体系

确保“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行稳致远，需健全协同保障机制，为艺术生的学习成长提供支撑。

（一）打造跨学科协同教学团队

建立“思政教师 + 专业艺术教师 +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协同教学机制，通过跨学科培训，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为思政教师开设专题研修班，通过赏析艺术作品、参与艺术创作等方式，提升其艺术鉴赏与用艺术语言阐释理论的能力；鼓励艺术教师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修，增强其用理论指导艺术创作的能力。同时，定期组织跨学科教研沙龙，促进不同领域教师交流，共同设计融合性教学方案。

（二）构建双维动态评价体系

为确保“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的实效，需要构建以“理论内化深度”和“文化理论融合表达”为核心维度的动态评价体系。该评价主要针对第四部分所述的“主题性艺术创作项目”，是“原理”课实践环节和过程性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占课程总评成绩的 30%~50%。

1. 评价标准双重化

理论内化维度，重点评估学生对创作项目所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深度、运用能力及价值认同度；文化理论融合表达维度，重点评估符号—理论映射的准确性、文化元素融合的创新性、艺术表达的效力这三项能力。

2. 评价过程动态化

实施覆盖创作全流程的跟踪评估：构思阶段，评价理论主题选择的清晰度、文化融入设想的合理性及主题与理论的关联度；初稿完成阶段，审视理论表达与艺术形式的适配性；最终展示阶段，综合考量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同时，将学生的创作草图、修改笔记、反思日志等过程性资料纳入评价范围，重视学生思考、探索和内化的过程。

3. 评价主体多元化

组建以思政教师、艺术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为评价主体的联合评审组。思政教师重点评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运用、阐释的准确性及价值观导向；艺术专业教师侧重评估艺术表现性与文化创新性；行业专家在涉及特定技艺或行业应用的项目中，从文化传承、市场需求等角度提出参考性建议，作为综合评价的补充。明确各评价主体的侧重和权重，思政教师意见应占主导权重。

六、结论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关键在于探索并构建一条高度契合其专业特性与学生认知规律的特色路径。本文提出“符号映射”与“创作内化”双轮驱动模型，旨在通过使抽象理论“可感知”“可创作”“可转化”，推动文化精髓与科学原理在艺术专业语境下实现深度交融与价值共生。

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特殊教育场域的实践形态，也为艺术类高校提供一套以“以艺通理”为鲜明特色、能有效提升“原理”课亲和力与实效性的融合方案，从而有力回应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艺双馨新时代艺术人才的战略需求。未来可在深化不同艺术门类的专业映射、构建智能创作生态、开发更精细化的融合成效量化评价工具等方面持续探索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袁佩媛，张曼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意蕴、契合之维及实践进路 [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2(05): 1−8.

[2] 戴春勤，贾文琪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创新的实践探索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 2025, 44(01): 60−66.

[3] 游佳 . 深度融合与创新路径 :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探索 [N]. 江苏经济报 , 2025−04−18(T01).

（下转 183 页）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栏目设置的教学运用研究

许丽媛

摘要：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与法治”作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模块，对高中生理解我国政治制度、增强法治意识至关重要。《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将教材分为正文和辅助文，辅助文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善用教材辅助文可保障课堂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因此，教师深入挖掘教材时，既要重视教材正文部分，也要重视教材辅助文资源。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持续调整和完善，本文将梳理高中思想政治新旧教材辅助文栏目，探讨新教材辅助文栏目在教学中的运用。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辅助文栏目；教学运用

一、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运用辅助文，离不开理论支撑。当前，一线教师未充分利用辅助文，原因在于对辅助文相关的教学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加强对教材辅助文的研究，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对“政治与法治”课堂教学有推动作用。

第二，在理论上推动“政治与法治”课堂教学。通过对新教材《政治与法治》中辅助文的运用研究，总结新教材中辅助文的新形式、新内容和新特点，系统分析教材辅助文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辅助文运用原则及优化策略，能够带动更多教师关注辅助文运用，明确辅助文价值。

（二）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增强教学的灵活性和连贯性。新课程改革对教学提出新要求，需改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拓展教育资源和教育空间，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将辅助文运用于课堂教学全过程，增强教学灵活性。在长期的传统教学中，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和学生的关注点集中于课本主体知识，忽略了辅助文的价值。对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辅助文的运用研究，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提供辅助文运用新方向和新方法，使课程内容结构化和合理化，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第二，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学生而言，曾被忽视的辅助文是一种新的学习资源，具有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特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借助辅助文联系上下文、拓展知识面和积累思想政治资源，并通过教师的引导逐渐掌握运用辅助文的方法。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辅助文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有效性，提升思政学科素养。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栏目设置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

（上接 182 页）

[4] 王亚萍，王尚君 . AI 赋能军校思政课靶向浸润模式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为例 [J]. 高教学刊，2025(20): 105-110.

[5] 张丽丽，张甜，张卓然，等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25(03): 8-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任务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类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交叉融合教学模式研究”（24Z038）。

（作者单位：武汉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更新了教学内容，精选学科内容，强调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推动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促进课程内容情境化，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新课标将教材分为教材正文与教材辅助文，并对教材辅助文的运用提出新要求[1]。新教材的辅助文与旧教材的辅助文相比，更具科学性和思想性，内容更加全面，结构更加完整。使用好教材辅助文是保障课堂教学有效性、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需要。因此，教师深入挖掘教材时，不仅要重视教材正文部分，还要重视教材辅助文资源。

重视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首先要准确把握教材的整体性。教材由正文和辅助文两部分组成，正文是教师教学的主体部分，是学生学习的重难点所在，可以帮助学生搭建知识体系。教材辅助文相对于正文处于次要地位，对正文起协助作用，教材辅助文与正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教材辅助文是教材重要的图文组成部分，内容具有时代性、教育性、多样性等特点，栏目类型多，数量多，在教材中所占篇幅较大，是协助教师正文教学的重要辅助性文本。教材辅助文主要起“辅佐”与“帮助”作用。辅助作为汉语常用词，核心定义为从旁提供支持与协助，所以辅助文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正文、明确知识逻辑。教科书辅助文是正文的从属，是“帮助创造性理解、掌握课文内容的教科书构成要素”，属于正文的“支架体系”。一般认为，教科书辅助文是辅助正文构建学科知识体系、辅助教师组织教学活动，以及辅助学生知识迁移的教学活动系统[2]。

（一）新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理论阐述栏目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是指穿插于正文之间，以小楷字体呈现的具有补充性、探究性、解释性等功能的文本材料[3]。新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主要包括《思想政治（人教版新版）》《思想政治生活（苏教版新版）》等。新版教材在辅助文栏目设置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版教材在每个章节的开头设置了“理论阐述”栏目，对学生整体把握本章内容作用重大。通过系统阐述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章的重点知识，在开始学习之前就对本章的核心概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去理解和消化所学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二）新版高中思想政治教材“时政热点”栏目

新版教材在每个章节的结尾设置了“时政热点”栏目，对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作用重大。通过选取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时政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培养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三）新版思想政治教材“拓展阅读”栏目

“拓展阅读”栏目有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在每个章节中，学生可以通过“拓展阅读”栏目接触到更多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这些经典文献和学术论文包含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本章内容的背景和前沿。通过阅读拓展材料，学生可以了解不同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研究方法。

（四）新版思想政治教材“学习任务”栏目

“学习任务”栏目是新版教材的一项重要创新，在每个章节的最后设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和要求，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指导。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章的内容，提高学习效果。

三、新教材辅助文栏目在教学中的运用

当前学术界对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辅助文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但从教材的结构来看，辅助文作为教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4]。

（一）“理论阐述”栏目的运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理论阐述”栏目，系统阐述本章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通过清晰明了地讲解和解析，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教师可以通过举例、引用相关研究等方式，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时政热点、拓展阅读等内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例如，当教授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时，教师可以通过理论阐述栏目详细介绍供求曲线的形成原理和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供求关系的作用和意义。

“理论阐述”栏目设置有助于学生建立知识框架结构。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通过对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本章所要讲述的内容以及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知识体系。这种框架结构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理论阐述”栏目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内涵和应用。通过对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阐述，学生可以深入地理解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含义和背后的逻辑关系。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内涵和应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记忆和应用上。这种理解和应用能力的提升，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时政热点”栏目的运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时政热点”栏目，选取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时政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辩论等形式的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理论阐述、拓展阅读等内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例如，当教授政治学中的权力分立原则时，教师可以结合当前国内外

的政治事件，引导学生分析权力分立原则在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加深学生对权力分立原则的理解并增强应用能力。

“时政热点”栏目的设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通过对时政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培养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学会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时政热点”栏目还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动态和国家政策。通过选取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时政热点问题，学生可以及时了解到社会的最新发展和国家的政策动向。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就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时政热点”栏目的设置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过去，学生往往只关注于课本知识的学习，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现在有了时政热点栏目，学生可以通过分析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时政热点问题，参与社会讨论，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这种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提升，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动力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拓展阅读”栏目的运用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拓展阅读”栏目，选取与本章内容相关的经典文献、学术论文等进行阅读。拓展阅读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术素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兴趣，推荐适合的阅读材料，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分享。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理论阐述、时政热点等内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例如，当教授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著名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的经典论文《认知失调理论》，让学生深入了解认知失调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应用，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

“拓展阅读”栏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在拓展阅读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和评估所阅读的材料。学生要学会辨别文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理解作者的观点和论证过程，并对阅读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评价。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术素养。

与传统的教科书内容相比，“拓展阅读”栏目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能够满足学生对于知识的进一步探索和求知欲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拓展阅读材料，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新版教材中的“拓展阅读”栏目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改进措施。通过选取与本章内容相关的经典文献、学术论文等进行阅读，学生可以拓宽知识面，提高学术素养，并激发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这一举措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发展机会，有助于培养终身学习和创新能力。

（四）“学习任务”栏目的运用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学习任务”栏目，为学生提供具体的学习任务和要求。通过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动力。教师可以设计多样化的学习任务，如小组项目、个人研究报告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理论阐述、时政热点、拓展阅读等内容，引导学生全面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学习任务”栏目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创设教学情境[5]。在学习任务的设计中，通常会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学生需要将所学的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和应用，培养跨学科的思维能力。同时，学习任务往往也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完成这些学习任务，学生可以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和思维水平。

新版教材中的“学习任务”栏目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改进措施。通过设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和要求，学生可以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学习任务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思维方式。这一举措为学生提供了更具体、实际和有意义的学习指导，有助于培养终身学习和创新能力。

四、结论

通过梳理高中思想政治新旧教材辅助文栏目设置的历史演进，分析新旧教材辅助文栏目设置差异，探讨新教材辅助文栏目在教学中的应用，可以看出新版教材在辅助文栏目设置更加丰富多样，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新教材辅助文栏目，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有效的学习指导，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 年版)[M].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8.

[2] 王瑞华 .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M].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2017.

[3] 王若雁 , 赵明辉 . 初中《道德与法治》辅助文的价值、类型与教学策略 [J]. 教学与管理 , 2023(13): 59−61.

[4] 梁煌君 . 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必修教材辅助文研究述评 [J]. 教育科学论坛 , 2021(16): 75−77.

[5] 毕妍 , 孟庆男 .《生活与哲学》教材辅文的特征、功效及运用 [J]. 教学与管理 , 2016(31): 53−55.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实施路径分析

黄　琳

摘要：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高校劳动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的逻辑起点。研究基于生产力三要素迭代的底层逻辑，系统分析新质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变革对高校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方式的重塑作用，构建包含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实施框架，并从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教育目标精准定位、虚实融合的劳动教育内容重构、多元协同的劳动教育生态构建、动态化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等维度探索具体实施路径，为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合型劳动人才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校；劳动教育；课程改革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1]。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科技跟跑”向“部分领跑”转型的关键期。该背景下，劳动教育作为“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底层支撑逻辑。高校作为新质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更应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劳动教育”课程的改革。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改革的底层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正深刻重塑劳动教育的内在机理，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教育改革的推动并非简单的技术适配，而是基于生产力三要素迭代所形成的系统性底层逻辑重构[2]。

（一）新质劳动者引领劳动教育目标发展

在劳动者维度，新质生产力塑造的劳动主体已突破传统产业工人的范畴。具备智能化劳动操控能力、人机协同系统思维与创新跨界整合素养的新质劳动者，正在成为驱动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引擎。而上述劳动素养结构的升级，推动着高校劳动教育目标发生转变。传统劳动教育以劳动技能传授为核心，所培养的人才已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下的社会发展需求。新质生产力发展语境下，高校需将劳动教育目标迭代升级为以数字素养、智能工具应用能力及跨领域创新思维为核心支柱的新型导向，同步增设绿色低碳劳动意识、跨文化劳动协作能力与劳动创业转化能力三大核心素养维度，其目标确立的核心逻辑已从聚焦具体劳动操作规范，转向培育能够在智能生产系统中精准锚定角色定位、高效协同人机关系，且统筹兼顾生态责任、全球协作与创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劳动主体。具体而言，高校需在劳动教育目标中明确界定：学生应熟练掌握节能减排型生产技术的实操应用范式，具备跨国劳动项目场景下的高效沟通与协同协作能力，能够实现劳动技能向创业项目核心竞争力的有效转化，同时依托数字化能力测评体系动态追踪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进程，为劳动教育目标的精准迭代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二）新质劳动对象驱动劳动教育内容革新

劳动对象的演进则推动教育内容体系的深层革新。当新质劳动对象从新能源材料等实体领域，向数据要素、信息服务等非实体范畴拓展，“脱实向虚”的劳动对象谱系要求高校劳动教育打破物质生产劳动的单一叙事[3]。传统劳动教育中以器物制造、体力劳作为主的内容框架，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需要嵌入数字劳动的数据采集分析、智能劳动的算法逻辑理解、情感劳动的服务场景构建等新型内容模块。劳动内容的革新并非对高校传统劳动教育的否定，而是借助虚实劳动形态的有机融合，构建覆盖全劳动谱系的教育内容体系，使受教育者既能掌握实体劳动的基础技能，又能适应非物质劳动领域的新要求。高校劳动教育需同步培养学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参与国际劳动协作及开展劳动创业实践的综合能力，在内容体系构建中可纳入光伏组件安装与维护、跨境电商多语言客户服务、劳动技能导向型创业计划书撰写及项目路演等实训模块，同时依托数字资源库整合优质线上课程、行业实践案例与实训模拟软件等核心资源，实现教育内

容的动态迭代与共享共建。

（三）新质劳动资料赋能劳动教育方式转型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跃迁则为教育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当人工智能训练平台、VR/AR 虚拟实训系统等数字化劳动资料成为新型劳动载体，劳动教育方式正从单一现实场景向“现实 + 虚拟”的智慧教育范式转型。借助智能技术创设的沉浸式劳动情境，教育者能将抽象的智能劳动流程转化为可交互的虚拟实践，使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自适应技能训练成为可能。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方式的转型不仅突破了传统劳动教育的时空限制，更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了劳动能力培养的精准化、动态化，让劳动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技能更新迭代的需求。

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框架

基于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教育底层逻辑的重塑，高校需要构建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框架，借助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有机结合，实现劳动教育目标的全面落地。

（一）显性课程中的劳动教育体系构建

显性课程是“劳动教育”课程的主要载体，高校应借助系统化的课程设计，将劳动教育的理论、实践内容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构建显性教育体系：

其一为理论类课程。高校可在选修课中设置“劳动教育通论”课程及专题讲座，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聚焦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新时代劳动价值观的阐释，同时普及劳动伦理、劳动法律等科学知识。虽然理论类课程实践环节较少，尚未构成完全意义上的“劳动教育”课程，但可为学生奠定劳动认知的理论基础[4]。

其二为实践类课程。高校需创新设计涵盖探究式、项目化劳动的实践活动，例如研究实践、专业实习、实验实训、田野调查等。同时高校应强调动手与动脑的有机结合，开设艺术创作类、探索类“劳动教育”课程，从而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体验劳动过程，进而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三为融合类课程。高校需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以此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与素养。例如，在人文社科专业中推广服务性学习，在理工类专业中结合产教融合开展创新实践，进而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等。

（二）隐性课程中的劳动教育渗透路径

隐性课程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与显性课程共同构成完整的劳动教育体系。高校可从以下四个维度系统完善隐性“劳动教育”课程，实现劳动教育的全方位渗透。其一，校园劳动实践维度。高校可组织常态化校园卫生清扫、绿植养护等日常劳动，以及实验室设备维护、图书馆书籍整理等专业性劳动实践，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形成劳动习惯，强化责任意识。此类实践活动应纳入学分管理体系，以制度保障劳动教育的持续性与规范性。其二，校园文化建设维度。应将劳动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中通过建设文化长廊等实体景观，以及播放劳动主题的校园广播、组织文化节等活动，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氛围。同时学校可以在规章制度中强调劳动价值，使劳动精神转化为师生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其三，同伴效应引导维度。高校应发挥学生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可借助评选劳动标兵、组建劳动实践社团等方式，树立劳动典型。利用朋辈之间的互动交流，激发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实现劳动教育从个体自觉向群体风尚的转变。其四，社会劳动拓展维度。高校可建立校社合作机制，引导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实践等社会劳动项目。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帮助学生深化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实现劳动教育从校园向社会的延伸拓展。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探索

在明确底层逻辑与实施框架的基础上，高校需要从目标、内容、方式、评价等多个维度探索具体的实施路径，以此确保“劳动教育”课程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有效实施。

（一）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教育目标精准定位

高校需立足新质生产力对劳动人才的需求框架，系统重塑劳动教育目标的定位逻辑。该目标构建应当突破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体的培养局限，转而建立以数字素养、智能技能、创新思维为核心要素的目标体系[5]。以计算机专业为例，高校可构建“三维九项”能力培养框架。在数字素养维度，开设“大数据劳动实践”课程，要求学生运用 Python 编程处理超 10GB 的制造业传感器数据，利用 Hadoop 集群完成工业流程优化分析，使学生掌握数据清洗、特征工程等数字化劳动技能；在智能技能维度，依托校企共建的“智能工厂数字孪生实验室”，学生需运用 TensorFlow 框架开发设备故障预测模型，结合 Unity3D 搭建产线虚拟调试系统，实现 AI 算法与工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在创新维度，设置“区块链 + 供应链劳动创新项目”，学生需组队设计去中心化的物流溯源系统，利用智能合约开发解决传统供应链中的信任痛点。

（二）虚实融合的劳动教育内容重构

面对劳动对象“脱实向虚”的发展趋势，高校需要重构劳动教育内容，实现实体劳动与虚拟劳动的有机融合。高校应在保留传统实体劳动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加大数字劳动、智能劳动等新型劳动内容的比重。以电子商务专业的劳动教育为例，传统劳动技能包括根据商品尺寸设计缓冲包装结构，使用半自动打包机完成十字捆扎的标准操作；虚拟劳动则新增电商智能

运营模块，学生需在阿里巴巴生意参谋平台分析某服饰店铺的流量转化漏斗，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优化推荐系统的商品关联规则，并运用 VR 技术搭建虚拟试衣间的三维场景，调试手势识别传感器与虚拟服装模型的交互逻辑。如此，借助虚实互嵌的训练模式，既可以保留劳动教育“手上有茧”的传统劳动质感，又注入了“云端有脑”的数字劳动内核，使劳动教育能精准对接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

（三）多元协同的劳动教育生态构建

高校需以学科特色为锚点，与头部企业共建兼具教学性与生产性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智能制造领域，可联合汽车智能工厂打造“校中厂”实训基地，助力学生理解智能生产线的数字孪生技术原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参与劳动教育需构建利益驱动与责任担当的双轮机制[6]。一方面，政府可出台《新质生产力劳动教育企业参与细则》，对连续三年提供超 50 个实习岗位的企业，按其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 3% 予以税收返还；对参与课程开发的企业技术骨干，认定为“产业教授”并纳入人才补贴范畴。另一方面，企业可将劳动教育嵌入员工培养体系，如某航空制造企业开设“青年技师工作坊”，让学生参与飞机零部件的无损检测项目，企业导师以“项目工单”形式布置检测任务，学生在超声波探伤仪的波形分析中，掌握新质生产力下的精密检测技能。除此之外，政府部门需搭建政策支持与资源供给的双平台。在政策端，除税收优惠外，可设立每年 5000 万元的劳动教育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校企合作的实训设备升级；在公共服务端，人社部门可联合产业园区开发“共享实习岗位池”，利用线上平台实时发布阶段性实习岗位信息。

（四）动态化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构建

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技能快速迭代的需求，高校需要构建以“能力成长树”模型为框架的动态化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突破传统的以知识记忆为主的评价范式。其一，多元评价主体构建需形成“三维坐标”。在纵向维度，企业导师以“工位观察日志”记录学生的操作规范，如某车企导师在评价学生时，详细标注“在模组焊接环节，第 3 次操作才达到焊点直径≤ 0.5mm 的工艺要求”；在横向维度，同学间可通过“项目贡献度雷达图”开展互评，如在智能仓储机器人调试项目中，小组成员从算法优化、硬件调试等 5 个维度进行星级评分；在深度维度，学生需提交“劳动反思手账”，用图文形式记录自己的实践过程。如图文并茂地记录自己在工业机器人编程中，如何通过 12 次参数调整解决轨迹偏移问题的思维过程。其二，评价方式创新需实现“三链融合”。过程性评价链采用“数字孪生 + 区块链”技术，如在智能制造实训中，系统自动抓取学生操作工业机械臂的数据，掌握学生的动作响应时间、路径重复精度等，生成动态能力图谱；结果性评价链引入产业标准，如物流管理专业的仓储规划项目，需按照《智能仓储系统设计规范》的指标，对货架利用率、拣货效率等进行量化评分；增值性评价链建立“成长档案袋”，收录学生在不同学期参与的如无人机巡检、智能产线优化等项目成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的改革创新已成为必然趋势。借助对底层逻辑的深入分析、实施框架的科学构建以及实施路径的积极探索，高校能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对劳动人才的需求，培养出具备数字素养、智能技能与创新思维的复合型劳动人才。未来，高校还需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态，不断优化“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动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作生，刘丰伟，李全海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塑造与模式创新 [J]. 中国大学教学，2025(05): 64−70.

[2] 褚蓉，刘玉升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涯 + 劳动”融合育人实践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 38(04): 65−68.

[3] 连冠，尹华，吴阿敏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劳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育的实践策略研究——以智能网联汽车专业为例 [J]. 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2024(12): 78−80.

[4] 陈艳玲，肖萍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J]. 纺织服装教育，2024, 39(03): 78−82.

[5] 刘向兵，曲霞 . 劳动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定位与路径创新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9): 34−41, 95.

[6] 戴君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工科类专业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J]. 就业与保障，2024(08): 23−2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北省教育厅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创新设计与实施研究”（2024573）。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

“大思政课”视域下职业本科院校行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模式构建

陈晓玲

摘要：“大思政课”视域下，将行业文化融入职业本科院校思政课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技并修”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路径。本文认为，职业本科院校需立足类型教育定位，将行业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创新意识等核心要素系统性地嵌入思政课教学体系。通过课程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平台拓展，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以及行业实践场域深度融合。“三维协同”即推动理论教学、实践体验与文化浸润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多元融合”则强调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行业专家等多主体参与，以及课堂、实训基地、企业文化馆等多场景贯通。实施路径上，需开发模块化行业思政案例库，开展项目化、情境化教学，并依托校企共建的实践育人基地，引导学生在真实职业场景中深化价值体认、锤炼技能，从而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切实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吸引力与育人实效，为职业本科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大思政课；职业本科；行业文化；思政课教学；模式构建

一、引言

“大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教育理念，强调要善用社会大课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其目的在于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与产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高等教育类型，其思政课教学需突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行业文化中蕴含的职业精神、道德规范、创新理念等要素融入教学全过程，构建“大课堂、大资源、大平台”的育人格局。探索行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模式，是落实“大思政课”理念、提升思政育人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行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理论逻辑

“大思政课”以“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为核心理念，形成开放性、实践性、职业性三大显著特征，为职业本科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了创新范式。

（一）开放性：构建“无边界”育人场域，实现多元协同共振

“大思政课”突破传统课堂的物理空间限制，打造“学校 + 企业 + 社会”立体化资源矩阵。职业本科院校将思政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与文化场域，如机械专业在智能制造工厂讲解“中国智造 2025”，石油化工专业赴铁人纪念馆感悟“铁人精神”。在育人主体上，构建“学校 + 企业 + 社会”三方联动机制。校内组建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协同的“大思政”团队；校外邀请大国工匠开设讲堂，传递行业精神内涵[1]。

（二）实践性：创设“沉浸式”体验场景，促进思政道理内化

通过“三阶递进”实践教学体系，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第一阶段为“认知体验”，如财经专业学生走访百年老字号企业，从历史档案中解读“诚信为本”；第二阶段为“技能训练”，在专业实训中嵌入思政要素，如建筑专业 BIM 建模需体现“绿色建筑伦理”；第三阶段为“创新实践”，组织真实项目（如计算机专业学生为小微企业开发党建系统），在技术服务中践行“科技报国”[2]。

（三）职业性：锚定“职业人 + 社会人”目标，推进产教文化融合

深度解构行业文化基因，提炼核心育人要素：制造业的“工匠精神”分解为“专注执着、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对应思政课的职业道德培育；现代服务业的“服务精神”与“客户至上、主动担当”融合，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共振。通过制定《行业文化思政要素清单》，将快递行业的“时效责任”、建筑行业的“安全伦理”等具象化，为将其融入课程提供指引，推进“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双轮驱动。

三、行业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

行业文化作为职业领域长期积淀的精神财富，蕴

含着独特的思政教育基因，是职业本科院校落实“大思政课”理念的鲜活教材。其教育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职业素养培育的“精神模具”

行业文化是职业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为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提供精准导向。制造业的“工匠精神”、服务业的“契约精神”、建筑业的“安全伦理”等，构成了职业行为的价值坐标。通过引入行业典型案例，可将抽象的职业道德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范式。

（二）文化认同建构的“基因密码”

行业文化承载着产业发展的历史记忆，是培育学生专业自信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当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了解民族工业从“洋火洋油”到“中国智造”的百年变迁，在专业实训中触摸工业遗产的历史温度，能深刻体会“产业兴则国家兴”的内在逻辑，进而建立“职业选择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价值认同，筑牢“技能报国”的信念根基[3]。

（三）社会责任培养的“实践锚点”

行业文化本质上是“人与社会关系”的职业性表达，天然蕴含社会责任基因。快递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精神、环保行业的“绿色发展”理念、教育行业的“立德树人”使命，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具体职业场景中的责任担当。

四、职业本科院校行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价值认知偏差导致融入深度不足

部分院校将行业文化融入简单等同于企业案例、工匠故事的碎片化叠加，忽视对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如某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显示，63% 的学生认为教学仅停留在事迹介绍，未讲透“工匠精神”“诚信文化”等背后的价值逻辑。同时，不同专业课程各自为政，融入过程缺乏整体设计，呈现“碎片化”现象[4]。

（二）协同机制缺失制约多元主体效能

校企合作陷入“单维输入”困境，企业多限于提供场地、案例或兼职教师，其文化诉求未转化为教学目标，院校对企业的管理哲学、专精特新精神等资源挖掘不足，合作停留在“一次性参观”“讲座式授课”层面。校内协同存在“壁垒效应”，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专业学院联动不足。

（三）师资能力短板造成文化转化低效

思政教师“行业失语”问题突出，仅 12% 的教师有企业实践经历，讲解行业文化时难融入职业场景（如建筑“安全红线”的生命伦理）、回应职业困惑（如“996 与工匠精神”冲突）、捕捉新兴行业伦理（如平台经济伦理）。专业教师“思政弱视”现象普遍，65% 的教师在课堂中仅作“事实性陈述”，或“生硬嫁接”口号，或回避价值冲突，未引导学生进行伦理反思，错失文化浸润契机[5]。

五、“三维协同·多元融合”模式的构建

（一）目标维度：构建“三层递进”育人目标体系

1. 基础目标：职业认知——解码行业文化基因

通过解析行业核心文化要素，如制造业的“工匠精神”、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设计思维”的价值内核，帮助学生掌握行业文化理念，形成职业角色认知。在“思想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设置“行业文化基因解码”模块，要求学生绘制所属行业的“精神谱系图”，梳理行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脉络。

2. 进阶目标：文化认同——实现价值情感共振

通过情境体验与价值辨析，引导学生理解行业文化的深层逻辑，建立“职业选择与国家战略同频”的情感认同。组织开展“企业价值观访谈”等活动，推动学生在思辨中深化对行业文化的理解。

3. 终极目标：价值践行——转化为职业行为准则

通过真实项目实践，将文化认同转化为职业行为准则，培养“德技并修”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承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如乡村振兴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计）、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践行行业文化，实现技术能力与职业责任的统一。

（二）资源维度：搭建“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平台

1. 校内资源整合：构建文化育人“中央厨房”

成立“行业文化研究中心”，统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学院、图书馆资源，开发《行业文化思政案例库》，涵盖 100 余个行业典型事件、50 余个大国工匠访谈视频、30 余家企业实景教学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课程化转化。机械专业可将“航空发动机叶片 0.01 毫米精度控制”转化为“工匠精神”教学案例，同步融入“机械制造基础”实训课与“思想道德与法治”思政理论课。

2. 校企共建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双元育人”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双元育人基地”，建立“共同制定标准、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建设实训”机制。例如，物流专业与京东物流共同制定《供应链伦理教学标准》，使学生领会“准时交付中的社会责任”；将特斯拉超级工厂生产线转化为 VR 教学场景，让学生在虚拟操作中理解“智能制造中的质量责任”，实现“课堂—实训室—生产现场”的无缝对接。

3. 社会资源转化：构建“大文化生态圈”

引入行业协会、非遗传承人、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挖掘多元文化资源。旅游管理专业可联合文旅局开发“工业旅游思政线路”，将本地老字号企业的创业故事转化为“民营经济发展”教学素材；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非遗工作坊，使学生在制作传统家具时体悟“守正创新”的内涵。

（三）实施维度：构建“三阶贯通”教学实施路径

1. 认知阶段（第一学年）：文化浸润式奠基

通过“行业文化导论”通识课（采用“文化解码 + 案例研讨”模式）、企业高管讲授“开学第一课”、

赴行业博物馆实地研学，建立文化认知框架。比如，通过“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时间轴”理解“科技自立自强”精神；机械专业新生可走进“国家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观察大型装备制造流程，树立“大国制造”职业自豪感。

2. 体验阶段（第二、三学年）：场景嵌入式深化

将课堂延伸至生产现场、虚拟仿真实训室、创新创业基地，开展“场景嵌入式”教学。护理专业可在三甲医院急诊室开展“生命急救中的伦理抉择”情景教学，让学生在真实抢救中理解“优先救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平衡；电商专业可在“校园直播基地”开展“助农直播”项目，在直播间讲解地域文化故事，提升职业场景适应能力。

3. 创新阶段（第四学年）：项目驱动式升华

结合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实施“双导师制”毕业项目，将行业文化要求纳入成果评价体系。机械专业学生在企业完成“精密零件加工工艺优化”项目时，需同步提交《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文化践行报告》，分析精度控制与职业责任的关联，实现从“文化体验者”到“文化践行者”的蜕变。

（四）多元融合：创新立体化育人机制

1. 主体融合：打造“双师双能 + 多方协同”共同体

组建“1+1+1”教学团队（1 名思政教师 +1 名专业教师 +1 名企业导师），实施“每年 1 次企业实践、每学期 1 次跨学科教研、每月 1 次企业导师进课堂”工程。

成立由教育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家长代表组成的“文化育人指导委员会”，定期审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文化融入指标，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校企主导”的协同格局。

2. 内容融合：构建“课程思政 + 专业思政”资源库

推动“思政课 + 专业课 + 通识课”协同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讲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联合机械专业教师以“某机床企业智能化改造”为例，分析产业升级中的文化转型；在通识课“美学与人生”中引入“工业设计美学”，解读有关作品中的“工匠精神”表达，形成跨课程育人合力。

3. 评价融合：建立“三维度四主体”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多元化：认知维度通过“文化要素思维导图”考察知识体系；情感维度通过“文化认同度问卷”“企业导师访谈”评估情感内化程度；实践维度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业文化创新方案”及职业行为作为评价依据。

评价主体多元化：实行“学生自评（30%）+ 教师评价（30%）+ 企业评价（20%）+ 社会评价（20%）”的多元主体复合评价。

（五）保障机制：夯实模式运行基础

为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院校可从制度、师资、文化三方面构建保障体系。制度保障方面，制定专项政策明确部门分工，如教务处统筹课程体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推动行业文化理论转化、校企合作处对接企业资源，并将“行业文化融入度”纳入思政课建设标准；师资保障方面，实施“双师双能”培养工程，要求思政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并提交调研报告，专业教师定期参加行业文化培训，同时通过跨学科团队协作和教学竞赛提升资源转化能力；文化保障方面，打造“一院一特色”产教融合文化品牌（如工匠走廊、诚信平台、职业文化园），结合行业文化节、展演活动等开展浸润式教育，形成“校园即职场”的育人生态。通过多维度协同，推动行业文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助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六、结论与展望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行业文化融入，本质上是职业本科教育“类型特征”与思政教育“铸魂功能”的深度耦合。通过“三维协同·多元融合”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职业本科院校可有效解决思政课“同质化”“脱离实践”等问题，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育人范式。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与行业文化育人的融合路径，强化“数字思政”“虚拟实践”等新型教学场景的应用，推动“大思政课”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为培养“心中有信仰、手中有技能、肩上有担当”的新时代产业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郁茗媛 . 行业文化融入职业院校“矩阵式”课程思政实践研究——以室内设计专业为例 [J]. 美术教育研究 , 2024(20): 96−98.

[2] 林彬 . 行业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析 [J].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 21(03): 46−50.

[3] 赵静 . “三教”改革背景下行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J].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0, 21(04): 47−50.

[4] 李芳玉 . 行业文化融入高职院校雷锋式工匠培育的路径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0, 33(14): 61−62.

[5] 高庆 . “大思政课”视域下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的思考 [J]. 世纪桥 , 2025(01): 34−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行业文化融入职业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探索”（2024GSZYJY−059）。

（作者单位：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工科专业教学改革实践
——以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为例

唐　晶 夏静芬 张　建

摘要：本文以新工科建设为背景，结合工科人才培养实际，聚焦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探索 OBE 教育理念在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应用。通过对比 2022 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引入 OBE 理念前后学生平均学分绩点及必修课及格率的变化，发现引入 OBE 理念后学生学业指标稳中有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基于此，本文从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严格毕业审核三个维度，提出贴合行业需求、完善反馈机制、规范教学管理等具体建议，旨在促进 OBE 理念与环境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为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科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OBE 教育理念；新工科；环境工程专业；高校教学改革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工科专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此，教育部结合工科专业工程实践现状，于 2017 年提出了新工科建设理念，目的是丰富工科类学生的工程实践经验、优化专业评价体系、促进教学改革。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由 Spady 等学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1]，该理念不仅关注教学内容及方法，更强调学生最终获得的能力，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中心，以学生的学习体验为出发点来进行教学设计，以学生学习反馈来优化调整教学目标[2]。新工科工程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制定能够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并将教学内容与实践经历相结合——这与 OBE 教育理念在内涵上是一致的[3]。因此，将 OBE 教育理念与新工科建设有机结合并推广应用，对提升高校教学质量、推动科技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OBE 教育理念在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中的应用

（一）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教学现状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并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基于此背景，环境工程专业应运而生[4]。该专业主要研究如何进行环境污染防治，研究领域涉及固废、废水、废气及噪声污染[5]。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依托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优势，人才培养以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旨在培养环境工程相关领域的应用型人才。该专业学生主要接受水处理技术、生态环境以及工程等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与实践训练。

自 2022 年起，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在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了 12 项毕业能力要求；对课程大纲中规定的课程目标也作出了相应调整，要求教师从学生的毕业能力出发，优化教学大纲并改进教学方法[6]。目前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大部分课程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即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组织形式[7]。课前，教师利用学校 moodle、微助教等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利用线上平台资源自主学习并提出问题。课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学过程，通过讲授和讨论的形式组织课堂教学，辅以手机 App、微助教等工具开展课堂实时评测、抢答等活动。课后，教师布置线上和线下作业，学生复习巩固所学内容。部分选修课学生可在尔雅和智慧树在线课堂平台自主学习，并在全部课程结束后参加在线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即可获得相应学分。这些在线课程不仅上课方式灵活，也便于学生反复观看。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将 OBE 教育理念引入课堂教学后，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在学生培养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二）OBE 教育理念引入环境工程专业课堂后取得的成效

为充分了解 OBE 教育理念引入课堂后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培养方面的变化，本文以学生课程考核结果中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两个指标为主要观测指标，以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年份（2022 年）为时间节点，分别对 2020、2021、2022、2023 级学生入学当年以及 2020 级学生在校四年间的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进行了横向及纵向比较。

横向对比显示，2020、2021、2022、2023 年入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大一新生入学当年的平均学分绩点分别为 2.905、2.560、3.136、2.898，必修课程及格率分别为 96.00%、95.87%、96.16%、97.00%，比较结果见图 1。纵向对比显示，2020 级学生在校期间大一至大四的平均学分绩点分别为 2.905、2.680、2.816、2.914，必修课程及格率分别为 96.00%、94.00%、95.00%、99.00%，比较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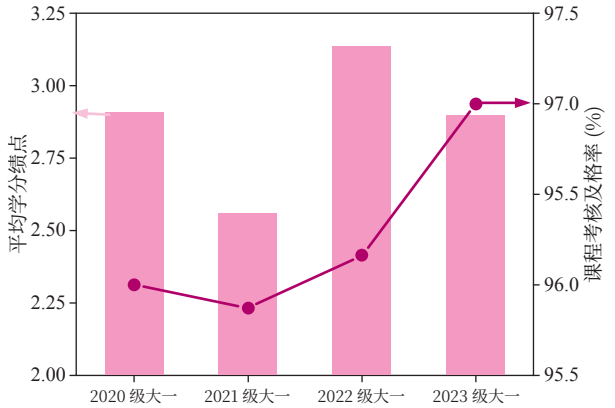


图 1 2020—2023 年入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大一新生入学当年的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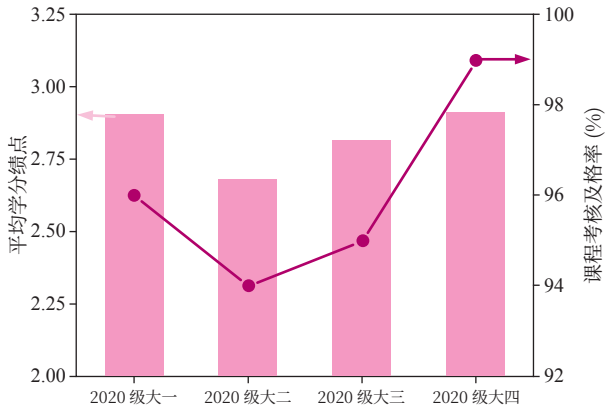


图 2 环境工程专业 2020 级学生在校四年间的各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

以大一新生入学当年的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为参照，分析数据可知：OBE 教育理念引入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前两年（2020 级、2021 级）及引入当年和后一年（2022 级、2023 级）平均学分绩点分别为 2.73 和 3.02，后者提高了 0.29；OBE 教育理念引入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前两年（2020 级、2021 级）及引入当年和后一年（2022 级、2023 级）平均必修课程及格率分别为 95.93% 和 96.58%，后者提升了 0.65 个百分点。

以 2020 级学生大学四年的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为参照，分析数据可知：OBE 教育理念引入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前两年（大一、大二学年）以及引入当年和后一年（大三、大四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分别为 2.79 和 2.87，后者提升了 0.08；OBE 教育理念引入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前两年（大一、大二学年）及引入当年和后一年（大三、大四学年）平均必修课程及格率分别为 95% 和 97%，后者提升了 2 个百分点。通过比较可知，自 2022 年人才培养方案中引入 OBE 教育理念以来，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和必修课程及格率均稳中有升。可见，OBE 教育理念引入教学大纲后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实际效果明显。

二、OBE 教育理念在环境工程专业的改革探索

高校培养的人才要符合社会及行业需求，目前行业对工科专业的人才需求已不只局限于理论研究型人才，能力强、素质高、创新意识强的综合型实践人才也是培养的重点[8]。本文根据高等教育“入学—在读—毕业”的人才培养顺序，结合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特点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一）优化入口——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

1. 明确目标定位

OBE 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成果为导向，这就要求在组织教学之前了解环境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能够综合应用化学、生物等多学科基础理论和环境工程专业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素质应用人才，期待学生毕业五年能达到注册环保工程师或环境监理工程师水平，能够胜任生态环境保护及相关领域的研发及管理工作。在明确目标后，要将目标体现在质量标准中，并分散于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规范的文件中，做到课程大纲与目标定位一一对应。

2. 贴合行业要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为适应我国环境工程产业快速发展对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新要求，贯彻工程教育认证（如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 标准）中“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浙江万里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应时刻关注国家环境工程专业相关行业要求及政策变化，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如宁波当地水资源丰富，可重点加强学生在水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能力培养，以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在相关领域工作。此外，可让当地行业企业专家积极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培养方案以符合行业企业发展实际。

3. 建立长期的反馈机制

持续改进是 OBE 教育理念的又一核心理念。要做到持续改进，需要精准地反馈信息。第一，重视学生反馈，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的反馈意见尤为重要。浙江万里学院设立学生反馈邮箱，收集学生对教育教学的需求和困惑。同时学生会定期组织调查和走访座谈活动，以便及时了解学生情况，进而优化教学设计。第二，及时了解用人单位反馈，行业企业对用工的满意度可以

直接反映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通过对用人单位的定期回访，可以进一步完善就业指导体系，保证 OBE 理念的长效化进行。

（二）完善过程——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1. 教师定期进行工作总结

定期总结和反思教学问题是授课教师必要的工作。教师要长期围绕学生的成长和需求开展工作，定期收集学生反馈，对个性化案例进行总结。教师应发挥敬业精神，以学生成长变化为基点积极探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并适时调整工作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2. 严格规范课程材料

要规范教师上课所需的课程材料。除了试卷材料，教学日历、大纲、教案、课件、作业、实验报告及教学平台等均是教师教学过程中所应提供的课程支撑材料。其中，教学大纲要反映出课程目标、课程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其他支撑材料中，一方面要相应体现出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包括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及综合评价；另一方面则要制定课程目标达成度的量化评价细则。与此同时，教师还需提供课程主要问题分析和持续改进策略。针对达标困难学生要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困难类型及课程学习方式，提供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

3. 学生自主规划学业

不断优化学生管理制度，提供更多的选课资源，允许学生自主规划学业，激励学生积极规划学习进程。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可自主安排学习进程，提前或延缓毕业。要求提前毕业的学生，应提前两个学期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初审，报教务部审批。建议推出宁波高校之间的课程学分互认机制，用集约化的手段最大限度地丰富课程资源。

（三）严把出口——加强毕业论文审核

毕业论文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最后一环，对专业教育质量至关重要。OBE 教育理念中“易观察与可测量”的质量标准落实到毕业论文环节的具体改革意见如下：

1. 建立院内毕业论文审查组

审查组成员应包括教学副院长、教务老师、系主任、导师、第二导师及教学督导。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设立毕业论文审查组，负责论文材料的通知及审核工作，保证论文材料的完整性及规范性。

2. 规范毕业论文要求及材料模板

详细的毕业论文材料有利于归档及审查，也有利于学生严谨学风的养成。浙江万里学院生物工程专业从开题到答辩有一套完整的毕业审核材料，材料中明确规定了各步骤所交材料及详细内容的格式要求，毕业论文审查组会按时间节点进行引导并审查。

3. 增设优秀毕业生荣誉

浙江万里学院的毕业生达到以下条件后会在毕业时额外获得荣誉学士学位证书，以表示学校对该学生本科期间表现的肯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证书的条件是学分绩点≥ 3.5 或专业排名在前 5%，外语成绩优异或在各大竞赛中获得出色成果。建议增设优秀毕业生的名额，适时调整获评条件，从而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积极性和培养质量。

入口、过程及出口各环节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人才培养方案的改进及毕业过程应融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而学生能力的提升又反哺于培养质量的优化与学校声誉的积累，最终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生态。

三、结语

将 OBE 教育理念深度融入工科专业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及任课教师的共同努力。未来，要从教学设计、资源配置、师资发展等各方面，不断优化课程管理制度，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毕业论文审核，以学生为中心，创造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制度保障和育人环境，从而切实提升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新工科建设与国家战略需求。

参考文献

[1] SPADY W. Choosing Outcomes of Significance[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94, 51(06): 18−22.

[2] 吕晓玲，高春艳，李满宏 . 新工科背景下以 OBE 为导向的机电传动与控制课程教学改革 [J]. 高教学刊，2025, 11(S1): 136−139.

[3] 王青旺，杨玲，罗朝阳，等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的“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改革 [J]. 西部素质教育，2025, 11(01): 13−16.

[4] 郭美莎，涂志红，李美倩，等 . 浅谈环境工程原理及设备课程教学现状及改革措施 [J]. 科教文汇（上旬刊），2021(16): 95−96.

[5] 崔康平，刁海东，刘睿 . 环境专业教学现状与创新改革 [J]. 教育现代化，2020, 7(54): 76−79.

[6] 李正，张健，王冰，等 . 环境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J]. 北极光，2019(06): 170−171.

[7] 刘恒明，张俊新，魏海峰 . 国内环境工程专业本科建设现状浅析 [J]. 广东化工，2019, 46(11): 230−231.

[8] 李莉梅 .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改革探究 [J]. 广州化工，2017, 45(03): 126−12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浙江省“十四五”第二批本科省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环境工程专业‘产学研赛创’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JGBA2024409）；2024 年浙江省校级课题“工科教学中落实 OBE 教育理念的调查与实证研究”（浙万院教〔2024〕32 号 −8）。

（作者：唐晶，浙江万里学院研究实习员；夏静芬，浙江万里学院教授；张建，浙江万里学院副教授）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研究

沈　莹　单银丽　沈　意　陈玉洁

摘要：为响应国家课程思政建设号召，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一系列课程思政改革。“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作为园林工程技术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立足高职育人定位，构建“三目标·四阶段·五层次”教学体系，通过优化“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四段式教学模式、融入企业文化与专业赛事、搭建多平台线上教学渠道等举措，将工匠精神、爱国情怀、浙江精神等五大育人元素“溶盐入汤”式融入教学各环节。为高职院校同类课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育人目标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思政；工匠精神；浙江精神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7年12月，“课程思政”写入了教育部的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骨干院校、国家双高学校。园林工程技术专业成立于1999年，是浙江省重点专业、国家骨干专业、国家优势专业。“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是该专业的核心课程、必修课。

一、实施过程

（一）探讨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被列为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后，在学院领导和系部领导的关心下，课程组成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商定具体的分工和实施方法。课题组成员都认真学习了关于课程思政的指导思想，并结合课程特点撰写了课程思政案例。系部多次组织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与思政课程以及课程思政相关的文件。课程思政逐渐在所有教职工中得到推广，几乎所有教师都对课程思政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撰写了相关案例。同时，在学校及系部的支持下，课题组教师利用周末及假期时间，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课程思政培训、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等，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

1. 课程内容改革——规范日常行为，强化职业道德

经过反复研讨和推敲，课题组成员对“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以及其他课程群的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活页教案、课程考核标准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课程思政目标等，使得课程教学目的更为明确。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授课周期为一学年，传统的授课方式为两段式教学，即“一学期理论授课＋一学期实践授课”，注重的是专业理论和技能的讲授及训练。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后，课程组认为应该将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决定把授课方式改为“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四段式教学，在讲授专业理论及技能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确立人生目标的重要性。课程的实训内容也由原来单一的设计实训，改为现场教学、调研、设计及模型制作等内容，从传统的“纸上谈兵设计法”转变为“触手可及设计法”，全方位培养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用的有理想有抱负的设计师助理。

课程群内其他课程也相应进行了课程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课程组教师指导学生们一起完成的《人生的意义》《幸福感》《兼职那些事》等课程思政动画片，以全新的方式融入课程教学，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2. 引入企业文化——提升行业归属感

园林工程技术专业一直坚持和企业保持紧密联系，专业教师每年都必须到企业进行调研以及兼职锻炼。在和企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企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充分了解了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授课教师有意识地在课堂中引入企业文化，告诉学生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便学生能够进一步树立就业目标以及人生目标。同时，企业骨干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进入课堂讲课，在日常课堂中将企业文化渗入到课程内容中，为日常教学增添了一

抹别样的色彩。

在学生即将踏入社会进行顶岗实习前期，企业派专人到学校进行宣讲，介绍企业文化、企业用人需求、岗位技能要求及人员培养计划，并进行现场招聘。通过企业宣讲，既满足了企业提前到学校“抢人”的需求，又为学生进一步树立就业目标和学习目标提供了帮助。

3. 结合相关比赛——提升专业归属感

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课程组教师将专业比赛和课程内容相结合。浙江省高职高专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大赛是园林专业比赛中含金量较高的赛事。该比赛要求学生根据规定的材料，对 30 平方米的庭院进行设计及施工。在课程教学中，将该项目的设计内容融入课程设计项目中，选拔出创作了优秀作品的学生，再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和训练，随后参加浙江省的比赛。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参加比赛的作品每一年都有很大的进步。除此之外，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组织的浙江省大学生园林景观设计大赛、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插花技能大赛的内容，都被融入了相关课程中，使得教学目标更为明确。

4. 辐射作用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作为院级课程思政项目立项后，进行了一系列课程改革。作为课程思政示范课，园林教研室多次组织教师听课、观摩和探讨。课程组教师也在相应的专业教研室进行了课程思政的推广。课题组教师代表课程组进行了全校公开观摩课研讨，参加了浙江省教学能力大赛。建筑与艺术系教师学习了相关教师的课程思政后，都进行了思考并结合自身课程的特点撰写了教学案例并应用于教学过程中。

5. 结合线上教学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作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智慧职教平台、职教云平台以及浙江省线上大学平台上开放，供在校学生及社会人士学习。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500 人在各类平台上参与了该课程的学习。该课程还被学校推荐为省级在线精品课程。

二、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改革组教师经过三年时间，面向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学生进行了课程思政改革。在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课程组教师多次召开研讨会，利用课余时间参与课程思政培训，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对“园林规划设计”的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活页教案、课程考核标准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课程思政目标等，使得课程教学目的更为明确。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企业文化、结合相关竞赛、结合线上教学，就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在智慧职教平台开设在线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课程内容。

通过实践，我们得出了结论。该课程拟通过“三目标·四阶段·五层次”的教学改革（见图 1），将工匠精神[3]、爱国情怀、职业道德、浙江精神、以人为本“五层次”育人元素，结合课程基础理论知识、基础实训、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训“四阶段”的教学，通过课前预习及鉴赏、课中学习及讨论、课后拓展及实践的路径，将思政人物及事件、行业事件、专业竞赛、社会实践等方面自然地融入教学，达到“传承中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规范日常行为、强化职业道德、增强行业归属感”的“三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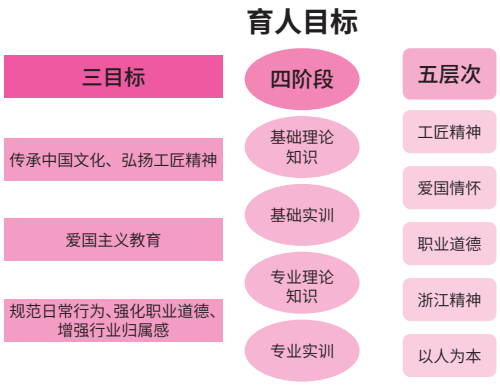


图 1 “三目标·四阶段·五层次”教学改革

（一）三目标

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设置“园林规划设计”课程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园林艺术的概况，掌握园林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掌握城市道路绿地设计、居住区绿地设计、单位附属绿地设计、公园规划设计等知识和方法，为将来从事园林规划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更好地为我国园林规划事业发展服务。

要达到上述目标，学生只掌握专业技能并不够，人格及专业素养更重要。作为中国园林事业未来的创造者，继承中国传统园林文化、弘扬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具备强烈的行业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

在“园林规划设计”课程中，结合教学内容，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教学、实训、参观企业、师兄师姐经验分享、课程实践、教师下企业、企业进校宣讲等方式，达到“传承中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规范日常行为、强化职业道德、增强行业归属感”的目标（见图 2）。

（二）四阶段

结合全国骨干高职高专院校的特点及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园林工程技术专业生源招生面向全国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和浙江省中职毕业生。根据学情，以“园林规划设计”课程多年的教学实践为依据，将该课程教学过程设置为基础理论知识、基础实训、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训四个阶段。由浅入深、由易转难，环环相扣，以达到教学目标（见图 3）。

教学内容	育人元素
课程导入之“什么是教育”环节：观看《教育者》视频，自然地融入思政元素。	传承中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1. 通过观看教师推荐的视频，感受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造园者的匠心独具，提升学生对造园者的敬畏，并思考“你为什么来？来做什么？将来打算做什么？” 2. 通过现场教学，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真实地体会到做工匠的感觉。 3. 通过讲解经典古典园林造景手法，使学生感受工匠精神。 4. 介绍经典案例，突出中国文化在造园中的重要性。 5.30 平方米的园林设计和模型制作，面积虽小，要做好做全也是非常不易的，使学生体会到工匠精神。
园林构成要素规划设计现场教学	
园林艺术布局	
园林造景手法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	
公园绿地规划设计	
小型园林规划设计及模型制作	
中外园林艺术风格	爱国主义教育： 1. 通过中西方园林的对比，展现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2. 分析现代城市园林景观中，古典元素和现代设计的优缺点让学生感受大众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偏爱，提升爱国情怀。
园林艺术布局	
园林造景手法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	
公园绿地规划设计	
单位附属绿地规划设计	
校园绿地测绘	规范日常行为、强化职业道德、增强行业归属感： 1. 通过团队合作进行实训，使学生掌握作为园林工匠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 2. 通过讲解国家设计标准和规范，强化职业道德。 3. 在反复的设计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耐心、细心、恒心使其养成设计师应有的日常规范。 4. 通过适当的点评鼓励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提升学生的行业自信感。 5. 组织和指导学生走出校园，参与比赛，提升行业归属感。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	
公园绿地规划设计	
单位附属绿地规划设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设计	
小型绿地规划设计及模型制作	

图 2 育人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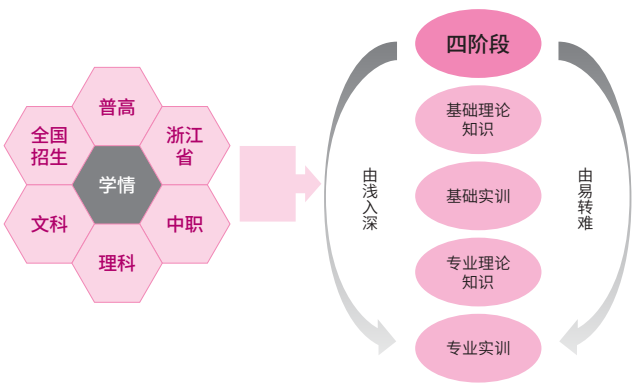


图 3 根据学情设置教学过程

（三）五层次

通过四阶段的教学，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教学、实训、参观企业、师兄师姐经验分享、课程实践、教师下企业、企业进校宣讲等方式方法，将工匠精神、爱国情怀、职业道德、浙江精神、以人为本“五层次”育人元素逐渐融入课程（见图 4）。将课程思政“溶盐入汤”式地融入课程[4]，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园林价值观。

三、反思与建议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是不一样的，在教学理念的提炼、教学内容的筛选和教学方法的应用等方面都不同，但是，课程思政必须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思政课程融入的是较高层次的思想政治元素，课程思政要将这些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专业中，具体化实施，溶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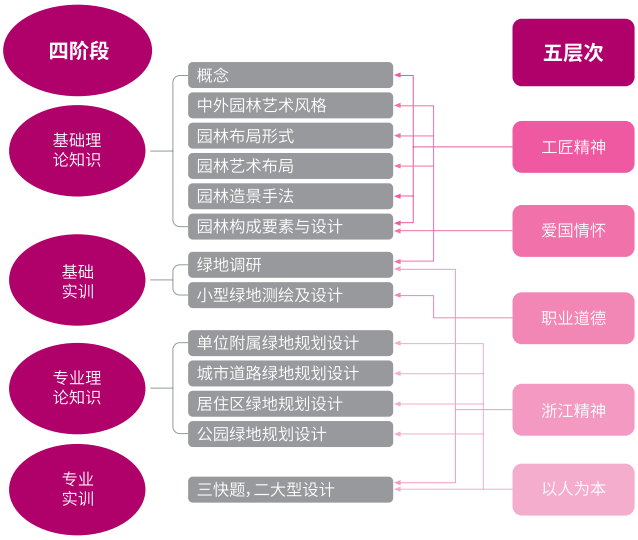


图 4 “五层次”育人元素融入课程

入汤。课程思政并不是喊口号，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系统的规划设计，以确定课程具体的育人元素与育人目标，不同的课程会有很大的差异。课程思政需要长时间坚持实践，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课程思政需要从上而下的激励机制，才能促使专业教师进行思考，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修为，进一步提高课程改革效果。课程思政要“乐教”，不能照搬硬抄。生硬的课程思政容易使学生反感，“润物细无声”[5]式的课程思政，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四、总结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不同，课程思政需立足于思政课程，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在教授专业技能的过程中结合工匠精神、爱国情怀、职业道德、浙江精神、以人为本等育人元素，培育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园林工程技术领域的新时代技术人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EB/OL]. 人民日报，(2016−12−09)[2025−11−25]. 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n1/2016/1209/c117092−28936962.html.

[2] 虞丽娟 . 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18(01): 42−44.

[3] 郭慧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17(12): 167, 169.

[4] 浙江省教育厅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校课程思政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EB/OL]. (2021−04−09)[2025−12−16]. http://jyt.zj.gov.（下转 198 页）

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王　杨

摘要：新媒体时代下，各类社会思潮凭借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广泛渗透，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既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全新挑战，也孕育着重要机遇。本文首先阐述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其次分析其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资源、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增强教育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助力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思潮；大学生；思政教育；影响；对策

一、引言

兼具即时传播、开放共享、双向互动与信息海量特性的新媒体，正深度重塑人们的生活学习与交流形态。而作为其核心使用群体的大学生，自然成为各类社会思潮最易触达也最易受浸染的群体。这些承载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与思想倾向的思潮，对大学生思想认知的建构、价值判断的形成及行为选择的导向，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深层作用。深挖新媒体场域中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渗透机理，精准探寻适配的应对路径，这样的深度钻研既直抵提升思政教育质量的关键内核，更对培育足以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的特点

（一）传播的快速性与广泛性

新媒体构筑的信息通途，彻底消解传统时空桎梏。昔日需经层级传递、耗时良久的信息传播，如今能瞬时触达全球各个角落。社会思潮一旦在某一节点成型，便会借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势能，快速蔓延至更广阔的场域[1]。西方“消费主义”思潮曾借新媒体平台瞬时涌入我国大学校园，时尚博主、网红等通过社交渠道大肆鼓吹高消费与超前消费理念，推介各类所谓“必备”奢侈品，相关话题在微博短时间内斩获数百万阅读量，大量大学生参与讨论并在校园形成广泛关注，深度影响部分学生的消费认知与行为。这种快速扩散让社会思潮得以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扎根、发酵，其影响力实难小觑。

（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隐蔽性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悄然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短视频平台里看似轻松的娱乐内容，可能暗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网络小说的情节设定会不经意传递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就连高频使用的表情包，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判断。在大学生圈层中广泛传播的“躺平”主题表情包，看似是消解压力的调侃式表达，实则暗藏着消极避世、规避竞争的价值倾向。部分不良社会思潮恰以这种生活化、娱乐化的伪装模糊自身本质，凭借极强的隐蔽性让沉浸于轻松体验的大学生难以洞悉其深层思想内核，最终在无意识中受到隐性侵蚀。

（三）互动性与影响力的强化性

新媒体为大学生注入强劲互动动能，使其跳出被动接收信息的桎梏，在微博话题场、抖音评论区等平台主动发声，以评论、转发等多元形式传递对各类社

（上接 197 页）cn/art/2021/4/9/art_1228998760_58916893.html.

[5] 肖紫嫣 . 高职专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方法策略探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18(01): 96-9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第一批省级课程思政教学项目“建设立项‘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浙教函〔2021〕47 号）。

（作者单位：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会思潮的见解，推动思潮完成二次乃至多次扩散。这种深度参与让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2]。以“Z世代职场观”思潮为观察样本，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主动表达对工作生活平衡、职业发展等议题的见解，在互动碰撞中凝聚起新的职业理念与态度并向外扩散。这一过程不仅深度重塑了他们对未来职业规划的认知与选择逻辑，更潜移默化地改写了既有的就业认知与职场行为倾向。

三、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丰富了思政教育的资源和内容

各类社会思潮的蓬勃涌现，恰似为思政教育推开一扇扇思想之窗，携多元观点立场与文化因子涌入其中，为思政教育素材库注入鲜活养分，丰富了这一教育领域的内容储备。近年兴起的创新思潮借新媒体传递大量科创、文创案例与理念，不少高校思政课堂引入这些内容，以科创企业成功实践为切入点，阐释创新精神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核心价值，让学生切实体悟时代精神的深层内涵[3]。环保思潮借新媒体广泛扩散，环保公益组织制作的短视频鲜活呈现全球生态现状与环保实践成效，高校思政教育者将这类素材融入社会责任教育环节，组织学生探讨环保与个人、社会的深层关联，让思政教育更贴近现实，学生也在具象案例中真切体悟责任担当的重量。

（二）激发了大学生的思维活力

新媒体时代多元社会思潮，促使大学生主动审视各类观点理念。面对思潮碰撞不再安于被动接纳现成结论，而是转而投入到主动地分析、比较、批判与反思之中。在对不同思潮的深入探究中，他们习得多元视角观照问题的方法，辩证思维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也随之逐步提升[4]。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思潮讨论为具体场景，大学生借新媒体接触到多元观点——既有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也有现代文明冲击下传承困境的细致剖析。参与讨论与探究时持续反思辨析，逐步沉淀出独立见解，这种思维锤炼让他们在思政课堂上更能精准理解并接纳正确理念，主动完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转化。

（三）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新媒体能即时捕捉社会热点脉动与思潮动态变迁，思政教育工作者可借这一特性，紧扣思潮最新发展态势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让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得到切实强化[5]。

网络中“人工智能伦理”讨论升温之际，思政教育工作者即刻将相关议题引入课堂，组织学生分析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深层关联，引导其树立正确科技观。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梳理大学生在新媒体平台关注的思潮话题及发声内容，教育工作者能精准锚定其思想动态、厘清困惑与需求，让思政教育更切中要害。分析发现某一时期大学生对“就业焦虑”相关话题关注度偏高，教师便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开展专题讲座、心理辅导等针对性活动，助力学生纾解内心焦虑、树立正确就业观念。

四、新媒体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其在思政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新媒体时代，传统说教式传播已难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高校应主动借力新媒体技术，打造兼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阵地。部分高校制作系列趣味短视频，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伟人的思想精髓，借形象画面与通俗语言直观呈现；部分高校以动画模拟《资本论》中商品价值、剩余价值的论述场景，让抽象理论鲜活可感；另有学校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短视频，将爱国、敬业等理念融入校园生活与社会热点故事。这些作品经学校官方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获得学生广泛关注点赞，播放量常达数万，让主流意识形态以更贴近大学生的方式传播。

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成长的引路人，其自身意识形态素养是站稳讲台的根本。为此，思政教育工作者需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与政治理论培训与学术研讨，在原著研读中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同时持续追踪社会思潮演进轨迹，深入研究其内核内涵，练就敏锐的辨别能力，确保教学中能够清晰地辨识各类思潮的潜在影响。例如，当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借网络渗入校园引发学生讨论时，思政教育工作者可凭扎实理论功底与敏锐洞察力，戳破其“人类共同价值”的伪装，揭示其服务西方“西化”“分化”图谋的意识形态工具本质，引导学生认清其维护资本利益的核心诉求，从而筑牢抵制不良思潮侵蚀的思想防线。

校园文化是浸润大学生思想的无声春雨。高校可通过开展“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主题班会，让学生在革命故事分享、红色历程研讨中触摸历史温度。从战役细节的梳理到英雄事迹的共情表达，沉浸式的互动让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碰撞中自然扎根，实现学生认知深化与情感认同的双重提升。红色文化节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营造校园思想氛围，红色歌曲传唱、经典篇目诵读等环节让学生在旋律共鸣与文字体悟中触摸革命岁月的温度，使红色基因在参与感中自然流淌进内心深处。学术讲座则搭建起思潮辨析的专业平台，邀请专家学者聚焦“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等热点议题，拆解其解构权威、消解深度的核心特征，指出可能引发的价值虚无倾向，引导学生在理论透视中建立对多元思潮的清醒认知与理性判断。这些多元活动以主旋律为内核传递正向能量，构筑起昂扬向上的校园文化场域，让主流意识形

态在课堂研讨、实践体验的日常浸润中自然流淌，于潜移默化间融入大学生思想认知与行为选择。

（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其价值判断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需深度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实现全方位育人。理工科课堂可在技术研发、工程实践教学中，锚定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的根本方向，让爱国情怀与敬业担当在攻克技术难题中自然彰显；文科课程依托社会治理、市场契约等真实案例辨析，在法理阐释与道德叩问中传递诚信底线与法治精神，让价值准则内化为学生思维习惯与行为自觉。社会实践是价值观培育的鲜活实践场，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开展敬老助残、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在躬身付出与真情帮扶中让友善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行动自觉。校园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举办文艺汇演、体育竞技等活动，让学生在旋律传唱、团队协作与思想共鸣中深化价值认知，实现从情感认同到行为践行的自然过渡，筑牢成长路上的价值根基。

高校应开设专门的价值观教育课程，以系统化理论讲授为根基，搭配现实案例剖析、小组深度研讨等多元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穿透不同价值观念的表层表述探究内核逻辑。针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等现实议题举办辩论活动，让学生在观点交锋中辨析价值冲突的本质，在理性辩驳中锤炼批判性思维，逐步构建起清醒笃定的价值判断体系。“我心中的正确价值观”主题演讲活动是价值观培育的载体，学生在文稿撰写时梳理个人经历与价值认知的交织点，从身边诚信故事的细节铺陈到集体利益的思辨阐释，在反复打磨中明晰价值内核。登台表达时的语言锤炼与情感传递，让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的人生体悟，这种“以我口说我心”的淬炼过程，自然让正确价值取向扎根于心。

榜样是照亮成长之路的精神微光。高校应深耕身边典型，选树“校园之星”，将学业精进、社会实践深耕、道德践行中的突出学子事迹具象化呈现。同时联动道德模范的感人经历，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多维渠道进行立体传播，让榜样的奋斗细节与精神内核可感可学，在耳濡目染中激发学子见贤思齐的内生动力。高校还可邀请全国道德模范走进校园与大学生围坐交流，结合捐髓救人的抉择忐忑、诚信立身的坚守不易等亲身经历，分享践行核心价值观时的初心坚守与精神淬炼。这些褪去光环的真实叙事带着生活温度，让高尚品格从宣传语汇转化为可感的人生选择，在眼神交汇的共情中唤醒学子向善向美的内生动力，让榜样教育真正落地生根。

（三）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引导其形成健康的行为方式

高校应配齐持有专业资质，且具备扎实理论功底与实操经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设课程系统讲解学业焦虑、人际适应等常见困扰的表现根源及调节技巧。同时，搭建“线下咨询室 + 新媒体平台”服务矩阵，线下提供面对面疏导，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QQ 等渠道开通文字语音咨询与预约通道，让心理支持打破时空限制触手可及。针对受社会思潮冲击滋生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的学生，专业心理咨询团队以共情倾听与科学干预精准疏导，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助力其维系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

高校应开设网络素养课程，系统传授网络知识、道德规范与安全常识，并结合网络暴力酿成的心理创伤、网络谣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真实案例，让学生直观认识不良行为的深层危害。以“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宣传周为载体，通过主题海报的细节呈现、签名承诺的仪式感营造，在沉浸式体验中提升学生信息辨别力与自我约束力，帮助其抵御不良思潮的网络渗透。

高校应构建依托大数据的舆情监测体系，实时追踪新媒体平台中涉及大学生的社会思潮动态与舆情信息。一旦捕捉到校园论坛等场景中极端思潮引发集中讨论等风险苗头，即刻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权威解读澄清事实引导舆论；同时联动专家学者与思政工作者开展精准疏导，及时消解负面影响，筑牢校园稳定防线。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既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注入鲜活动能，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冲击，高校思政工作者需深察社会思潮的特质与影响，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锚定价值航向，以价值观培育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以心理健康关怀破解现实困局，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最终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高建华 .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实践研究——评《新媒体视野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探索》[J]. 传媒 , 2024(23): 100.

[2] 白志琴 , 王晨岚 .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现状及发展探究——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J]. 中国教育学刊 , 2024(09): 111.

[3] 范鸿飞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评《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探索》[J]. 科技管理研究 , 2022, 42(19): 261.

[4] 邱白 .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思考与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1, 34(20): 102−103.

[5] 奚榆 . 数智赋能与价值引领 : 新媒体驱动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 [N]. 贵州教育报 , 2025−12−04(T01).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数字化时代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张　月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学的变革势不可挡，提升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更是筑牢新时代思政课教育根基的核心要务。本文立足数字化浪潮下思政课教学信息化的发展现状，系统剖析当前思政教师在新兴信息技术应用、多元教学资源整合利用及持续学习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从能力进阶、资源赋能、生态支撑三个维度，构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研究旨在助力思政教师突破数字化教学瓶颈，全面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平，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切实增强思政课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推动思政课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全方位冲击，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思政课教学作为塑造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课程，在这场变革中既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思政课堂引入海量教学资源与丰富的教学形式，有效破除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禁锢，极大提升了课程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然而，当前思政教师在信息化教学能力方面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很难将数字化优势全面发挥，对思政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形成了制约。全面探究增强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成为当下思政教育领域急需化解的关键课题。

一、数字化时代思政课教学信息化发展概述

步入数字化时代，思政课教学信息化进程持续加速，传统思政课教学的模式、内容与方法均发生了深刻变革，为思政课教育的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教学资源层面，众多多媒体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素材。教师能便利地获得各类高清图片、生动的视频以及真实案例，把原本枯燥的思政理论以更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当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相关内容的时候，教师能找到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以直观的方式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使学生仿若处于历史事件现场，增强知识的沉浸式代入感[1]。

在线教学平台及教育软件的大规模应用，革新了教学模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步入常态化，教师借助在线平台将预习任务与课程资料对外发布，学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开展初步学习。针对学生在线学习遇到的疑问及难点进行深度探讨，实现了教学的精准发力。运用虚拟现实（VR）及增强现实（AR）技术，为思政课教学打造沉浸式情境。在红色文化讲解之际，采用 VR 技术构建革命情境，让学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使抽象的思政概念具象化表达，增强了学生在情感上的共鸣以及理解深度。但不能忽略这一事实，思政教师在信息化教学能力上的差异十分显著，部分教师具有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但是在实操技能上存在不足，无法把众多技术手段与思政课教学进行合理且有机地结合，限制了思政课教学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步伐[2]。

二、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存核心问题

（一）新兴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不足

当前，大部分思政教师已掌握基础的数字化教学工具，能熟练运用 PPT 制作教学课件、凭借电子邮件收发教学资料，基本满足传统教学模式向数字化过渡的基础需求。然而，在新兴技术的实际运用方面存在显著落差。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迭代，多数教师只是停留在知悉概念或进行简易对话互动的水平，无法把智能辅助教学工具融入日常教学中。例如智能批改作业软件可迅速分析学生答题的情况，并作出有针对性的反馈说明，但部分教师因操作能力不足，依旧采用传统的人工批改模式，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智能备课系统可按照教学大纲及学生学情，自动生成教学设计方案，推荐契合的教学视频、案例类资源，进而对教案进行智能优化处理，然而教师因对操作流程不熟练，仍旧习惯手动搜索资料、撰写教案，不仅

需耗费大量时间，也很难精确贴合学生需求。

在作业批改这一环节，智能作业批改软件可采用语义分析技术，迅速发现学生答题中的逻辑失误、知识缺漏，进而生成定制化反馈说明，极大提升批改速度。因为教师对软件评分规则及操作界面不熟悉，依旧秉持传统人工批改模式，导致作业反馈周期延长，难以及时帮助学生矫正错误。教育类 App 的功能不断拓展，思政案例分析 App 不仅可提供海量实时案例，还具备互动研讨、模拟辩论等功能，但教师仅把该 App 当作普通资料查看平台，未有效利用这些功能实现教学形式创新，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积极性，阻碍了新兴技术在思政课教学的应用价值发挥。

（二）新兴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能力薄弱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专业科研数据库、特色教育 App 等资源纷纷涌现的背景里，思政教师资源整合能力亟须强化提升。面对 AIGC 生成的诸如教案、案例等内容，部分教师因没有信息鉴别能力，未将思政课程意识形态要求与学术规范融入审核，不作鉴别就采用，有传播错误信息的潜在可能。就科研数据库内的前沿成果而言，无法高效筛选并转化成适宜课堂授课的内容，理论与教学实践存在割裂现象。在对不同来源的资源进行整合时，未实施系统性规划，不能把 App 上的生动案例、数据库中的学术成果与人工智能生成的辅助材料有机地结合，搭建逻辑连贯的教学架构，学生构建完整知识框架面临难题，阻碍教学质量的提升。直接采用 AI 生成的历史事件剖析，可能会因算法训练数据偏差引发史实错误，也可能存在价值观表述含糊等问题，有误导学生认知的潜在风险。

就专业科研数据库资源利用而言，教师虽可得到前沿学术成果，不过很难把高深理论转化成与学生认知水平相符的教学内容。面对数据库中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成果，教师无力高效筛选核心要点、简化复杂论证步骤，造成教学中理论阐释生涩费解，与学生当下实际生活脱节，引发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现象。

在实施多元资源整合时，教师普遍在系统性规划能力上有缺失。无法把 App 中的时政热点案例当作理论的切入点，同样无法把科研成果与 AI 生成的辅助材料有效整合，造成教学内容零散化。这种欠缺逻辑连贯性的教学架构，使学生构建完整知识体系障碍重重，降低了思政课程铸魂育人的实际成效，极大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持续学习的动力与优质资源严重缺乏

当前，思政教师还面临教学任务量大与信息化能力提升需求的矛盾。每日要开展多班级备课、跨章节授课、课后作业批改等相关工作，平均每周的教学时间长达 16 小时以上，课余还要应对学生思想辅导、党建活动安排等，造成自主学习时间被大幅挤压。少数教师直言，虽然认识到信息化教学的关键意义，皆因精力有限，难以挤出时间系统学习智能备课、虚拟仿真等新技术。

学校开展的信息化教学培训往往出现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培训较多聚焦于前沿技术原理及通用操作规范，如阐释大数据分析模型的创建、虚拟现实技术的要义，缺乏针对思政课程实操的引导。既没有展示怎样把党史数据库资源和 VR 技术融合以设计沉浸式教学场景，也未提及怎样利用智能分析工具优化思政课教学安排，导致教师学后难以把理论转化为实际课堂操作，削弱学习的积极性。

就资源获取而言，教师陷入“量多质差”的不利局面。虽然网络充斥着巨量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但契合思政课程意识形态要求、与教材章节相适配的优质内容稀缺[3]。同时满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目标，兼具理论深度与趣味性的虚拟仿真课件、互动式教学案例数量极少，资源的匮乏阻碍教师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影响其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持续进阶。

三、数字化时代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策略

（一）分层分类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新兴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高校可借助校内专业力量，按周期开设切合思政课教学要求的新兴技术培训课程，课程应覆盖人工智能、科研数据库、教育类 App 的基础操作内容，更要深度剖析其在多元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技巧。在智能批改作业软件培训期间，指导教师依照大学思政课评分标准设置好批改规则，对学生答题报告作深度剖析，精准掌握学生在复杂理论理解上的难点，进而调整教学的关键重点。对于科研数据库，应介绍针对思政学科的资源分类及高级检索技能，协助教师获取前沿学术资料，支持教师挖掘教育类 App 在组织社团活动、实施课外调研等方面的功能，例如借助 App 的线上调研功能，引导学生针对思政热点展开社会调查活动。

河南部分高校紧跟数字化时代发展，依托教育技术中心与其他学院协同联动，定期开展“思政 + 信息技术”融合专项培训。教师借助智能备课软件，从海量资料中筛选出贴合课程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等，丰富教学内容。通过对学生线上学习数据的分析，发现部分学生对复杂历史事件的时间线理解困难，教师便针对性地制作时间轴图表，帮助学生梳理知识。教师凭借科研数据库检索方法，找出跨文化思政教育的相关论文，将其融入课程，学生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宽，提高了学生思政学习的积极性[4]。教师还借助教育类 App 的互动效能，实施线上思政案例研讨活动，召集学生分组开展案例分析与辩论，借助实时线上交流实现观点交锋，深化学生对思政理论的把握与运用。采用虚拟仿真技术构筑红色革命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岁月，沉浸式教学模式明显强化了思政课堂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二）构建科学整合体系，强化新兴资源整合与利用能力

面对多元且新兴的各类资源，高校应采用常态化的讲座培训及学术研讨手段，助力思政教师更新资源整合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筛选整合体系。教师应依照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结合思政学科发展态势及学生认知规律，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科研数据库资源及教育类App素材开展分级分类核查。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辨别上，教师必须严格依照学术规范，在内容的逻辑连贯性、价值观指向、事实确切性等维度做交叉核实，防止算法偏差产生的错误信息及价值误导。就教育类App中的案例素材而言，则需评定其思想的深刻程度、现实的指导作用及学术的启发意义，保障素材可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资源整合的实施阶段，教师应把思政学科知识体系、教学大纲作为框架，借助结构化思维对多源资源展开梳理与重塑，依靠建立知识纽带、设计教学逻辑线索，形成条理井然、逻辑严整的教学资源体系，促成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学的育人实效。

以某高校的思政教师为例，在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时，教师从网络上搜集了多个高校关于该课程的精品教学视频片段，筛选出讲解清晰、案例生动的部分，整合进自己的教学课件中；也借助人工智能写作工具创作案例素材，且通过官方数据、学术报告做进一步核实完善；也有教师对App中的优质讨论话题与实践方案进行筛选。经过集体研讨，团队把这些资源统筹成系统教学方案，学生先开展对理论的学习，然后对案例展开分析，最后参与到App线上辩论与实地调研中，可以大幅提升理论分析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融入信息化技术的师生合作，很好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模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高涨。

（三）健全多维支撑体系，完善保障与激励机制

高校应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化教学的资源投入，构建高速稳定的校园网络环境，采购先进的教学设备，创建功能完备的在线教学平台和资源共享库，为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提供软硬件方面的支持[5]。同时，构建智能化管理体系，实现教学设备的远程查看与维护，保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可使用状态。建设合理的激励模式，把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成果纳入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体系，对信息化教学中表现出色的教师给予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激发教师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在动力。此外，依靠优化课程设置、推行教学任务协同办法，恰当安排教师教学工作，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进行培训、开展信息化教学研究预留空余时间。

部分高校为激励教师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法。就保障工作而言，学校投入专项资金，升级校园网络带宽，确保线上教学流畅。学院教师配备了高清摄像机与智能录播系统，方便教师录制优质教学视频。搭建了思政课教学信息化平台，教师可在平台上进行备课、授课、布置作业、开展教学评价等。设立“思政课信息化教学创新奖”，对获奖教师给予奖金方面的奖励[6]。把信息化教学成果增添到职称评审加分项目，另外定期举办优秀教学案例分享会，促进教师间经验的互鉴，进一步促进教师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自主性。通过这些措施，高校教师参与信息化教学的积极性出现大幅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实现显著跃升。

四、结语

数字化时代为思政课教学赋予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思政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思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是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思政课教学信息化现状进行系统概述，清晰地认识到当下存在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欠佳、新兴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能力薄弱、持续学习的动力与优质资源严重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本文从分层分类开展专项培训、构建科学整合体系、健全多维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

这些策略的实施，能够切实帮助思政教师突破数字化教学的瓶颈，全面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让思政课堂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展现出更大活力与魅力。思政教师应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加科学合理地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新人，同时，高校也应构建完善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为思政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有力支撑，共同推动思政教育在数字化时代稳步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谢刚 . 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J]. 教育信息化论坛 , 2024(15): 15−17.

[2] 孙艳艳 .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J]. 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 2024(06): 109−112.

[3] 王串 . 数字化时代下高校思政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J]. 世纪桥 , 2023(07): 52−54.

[4] 刘梅雪 , 徐恩芹 . 数字化时代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策略研究进展 [J]. 教育进展 , 2024, 14(08): 930−935.

[5] 曾平 , 陈海英 , 张萍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公共基础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J]. 中国新通信 , 2024, 26(20): 92−94.

[6] 左莹莹 . 高校教师教学理念创新及能力提升探索——评《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 2022, 42(21): 254.

（作者系郑州西亚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的优化思路

侯霁洋 徐浩茗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数字赋能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中发展新动能和开拓新领域的重要突破口，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的路径选择与数字化信息网络不断革新的时代背景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直接融入学生的所思所想，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三观”，种好思想政治教育责任田，就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的支持，实现思想政治“所教”和“所学”精准化对接“所需”和“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的理念也就应运而生。本文围绕“以精准思维抓落实”的理念，探讨如何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虚增实，有效规避网络视野下的思维固化和路径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大学生群体对于主流思想价值观的认同，打造出令校、师、生三方持续受益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方式。

关键词：大数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

一、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内涵生成和基本理念

（一）内涵生成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根植于人工智能时代下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学校教育领域的持续渗透后引发的思政教育活动中矛盾关系的转化。大数据在各个领域持续深入的态势并非一个简单的技术现象，而是一个反映了社会快速变革的镜像。针对这种变化，早在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就吹响了教育信息化革新进程的号角。自此之后，在教育领域持续开展教育信息化变革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革新与发展也成了大势所趋，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所指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

（二）基本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就是在精准思维的指导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大学生个体特征的全面了解与思想困惑的准确解读，有的放矢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化供给，促进大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1]。精准化供给在技术支撑方面，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收集、资源平台的建设、海量信息的解析。在时空范畴方面，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单一或者固化的思维定势，选择固定的时间，而是要善于发现或者营造时机，把握思想教育关键节点，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增加思想教育自由支配时间，提升时间安排的灵活性。在教育者方面，理论创新要保持深度，向受教育者传授有理有据、生动具体的教育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要素特点和运行逻辑

（一）要素特点

1. 教育信息的可视化

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数据可以对学生的基础数据、资源数据、评价数据等进行挖掘和分析，得到教育对象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指标的量化数据，从而为教育者作出科学决策[2]。另一方面是教育结果的可视化反馈，大数据的优势在于数据处理之后的价值互动和价值反馈功能，利用大数据采集海量的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评价结果的数据转化，而可视化分析工具的设计是“数据驱动教育教学”的核心，而且能通过放射层次结构、热力图、个人画像等方式直接呈现出多层次的教育评价结果，使教师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所有教育教学数据，深入理解并分析数据的趋势、差异、关联等信息，直观地看到与学习者相关的多个属性或变量的变化关系[3]。

2. 精准供给的高效性

一方面是在前沿科技的支持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种单向教育信息传递的主次关系，更倾向为一种由教育教学活动构成的协作伙伴关系，师生之间构成的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保证了双方沟通的高效性，在这种关系下，教育对象的教育主体地位没有变化，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还在成倍地发挥作用[4]。另一方面是现代化技术群落的发展造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便捷性，在大数据助力下所带来的信息传导功能的强化为教育者带来了更

加快捷和便利的资源供给，学校各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合作协同的持续增强，有效规避了无效与重复供给的问题，同时，依据数据图谱能够优化内容供给策略，通过智能推荐技术降低供给成本，并运用智能管理系统减少内容供给中的潜在风险。

3. 内容供给的针对性

一方面是教育目标的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技术支持为基础，那么就难以避免由互联网双面性所引起的数据泡沫和数据陷阱，这也要求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大方向，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持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抓好“新时代铸魂工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努力使思想政治通过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的多重教育场景的重建让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破解了众多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在数据的构建过程中，对学生个人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融合分析，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思想价值困惑，通过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的多重教育场景重建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5]。

（二）运行逻辑

1. 教育对象精准成像

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式多是基于对于一定年龄阶段、教育环境和社会发展与思潮而形成较为笼统的观念，进行模式化的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来研判学生的思想政治需求具有较强的单薄性、主观性、迟缓性，难以实现对每个目标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而精准化学生用户图像就是将涵盖学生学习与生活、课上与课下、思想与情感等方面的信息全部掌握，必要时对学生的思想困扰和问题情景进行细节性把握，以及对学生提供符合个性特征和发展需求的思政教育，如此对教育对象进行精准的用户识别与画像，为以后的精准化施教奠定基础。

2. 数据信息精准匹配

在前期对学生进行精准画像的基础上，立足于学生的具体状况，从海量成像资源库中选取案例与个体进行对比与匹配，找寻与目标对象相似或者相同的案例。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找出学生的共性问题，将多种场域的资源内容有效整合，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如今无论什么时间、什么社会场所都会生成教育内容资源，建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大数据一体化平台就是以学生为核心，不断收集多种场域下的各种信息，在拥有海量类型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地分类、筛选，将其样本化、智能化，再根据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实施个性化解决方案[6]。

3. 教育内容精准供给

通过信息的匹配将具有针对性和最优化性的解决方案以合适的形式提供给学生。在供给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及时，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对学生行为或文本数据同时抓取、持续追踪、实时更新，从而减少师生间“信息时差”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教育内容。其次是要适度，在对学生进行教育供给时，要把握好教育力度，在个性化教育方案的选择过程中要经过反复地推敲与研判，努力使一次的教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4. 教育结果精准评价

对教育对象和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精确预测和全面评价，同时基于不同教育对象的各阶段问题与变化趋势，为接下来的思想教育工作提供最具价值的问题反馈，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个案与普案相结合的方式对教育结果进行精准评价，实现了经验化到技术化、粗略化到精准化的转变。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的优化路径分析

1. 搭建数据平台，提升治理效能

要想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精准化教育，就要实现对目标资源的充分获取，从复杂庞大的数据中提取出具有价值的数据，再进一步深入挖掘各种数据间的交叉性与规律性，才能实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因此建设一个综合数据平台就成为实施精准化思政的基础性工程。通过制定数据的收集标准和规则、建立大数据底座、建设智能化应用、构建多级联动机制实现多种教育平台的对接。将大数据技术深度运用于学生思政工作中，并将其纳入学校信息化建设大局，切实做到数据应采尽采、能汇即汇，实现一次采集、一库管理、多方使用、即调即用，为开展精准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综合数据平台的建设，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平台不断提升精准识别水平，实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通过深度挖掘学生上网行为数据，掌握学生喜欢的网络资源、关注的社会热点、访问的站点规律等，通过文字、图表等形式，自动生成学生上网主题报告和上网行为报告。既对不同学生群体进行分析，了解整体状态，也对学生个体进行画像，做到一人一像。每年开展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纵向与历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横向与兄弟高校、全国全省情况进行比较，全景化呈现学生思想政治动态。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平台全面整合校园数据，并以智能化、实时化和易用性为基础设计要点，适应当下大数据领域技术发展趋势，提供多功能的平台应用，其设计与开发具备多元化的特点，并根据教育者内容需求提供灵活可扩展的内容产品和定制化服务。

2. 提升供给质量，精准对接供需

“举什么样的旗，决定了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了能否走好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想要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供给，就要把牢政治方向，牢固树立育人使命，也就是要在教育大方向上做到绝对的精准，具体而言就是要始终以供需精准对接为主线，

通过学生需求引导教育供给创新[7]。一是精心组织教育内容，围绕大学生思想特点、兴趣与诉求，针对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学习投入深度不足、深层认知相对较弱等问题，精心挑选教育内容。利用大平台为学生提供高活跃度和高黏性的内容，以个性化教育引导路径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提高网络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8]。二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构建起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工作体系，加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深度挖掘各学科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教育价值，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巧妙融入专业教学之中，以丰富和提升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增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配合融通，推动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充分发挥社会大课堂育人作用。不断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和平台，充分利用高校专家学者多、师生集中的优势，加强理论宣讲，营造良好的理论学习氛围。在这个系统里，各个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配合与协调等要求对所有教育主体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

3. 强化育人素质，建设育人队伍

大数据一体化平台的搭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供给提供了技术保障，但是，只有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目标，需要有掌握技术的教育者和管理者来完成专业化的信息与数据的挖掘、采集、筛选、分析、整合和运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和管理者的数据素养、技术能力素养、信息媒介素养和思维能力素养都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攻坚内容能否推动文化创新精品顺利转化[10]。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作为新生形态就需要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单位齐抓共管、同向发力，最后呈现出整体性繁荣发展的局面[1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供给绝不是单独一位教育者所能开展的活动，而是需要整个校园内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各取所长、齐抓共管形成强大的合力，通过充分发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文化、组织等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教育和引领作用，着重抓好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形成人人关注、人人拥护、人人投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 王莹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精准化探赜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 2025, 46(01): 135−139.

[2] 牛义锋 , 叶珺 , 徐秀珍 . 基于大数据画像的精准化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研究 [J]. 中国教育信息化 , 2024, 30(11): 95−102.

[3] 刘敏畅 , 王甲成 , 丁一 . 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现实路径 [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 2024, 26(04): 69−74.

[4] 廖斌斌 . 新媒体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应用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 [J]. 林区教学 , 2025(03): 23−26.

[5] 程仕波 , 余扬扬 .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方法发展的技术向度 [J]. 教育评论 , 2025(02): 47−56.

[6] 刘倩婧 , 岳国伟 , 徐昊昊 . “一三六”体系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5(06): 1−4.

[7] 刘炫志 , 黄照新 , 付周赟 . 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J]. 大众文艺 , 2025(03): 204−206.

[8] 胡景谱 , 谈传生 . “基础 + 主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路径与创新价值——基于 C 大学的实践探索 [J]. 当代教育论坛 , 2025(01): 83−90.

[9] 左尚瑜 , 胡恒钊 , 杨志勇 .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J]. 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 2025(03): 24−27.

[10] 邓剑波 .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与创新：理论逻辑、现实意义与实践路径 [J].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5, 24(02): 115−119.

[11] 张秀娟 .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政教育路径创新探索——评《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 2025(06): 1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智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究”（2025SJSZ0848）。

（作者：侯霖洋，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徐浩茗，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助教）

强党建之基 固思想之本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辅导员思政教育模式探索

李　倩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他们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生涯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学生多样化的需要，校企合作为高职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辅导员可以把思政教育和职业素养结合起来，向学生提供更贴近生活与职业、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这一模式既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又可以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全面提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校企合作；高职辅导员；思政教育模式

思政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认同度不高，教学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校企合作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为高职院校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与企业的密切合作，高职院校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在思政教育中融入企业文化、价值观、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建立思政教育与学生的生活、职业之间的联系。这一模式既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又为高职院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思路。

一、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辅导员思政教育模式特点

（一）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结合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传授理论知识，学生掌握知识、运用能力较弱。而校企合作模式则是将高校思政教育从课堂教学中解放出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以企业为实习基地，可以使学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目的[1]。二者相结合，既能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与实践能力。通过在企业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到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理解。

（二）职业导向性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职业素养紧密结合。校企合作模式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把企业的职业规范和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之中，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得到与职业发展紧密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而且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与责任感。通过去企业实习，学生可以直接接触到企业的生产过程、管理制度、文化等，对职业素质的重要性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三）多方协同与资源整合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于学校内部的教师和教学资源，而校企合作的模式打破了这一局限，将学校、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2]。校企双方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明确校企双方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责任与任务，共同制定培养目标与内容。企业除提供实习基地外，还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指导、管理思政教育，并向学生提供实习案例及经验交流。同时，行业协会、社区等社会资源也可参与思政教育，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学习平台与实践空间。

（四）动态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变迁，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校企合作模式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与行业发展趋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进行调整与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与时俱进。同时，应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思政教育贯穿了学生从入学、毕业、实习、就业的全过程，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动态、可持续的特征，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企业的发展变化，又能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和激励，使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二、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辅导员思政教育模式应用

（一）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明确校企双方职责

成立校企联合思政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辅导员和企业代表组成，定期召开联席会议[3]。学校方面，辅导员负责制定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案，负责学校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并对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进行反馈。企业根据行业特点和岗位需要开展思政教育实践活动，选派资深员工担任校外思想政治辅导员，引导学生把思想政治理论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双方共同制定思政教育的目标、计划和评价机制，保证思政教育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防止教育内容脱节，责任不清。

例如，高职院校可结合当前智能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多家智能制造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成立校企联合思政育人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开学前，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本学期思政教育工作。在方案制定阶段，学校辅导员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特征，提出本学期思政理论教学的重点，如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企业代表针对产业的人才需求，指出在智能制造领域，员工需要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学习新技术的热情。双方联合策划智能制造项目实习思政课程。在活动开始之前，学校的辅导员就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如工匠精神、创新思维等，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企业将选派资深工程师担任校外思政辅导员，在学生进入企业实习之前，对其进行专题培训，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流程、质量标准和岗位规范进行详细的讲解，使学生能够初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在实施过程中，校外思政辅导员对学生进行分组，并进行分工。如学生在完成生产任务的过程中，遇到设备故障和技术难题，通过这种方式，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团队精神，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责任心。同时，学校辅导员还定期走访企业，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实际工作中的思想动态，解答学生在思政方面的困惑。项目完成后，校企双方将共同制定考核标准，从任务完成质量、团队合作绩效和思政理论应用四个方面来评价学生。在这样的协同育人机制下，学生既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又能深刻认识到思政教育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连贯性和实效性。

（二）开发思政实践项目，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应结合企业实际案例，开发具有思政教育功能的实践性课题。高等职业学校辅导员要与企业辅导员合作，将项目分解，设计符合学生学习阶段的学习任务。在课题实施之前，由导师做好理论知识的铺垫工作，由企业指导老师讲解课题背景及操作规范[4]。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把团队精神、诚实和敬业精神等思想融入教学实践中。项目完成后，双方将联合开展成果汇报和评估，引导学生对思政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进行反思，进而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思政意识。

例如，高职学院可与多家旅游企业合作，开展“文旅融合宣传推广”的思政实践活动。在项目筹备阶段，学校辅导员在课堂上讲授文化传承和旅游服务规范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对文旅产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活动导师为学生讲解时下热门的旅游、旅游项目案例，剖析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某一区域的文旅融合宣传推广方案。小组成员首先实地考察，深入当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并与当地居民及旅游从业人员进行交流，搜集第一手资料。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学生把文化自信、服务社会等思政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思考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地方文化。然后，学生利用自己学到的旅游策划和新媒体运营方面的知识进行宣传策划，内容包括线上、线下的各种宣传方式，如制作短视频、撰写微信公众号与微博内容、设计海报等，创作时，学生注重团队合作，取长补短，精益求精。项目完成后，学校和企业组织成果展示，每一组都以PPT、录像等形式进行宣传活动。企业指导教师与学校辅导员分别从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以及思政教育的融合性三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估。学生们通过参加此次活动，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旅游专业素养，同时也可增强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在接下来的实习与工作中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与思想意识。

（三）打造“双师”队伍，提升思政教育能力

学校应定期组织辅导员到企业实习，以加深对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理解，为辅导员实践教学提供素材。同时，可邀请企业思政工作人员来学校进行专题讲座和培训，分享成功的企业思政工作经验和做法[5]。另外，通过搭建“双师”交流平台，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密切联系，共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建立一支既懂思想政治理论、又熟悉行业实际的“双师”队伍，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例如，为建设“双师”团队，高职建筑工程学院可与众多施工企业进行合作。每个学期，学校都会选派指导教师到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实习，并全程参与项目的实施。在某大型住宅小区建设项目中，辅导员进入项目组后，要参加企业组织的安全培训及项目交底会，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施工方案。在工程施工期间，辅导员跟随施工团队深入现场，详细了解基础处理、主体结构、装修等各环节的施工工艺及工作流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结合施工过程，对辅导员进行质量、安全、团队合作等方面的培训。如一次浇筑混凝土时，因操作不当，造成混凝土开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利用这个机会，组织现场研讨，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

突出质量意识的重要意义，使他们对如何把思政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定期到学校举办讲座，在一次讲座中，企业员工分享如何利用团队合作、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保证工程按期完工的体会。另外，学校和企业之间还可以搭建一个线上沟通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导师可以针对学生思政工作中遇到的诸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团队合作能力不强等问题进行共享。企业思政工作者分享了在管理者工作中遇到的相似问题，双方共同探讨解决办法。通过这些措施，学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具体的案例结合起来，使思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整合多元资源，创新思政教育形式

可利用网络技术，构建校企两级思政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学校和企业的思政教育。学校上载思政理论课程资源，企业分享优秀的企业文化、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故事。职业院校辅导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网上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和交流[6]。同时，与线下企业参观、主题班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思政教育模式，通过制作短视频和撰写宣传文案等方式，鼓励学生参加企业思政宣传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例如，高职信息技术学院与众多网络企业建立思政资源共享平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学校上载大量的思政理论课程资源，主要有教学录像、课件和案例解析等。企业提供文化宣传片、员工创业故事、项目发展经验分享等。学校辅导员利用平台开展线上思政教育，围绕“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主题，组织学生们在网上讨论。学生借助自己搜集到的互联网企业帮助乡村振兴、推动科技创新、参与公益事业等案例进行了交流，并与思政理论相结合。如某互联网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解决滞销难题，引起学生的热烈讨论。同时，指导老师布置离线作业，以小组为单位参观网络企业，在参观期间，学生可对该企业的运作模式、研究与开发过程以及文化氛围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企业员工也向学生介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如研发环境友好的软件、进行网络安全教育等。参观结束后，学生分组制作了短视频，展示网络企业的正能量。学生利用他们学到的影像制作技巧，精心策划，拍摄及剪辑影片。线上线下结合，可以使学生对思政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程度，扩大思政教育的影响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高职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仅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校企合作模式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健全校企合作机制，创新思政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主导作用，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善云 . “大思政课”理念下高职辅导员能力发展现状与对策探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4, 40(11): 173-175.

[2] 焦慧洁 . 高职院校辅导员谈心谈话模式重构与实施路径——基于大思政视角 [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 23(05): 73-75.

[3] 陈平 .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一站式”学生社区辅导员育人模式的构建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中旬刊), 2024(09): 209-212.

[4] 马骄 .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体系构建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4, 37(11): 94-95, 98.

[5] 胡静 . 新时代高职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探索 [J].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 23(02): 98-101.

[6] 时雪丽 . 短视频时代高职辅导员网络育人的路径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 2024(16): 165-168.

（作者单位：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校企协同育人 思政赋能成长

基于课程思政的最大无关组教学设计

朱星星 张宇轩

摘要：在“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中，学生普遍对其中的最大无关组的概念难以理解和掌握。为帮助学生理解此概念，本文探索将最大无关组的概念与学生的职业目标相结合，让学生能够利用实际情境主动学习并掌握此概念。这种虚实结合的教学方式拉近了数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线性代数学习与现实生活的壁垒。同时，本文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素养，并且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培养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线性代数；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向量组的秩；职业

一、概述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教育的重要指示，各高校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各门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发展，形成教育的合力[1-3]。然而，理工科课程由于其固有的自然认知特性，相较于人文社科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面临更多挑战。

“线性代数”作为工科和管理类本科生的必修基础课程，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但由于其抽象的学科特征，导致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部分知识点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如何在“线性代数”教学中自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数学教育者面临的一大考验。在“线性代数”的教学中，“最大无关组”是一个基础并且关键的概念，理解并灵活应用此概念，对于学生后续学习“线性代数”这门课程并形成自己的知识框架有重要意义。探索将思政元素与“线性代数”教学相融合，对持续提升“线性代数”的教学效果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长远意义。

二、教学过程

本节课将采用“实例引入—抽象归纳—求解方法—思想推广”的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形象地理解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的概念。首先，通过讨论社会现象，引入生动的职业目标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自身职业发展规划进行认真思考，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得“线性代数”学习具象化。其次，从所举的实际案例中提炼出最大无关组的定义，然后给出求解向量组最大无关组的通用方法。最后，通过三原色的例子来进行思想推广，强化最大无关组与矩阵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线性代数”的核心思想，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一）引入环节

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播放一段“抓周”视频来展示中国传统风俗，引导大学生进行思考：“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将做出怎样的职业选择？”将“线性代数”的学习巧妙地与学生自身职业发展相结合，以此激发学生们树立将所学知识投身祖国建设的远大志向。同时占领宣传主阵地，教育学生珍惜大学时光，远离享乐主义，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个人能力。鼓励学生心怀远大理想，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紧接着，利用学生自己心中理想的职业，来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假设我们班一共有 40 名同学，每名同学只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统计出班级一共有 25 种不同的职业。如果要涵盖班级中所有的职业，至少需要多少名的同学参与？”通过讨论学生很容易得出，如果每位同学代表一种不同的职业，则至少需要 25 名同学的参与。

设计目的：通过数学问题，将知识点和学生未来发展相结合，使学生在课堂中兼顾知识理解和对个人发展的思考。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对受教育的学生产生有利的深远影响。

（二）引入定义

1. 直觉定义的形成

教师可以把教学的班级视为向量组，每个向量则相当于班级中的一名同学，来形象地解释线性相关性的概念。具体来说，如果班级中的两名同学选择了相同的职业，我们可以将这个班级视为在职业选择上是“相关”的；如果没有同学的职业选择重复，那么这个班级在职业选择上就是“无关”的[4]，基于这种直观的理解，我们可以将班级中的 25 名同学视为构成了一个最大的职业“无关组”，这正是向量组最大无关组概念的直观体现。

设计目的：将数学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实际情境引入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概念，使得线性代数的概念具象化，通过类比日常生活的概念使学生加快对

抽象数学概念的理解掌握，对线性相关性的概念形成初步认识，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在无形中锻炼和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让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自觉地使用数学思维。

2. 向量组最大无关组的严格定义及理解

在直觉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再次利用班级中学生的职业选择进行举例：班级中一共有 40 名同学，每名同学只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统计出班级一共有 25 种不同的职业，这 25 名同学就构成了一个职业“无关组”。则在班级中任 26 名同学中，至少会有两名同学选择相同的职业，此时该班级成为“职业相关”组。用数学语言可叙述为，一个向量组中有 25 个向量线性无关，从向量组中其余向量中任挑一个向量加入这 25 个向量的向量组，则这 26 个向量是线性相关的。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给出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的严格定义。

定义 1[5]91：在向量组 A 中选出 r 个向量 a_1，a_2，…，a_r，满足以下条件：

（1）向量组 A_0：a_1，a_2，…，a_r 线性无关；

（2）向量组 A 中任意 r+1 个向量都线性相关。

则称向量组 A_0 是向量组 A 的最大无关组。

最大无关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该向量组中包含的“最大个数的”线性无关向量组。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最大无关组的概念，教师引导学生从向量组最大无关组的定义中直接推导以下结论：

（1）一个向量组线性无关，则其最大无关组是该向量组；

（2）ε_1，ε_2，…，ε_n 为 R^n 的一个最大无关组。

为了加深学生对最大无关组概念的理解，教师可以设计如下例题。

例 1：求向量组 A：

$$a_1=\begin{pmatrix}1\\0\\0\end{pmatrix},a_2=\begin{pmatrix}0\\1\\0\end{pmatrix},a_3=\begin{pmatrix}0\\0\\1\end{pmatrix},a_4=\begin{pmatrix}1\\1\\0\end{pmatrix},a_5=\begin{pmatrix}1\\1\\1\end{pmatrix}$$ 的一个最大无关组。

解由定义，a_1，a_2，a_3 或 a_1，a_2，a_5 等都是所求最大无关组。

设计目的：通过例题让学生发现，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可能不唯一。但向量组中两个不同的最大无关组中所含向量个数一样。这一点类似于班级中 40 名同学，每名同学只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统计出班级一共有 25 种不同的职业。尽管这 25 名同学的选择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最终的人数是固定的 25 人。通过这种类比，学生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最大无关组的概念。

3. 向量组秩的概念

通过结合最大无关组的概念和之前学习的向量组等价的知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证明向量组最大线性无关组的一些重要性质：

性质 1[5]92：向量组与其最大线性无关组等价。

性质 2[5]92：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之间全都等价。

性质 3[5]92：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所含向量个数是确定的。

最大无关组的价值在于通过掌握部分向量从而把握全局，它与原向量组等价，故最大无关组的实质是以部分代整体。从而最大无关组所包含向量个数是确定的数字，这个恒定的数字特征被称为向量组的秩。由此给出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的等价定义和向量组的秩的定义。

定义 2[5]92：若向量组 A 中能选出 r 个向量 a_1，a_2，…，a_r，符合以下条件：

（1）向量组 A_0：a_1，a_2，…，a_r 线性无关；

（2）A 中任一向量都可由 A_0 线性表示，则称 A_0 是 A 的一个最大无关组。

并且称 A_0 所含向量个数是向量组 A 的秩，记为 R_A。

通过理解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与秩的概念，类比到学生未来对于自身的职业选择，从而引导学生提升自己个人水平，努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这样在未来的个人发展过程中，不会成为可以被替代的人，培养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设计目的：在讲解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和向量组的秩的概念时，如果先给出定义 2，学生很难体会到最大无关组中“最大”两个字的含义，同时也可能难以理解向量组“秩”的概念。

（三）求解方法

从例 1 的多种答案中可以发现，最大无关组按列构成的矩阵是行最简形矩阵。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步骤找到一个非零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首先，将向量组的列向量按列排列成一个矩阵，接着使用初等行变换将得到矩阵简成行最简形矩阵。这个方法能够正确的原因是：初等行变换不会改变列向量间的线性关系。通过行最简形矩阵，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最大无关组。同时，行最简形矩阵还能揭示向量组的秩的内涵，即行最简形矩阵中不用全为零的行的行数，亦即向量组中线性无关的向量的最大个数。同时，从行最简形矩阵还能发现，对于向量组中的任一向量都能由最大无关组线性表示。这种求解方法不仅找到一个非零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同时得到向量组的秩以及用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来表示其余的每一个向量。

例 2[6]：某商家利用四种谷物，通过不同配比方式制作出四种不同的营养餐（A~D），每种营养餐的成分需求见表 1，现在营养餐 C 和营养餐 F 脱销，能否用其余四种营养餐来配制营养餐 C 和营养餐 F？如果可以，怎样配制呢？

分析将每种营养餐看作一个 7 维列向量，则表 1 即为 6 个 7 维列向量，记作 A:a_1，a_2，a_3，a_4，a_5，a_6，问题的实质在于找到向量组 A 的最大无关组。

表 1

	A	B	C	D	E	F
黑芝麻	5	3	11	0	5	14
红豆	12	0	12	25	35	60
黑米	25	5	35	5	35	55
核桃	7	9	25	5	15	47
枸杞	1	2	5	25	0	33
红枣	10	2	14	12	20	38
燕麦	8	2	12	0	2	6

解将向量组构成矩阵（a_1，a_2，a_3，a_4，a_5，a_6），化为行最简形，

$$\begin{bmatrix} 5 & 3 & 11 & 0 & 5 & 14 \\ 12 & 0 & 12 & 25 & 35 & 60 \\ 25 & 5 & 35 & 5 & 35 & 55 \\ 7 & 9 & 25 & 5 & 15 & 47 \\ 1 & 2 & 5 & 25 & 0 & 33 \\ 10 & 2 & 14 & 12 & 20 & 11 \\ 8 & 2 & 12 & 0 & 2 & 6 \end{bmatrix} \rightarrow \begin{bmatrix} 1 & 0 & 1 & 0 & 0 & 0 \\ 0 & 1 & 2 & 0 & 0 & 3 \\ 0 & 0 & 0 & 1 & 0 & 1 \\ 0 & 0 & 0 & 0 & 1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end{bmatrix}$$

从行最简形不难得到向量组 A 的一个最大线性无关组 a_1，a_2，a_4，a_5。营养餐 C 和营养餐 F 的配制方法为 $a_3=a_1+a_2$，$a_6=3a_2+a_4+a_5$。

设计目的：学生能够将实际问题抽象化，并以适当的数学模型求解，最后将数学模型求解的结论还原到实际问题中，从而解决问题。

（四）思想推广

为了加强学生对向量组最大无关组和向量组的秩概念的理解程度，我们引入三原色原理。三原色是红色、绿色和蓝色，它们不能用其余颜色混合得到，但反过来，其余所有的颜色都可用这三色混合而得。三原色原理与向量组中最大无关组的含义十分相似，可以做类比，三原色无法通过彼此混合得到，可以认为它们是线性无关的。在向量组中，最大无关组中的向量不能通过最大无关组内的其余向量线性表示，这与三原色的性质相呼应。所有颜色可以通过三原色的不同组合混合得到，这时可认为颜色空间的秩为 3。类似地，一个向量组的秩是最大无关组中所含向量的个数，这决定了向量组能够“覆盖”的“空间”大小[7]。

设计目的：通过将抽象的线性代数概念与学生感兴趣的现象结合使知识更形象化，让学生真切感受到线性代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实现学以致用，明白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的数学概念。通过引入学生熟悉的三原色原理，使学生明白数学概念的学习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使学生体会学习的乐趣，同时培养学生在多学科间建立知识体系的能力，努力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图像处理、视频设计等其他领域，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创新教学设计，在新课引入时，利用与中国传统风俗“抓周”有关的视频激发学生兴趣，打破传统的课程引入方式，进而引导学生思考理想中的职业，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风俗和三观教育融入“线性代数”课程中。这种和学生密切相关的教育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学生学习数学课程的手段，对培养适应当今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通过将所在教学班级比作向量组，将班级中的每位同学视为向量组中的一个向量，引入“职业相关”与“职业无关”的概念，进而提出“班级最大职业无关组”的概念。这种形象的且和学生自身相关的比喻把抽象的数学概念更加具象化并增加了其趣味性，能减少学生学习数学概念时的畏难情绪。这种对于教学方式的创新不仅帮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公理化的本质，而且提高了学习定理的兴趣，对启发学生采用类似的方法理解抽象数学概念有一定借鉴意义，能助力学生在未来专业学习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2016-12-09(01).

[2] 何巍，陈建龙.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的设计与实践 [J]. 大学数学，2021, 37(05): 47-51.

[3] 赵东红，魏海瑞，刘林. 大学数学公共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初探 [J]. 大学数学，2021, 37(03): 13-17.

[4] 何俊，刘如玉. 向量组线性相关性理论的一种解释 [J]. 高等数学研究，2015, 18(02): 53-56.

[5] 同济大学数学系. 线性代数 [M]. 6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 马荣. 基于问题导向的极大线性无关组教学设计研究 [J]. 高教视野，2021(14): 4-5.

[7] 王发兴，郑莹. 浅谈线性代数微课设计——以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与秩为例 [J]. 大学数学，2020, 36(02): 77-8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信阳农林学院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项目（GGJCKSZTDLX-202402）；2025 年度信阳农林学院精品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2025TSKC004）。

（作者单位：信阳农林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宋季倪

摘要：在“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本研究通过对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度解析，系统探讨“大思政”与劳动教育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拓展多元实践平台、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等，以期为推动高职院校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关键词：大思政；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教育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在“大思政”视域下，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并系统探索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大思政”与劳动教育的内在联系

（一）“大思政”为劳动教育提供价值引领

“大思政”秉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以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恪守科学的劳动观念，在“大思政”教育开展期间，可以实例增强体悟，比如讲解铁路工人巨晓林，在铁路电气化建设的前沿一线，面对复杂又棘手的施工难题，以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依托，不断学习、刻苦探究，参与到多项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中，创新施工工艺，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添一份力，带动中国铁路建设迈向新层级。依靠这样的案例，学生可深刻认识到劳动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分别[2]，每份劳动都在为社会进步添砖加瓦，进而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大思政”也勉励学生在劳动中积极求新，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功夫，以契合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劳动教育丰富“大思政”的实践内涵

劳动教育是“大思政”关键的实践载体之一，依靠劳动实践，学生可以亲身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透彻理解劳动的价值及意义，由此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及践行水平[3]。

以校园志愿服务劳动为例，学生参与图书馆书籍整理、校园环境清洁等活动，在劳动实践中领悟劳动成果的产出，同时也懂得了珍视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一来，学生不只是增进了自身的劳动本领，还塑造了团队协同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和真诚守信品质等。这些大量的实践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了鲜活的素材，让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挂钩，极大地丰富了“大思政”的实践内涵。

三、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高职院校对劳动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存在看重技能培育、忽视劳动教育的倾向，劳动教育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常被放置到边缘地带，课时安排较少，部分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课每周仅安排 1~2 课时，远远不能适应学生对劳动教育的需求；在实际教学期间，劳动教育内容及方法相对单一，缺乏具体针对性和实际成效，多数劳动教育课程仅停留在理论讲授层面，实践教学环节强度欠佳，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难以达成预期的教学成果。

（二）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师资普遍存在人员较少、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许多教师缺乏系统的劳动教育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难以高效开展教学工作。由于劳动教育地位被边缘化，教师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也不高，在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等范畴内，与其他专业的

教师比，劳动教育教师没有对等的长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教学工作的热情与主动性。

（三）劳动教育实践平台匮乏

劳动教育实践平台建设滞后情况较为明显，难以及时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一些院校虽已搭建起实习实训基地，但一般会侧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欠佳，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同样存在诸多难题，诸如合作企业积极性不足、实践内容单一等。

（四）劳动教育评价机制不健全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尚不完善，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价标准与办法，评价内容主要聚焦于学生的劳动技能和成果，经常忽略学生的劳动态度等方面。在部分高职院校开展的劳动教育评价里，仅以学生完成劳动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去评定分数，忽视了学生在劳动期间的表现、态度以及思想层面的进步。

除以上情况外，评价主体过分集中到教师一方，学生互评、企业点评等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未被充分采用，导致评价体系呈现单一状态。

四、“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系统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1. 开设独立的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规划的时候，应把劳动教育添加进去，开设相应课程，明确课程的目标、所授内容及教学办法。课程体系要囊括劳动理论、劳动法规等，重点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与务实的劳动本领。

在劳动理论教学期间，可以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让学生明白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劳动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就劳动技能教学而言，结合不同专业的特性与要求，制定对应的教学内容。针对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教授客房服务、餐饮服务等相关技能；针对农业类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课程。

2. 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把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挖掘劳动教育元素，依靠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教学等方式，引领学生树立科学的劳动观念。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可以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阶段，引导学生认识劳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知识点，通过劳动模范坚守岗位、诚信劳动的案例，引导学生树立“劳动创造价值、诚信赢得尊重”的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梳理革命时期的生产自救、建设时期的垦荒拓土、改革时期的创业创新等历史脉络，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推动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

3.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全面渗透劳动教育

将劳动教育有机嵌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把劳动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有机结合在一起。教师教学时，可按照专业特点与职业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本专业的劳动特性与劳动规范，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及劳动精神。比如，在风力发电专业课程教学阶段，可以引导学生认识风力发电行业的劳动强度与劳动环境，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创新的精神。对护理专业学生，可在“临床护理实训”课程中，强调护理操作的规范性、对患者的责任心，培养学生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对计算机应用专业学生，可在编程开发、项目实践课程中，引导学生认识软件开发中的团队协作、攻坚克难精神，锻炼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时，可邀请行业一线技术能手参与课堂教学，分享岗位劳动中的实战经验与职业感悟，让学生直观了解专业领域的劳动标准与职业价值，使专业学习的过程成为劳动素养培育的过程，实现“学技能”与“育劳动精神”的双重目标。

（二）建设专业化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1. 多渠道引进专业师资

高职院校要拓展劳动教育教师的引进渠道，招入具有劳动教育专业背景及实践经验的教师，扩充劳动教育师资力量[4]。也可借助聘请兼职教师、客座教授等途径，聘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担当劳动教育教师，为学生讲授劳动技能与劳动经验。

2. 强化在职教师培训与发展

高职院校应强化对现有师资的培训，提升教师劳动教育教学的综合水平，可采用组织教师参与劳动教育培训、召开教学研讨会议、开展教学观摩等举措，辅助教师掌握劳动教育教学方法与技巧，也可动员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师的实践本领与劳动素养。

3. 完善教师激励与评价机制

高职院校应构建教师激励机制，唤起其投入劳动教育的热忱，采用设立劳动教育教学成果奖等，对在劳动教育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嘉奖，同时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方面对劳动教育教师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三）拓展多元协同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

1. 建设校内实践基地

为让学生拥有丰富的劳动实践体验，高职院校要全力推动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节奏，可以依照学校的实际情形，建设一批特色化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5]，比如搭建一个校园农场实践平台，让学生沉浸式投身农作物栽种、养护、采收的全环节，逐步掌握农业生产的知识技能，劳动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也同步得以培养。

2. 拓展校外实践基地

高职院校还要积极开辟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与企业、社区、农村等结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可创建企业实训平台，鼓励学生到企业深度耕耘，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及劳动精神；可带领学生到社区、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社区建设及乡村开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品格。

3.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高职院校可以重大节日、纪念日等为契机，推出各类与劳动教育实践举措。比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展劳动主题相关的手工创作、创意劳动场景搭建活动；可在“学雷锋纪念日”，引导学生进行志愿服务活动，践行雷锋精神，依靠实践活动，促进学生提升劳动热情。

（四）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文化氛围

1. 加强劳动文化宣传

高职院校要提升针对劳动教育的宣传力度[6]，依靠校园微信公众号、劳动主题文化长廊等多种途径，宣传劳动教育的关键意义、目标使命与实践成果，邀请在劳动领域表现出色的模范人物、技术能手到校，为学生开办劳动教育讲座，诉说个人的劳动经历，回首拼搏岁月，以此激起学生的劳动热忱，推动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

2. 打造劳动教育品牌活动

高职院校需按照自身实际情况，举办各式各样的劳动教育主题活动，发起“校园翻新计划”实践活动，学生分组参与校园里老旧设施的改建工作，实施“绿色校园行动”，学生通过校园绿植养护等具体实践逐步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念，把劳动意识融入心灵、落实到行动。

3. 支持劳动类学生社团建设

高职院校还应设立劳动教育社团组织，诸如劳动实践社团、志愿服务社团等，为学生提供更多劳动实践的机会以及相互交流的平台，学生可利用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不断打磨自身劳动技能，有效增进实践操作水平，在与同伴相互协作中扩大社交圈，结识更多志趣相投的伙伴。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劳动教育评价机制

1. 制定多维评价标准

高职院校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准则，评价范畴不仅包含学生对待劳动的态度、掌握的劳动技能、产生的劳动成果，还应考量劳动创新表现等多个维度。评价标准要有可操作性及可量化性，便于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评价客观公正，可采用百分制的评价模式，为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劳动成果、劳动创新等方面各自赋予一定分值，按照学生的实际表现予以打分，最后得出综合评价结果。

2. 推行多元主体评价

高职院校要推进多元融合的评价体系实施，包括学生自评、相互测评、教师的评价以及社会的评价，以学生自评带动学生对自身劳动过程进行复盘，借反思深化对自我的认知，获得自我成长；互评给学生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借助相互点评，增进团队成员间的协作默契，教师借助专业知识对学生劳动表现精准剖析，给予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使学生劳动技能和实践能力实现稳步提升；社会评价把学生劳动成果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加以检验，使学生了解社会期望，增强社会层面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全面提升学生劳动素养。

3.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

高职院校应把劳动教育的评价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核心指标，使其成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与学生的评优评先、奖助学金评定、推荐就业等挂钩。同时，还要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和学生，以便于教师和学生及时了解劳动教育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劳动教育教学策略，真正发挥劳动教育评价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五、结语

在“大思政”育人格局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通过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开拓多元化的实践平台、营造浸润式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健全科学化的评价机制等协同路径，能够切实提升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育人成效。未来，仍需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全过程贯穿、全方位协同的“大劳动”育人共同体，方能培养出既掌握精湛技能又具备高尚劳动品格的时代新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0(03): 2−6.

[2] 檀传宝 . 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J]. 中国教育学刊，2020(04): 1−6.

[3] 黄月细，张新科 .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路径探究 [J]. 职业技术教育，2021, 42(23): 67−70.

[4] 李珂 . 高校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J]. 思想教育研究，2021(03): 142−145.

[5] 张健 .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策略 [J]. 教育与职业，2020(14): 55−59.

[6] 刘洁 . 校园文化建设视角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创新实践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08): 78−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NZJGH2023074）。

（作者单位：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大思政课”理念内涵、特征及研究价值

曹雯欣 刘福森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大思政课”理念是对思政课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时代性深化，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创新。该理念强调，在坚守思政课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系统性拓展育人空间、汇聚多元育人主体、构建一体化育人格局，其鲜明特征体现为理论性与实践性深度融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辩证统一、时代要求与创新路径有机结合。“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与实践，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大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育人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迈入新征程”[1]，“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性、创新性教育理念，是推动思政课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为新时期思政教育改革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善用“大思政课”，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澄明其核心内涵，在实践中把握其鲜明特征，进而深刻探寻其研究价值与应用路径。

一、“大思政课”理念的核心内涵

（一）坚守“大思政课”的本质属性与战略站位

“大思政课”作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其内涵的阐释首先要基于“课程”的本质属性，立足于“大历史观”、胸怀“大视野”，对课程体系及其构成要素进行系统性优化。

树立“大视野观”，胸怀“两个大局”。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正确认识“大思政课”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意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关键作用。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具备“两个大局”的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把握时代，确保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和课程评价等要素紧跟时代趋势。同时，推进教学设计、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革新与优化，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大思政课”的教育效果与针对性。坚持“大历史观”，厚植历史根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通过生动的历史事实展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性成就，引导学生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二）构建“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育人场域

夯实“思政小课堂”主渠道。在坚守课程属性的基础上，“大思政课”着力推进育人场域的系统性重构与延展。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空间的物理边界，形成“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线上云平台”的立体化育人格局。从实体空间维度，思政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讲好“大思政课”要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思政课程体系：在纵向层面统筹规划各学段思政课程目标与内容的递进式衔接，建立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在横向层面推进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通过教学资源的系统整合与教学设计的协同创新，形成课程协同育人的倍增效应。拓展“社会大课堂”大平台。“大思政课”强调将思政课融入广阔的社会，通过挖掘社会教育资源、深化实践教学、拓展第二课堂等实现思政教育从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扩展到社会全域，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充分发挥学生社会实践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在思政实践活动中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建强“网络云课堂”新阵地。就虚拟空间建设而言，需依托数字技术构建集资源共享、教学交互、自主学习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育人平台。运用“线上云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配置，打破传统思政教学的时空限制，使虚拟场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育人场域的多维延展体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从封闭式单

向灌输向开放式实践沉浸的转变，从单一知识传授到全环境育人的变革，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广度、影响深度与育人效度。

（三）打造“大师资”汇聚的育人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2]“大思政课”理念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丰富育人主体，形成育人合力。汇聚多元育人力量。以系统思维组建大育人队伍，整合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学工队伍、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解说员、党员干部、各行业先进人物、劳模等多方力量，并辅之以专家咨询、实践导师、管理保障等团队，形成协同育人“大师资”队伍。健全教师发展机制。师资队伍要严把培训质量关，优化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培训体系，借助定期培训与考核，全面提升教师的整体素养；完善师资梯队，确保“传帮带”有效，使青年教师在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得到全方位的指导与支持；完善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优化职称评聘、评优评先机制，将教师在实践育人中的表现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形成明确的政策导向，激发教师参与实践育人的内生动力。同时，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荣誉表彰体系，设立多级别、多类别奖项，对在“大思政课”建设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这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师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战略的积极性，推动“大思政课”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支撑。

（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

“大思政课”理念强调“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已从单一的在校大学生群体，拓展至涵盖不同学段学生的大群体[3]。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是否紧密取决于各学段能否实现顺畅沟通和交流，关键在于形成全过程全方位联动的有效机制。高职院校要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强化顶层设计。一方面，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以教体局为主导，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牵引，各级各类学校政治组、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等部门参与的工作体系，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为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在科学规划教学目标、精准选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大中小学一体化实践教学活动。高职院校应统筹校内校外资源，打造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育人品牌项目，常态化开展大中小学一体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二、“大思政课”的鲜明特征

（一）理论讲授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

一方面，“大思政课”生成与发展，既根植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又立足于丰富的实践探索[4]。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思政教育工作为“大思政课”理念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大思政课”进一步深化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5]，理论性是其立身之本，“大思政课”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讲深讲透，又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运用理论知识，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使思政课更加生动和鲜活，还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实现了思政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社会的有机衔接，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入魂。

（二）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

在“大思政课”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教学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教师主导性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引导、组织和调控的作用。教师要依据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学生的个体差异，精准选择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并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这种主导性旨在通过科学地统筹与规划，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清晰的方向和有效的支持。学生主体则强调学生的主动性价值高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价值，“大思政课”通过开展充满活力、富有温度的理论教学和沉浸式的实践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从而提升学习效果[6]。

（三）内容方法与时代要求、技术创新的同频共振

“大思政课”立足广阔视野，将“大背景”“大使命”“大任务”深度融合，展现出显著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大思政课”紧扣时代主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要内容，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时代课题展开，聚焦社会热点，弘扬时代精神，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教育理念，“大思政课”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育人场域的多维拓展、育人主体的多元参与、育人对象的精准化覆盖、新思政元素的不断挖掘，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教育教学的深度赋能不仅实现了传统思政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更形成了与新时代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教育创新机制，有效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科学性与实效性。

三、“大思政课”理念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

“大思政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为抓手，积极倡导“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与“大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等思政课建设理论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思政课”理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加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培养新时代青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大思政课”理念，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大思政课”与这一重任、与新时代青年的特点与需求相契合。“大思政课”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调动各类教育主体、深入挖掘教育资源，打造全方位思政育人环境，通过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滋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引导学生自觉投身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二）引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予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将其稳稳置于教育工作的核心关键位置。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与指引下，思政课的发展环境得以全面优化，整体生态发生了脱胎换骨、全局性且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教学理念的更新上，更渗透于教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为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与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已然成为新时代思政教育坚定不移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教学内容维度，“大思政课”极为注重广度与深度的双重延展。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核心课程作为坚实主体，精心构建起一套逻辑严密、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这些核心课程犹如思政教育大厦的支柱，承载着传授基础理论知识、培育正确价值观的重任。与此同时，“大思政课”敏锐捕捉时代脉搏，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及时融入教学内容之中。对于社会热点问题，诸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数字化时代的网络安全问题等，也进行深入剖析，将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内容。如此一来，教学内容能够紧密贴合时代发展步伐，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高度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思政教育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洞说教，而是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息息相关。“大思政课”还积极深挖地方教育资源这座宝库，致力于融通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各地独特的历史文化遗迹、革命纪念场馆、优秀企业实践基地等，都成为“大思政课”的生动素材。例如，在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在经济发达地区，带领学生走进现代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成果。

四、结语

“大思政课”理念是顺应时代发展、遵循教育规律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我们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它从内涵、特征到价值，构成了一套逻辑严密、指向明确的改革方略。全面把握并善用“大思政课”，要求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格局、创新方法、汇聚合力，切实将思政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未来，仍需在“大思政课”的体制机制完善、资源深度整合、效果科学评估等方面持续探索，推动这一理念不断走向成熟、发挥更大效用。

参考文献

[1] 黄蓉生 . 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几点粗浅体会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18(03): 6−9.

[2]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实践 (党的教育版), 2020(09): 4−11.

[3] 李强 . 政府工作报告——2025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25(09): 4−17.

[4]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奋斗 , 2020(17): 4−16.

[5]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 人民日报 , 2022−04−26(01).

[6] 同 [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2024−QNRC−36）。

（作者：曹雯欣，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刘福森，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探究

武文杰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国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保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独特且关键的作用。本文深入剖析思想政治工作如何从激发创新意识、培育高素质人才、凝聚发展合力等方面，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支撑，旨在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丰富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与方法、构建协同推进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等路径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新质生产力；创新意识；人才培育

一、引言

时代快速演进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凭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提供支撑的新质生产力，正逐步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其本质呈现为效率更高的全新生产力形态。我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重要战略意义，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在各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思想政治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充分彰显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价值，对更有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进中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生产流程，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创新生产方式并拓展生产领域[1]。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还可以推动生产关系、管理模式、创新生态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以智能制造领域为实践范本，企业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化调控与精准化管控，从原材料采购的溯源把控、产品设计的数字化迭代、生产制造的柔性化适配到销售服务的个性化响应构建全链条高效协同体系，这种突破传统生产范式的新型模式正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活具象表达。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新质生产力更凸显“技术创新赋能生态友好”的双重特质，凭借新能源技术革新与循环经济模式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在破解发展与减排双重命题中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彰显技术革新与生态理念深度交融的时代发展逻辑。

（二）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新质生产力特征较为鲜明。其一，创新性堪称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这种生产力依托持续的科技创新突破传统技术瓶颈，进而催生出全新的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电池技术的创新突破与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动该领域车型在续航里程、安全性及智能化水平上持续提升，同时也引领了整个汽车产业的变革升级[3]。其二，高效性亦是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点，它依托先进技术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既大幅压缩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又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从电商行业来看，大数据分析技术可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支撑精准营销与供应链高效管理，使商品能快速且精准地送达消费者手中[4]。其三，融合性是新质生产力的又一重要特征，它打破传统产业间的固有界限，推动不同领域与行业形成深度融合，比如“互联网 +”模式促成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深度结合，催生出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农业、在线教育等诸多新业态与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5]。

三、思想政治工作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激发创新意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创新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可

激发创新意识。在思想引领层面，思想政治工作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要抓手，积极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劳动者树立宏大且高远的理想目标，着力强化他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推动科技工作者将个人创新方向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从而充分激发其创新潜能与不竭动力[6]。在我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征程中，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以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满腔热忱为帆，以实现航天强国梦的坚定信念为桨，于科研探索中无畏前行、锐意创新，接连突破重重技术壁垒，推动我国航天事业迈向举世公认的新高度[7]。在实际工作推进中，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把培育大众的创新思维与精神置于关键位置，它有计划地开展一系列创新培训活动，搭建起高效能的学术交流桥梁，还广泛传播创新领域的成功范例，以此启发大众挣脱传统思维框架，踊跃尝试新技术与新方法，构建起富有活力的创新格局。在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实际发展中，企业党组织把思想政治工作巧妙嵌入企业运营，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土壤，鼓励员工毫无保留地提出新颖独到的想法与建议，同时对极具价值的创新成果及时给予肯定与奖励，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创新活力，有力支撑了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提质。

（二）培育高素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生产力演进历程中，人是极具活力与决定意义的要素，新质生产力若想实现质的飞跃与高效发展，高素质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思想政治工作凭借其独特的价值引领和资源整合功能，在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诉求的高素质人才进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支撑作用[8]。在人才战略的宏观布局里，思想政治工作聚焦于深度提升人才的思想政治水准。它致力于锻造出政治立场坚如磐石、道德品行温润如玉且社会责任感炽热如火的人才队伍，这无疑是新质生产力持续蓬勃发展、迈向新高度的稳固基石。唯有思想政治素养过硬的人才，方能在新质生产力推进过程中，精准导航技术创新路径，确保创新成果切实利民惠民。聚焦生物医药领域，科研人员开展新药研发时，需将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意识深植于心，以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态度遵循科研伦理道德规范，确保所研制的药品在安全性上毫无疏漏，有效性上经得起专业与时间的双重考验[9]。此外，思想政治工作堪称人才成长的强大助推器。它巧妙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以潜移默化之效引导人才树立起终身学习的坚定信念，推动人才不断丰富知识储备、精进专业技能。与此同时，还精心培育人才的沟通协作、团队协同及创新实践等综合素养，让人才能从容应对新质生产力中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挑战。在部分产学研合作项目推进期间，高校及科研机构积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于日常点滴中滋养学生与科研人员的团队协作意识，推动不同学科专业人才跨越界限、深度互动，有力提升科研项目成功率与创新成果转化水平。

（三）凝聚发展合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等各方力量的相互合作。在各发展合力凝聚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作用[10]。在社会不断向前演进的大潮中，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指引作用。它凭借细致入微、层层递进的宣传手段，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在价值、发展路径以及实践成效，使民众真切体会到其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积极影响，进而在社会各界达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广泛共识与坚定支持。从另一层面看，思想政治工作能发挥协调作用，平衡各方利益、消弭矛盾冲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和谐稳定的社会根基。新质生产力推进时，不同利益方易生矛盾，像企业与员工在技术投入及收益分配上的分歧、产业升级中传统与新兴产业间的竞争矛盾等[11]。思想政治工作借助系统深入的沟通对话与思想点拨，引导各方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精准权衡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互利共赢、协同共进的发展态势。

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为紧密贴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持续革新。要把新质生产力相关理论系统纳入思政教育体系，全面阐释其概念内涵、发展走向及在我国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定位，从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与现实紧迫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构建中，可专设新质生产力相关章节，借助案例研讨、小组互动等多元教学手段，引领学生深度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个人职业规划及社会整体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此外，需要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中涌现的热点与棘手问题，全方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数字经济领域的数据安全挑战为例，可通过组织针对性强、内容深入的专题研讨与教育活动，引导大众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剖析并妥善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如，企业可邀请资深专家开展人工智能伦理专题讲座，组织员工深入研讨，确保其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自觉践行伦理规范，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二）丰富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与方法

伴随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思想政治工作务必主动探寻多元载体与创新方法，以此增强工作的实际成效，确保在时代浪潮中精准发力、高效推进。从工作推进维度而言，需要深度激活新媒体平台效能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可依托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线上学习阵地等新型传播渠道，广泛传递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并采取丰富多元的线上互动方式。比如，部分政府单位与企业利用微信公众号，定期刊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详解、先进人物事迹等资讯，同时设置留言反馈专区，及时回应民众疑问，有力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与影响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可运用典型案例剖析、沉浸式情境体验、模拟场景演练等多元教学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趣味性与感染力。比如，在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时，组织人员参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科技创新成果展陈，使其直观感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脉动与丰硕成果；或通过举办科技创新创业挑战赛等活动，搭建实践平台，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

（三）构建协同推进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需构建协同联动格局。政府部门应发挥关键引领效能，制定并实施系列支持政策，在资金、资源等方面加大投入，为思政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引导全社会积极投身其中。比如，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新质生产力相关思政研究与实践，出台奖励政策激发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动力。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力量，务必强化内部思政工作，将其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深度糅合。经由企业文化营造、员工思政培训等途径，凝聚员工共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思想后盾。高校与科研机构要深度挖掘自身在人才培育及科研创新方面的潜力，把思想政治教育无缝融入人才培养与科研活动全过程，经由特色课程打造、学术前沿探索，培育出创新与担当兼备的卓越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着力推动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开展深度沟通与紧密协作，构建一套完善且高效的协同工作机制，以此汇聚起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力量。例如，政府可搭建产学研互动交流平台，推动各方在思政领域共享经验、互通资源，共同探寻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政工作新范式。

五、结论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支持。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激发创新意识、培育高素质人才、凝聚发展合力等作用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直面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与艰巨的改革创新任务，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地位与作用，持续深化两者内在联系的研究探索。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需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载体方法拓展、协同推进格局构建等具体路径强化改进工作，让思想引领精准契合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等核心诉求，以靶向性思想凝聚破解发展梗阻、汇聚创新合力，筑牢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的思想根基与精神支撑。思想政治工作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度融合方能充分释放两者优势，以思想引领破除发展中的认知壁垒与实践梗阻，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扫清障碍、注入动能。这种融合不仅让思想凝聚精准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核心需求，更以精神赋能夯实发展根基，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凝聚起磅礴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保障、提供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 吴志兴，苟延峰．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角色转变与功能发挥 [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6(02): 65−72.

[2] 夏雪梦．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特殊院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提升策略 [J]. 公关世界，2025(06): 73−75.

[3] 刘丽，石成钰，李睐欧．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J]. 继续教育研究，2025(03): 73−79.

[4] 周月华，郝晓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 45(06): 36−40.

[5] 张玉玲，丁科．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探究 [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5, 39(01): 86−92.

[6] 汤薛艳．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J]. 公关世界，2025(03): 162−164.

[7] 柴公权，徐鲁林，邵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发挥党组织作用研究 [J]. 石油组织人事，2025(01): 8−11.

[8] 甘庆华，吴小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四维探赜 [J].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2025, 37(01): 92−98.

[9] 朱文，许文广．思想政治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耦合机理与实践进路 [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 37(06): 96−101, 124.

[10] 李娟娟．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J]. 教育观察，2024, 13(28): 113−115,126.

[11] 李婷婷，曹胜．善用“大思政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J].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2024, 25(04): 1−7.

（作者单位：陕西韩城矿业王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职业教育视域下中高职残障学生思政课育人体系研究

周　琴

摘要：本研究针对中高职残障学生思政课程教育存在的目标割裂、课程脱节、实践单一等现实问题，结合教育规律与特殊教育规律，构建“双规律协同育人”理论模型，形成涵盖目标贯通、课程融通、实践浸润的三支柱培养链，构建“播种—破土—拔节—绽放—硕果”五阶递进育人体系。通过开发多模态适配资源、搭建四维实践共同体等差异化实施路径，精准适配听障、视障、肢体障碍学生认知特点。实践表明，该体系在中高职残障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提升以及社会责任感增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特殊教育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可推广的范式。

关键词：残障学生；职业教育；思政课程；认知发展

一、相关定义的界定

（一）特殊教育的定义

特殊教育是以在生理、心理或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人员群体为对象，通过专门设计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及辅助技术，促进其潜能开发与社会融入的系统化教育实践。其本质特征体现为教育公平原则下的分层分类个性化指导，特别是在《残疾人权利公约》框架下构建全纳教育生态[1]。本文中提到的特殊教育主要是以中高特殊教育职业院校的听力障碍、视力障碍以及肢体障碍的学生为教育实践范围，不同类型的学生在年龄层次、性格、心理、身体、认知水平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政课程育人全过程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职业技能为纽带，将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转化为特殊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亮点”。

（二）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定义

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是以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为导向，通过制度化课程载体实施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实践活动[2]。其内在特征在于通过结构化课程设计，将抽象系统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认知过程：依托“播种—破土—拔节—绽放—硕果”五阶递进育人体系，构建起目标贯通（方向维度）、课程融通（内容维度）、实践浸润（行动维度）三支柱培养链，并通过五阶段螺旋上升路径最终实现价值内化。

二、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教学目标存在碎片化现象

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教育目标设计存在“碎片化、断层式”问题，其根源在于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及肢体障碍学生的群体认知发展特征与普通学生存在明显差异[3]。听障、视障及肢体障碍学生因听觉、视觉或运动功能受限，导致其信息接收方式、思维建构路径以及心理状态呈现特殊性，而当前普教教育目标设置未能充分考虑这种认知特性。中职阶段目标偏差存在过度强调技能和素养培养，以至于技能导向挤压价值内核，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边缘化。以特教学校中职思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为例，其课时分配呈现“三三制”失衡，高职阶段目标困境则是“价值升华”的衔接断裂。当学生进入服装设计、中医康复等专业领域后，思政目标仍停滞在职业纪律遵守层面，未能向设计伦理、生命价值等深层维度延伸[4]。

（二）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设计问题

当前课程设计未能遵循思政教育规律和残障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出现“三重脱节”的现象：中职课程讲授的内容只针对中职教材内容进行设计，缺少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基础价值观教育的承继关系；缺乏与高职阶段职业伦理培育的协同机制；缺乏向本科教育延伸的学术前瞻性[5]。例如，对中职特教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治》教材进行分析显示，其与高职本科阶段“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思政课所用的教材，重复知识点比较多，如职业道德教育、追求向上向善的道德教育，中高职学段都存在此类内容。特殊教育与学术前沿的知识体系设计脱节，课程设计缺乏“尊严设计”的价值命题，案例仍沿用普教素材，暴露出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价值穿透力”匮乏的问题。

（三）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教学实践载体存在同质化问题

传统的“讲座 + 参观”模式难以突破听障生、视障生和肢体障碍学生的自身认知障碍，讲座这种学习模式过于依赖听觉，一般没有字幕或者语音翻译软件翻译的准确度不高，这对听障生不利；参观对肢体障碍学生尤其是坐轮椅的学生来说，出行途中可能遇到楼梯，导致无法前进，又如乘车时没有升降设备，无法独立乘车等；对视障学生而言，他们无法接收画面信息。此外，同质化的实践载体没有考虑到不同残障类型学生的认知特点，导致思政实践教学效果差。

三、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双规律协同育人模型的建构逻辑

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双规律协同育人模型的建构，立足于教育规律与特殊教育规律的深度融合，以“普特融合”理念为指导，通过“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评价反馈”的闭环体系，实现对特殊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与技能培养的双向赋能。该模型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理论根基，一方面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普遍规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课程始终；另一方面紧扣特殊教育“补偿缺陷、开发潜能、社会适应”的特殊规律，通过分层教学、多元评价、个性化支持等策略，构建“普教固本、特教补位、双向协同”的育人机制[6]。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以思政课程为载体，通过教学内容的适切性改造、教学方法的差异化设计、资源平台的共享共建，推动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在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社会融入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力，最终形成“以德为先、以能为基、以融为本”的特殊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中高职特殊学生终身发展与社会参与提供系统性支持。

（一）认知发展规律与思政教育规律的耦合机理

1. 认知梯队适配原理

依据皮亚杰对形式运算阶段的界定，认知梯队适配原理遵循“具象经验—符号系统—抽象迁移”三阶认知框架体系。思政课程教学设计根据学生认知梯队建立具象化（中职）—符号化（高职）内容转换机制。例如，将“爱国主义”概念拆解为具象操作“国旗制作”→符号理解“国歌意义”→抽象内化“国家认同”。针对不同残障类型的学生，要将爱国主义内化为国家认同的抽象层次，课程设计时就需要选取适合不同残障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学习方式进行设计。比如，普通学生自然完成升级过程是看国旗→听国歌→写爱国作文；对于听障生来说，则是把听不到的声音转为眼睛能看得见的；而视障生则是把看不到的画面转为听得到摸得到的；对肢体障碍生来说，就是把动作转为不受肢体功能限制的可操控的形式，但最终都要让所有残障学生发展到同样的认知高度。

2. 具身学习理论

该理论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人的认知，强调身体、环境和情感都对认知过程有重要影响，人的思维并不独立于身体之外，而是身体的一种功能。根据具身认知理论，针对不同残障学生开发触觉教具、体感交互系统（如 VR 红色教育基地漫游）等多元感知通道。例如，通过 3D 打印党史事件模型，让视障学生通过触摸感受党史故事；肢体障碍学生通过在轮椅上的“爬坡长征”，体会肌肉酸痛感，以深入了解“雪山地势变化曲线图”；听力障碍学生通过体验过草地、感受双腿难以挪动的方式体会红军战士在革命路上的艰辛。

（二）职业技能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在职业教育的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征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会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发展，并通过不同形式的载体得以实现。

1. 中职一年级

播种期——职业身份感知的萌芽。残障学生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的阶段，他们对外界的感知更多依赖于直观、具体的体验。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帮助残障学生建立初步的职业身份感知，让他们了解自己即将从事的职业并产生认同感。例如，在入学期间开展职业入门教育，校史馆成为重要的教育载体。学校通过组织“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穿上特定职业的制服，扮演校史中的优秀校友或行业先锋，进而感受到职业技能的重要性与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动的体验方式，激发了他们对未来职业的兴趣。

2. 中职二年级

破土期——劳动价值观的初步形成。残障学生开始从具体形象思维向表象思维过渡，能够将所见所闻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转向劳动价值观的培育，旨在让残障学生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例如，学校可与本地企业合作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实践。残障学生们被安排到企业车间参观，了解岗位相关知识，并亲自参与生产流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操作机器设备，还深刻体会到每一道工序背后劳动者的付出。这样的实践经历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

3. 中职三年级

拔节期——法治观念的初步建构。残障学生的思维能力进一步提升，开始具备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聚焦于法治观念的建构，希望学生能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学校可以引入“模拟法庭情境教学”，以真实的案例为基础进行教学，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既增强了学生的法治意识，也为他们未来步入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高职一年级

绽放期——政治认同的深化。残障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的思想逐渐趋向成熟。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深化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增强政治认同感。例如，学校可以举办 “时政手

语辩论赛”，学生们针对热点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这种创新的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关注时事的热情，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5. 高职二年级

硕果期——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的升华。残障学生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辩证思维能力，能够全面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使他们成为有使命感的公民。例如，推出“社区治理参与计划”，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协助解决社区面临的实际问题。这种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经历，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个人行动对社会的影响。

总而言之，从“播种期”到“硕果期”，职业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紧扣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发展需求，通过多样化的、贴近实际的方式，引导学生不断成长，最终实现从职业认知到社会责任的全面提升[7]。

四、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课程的实施路径

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残障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本文提出的“三维五阶”的育人体系，不仅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价值观念的内化，走差异化发展路径，力求让每一位残障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轨道上茁壮成长，最终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极强职业胜任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8]。

（一）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教育三维核心贯通培养残障学生

1. 建成系统完整的螺旋上升的目标贯通价值链

在课程目标设计中，建立职业认同（技能认知）→公民意识（规则内化）→核心价值观（价值判断）→社会责任感（行为外化）的进阶路径。记录学生各阶段的行为表现，实现目标可视化追踪。

2. 从课程融通维度实施多模态资源开发

在中高职思想政治课中，针对听障学生，根据每章节的内容，依据课程标准，建立手语微课分层系统，如基础版（单手势词汇）—进阶版（连贯手语叙事）—高阶版（抽象概念隐喻表达）；针对视障学生，建立触感可拼接教具“课程魔方”，在每个章节模块嵌入振动反馈与盲文注解；针对肢体障碍学生，开发“课程内容体感模拟”等 VR 情境主题场景。

3. 构建实践活动四维共同体

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如表 1 所示。

（二）中高职特殊教育思政教育五阶成长模型

基于“双规律协同育人”理论模型，本研究设计了“播种—破土—拔节—绽放—硕果”五阶递进育人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1 实践活动四维共同体

实践场域	实践活动内容	成效指标
校园工坊	文创产品设计	职业认同感
企业实训	工匠精神案例采集	劳动价值观
社区服务	手语普法宣传队	社会责任感
云端交互	全国思政类竞赛	政治认同度

表 2 五阶递进育人体系

阶段	核心任务	实施载体	残障学生适配策略
播种	认知启蒙	多感官教学包	按残障类型分组提供差异化教具
破土	基础建构	问题导学	采用协作学习模式，混合不同残障类型学生组队
拔节	能力提升	职业场景角色扮演	配备辅助技术设备（如语音转文字系统）
绽放	价值认同	主题创作展	搭建无障碍展示空间（盲文解说 + 震动感知装置）
硕果	行为外化	志愿服务积分制	建立个性化实践档案，记录能力成长轨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双规律协同”理论模型及其五阶递进体系，通过将特殊教育规律与职业教育规律深度耦合，提出了中高职残障学生思政教育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该路径以“三维锚定方向、五阶适配成长”为内核，破解了传统中高职残障学生思政教育中“目标割裂化、课程脱节化、实践形式化”的共性难题。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 (2021-12-31)[2025-12-17].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01/t20220125_596312.html.

[2] 张耀灿 .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6.

[3] 皮亚杰 . 发生认识论原理 [M]. 王宪钿 , 等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6.

[4]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0.

[5] 单文鹏 . 习近平关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23(07): 106-110.

[6] 王晓宇 .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2(12): 116-120.

[7] 杨晓慧 , 弓昭民 . 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3(01): 119-125.

[8] 杨增岩 , 金灿洋 , 藏雪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背景下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探赜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4(01): 54-60.

（作者系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副教授）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祁彦恬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资源，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主要途径。如今，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离不开物质文明的积累与精神文明的升华。基于此，本文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特征、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旨在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政治引领力、文化渗透力以及实践转化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高校；思政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引领价值，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灵活运用好已有的文化资源，深入解读精神谱系的精神内涵、体悟红色精神，才可将其融入思政内容中，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植根于大学生的心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让大学生在特色思政课堂中体验、感知中国共产党人各个阶段的奋斗历程，深入理解党的精神谱系，促使大学生自发地传承红色精神，树立积极、正向的政治观与文化观。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

（一）教育资源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指明了前进与创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红色基因库，其教育资源价值体现于思想引领、实践育人、文化浸润、国际传播四个层面[1]。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为思政课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帮助高校师生全面掌握党的科学理论发展脉络。这种融入不仅是对现有思政教育内容的补充，同样是构建完整思政理论体系的有效途径。因此，高校思政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切实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引领价值，使其真正成为滋养青年成长的精神沃土。

（二）文化传播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优秀传统、先进文化与革命历史的精神纽带，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内核。这种精神资源不仅涵盖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等价值维度，还通过革命实践凝练成永续传承的精神文化财富，深深地维系着党和人民群众的深度连接。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文化传播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谱系作为文化基因库，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通过具象化表达，可将抽象精神具象化地呈现到人们面前；将其融入思政课堂中，还可逐步形成“精神解码—价值认同—实践转化”的育人闭环，可让精神谱系真正成为培育时代新人、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优质资源。

（三）政治引领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党的政治品格的核心载体，在新时代展现出独特的政治引领效能。此精神体系不仅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记忆，还凝结着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政治引领价值主要体现于：政治本色的传承载体、治国理政的实践指南、青年教育的价值纽带。首先，政治本色的传承载体。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的历史，多个里程碑事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政治基础。精神谱系通过具象化的革命、斗争以及改革精神等要素，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筑牢政治忠诚提供了精准的坐标。其次，治国理政的实践指南。精神谱系中的“艰苦奋斗老黄牛、创新发展拓荒牛、为民服务孺子牛”等价值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实现了融合统一。这些具体化的实践充分印证了精神谱系对治国理政的指导意义。最后，青年教育的价值纽带。在高校思政教学中，教师需着力创建“精神谱系—政治认同—

使命担当”的教育闭环。通过系统阐述长征精神、红船精神等的具体形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红色文化及精神的深层逻辑。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多维教学法，把“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可感知的政治认同过程，有利于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盖创新精神、革命精神以及奋斗精神等核心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理论特征，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有效补充和完善当下的思政理论维度。精神谱系涵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被高校及教师融入大学生思政教学中，不仅可丰富思政教学内容，还可让大学生意识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二）强化对大学生的价值引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力量，是开展信念教育的鲜活素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可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促使学生形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频共振的价值判断标准，持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的效果[2]。

（三）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思政教育需要培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精神谱系蕴含的初心使命意识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理论支撑。通过梳理精神谱系的发展脉络，思政教育过程可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精准对接，让大学生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自觉地把专业学习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这种融入模式，不仅可以保持思政教育的政治属性，还可以增强其回应现实问题的实践导向，有利于推动教育体系实现守正创新。

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深挖精神谱系思想内涵，扩容思政课程校本资源库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要立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构建系统、全面且彰显特色的校本资源体系。高校可建立精神谱系专题研究小组，比如系统梳理和归纳红船精神、延安精神等的历史脉络和当代阐释，从中提炼与大学生认知规律相符的教学素材。高校及教师还要一起研发“精神谱系+”的课程模式，在现有的思政理论课程中融入“脱贫攻坚中的奋斗精神”“改革开放中的特区精神”等专题模块，形成覆盖必修课、选修课以及实践课的全方位课程体系。同时，高校思政教师还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多元展现革命文物、历史场景。这种系统化建设路径不仅能保持精神谱系教育的理论深度，还可增强思政教学的感染力[3]。

例如，高校在开展“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时，专门增设了“精神谱系和时代新人”的教学单元。高校课程专项小组梳理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各种伟大精神，根据“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新时代”构建教学图谱，研发配套的虚拟仿真项目、微课视频。在“井冈山精神”教学中，教师在讲解历史背景的同时，还可根据学校所在省份的红色资源，利用VR技术带领学生“云参观”井冈山的革命博物馆，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完成“重走挑粮小道”的沉浸式体验。同时，高校还可利用契合新时代的红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以校内资源为基础，把红色精神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育中，持续扩充资源库，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完成线上同步，如收录老红军口述史视频、根据地经济政策文献等原始资料，供高校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高校也可建立“精神谱系实践教学资源平台”，整合区域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数字化资源，持续扩充思政课程校本资源库。在此过程中，小组学生可还原历史场景，比如在角色扮演中感知和体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心路历程。这一教学策略不仅契合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让精神谱系教育不仅跳出说教化的窠臼，还能在具身体验中实现价值引领[4]。

（二）强化红色文化阵地建设，构建思政教育校园生态圈

新时代背景下，强化红色文化阵地建设是构建高校思政教育生态圈的主要抓手。高校应以系统思维科学规划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转化成可传承、可感知、可参与的育人载体。在理论课程体系内，需推动专业课程和红色精神的深度融合，通过案例解析、专题式教学等方式将红色精神具象化为大学生可理解的价值符号。从实践角度，高校可打造多维度的红色文化体验空间，依托党建长廊、校史馆等实体场所，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沉浸式教育场景，让学生在具身参与中深化情感认同。

例如，高校可立足“延安精神”设计专题教学模块。教师可引导学生共同研读文献资料，梳理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将学生划分成不同的小组，共同研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历史生成逻辑。随后高校教师可利用VR技术，为大学生重现革命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现场。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为学生设置“红色剧本创编”任务，让各小组根据与鲁迅艺术学院、延安保育院等相关的真实史料，编创沉浸式情景剧，要求时长为7~10分钟[5]。

（三）构建精神谱系融合课程体系，打造思政教育创新共同体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要以系统思维构建精神谱系

融合课程体系，打造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创新生态。高校可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体系，建立“必修＋选修”“理论＋实践”的立体化课程模块，利用 VR 技术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创新实验室”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高校还可加强与社会组织、红色教育基地的合作与交流，共建协同育人机制，联合开发实践教学基地和线上资源平台，不仅可打造思政教育创新共同体，还可实现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例如，高校在开展“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可创新设计“精神谱系 12 讲”的专题模块。课程团队以“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实践担当”为主线，把载人航天精神、红岩精神等和法治教育融合在一起。在专题教学中，教师以案例分析法，挑选真实事件，引导学生分析精神谱系中的法治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实践教学环节，高校及教师还可加强和基层法院、当地社区的联动与合作，组织学生参与“法治精神宣讲”等活动，要求撰写“精神践行日志”并纳入课程考核。通过此方式，不仅能让课程体系实现由知识传授到价值引领的升华，还可形成“资源互通—教学协同—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

（四）建立健全长效融入机制，提升铸魂育人实效性

健全、长效的融入机制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持续浸润高校思政教育的关键。高校要构建系统化的课程融入机制，把精神谱系核心要素分层融入思政教育课程中，并制定贯穿 4 年的教学大纲，细分各阶段融入的重点和考核标准。同时，高校还要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组建由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组成的联合教研组，定期研讨案例、教研备课，建立跨部门资源整合平台，实现理论讲授和实践体验的深度衔接 [6]。

例如，高校在思政教育中融入“红岩精神”时，系统构建“课程融入—实践强化—文化浸润”的长效机制。在课程建设方面，高校在思政理论课中增加“红岩精神与革命文化传承”的专题模块，组织教研小组共同编写配套案例集，研发数字化资源包，如红岩人物访谈纪录片、VR 实景还原等。高校可定期组织革命纪念馆实地参观、红岩故事宣讲比赛、主题团日活动等。从校园文化建设角度，高校宣传部还可积极打造“红岩文化月”品牌活动，在每年的 11 月 27 日红岩英烈殉难日前后开展历史情景剧展演、革命家书诵读、红岩诗会等系列活动，也可与图书馆联动增设红岩主题图书专区、举办读书沙龙。通过此方式，不仅能避免传统碎片化的教育模式，还实现了精神谱系教育的常态化渗透，让红色精神真正成为塑造学生价值观的核心动力。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主要抓手，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立足时代特征和育人规律，深挖精神谱系的核心内涵，强化红色文化阵地建设，构建精神谱系融合课程体系，建立健全长效融入机制。由此，不仅可赓续传承红色基因，把精神谱系转化成铸魂育人的鲜活教材，还可推动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陆礼娟，林勇灵，赵彩晴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J]. 广西教育，2024(36): 34−36, 51.

[2] 王彤 . 胡杨精神融入兵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 阿拉尔：塔里木大学，2024.

[3] 张伟双 .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 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24.

[4] 唐婷婷 .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24.

[5] 田瑞缙 . 新时代北斗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D]. 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24.

[6] 范志燕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研究 [D]. 桂林：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研究”（2024XXSZGZYBKT49）。

（作者系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主旋律影视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关　钵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主旋律影视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节奏和情感共鸣，已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载体。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如何精准选取与学生适配的主旋律影视，怎样实现其与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想实现影视资源与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就需要打破播放影视资源即达到教育效果的浅层模式，通过深入挖掘作品中的思政育人元素，剖析职教思政的现实需求，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充分释放主旋律影视的育人功能，提升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实效。

关键词：主旋律影视；高职思政；育人功能

一、主旋律影视的思政价值要素解析

作为能够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正能量的文艺载体，主旋律影视始终聚焦国家发展脉络，通常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英雄楷模、时代精神等为主题。例如，以青春化叙事讲述新文化运动到建党的思想启蒙史的《觉醒年代》，这类作品无论是观照历史还是展望未来，无论是主题教育还是人物刻画，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彰显家国情怀、倡导时代新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广大青年的重要精神资源。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如《人民领袖毛泽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呈现了伟人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关于历史事件的影视作品，从记载中国发展重要历史事件的《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到展现大国形象的《万里归途》《厉害了，我的国》《大国重器》，这些作品为观众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逐步走向富强的故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这些作品通过影像化的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传播，有力擎起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1]。

（二）浓厚家国情怀的彰显

家国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把个人理想、家庭幸福与国家命运熔铸为一体，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又照亮光明的未来。从千年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时代宣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一情怀始终贯穿在主旋律影视中。讲述古人家国情怀的影视作品[2]，如《千秋诗颂》以 AI 动画的形式沉浸式演绎了诗词中的家国意象，让广大青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根植了深厚的文化自信。对中国革命时期家国情怀的呈现，如电影《长津湖》中伍千里“带哥哥回家”的个人愿望与“全歼北极熊团”的国家使命相交织，彰显了家与国的统一。对当今时代家国情怀的刻画，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呈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主旋律影视对家国情怀的表达，让观众产生心灵共振，凝聚起了人民群众的磅礴精神向心力。

（三）时代新风正气的提倡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催生了人民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主旋律影视创作需要紧扣时代脉搏，回应这种时代变化。一是体现时代变迁。如电视剧《小巷人家》通过讲述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小巷三家人的生活变化，描绘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画卷。二是歌颂“时代楷模”。如电视剧《功勋》以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奋斗故事为题材，歌颂了他们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的伟大事迹，直抵观众心灵。三是弘扬时代正气。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等提倡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3]。这些作品通过弘扬模范精神、树立时代新风，为培育时代新人营造了优质的育人环境。

二、高职思政教育对主旋律影视的现实需求

主旋律影视凭借其独特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载体。比如把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具象化为电视剧《山海情》中水花拉板车、种蘑菇的坚韧身影；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象化为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里修表匠校准升旗时间的执着。这种以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为载体的教学资源，为高职思政育人提供了多元且立体的支撑[4]。

（一）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际要求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既需要注重显性表达，还要求兼顾隐性感染。从显性教育层面来看，校园环境是传递学校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围绕每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开展观影活动周时，不仅要组织学生观看相关影视作品，更要将影视元素渗透到校园每个角落，比如在校园影院门口设置“时代楷模”语录灯箱，在教室黑板报上设置影视经典台词专栏，在实训室墙面悬挂工匠群像海报，同时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播放影片中的励志片段。这种沉浸式的布局可以让师生在校园中随时接触主旋律影视内容，主动感知校园文化。从隐性教育层面来看，核心在于通过精神共鸣进行价值观教育。主旋律影视正是解读校园精神的生动教材。以解读“尚德强能”校训为例，可以组织师生共同观看《大国工匠》，既能直观感受一线工人打磨零件时“毫米级”的精度追求，理解“强能”所蕴含的专业素养；又能通过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体会“尚德”背后的敬业精神与家国情怀。这种结合观影的解读方式，让师生在情感共鸣中深化对校园精神的认同，使校训从文字符号真正转化为指导行动的价值准则[5]。

（二）高职院校学生认知特点的适配要求

高职院校学生更擅长通过具体案例和直观画面理解知识，习惯从视觉、听觉等多感官体验中获取信息，对故事性、场景化的内容有着明显偏好。主旋律影视恰恰以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叙事链条传递价值观，其具象化的表达高度契合了高职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特点。高职院校学生情感表达直接坦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更容易引发他们的共鸣。许多主旋律影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剧中角色的奋斗历程、价值选择贴近生活实际，这种呈现方式能让学生在情感触动中自然地接受主流价值观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倾向于将学习内容和日常生活、未来职业相结合，聚焦职业领域的主旋律影视，能够直接呼应学生的专业认知需求和职业规划需求，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高职院校学生受短视频的影响，对时间较长的教育内容专注力有限，更容易接受节奏紧凑、画面冲击力强的内容。为此，提取主旋律影视中的高光时刻，如重大历史转折中的震撼场景、英雄人物的重大抉择等，利用课前三分钟的时间进行分享，既能契合学生碎片化学习的习惯，又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实现以小见大的教育效果。

（三）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载体的创新要求

高职院校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核心目标，创新思政教育载体应当紧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主旋律影视凭借独特的传播优势，成为连接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重要纽带。一部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同时包含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职业素养等多项教育内容，其教育辐射的范围远远大于学校的一堂思政课传递的学习内容，能够有效实现思政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例如电影《中国医生》在展现医护人员抗疫壮举的同时，既能够传递生命至上的理念，也能够凸显医护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与责任担当。主旋律影视能够拓宽思政教育的时空维度，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现实实践，都能够被浓缩于作品中，帮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不同维度的思政教育。更重要的是，其播放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学生可以利用课前、课中、课后的时间讨论剧情内涵、重温经典场景，使碎片化的时间得到高效利用。这种贯穿教育全过程的教育模式，使思政教育渗透到专业学习、技能实训的各个环节，真正实现“时时有思政”的育人格局。

三、主旋律影视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育人路径

构建主旋律影视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中的育人路径，对于提升思政教育成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需要高职院校形成学校影视育人合力，让思政教师、专业教师等协同发力，扩大育人覆盖面、增强渗透力。提升学生影视鉴赏能力，让他们对主旋律影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悟，增强教育感染力。完善影视教育配套资源，为育人提供稳定支撑。

（一）形成学校影视育人合力

高职院校以主旋律影视为载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涵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学工干部等，需要高职院校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凝聚起强大的主旋律影视育人合力。

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主旋律影视的育人功能，积极推动其走进思政课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针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核心内容，结合所教授学生的专业特点，选取契合的影视片段。这样有助于把书本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影视符号，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为理工科专业学生授课时，教师可深入挖掘《大国工匠》等作品中蕴含的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将其与专业课程中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等元素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并激励学生积极践行。

运用主旋律影视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努力，还需充分调动辅导员、学工干部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创新教育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引导。辅导员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开展班会、与学生谈心谈话时运用主旋律影视案例。同时，可将其融入团日活动、党日活动中，利用青年节、建党节等重大纪念活动的契机，组织学生观看、品评影视作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洗礼。此外，高校辅导员及学工干部在指导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

创业方面，也应充分挖掘主旋律影视中的有益信息。如电视剧《我们这十年》中张雷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精神风貌。通过观看此类影视作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二）提升学生影视鉴赏能力

高校学生只有认可主旋律影视，自觉接受利用主旋律影视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影视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因此，要想提升主旋律影视的育人实效，需要学生在认知根源上建立思想认同，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夯实认知根基，并且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的媒体素养。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加强理论学习是主旋律影视能够发挥思政育人作用的基础。理论学习能为学生搭建认知框架，让他们在接触主旋律影视时，在观看作品的过程中更能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逻辑与价值内核。比如学习了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理论知识后，学生观看《觉醒年代》会更理解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与抉择，观看《大国工匠》能更清晰认识工匠精神与国家发展的关联。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育侧重技能培养，理论学习能帮他们将作品的精神内核与职业理想相结合，比如机电专业的学生观看工业题材作品会对技术报国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护理专业的学生观看医疗题材作品更能够体会医者的使命担当。这种基于理论的理解，使学生在观看主旋律作品时能够从被动观看变成主动感悟，使思政教育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追求，实现在精神层面对学生的深层浸润。

提升自身的媒体素养则是高职院校学生吸收主旋律影视思政养分的关键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每天会接触到海量信息，具备良好媒体素养的学生，能够准确理解主旋律作品的思想内涵，比如观看《长津湖》时，不会只关注战争场面，而是能聚焦保家卫国的精神内核。因此，学生首先要建立基础认知，了解信息传播规律，明确主旋律作品与其他信息的本质区别。其次要强化实践运用能力，在观看主旋律影视时主动进行深度解析，比如分析《流浪地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呈现方式，尝试用短视频剪辑、影评撰写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在内容输出过程中深化对作品内核的理解。此外，可结合职业特色提升针对性，比如设计专业的学生可研究作品视觉符号的思政表达，以此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与专业技能。

（三）完善影视教育配套资源

高职院校建设主旋律影视资源库，是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举措。当前主旋律影视内容丰富但分散，学生难精准获取适配内容。资源库能整合优质作品，结合高职学生重实践、强职业导向的特点提供合适的作品，解决作品与需求错位问题，让思政教育更贴合学生的认知习惯。

建设资源库需重点关注内容筛选与分类体系，确保资源精准匹配高职教育需求。内容筛选环节应建立由思政教师、专业带头人、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联合评审小组，依据课程标准，制定包含思想性、专业性、教育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严格筛选出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分类环节首先要体现出思政教育的层次分类，比如基础认知层次，选择《觉醒年代》《山河岁月》等历史题材作品，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再如价值升华层次，可以选择《山海情》《功勋》等作品，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同时还要体现出专业导向，比如针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重点推荐《智造美好生活》《大国重器》等展现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成就的纪录片；为经管类专业学生推荐《中国经济大讲堂》《第一财经》系列专题片，助力学生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建设资源库需要实现主旋律影视从资源存储到思政育人的升级。第一，高职院校在主旋律影视的实践转化过程中，可将影视和实训深度融合，比如组织汽修专业学生观看《大国工匠·智造先锋》等汽车工业题材影片后，开展以“技术报国”为主题的拆解实训，引导学生在实操中感悟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精神。第二，在成果输出方面，鼓励学生运用专业特长进行二次创作，比如将经典红色影片中的经典场景转化为实体展品，设计由红色影视衍生的文创产品，为经典主旋律影视配音等，这些作品通过校园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进行展播，形成立体的育人生态。第三，为实现资源库的持续动态更新，还需建立资源库应用的反馈机制。每学期开展影视资源需求调研，运用大数据分析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兴趣偏好；把对资源库使用的满意度、教学成效引入学生评教系统进行量化评估；以季度为周期优化资源分类标签，创新开设“热点专题速递”等特色板块，推动资源库向智能化、精准化育人平台持续进化。

参考文献

[1] 张静，程洁．主旋律影视出圈意义、传播困境与创新传播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51(04): 102−111.

[2] 赵前卫．主旋律影视作品对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06): 75−77.

[3] 李蓉．媒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发挥——以主旋律影视作品为例 [J]. 出版广角，2021(24): 86−90.

[4] 向元琼．论主旋律影视作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能 [J]. 教育与职业，2011(26): 60−61.

[5] 徐芳依，朱迪．AI 赋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多维创新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5 (10): 28−31.

（作者单位：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李斯瑶

摘要：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为促进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革新，本文基于数智融合赋能视角切入研究，解读和分析了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意义及其理论框架构建，并结合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包括深化技术融合、强化人才培养、完善资金保障等在内的建议对策，从而助力促进湖湘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承和弘扬，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变革。

关键词：数智融合；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理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

湖湘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红色遗址、革命故事，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红色革命精神，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基于数智技术赋能也能推动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的重塑。所以，在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中积极推动数智融合赋能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既能实现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机制理论构建的不断革新，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以此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一、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意义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有助于实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的革新，进而助力提升其影响力。在数智赋能之下，湖湘红色文化可以打破传统的单一传播方式，逐步衍生出具有多元互动性质的跨越式文化传播模式。如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进行湖湘红色文化的介绍，受众群体可以通过佩戴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历史场景，身临其境地体会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历程，这样既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互动感，也能提升其感染力以及吸引力，进而使更多的受众群体了解湖湘红色文化。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数智化传播形式更契合其信息接收习惯，通过互动游戏、短视频剧情、虚拟偶像宣讲等年轻化表达，能有效破解红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 的“传播壁垒”，让红色基因在代际传递中更具生命力。同时，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有助于激发红色文化资源价值，进而使红色文化产业实现创新发展。在实际中，通过大数据技术、数字化采集技术等能够将湖湘地区零散分布的红色文献、革命历史、口述历史等珍贵资源得以整合，并且实现数字化储存，这样既能形成更加完善的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同时也能依托数字资源建立起湖湘红色文化知识图谱，逐步实现湖湘红色文化资源的衍生开发，打造地域特色文化 IP，以此来提升湖湘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这种资源价值的激发还能带动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例如基于数字资源开发的红色文创产品、线上研学课程等，既拓展了红色文化的产业边界，又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活力，形成 “文化传承 + 产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

二、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机制的理论建构

（一）数智融合赋能红色文化传承的理论基础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机制的理论基础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数字技术哲学这一交叉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提到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文化属于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湖湘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人民群众革命、建设以及改革中所形成的重要精神财富，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而数智技术则是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所形成的重要生产工具，运用数字采集、算法分析以及智能交互等可以有效重塑湖湘红色文化发展的全链条，这也充分契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二）数智融合与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协同作用机制

数智融合与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协同作用机制体现为“技术支撑 + 价值赋能 + 内容创新”动态循环模式构建。从技术层面来看，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

以及区块链技术等可以为湖湘红色文化的数据挖掘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实现湖湘红色文化的安全储存和动态共享，这一过程既提升了湖湘红色文化挖掘的便利性，又能确保革命文物信息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从内容创新层面来看，数智技术有助于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实现符号化，尤其是运用计算机图形学以及数字孪生技术，有助于实现湖湘红色文化的实体空间复刻、虚拟场景展现，使受众群体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感受湖湘红色文化的内涵。从价值赋能角度来看，基于数智融合促进湖湘红色文化价值挖掘有助于实现其影响力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湖湘红色文化可以实现裂变式的信息传播，人工智能的智能推荐算法也能结合用户兴趣画像进行精准化的湖湘红色文化内容推送，以此实现湖湘红色文化传播的个性化，有助于引发受众群体的情感共鸣，激发其价值认同。在此过程中，价值赋能还体现为红色文化的时代化转化，数智技术能够捕捉当下社会热点与公众价值诉求，将湖湘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奋斗理念与当代议题相结合，例如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主题传播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让红色价值在现实语境中得到更生动的诠释，进一步强化其精神引领作用。

（三）数智技术应用于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模式框架

数智技术应用于湖湘红色文化传承的模式框架呈现出“三维驱动 + 多端协同”这一特征。从技术维度来看，各种先进信息技术成为湖湘红色文化创新传播的重要驱动力，如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都是其中的核心技术形式，可以在湖湘红色文化资源采集、储存、分析以及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内容维度，湖湘红色文化在开发以及挖掘上呈现出智能化、虚拟化、数字化的趋势，并且由此衍生出包括互动影视、数字文创、虚拟展览等多元化的红色文化产品形式。在传播维度，形成了线上与线下深度整合、国内与国外相互促进的立体化传播格局，如线上依托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平台进行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能依托 AI 翻译适配多语言环境，打破红色文化传播的文化壁垒，线下传播中则是通过红色文化场馆、全息投影技术突出现实体验的革新。在多端协同层面，形成了政府、高校、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深度协同的湖湘红色文化互促传播格局，构建起了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闭环模式。

三、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

（一）技术应用与文化内涵融合的深度不足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阶段面临着来自技术应用和文化内涵融合深度不足这一挑战，因此也会导致湖湘红色文化传承效果不佳的困境。在实际中，存在一部分红色文化数字项目过度追求技术创新的情况，如在一些虚拟红色文化展馆中堆砌 VR 特效、全息投影等技术，却并没有注重深度挖掘湖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及价值，因此也导致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影响力相对有限，难以引发受众群体的情感共鸣。除此之外，数智技术与湖湘红色文化之间融合的底层逻辑尚未清晰，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往往多是分析红色文化资源的表面特征，尤其是一些文化传承机构单纯地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红色文化展馆的文物数量、参观人次等方面的表层信息，而缺乏对于其中红色革命精神、价值内涵等隐性价值的深度挖掘，该现象的产生反映出技术应用和文化内涵融合深度不足的困境。

（二）红色文化数字化人才储备与需求不匹配

红色文化数字化人才储备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是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又一大挑战，主要体现为当前红色文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中存在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当前人才市场中对数智技术且掌握湖湘红色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储备数量相对不足，当前领域中的人才多数集中于基础操作层面，而缺乏对于数智技术作用的深度挖掘，同时具备虚拟现实内容开发、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储备相对薄弱，因此也致使人才短缺问题更加显著。此外，当前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中也面临着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如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并未针对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数字化交融而设置针对性的课程，只是单纯地在课程教育中融入技术或者是红色文化相关内容，而并没有针对性地围绕湖湘红色文化以及数智技术进行定制化的人才培养，所以也导致毕业生难以充分适应这一领域人才需要。

（三）数智技术应用的资金投入与保障体系不完善

数智技术应用的资金投入与保障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善，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也难以实现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入。在实际中，红色文化数字项目资金来源往往单纯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拨款，而单一的资金来源也会导致红色文化数字项目发展资金使用捉襟见肘，缺乏社会资本的参与也难以形成多元化资金来源模式[1]。单纯依赖政府拨款也只能将红色文化数字项目的发展重点放在省级重点场馆中，而基层的红色文化遗址数字化改造则相对不足，资金缺口较大，难以实现湖湘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承以及弘扬。除此之外，在资金保障体系建设中也存在长效投入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多数的项目只是单纯地依赖于一次性拨款，而缺乏后续的运营以及技术迭代的资金支持。

四、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对策

（一）深化技术融合，创新红色文化数智化表达形式

数智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承机制构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大力深化技术融合，从而创新红色文化

数智表达形式[2]。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湖湘红色文献等文本进行细致整理，提取其中的红色革命精神，并且结合分析构建沉浸式叙事框架。将区块链技术融入其中，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红色资源的确权等，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化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库，从而使红色文化的传播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表达形式的创新层面，需要积极将湖湘红色文化融入社会新型技术中，打造前沿式的技术应用场景，以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革新[3]。如探索湖湘红色文化与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方面的前沿技术应用场景的融合，从而深度整合湖湘地区韶山、花明楼等地的红色景区，基于虚拟化技术实现“重走革命路”，增强湖湘红色文化传播过程的互动性，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湖南支部旧址复刻，同时结合历史影像以及实时数据进行革命历史场景的动态化还原，这一过程既能使受众收获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感悟，也能给受众带来新型文化传承体验，提升思政教育效果，促进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二）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专业红色文化数智传承队伍

人才培养是促进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键，因此要致力于构建“政校企研”深度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专业化的红色文化数智传承队伍。在政府层面，要设立红色文化数字转型人才培养的专项基金，通过出台支持政策引领行业内人才学习前沿技术和湖湘红色文化内涵，打造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4]。同时，可联合行业协会开展短期研修班、技能竞赛等活动，针对在职人员开展数智技术与红色文化融合的专项培训，快速弥补现有人才队伍的技能短板。在高校层面，要优化专业设置，重构课程内容，如在历史学、思政专业中增设数字技术实践模块，通过开设红色文化叙事、虚拟现实内容开发等跨学科实践课程培育实践型人才。在社会层面，要加强文化机构与高校之间的联系，通过双方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引入真实红色文化数字项目推动产学研用协作，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技能锻炼，成长为掌握数智技术与红色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三）完善资金保障，构建多元投入与运营模式

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完善资金保障，构建“政府引导 + 市场运作 + 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与运营机制。首先，在政府层面需要加强对湖湘红色文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加强专项经费拨款、优化资金分配，进而确保红色文化数字化转型项目创作、技术研发等拥有资金支持[5]。其次，也要设立湖湘红色文化数智转型发展专项基金，运用包括贴息贷款、税收优惠等多重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支持红色文化数字项目融资。最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可以积极合作探索 PPP 模式，通过政府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如合力开展湖湘红色文化数字场馆开发、数字化项目改造、数字化内容挖掘等多种数字项目，同时通过湖湘红色文化衍生品开发、门票分成等多种方式实现效益回收，这样既实现了运营模式的革新，也确保了湖湘红色文化传承中的资金充足，进而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语

研究发现，数智融合赋能湖湘红色文化传承具有深远的价值和影响，既能实现传承机制的革新，也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从而使湖湘红色文化拥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以及覆盖范围，提升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效果。本文中所提出的技术融合、人才强化、资金保障等多重措施显著提升了红色文化传承效果与思想政治育人质量。未来，湖湘红色文化的传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也要持续性地深化探索数智技术与湖湘红色文化的融合，进而提升红色文化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 陈贝贝 . 数智赋能广西非遗文化影像的活态传承与发展路径探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 2024(10): 105−110.

[2] 高光欢 , 樊瑞科 . 数智技术赋能沂蒙红色文化传承的双重境遇与实现路径 [J]. 文化学刊 , 2025(01): 6−10.

[3] 胡娟 . 数智技术赋能福文化传播——小学英语特色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J]. 2024(28): 72−74.

[4] 李孟霜 . 数字技术赋能沂蒙红色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J]. 传播与版权 , 2024(11): 78−81.

[5] 蔡思雨 , 欧阳晓飞 . 红色文化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优化路径研究 [J]. 奥秘 , 2024(05): 172−17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数智融合背景下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研究”（24C1314）。

（作者系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下资助育人模式研究

周一汛

摘要：本文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背景，探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开展的策略和趋势。文章首先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高校在资助育人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接着文章分析了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现状，指出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最后文章展望了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发展趋势。本文对于优化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高校资助育人；就业帮扶；贫困生

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在积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一环，不仅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塑造[1]。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一直担负着重任[2]。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就包括高等院校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高校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不是简简单单地为这部分学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是期望可以通过资助对每一位大学生进行再教育、再引领，从而通过资助育人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回报社会、服务人民的热情。可以说资助育人促进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的过程中也发现存在部分学生对学校的资助产生依赖心理，影响其自立自强能力的培养。也存在部分学生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导致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加上资助育人政策实施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尚不完善，这些都是高校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本文通过研究资助育人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现当前资助育人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找到适合经济困难学生的教育方法，并探索资助育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资助育人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探讨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环，资助育人旨在对经济上存在一定困难的学生给予资金支持，让这部分学生可以顺利地完成学业，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何让资助育人的工作可以适应当代高等院校，形成一种有效的育人模式，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当前部分受资助的大学生对资助工作存在功利化的认识，将学校给予的资助视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没有能够真正理解资助的深刻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受资助的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也暴露出高校在开展资助育人过程中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在给予大学生经济上的支持的同时，更要给予大学生精神上的关怀，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

其次，现行贫困生的认定机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定标准比较模糊。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地方对贫困生的认定标准不同。再加上负责审查贫困情况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参差不齐，不可避免地在认定贫困生时受到了地方和个人主观的影响，使部分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二是认定过程缺乏监督。在认定的过程中，大学生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目的隐瞒或夸大自己家庭的状况，辅导员因为工作繁忙，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同时在认定过程中个别工作人员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为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争取资助名额，或者故意降低认定标准，使得高校在资助工

作中可能会出现“人情资助”或“关系资助”的现象。

再次，高校资助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很多都是从辅导员队伍中抽选过来的，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而且这些抽调过来做高校资助工作的人员本身就不是很专业，也无法投入过多的时间。这些原因往往会导致资助育人过程的简单化，缺少对贫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注。由于工作人员无法投入太多的精力，导致应该学习的一些关于大学生资助工作的文件无法深化学习，无法深刻领会相关政策的核心理念，使得部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流于形式。

最后，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缺少对贫困生的思想政治引领。当前绝大部分高等院校资助内容单一、形式刻板，普遍存在思想政治引领针对性不足、深度不够、体系不完善的现象。在贫困生的认定和资助发放环节，基本只关注对贫困大学生经济上的支持，忽视对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而且在资助发放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贫困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需求，这样就很难使贫困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不利于后续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开展。

三、资助育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强化资助政策宣传，树立正确的资助观念。从高校实际情况来看，有效且优质地资助育人宣传是做好该项工作的关键所在。高校应依托新媒体、校园网、宣传栏等教育平台向大学生全面、准确地推送国家资助政策，让每一位需要资助的大学生了解国家制定资助政策的初衷和目的，并树立正确的资助观念。同时高校可以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或专家学者为大学生讲解高校资助政策、解答大学生在受资助过程中的疑问。高校还应强化感恩教育，通过宣传优秀受助学生的典型事迹来引导学生树立感恩意识，珍惜资助机会，努力回报社会。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提高教育实效。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势、新任务，高校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开展线上互动，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学生。高校也要注重实践育人，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实习实训等，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3]。此外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资助育人评价体系，促进思政教育与资助的融合。资助育人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亟须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为其提供科学化的指导。首先，高校的评价体系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的。不仅要考核高校对贫困大学生经济支持的力度，还要评估高校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中对学生生活质量、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提高的程度。其次，在考核方面高校应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以此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4]。高校可以邀请社会机构、专家学者对资助育人工作进行独立评估，也可以建立学生、教师、家长等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来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最后，高校可以通过建立动态评价考核的机制来应对资助育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变化，从而确保评价体系的适应性和前瞻性。

四、资助育人模式中的就业帮扶策略

作为资助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育人旨在通过经济资助、就业平台建设以及职业发展规划的多重支持来帮助学生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顺利过渡，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资助育人视角下，就业帮扶不仅是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帮助大学生解决经济问题，更是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使得就业育人的作用最大化。以下将从就业困境、策略和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高校就业育人的现实困境

高校在全力推进就业育人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首先，教育资源与市场需求脱节。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未能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导致大学生在求职时难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教育资源的更新速度也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教学内容和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导致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导致偏远落后地区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机会和待遇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就业育人理念尚待确立。学生个人职业规划不清晰，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存在“眼高手低”“懒就业”“慢就业”现象；高校对就业育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缺乏系统的就业理念和就业策略的指导，导致就业指导工作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地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念和就业观。最后，高校就业育人平台搭建不够完善。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平台和实习实践基地，学生难以获取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实习机会的缺失导致实践经验不足，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高校就业帮扶的策略

强化就业指导服务。有一支专业就业指导队伍并强化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是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高校应该设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了解学生的兴趣、能力、职业目标帮助学生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同时高校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素养培训、心理培训、模拟面试、就业指导讲座等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

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就业的任务十分紧迫，拓展就业渠道是高校就业育人工作的重要任务。高校要积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来为学

生争取更多的实习机会；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就业招聘活动，为学生尽可能地提供应聘机会；积极开拓国际就业市场，鼓励大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育人工作的灵魂，有助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养。高校可以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就业指导课程、开展主题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鼓励学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等措施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

一是思政教育引领下的资助育人模式创新。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资助育人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资助政策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激发学生回报社会、服务人民的热情[5]。

二是资助育人工作的优化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单一的资助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校发展的需求，所以建立多元化的资助育人工作体系势在必行。高校可以在传统资助工作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资助，并与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要不断完善贫困生认定机制，加强认定过程的监督；不断加强资助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资助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加强资助育人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高资助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不断强化资助育人工作的评估与反馈，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

三是资助育人模式的发展趋势多元化。当前，大学生资助方面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首先，大学生在经济资助需求方面多样化。现在大学生经济资助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学费和生活费，而是向更加宽泛的领域拓展，例如学术研究资助、国际交流学习等。其次，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强，大学生心理资助需求也在增加，包括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测评等服务。再次，大学生在能力提升方面的资助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包括专业技能培训、职业规划指导、实习实践机会的提供等。最后，特殊群体的资助需求也日益凸显，如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残疾学生等群体的需求，要有个性化资助方案，以此来保障所有学生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需要顺应时代需求和潮流，在思政教育引领下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有机结合。展望未来，高校资助育人模式将朝着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迈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符方军 . 教育强国背景下提升学校德育质量的实践探索 [J]. 湖北教育 (政务宣传), 2023(12): 62-63.

[2] 梁美 . 坚持“八个相统一”上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J]. 广西教育 , 2019(35): 85-86, 140.

[3] 孙青 .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路径研究 [J]. 新西部 , 2023(10): 239-241.

[4] 吴蕊 , 刘彦芬 , 徐津 , 等 . 基于 OBE 模式的林业高校教育培养模式改革——以“亚太林业教育协调机制第六次会议”为例 [J]. 林产工业 , 2024, 61(01): 103-104.

[5] 李杨 . 育人目标下的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J]. 课程教育研究 , 2016(09): 212-214.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助教)



新时代高校“银龄行动”助推“大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高校为例

李鑫悦

摘要：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时代诉求和上好“大思政课”的价值引领下，依托“银龄行动”推动“大思政课”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高校退休教师关于“大思政课”体系及“银龄行动”的认知与参与意愿进行调研，分析了“银龄行动”在思政育人中的潜力与实际需求，并梳理了其在助推“大思政课”发展中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扩大社会宣传、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构建多元化参与平台、推动个人观念更新等方面提出路径建议，以期推动新时代“银龄行动”深入开展，为“大思政课”建设注入持续动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银龄行动”；高校离退休教师；“大思政课”；“思政育人”；积极老龄化

“大思政课”理念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具有深厚基础。2022 年 7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标志着思政课在新时代立德树人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4 年 9 月，全国老龄委发布《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引导老年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要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1]。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在老有所为方面则多重视发展银发经济，对其参与思政育人则少有研究。因此，研究分析作为“五老”之一的高校退休教师参与“银龄行动”，发挥银发力量的独特作用助力“大思政课”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高校“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性

（一）个人层面：满足高校退休教师实现持续社会价值的内在需求

推动高校“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发展，有助于满足高校退休教师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需求，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社会上宣扬积极老龄观。调研发现，受访的大部分退休教师认为自身仍有加强学习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能力，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发挥余热。

（二）高校层面：助力构建“大师资”体系，丰富思政育人资源

推动高校“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发展，有利于高校构建“大师资”体系。2022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中，要求构建“大师资”体系，积极聘请党政领导、科学家、老党员、先进模范等担任思政课兼职教师。高校退休教师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和威望优势，并且具有其他在职教师所没有的独特优势——时间充足。

（三）政府层面：有助于急党政所急、想青年所想、尽关工委所能

“银龄行动”开展二十年来，已成为动员老年人才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载体。2024 年 11 月，民政部进一步明确，新时代“银龄行动”应紧扣国家所需、群众所盼。高校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既呼应“急党政所急、想青年所需、尽关工委所能”工作导向，也有助于将关心下一代工作有机融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

（四）社会层面：弘扬积极老龄化理念，激发老年群体潜能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基本国情。推进高校退休教师参与“银龄行动”有利于在社会上宣扬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提高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自觉，激发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群蕴含的能动作用和潜在能力，调动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广

泛参与公共服务。

二、“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社会认知与宣传不足

对于社会对老年人“老有所为”的关注度，受访者的反馈呈现出一般关注和支持的态势，分别占40.59% 和 33.66%。这表明社会对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关注仍需加强。在访谈和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只有一半的退休教师了解“大思政课”体系，近三成的退休教师了解“银龄行动”，而离退休处和其他学院的工作人员对“银龄行动”的了解也不甚全面。在谈及影响高校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的因素时，约七成的人都选择了“社会宣传不足”，表示未曾或者很少听说过所在高校组织退休教师参与过思政育人的相关活动。

（二）高校平台支持机制不健全

李良俊在《关于发挥高校离退休教职工作用的思考》中表示，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发挥作用的平台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党组织平台、涉老组织协会平台和科学研究平台[2]。在某高校关工委的工作人员处，经调研发现各高校关工委都接到了省关工委下达的通知。有些高校关工委已经依照通知建立或开始建立二级学院关工委，开展过相应的“银龄”宣讲、学术讲座等活动，如河南大学关工委举办的“老教授大讲堂”、河南科技大学关工委举办的“月月谈”大讲堂。但二级学院关工委有“只建不用”、活动组织有“只设不办”之嫌，受众学生范围也有待扩大，受邀参与“银龄行动”的老教师数量也有待提升。

（三）家庭与社会观念存在制约

调查发现，52.48% 的退休教师将“回归家庭”作为退休后的首选项，体现出家庭陪伴的重要地位。约20%的人受访者认为家庭支持不足影响其参与思政育人意愿。部分退休教师虽有继续参与教育事业相关活动的倾向，但由于家人在观念上认为退休后就应该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安享晚年”。由此可见，在崇尚“孝”文化的中国社会上，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家庭支持的不足也是影响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的因素之一。

三、“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建设的问题成因

（一）社会层面：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重视不足

社会上对“老有所为”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社会上失业率也在增加。对比来讲，社会上对老年退休群体的返聘和再就业问题的认识不深。

（二）政府层面：专项支持与机制衔接有待加强

目前直接引导高校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的政策多为宏观倡导，具体实施细则、激励保障、部门协作机制仍不完善。关工委组织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常因缺乏跨部门政策协同而面临落实阻力。

（三）高校层面：组织实施体系尚不顺畅

经调查，高校中组织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的工作开展较少的部分原因在于，高校党委、关工委、离退休处、各学院二级关工委之间的协调配合仍有疏漏，仍会出现因分工不明导致的“上传下不达”的情况。有的高校关工委组织机构尚不完善，退休教师相关工作，活动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化、标准化仍待加强。有的高校虽下设了各学院的二级关工委，但并未打造出一支作风精良的关工委队伍，缺少统一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强有力的组织执行力，无法推动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四）个人与家庭层面：传统养老观念亟待升级

退休教师及其家人的老龄观亟待升级，传统“养儿防老”“安享晚年”“颐养天年”的观念仍具惯性影响力。这种基于年龄刻板印象的社会认知，将老年人固化为需要被照顾的被动角色。在家庭场域中，子女出于对父母健康的担忧或对家庭责任的误读，常以“身体为重”“不必操劳”为由限制退休教师的社会参与，进一步削弱了退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退休教师自身也在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心有忧虑，内在动力不足。

四、“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一）社会层面：强化宣传引领，凝聚协同育人共识

首先，要重视社会各媒体的宣传引领作用。我们应该将有关“银龄行动”和“大思政课”发展的官方文件和政策的解读，通过官方媒体进行宣传。这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两项行动的背景、意义和目标，还能够营造出崇老尚老以及社会全员参与思政育人的社会氛围。

其次，在构建“大思政课”育人体系的时代要求下，推动全社会协同参与“银龄行动”，是实现思政教育从“课堂教学”向“社会育人”范式转型的必然路径。为满足“大思政课”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需求，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银龄行动”和“大思政课”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思政课作为塑造灵魂、培育新人的关键课程，不能没有生命，必须从现实社会中获取营养。”[3]

（二）政府层面：完善政策体系，夯实制度保障基础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银龄行动”的开展和“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支持。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少年的纽带的关工委，其工作的重要性、目的和方案还有很多人不清楚，这就

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支持，突出关工委工作的重要地位，并支持关工委开展如“读懂中国”此类让青年学生走近老教师的系列活动。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更多的老年人和教育工作者参与到“银龄行动”和“大思政课”建设中来。

政府还应对退休人群再就业政策进行调整，针对接受返聘或选择再就业的退休教师完善相关制度，使其权益和利益得到保障。通过搭建跨部门协同平台，整合人社、教育、财政等部门资源，建立退休教师再就业信息数据库，实现岗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精准匹配；运用数字技术开发“银龄就业服务”智能平台，提供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三）高校层面：健全组织平台，拓展多元参与渠道

要完善高校党组织领导下的关工委的组织机制，加强关工委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推动建设二级院系关工委工作。南京大学的毛予倩、陈昕指出，要坚持用党的教育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完善院系关工委一级组织的人员配备、制度配备等[4]。此外关工委要积极与高校其他党团组织、老年大学以及社区开展合作，将自身工作纳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总体格局，还要构建多元“大平台”，有效拓宽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要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思政教育平台，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思政课的范围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5]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学习的需求和全面发展需求。调查显示，大多数老教师在谈及目前退休教师参与思政育人的建议时，提到了建立与学生沟通的途径，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变化巨大的时期，不仅有学习知识的需求，还需要得到老师对其人生规划、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建议。

（四）个人层面：更新年龄观念，激发内生参与动力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传统“消极老龄观”形成的认知桎梏，正成为制约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效能的关键因素。有社会、高校、政府的措施还不够，社会上的每个人，包括退休教师自身，还需树立正确积极的老龄观，告别传统观念。退休教师群体作为知识群体，其自身观念的革新对突破代际价值壁垒具有示范效应。老年人需要更新观念，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不断地实现；年轻人需要转变思想，放弃原有的认为年老就该退位，忽视老年人智慧的保守思想。认识到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经验宝库”而非“负担”，这不仅有助于打破代际隔阂，更能促进知识与智慧的跨代际流动。当社会各阶层都能给予老年人认可与支持，协同发力，才能为“银龄行动”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实施“银龄行动”并将其与“大思政课”建设紧密结合，是盘活优质老年人力资源、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之举。本研究在相关机构支持下，通过对河南省高校的调研，剖析高校退休教师参与“银龄行动”助力“大思政课”的现实图景，揭示了高校退休教师群体在思政育人实践中呈现的理论宣讲优势、实践指导专长及朋辈引导特色，同时也识别出制度保障不足、供需对接不畅等现实制约因素。基于此，从扩大社会影响、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多元平台、深化观念升级等维度提出策略建议，旨在系统激发退休教师群体的“银发智库”育人潜能。展望未来，广泛而深入地推动退休教师助力“大思政课”，必能将其深厚的政治优势、丰富的经验优势和独特的人格优势，有效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践优势，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持久而深厚的“银色”力量，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人才根基与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 2021−11−25(01).

[2] 李良俊 . 关于发挥高校离退休教职工作用的思考 [J]. 老年教育 (老年大学), 2024(06): 29−33.

[3] 杨学慧 , 马方 . “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现状及体系构建研究 [J]. 文教资料 , 2023(17): 32−36.

[4] 毛予倩 , 陈昕 . 新时代高校院系关工委工作长效机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4(39): 13−16.

[5] 习近平 .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J]. 职业 , 2023(19): 4−7.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浅谈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

申艳玲 李海玲 王 琳

摘要：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群体，是国家未来发展与民族希望寄托的核心力量，其社会心态既关系自身成长成才进程与心理健康状态，更对整体社会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现实状况，全面梳理影响其社会心态的各类关键因素，以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手段疏导大学生群体的情绪，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大学生群体的意识认同，以校园文化建设和后勤服务保障为依托开拓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空间，助力大学生群体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心理疏导

随着心理委员制度在全国高校的普遍施行，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取得有效进展。然而，心理委员队伍建设在选拔过程、培训教育工作模式、师资力量与激励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亟待改进之处。为进一步帮助心理委员明确工作职责，培育一支有知识、有能力、敢担当的朋辈心理工作队伍，发挥优秀心理委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心理健康四级网络，强调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这包括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学生心理咨询服务，以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极的社会心态。

一、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内涵

积极社会心态是指个体在面对社会环境和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有自信心、责任感、使命感等积极品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群体，是国家未来发展与民族希望寄托的核心力量，其社会心态不仅直接关联自身成长成才路径与心理健康状态，更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及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学生的社会心态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化，理智化[1]。但不可否认，受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仍有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关注大学生社会心态并培育其积极社会心态，既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有着深远社会影响：一方面，积极社会心态能够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意识，推动他们主动投身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进而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切实助力；另一方面，这类心态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撑，可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学业压力与生活挑战，为自身全面发展筑牢基础。

二、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途径探索

班主任的核心职责之一是关注并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实际班级管理中，研究者针对一名频繁请假的女生开展一对一沟通，该生态度诚恳，明确请假系身体不适。结合前期观察，其学业基础薄弱，高考失利引发的自我否定，正持续影响其在校学习状态。针对该生情况，班主任以专业温和的沟通方式引导其调整认知，明确高考仅为阶段性评价，无法定义个人能力，大学学习与基础教育存在本质差异，更侧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培育，有效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逐步重建学习信心。后续班级管理跟进显示，该生请假次数显著减少，课堂参与度与主动性明显提升，能主动向教师请教问题，学习状态与精神面貌均有较大转变。班主任及时介入、主动关怀、耐心引导，既能助力此类学生走出困境，也能带动班级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2]。在班级管理与育人实践中，班主任相较于其他教育者更易贴近学生，可通过日常相处精准把握学生真实需求、提供适配帮扶并快速建立信任的师生关系，其育人关键在于走进学生内心，洞察真实想法与潜在困扰，以真诚理解和个性化帮扶为学生成长赋能。长期班主任工作实践与深入观察表明，对学生实施针对性、持续性引导，无需刻意采用复杂教育模式，即可有效发挥育人效能，助力学生综合素养与核心能力稳步提升，这也是班主任精准履职的重要实践路径。

（一）加强素质教育

通过加强素质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3]。利用SWOT专业技术工具引导同学们设定明确的目标，从而帮助学生设定具体、可达成的学习和个人发展目标，让他们有方向感和成就感。定期评估学生的目标完成情况，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反馈。这个过程中让学生明白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有心理认识，清晰人生三件事：对于自己的事情要做到全力以赴，对于别人的事情做到尊重，对于一些规则制度做到遵守和接受。作为班主任可以在开设班会的时候开展主题教育，让学生更加清晰自己的人生方向[4]。当学生的人生方向清晰的时候，他的人生也就有目标了，自然人生态度就会更加积极。

（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引导他们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强化意识并主动践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兴趣，进而掌握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通过课内和课外活动，向学生传授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如正念、优势学习、积极心理学的引入等让学生认识情绪、运用情绪而不是控制情绪[5]。在班主任层面可以以小组或者班级班会的形式展开，我作为一线教师，尤其是在春天容易引发情绪的时间点，会更多地引导学生了解积极心态对个人成长和幸福的重要性，加大频率开设这方面主题的班会并取得非常好的成效。会在班会或者私下一对一聊天的时候以聊天的形式融入对情绪的认知；设立情绪管理课程，让学生学习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让学生认识到情绪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都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接纳它们，这就是我。具体的练习操作如下：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人对另一个人说：“我只想让你看到我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你看到我失败的一面。”另一个人用心地说：“我看到你优秀的一面，也看到你失败的一面，这都是你。”然后一个人回应：“是的，这就是我。”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词比如坚强、脆弱等，不断地整合自己的能量，每个练习至少表达六次，基本效果都会很好，做完之后让学生两两分享，甚至有的同学情绪激动眼泪都会流出来，这个时候作为有经验的引导者一定不要去打扰他们，允许他们的情绪流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认知能量整合的练习。另外鼓励学生参与团队项目或活动，提升他们的合作能力和社交技巧，从而增强自信心和归属感。教授学生应对挫折和失败的方法，如积极归因、重新设定目标等。引导学生从失败中学习经验，培养他们的韧性和适应性。

三、未来展望和建议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是中坚力量，未来面临就业，和高中相比不再以学为唯一重心，而是有更多的自主时间，拓展各方面能力，不仅仅是深耕专业，还是兼顾横向学习拓展认知。如何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不仅仅关乎个体发展，还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教育干预的实效性出发，与其期待学生在脱离校园环境后通过试错完成社会适应，不如在培养阶段前置性地建构其适应能力。教师虽无法干预学生的家庭背景，也难以直接影响宏观社会结构，但可以依托专业教育资源，从认知与行为两个层面为学生提供系统性支持，同时通过家校沟通渠道，间接促进家庭教育观念的优化调整。主题班会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价值传递与认知重构的功能。通过班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对现实的理性接纳能力，并建立起解决问题的内在驱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仅仅是教育实践的起点。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化，从理念的接受到能力的习得，中间存在着显著的执行鸿沟。知道不等于做到，缺乏系统规划与持续投入的理念宣导，其教育效果必然是有限的。真正实现教育目标，需要在多个维度同步推进：既要有明确的长期规划，又要保持策略执行的灵活性；既要依靠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育耐心，又要形成可复制、可评估的系统化培养机制。唯有通过持续、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教育干预，才能逐步实现对更多学生的影响，最终形成兼具规范性与适应性的专业育人模式。

（一）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养成是贯穿求学阶段的系统性工程，需凝聚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力量

从现实来看，当代青年面临学业竞争、就业压力与价值多元的冲击，部分学生存在情绪调节能力薄弱、社会参与意愿不足等问题。实践表明，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成长全过程，如通过“红色剧本杀”“党史知识擂台赛”等沉浸式活动，能让青年在历史叙事中理解个体与时代的联结；而心理健康教育可突破传统课堂模式，例如开展“情绪管理工作坊”，以情景模拟训练学生应对人际冲突、学业挫折的能力。校园文化建设则需打造“隐性育人场域”，例如设立“树洞信箱”收集学生困惑，组织“阳光晨跑”“书香交换”等日常活动，让积极心态在潜移默化中生根。

这种培育本质上是“小我”向“大我”的认知跃升。某高校曾开展“社区微治理”实践，学生组队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设计，从调研居民需求到绘制改造图纸，在解决停车难、适老化设施等具体问题中，真切体会到“个体智慧服务社会治理”的价值。这种从关注个人发展到投身公共事务的转变，正是积极社会心态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建议

构建分层心理教育体系：开设“积极心理学”公选课，结合塞利格曼“PERMA模型”（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成就）设计课程模块，让学生通过“感恩日记撰写”“优势卡片互赠”等课堂活动，具象化理解积极心态的构建路径。每月举办“心灵茶话会”，

邀请往届优秀毕业生分享从迷茫到奋起的成长故事，用朋辈力量激发共鸣。

完善心理支持网络：建立“班级心理委员—院系辅导员—校心理咨询中心”三级干预机制。比如某高校推行的“1+1 心灵伙伴”计划，由心理委员每周与宿舍成员开展“情绪树洞”聊天，辅导员针对共性问题组织“压力管理工作坊”，中心则提供艺术治疗、正念训练等特色服务。曾有学生通过“沙盘游戏疗法”，在摆放象征物的过程中梳理了职业选择焦虑，这种非语言的心理疏导往往更易触及深层困惑。

情绪管理实操训练：开发“五分钟情绪急救包”：当感到焦虑时，可执行“478 呼吸法”（吸气 4 秒、屏息 7 秒、呼气 8 秒），配合“身体扫描”放松训练；课后设置“情绪涂鸦角”，学生用彩笔在黑板绘制心情图谱，通过色彩宣泄压力。某理工院校将工程制图软件与情绪管理结合，让学生用 CAD 绘制“情绪流程图”，分析压力来源与应对策略，实现理性思维与感性表达的融合。

打造正向激励闭环：推行“成长可视化”计划：学生每月填写“优势发现表”，记录自己在小组合作中展现的沟通力、在实验课中体现的严谨性等；班级设立“微光墙”，张贴同学间互相书写的“点赞便签”——“你讲解高数题时逻辑特别清晰”“运动会上你坚持跑完 800 米的样子超励志”。这种来自同伴的具体认可，比抽象表扬更能增强自我效能感。

兴趣与目标双驱动：开展“专业 + 兴趣”融合活动：文学专业学生创办“诗歌疗愈社”，用现代诗解读心理现象；工科学生组建“机器人公益服务队”，为留守儿童设计益智玩具。在目标设定上，采用“SMART 原则”指导学生分解任务，如考研备考可细化为“每周完成 3 套真题 + 整理 1 章思维导图”，辅导员通过“目标进度看板”定期跟进，及时给予方法调整建议。

教授学生基本的社交礼仪和沟通技巧，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一个小小的练习——“你会经营自己的人脉吗？”把这个点抛出来，把时间延伸到三年后、五年后。然后让同学们看到自己的同学，并对他说“你是我的人脉”。让学生感受此刻的同学情，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情，珍惜现在的感情，还可以继续延伸活动让同学们去和身边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体验，进一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鼓励学生参与团队项目和集体活动，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指定小组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提升完成任务的能力，还能观察和感受小组建立过程中的模式，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还可以邀请成功人士（榜样力量）或优秀校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和积极心态，为学生树立榜样。

四、结语

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在专业、职业、社会实践、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也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培育方式要不断优化以适应需求，甚至具备提前适应的能力。当代大学生的信念价值观等软件系统也必须不断升级，从而带动更多人影响环境、调整自身行为，具备相应的能力，最终成为有智慧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 赵小云，薛桂英．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现状及其与生涯决策风格的关系 [J]. 现代教育管理，2010(10): 119−122.

[2] 亚米契斯．爱的教育 [M]. 刘月樵，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3] 连山．超级自控力 [M]. 长春：吉林文化出版社，2018: 10.

[4] 李斌．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5] 肖冬梅．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课题“新商科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公共基础课竞赛育训模式研究——以数学建模竞赛为例”（SKJYKT−2405076）。

（作者单位：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路径探究

赵　钰

摘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的关键一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的关键手段。本文旨在探究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路径。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要在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针对理工类高校的专业特色、学生特点及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师资建设、教学改革、环境营造、媒体传播四大路径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增强理工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更多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理工类人才。

关键词：生态文明教育；理工类高校；大学生；环保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理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教材、融入课堂、融入实践、融入人才培育的全过程，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逐步形成思想自觉，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理工类高校由于其学生大多在未来会从事科技研发、工程实践等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具有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独特优势。因此，探究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其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源。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通过大肆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实现快速发展而导致了生态状况的恶化的问题进行质疑。这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埋下了最初的理论火种，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生态理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传承土壤。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将其转化为我国生态治理的系统思维和具体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在社会发展各领域各行业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可否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漠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使得生态问题日益暴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众多可行的措施，比如余村从“荒村”变成全球最佳旅游乡村、塞罕坝从荒漠变绿洲的奇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四大核心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新经济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新系统观；环境就是民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新民生政绩观。这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立德树人关系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必须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 理工类高校是实现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性力量，培养和增强理工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素养对于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有益于生态文明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相符，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符。必须把绿色发展理念和新发展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中，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二、加强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必要性和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些理工类学科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如环境科学、生态学、化学工程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都与生态建设和保护息息相关。通过加强生态文明教

育，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把专业知识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参与者和建设者[2]。作为“小社会”，高校在生态文明教育中责无旁贷。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如何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绿色化”发展？这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作为高校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生态文明教育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少被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理工类高校尤为明显。

（一）生态文明认知缺失和教育理念滞后

一项针对理工类本科学生有关生态文明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尽管生态文明教育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部分理工类大学中并未得到具体体现，究其根源是理工类大学生生态敏锐度不高，在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参与度和认知水平相对有限，并未形成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思想认同和社会融合。总结起来就是理工类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是有所缺失的。理工类高校由于其特殊的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方面的独特优势，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使其养成实践习惯。如果理工类高校学生对于生态文明认知和践行程度过低，这种现状不仅滞后于高等教育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进程，也不能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形成有效协同。

（二）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不够

课堂教学作为学生获取生态文明知识的主渠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3]。首先，课程体系呈现碎片化特征，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多以零散知识点的形式嵌入思政课或专业课，缺乏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到实践路径的系统性建构。其次，教学实施存在表面化倾向，部分教师仍停留在政策文件解读层面，未能将生态危机案例、绿色技术前沿与本土生态实践有机结合。再次，教学评价机制普遍缺位，多数高校未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项考核指标，并未形成一条“知识传递—价值内化—行为转化”的完整育人链条。这种现状既反映出教育系统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知局限，也暴露出传统教学模式与新时代育人要求的深层矛盾。目前，理工类高校的课程体系中，生态文明教育相关的课程设置较少，没有实现生态文明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最后，生态文明教育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与环境保护相关，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理念、价值观以及实践方法等方面涉及较少。因此，生态文明教育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极其有限，使得部分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大多仅仅停留于环保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没有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个人素质的提升。

（三）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分离

教育从来都不是某一方的责任，而是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合作，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当前社会试图构建高质量生态文明教育共同体，必须依靠政府主导、家庭协同、学校组织、社会参与。迄今为止，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良性衔接系统尚未完全形成，使得生态文明教育的正能量没有得到彻底激活，严重影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4]。公众普遍认为理工类高校学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成绩、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综合素质的培养。

（四）高校师资培育体系亟待完善

高校教师承担着向学生传授生态文明知识、理念和技能的重任，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推动者和促进者。这就需要教师深入学习和掌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时代内涵。同时，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举动，如垃圾分类、节约能源等，都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可见生态文明教育需要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然而，理工类高校中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师数量不多，并且部分教师缺乏相关的培训和实践经验，无法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三、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

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认知度和生态文明实践参与度，增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责任感，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及时更新教育理念

在理工类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对生态文明思维的培育，将生态文明思维的培养作为一项关键任务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和学生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5]。通过丰富培训形式、加强教育教学实践锻炼、建立校内外合作交流机制、构建激励保障机制等手段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同时，教师帮助学生培养理性批判的思维能力。比如通过当地极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实例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在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学中，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课程教学全过程，使学生关注城市环境建设和化工行业的环境问题；还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或者课后反思的形式，让学生发掘本校实际的校园生态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掌握实践的具体方法。此外，需要教师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将生态文明价值观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通过列举案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二）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牢筑生态文明实践教学的根基

在高校教育体系中，生态文明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学生真正地将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筑牢生态文明实践教学的根基。一方面，丰富实

践教学形式。与环保企业、自然保护区、城市生态公园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实训、调研，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实践教学考核机制[6]。确保每个环节都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协助学生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使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真正成为提升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重要途径。另外，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活动。学生通过接触前沿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培养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创业意识。这个过程中，既能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更多专业人才，满足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的需求。

（三）营造良好的校园生态文明环境，建设绿色校园

良好的校园生态文明环境是一种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校园规划、建设、管理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整体环境。绿色校园则以直观的方式诠释着高校的生态文明素养。创建绿色校园，营造良好的校园生态文明环境对于高校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绿色校园为理工类高校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无论是校园中的生态景观还是环保设施，都是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既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又促使生态文明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其次，绿色校园建设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教育氛围。通过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公益环保社团组织活动、绿色科技创新竞赛等方式，吸引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促使他们运用所学的理工类知识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7]。最后，绿色校园建设有利于提升理工类高校的社会影响力。绿色校园展示了理工类高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成果，既能提升学校和专业的社会影响力，还能促进高校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推动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四）以新媒体为媒介，激活生态文明教育的新动能

新媒体的兴起为生态文明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迈上新台阶。第一，借助新媒体技术（如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良好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福祉，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关注热情。第二，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聚集大量人气。发起关于环保话题和公益活动的讨论，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第三，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现代化。鼓励更多的学生创作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作品，传播积极的生态文明价值观。第四，开发新媒体平台的育人功能，增强大学生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协助理工类高校共同建构大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第五，实现信息互通。新媒体加强了不同地区高校之间的交流，实现生态文明教育资源的互通互享，为理工类大学推进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理工类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困境是教育生态系统的多重结构性矛盾造成的，所以，生态文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师资、教学、环境、媒体四大途径，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教育的质量，培养更多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理工类人才，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同时，理工类高校应不断探索和创新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路径，增强维护生态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论教育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4.

[2] 刘小华 , 李康 .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 : 时代诉求、现实问题与实践进路 [J]. 云梦学刊 , 2023(03): 116−124.

[3] 李金华 , 康亚玮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理论溯源、核心内蕴及时代价值 [J]. 党政干部学刊 , 2023(02): 9−16.

[4] 亓慧坤 , 王新茹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24(02): 1−4.

[5] 吴晓玲 , 李宁清 , 曾锐 .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J]. 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2024(12): 19−22.

[6] 王艺璇 , 赵尔康 , 任新 , 等 . 高等师范院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探索 [J]. 理论 , 2024(10): 28−30.

[7] 李俊彩 . 新时代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探析 [J]. 科技导刊 , 2024(26): 34−36.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助教）

理工赋能生态 教育涵养文明

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研究

林艺凤

摘要：提质培优背景之下，高职学生管理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从体制配备、管理现状和创新策略三个不同维度着手，深入探讨了高职学生工作的创新对策。文章详细剖析了提质培优对于高职学生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明确指出了当前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影响因素，提出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新四大对策，同时还阐述了实施这些对策所需要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资源支持，期望可以为高职学生工作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和实践层面的指导。

关键词：提质培优；学生管理；管理现状；创新策略

在提质培优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场所，其对学生的管理工作无疑相当关键，但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契合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迫切需要进行创新。基于此，文章对提质培优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创新的应对策略展开探讨。

一、提质培优在高职教育中的定位

提质培优是要提升质量并且培育优秀成果，在高职教育领域中，提质培优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以及提高人才培养适应性的关键举措，它主要关注的是全方位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涉及课程体系的优化、师资队伍的建设、实训条件的改善等多个方面。在高职教育中，提质培优占据着战略核心的位置，是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途径[1]。借助提质，可让高职教育的教学内容更加紧密地贴合行业发展的前沿，以此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依靠培优，可以挖掘学生的潜力，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行业精英，为社会输送大量契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优质人才，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提质培优对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新要求

（一）政策解读与目标导向

为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教育主管部门联合多部委相继颁布多项指导性文件，系统推进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政策导向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对院校学生工作提出多维创新要求：在人才培养层面，强调构建“技能 + 素养”双轮驱动模式，要求职业院校注重学生专业技术能力锻造，更需强化其工匠精神培育、创新思维养成及社会责任意识塑造；在管理机制改革层面，着力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凭借简化冗余环节提升决策精度和落实效果，实现从经验型管理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型管理转型。新政策框架推动学生管理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创新性地将思政引导与职业素质培养渗透到日常管理各环节，形成课堂教学、实训操作、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切实保障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升级需求侧的精准对接[2]。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质培优工程实施过程中，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呈现多维度协同发展态势。在思想引领层面，依靠构建浸润式思政教育体系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借助主题研学与实践课程相结合的模式，着力塑造青年学子的家国认同与责任意识。专业能力锻造方面，职业院校立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重构“岗课赛证”融合的课程生态，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模块化教学，使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掌握关键技术，同时贯通职业资格认证考核通道，有效提升岗位适配度[3]。创新素养培育环节，依靠搭建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实施赛教融合项目，系统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跨界思维品质，建立五育融合培育机制，重点关注职业心理素质养成、跨领域协作能力提升及职业沟通技巧训练，保证毕业生能快速适应职场生态，实现职业发展与价值创造的有机统一。

三、当前高职学生管理现状分析

（一）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传统管理模式转型滞后非常突出，多数院校仍延续行政指令式的单向管理模式，过度依赖制度约束而对学

生个体需求的关注不足，致使学生群体普遍存在参与意愿淡薄和隐性抵触现象。在评价机制层面，现行体系过分倚重理论考核指标，对实践操作、团队协作等职业素养维度缺乏系统评估，社会服务类实践活动的量化评价标准尚未健全，难以形成立体化的素质评价图谱。管理团队在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素养方面存在结构性缺失，基层管理者未接受过系统岗位培训，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职业规划等复杂问题时存在专业能力瓶颈，制约了管理效能的整体提升。

（二）影响学生管理质量的因素

生源特质差异构成教育管理实践中的核心挑战，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特征，其学习基础薄弱、自律意识参差不齐等现象普遍存在，形成多维度的管理阻抗。家庭背景因素同样产生深层影响，教养模式的代际传递与经济条件的悬殊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存在价值观偏差与适应性障碍，这种家校教育的协同断裂需要修复[4]。从资源配置维度审视，当前院校普遍面临专业支持系统建设滞后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心理健康辅导硬件配置滞后、管理队伍专业化程度不足等现象，制约育人效能的精准化提升。娱乐化网络生态与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交织作用下，青少年群体易受负面信息影响，这种复合型社会压力源持续冲击着校园管理系统的稳定性边界。

（三）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高职院校扩招带来的生源规模持续扩大，传统管理模式正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激增的学生群体使得管理负荷呈几何级数增长，如何在提升管理效能的同时保障育人质量成为需要破解的困局；另一方面，教育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部分院校仍沿用陈旧的管理系统，难以有效支撑日常管理工作。产业转型升级使得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对院校及时调整培养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依托大数据画像、智能分析等技术构建精准施策的管理模式渐成可能，凭借深度挖掘学生行为轨迹数据，能实现潜在风险的智能预警，可量身定制成长方案，这种“数智赋能”的管理创新正在重塑高职院校的育人生态，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四、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对策

（一）制度创新：完善学生管理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在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中，高职院校需要系统梳理现行学生管理体系，重点剔除滞后条款和形式化规定。建议构建融合发展的评价框架，将专业技能竞赛获奖、创新创业成果等纳入评优体系，打破传统唯分数论的考核模式，需同步完善权益维护通道，设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保证学生在受到纪律处分时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复议等程序性权利[5]。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建立“成长银行”积分制度，将志愿服务时长、企业实习评价等转化为可累计的素质学分，配套设立专项奖励基金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研修或创业孵化，借助构建有弹性的制度更新机制，形成“评价—反馈—优化”的管理闭环，使育人规范保持相对稳定又有时代适应性。

（二）方法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效率

建议采用现代数字技术构建综合型学生管理服务平台，凭借数据中枢系统实现学籍档案、课业表现、日常考勤、荣誉处分等多元信息的动态整合与跨部门共享。在技术应用层面，可建立生物特征识别系统优化考勤机制，同步构建校园行为分析模型，对膳食消费、网络行为等轨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早期预警机制。依托云平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矩阵，打造 24 小时在线的心理辅导专区，构建精准化的成长支持体系，该模式借助智能化手段重构管理流程，减少传统人工管理的疏漏，提升校园治理的响应速度与服务效能，全面推动学生管理工作向数字化转型。

（三）内容创新：丰富学生管理内容，注重能力培养

在学生管理体系构建中，突破传统纪律约束框架，系统构建职业素养培育体系，借助职场软实力课程模块系统覆盖职业发展规划、现代商务礼仪及高效团队建设等实务领域，协同企业导师形成“理论教学 + 场景实训”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此基础上打造“双创”教育生态圈，依托创业竞赛、项目孵化平台及创新思维训练营等载体，有效激活学生的商业“嗅觉”与创业潜能。深化实践育人路径设计，整合社区志愿服务、公益项目运营及企业岗位实战等多元实践平台，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与职业适应能力，同步构建多维成长支持体系，创新体育俱乐部制管理模式，开展心理健康工作坊与成长导师计划，全面对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切实培育兼具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四）文化创新：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立足职业教育特色构建浸润式育人生态，在环境营造中实现环境育人目标。策划多元化主题活动，例如组织专业技能竞赛周，搭建各院系学生技艺展示擂台，激发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联动地方非遗传承人开展美育工坊，培育兼具职业气质与审美情趣的新时代工匠；优化校园景观设计，将职业特色融入空间布局，设立劳模工匠主题园地，用互动装置呈现技术革新历程，打造杰出校友成长轨迹墙，依靠二维码延展职业发展案例库。深化学生社团的供给侧改革，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

在这一背景下，孵化产教融合型兴趣小组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这类兴趣小组不仅融合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热爱与探索精神，还深度链接了企业与学校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兴趣相促进的独特平台。依托校企双方的丰富资源，共同开发一系列职业素养训练项目。这些项目紧密围绕行业需求，旨在通过模拟真实工作场景、引入企业导师指导、参与实际项目研发等形式，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团队协作精神、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等关键职业素养。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能够提前适应职场环境，为将来顺利步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为了构建更加系统、科学的能力培养体系，采取阶梯式的教学方法。从基础技能的培养到高级技能的掌握，每一个阶段都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能力培养重点。这样的设计既保证了学生知识的连贯性和深度，又鼓励他们在不同层级上挑战自我，实现能力的逐步跃升。

五、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创新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体系的创新升级离不开高素质师资团队的建设，需构建常态化培训机制，依靠聘请教育领域权威专家及资深管理者开展专题讲座与案例研讨，重点强化教育学前沿理论、心理辅导策略以及智慧校园管理工具的应用能力，这种持续的知识更新机制能有效提高学工人员对学生心理状态的研判能力，并提升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终端等数字化手段开展管理工作的实操水平。应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定期安排管理团队赴校企合作单位进行岗位实践，特别要深入对接区域重点产业，使学工人员精准把握行业用人标准与职业发展路径，将产业新规范、岗位新要求有机融入学生日常管理与生涯指导，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平台，借助月度工作坊、季度成果展等形式促进管理经验的流动共享，形成协同创新的良性生态，最终培育出专业素养过硬、管理理念前沿的现代化学生管理师资梯队。

（二）资源投入与支持

创新对策的有效落地需要以完善的资源保障体系为支撑。在硬件资源配置层面，教育机构应当构建智能化学生管理平台，借助引入云计算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搭建具有数据整合、动态监测和精准服务的综合性数据平台，同步升级校园文体设施配置，打造多功能活动空间，为社团运营和素质拓展提供智能化设备与交互式场景。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建议采用校企协同模式支持优质课程资源的开发，整合行业标杆案例和国际前沿管理模型，构建模块化的学生管理知识图谱。通过设立专项创新基金，对在管理实践中取得突破的团队和个人给予奖励，建立包含物质激励、职业发展通道和精神表彰的复合激励机制，全面激活管理队伍的创新动能，形成可持续的资源支持生态。

六、结语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在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属于一项系统工程，这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以及社会等多个方面共同付出努力，借助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可有效解决当前高职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就业竞争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给予资源投入支持是实施这些创新对策的关键保障。未来，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会不断朝着新的高度迈进，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 杜昀 .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创新对策探究 [J]. 试题与研究 , 2021(02): 138-139.

[2] 肖兴 .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创新对策探索 [J]. 大众标准化 , 2020(12): 215-216.

[3] 潘琴 . 大数据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创新对策初探——以高职院校为例 [J]. 侨园 , 2020(03): 77.

[4] 王威 , 肖金峰 , 王慧 . 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对策研究 [J].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8, 17(02): 87-89.

[5] 陈颖 . 关于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创新 [J]. 青春岁月 , 2015(13): 173.

（作者单位：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时代背景下学生骨干在高校舆情信息工作中的作用探讨

任　瑞　刘艳辉　张珊瑚　李佳洳　葛靖阳

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高校成为网络舆情的敏感区和发源地，学生骨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舆论传播带来了新挑战，高校需构建完善的舆情预警系统和应对机制。在学生骨干培养工作中，高校需要通过筑牢理论根基、打造网络思政平台、创新思政教育方式、加强家校合作、加强“第二课堂”建设等方式，全面提升学生骨干的价值观塑造水平和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学生骨干需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积极发挥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作用，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大学生骨干；舆情；思政育人；社会心理学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在互联网、网络强国和网络安全方面，“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等。这些关于互联网的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从国家总体宏观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指出工作成就以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1]。

二、高校网络舆情在数字时代的特点

（一）数字时代网络伴随大学生成长

大学生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高校是科研的高地，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地，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网络的自由化发展深切地影响着每一个当代大学生。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因生源地不同，在思想上、情感上、生活习惯上都有着巨大差异。可以说高校是各种思想汇集和碰撞的地点，也是网络舆情的敏感区和发源地。一旦有社会热点问题发生，在高校可以快速引发传播，社会问题在高校进行发酵和传播后，往往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高校的网络舆情进行调研，可以更好地控制社会网络环境的发展。高校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也最具创造力，思想活跃且具有社会责任感。营造良好的新时代大学生网络使用环境，是管控网络舆情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

（二）数字时代学生骨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大学生骨干具有引导大学生思想变化发展的重要功能。在大学，学生骨干通过班级、学生会、学生组织民主选出，其综合能力高于普通同学，但同时也有学生思维的局限性。学生骨干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理解网络、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对学校的整体价值观教育，尤其是网络校园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大学生骨干培养体系一直在建立中。

大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冲击。比如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影视作品，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中的文化娱乐产品有大量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因此需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学生骨干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学生，也是教育的实践者，是学校辅导员教师的助手，也是管理者。多重身份要求学生骨干具有更强的自我管理和学习的能力。学生骨干能为其他学生带去好的影响，因为学生干部是学生思想变化的实际体验者，对于广大同学来说也更有说服力。只有发挥大学生骨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并帮助大学生走向思想、政治上的成熟。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新一轮严峻考验

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真人与AI、校园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模糊。这对于校园舆情信息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学生骨干培养有

着新目标、新使命、新要求。辅导员教师要有培养学生骨干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责任。大学生的思想变化源自外界社会，也源自学生本身。学生骨干在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是先进思想的优良载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快速生产信息及新闻，并突破了文字、图片、视频的限制，做到了“有图有真相”，也做到了“量大管饱”[2]。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数据的能力远超普通人，在新闻及信息制作过程中，有巨量的假新闻、假消息产生，不可避免地产生偏离事实的系统性新闻失真问题。

三、高校应对舆论突发事件的流程框架

高校热点舆论事件根据信息源头大致可以区分为校内首发和社会首发倒灌入校园。需要针对信息的传播、引导等各个环节分别采取措施，结合学校现有资源，有效管控。校内首发的舆论事件应重点解决事件源头，谨慎处置舆论源，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对于校外首发的舆论事件，高校“主动出击”有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需要综合研判事态发展趋势，统筹学生骨干宣传阵地。

校内突发舆情事件需注意：一是统一口径，根据事态发展及时进行组织部署，开展信息公开和舆情监测工作，最终形成统一口径；二是慎重公开，慎重研究信息公开的方式以及对象，只对受到事件影响的师生进行信息公开，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内容简明扼要；三是动态关注，舆论事件变化快，面临着随时“翻转”的可能，需要及时更新信息，掌握事件发展动向。

四、如何对学生骨干进行价值观培养教育

（一）读书悟道，锚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哲学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时曾强调：“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总书记用“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来形容当前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的浮光掠影式学习，建议青年学子要避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学习方式。要做好学生骨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让他们学习、读书，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道。 政治的敏感度决定了培养的效果，思想的深度决定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学校层面，需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学生骨干培养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四史”、革命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教育。学生骨干是党的青年人才的后备军，做好学生骨干的价值观教育培养，是党和人民赋予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短视频”时代，凸显了“短”和“快”的特点。人们读到一条信息或视频，几秒钟内就会决定是否继续看下去，抑或是点“下一个”。“快”的特点决定了视频制作者往往会把内容一再凝练，力求用最短的时间吸引个体最大的注意力。凝练后的“碎片化的信息”是无法展现视频的全貌的。“快餐化的知识”带来的营养也是单一的，不足的。长期“食用”这类知识副作用极大。怎么解决这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读书，尤其是读原文、原著是最好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这方面就起到了表率作用，订阅书籍、杂志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平台。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学生骨干领学原文、原著，学生党员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都是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二）打造平台，紧跟网络时代潮流构筑高校网络高地

网络是开放的、共享的，也是富有感召力的。高校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络思政平台。学生用什么，学校的目光就应当在哪里。当今社会各种应用软件更新速度极快，新的 App 层出不穷。从最初的人人网、微信朋友圈、QQ 空间、贴吧，扩展到树洞、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知乎、B 站、视频号等。学校的网络平台建设也应当与时俱进，总体上实现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从单一灌输到生态培育的范式转换。学生骨干是建设新时代网络高地的主力军，他们有活力，有想法。学校应对在网络上积极发声的学生骨干给予经费、物资方面的支持。让学生骨干有能力、有底气去做有关工作，引导学生使用正规、官方的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氛围。平台发布的内容也应该更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富有活力。平台需要的是广大学生群体想听、爱听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学校也需要配备教师骨干力量对其进行引导，坚守政治底色。

（三）创新思维，通过文娱活动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文娱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日益丰富。对于学生骨干而言，单纯的理论学习不能作为全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手段。思想教育需要“接地气”，需要在“玩”中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观教育。例如“红色剧本杀”就是近年来出现的极具特色和感染力的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红色剧本杀”满足了大学生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与人际沟通的心理需求[3]，增强了角色的代入感与沉浸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学生能够以第一视角经历和见证历史人物身上肩负的使命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游戏的过程也会提高学生的共情能力，使他们释放心理压力，调节情绪，以更好地应对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学生骨干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推广和带动作用，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激发最广大学生群体的爱国热情。

（四）家校合作，价值观教育不应摒弃和隔离学生的原生家庭

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价值观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家庭作为学生最早接触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价值观传递具有基础性和持续性。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协同共生理念整合家校资源，避免割裂式教育。学校的作用在于激活家庭作为文化基因库和价值转换器的双重功能。例如邀请学生讲述自己祖辈的革命奋斗史，从身边的小故事入手，以小见大。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的方法植入家庭生活场景，实现个体家庭叙事与国家发展话语的深度融合。家校合作也是对家长教育理念的提升，大学可以通过线上讲座和培训等方式提升家长的教育水平。

（五）政策引领，发挥“第二课堂”思政工作指挥棒的指引作用

高校建设“第二课堂”以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与发展为目标。“第二课堂”不同于专业课的考核机制，评价体系相对更复杂、更人性化，但其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教育底色没有变。通过政策引领将“第二课堂”纳入高校教育体系，实质上是推动思政教育从“柔性倡导”转向“刚性约束”、从“碎片化活动”升级为“系统化工程”。这种变革通过制度设计将“四个自信”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参与、可创造的行动方案，最终实现“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育人目标，使“第二课堂”真正成为锻造时代新人的有效途径。

（六）学生骨干在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

网络群体极化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指群体决策比个人更容易走向保守和极端。学生骨干在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扮演着多重复杂角色，其作用既可能是极化加速器，也可能是理性调节阀，具体取决于学校的管理、学生个人价值立场与行为逻辑[4]。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如在热点事件中，学生骨干若未经核实便转发片面信息，利用其影响力强化群体偏见，也容易放大负面情绪。在谣言扩散初期，学生骨干需要利用组织渠道，如班级群、社团微信公众号，发布权威信源对比图，让事件回归真实。

五、学生骨干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一）以点带面，从教育活动入手解决实际问题

用现有资源结合党课、团课、专题培训培养学生骨干。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引领和带头作用，组织相关培训和讲座。使学生党团干部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5]。要提高学生干部的思想觉悟，着力做到知行合一，巩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责任体系。开展“爱国、爱家、爱生活”以及“感动、感恩、感悟”等主题活动，将大学生日常生活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结合。发挥主题教育引导学校网络舆情的导向作用。

（二）明确边界，坚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

2025 年 3 月 28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法律明确了网络公共秩序的范围，网络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个人的隐私和名誉不容践踏。在实际生活中，需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普法教育任重而道远。学生骨干引导网络舆论工作时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精神，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师生联动，培养新时代“中国好网民”

通过对现有部分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能力培养，传播网络正能量。学校需要组织师生，通过班级班会、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团日活动、座谈会等形式就学校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线上线下总结交流经验，强调正向的舆论影响力。在网络上“发声”是学生骨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建设舆论阵地最关键的一环。培养新时代“中国好网民”，让大学生能够在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学生骨干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 王学俭，朱大鹏．大学生思想变化规律与学生骨干理论素质培养 [J]. 思想教育研究，2009(12): 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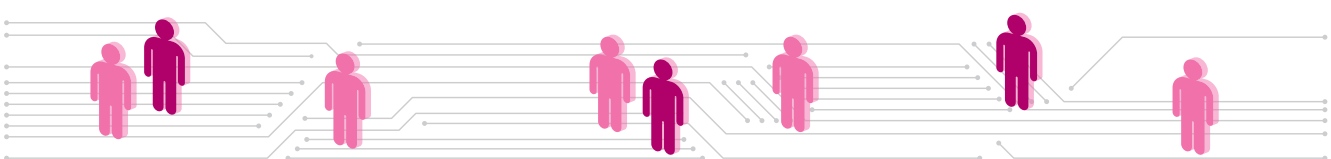
[2] 李明德，李聿哲．赋能和消解：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真实的碰撞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45(02): 109−118.

[3] 韩瑞娜，朱孟迪．红色文化游戏化传播创新路径探析——以红色剧本杀为例 [J]. 传播与版权，2024(16): 85−87.

[4] 林佳文，唐才茗．网络群体极化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负面影响及其纠治策略 [J]. 中国新通信，2024, 26(23): 112−118.

[5] 杨林玉．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D]. 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23.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五育融合＋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研究

梁　燕

摘要：本文从当前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基于PERMA理论的“五育融合＋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在高职院校的应用，介绍了PERMA理论的五个要素，并详细阐述了该模式的内涵、构建过程、特点以及对学生和带领人的积极作用。该模式创新性融合PERMA理论与高职教育特色，形成“特长驱动—五育融合—职业赋能”生态闭环，立足学生个体特长，通过五育融合的“团体合伙人”机制激活学生主体性，强化自我认同感与职业自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一站式”学生社区；五育融合；特长驱动；团体成长

一、问题提出

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该专项行动计划着重强调了通过五育并举的方式促进心理健康工作，并将其作为首要任务。2024年4月，教育部思政司发布《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第一版）》，将丰富社区学生活动体系作为基础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了社区学生活动体系的具体要求：完善社区德育活动体系，丰富社区智育活动内容，健全社区体育活动体系，构筑社区美育活动体系，强化社区劳动教育活动体系。

“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新时代高校育人的前沿阵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服务体系。但目前高职院校在实施“一站式”学生社区活动的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与不足。首先，活动形式创新性不足，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主要以党团活动、主题班会、学习互助小组、学术讲座以及各类社团活动、宿舍文化节等活动形式为主，部分活动形式较为传统，缺乏创新性和吸引力，导致学生参与积极性未达预期，部分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其次，学生参与活动纵深度不足，“四自”意识不强。学生是“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主体，然而在实际活动过程中，学生更多承担接待、志愿者等较为单一的工作，参与活动纵深度不足，导致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四自”意识不强。因此，探索一种有效的学生活动模式，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心理健康、深化思政教育及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应用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PERMA理论[1]认为，个体在追求幸福过程中，需要关注五大要素：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hievement）之间的平衡与发展。在团体活动中融入PERMA理论，依托社区服务、公益活动、主题工作坊、体育运动等多形态活动载体，设计活动的多元实践路径，有效激发参与学生的积极情绪；同步设计具有适度挑战性的实践任务，引导学生积极投入、深度参与，从而提升其参与度和专注度；通过团队建设、合作互动等环节有助于增进成员互信、培育互助合作精神，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引导学生感受个人行动的社会意义与自我价值实现；通过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或团队给予及时肯定和鼓励，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三、“五育融合＋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内涵

“五育融合＋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是基于PERMA理论支撑的一种团体成长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聚焦挖掘和孵化具有个体特长的学生，通过培育团体活动带领人（即团体合伙人），设计综合性、

多样性、创新性的团体主题活动，将德、智、体、美、劳“五育”目标有机融入活动实践中[2]，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以学生个体特长驱动活动设计，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通过团体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形成稳定的团体成长模式，包括团队成员招募、目标设定、活动实施、成果展示、分享反馈等环节，促进团体成员间的互助共进与协同成长。

该模式包含以下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五育素养提升，不仅重视学生个体特长发展，还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能力的全面发展；二是特长协同发展，学生在团体活动中不仅能发挥个人特长，还能在兴趣的引导下与团队成员协同合作，共同进步。

四、“五育融合 + 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构建

（一）特长招募与选拔

目标是吸引具有个性化特长的学生积极参与，为团体活动提供丰富的带领人资源。通过校园广泛宣传，如海报、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等渠道，发布“团体合伙人招募”信息，创造积极、包容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被重视和认可（积极情感 Positive Emotions）。选拔过程中，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如手工串珠、绘画、摄影、音乐、美妆、花艺、主持等，根据展示效果和学生综合素质，选拔出最具潜力和热情的团体活动带领人（投入 Engagement）；鼓励学生互相交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s）。

（二）专业培训与荣誉

目标是提升团体活动带领人的活动设计能力和成就感，增强其对该团体活动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面向团体活动带领人开展包括团队建设、活动策划与实施、沟通技巧等方面的专业培训，让活动带领人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活动意义（意义 Meaning）。活动结束后，为表现优秀的团体活动带领人颁发聘书，增强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感、责任感和成就感（成就 Achievement）。

（三）五育融合与创新

目标是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五育元素融入团体活动中，实现五育融合[3]。以 PERMA 理论为基础，分析每个要素在团体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方式，结合高职教育特色和学生需求，设计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团体活动主题，在活动策划过程中，注重将五育元素有机融合，形成综合性活动方案。

（四）特长驱动与协作

目标是团体活动带领人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提出初步活动设计方案，激发参与活动学生的积极情感，如好奇、兴趣、快乐、满足、欣赏和兴奋（积极情感 Positive Emotions）；组织团队讨论和修改，增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协作（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s）；完善活动方案的内容和形式，确保活动具有挑战性，让活动带领人和参与的学生都能够全身心投入（投入 Engagement），团体中的投入状态具有传染性，能够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邀请校内外指导老师对活动方案进行评审和指导，确保方案的可行性，让参与活动的学生理解活动价值和长远影响（意义 Meaning），增强全体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成就 Achievement）；进行最终修改和完善，形成特色鲜明的团体活动方案。

五、“五育融合 + 特长驱动型”团体成长模式的特点

（一）激发动力：以个体特长驱动群体潜能

“特长驱动”是该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旨在通过挖掘团体带领人的特长优势，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同时以个体特长优势驱动群体学生的共同成长。

优势深化与示范效应：选拔具备摄影、美妆、音乐、手工制作、园艺养护、体育运动等特长的学生作为团体活动带领人，不仅能够提升其在优势特长领域的技能熟练度，还能通过“榜样示范”效应激发其他学生的兴趣。

资源优化与个性化适配：在资源有限的高职院校，通过整合学生自身特长，设计低成本、高参与度的五育活动，如：“以德育心—红色文化心灵之旅”“以智慧心—博弈推理”“以体强心—Campus Walk”“以美润心—愈见‘泥’自己”“以劳健心—树叶拼贴画等”，既节省经费又贴合学生兴趣。

强化参与与过程体验：避免部分参与活动的学生因能力水平较低而产生自卑心理。强调“参与即成长”，强化过程体验，弱化评价结果，确保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均能通过协作完成体验，既发挥团体活动带领人的引领作用，又保障参与活动学生的体验感和参与感。

（二）激发责任：以协作互动促进团体成长

通过多层次互动，促进参与活动学生间的知识共享、情感互动与能力互补。

角色分工与协作互助：在团体活动开展过程中，通过明确的角色分工和协作互助激发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在“以德育心—红色文化心灵之旅”活动中，小组成员需分别承担区域红色历史文化解读、游戏策略制定、团队协调等任务完成小组任务。

互动形式创新：突破传统单向讲授模式，采用沉浸式、游戏化设计增强互动体验。比如，在“以体强心”模块中引入“校园趣味寻宝”，将体育目标与团队寻宝任务有机融合，学生在奔跑、讨论、合作中自然形成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

技术赋能与线上参与：针对部分内向或不善表达的学生，可借助线上平台（如虚拟社区、匿名反馈系统）降低参与门槛。例如，在“以美润心”模块中参与活动的学生可通过匿名投稿方式展示作品，获得朋辈评价，既保护学生隐私又促进互动。

（三）整合资源：五育融合有机统一

五育融合不仅是政策要求，更是模式设计的底层

逻辑，需通过系统化的活动设计实现德、智、体、美、劳有机统一。

融合路径具象化：在单次活动中嵌入五育维度教育目标。比如，“以劳健心·我的花草世界”活动中，学生种植植物的过程（劳育）需记录生长数据（智育），设计花盆造型（美育），参与小组分工（德育），在绿植养护中锻炼身体（体育），实现五育渗透。

跨学科资源整合：整合校内外资源，形成多部门协同育人的机制。比如，邀请体育教师指导“地壶球训练营”（体育），思政教师参与红色文化剧本设计（德育），美育教师点评艺术作品（美育）等。

（四）压力疏解：培育积极心理品质

该模式在活动设计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既注重短期情绪调节，更强调长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疏解情绪释放压力：在“以美润心”模块中设置“音乐放松角”，学生可通过即兴演奏或倾听舒缓音乐释放情绪压力；在“以体强心”模块中通过高强度团体运动促进内啡肽分泌，改善焦虑情绪。

强调归属感和意义感：通过意义（Meaning）要素的设计，帮助学生建立活动与个人成长的联结。比如，在公益类活动中，带领人引导学生讨论“我的特长如何服务社会”，摄影特长生为社区老人拍摄照片，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自身价值，增强社会归属感。

培养积极心理品质：在挑战性任务中嵌入“成长型思维”训练[4]。例如，在“以智慧心”推理活动中，设置需多次试错才能解决的难题，带领人通过引导反思（如“失败教会了你什么”）帮助学生将挫折转化为学习机会。

（五）持续发展：构建长效育人生态圈

该模式注重可持续性，通过制度保障、资源循环和传承机制，形成动态发展的育人生态。

“老带新”传承机制：优秀带领人可晋升为“导师”，指导新晋成员策划活动，形成经验传递链条。例如，在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中，首届“剧本杀主持”带领人通过工作坊培训下一届学生，确保活动创意的延续与优化。

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开发“五育活动资源库”，将活动方案、活动模板、道具清单、风险评估表、学生反馈等资料按照五育目标进行分类，整合为在线资源库，供后续团队参考。

校社联动与品牌孵化：与社区、企业合作拓展活动场景。如“以劳健心·我的花草世界”可延伸至校外社区绿化项目，既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又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

（六）产教融合：五育赋能职业教育创新实践

该模式注重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深度契合[5]，可依托产教融合、“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项目，以地域性非遗、红色文化为载体，将“职业价值观”“文化自信”、专业技术特长、项目实施开展、成果转化、社会价值体现等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目标有机衔接，凸显高职院校在五育实践中的教育特色。

六、结语

本模式破解高职院校两大痛点：一是资源瓶颈，通过学生特长转化降低活动成本；二是参与度不足，通过“团体合伙人”机制提升学生主动性，嵌入高职教育特色，形成“特长驱动—五育融合—职业赋能”生态闭环（见图1），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成长环境，充分挖掘学生潜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学生社区的集聚效应和榜样效应，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激发团体活动带领人和参与学生的双向积极情绪和成就感，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特长为纽带、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型教育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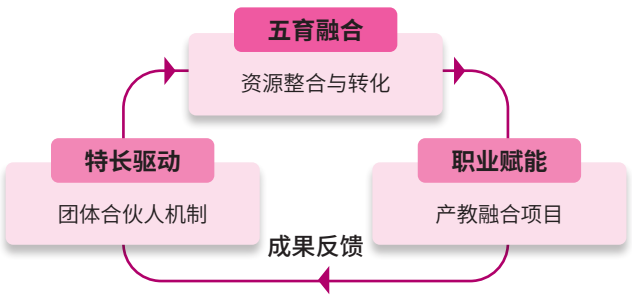


图1 “特长驱动—五育融合—职业赋能”生态闭环

参考文献

[1] 马丁·塞利格曼. 积极心理学 [M]. 任俊, 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2] 候高翔. “五育”融合视角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J]. 科幻画报, 2024(05): 42-45.

[3] 朱婷霞. 例谈“五育”视角下学校心育活动的创新与实践 [J]. 全国优秀作文选（教师教育）, 2024(06): 22-23.

[4] 王丽丽, 李明. 基于Perma理论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设计与实践 [J]. 心理健康教育, 2018, 8(02): 32-35.

[5] 陈旭. “五育融合”视域下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探索 [J]. 山西青年, 2025(10): 114-1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茂名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校级科研项目（重点项目）“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202413）；2025年广东省教育厅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五育融合视域下粤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2025GXJK0990）。

（作者单位：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沉浸式”党课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探索

巫健坤

摘要：在党员发展、教育和管理中，传统党课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存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互动性和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沉浸式”党课作为一种创新形式逐渐兴起。为充分发挥党史学习教育在强化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和抵制错误思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对学生党支部党课教育方式进行创新，探索通过“沉浸式”党课学习党史的实践，以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沉浸式”党课；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高校学生党支部是高校党组织联系广大学生群体的桥梁纽带，是引领学生成才成长的重要战斗堡垒，而高校党课作为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的重要一环，对培养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作用，能够促进青年学生系统地了解党的理论知识，贯彻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党员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教育，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这为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存在问题

自笔者所在的学生党支部成立以来，党支部组织举办了一系列的党课党史学习教育，党支部成员增进了对党史的了解和认知，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支部的党课学习活动局限于简单的理论学习，开展形式较为单一；表现为单向灌输式的讲座和集中理论学习，缺乏创新性，支部党员参与度和主动性不太高。想要带动支部党员更加投入，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还需要在以学促干、以干践学上下功夫。

针对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反映的“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坚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成才规律[1]。为了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学生党支部充分发挥学院师生，特别是学生党员的专业优势和个人专长，创新党课教育方式，积极进行“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实现从教材到故事、从照本宣科到“情景对话”、从单向输出到翻转课堂、从形式单一到“艺术赋能”的重大转变。通过将党史学习教育前置、转变授课主体、开展实地党课、丰富课程活动等方式，使学生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推进党史浸润，将党史故事讲好讲活，充分调动党员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党员将党史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

“沉浸式”党课是指将“沉浸式”的体验贯穿于党史学习教育中，使学生党员在党史的具体情境中感同身受，在“沉浸式”党史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中深刻领悟党史。“沉浸式”党课将党史课堂搬到户外、搬到现场，用好用活党史教科书，真正引导学生党员穿越历史长河，实地缅怀先烈，感受彼时此地，对话历史人物，重构历史样貌，实现了从照本宣科到“情境对话”的转变。“沉浸式”党课显著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激励更多的学生党员铭记历史、砥砺前行[3]。

二、“沉浸式”党课实践路径

（一）提升思想认识，践行初心使命，构建认知提升体系

支部积极开展精神感悟系列活动，构建支部成员认知提升体系。借助接收新发展的预备党员的契机，举办6期“重温入党誓词，叩问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明确作为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会，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和党性修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权利，更是党员的义务；定期举办党章党史

知识竞赛和集中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学习党章党史，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建党百年的光辉历史和奋斗历程，提高学生政治理论学习水平，增强学生对党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觉传承践行红色基因；开展“师生共读一本书”系列活动，目前累计共同学习了20余本书，邀请学校党员干部、专业教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读书心得，进行定期学习并交流学习感悟，充分发挥教师领学促学效应以及书籍作为心灵沟通的桥梁作用，从学术视角与党史研究角度，带领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进一步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效果，不断提升学生党史认知水平[4]。

（二）注重情景式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构建意志增强体系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党支部紧密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注重思想洗礼，突出政治导向，让其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磨刀石，通过“沉浸式”党课提高支部成员的政治责任感，更加明确时代新人的担当与责任。组织支部成员前往革命烈士陵园、博物馆，师生一同实地研学，“沉浸式”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在青松翠柏环绕中聆听革命烈士的故事，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下开展“现场党课”[5]。从伟大建党精神启程，沿历史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引发学生党员对“共产党人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思考，在探讨中总结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在新时代所赋予的内涵，从而进一步坚定时代青年的理想信念。

（三）用音乐讲党课，创新教育方式，构建情感培植体系

支部积极探索“音乐党课”，创新党建融入美育新模式，将艺术实践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将传统的“理论灌输”变为“共情感染”。笔者所在学院从2021年开始将“音乐党课”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浸润体系的重要一环，采用“理论授课+音乐艺术作品展演”的形式，学生可以采用朗诵、合唱、舞蹈、情景剧、配音等方式进行展示，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讲述历史，制作精良的党史视频，同时在背景音乐、服装、道具、舞美等方面紧密结合史实，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演绎，打造浸润式体验的党史学习教育模式，达到音乐与党史、艺术与知识、情感与党性的融合交汇，使参与学生完成从“接受者”向“演绎者”的角色转变，从“初步了解”到“震撼灵魂”的精神升华。目前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累计参与人数近800人，成功推出近30部优秀红色作品，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真正实现在演中学、在学中练，在艺术实践洗礼中浸润党史，培育爱国情怀。

（四）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构建行为转化体系

支部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党员的典型示范和榜样引领，引导学生党员树立宗旨意识“为群众办实事”，让学习教育有温度。以雷锋精神为指引，由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自发组建“党员先锋队”，开展志愿服务，坚持服务学生，主动担当、争当表率。利用空余时间，在学业、工作、生活中开展“学业帮扶小组”“校园护绿行动”“党员志愿服务小组”等30多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校外，支部成员主动走进社区，走近群众，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引导学生在奉献互助中得到思想升华，将党史学习教育从思想层面转化为实际行动。

三、启示与思考

总而言之，“沉浸式”党课是一种创新的党史学习教育方式，通过情境体验的沉浸式学习，使党员、群众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党的历史和伟大成就。这种方式也为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带来了诸多成效。一是提高学习效果。“沉浸式”党课使学习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党的历史和伟大成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了更直观全面的了解，这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也使得学习效果更加深刻和持久。通过与不同的活动融合，增强实用性和实践性，让学生在实践中思、悟、行，学生们参与度更高。二是增强党员意识。“沉浸式”党课通过情景体验的方式，让党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增强了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激发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支部学生党员均在学校、学院、班级担任学生干部角色，也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为师生们服务。三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沉浸式”党课将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让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学习教育中来，提高了学习教育的覆盖率和参与度。通过组织各项活动，让入党积极分子、群众一同参与进来。四是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沉浸式”党课与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更加生动、形象、互动性强，能够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学生深刻感受到党史的厚重与鲜活、百年初心的真诚与珍贵。在传统党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激发学生党员的“主体意识”，创新党课教育方式，将党史课堂搬到户外、搬到现场，用好用活党史教科书，扩宽联动边界，形成育人合力。“沉浸式”党课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带给我们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一）注重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面，提高学生党员学习党史的积极性

“沉浸式”党课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理论学习效果显著，已100%覆盖学生党员，并辐射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申请人和团员，引导普通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学生党支部活力明显提升，并获得广东财经大学第五届学生党支部风采大赛三等奖、广东财经大学第六届学生党支部风采大赛一等奖等荣誉。在接下

来的活动开展中，要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于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凝聚各方育人合力，切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育人实效。

（二）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实现从传统学习到情境学习的转变

在传统党课的基础上，创新党课教育方式。将传统单向被动的党课输出转变为双向互动的情境实践体验，通过“沉浸式”党课生动讲好党史故事，以美育带动红色文化教育，进一步丰富了“沉浸式”党课的形式，实现了从传统党课学习到情境学习的转变，让学生以史赏歌、以歌叙史，推动了党课教育焕发新活力，让党史学习教育内容更实、形式更新、氛围更浓。因此，在开展党课学习党史的实践中更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利用新媒体技术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

（三）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以致用

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承载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其核心目的在于深度培育与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在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宛如指引大学生前行的明亮灯塔，能让他们在纷繁的思潮涌动中，始终坚守正确的方向。通过系统且深入的党史学习教育，大学生能够深刻领悟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伟大精神与卓越智慧，进而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精神支柱，使之能够更好地契合党和国家的长远需要，笃定地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然而，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进程中，必须时刻警惕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绝不能脱离实践、陷入空谈教育的泥沼。单纯的理论灌输，极易让党史学习教育流于表面，学生难以真正触及党史的深厚内涵与精神实质。脱离实践的教育，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法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党的奋斗历程与伟大成就背后的艰辛付出与深远意义。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无法有效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还可能导致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产生抵触情绪，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注重组织引导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当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时，他们便有机会将所学的党史知识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无论是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还是投身各类公益活动，大学生都能亲眼看见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感受到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坚定决心与不懈努力。这种亲身经历与切身体会，能够不断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他们会深刻认识到，自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从而更加自觉地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所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通过“沉浸式”党课开展党史学习，已形成成熟的工作机制，可在校内外推广。不同学院均可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学生党员的专业、特长、兴趣以及未来职业规划，设计相应的“沉浸式”党课，切实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 . 高校辅导员职业化的困境与消解 [J]. 理论导刊 , 2010(07): 72−75.

[2] 李丹 . 沉浸式音乐党课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路径研究 [J]. 党史博采 , 2023(02): 61−63.

[3] 黎晓凤 . “ 互联网 +” 视域下开展 “ 沉浸式 ” 党史学习教育的路径 [J]. 广西教育 , 2022(24): 24−28.

[4] 刘杰 , 陈文革 . “ 音乐党课 ” 文化现象及其理论意蕴 : 基于音乐伦理维度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01): 115−120.

[5] 杨端祥 . 丰富 “ 党课 +” 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入实 [J]. 中国盐业 , 2022(05): 30−32.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礼物织情：大学生情侣亲密关系的维系策略
——基于礼物交换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李朋岳 张云梦

摘要：大学生情侣间的礼物交换不仅是传递“人情”与“爱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是维系和发展亲密关系的重要社会行为。礼物交换过程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实践逻辑，为社会科学考察人际互动提供了经典路径。基于访谈材料的质性分析发现：大学生礼物交换实践同时呈现出有“人情”特性和互动特性，两者相互交织，超越了传统礼物交换的二元对称框架，并在亲密关系的建构与维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折射出消费主义时代亲密关系形成与维系的基本情境。

关键词：礼物交换；大学生；亲密关系；实践逻辑；人情互动

经营是一种理性计算，而爱情是情感冲动，这样一对充满张力的概念放在一起，恰好解释了消费主义时代情侣关系的生产方式[1]。礼物交换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鲍曼认为，作为馈赠的爱是最不脆弱的[2]，镶嵌在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礼物互动，伴随着亲密关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观察大学生进行爱情经营的有效窗口[3]。所以，对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中的礼物交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莫斯认为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4]。里维拉认为，爱情中的礼物交换构成了表演性行为，它是无偿的、免费的和无条件的赠予。相比之下，施坦因搏克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只有当礼物是多余的，或作为一种唤起人际关系中爱意而非爱之对象的象征时，方能还原其本质属性。但是，上述研究多聚焦于礼物交换的抽象特性，对于特定情景下的交换行为研究仍有待深化。

鉴于此，本文聚焦大学生情侣恋爱关系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基于礼物交换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大学生情侣礼物交换的解释模型，旨在探讨礼物交换在维系大学生恋爱关系中的特性与作用，揭示其内在机制与实践逻辑，从而为理解大学生恋爱观念提供新的经验支持。

一、研究现状

现代汉语中，“礼物”一词由两个字组成。“礼”的意思是仪式、礼节以及诸如忠孝的道德观念的礼仪性表达，“物”的意思是物质的东西。从词源上讲，礼物这一词汇不仅指涉物质性的礼品，它还承载着文化的规则并牵扯到仪式。早期西方人类学家对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以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强调送礼与收礼之间二元对称平衡，受赠者有必须回礼的义务。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赤道新几内亚群岛的田野调查，阐述了库拉体系下的礼仪性礼物交换原则，即库拉是礼仪性礼物的赠予，受赠者必须在一段时间后赠送等价的回礼[5]。但是，大学生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礼物往往是以馈赠形式出现，且并不预期对方回礼，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赠礼、收礼和回礼的三重义务，那么这种失衡现象该如何解释？

中国学者阎云翔将礼物流动与“差序格局”理论相结合，认为中国传统礼物馈赠文化中的礼物交换具有不对称性，“人情”是礼物收受的核心要素。鱼耀通过对八坊社会的研究，认为八坊的礼物更在于形塑一种规范性社会模型，尤其注重“礼仪”发挥作用，强调人情、孝道规则的重要性。上述观点超越了二元对称礼物交换论，强调礼物在恋爱关系中的工具性、经济性以及不对称性。

二、研究方法

访谈法是通过访问者口头交谈的方式，向被访问者了解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 12 名正处于或曾经历过一年以上亲密关系的高年级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 10 名作为主样本，2 名作为子样本。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现场面对面和网络电话两种形式，每位受

访者的访谈时间约为 90 分钟，旨在收集有关“大学生情侣间礼物交换策略、目的及态度”的原始话语资料。为方便整理与归纳，研究使用 Nvivo15 辅助分析，借鉴斯特劳斯与科宾的程序派扎根理论编码基本原则，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完成从经验材料提炼出理论维度的研究路径。

扎根理论是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发展的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构建扎根于数据的理论。其基本特征在于对获取的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后，对数据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从而从经验材料中提炼理论。笔者围绕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并基于符号互动的概念，以期解释礼物对于维系大学生情侣间亲密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作用。

三、研究过程

（一）开放式编码

笔者采用过程派扎根理论基本思想，运用三级编码的方式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开放式编码是三级编码的第一级，它依据材料本身，对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具体来说，开放式编码分为以下两步。首先，研究者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文本内容概念，确定范畴的属性和维度。其次，将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范畴化，初步构建范畴间的联系。例如，根据“应当为自己的感情投入适当的追求和付出，且不需要什么回报”提炼出概念“付出感”。依据这一方法，笔者在剔除大量无关信息和重复概念后，共提炼出 90 个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比较和分析，形成了 20 个初始范畴。

（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在主轴编码阶段，笔者将 20 个初始范畴进一步归纳提炼，共形成了“人情”对等、“人情”失衡、工具性礼物、情感性礼物、礼物织情等 5 个主范畴。

（三）选择式编码

在选择式编码阶段，需要识别并解析核心范畴，并建立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基于对 5 个主范畴进行深层次分析并沿用上述“范例”的指示，本研究发现“礼物织情”始终在众范畴中处于核心位置，且与所有主范畴之间具有稳定而强烈的逻辑关系，故“礼物织情”应为 5 个主范畴之上的核心范畴。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检验大学生情侣礼物交换模型的理论饱和度，笔者对剩余的 2 份访谈内容进行编码，通过反复比较概念范畴间的关系，未发现新的属性、维度、条件、行动或后果信息，表明范畴已达到研究样本边界，无须再进一步收集资料与拓展范畴，故选择式编码概念在理论模型上已经饱和。

四、大学生情侣礼物交换模型阐释

大学生礼物交换模型由“‘人情’特性”“互动特性”和“礼物织情”三个维度。“‘人情’特性”包括“人情”对等和“人情”失衡两个方面。其中“人情”对等与莫斯所强调的送礼与收礼间的二元对称平衡相对应，即接受礼物的一方必须以回礼作为回应，以维持“人情”平衡。反之，当“人情”出现失衡时，这与里维拉所阐述的观点相一致，即在恋爱关系中，礼物的赠予是不以回报为前提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因此，接受礼物的一方并非必须回礼，无需刻意追求“人情”的平衡。“互动特性”可分为工具性礼物与情感性礼物两大类。工具性礼物主要强调在礼物交换过程中，由于经济交易而产生的情感交流；而情感性礼物则侧重于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而进行的情感维系。“礼物织情”是上述两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礼物交换的目的，也是其最终达成的成果。

（一）爱情接触：从“人情”对等到“人情”失衡

大多数大学生情侣在恋爱初期主要关注的是礼物交换在物质层面的对等性。在这一时期，大学生情侣在感情上的波动性塑造了礼物交换过程中的确定性，为避免“人情”上的亏欠，受礼者大都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价值相近礼物的回礼。同时，若送礼者所赠礼物的经济价值显著超出受礼者的偿还能力，且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无法回报，恋爱初期的大学生倾向于拒绝接受礼物的过高经济价值，而仅接受其能够回报的部分，例如情绪价值。这种做法同样是为了避免“人情”关系的失衡，是一种必要的调整手段。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换是当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不过在恋爱初期礼物交换和情侣互动中这种回避“亏欠”的取向并不会一直持续，到一段感情的稳定期，双方关系中因不了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减少，在长时间的交往中也逐渐建立起信赖或是依恋，逐渐由“我”发展为“我们”。这时大学生情侣的交换实践表明，礼物流动并不是对互惠循环的简单重复，“只要进程还未完成，互动的结局就依然可能不确定”，同时在时间上也更具有灵活性。在恋爱稳定期，双方更注重情感上的交流和共鸣，而不是物质上的得失。

（二）爱情塑造：从工具性礼物到情感性礼物

戈森认为，人的行为目标是使他的生活享受最大化，其一旦认识了他们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就会实现他们这一生活的目的。在恋爱的初始阶段，大学生情侣往往通过礼物的经济功能来加深彼此的情感联系，达到稳定亲密关系的目的。然而，为了维系长久的亲密关系，工具性礼物所蕴含的情感目的最终会导致其转变为纯粹的情感性礼物，即从经济因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转变为纯粹的情感象征意义，从建立联系转变为维护和强化现有的情感联系。因此，塑造

或建立关系是工具性礼物的显著特征和主要目的。当关系塑造达到一定阶段，通常是在亲密关系逐渐进入稳定期时，这种工具性礼物便会向情感性礼物过渡。

在恋爱初期，大学生情侣倾向于通过赠送贵重礼物来表达和传递他们的经济能力以及对亲密关系的重视。然而，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礼物交换过程本身更多地体现了双方对彼此长期感情的依附和象征。情侣间互赠的礼物更加注重表达心意，礼物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赠送礼物的时间选择也更加灵活。此外，大学生情侣会随着时间和感情的推移更加重视在亲密关系中自身的付出感，相较于恋爱初期，减少了赠送礼物的目的性，工具性礼物逐渐转变为情感性礼物。古德利尔关于礼物交换的观点在此情境中尤为适用，即礼物赠予和回赠礼物形成了一种相互的负债和依赖，而这对双方又都是优势。情感性礼物为大学生情侣创造了情感成长的空间，依赖关系的确立使得双方能够通过情感性礼物的互赠，交替在亲密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进而促进感情的良性互动。在 K8 同学的经历中，她认为“我会送男友小皮筋，东西不贵但充满心意，而且他手上戴着小皮筋他也不敢乱来”。作为爱意的表征，情感性礼物主要功能在于维系亲密关系，此类礼物并不侧重于单纯经济价值上的对等性，亦不强调回礼的义务。它超越了礼物交换的二元对称性理论，体现了“人情”失衡的外在特性。对于大学生情侣而言，礼物交换的关键价值在于其爱情象征意义，连接着经济交易或经济因素过多的礼物并不具有爱情基础和载体必然性，当一种关系已经稳定时，这种与经济相联系的因素必然会被逐渐削弱，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面对面相处较多的情侣并不那么重视礼物交换活动。

（三）礼物织情：“人情”特性与互动特性的交互与转化

由“人情”对等发展为“人情”失衡，以及工具性礼物逐渐转化为情感性礼物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人情”对等和礼物工具性特质完全消失。在大学生情侣之间的礼物交换实践中，“人情”特性和互动特性往往能共同展现出整体性的功能。在亲密关系的初期阶段，“人情”的对等性和工具性礼物的交换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亲密关系进入平稳期后，“人情”的失衡性和情感性礼物的交换则成为主导。这些现象通常在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表现出其阶段性的作用和意义。

礼物交换对亲密关系的维系作用主要是依靠上述两种特性的双向作用而发挥其作用。大学生情侣对爱情安全感的追求是其礼物交换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为确保这种需求得到满足，付出感的体现以及礼物所蕴含意义的抽象化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在恋爱过程中，每一阶段所展现的礼物交换特性都是满足爱情需求不可或缺的过程。当这些特性的功能发挥到一定程度，旧的爱情需求将催生新的需求，而原有的礼物交换特性无法满足这些新需求时，新的功能便随之产生。同时，旧有功能已深深嵌入新功能之中，旧特性与新特性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共同发挥作用。

五、结语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两方面结论：第一，大学生情侣间的礼物交换呈现明显的动态性与阶段性。不论是“人情”还是礼物的特性都会随着亲密关系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亲密关系的初期，大学生情侣之间的礼物交换过程更倾向于遵循莫斯所阐述的礼物交换经典模式，即强调送礼与回礼之间的对称性。然而，随着感情的加深，情侣之间的礼物交换会跨越对称的边界。赠礼者不再过分期待伴侣的即时回礼，而收礼者也不必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回赠。正是这种不平衡性促进了情侣间情感的互动，满足了彼此在心理层面的付出感，从而推动了亲密关系的积极发展。第二，礼物交换兼具工具性与情感性，且情感维度占据主导。大学生情侣间交换的礼物显然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意义。在亲密关系中，礼物交换往往同时融合了工具性与情感性，且情感性因素通常占据主导地位，送礼行为的产生源于维系亲密关系的需要，其最终目的往往聚焦于情感层面，而非物质的经济价值。因此，如果忽视了礼物交换中的工具性和情感性这两个面向，便难以准确把握大学生情侣关系的建立方式与内在本质。

参考文献：

[1] 杜佳冰 . 交换爱情 : 消费时代的大学生礼物社交 [N]. 中国青年报 , 2022−04−06(03).

[2] 鲍曼 . 社会学之思 [M]. 李康 , 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 87.

[3] 刘大为 , 郭瑞 . 经营爱情 : 大学生情侣礼物交换的实践逻辑 [J]. 中国青年研究 , 2021(12): 40−46.

[4] 莫斯 . 礼物 :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M]. 汲哲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 3.

[5] 马林诺夫斯基 .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M]. 弓秀英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6: 104.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家—校—医”协同：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路径探索

姜建平

摘要：“家—校—医”协同的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是响应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国家战略要求，是应对当前学生心理危机低龄化加剧、社会压力攀升与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的现实挑战的有效举措。立足国家政策导向，界定并分析了“家—校—医”协同的概念和特征。基于个体心理发展纵向规律，以家校协同为切入点探索危机预防路径。依托资源横向整合优势，以医校协作为突破口构建危机干预路径，为培养心理健康、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家—校—医”协同；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

心理危机指个体在遭遇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挫折和困难，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对方式来解决时所出现的暂时且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1]。当前个体心理危机低龄化日趋明显[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明确提出：“要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政策与制度、学科与人才、技术与环境，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标志着国家对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新格局已作出顶层部署。因此，探索“家—校—医”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一体化实现路径，构建同参与、齐推动、共分享的工作格局，是预防化解心理危机的重要举措。

本研究紧扣心理危机预防干预科学原理，提出在“家—校—医”协作视角下，构建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横纵交叉实现路径。基于个体纵向心理发展规律，从家校合作视角，探索心理危机一体化预防路径；基于横向资源整合衔接，以医校合作视角，构建心理危机一体化干预路径。

一、概念提出

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关键内容，危机预防干预一体化实现路径符合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阶段性和连续性发展的普遍过程；同时因其发生、发展和转化的动态特征和复杂特性，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一体化实现路径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深化。“家—校—医”协同是指以家庭、学校、医院为主体，通过系统性协作共同预防和干预学生心理危机，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单一主体干预的局限，构建跨领域资源联动的闭环。其概念体现以下特征：

（一）从单一问题到综合体系

长期以来，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侧重对某一特定学段或特定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家—校—医”协同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强调从多角度、多层面出发，横向贯通家庭、学校和社会，构建综合性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3]。

（二）从被动干预到主动预防

与“危机发生后才重视”的传统做法不同，“家—校—医”协同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基于发展心理学视角和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从源头主动预防心理危机。通过从低年级起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建立预警机制等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危机因素，有效降低心理危机发生率。

（三）从局部职责到全局动员

“家—校—医”协同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不再局限于学生所在学段的学校工作范畴，强调跨学段、跨领域的协同，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守护学生心理安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二、学理支撑

推进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建设时，首先要遵循发展心理学规律，既要确保学生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又要考虑阶段性差异与递进性特征；其次，要基于系统论视角，关注个体与外界环境的作用与影响；最后，聚焦心理危机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规律。

（一）发展心理学

在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一体化的理论构建中，发展心理学提供了核心依据。该学科指出，个体心理发

展兼具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双重维度。这种辩证统一的动态关系，本质上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

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八阶段理论认为，在每个阶段个体都面临特定的心理冲突与核心任务。对于学生而言，学龄初期、学龄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这四个阶段具有尤为密切的相关性。各发展阶段的特定任务决定了心理危机预防干预的差异化策略。学龄期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勤奋感、避免自卑情结，因此小学阶段应着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特别关注学业受挫群体，防止自卑感固化引发的心理危机。青少年期的关键任务是构建自我同一性，需引导学生形成客观的自我认知体系，预防因身份认同混乱引发的心理危机。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强有力的人际联结是阻断心理危机发生发展的关键。因此，需明确各学段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与具体内容，将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置于体系之中，形成有机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

（二）生态系统论

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模型，个体发展受到由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的嵌套系统的共同作用。

微观系统（如家庭、班级）中的不良经历（如目睹父母激烈争吵或遭受同学排挤孤立）能直接破坏心理稳态，是心理危机的潜在直接诱因。中间系统指微观系统间的互动关系（如家校协作），这种互动若失调（如学校频繁向家长反映学生问题引发亲子关系紧张），可能成为加剧个体压力的中介风险因素。外层系统（如父母的工作单位、本地医疗资源）的变化（如父母因工作变动迁居导致子女被迫转学），虽不直接作用于个体，却能通过影响其微观系统间接引发适应困难和心理危机。宏观系统（如社会文化规范）塑造整体发展环境，其中潜在的冲突性要求可以构成个体心理危机的远端社会文化根源。

（三）发展精神病理学

发展精神病理学强调心理异常具有动态发展性。研究数据表明，焦虑障碍与冲动控制障碍的集中发病年龄较早，其中位数约为 11 岁。学生心理危机表现出明显的学段特异性：小学阶段重点防控发展性障碍和适应性问题；中学阶段聚焦青春期特有的身份危机和行为问题；大学阶段关注成人期心理疾病的早期征兆。

基于此，急需构建“全链条、分节点”的心理危机防治体系。该体系应纵向贯穿各学段以保持预防的连贯性，同时横向聚焦各阶段核心风险以提升干预的精准性，最终实现心理健康保障的无缝覆盖与精准对接。

三、实施路径

（一）家校合作视角下心理危机一体化预防路径

家庭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基础环境，也是心理危机的潜在根源与核心预防阵地。从家校协同视角推进心理危机干预，是构建“家—校—医”一体化预防体系的关键路径。家庭环境通过三重机制深度影响个体心理发展，一是认知塑造：家庭互动模式与教育态度影响个体对自我及世界的认知评价 [4]；二是情绪调节：家庭成员情绪表达方式塑造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 [5]；三是应对策略：家庭解决问题模式直接影响个体应对困境的行为模式 [6]。《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这表明父母在任何学段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均承担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应对态度与方式直接决定危机化解效能。

因此，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一体化建设必须将家校深度合作作为核心支点，通过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筑牢预防根基，系统设计家校协同实施路径，实现危机防控关口前移。

1. 体验式家长会

体验式家长会借鉴体验式团体心理辅导的参与性、互动性、反思分享等优势，打破传统家长会由班主任主导和单向沟通的模式。以家长为中心，通过创设情景模拟、游戏互动、圆桌讨论等形式，发挥家长资源优势，激发家长对孩子成长议题进行研讨的参与热情。

2. 心理专题讲座

发挥社会、师资和家长资源优势，针对家庭教育共性和个性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专题讲座。比如亲子沟通类，传授家长共情表达、积极倾听等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类，分享情绪管理知识，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学习如何帮助孩子管理情绪，减少情绪化地解决问题；亲子共读类，强调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介绍适合不同年龄段的阅读材料和阅读方法，帮助家长掌握培养孩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的有效策略。

3. 共育资源推送

注重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推广，借助家长会与专题讲座、纸质宣传手册、校园网站与微信公众号等，推送心理健康教育科普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常见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亲子沟通与家庭关系、学业压力管理、生命教育与自我认知等。此外，主动向家长推荐当地“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96111 服务热线”和“共青团青少年 12355 心理热线”，引导家长学会积极使用公益心理热线资源。

4. 开展校园亲子活动

校园亲子体验活动作为连接家长、学校与孩子的桥梁，有助于家长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增强家校信任，更有利于增进亲子关系。学校可以在新生入学时，举办适应性亲子游园会，组织家长和学生一起参观校园，参与趣味游戏和挑战，帮助学生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借助重要节日或纪念日，围绕节日主题，组织家长与孩子共同完成手工制作，分享感恩

故事等；结合学校教学计划，围绕特定学科或主题开展亲子活动。

（二）医校合作视角下心理危机一体化干预路径

“医校合作”指医院和学校在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领域紧密合作，为有严重心理危机学生的治疗提供保障[7]。精神专科医院在心理危机干预处置中具有专业和技术优势，在探索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一体化实施路径过程中，横向链接社会资源，探索医校合作路径，是做好心理危机干预的有力措施。

1. 搭建心理危机联络评估系统

通过医学评估与教育干预的深度融合，强化危机预警的专业性、保障干预措施的适切性，形成心理危机防控的闭环管理。

首先，构建医校协同机制。学校与精神专科医院建立深度合作，通过共建实践基地、共享专业资源、共组工作团队，形成“教育—医疗”协同网络[8]。重点构建三维保障体系：精神科医师定期进校服务、设立专项合作经费、建立信息互通与联席会商机制。

其次，规范危机评估流程。建立医校信息共享平台，协同开展危机早期识别与干预，医疗机构定期为学校提供精神卫生知识培训及个案督导[9]。

最后，实施分类干预策略。针对高危学生启动 24 小时安全监护，即时联系家长送医，依据医嘱调整在校方案；针对疑似病例，书面告知家长医学评估结果，建议专科就诊并跟踪诊断进展；针对普通学生，构建“心理疏导 + 现实问题解决”双轨支持体系，通过提供人文关怀与成长指导帮助学生。

2. 形成心理危机协同干预框架

在医校合作模式下，依托精神卫生机构的专业力量，组建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学校心理教师组成的专业队伍，联合开展以下工作：①心理疾病科普宣传，提高学生对心理疾病的认识；②心理健康普查，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③心理危机干预，开通心理危机干预转介“绿色通道”，确保学生能够及时接受专业的心理评估和治疗；④重点学生帮扶与随访，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支持服务。

3. 创设专业技能交流互促平台

学校充分借助医疗机构的专业资源优势，从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个案处理三个维度对心理教师和班主任进行系统化培训。首先，通过精神科医师开展和病理学、药理学、精神卫生法等相关的专题讲座，使教师掌握精神障碍相关知识，减少学生和家长对就医用药的抵触情绪。其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升教师的危机识别能力：邀请医疗专家对教师进行心理危机识别培训，使其准确掌握高危人群特征和危机预警信号；安排教师到合作医院精神科见习，通过直观观察患者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表现，提高对心理异常的识别敏感度。最后，针对已确诊学生建立医校联合个案研讨机制，共同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实现医学治疗与心理教育的有效衔接，促进学生全面康复与健康成长。

四、结语

当前学生成长压力持续升级，心理危机低龄化态势日益凸显，而预防干预资源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现实挑战。研究立足个体心理发展纵向规律，以家校协同为切入点探索危机预防路径；依托资源横向整合优势，以医校协同作为突破口构建危机干预路径；通过“家—校—医”协同机制整合纵向和横向资源，形成“纵贯发展轴线、横联资源网络”的心理危机防控立体化实施路径。这一模式既彰显政策响应力与实践创新性，也为摆脱心理健康教育现实困境提供系统性方案。未来，应深化实践探索，推动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心理危机防控体系，为培养心理健康、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CAPLAN G.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psychiat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2] 蔺秀云 . 新时代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现状及对策探析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2024(08): 19-24.

[3] 阴国恩 , 曹瑞 , 徐丽 .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 2014, 12(06): 819-823.

[4] 李明 . 家庭教育也需因材施教——教养方式对儿童认知能力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J]. 当代青年研究 , 2022(06): 67-77.

[5] 刘航 , 刘秀丽 , 郭莹莹 . 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 : 因素、机制与启示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148-155.

[6] 向蓉 , 雷万鹏 . 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儿童问题行为？ [J]. 教育与经济 , 2021, 37(05): 49-57.

[7] 姚斌 . 新时代背景下“医校结合”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19(05): 90-94.

[8] 徐畅 . 高校学生心理支持系统的医校合作互助发展模式构建 [J].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 22(06): 14-16.

[9] 徐杏玉 , 姜建平 . 高校心理危机“联络—评估”的概念、需求与着力点 [J]. 江苏教育 , 2022(72): 33-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1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高职院校心理危机识别与预警机制研究”（2021SJB0664）。

（作者单位：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在校大学生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黄韵霖

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全国 7 个地区的 115 名大学生进行了在线“问卷星”调研，研究在校大学生的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受到自身零花钱水平和他们所处社会支持的显著影响。不同月零花钱水平的大学生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多个维度上存在差异性。建议高校要优化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支持服务，增强大学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财务管理能力。学生的家庭也要给在校大学生提供适当的情感支持和经济帮助，通过家长的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大学生自身更要有合理规划零花钱的理念，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学校和社会活动，用朝气蓬勃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大学生零花钱；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大学生在校培养问题和未来就业创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大学生是否能成才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反映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与生活质量，也关系到他们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以及未来就业或创业的适应性。当前大学生面临的学业竞争、职业规划压力以及内卷的社会就业现状容易使他们产生躺平心态，由这些原因产生的消极情绪会影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虽然高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学校辅导员也提供了一些心理健康的支持服务（如宿舍谈心、心理咨询），但是由于部分大学生的内向和拒绝社交，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始终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

手机、电脑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让大学生有了开阔的视野，能够以更加全面的角度看待生活，但是社会上不良风气以及追求成就的趋势也在不断地引导他们忽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大学生们在这种影响下会更加注重金钱而忽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情绪。对于目前研究样本的大学生来说，不同经济条件的大学生的月零花钱差距较大，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大学生的生活体验不同。零花钱少的学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们要通过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才能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甚至在正常的校内外社交活动中也会觉得捉襟见肘，有中高月零花钱水平的学生则可以更加自由地参与校内外社交活动，获得更多的友情、爱情和社会支持，包括人脉资源和就业信息，零花钱的多少使在校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指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大学生月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大学生月零花钱水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研究社会支持对在校大学生月零花钱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了解来自不同经济条件家庭的大学生如何借助社会支持来缓解在校经济压力，提升自身大学生活满意度。

在理论上，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月零花钱、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充实和完善了相关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本研究从大学生月零花钱的角度出发，为高校提出关于大学生在校生活满意度的建议，使高校能更好地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从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及生活支持服务。同时，也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参考，促使学生家长和社会更加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本研究也希望为大学生自身提供指导，培养大学生的财富管理意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个人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研究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总体评价，通常包括对学习、人际、生活等方面的主观感受。Diener（1985）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了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对生活的整体满

意度。有学者认为，经济压力是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可能需要通过兼职等方式来维持生活，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还可能影响学业和心理健康。谢阳熙等（2014）发现，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往往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导致生活满意度较低[1]。朱孟斐等（2020）发现，学业竞争和学业负担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高学业压力会导致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降低生活满意度。相反，良好的学业表现和学习体验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2]。贾旖璠等（2021）发现，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中起着重要作用[3]。

不少学者发现，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往往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如陈健（2020）认为，高校提供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服务，对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4]。

（二）大学生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李旺先等（2009）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经济压力较大，生活满意度较低；而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经济自由度较高，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5]。然而，Schnettler 等（2015）研究指出，零花钱水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过度的经济自由可能导致大学生产生消费主义倾向，反而降低生活满意度。除了零花钱水平，零花钱管理能力也是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良好的零花钱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大学生合理规划消费，减少经济压力，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学者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家庭、朋友、学校和自身的社会网络。姜楠（2017）认为，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大学生缓解生活压力，提升他们的社会应对能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显著降低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生活满意度。笔者认为，社会支持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例如，在校大学生通过自己的课业或者论文导师及朋友的推荐，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就业机会，从而间接提升生活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和问卷构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分为人口学信息与认可度调查两部分，认可度调查分为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社会支持维度包括家人在经济上支持学习和生活、家人在情感上支持学习和生活、学校和社会风气、容易陷入网络消费陷阱、容易有更多支出、同学朋友省钱技巧、增加零花钱可以参加更多社交活动等。生活满意度维度包括学习资源满足度（零花钱能满足学习资源需求）、消费自由度满意度（对消费自由度感到满意）、生活安全感（零花钱给我安全感）、经济独立信心（对毕业后经济独立有信心）、非必要性消费能力（零花钱能满足非必要性消费）、零花钱规划能力（我能合理规划零花钱，不会超支）。

三、实证分析

（一）统计学特征分析

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平台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116 份，剔除不符合年龄要求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1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

研究样本中，女性占比 78.3%（90 人），男性占比 21.7%（25 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17~23 岁，占比 93.9%（108 人），24~30 岁仅占 6.1%（7 人）。地区分布以南部地区为主（73.0%，84 人），西部地区占 9.6%（11 人），东部地区占 10.4%（12 人），中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合计占比低于 5%（8 人）。独生子女占 27.8%（32 人），非独生子女占 72.2%（83 人）。月零花钱水平主要集中在 1001~3000 元区间（75.7%，87 人），500~1000 元占 11.3%（13 人），3001~5000 元占 10.4%（12 人），5001 元及以上仅占 2.6%（3 人）。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目前对于信度和效度指标，国内外学者通用的是 Cronbach's α 系数和 KMO 值。当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6 以上就说明问卷的信度是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较好；KMO 值在 0.7 以上则说明问卷的效度不错。

本研究根据表 1 呈现的结果发现，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0，这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这意味着问卷中的各个题目在测量同一个概念或变量时是相互关联的，问卷的结构是稳定的。本研究问卷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问卷的 KMO 值为 0.792，这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分析。

表 1 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信度和效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s α 系数
17	115	0.770
KMO 值		0.792

（三）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运用单因素方差检验来研究不同月零花钱水平（500~1000 元、1001~3000 元、3001~5000 元、5001 元及以上）对大学生社会支持及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月零花钱水平在社会支持各个方面中都存在一定差异性，差异最大的是家庭经济支持感知、家庭情感支持，这反映了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家庭经济支持感受，又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家庭情感支持。中等零花钱水平的学生家庭更看重子女自主性和消费选择，支持方式更包容；低零花钱水平的家庭因经济压力更看重消费“必要性”，对非必要消费的理解和支持少；社会环境焦虑缓解、同伴省钱技巧获取、网络消费陷阱倾向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可见不同经济水平的大学生在消费行为、理财意识、对社会环境压力的感知与应对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月零花钱水平对各指标均有显著影响。零花钱水平较高的学生在学习资源满足度、

消费自由度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经济独立信心、非必要性消费能力等方面表现更好。低零花钱水平的学生因经济资源有限，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存在压力，消费选择受限，对意外支出的担忧更为明显，且在零花钱规划能力上虽严格规划但仍易超支。

（四）相关性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712，标准误（SE）为 0.103，CR 值（z 值）为 6.928，p 值为 0.000，表明该影响在统计上极其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863，说明社会支持在预测生活满意度时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且关键的因素。

表 2 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X→Y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E	z (CR 值)	p	标准化回归系数
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712	0.103	6.928	0.000	0.863

四、研究建议

（一）高校方面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零花钱水平对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很大，这要求高校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必要的资助。第一，在心理健康教育上，学校可以定期举办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和活动工作坊，可以邀请专业的咨询老师进行心理咨询辅导，尤其是对金钱和工作的态度问题；第二，高校要设立一些经济援助项目，比如多设置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类型与额度，开设勤工俭学岗位等，以此减少经济困窘学生的财务压力，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第三，学校也要创建新的课程和活动给予在校大学生一些帮助，比如理财知识讲座等，协助在校大学生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

（二）家庭方面

父母要时刻关心孩子，给予他们适当的心理安慰和支持，并且不应该对孩子过度放任不管。本研究建议家长要定期和孩子开展深入交流，及时了解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状态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给予情感支持与鼓励。同时也要给予孩子经济支持，要根据家中的实际情况安排孩子平时的生活支出，既能满足孩子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上的花费，又不会导致他们养尊处优。家长应当引导大学生合理规划消费，懂得珍惜资源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零花钱等。本研究认为可以引导在校大学生参与到家庭决策中来，培养他们的独立性以及责任心。

（三）个人方面

本研究认为在校大学生自身需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攀比和超前消费。建议在校大学生做好每月的消费预算，先满足基本的需求，再安排一些不必要的消费。大学生还需要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学术交流、社会实践活动等，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丰富自己在校体验，提高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五、结语

本文研究大学生零花钱、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时，发现零花钱水平、社会支持对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高校的帮扶和开设财富课程，家庭给予关系和决策鼓励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合理规划等建议，从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大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谢阳熙，范小庆．大学生的压力知觉、情绪智力、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05): 697−699.

[2] 朱孟斐，崔爱萍，欧阳阳．大学新生学业压力现状分析及改善策略探讨——基于对济南大学商学院新生的调查 [J]. 教育观察，2020, 9(05): 49−51.

[3] 贾祷璠，白学军，张志杰，等．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安全感与积极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效应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 29(11): 1703−1707.

[4] 陈健．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学生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J]. 教育现代化，2020, 7(01): 173−175.

[5] 李旺先，任爱琴．大学生生活支出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J]. 中外健康文摘，2009, 6(29): 253−255.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零花有度 支持有心

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贾小杰

摘要：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敌对势力与分裂分子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高校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撼动师生的理想信念根基。文章以社会燃烧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审视高校意识形态危机的生成机制及其特点，基于“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三个方面研究高校意识形态危机生成机理的模型，探索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对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作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有利于维护高校安全稳定，促进高校和谐发展。

关键词：社会燃烧理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

一、社会燃烧理论用于分析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适用性

自然界的燃烧现象需要三个要素，即燃烧物质、点火温度和助燃剂，三者缺一不可。2001 年我国牛文元院士提出社会燃烧理论，将社会的无序、失衡乃至动乱等社会现象和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进行类比，对社会的稳定状态进行解释分析。该理论认为，可将社会动荡的基本驱动因素，即“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作社会动荡的“可燃物质”；而非理智的判断、流言的散播、敌对力量的蓄意破坏、媒体的错误引导以及对于片面利益的盲目追求等，可以视为促进燃烧的“助燃剂”。一旦这两者同时存在，任何微小的突发危机都可能成为引发动乱的“导火索”或“点火温度”，进而引发规模大、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的社会危机，可能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和秩序失调的境况 [1]。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通常源自复杂的社会环境、高校办学存在问题以及师生自身存在的权益和矛盾等“燃烧物质”的积聚。在网络意见领袖的煽动、不实信息的教唆、谣言的扩散以及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等“助燃剂”催化下，一旦环境条件达到“点火温度”便可能触发意识形态危机。因此，借用社会燃烧理论来分析高校意识形态危机事件生成机理，有助于创新管理策略，优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管理体系。

二、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特点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指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潜伏的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或侵害的不稳定因素，与一般性社会安全稳定风险相比有以下特征。

（一）敏感性高、活跃性强

高校作为知识传播、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面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问题尤为突出。高校学生群体主要由 20 岁左右的青年学生构成，他们展现出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及敏锐的洞察力，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各种思想观念的接受和辨识能力尚未成熟，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极易被卷入对不良意识形态的关注与参与之中。

（二）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

高校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所遭受的负面效应极易传播。一方面源自高校学生群体的地理来源多样性及与社会各阶层的频繁互动，使得相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信息传播覆盖面更广；另一方面，由于高校师生具备先进的信息传播途径、手段、技术能力和专业素养，加大了风险对外扩散的潜力和影响力。

（三）传播形式复杂、渠道隐匿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不断渗透，容易引发价值观念的冲突，这些冲突观点往往在学术交流、校园文化活动等领域被夹带，不易被发现。不良信息和错误观点往往在网络上以匿名形式传播，很难追溯源头。部分师生在接触到不良信息和错误观点时，出于自我保护会选择沉默或私下传播。这种复杂性和隐匿性都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难以防范。

（四）持续周期长、影响更久远

当前网络媒体如此发达，一旦某高校发生意识形态危机，很容易波及其他高校乃至全国高校，即使最先出现危机的高校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形势，往往也难以避免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续反应 [2]。此外，即便事件已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控制，且善后处

理措施得当，错误的思想观念仍有可能在师生群体中深植。此类观念的消弭，并非事件本身的终结所能即时实现，需要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活动，历经较长时间方能逐步消除。

（五）群体性显著、可控性强

高校师生群体往往对国家及社会议题展现出高度关注与参与意愿，在诸如爱国主义、权益维护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很容易产生冲动和好奇。他们更善于运用社交媒体迅速凝聚，若遭遇不当引导，这种集体动能极易转化为集体对抗行为，加剧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但高校师生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并更愿意接受劝导与解释[3]。因此，在处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因素导致的阻力相对较弱，风险的可控性相对较强。

三、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稳定危机事件的生成机理

（一）燃烧物质的不断积累

首先，复杂的社会环境。一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大量涌入，与我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碰撞。加上西方敌对势力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各种手段对高校进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试图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来影响我国的青年一代，也会更直接地腐蚀和动摇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二是社会转型矛盾与压力。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特殊时期，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引发不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就业压力、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高校师生较为关注的问题。由于高校师生政治参与度高、敏感性强，他们极易卷入社会矛盾与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和妥善的处理，都可能成为影响高校意识形态稳定的因素。

其次，高校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促使不少高校合作办学多样化，急速扩张的同时带来不少问题。一是办学方向风险显现。民办高校集团化办学易诱发如法律、运营、办学方向不确定及教育本质属性异化风险，其中逐利性资本对教育的控制可能削弱教育的公益属性，甚至触及教育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敏感领域。二是内部资源和服务诱发的矛盾凸显。作为承载大量师生学习、生活与科研活动的场所，高校内的食堂、图书馆、实验室等关键区域，在资源配置与服务保障方面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管理挑战。一旦高校内部管理和后勤服务跟不上新形势，师生的合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压力。假如处理不好，负面情绪会如“情绪污染”，易吸附消极观念，滋生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

最后，师生自身层面的权益和矛盾。一是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来自教学任务、科研任务、社会工作任务、未来职业发展等。因此学校的职称评聘、薪酬分配、住房分配等考核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经过深入的调查和严谨的论证，是否广泛听取了师生的意见，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关键问题。二是大学生心智成熟过程中的挑战与问题。大学生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可能会因情绪驱动或片面理解问题而做出非理性判断，进而参与极端行为或成为错误意识形态扩散的媒介。

（二）助燃剂的不断催化

一是错误的舆论导向。高校意识形态危机事件一旦出现苗头，就容易伴随着不良舆论的“煽风点火”。比如西方反华势力有目的的信息渗透，一直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伺机而动，妄图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发现高校安全稳定风险，便会通过设置议题、夸大问题、歪曲事实等方式，将一般性矛盾引申到某些敏感或争议性话题上，如民族问题、历史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并借机进行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对比，以此来质疑和贬低本土价值观和政策，制造政治性、煽动性和攻击性的言论，由于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其中部分警惕性及辨识能力较弱的学生易于受到错误信息的诱导，引起激愤情绪蔓延，催化高校安全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

二是信息疏导机制的缺失。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与信息的沟通密切相关。在问题出现时，假如官方采取习惯性沉默、信息选择性披露、对公众关切敷衍了事等不作为的姿态，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化师生不满情绪，造成了危机主体和客体的信息交流障碍、信息不对称，从而爆发更大的危机。

三是师生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师生因对官方失望伴随着因信息匮乏所致的恐慌、愤怒与无奈等情绪相互交织，极易对相关事件展开臆想和猜测。凭借自媒体的便捷性，诸多片面、负面且未经验证甚至满含宣泄意味的虚假信息很容易在这种情绪下传播，更会加剧师生对事件不确定性的惶恐与焦虑。这种情绪刺激极易导致师生丧失理智，进而作出非理性的行为决策，致使事态不断扩大，风险四处蔓延，犹如引发剧烈反应的催化剂，严重冲击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对校园的和谐稳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与干扰。

（三）触发点火温度

点火温度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稳定事件的关键因素，它可能源自外部社会危机或高校内部冲突。外部社会危机指的是那些在社会环境中发生并可能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事件、经济危机、流行疾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与暴力事件等。这种危机一般来说涉及面广、影响大，高校很难幸免。高校内部冲突是由于学校管理不善导致的学生意外伤害事件，如食物中毒、火灾、校园治安等。危机发生时，可能导致短期内混乱，如果在应急过程中表现不足，会降低学生对学校甚至对政府的信任，也有可能会被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传播反动思想，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

四、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稳定系统的构建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如何有效遏制潜在风险的“燃烧”，防止危机事件的发生是关键。

（一）系统识别并全面消除燃烧物质

加强思想教育，提升辨识能力。要通过开设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选修课程、主题宣传讲座、专题知识竞赛、案例情景模拟等教育活动，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对错误思潮的辨识能力。确保师生能客观理解社会制度差别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主动抵御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不良现象的侵蚀，严防西方国家出于“颜色革命”等政治目的向高校师生渗透西方价值观或进行思想牵引。

强化内部管理，消除可燃源头。绝大多数意识形态危机都是可防可控的，高校应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学校的安全稳定。一方面应提升高校内部建设管理水平，优化办学条件，提高师生满意度，消除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倾听学生的利益诉求，化解初始矛盾[4]。要培养师生爱党爱国、爱校荣校意识。激发师生共谋发展积极性，形成学生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的凝聚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二）精准掌控并有效减排助燃剂

畅通回应渠道，关注师生需求。确保师生有顺畅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意见，对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要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设立意见箱、开通热线电话、校领导接待日等及时解决师生所需，避免因问题积累引发更大的不满。加强对师生的人文关怀和关注，重点关注有部分心理问题倾向的师生，防止因心理不平衡而成为不法分子操纵的对象，进而杜绝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事件发生。

维护正确舆论，营造良好氛围。首先，要加强舆论监控，杜绝错误的谣言散播。对于一些反动、失真且社会危害性大的谣言，要及时干预，还原事情真相。其次，要充分利用课堂、会议、校园活动等场合，借用微信、微博、QQ、BBS 等新媒体来“发声”。

培育传播素养，增强法律意识。引导师生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学会辨别真假。通过普法宣传消除高校师生的法律盲区，使其在面对西方“糖衣炮弹”的诱导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面对负面舆论及不实信息传播时，应基于尊重事实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以理性的态度、文明合法的方式，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见解，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营造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

（三）严格控制并科学降低点火温度

搭建风险预警系统。全面监测和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舆情。首先，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反应迅速的师生情报队伍，负责日常监控、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预警。其次，依托技术部门对校园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用户实名登录等进行严格监管，对高校服务器域名进行重点审查，对异常校园 IP 进行严密监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技术手段，及时过滤虚假、反动言论，第一时间处理舆情异象和风险隐患。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 3T 原则，意思是面对危机时要 Tell You Own Tale、Tell it fast、Tell it all[5]。在危机初期，高校应通过各种方式与外部媒体保持顺畅、有效的沟通，尊重、公开和满足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应及时、全面地向公众披露事件的事件真相、起因、演变过程和处置结果、后续措施等方面的问题，以此引导事件及其舆论走向稳定可控的方向，实现高校管理层与师生的良性互动，确保真实的信息能在第一时间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消除误解。

做好危机的处置与善后。面对紧急事件，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以期实现对局势的有效控制，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或恶化。当事件得到初步控制后，也需妥善做好善后工作。一方面，要确保事件处理方案和措施的严格执行，防止“复燃”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做好整个事件的梳理和总结，从事件的诱发因素、演变轨迹、处置过程、影响范围以及从该事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有效避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 牛文元 . 社会物理学理论与应用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09: 177.

[2] 张小兵 , 崔海恩 , 唐彦东 . 危机管理 [M]. 北京 : 应急管理出版社 , 2021: 80−120.

[3] 居延安 . 公共关系学 [M]. 5 版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3.

[4] 白志华 .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分析框架 [J]. 河南社会科学 , 2022, 30(04): 101−109.

[5] 温文华 , 尹佳莉 .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高校网络舆论演化机制探析 [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4, 46(02): 47−5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微’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认同研究”（2023SJSZ0617）。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

孙云超

摘要：“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是高校通识必修课，是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支撑。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借鉴国内外经验，研究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团队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改革以及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解决目前教学中师资、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痛点问题。本研究为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面临多重挑战。企业因成本控制等因素缩减招聘规模，导致就业岗位供给不足。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却多年持续攀升，屡创历史新高。这种“岗位减少”与“毕业生激增”的双重压力，使得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同时，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招聘能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综合型人才。然而，传统“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注重学生的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培养和沟通表达、团队协作、思维分析、抗压情绪管理等方面的素质培养存在不足。同时，就业指导课程仅提供求职技巧，差异化针对性的培训指导不够，学生学习的实际获得感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和难就业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是新时代做好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持，也是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体系的深化探索。

1. 教学方法改革

张瑜强调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BL）和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BL）整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实现从“以脑为主”到“以心和行为主”的转变[1]。姚琳认为“互联网 +”思维融入就业指导教育中能够提高教学效果和个性化服务水平[2]。

2. 教学内容创新

余婧提出根据企业需求优化课程内容，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开展产教融合优化课程内容建设[3]。李海平等人提出创新教学方法和建设专业化师资队伍等方式激活学生的内驱力和行动力，改革“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质量[4]。

3. 课程体系建设

许琛和卢卫斌等学者强调，建立起符合学生需求和市场实际的就业指导课程体系，需要从教学理念到教学资源进行全面充实和完善[5-6]。朱明等人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素养的塑造角度提出了通识与专业结合的“三元交互”教学模式[7]。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的研究，已经扩展到职业发展服务、跨文化与跨学科有效性研究以及雇主参与和反馈机制。

1. 就业指导服务

国外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已经延伸至实习安排、行业研讨会和跨国公司的合作项目等一系列的职业发展服务。如，哈佛大学为帮助他们在课堂学习之外获得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实习资源和指导。斯坦福大学为帮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职业发展路径，定期举办行业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和校友分享经验和最新趋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给学生提供实习和项目机会，与多家国际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2. 学生跨文化职业能力的培养

在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研究者们则利用跨学科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技能，为学生跨行业职业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日本和韩国从就业指导课程上，帮助学生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需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通过调整文化敏感度和语言支持来改善其国际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以提高其就业成功率。

3. 雇主参与课程改进

大学与当地的企业或行业协会合作，定期举办工作坊、讲座或座谈会，邀请行业专家或雇主代表参与教学过程。通过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合作，建立了雇

主参与的反馈机制，大学能确保就业指导课程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综上所述，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就业指导的研究。教育模式的转变、课程体系的深化到跨文化背景下的教学有效性和雇主参与的实践反馈机制都有相关案例和实践。但从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的全方位的“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立足于学生对“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学习需求，填补研究空白，以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三、大学生就业指导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是高校的通识必修课，是连接学校教育与职场就业的关键环节，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就业政策、学会收集和处理就业信息、提高求职技巧等，以便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但现实情况是，学生毕业求职时屡屡碰壁，简历不够好，自我介绍平淡无奇等系列问题凸显，究其原因是学生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学习时学习效果不佳。再进一步深挖时发现，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队伍力量薄弱

学校尚未形成稳定的教师队伍，目前承担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师主要由行政人员和辅导员兼任，同时大部分为新进教师且流动性大，缺乏合理的梯队建设，既没有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传帮带机制，也缺少来自企业和行业的实践专家参与，导致就业市场分析不够、教学内容质量不高、课程建设体系化不足和教学研究不够等问题。

（二）教学多元化课程改革不足

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教学，以 PPT 讲解为主，缺少课堂互动，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关注不足，尚未探索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BL）、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BL）、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法（TBL）等多元化教学改革方法，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今在人类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的时代，这样的课堂是无效的课堂。一位老教师坦言：“点名前还有 30 人，课才过半少了三分之一——手机成了课堂主角，交作业的名单越缩越短。”

（三）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不完善

目前的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主要依赖就业服务中心，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就业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就业辅助。就业中心主要负责就业单位的开拓、就业信息的发布、校园招聘会的组织、学生求职技能的专项培训等服务内容；辅导员、班主任负责一对一地对接，开展就业辅导，为学生提供符合就业意愿的招聘信息，辅导学生求职就业；专业教师在学业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帮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专业能力；就业指导教师训练学生的就业技能，帮助学生能够顺利入职心仪单位，但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学生实际求职就业效果不佳。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就业指导课程陷入“学生不爱学、教师不好教、企业不认可”的困境。学生普遍反映课程内容“不实用”“不解渴”，学到的求职技巧在实际应聘中效果有限；用人单位则反馈毕业生职业准备不足，需要较长的适应期。这种供需错配的状况，不仅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大学生就业指导改革举措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师资体系

建设“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师资体系，既可以解决教学研究、教学方法改革、课程建设、课程研讨、新教师培养等问题，又可以减轻因教师流动而对课程教学产生的影响。课程导师团队采用“金字塔式”梯队建设模式：核心教学团队由具有 5 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专职教师、资深辅导员、人力资源领域外聘专家及行业资深人力资源（HR）组成，主要负责课程体系设计、教学标准制定和质量监控；骨干教师团队由 1~5 年教龄的教师构成，承担主要教学任务，并参与课程开发；新教师团队则实施“导师制”培养，通过听课、助教、试讲等方式快速成长。专家导师团队由各专业领域的教授、学科带头人组成，每学期开展 4~6 次专业前沿讲座，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职业方向。行业导师团队则从合作企业中遴选技术骨干、部门主管等实战专家，通过“企业导师进课堂”“学生进企业”等双向互动模式，让学生体验真实职场环境。为保障团队运行，建立“三导师”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召开一次教学协调会；制定《导师工作手册》，明确各类导师的职责边界和协作机制；设立专项经费，保障外聘导师的课酬和活动支出。同时，构建导师能力提升体系，包括定期组织教学能力培训、企业实践锻炼和职业指导师资格认证，确保每位导师每年接受不少于 40 学时的专业培训。

（二）课堂教学改革实施“四维联动”创新工程

根据学生及教师特点，积极探索最适合的教学方法，开展多元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教学资源建设上，打造“云端 + 线下”资源库：开发模块化云教材，按行业分类设置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版本；建设动态案例库，每季度更新企业真实招聘案例；制作微课视频，涵盖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实操内容；开发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模拟群面、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求职场景。教学方法上推行“三元混合”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PBL），项目以真实企业课题为载体，如为某公司设计校园招聘方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BL），案例选取本校往届生成功 / 失败求职经历；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法（TBL），通过设计具有实际

意义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合作探究，从而掌握知识、提升能力、培养综合素养。课堂组织形式上构建“三课堂”体系：第一课堂进行理论讲授，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活动，如举办模拟招聘会、职业角色扮演等；第三课堂拓展在线学习，利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平台延伸教学。教学评价方面建立“三维度”考核体系：知识维度采用机考测试理论掌握情况；能力维度通过实训平台记录技能成长；素质维度使用360度评价考察职业素养。同时，引入企业参与评价，邀请人力资源（HR）对学生的求职材料、面试表现进行评分，并将评价结果纳入课程成绩。为保障改革成效，建立教学督导制度，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代表和学生代表构成的督导组，定期开展听课评课；开发教学质量监测平台，实时收集分析教学数据；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每学期末召开教学反思会，根据就业市场变化调整教学内容。

（三）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

为科学高效地帮助学生捕捉适合自己的就业信息，精准就业，构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 就业指导课程教研室 + 二级学院 + 行业企业系统 + 政府就业指导部门”的“五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组织大型招聘会、发布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咨询与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服务，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就业信息与资源，搭建与用人单位的对接平台；就业指导课程教研室，负责开发和优化就业指导课程，如求职技巧、面试模拟、简历撰写、职业生涯规划等，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求职技能，为精准就业奠定基础，同时开展多样化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吸收和内化能力；二级学院与校企合作单位建立紧密联系，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及行业信息，帮助学生了解行业需求与动态，通过校企合作项目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行业企业系统，共享企业人才需求趋势，参与高校就业指导课程优化，为学生提供实习、见习、实训基地和企业导师，帮助学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组织企业开放日、招聘宣讲会，增强求职信心和能力。同时，通过共建产学研合作项目、创业孵化基地，帮助学生将创新想法落地。另外，除向学校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推送招聘岗位外，还通过企业联盟、行业协会等渠道，拓展国内外就业市场，为学生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政府就业指导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就业数据分析、创业补贴等服务，引导和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政府层面的就业资源和政策保障。

除构建“五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外，学校还应该充分发挥辅导员和就业导师的力量，建立一对一的帮扶机制，从求职材料的准备、就业信息的搜集、笔试、面试通关到最终成功入职和职场适应，均需要有教师进行全程的跟踪辅导，解决学生求职中的一切问题，助力其高质量就业。

五、结语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帮助其毕业时能够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但由于教学团队专业化不足、教学方法多样化不够、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学生求职就业屡屡碰壁，就业过程异常艰难。基于此，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改革框架：首先，通过建立课程导师、专家导师、行业导师“三位一体”的协同配合的师资体系，实现了理论教学、专业指导和实践演练的有机融合；其次，采用“四维联动”的课堂教学改革策略，在资源建设、教学方法、组织形式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创新；最后，打造“五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整合学校、院系、企业、政府和教研室的资源优势，形成全程化、精准化的就业服务网络。这一系统性改革方案为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填补了现有研究空白，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效果，以及不同院校类型的适应性调整策略。

参考文献

[1] 张瑜 . CBL 和 PBL 整合式教学模式在高职《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2, 38(02): 146−148.

[2] 姚琳 . “互联网 +”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指导教育的技术性创新研究 [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 2024, 33(01): 46−50.

[3] 余婧 . 产教融合视角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J]. 教师 , 2021(33): 127−128.

[4] 李海平 .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的探索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2022, 5(20): 27−29.

[5] 许琛 , 钟秋明 . 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强化大学生职业适应力培养的意义、现状及路径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 2023(11): 64−71.

[6] 卢卫斌 .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体系构建 [J]. 就业与保障 , 2022(02): 106−108.

[7] 朱明 , 窦铮 . 基于“三元交互”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探索——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为例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2023, 6(14): 113−11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北恩施学院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探索”（KYSZ202402）。

（作者系湖北恩施学院副教授）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提高政工师自身素养的思考

朱　燕

摘要：本文立足新媒体时代背景，结合政工工作实际，聚焦政工师队伍自身素养提升这一核心议题，系统梳理了政工师应具备的政治素养、业务素养、职业精神等核心素养内涵，探讨了新媒体技术在赋能政工师素养提升方面的独特优势，客观分析了当前政工师素养现状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而重点结合新媒体特性与政工工作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素养提升策略，旨在为事业单位政工师适应时代发展、提升履职能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新媒体；政工师；自身素养；思想政治；职业能力

当前，新媒体技术深刻重塑着信息传播格局和人们的思想交流方式，为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拓展空间的新机遇，也带来了应对复杂局面、提升引导效能的新挑战。事业单位政工师的能力、素质和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作的实际成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有效借助新媒体工具提升自身素养，更好地适应岗位要求，履行好凝聚人心、服务发展的使命，是每一位政工师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一、政工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内涵

（一）过硬的政治素养

政治素养是政工师履职的根本要求。要立场坚定、信念牢固，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是非分明，自觉在思想上认同核心、政治上维护核心、行动上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能够运用这些科学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思想问题；要深刻认识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牢记责任，切实站好岗、放好哨，坚决维护好单位的思想阵地和精神家园[1]。

（二）精湛的业务素养

业务素养是政工师履职的基本条件。在专业知识上，要通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发展历程、核心原则和常用方法，并懂得运用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来理解人、引导人；在核心业务上，要实现思想工作与日常业务、管理服务的自然融合；在组织协调与沟通上，要灵活策划活动、协调关系，让大家听得懂、愿意听，把心结解开；在调查研究方法上，能通过科学方式摸清干部职工的真实想法和实际困难，为精准开展思想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三）高尚的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是政工师履职的内在动力。要对政工事业怀有深厚感情，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甘于在岗位上默默耕耘，乐于服务他人，做支持他人成长的“铺路石”；要坚持原则，办事公道，作风正派，时刻严于律己，保持清正廉洁，在干部职工中树立起可信赖的良好形象；要开拓创新、勇于担当，思想不僵化，视野开阔，主动探索新思路新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尊重、理解、关心每一位干部职工，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尽力提供帮助。

二、新媒体赋能政工师自身素养提升的可行性

（一）渠道优势：拓展学习与实践的广阔空间

新媒体为政工师提升素养开辟了便捷高效的新途径。首先，它提供了海量的学习资源。政工师可登录“学习强国”、干部网络在线教育、关注专业微信公众号或在线课程平台等，获取最新政策解读文章、专业知识要点和各地优秀工作案例，大大丰富了学习内容[2]。其次，它搭建了便捷的交流平台。政工师可通过微信群、专业论坛或在线社区，突破时空限制，交流经验，请教难题，或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最后，它开辟了开展工作的新阵地。政工师可在平台上按规定发布信息、组织线上学习活动、策划主题宣传内容、进行日常思想引导，有效延伸了传统工作的触角。

（二）内容优势：丰富素养提升的内涵与形式

新媒体在内容呈现上为政工师学习成长提供了便利。首先，学习材料的形式更丰富多样。图文并茂、音频讲解、视频短片、直播授课、互动 H5 等多种方式，使理论学习变得生动直观，业务知识更容易理解，政

策精神解读更透彻深入。其次，新媒体平台汇聚了鲜活的工作实例，体现了对政工工作的创新探索，并提供了有效做法，为政工师借鉴他人经验、启发自身工作思路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库。最后，新媒体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功能，可根据政工师的学习兴趣和工作需要，推送更匹配的学习资源，提高学习的效率和针对性，让知识获取更加精准有效。

（三）评价优势：提供素养提升的反馈与激励信息

新媒体还为政工师评估自身工作和学习效果带来了新视角。首先，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其阅读量、点赞数、评论互动和转发情况等，能让政工师直观掌握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受众反应，为工作方法调整提供依据。其次，利用在线测试、知识答题、问卷调研等形式，政工师可以对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和能力水平进行自我检测和评估，发现短板，进行针对性学习提升[3]。最后，新媒体背景下的工作环境更开放透明，会接收同行交流评价、社会公众反馈等信息，能帮助政工师清晰认识工作中的优缺点，可以对其进行正向激励，促进其持续进步，明确后续努力的方向。

三、当前政工师自身素养的普遍现状分析

（一）政治素养的实践深度与网络应对能力有待提升

一方面，部分政工师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理解还不够深入，未能运用新媒体等新载体主动深化理论学习和创新学习方式，未能完全有效地将理论精髓转化为解决干部职工现实思想困惑的具体方法。另一方面，部分政工师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未能表现出政治敏锐性和较强的鉴别力，对于一些网络错误观点和思潮的辨析不够清晰，未能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引导、澄清是非，责任意识和实施策略也需要进一步强化[4]。

（二）业务素养的融合能力与新媒体技能存在短板

首先，对新媒体工具的实际运用能力相对欠缺。部分政工师对政务平台、在线学习系统、社交媒介等常用工具的掌握不够熟练，利用这些工具开展学习培训、政策宣传和思想引导的实践经验较少，限制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其次，思想政治工作与单位的核心业务结合不够紧密。部分政工师对单位主责主业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精准融入业务的关键环节，对运用新媒体探索两者融合新方法的尝试也显得不足。最后，对在线上环境中进行思想引导的方式不够适应。部分政工师仍习惯于传统的单向说教模式，缺乏运用互动讨论、分群体推送、情境体验等新媒体常用方式开展引导的能力，难以有效吸引职工群体特别是年轻职工群体的关注。

（三）创新驱动力与职业价值感有待增强

一方面，一些政工师习惯于按部就班完成常规任务，主动尝试利用新媒体技术的想法和行动力有所欠缺，创新的意识和实践能力需要进一步被激发。另一方面，由于政工工作的成效不易量化，部分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不足，未能很好地借助新媒体平台展示工作成果、传递积极声音、扩大正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在动力。

（四）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与危机管理经验相对欠缺

首先，在舆情监测和研判环节存在能力短板。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和实战锻炼，导致对涉及单位核心业务领域的网络舆论苗头捕捉不够及时敏锐，信息真伪辨别、风险准确预判和态势整体把握的能力需要提升[5]。其次，在线上沟通引导和危机处置的策略技巧不够成熟。当突发网络舆情出现时，部分政工师在快速反应、信息核实、权威发布、疏导公众情绪、化解矛盾焦点等关键环节的应对方法不够精准有效，特别是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危机公关的实际能力有待加强。

四、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政工师自身素养提升的可行策略

（一）强化思想淬炼，筑牢政治根基

首先，要打造“新媒体＋理论学习”模式，主动拥抱新媒体工具深化理论学习。积极利用“学习强国”、干部网络在线教育等权威平台，形成系统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机制。要关注高质量的理论类微信公众号，参与在线专题讲座，及时学习领会中央最新精神；要积极参与平台上的主题讨论区发言、在线知识竞赛答题等活动，通过互动交流深化对理论精髓的理解。总之，要养成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新媒体渠道常态化、沉浸式学习的习惯，使理论学习更灵活、更深入。

其次，要提升网络政治鉴别力，具备更强的线上政治敏锐性。要定期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上的网络舆情分析报告、意识形态动态研判等，学习识别、辨析各类网络思潮、错误观点的方法论。要勇于并善于在新媒体阵地、业务平台或社交媒介上，针对涉及原则问题的错误言论，及时、理性、有策略地用事实和逻辑批驳谬误，积极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自身的政治鉴别力和引导力。

（二）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履职本领

首先，要善用新媒体钻研单位业务。如对医疗系统政工师来说，要持续关注国家医保局、省市级卫生健康和医保部门的官方门户网站、政策发布平台及其专业解读账号，第一时间掌握医药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药品耗材集中采购规则调整等最新政策动态和权威分析；积极寻找并利用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系统学习与单位业务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以及基础理论、原理等，弥补知识盲区。

其次，要掌握新媒体传播技能。要有计划地系统学习新媒体内容策划、图文编辑、短视频制作、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运营管理以及数据分析等核心技能；并积极参加单位组织或上级推荐的线上线下结合的专

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运用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

再次，要构建线上交流学习社群。主动建立或加入由本单位及外单位政工同行、关键业务部门骨干组成的线上交流群组，如微信群、专业论坛板块等，定期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例、有效做法和最新的政策解读文章，就共同面临的难点问题进行线上研讨，邀请业务专家线上答疑解惑，通过思想的碰撞和经验交流，实现互助共进、共同提升。

最后，要模拟演练网络舆情应对方式。积极利用线上丰富的舆情案例分析库，系统学习舆情发生发展规律、监测研判方法和标准处置流程[6]。主动参与或组织模拟网络舆情事件的线上演练，在模拟环境中实践如何快速响应、准确核实信息、拟定发布口径、进行线上情绪疏导、化解核心矛盾点，锻炼在真实舆情压力下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有效沟通、引导和危机公关的实战能力。

（三）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工作实效

首先，要建设线上思想引领阵地，应着力将单位的政务新媒体打造成思想引领的主平台。不能仅仅满足于信息发布，更要精心策划内容，运用微视频讲述身边榜样故事、制作互动 H5 图解重要政策、尝试直播解读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干部职工关切等多元形式，努力使平台内容既有思想深度又富有人情味，成为干部职工愿意看、喜欢看、有收获的思想园地，持续传递正能量，弘扬单位核心价值观。

其次，要进行精准化、互动式引导。要注意观察和分析不同部门、不同年龄段职工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兴趣点及信息接收习惯，尝试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内容推送，实现分众化传播；要增强互动性，通过定期发布在线问卷了解职工思想动态，在平台上设置留言区鼓励职工进行反馈交流，或者有选择地开展线上“微谈心”活动，及时捕捉思想苗头，答疑解惑。

最后，推动线上线下一体融合。在线下讲座、培训或主题活动举办前，可通过新媒体预热宣传，营造氛围；活动中，利用直播让无法到场的职工同步参与；活动后，在线上展示精彩内容、分享成果，持续提升影响力。同时，线上征集的意见建议可为线下活动策划提供参考，线下活动产生的素材又可丰富线上内容，形成良性互动的工作闭环。由此，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吸引力和实际效果。

（四）涵养职业精神，激发内生动力

首先，可利用新媒体展示工作价值。通过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精心撰写的工作综述，讲述政工团队在思想引领、凝聚人心、服务发展中的具体作为和感人故事，宣传单位内部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他们的优秀事迹等，让干部职工和社会公众更直观地了解政工工作的意义，从而提升他们对政工工作的认可度，增强政工师自身的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

其次，注重榜样引领与同行带动，形成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主动关注权威媒体、政工专业平台对全国或本地区优秀政工师、先进基层党组织事迹的宣传报道，积极参与他们的在线经验分享会或事迹报告直播；认真聆听他们坚守岗位的敬业故事、破解难题的创新智慧和服务群众的奉献情怀，从中感受榜样的力量，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激发自身追求卓越、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最后，要建立线上互助支持网络。在政工同行建立的线上社群中，坦诚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压力和挑战，寻求理解和支持；或分享自己应对压力、缓解情绪的有效方法，交流工作中的点滴心得和实用技巧。在开放、包容、互助的线上氛围中，让政工师获得情感慰藉，找到共鸣，学习他人智慧，共同营造一个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职业共同体，有效缓解职业倦怠，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五、结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时代为政工师素养提升提供了全新路径与工具。面对新要求与新挑战，政工师需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将新媒体深度融入理论学习、业务钻研、方法创新与精神涵养的实践中。唯有持续强化政治根基、精进专业能力、创新工作模式、激发内生动力，方能切实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与实效性，为事业单位凝聚思想共识、服务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在新征程上展现政工队伍的新担当与新作为。

参考文献

[1] 徐宁 . “三个着眼”构建基层党支部书记激励机制 [J]. 企业文明 , 2023(07): 72.

[2] 李芳 . 刍议新时代青年政工师如何快速成长 [J]. 中国电力教育 , 2023(03): 34-35.

[3] 上海市政研会 . 打造高素质政工师队伍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 2025(05): 45.

[4] 李春民 . 推动高校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以咸阳职院省级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路径为例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5, 38(11): 15-17,21.

[5] 刘伊 . 基层单位政工师运用沟通技巧化解员工日常矛盾的策略研究 [N]. 河南经济报 , 2025-04-10(12).

[6] 王莹 . 学深悟透下真功 感恩奋进铸忠诚 [N]. 中国航空报 , 2023-08-29(04).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医药价格和集中采购服务中心）

数智 AI 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科学开展的策略与实践分析

赵启涛

摘要：在当前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智 AI 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各个领域。本文旨在分析数智 AI 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开展的策略与实践，强调以党建思想引领为科研工作明确方向，主要从强化理论学习和创新主题活动两个维度切入，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研究表明，可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校内骨干、组建跨学科团队等措施夯实人才基础。同时，应着力优化科研管理机制以激发创新活力，具体包括精简项目管理流程、改革评价模式、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并加强合作交流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本研究旨在为民办高职院校在党建引领下，实现科研诚信与数智 AI 技术应用的融合提供可行思路，从而推动民办高职院校科研水平提升与数智 AI 技术应用拓展。

关键词：党建；民办高职；科研工作；数智 AI

伴随科技的飞速进步，数智 AI 技术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数智 AI 技术的融入为科研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作为高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在科研工作方面，既承担着提升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也面临资源相对稀缺、科研基础较为薄弱等现实困难。从党建引领的视角而言，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与数智 AI 的融合研究与实践尚处于探索初期，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因此，深入剖析数智 AI 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科学开展的策略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党建引领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融入数智 AI 的意义

（一）学校发展维度

在当下高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科研实力是院校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党建引领为院校科研的质量与诚信工作规划了恰当的实施路径，保证科研工作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开展[1]。采用数字化智能 AI 技术，可助力学校在科研与诚信方面契合时代发展规律，造就特色鲜明的科研方向及成果，在同类院校中独占鳌头。党建工作凸显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科研工作借助数智 AI，可促进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培养、教学改革等方面实现协同成长。教学过程中采用数智 AI 技术，可推动教学方法的变革及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成果可对教学起到滋养的功效，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协同共进，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

（二）科研创新维度

党建倡导科研人员勇于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作为现时代科技发展前沿范畴的数智 AI，有着极高的创新潜在价值，民办高职院校把科研质量工作与诚信工作纳入数智 AI 范畴内，可开辟崭新的科研领域与方向，诸如智能教育、智慧管理、人工智能与专业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数智 AI 技术展现出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以及模拟能力。依托党建的引领效果，靠着数智 AI 技术可助力科研人员更高效地去收集、整理以及分析科研数据，及时辨认研究进程中的规律与困境，由此提升科研的效率与水平。

（三）人才培养维度

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科研诚信工作中引入数智 AI 技术，能使师生接触到前沿科技知识与研究方法，有效激发其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科研诚信和跨学科融合能力。党建注重发挥党员教师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应用数智 AI 技术，将促使教师持续学习以更新知识体系，提升自身的科研与教学能力。通过参与数智 AI 相关科研项目，教师得以深入理解数智 AI 技术原理与实践应用，从而更有效地将其融入教学过程，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四）社会贡献维度

党建要求高校科研工作必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民办高职院校通过推动科研工作融入

数智 AI 领域，能够为地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及智力支持。凭借党建引领凝聚的发展合力，民办高职院校有机会与行业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数智 AI 相关科研项目与技术攻关，通过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成果涌现。

二、党建引领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融入数智 AI 面临的难点

（一）资源层面

开展数智 AI 范畴内的科研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民办高职院校的资金来源情况相对单一，收入主要依靠学费支撑，没有获得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扶持资金资助，无法承受数智 AI 科研要求的高额开支 [2]。对科研项目的开展与深度研究起到约束作用。数智 AI 发展离不开大量高质量的数据基础，民办高职院校在获取数据事宜上面临一系列挑战，未拥有与企业、政府等数据掌控方的有效合作途径。面临获取真实、丰富、多样的行业数据的阻碍。在数据整合与管理方面同样存在问题，学校内部各部门的数据分散保存，标准依旧未达成一致，无法整合出符合科研要求的有效数据资源。

（二）人才层面

数智 AI 属于新兴交叉学科范畴，需要既懂党建知识，又具备扎实数智 AI 技术与专业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民办高职院校在薪酬待遇、发展平台等方面的竞争能力比公办院校弱，较难吸引且留住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现阶段校内大部分教师把精力投放到传统学科教学工作中，数智 AI 技术掌握及运用所达到的水平不高，难以契合科研工作嵌入数智 AI 的要求。学校未组建针对数智 AI 技术的系统培训体系，教师以及学生很难得到及时且成效极佳的培训机会，导致他们对数智 AI 理论及实践操作的认知不够全面，难以把数智 AI 融入科研工作。

（三）观念层面

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存在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两张皮”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党建对科研工作的引领作用。在推动科研工作融入数智 AI 的进程中，缺乏党建思想上的指引与组织上的扶持，致使科研工作没有明确清晰的方向及目标，较难借助战略高度助力数智 AI 与科研实现深度融合。民办高职院校具有相对传统的科研观念与模式，不断在熟悉的范畴开展相关研究，面对正处于兴起阶段的数智 AI 技术，产生害怕与抵触的心理。有部分科研人员抵触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缺少创新理念与进取干劲，对科研工作拓展至数智 AI 领域的进程形成阻碍。

（四）机制层面

现有的科研管理机制无法适应数智 AI 科研工作的特点与要求。在项目审批方面，传统流程较为烦琐、周期长，无法及时响应数智 AI 领域的快速发展节奏。在科研评价方面，仍以论文发表数量、课题级别等传统指标为主，未能充分考虑数智 AI 科研成果在创新性、实用性与应用转化价值上的特质，对促进科研人员投身数智 AI 研究的积极性形成妨碍 [3]。尽管党建带动高校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协作，然而民办高职院校在产学研合作工作推进上存在诸多问题。

三、党建引领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融入数智 AI 的策略

（一）夯实党建思想引领，筑牢科研诚信根基

明确科研的正确导向，必须强化理论学习这一基础环节。民办高职院校需带领科研人员深度钻研党的创新与务实理论，尤其需着重聚焦关于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以及科研诚信的重要论断。在开展学习期间，应采用多种模式，比如专题研讨班、线上学习平台等，让科研人员可以透彻、全面地领悟党的政策方针内涵。把党建理论与数智 AI 科研工作整合到一处，体现科研人员应从党的理论中汲取智慧力量，思考怎样让数智 AI 科研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相契合 [4]，诸如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产业等。凭借整合引领科研人员确立正确的科研价值理念，让他们认识到科研不只是着眼于个人学术成就去开展，更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符合国家与社会的期望，由此强化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积极开展主题活动是营造积极诚信科研氛围的有效途径。通过开展主题党日、科研诚信专题党课等活动，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与诚信自觉。在主题党日活动举办的同时，可就数智 AI 科研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研讨探讨，引导科研人员分享个人的想法主张。科研党课可聘请党建专家与数智 AI 方面具有权威性的资深人士开展授课。基于党建和科研两个范畴为科研人员拓展新的思路与路径，党员科研骨干在这些活动的进行中充当先锋模范角色，凭借自身当下的专业能力及党性修养，在数智 AI 科研方面积极探索、主动进取，凭借实际表现带动全体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到数智 AI 科研工作中，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

（二）整合多方资源，夯实科研发展基础

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是获取资源的关键路径。学校党组织应主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准确把握政府在科技创新、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政策导向。通过撰写扎实全面的科研项目计划书，充分展示学校在数智 AI 科研方面的特长与潜力，申请政府为科研设立的专项基金、数智 AI 产业扶持资金等。由政府构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是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强化合作的桥梁。学校可依托此类平台，介入政府所牵头举办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与企业以及科研机构一起开展数智 AI 方面的科研工作，实现资源互用、优势互补，为科研工作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化校企合作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学校

应主动与数智 AI 相关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学校主动开展合作对接，认清企业的需求及发展目标，共建科研实验室、实训基地等，企业可以把先进设备引入学校的科研实验室，为科研人员提供实际的行业数据与实践实例，推动科研工作进一步贴近实际应用的范畴。学校借助自身现有的科研优势及相关人才资源，为企业提供科研辅助，帮助企业打破技术壁垒，同时为企业培养符合其岗位需求的高质量人才。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有效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也能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注重人才培养，建强科研团队实力

引进高层次人才是快速提升科研团队实力的有效手段。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与支持下，学校应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如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良好的实验平台等，着力引进数智 AI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5]。这些人才是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技术骨干，他们在数智 AI 方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实践经验，依靠他们所发挥的引领与示范效能，有利于学校现有的科研人员增进专业层级，助力学术交流及合作，提升学校数智 AI 科研整体水平。

加强校内现有人才的培养是提升科研团队整体实力的长远之策。学校应系统开展数智 AI 有关的培训课程与学术讲座，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前往学校开展讲学活动，能使教师、科研人员接触数智 AI 领域相关的前沿知识及技术。培训课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教师及科研人员的实际操作本领，保障教师及科研人员投身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让他们掌握国际数智 AI 方面的前沿技术以及研究动态。依托此类活动，拓展他们的视野，催生他们的创新思维，为学校的数智 AI 科研工作赋予新的生命力。

（四）创新科研管理机制，激发科研创新活力

优化项目管理流程是确保科研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需建立与数智 AI 科研特点相契合的项目管理机制。通过将数智 AI 融入科研管理系统，使得科研项目周期短、变化迅速、创新性突出，简化项目审批流程，缩短项目审批的总体周期。采用线上审批、快速评审等执行手段，提升效率，促进科研人员及时开展研究工作，增强对项目实施进程的监督把控能力。建立项目进度跟踪与质量把控的制度体系，保障项目按照既定方案有效开展，迅速发现并处理项目实施进程中暴露的问题，维护科研项目稳步推进。

改革科研评价机制是激发科研创新活力的关键。传统科研评价模式里论文、课题占据主导，已跟不上数智 AI 科研发展的脚步，务必搭建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体系，统筹兼顾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应用转化价值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相关内容。若涉及凸显创新性的数智 AI 算法、模型等科研成果，需给予适当的肯定和嘉奖。

四、结语

在党建引领下，推动民办高职院校科研工作与数智 AI 深度融入，是一项具有前瞻性与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通过强化党建思想引领、整合多元资源、聚焦人才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深化协同合作等一系列策略与实践，民办高职院校能够在科研与数智 AI 融合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党建为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使科研人员更加明晰自身的使命担当，也有力促进了科研诚信建设。面向未来，民办高职院校应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持续探求科研工作与数智 AI 技术融合创新的有效路径，以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雷 . 基于“数字孪生 + 人工智能”的高校智慧党建系统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 2022(04): 1−2.

[2] 张书林 . 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 : 困境与路向 [J]. 理论探讨 , 2018(01): 7.

[3] 石勤 , 卢方 .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业财一体信息化应用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J]. 会计师 , 2022(11): 121−123.

[4] 邹永星 , 艾建平 . 科技创新背景下高校科研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J]. 大视野 , 2022(03): 18−22.

[5] 杨奎 . 融媒体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智慧党建”模式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 [J]. 时代人物 , 2020(23): 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苏州高博职业学院 2025 年度校级课题“民办高职院校青年教师科研素养提升路径的研究”（GIST2025−04）。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路径研究
——以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郑大斌

摘要：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高职院校作为党外高层次人才与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聚集地，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泛共识与合力支撑。加强统战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对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区域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本文认为，实践中应通过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大工作宣传力度、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建强统战干部队伍、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品牌等路径，切实推动高职院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关键词：高职院校；统战工作；提质增效；路径

高校是党外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是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关键阵地。必须始终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直以来，高校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阵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院校实际，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以强化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汇聚人心力量为基础，扎实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学校高质量发展。

一、背景和意义

（一）党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

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聚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制度机制和重要改革方向。在全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新历史征程上，必须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制度和机制，推动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这一决定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特别是新建高职院校统战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落实广西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部署

2025 年 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统战部长会议明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抓好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领域示范点建设，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推动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健全促进“两个健康”工作机制[3]。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4]。教育的初心使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对于新建的高职院校来说，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广泛地凝聚学校各界人士的共识。这就要求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始终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有效开展统战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尽管在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统战工作的具体任务和内容都不一样，但其核心目标都是以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务为出发点。“党的工作重心在哪里，统一战线职能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党的事业推进到哪里，统一战线工作就跟进到哪里。”[5] 高职院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主渠道，所以广西高职院校的统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始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广西成为农业强区和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与统战工作的独特优势相结合，引领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助力人才培养和服务学校高质量发展。

（四）学校基本情况

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是全区第一所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建设和管理、自治区教育厅业务指导的制造类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校于2020年4月10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2020年5月11日通过教育部备案。作为一所新建的高职院校，加强统战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对于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现状与挑战

高职院校汇聚了大批高水平技能型人才。这些教师群体不仅学历层次高、知识覆盖面广、职业技能精湛，更以活跃的思想特质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由于教师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学生“三观”的塑造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学校统战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高职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建校初期，学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将统战工作置于重要位置，通过搭建沟通平台、完善保障机制等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对照高水平高质量统战工作的目标要求，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是工作责任传导存在“温差”，学校各部门、二级学院及基层党支部在落实统战工作主体责任时，存在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现象，尚未形成上下联动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二是工作力量配置存在“短板”，统战干部多为兼职，日常事务繁杂导致精力投入不足，专业化队伍建设滞后；三是活动载体创新存在“瓶颈”，工作形式仍以传统会议、座谈为主，未能充分结合技能型人才特点设计特色活动，难以激发党外人才的参与热情。

三、探索与实践

自学校成立以来，学校党委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引导其发挥高理论知识、高技能水平的特点，主动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训室建设、产教融合和职业技能比赛。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充分利用职工之家、教职工文体活动等形式关心关爱和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和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同时通过“书记有约、校长下午茶”活动与少数民族同学代表开展面对面交谈，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特别是2024年以来，学校党委就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作出新的决策部署，强调要在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任务清单、方法措施、工作责任和保障支持上作出新的思考，要充分结合学校统战工作实际，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式方法。学校第一次党员大会强调要强化统一战线工作，以更加优异的统战工作成绩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学校研究制定一系列加强统战工作的措施。

（一）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各部门、二级学院负责人为组员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学校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学校党委定期听取党委统战部关于年度统战工作报告，党委会定期通过专题会研究学校统战工作，审议上一年度统战工作完成情况，对下一阶段统战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及时解决各层面统战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把统战工作纳入学校每年度工作要点，把统战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各部门、二级学院和各基层党支部绩效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在决定重大事项，特别是涉及教职工重大切身利益时，通过座谈会和发放问卷等形式主动倾听和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拓宽民主参与监督渠道。

（二）加强统战工作宣传

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把统战理论的学习和宣传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组织各党支部通过“三会一课”等形式加强学习统战政策，编印结合学校实际和特点的《统战理论学习材料》，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强化担当作为，在学校层面形成全员重视关心统战工作的浓厚氛围。在学校官方网站设立统战工作专栏，及时推送学校统战工作信息。邀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何文钜教授面向全体教职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安排落实统战专项经费集中采购一批统战书籍，如《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等，为学校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统战干部、党外知识分子拓宽统战知识学习渠道、丰富学习载体。

（三）扎实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

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师生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密切关注涉及民族与宗教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做好相关工作。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师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3—2025年均面向师生开展“壮族三月三”音乐节暨民族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主要围绕壮族文化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山歌演唱、壮族舞蹈体验等环节。活动内容包括师生们穿着民族服饰体验壮族走木板鞋、抛绣球、跳竹竿舞、唱山歌、跳民族舞蹈，感受壮族民族特色和文化魅力。开展“民族团结我同行 各族师生一家亲”系列主题活动。面向全体师生开展主题班会、民族文化课堂、交往交流交融等系列主题活动，以丰富的活动形式引导各族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大团结。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严格落实有关文件要求，严禁任何团体与个人在学校范围内开展

传教及实施各类宗教仪式和活动。同时坚决防范境内外敌对分子及势力借用民族宗教问题实施渗透、破坏与分裂，坚决防范和抵制各类邪教，维护学校团结安全稳定大局。

（四）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建立健全党外知识分子信息库与常态化联系机制。通过定期开展“思想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举办“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围绕教育发展热点议题交流研讨，引导广大党外人才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课堂教学、技能传授和校园生活各环节，自觉成为主流价值的践行者与传播者。积极建强载体、搭建多元平台，每季度召开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常态化开展联谊活动，把党外知识分子紧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全力关心支持他们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探索创新、在学生管理中倾注心力、在技能比赛中指导学子摘金夺银、在科研攻关中突破技术瓶颈、在助力乡村振兴中贡献专业智慧，既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也为其自身成长搭建广阔舞台。坚持“广泛团结、热情服务、积极引导、发挥作用”的方针，建立留学人员帮扶机制，精准关心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的学习科研、工作发展与生活需求。通过组织国情研修班、区情考察行、校史宣讲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强化其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在国际化办学、跨国学术交流、前沿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引导他们以实干投身学校改革发展。广泛建立党外知识分子联系网络，通过谈心谈话、问卷调查、线上交流等方式，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工作困惑和意见建议，有针对性提供支持保障，鼓励他们立足岗位发挥优势，在服务学校建设、助力地方发展中彰显价值。

（五）建强统战干部队伍

坚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放在干部队伍建设首位，注重对统战干部理论政策、专业素养、业务水平的知识培训，着力打造专兼结合、素质优良的统战干部队伍。组织统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将贯彻落实情况作为统战干部政治学习、政治引领的重要内容。2025 年，学校党委围绕解决基层统战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问题，重点加强统战工作网格体系建设，在学校所有党支部设立统战委员。统战委员的增设进一步健全统战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压实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形成推进统战工作的强大合力。

（六）打造“三同三匠”校园文化品牌

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于 2025 年提出了“三同三匠”校园文化品牌建设。“三同”指的是同心、同梦、同德。凝聚师生共识，追求“修德练技、创业报国”的共同价值观，激发师生技能报国、创新强国的职业理想。引导广大师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下一心、同心同向发力，奔向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共同梦想。“三匠”指的是育匠人、守匠心、铸匠魂。通过技能竞赛、实践实训、产教融合等路径，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通过文化浸润、榜样引领、制度保障，传承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态度。通过红色教育、校企合作、国际交流，培育具有家国情怀、行业使命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品牌建设成果主要包括创作校歌、打造二级学院院训、建成长约 110 米的党建红色文化长廊、打造“党建 + 思政”育人基地，组织师生参与 VR 沉浸式体验思政课程等。同时更改校园内道路和相关报告厅的命名，如调整后学校报告厅的命名有“同心厅”“同德厅”“同梦厅”。

四、总结与体会

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是高职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上持续用力。未来，学校将进一步探索统战工作与教育教学、产教融合深度结合的路径，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能，团结带领全体师生员工，为学校事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 孙信 .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EB/OL]. (2023-08-21)[2025-07-23]. https://www.zysy.org.cn/article/4EDBco7OvyD.

[2] 代晓灵 .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EB/OL]. (2025-01-03)[2025-07-23].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5/0103/c40531-40394828.html.

[3] 佚名 . 全区统战部长会议在南宁召开 [EB/OL]. (2025-01-21)[2025-07-23]. http://jyt.gxzf.gov.cn/ztzl/tzgz/gzdt1/t19548011.shtml.

[4]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2.

[5] 张献生 . 研究把握统一战线工作规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22(06): 5-15.

（作者单位：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

刘志锋

摘要：当前社会对医学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着个人的成长发展，更影响着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安全。新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医教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主要阐述了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意义，并从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开展多样化实践活动、加强家校合作共育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进而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高职医学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心理健康；医教协同育人；高职医学生

高职医学院校承担着培养基层医疗人才的重任，当前学生受学业压力大、临床实践挑战多等诸多因素影响，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医教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助于促进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高职医学院校应积极优化课程体系，基于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和成长需求，设计包含基础心理健康知识、临床心理应用实践等分层递进式课程模块，同时还应积极开发校本特色教材及教学资源。在学校实训中心，可以设置模拟门诊、病房等场景，积极开展社区医疗服务实践的心理概念项目，强化临床实践体验；同时还应建立良好的家校沟通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服务渠道，进而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高职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意义

（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职医学生在学习期间面临着多重压力，在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有机会接触真实的患者和医疗场景，亲身体验到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和责任重大，从而学会如何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挫折。而且通过医教协同，学生在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患者的痛苦和需求，培养出关爱他人、尊重生命的人文情怀；参与临床实践活动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和毅力。医教协同过程中，学生跟随医生查房、会诊、参与病例讨论等实践活动，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诊断和治疗方案，深刻体会到医学的魅力和实用性，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专业知识。传统的课堂教学忽视了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医教协同育人模式打破了这一局限，使学生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所学理论，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为后续的理论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新的视角，形成良性循环[1]。

（二）推动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养成

医学从业者必须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医教协同实践中，学生会感受到医院的文化氛围和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如保密原则、廉洁行医等，在榜样的影响下，逐渐树立起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培育医务人员应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如在处理医患关系时，观察到老师始终以患者为中心，耐心解答疑问、精心治疗护理，学生也会懂得尊重患者权益的重要性。高职医学生毕业后，大多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参与社区医疗服务、义诊活动等社会实践项目，直接接触到不同层次的人群，了解社会的健康需求和卫生现状，促使其意识到自身工作是一份社会责任，促使其努力提高所在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为改善公众健康状况贡献力量[2]。

二、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优化课程体系

优化课程体系是实现有效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路径，高职院校应积极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系统讲解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包括个性心理特征、心理过程等，帮助学生理解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原理，同时融入医学素养课程，探讨医生的职业角色与心理品质的关系。在讲述医患纠纷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心理

学角度，分析患者与家属情绪反应的需求，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化解矛盾。在优化课程体系中，还应注重完善专业技能培训课程模块，开设一系列临床心理学选修课程群建设，侧重于培养学生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实验课见习等环节中，有意识地设计心理技能训练项目。在当前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学校还应积极加强网络课程平台建设与应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视频、讲座、电子文档等数据库，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度，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并丰富平台功能，通过在线答疑、论坛交流等实现个性化学习。此外，教师还应将传统教学与网络课程有机结合，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打造专业化师资队伍

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在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从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选拔优秀人才，确保教师可以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更好地理解学生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同时还应选择具有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经验的人员，为学生提供丰富素材，增强教学的实效性。高职院校应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国内外知名的心理学学术会议、研讨会等，更新知识，如学习认知行为疗法等技术，安排医生、学者、专家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系统的医学知识培训，促使其熟悉人体解剖学、心理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课程内容，在辅导学生时能够更好地结合专业知识，解释心理因素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机制。此外，高职医学院校还应制定详细的岗位职责说明书，明确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工作内容、目标、任务，将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改善情况、科研成果等因素纳入考核指标，鼓励教师开展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科研项目，并设立专项基金给予支持，同时通过表彰大会颁发荣誉证书等给予精神激励，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3]。

（三）积极开展模拟诊疗中的角色扮演活动

医教协同育人背景下，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胜任工作、实现职业发展的关键。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可以开展模拟诊疗中的角色扮演活动，鼓励学生扮演医生、患者、家属等不同的角色，在积极培养沟通技巧及团队协作能力的同时，增强自我管理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基于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模拟诊疗案例、脚本案例，内容涵盖症状表现、治疗方法、疾病类型等多方面的内容，明确各个角色的人物和台词，同时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使学生在活动中相互启发、互相学习。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还应结合学生的表现给予专业的指导，积极采取奖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角色扮演活动，并根据其特点适当安排合理的角色。教师还应将角色扮演活动融入日常教学过程中，利用碎片化的知识进行小型的案例讨论以及简单的角色扮演活动。活动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总结讨论，促使其分享自己在活动中的感受和评价。为了进一步增强活动的实效性，教师还应充分利用学校的实训基地和实验室搭建临床实训场景，配置齐全的医疗设备和道具，积极参与指导，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实用的指导和建议。

（四）开展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

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患者的安全，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中锻炼自我、提升能力。高职医学院校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目标和教学计划，将心理健康教育元素融入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如在学生学习内科疾病诊断与治疗课程期间，可以安排学生到社区卫生中心进行慢性病随访志愿服务，促使其在实践过程中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学习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此外，还应针对不同年级、阶段的学生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活动方案，高年级学生可以参与到临床辅助工作、急救演练等专业性较强的实践中，同时活动应设定具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高职医学院校应积极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和合作网络，积极与当地的医院、卫生服务机构、福利院等合作，还可以与社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项目，使学生跟随医生随访，了解居民的健康档案管理流程和家庭医疗保健需求。此外，在当前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加强校内模拟实训中心的建设，通过各种临床操作技能训练，设置相应的心理应激情景，通过虚实结合方式，使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4]。

（五）加强家校共育

医教协同育人背景下，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难以有效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应加强家校合作共育，学校应改变传统家长会单一汇报成绩的模式，邀请心理学专家和资深教师讲解高职医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方法，建立班级微信群、QQ 群或其他在线学习平台，方便教师与家长进行日常沟通交流，还可以开展线上家长会，打破时空限制，提高家长的参与度。高职医学院校应积极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户外拓展项目，通过地图辨识、接力障碍跑及信任背摔等合作游戏项目，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与默契，在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元素，引导学生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此外，还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延伸到社区，邀请心理健康教师走进社区举办讲座，其内容包括如何建立亲子沟通模式、了解心理异常信号等，进而提高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高职医学院校还可以针对学生和家长的特点及需求系统地开设一系列培训课程，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模式，使家长在实践过程中，掌握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同时向家长推荐文章、网站等教育资源，帮助其自主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和家庭教育技巧。

（六）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其心理调适能力。高职医学院校应在校园的整体规划中，融入医学符号和理念，在道路或广场中设置人体解剖模型展示区、中草药植物园等特色景观，使学生随时随地感受到浓厚的专业氛围，激发其对医学科学的探索兴趣；利用走廊、墙壁等空间打造校园文化长廊，展示学校的办学历史、医学科技成果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学生传播医学知识和文化，弘扬救死扶伤的精神，并定期更新展示内容，保持其新鲜感和吸引力。学校应围绕医学职业道德、医学史等方面开展系列主题教育，邀请行业专家、资深医师举办讲座，分享其从业经验和感悟；每年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文艺创作和表演，举办医学人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将医学知识与文化艺术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学校还应注重行为文化建设，开设礼仪课程，教授学生基本的社交礼仪、职场礼仪和医疗礼仪知识，通过课堂讲授、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言行举止规范；同时积极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举办运动会、球类比赛、健身操大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运动氛围。引导学生养成定期锻炼的习惯，增强体质，缓解学习压力[5]。

（七）完善心理测评与干预机制

高职医学院校在完善心理测评与干预机制中，应构建科学全面的心理测评体系，结合医学临床实践要求，筛选已有的信效度较高的专用于医学领域的心理测评量表，鼓励校内专家与校外专业机构合作，共同研发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化测评工具，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测评模式，并引入同伴互评、自我评价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方式，从多个角度获取关于学生心理状态的信息，使测评结果更加客观全面。高职医学院校应打造专业化的心理干预服务平台，构建校内心理咨询室、院系心理辅导站、班级心理委员三级服务网络，其中院系心理辅导站贴近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场景，负责本院系学生的初步接待和转介工作。通过三级服务平台的有效衔接，实现对学生心理问题的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针对高职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常见心理问题，设计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干预项目，如开设医学人文素养提升课程、组织模拟诊疗情境下的压力管理工作坊、举办医患沟通技巧训练营等，实现医教协同育人的目标[6]。

三、结语

医教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学校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在该模式下积极开展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适应医学职业的特殊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障医疗安全和质量。高职医学院校应积极打造跨学科团队，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医学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中，开发特色教材，并鼓励教师创新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教学模式。此外，高职医学院校应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可以安排学生尽早进入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体验医院的真实工作环境；组织开展社区义诊、健康宣教等活动；成立心理健康协会志愿者服务队、学生社团；组织并完善心理测评与干预机制，根据测评结果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层次，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进而不断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开展，提高高职医学生的心理素质。

参考文献

[1] 王莹华，张静．医教协同育人模式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23(06): 42-45,84.

[2] 史略，金光美．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医学类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4(46): 185-188.

[3] 高婷．基于职业素养提升的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改革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 23(05): 155-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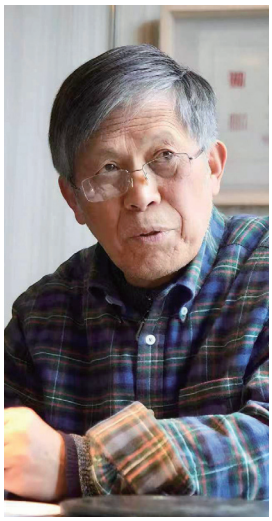
[4] 田伟翠，余彩云，黄秋莲，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路径 [J]. 职业教育，2023, 22(26): 35-38, 63.

[5] 靳晓霞．对联合培养模式下医学类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 [J]. 职业，2022(01): 94-96.

[6] 李媛．健康中国背景下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探析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5): 156-158.

（作者单位：北京知本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苏金海，1952年生。江苏南京人。擅长篆书及甲骨文、金文治印。现为西泠印社社员，南京印社及南京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至第七届篆刻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先后在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和相关高校执教篆刻近40年。

1983年获《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首届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1986年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作品奖，2001年获南京市政府第四届文学艺术奖银奖。篆刻作品入展第五、七、十一（特邀）、十二届（特邀）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一、二、三、五、六、七、九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当代书坛名家系统工程·五百家书法精品展等国内外重要展览一百余次。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西泠印社、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等多家机构收藏。2021年在金陵美术馆举办苏金海书法篆刻展。历年出版有《苏金海印集》《苏金海刻心经》《金海印谭》《苏金海·书法篆刻》等。

自强不息 书印参同

——记书法篆刻名家苏金海

彭一超

苏金海是当代印坛颇具影响力的印人之一，大凡年龄在50岁以上的那一辈印坛同仁，没有不熟悉苏金海这个名字的。早在书法篆刻热潮兴起初期的1983年，他篆刻的《洛阳》《吾将上下而求索》《毛遂自荐》等6方古玺印风作品，荣获上海《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首届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他从此名扬当代印坛。近半个世纪以来，一方面，他立足金陵传道授业，深耕教坛近40年；另一方面，以书法篆刻传薪，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他是当代集书法篆刻教育、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于一体的书法篆刻名家。

与苏先生的交往，始于多年前笔者在京主编北京中韩书画家联谊会纸质会刊《书画史记》（2017—2021），此刊每期开辟专门推介具有较高创作水平的西泠印社社员的专版“印人传”；基于此，经北京名家友人推荐后，笔者于2019年9月28日第9期（总第29期）刊物中给先生编辑出版了一期“印人传·苏金海”连版专题；特别是在近几年因工作关系多次通过电话或微信请益先生的过程中，能感知他语言平和，口不臧否人物，交谈中绝不妄言的务实求真精神，一如其书法篆刻创作风格。先生每有出版自己的专著，都会寄来一本分享。因此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苏金海长期致力于甲骨文、金文等上古文字的研究与创作，潜心研究古文字，书写古文字，篆刻古文字，数十年如一日，陶醉其中，乐此不疲，堪称一位纯粹的学者型书法篆刻家。他早年幸得金陵甲骨文书法篆刻大家秦士蔚（1922–1999）亲炙，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尤擅长以甲金文字入印；后受教于著名印学理论家、西泠印社理事徐畅。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研习书法篆刻艺术和古文字；到了80年代各项参展获奖作品呈现出工稳型甲骨文古玺印风；再到新世纪后其刀下作品便出落成写意甲骨文印风，这无疑凝聚着他毕生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不懈的学术探求。其篆刻创作始终秉持清人邓石如提出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

的审美理念。从而完美实现了作为一位风格稳定、创作成熟的优秀篆刻家的风范。

2021 年 9 月，南京书画院在地处南京老门东的金陵美术馆举办了苏金海书法篆刻展，其实，该展览是先生诸多弟子们热心具体操办的。笔者虽未能前往观摩学习，但先生于 2022 年 4 月安排寄来了当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开精装版《苏金海・书法篆刻》一书，故能一睹其展览作品风貌。一向治学严谨、行事低调的先生，从艺 50 余年来，他从未主动张罗过自己的个展，其弟子们为先生实现了梦想，实属难能可贵。著名山水画家、南京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在展览序言中这样评价先生：“印如其人，书如其人。苏金海书法篆刻作品与其人格精神是相一致的。……他是一位有风骨的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支配了他的一生。一如他的印风、书风，他刚正直率，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向困难低头，不为名利所动。甘于寂寞，敢于坐冷板凳。身处低微，气宇不卑不亢；胸有浩气，作品自不同凡响。”

观先生近 20 年的篆刻作品，主要有拟甲骨文、金文入印两类，如甲骨文印代表作品有“衣莫若新”（白文），“不可一日无此君”（朱文），“不为无益之事”（白文），“印从书出”（白文），“宁作我”（朱文）；先生金文印代表作有“删去平生多余事”（白文），“盍山精舍”（朱文），“揆古察今”（白文），“君子不器”（白文），“文章千古事”（十字格白文）等；其他有少量拟汉印风格的作品，如自撰句白文印“四十二年老园丁、六十七后读元史”等。印蜕信息量大，内涵丰富，用篆严谨，印风平实，其字法构形和印边绝不做刻意变形，彰显了先生创作的勤逸、率真与执着。

以上所举若干印例，反映了先生以甲骨文、金文入印的主打印风，古朴典雅，刚劲雄强；且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尽可能保持入印文字的纯洁性，如甲骨文和金文入印尽量不混杂其中，但特殊情况例外。当先生读到 2020 年第 8 期《西泠艺丛》刊出李宗焜教授撰写的《甲骨书风在篆刻艺术的应用》一文后，先生撰文作了回应，他明确提出：“我的看法是，甲骨文篆刻最好还是姓‘甲’（全甲骨），在缺字万不得已时，也要力争将非甲骨文字的占比降到最低限度。”意思是刻甲骨文印尽量不要假借字或移植字。

先生的篆刻得到了诸多印坛名家的盛赞，如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撰文：“金海兄是专业印人，这不是说他以刻印为职业，而是指他站在纯粹的篆刻艺术立场潜心刀石，神游千古，贯通融会，自成一家。其创作理念与作品是非常专业化的。”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赵熊说：“篆刻艺术已成为金海先生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早在 30 多年前他已蜚声印坛，迄今始终没有停止进取探索的步伐，表现出一位文化传承人的宽大胸怀和真诚态度。金海兄的篆刻以刀笔成心画，以写意为形式，无论是在秦汉印或是在古玺印的研究创作中，都不断以现代人的审美思想，努力赋予作品以时代精神。”

先生在《习篆心语》中坦言：“余习篆治印迄今已逾五十载。就习篆而言，体会有四点，若多写，多查，多看，多练……”这“四多”也许是先生毕生对篆刻艺术认知与创作的精辟概括与总结。诚哉斯言！

先生治学从艺之余，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 2017 年 7 月至 8 月，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一日一印”栏目前后做了 15 次篆刻专题讲座；2023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举办“漫谈篆刻临古与创作”讲座；同年 12 月，在暨南大学举办“我与篆刻五十年”讲座。近 20 年，先后向南京市慈善总会、西泠印社、海南省博物馆、江苏省红十字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捐赠书法篆刻作品近百件。其中，包括 2020 年向南京援鄂白衣勇士赠刻姓名印 3 方；2023 年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人民当家作主”篆刻作品 1 方；2024 年向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和杭州第 4 届亚残会组委会捐赠篆刻冠军印 2 方。如今先生的公益行迹仍在与时俱进、与艺术同行。









△ 持养（附边款）
直径 3.2cm



△ 印从书出（附边款）
3.8cm×3.8cm



△ 宁作我（附边款）
3.5cm×3.5×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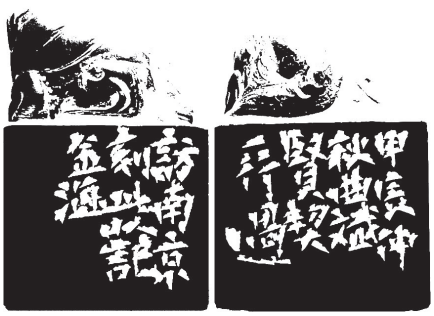


△ 揆古察今
3cm×3cm





△ 以德服人
3.2cm×3.2cm



△ 高轩过宁（附边款）
3cm×3cm



△ 正大气象
5.7cm×3.7cm



△ 青云不及白云高
4cm×4cm



△ 君子不器
4cm×4cm



△ 文章千古事
4cm×4cm



△ 绝交不出丑言
3.5cm×3.5cm



△ 删去平生多余事
3.4cm×3.4cm









△ 衣莫若新（附边款）
2.6cm×2.6cm



△ 斗米恩（附边款）
2.5cm×2.5cm



△ 知止（附边款）
2.6cm×2.6cm



逐梦艺术 躬身有为

——记知名山水画家刘振江

王 田

刘振江是一位书法、中国画兼擅的双栖艺术家。我们相识几十年，早年是战友，现在是画友。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世界。

刘振江受其父亲的影响，青少年时代就喜欢写写画画。在农村集市上，那些色彩斑斓的年画，那些描绘着神话故事、丰收场景的画面，一本本充满奇幻冒险与精彩故事的小人书，都成了他儿时艺术启蒙的教材，这一切都在他心中播下了艺术的种子。没有画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在木板上，勾勒心中的图案；没有画纸，大地和木板就是他梦想的画布；那些简单的线条，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艺术表达。

中学阶段，他对书法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农村的夜晚，唯一的光亮就是煤油灯，那盏跳动的火苗，点燃了他对书法的热情，练书法也成了他追寻精神寄托的重要方式。每到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刘振江不知疲倦地练习书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练就了一番童子功。每逢过年，他经常帮助左邻右舍写春联，那一幅幅饱含着祝福与希望的春联，贴在农家的门上，不但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也让父母为他感到自豪。

1969 年冬，刘振江成为一名通信兵，在高强度的训练与备战之余，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因为艺术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连队的黑板报、宣传橱窗、围墙都是他展示才华的舞台；他的作品也成为连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的插画作品，常常引来战友们的驻足欣赏，大家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 。

1974 年，他认真创作了中国画《西沙报捷》，以西沙海战为背景，硝烟弥漫的海面，中国海军舰艇奋勇作战，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场景，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作品把中国军人的顽强斗志和爱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入选了全军美展，自此他的美术创作在部队中声名远扬。

1975 年，刘振江凭借着自己扎实的绘画功底和在部队中的出色表现，被部队抽调到西安举办的通信兵美术骨干创作集训班学习，由西安美院的杨国光、陈光健老师授课；通过三个多月的集训，让刘振江在美术创作和理论等方面大开眼界。他珍惜机遇，勤学苦练，不断尝试，使绘画技巧突飞猛进。

刘振江，1952 年 1 月出生于山东滨州，笔名易石，字兆溪，斋号响石斋，北京人。曾就读于西安美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于中央美院中国画专业，一级美术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通信战士》杂志美术编辑、记者。曾获全军书法大赛二等奖，其书法作品被多处碑林勒石刊刻。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军各类主题美术作品展并有作品获奖。2020 年 11 月在山东滨州举办《故乡情·黄河韵——刘振江书画展》；2022 年 6 月中国教育电视台《墨香》栏目为其录制《祥帆迎朝晖》《和风送清凉》两期专题片播出。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刘振江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山水画，为了深入学习山水画技艺，他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前往“西单夜校”自费学习。他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一笔一画地描摹着每一个线条，每一处皴、擦、点、染，他都认真揣摩，力求领悟其中的精髓。那些古老的技法，在他的笔下逐渐复活，成为他探索山水画世界的基石。无数个夜晚，当别人娱乐或休息时，他却在夜校的教室里，专注地临摹那一幅幅经典画作。1985 年，他精心创作的中国画《幽谷雄姿》在通信兵 “军地两用人才书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1989 年，刘振江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部队安排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进修。他受到了更为系统、专业的艺术教育，先后得到刘大为、王天胜的艺术指导。这使刘振江的艺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1992 年，他又转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在这里，他先后得到伍必端、钱绍武、韩国臻等名师的亲授，使他更加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前沿的艺术理念和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 。

刘振江始终牢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念。他深入太行山区写生，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他利用采风素材创作的六尺四条屏《老区风情》，生动地展现了太行山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入选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他还以太行山“王莽岭”为素材，创作巨幅中国画《山岳图》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此外，他还多次深入峡江、长江三峡采风写生。在游历长江三峡时，他画了厚厚的一本速写，将三峡的每一处险滩、每一座山峰、每一片云雾都记录下来。归来后，他根据这些速写，创作了巨幅中国画《峡江图》（136×410cm），后被北京前门烤鸭店收藏陈列。美术评论家朱铁力说：“在我认识的书画家中，刘振江是一位为人朴实谦和、治学严谨且在艺术上多才多艺的高手……纵观他的作品大都笔墨苍秀、典雅清新、雅俗共赏，这和他具备较丰富的知识和多方面的素养是分不开的。他积极参加各种公益书画活动，奉献爱心。人品、画品，令人敬佩。”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程振国撰文指出：“观振江的画犹如置身在一个清新雄秀、幽雅天成的世界里。他追求壮美、清秀，其作品可谓雅俗共赏。读他的画有真情、有气势，博采众长、别具一格。既有北方山水的浑厚雄健，又有长江三峡的壮美秀丽。……也有江南水乡秀美清幽的小桥流水。不同的作品能给人以不同的艺术享受。”

近二十年来，刘振江还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他多次为灾区、边远山区、慈善事业等捐献书画作品，用自己的艺术才华传递爱心，用书画作品回报社会，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他积极参与“心系汶川全国美术作品特展”并捐赠作品；2010 年 4 月，被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授予“心系玉树、大爱无疆、齐心协力、共建家园”——扶残助残贡献奖；2013 年，他参加“母爱大如天、书画传真情”活动，为雅安灾区母亲义捐义卖书画作品。2018 年 2 月，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万福送万家”书春活动。他还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天津音像公司、海洋音像公司、中国华艺有限实业公司、中国和平音像公司等单位设计音像海报近百种，海报总发行量超过 10 万份。他在部队服役期间曾为《解放军画报》写了很多精彩的标题书法，广受读者的好评。

刘振江山水画作品选刊



△ 刘振江 《江南春风图》 248cm×90cm



◁ 刘振江 《山水清音》 136cm×6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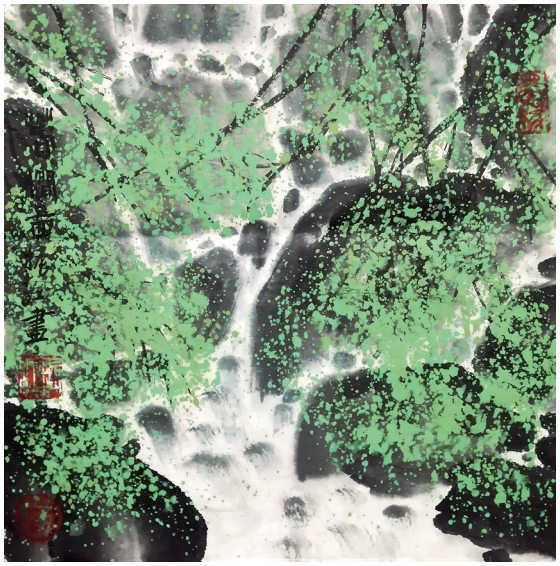
△ 刘振江 《翠湖春帆图》 90cm×50cm



◁ 刘振江 《家在青山绿水间》 138cm×68cm



△ 刘振江 《清溪泊舟》 69cm×69cm



◁ 刘振江 《春泉图》 35cm×35cm



△ 刘振江 《春山清泉图》 68cm×45cm


公益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01>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2026年1月（上）总第189期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